毛澤東與林彪

馮治軍 著




林彪與毛澤東

馮治軍 著

皇福圖書

林彪與毛澤東・馮治軍　著

出版：皇福圖書
皇福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 71802 號

印刷：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 27 號德景工業大廈 10 字樓

ISBN 962-8195-01-8
一九九六年八月　香港第一版
一九九七年一月　香港第三版



三十年代初，毛澤東與林彪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這是文獻中所見最早的毛、林兩人的單獨合影。



毛澤東與林彪在陝北



抗大校長兼政委
林彪為學員作報告



抗大校門



毛澤東在延安



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林彪



林彪在平型關戰場（1937 年）



1938年冬，謝覺哉（左起）、李天佑、林彪、趙品三、鄧小平在八路軍駐陝辦事處合影

北平和平解放後，林彪（中）、羅榮桓（右）、聶榮臻（左）在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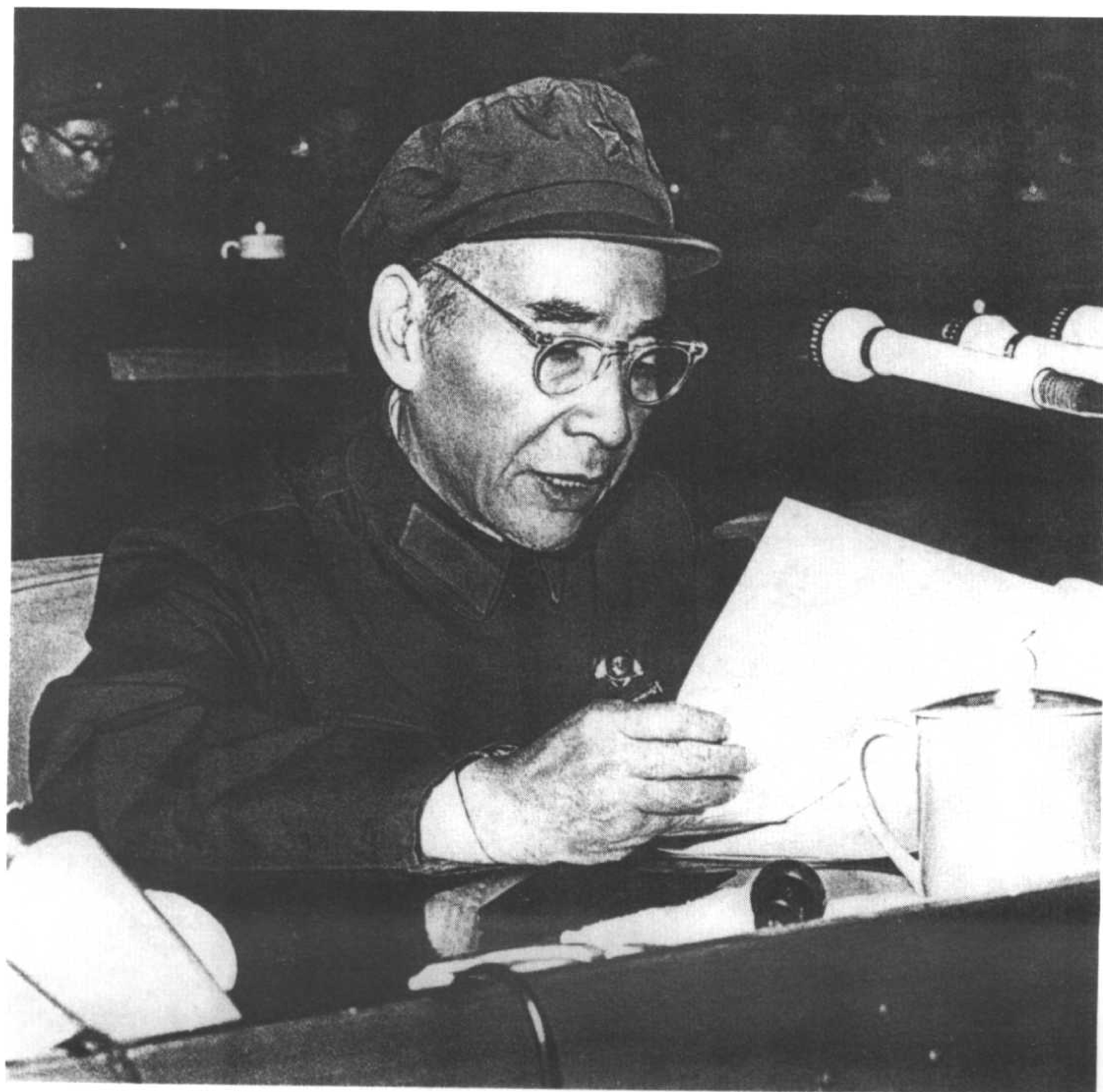
文化革命初期，毛澤東與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

毛澤東和林彪、陶鑄在天安門城樓上（1966 年）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在題詞

1969 年 4 月，毛澤東與林彪在中共“九大”會議上。



1969 年 4 月，林彪在中共“九大”上作政治報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叛逃時所乘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的現場。



林彪的256號三叉戟座機的殘骸



林彪的屍體



葉群的屍體

前 言

「林彪與毛澤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引人入勝的題目，又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困難的題目。之所以困難，是因爲這方面的資料，被深深地埋藏。

今年，一九九六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三十周年，毛澤東逝世二十周年，林彪叛逃身亡二十五周年。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但這段歷史和整個事件，仍然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其原因是，公開的資料少，對這段歷史和整個事件進行深入客觀的研究，從而得出明確而公正結論的就更少。目前不僅需要有更多的資料公開，而且更需要有深入、客觀的研究，避免羅列現象、人云亦云、因循那些不正確的定論和框框，以便去僞存眞，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將中國現代史上逝去的兩位最重要的人物——毛澤東與林彪，放到公正的歷史的天平上。

本書不是現象和事實的簡單的羅列，而是多年來研究和探索的一點成果，算是引玉之磚。本書所引資料，均有出處，重要的資料注明引處，以便於讀者參考。

本書並不是對毛澤東和林彪這兩位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作全面的評價——那是《毛澤東傳》和《林彪傳》的任務。本書僅是從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這個角度，去探討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些問題，以便於盡力表述這一段歷史的本來面目。

如果本書能成爲一面歷史的鏡子，讀者諸公從中有所裨益——那就是作者的最大心願了。

序篇 歷史在「九·一三」轉彎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

一架中國民航編號爲二五六三叉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倉促發動，於一片漆黑中匆匆向跑道滑行。由於沒有燈光照明，飛機在滑行道上與油罐車相撞，飛機右翼上的航行燈將油罐車頂部車口蓋的螺絲桿撞彎，航行燈也被撞得粉碎。飛機在黑暗中滑進草地，發動機發出震耳欲聾的響聲。飛機在草地里滑行了一百多米才上主跑道，緊接着，飛機加大油門，發動機飛快運轉。二五六號飛機在沒有開跑道燈、沒有地面控制塔指揮的情況下，強行起飛了。

二五六號飛機上的乘客是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還有隨員和機師，他們是飛機駕駛員潘景寅、機械師張延奎，空勤機械師李平，特設機械師邵起良，林彪座車司機楊振綱，以及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小艦隊」的頭目劉沛豐，總共九人。飛機的航向先往西，然後折向北方，直往外蒙古飛去。

北戴河林彪駐地的八三四一警衛部隊負責人張宏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報告了情況，山海關機場也向北京報告了二五六號飛機強行起飛的情況。

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調度指揮室的雷達，密切地跟蹤、監視着二五六號飛機。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會議，討論他即將在四屆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接到中辦主任汪東興的報告後，周恩來立即停止會議，下令李德生將軍到空軍司令部坐

陣，而自己則馬上驅車到中南海毛澤東的住地。

在中南海游泳池，花木扶疏，星光燗爍，四周一片寧靜。毛澤東的住處裏，燈火通明。剛剛從南方巡視回京的毛澤東，身穿寬大的睡衣，正坐在書房裏，聽取周恩來、汪東興、張耀祠等人的匯報。空軍司令部指揮室不斷地將二五六號飛機的航向、時速、高度、位置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便馬上向毛澤東報告。

在南方巡視時，毛澤東向各地的黨、政、軍大員吹風、打招呼，準備在九月底十月初召開的中共九屆三中全會上解決林彪的問題。現在，想不到林彪竟然先發制人。對這個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毛澤東不知所措。他緊皺着眉頭，一口接一口地抽煙，偌大個書房裏彌漫着緊張的氣氛。

李德生將軍從空軍司令部打來電話請示：二五六號飛機已飛近中蒙邊境，要不要派殲擊機攔截？

書房中一片寂靜。周恩來、汪東興、張耀祠都將目光投向毛澤東。

毛澤東猛抽着煙，一陣陣青色的煙霧籠罩着他的全身。沉吟了好一會兒，毛澤東才說道：

「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不要阻攔，讓他飛吧！」

毛澤東的聲調中飽含着深深的無奈和痛楚。

汪東興向李德生將軍轉達了「不要阻攔」的指示，林彪的座機直飛向北。

空軍司令部的調度員繼續報告：「飛機在中蒙邊界四一四號界樁上空越出國境，進入蒙古。」幾分鐘後，飛機的綠色點子從雷達的熒光屏上消失了。

這時正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時五十五分。

林彪逃出了中國，但並沒有逃脫厄運。二五六號三叉戟座機飛過中國邊境才十多分鐘左右，便在蒙

古的一片荒涼的草原上失事燒毀。

據在當地宿營的牧民說，在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時左右，傳來了幾聲爆炸的聲音。牧民們跑出屋外，只見一架飛機墜毀，發動機上噴着熊熊的烈焰。失事的地點是一個草原上的丘陵間盆地，到處覆蓋着半人高的茅草，周圍是一望無垠的杳無人煙的荒原。那就是蒙古的一個名不經傳的小地方——溫都爾汗。

二五六號座機的殘骸散佈在一片燒焦的原野上。秋風蕭殺，長草瑟瑟，一片淒涼悲慘的景象。九具屍體，橫七豎八地散布在飛機的碎片中間，面目模糊，難以辨認。

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到達失事現場後，將屍體由北向南編成一至九號。經辨認，其中的第五號屍體，便是林彪。林彪的屍體衣服全部燒光，頭部禿頂，頭皮綻裂，露出幾道頭骨;眉毛被燒光，眼睛形成兩個黑洞，鼻尖燒焦，右門牙至犬齒被撞掉，舌頭燒焦。左眼內角至鼻梁間有一道傷痕，血迹順着額部流至右頭頂。脛骨折斷，肌肉外翻，上脛骨刺露，兩腳底及右手心都燒起燎泡。整個屍體瘦削、短小，已發腐腫脹，慘不忍睹。

九月十六日上午十時，蒙古士兵抬來九口白茬木棺材。許文益等人對九具屍體又進行一輪拍照，然後入殮。裝殮後，蒙古士兵將棺材運往墓地。墓地位於飛機失事現場西邊一·一公里處，在一塊高地的東坡上。之所以選擇東坡，是想讓這九個長眠在異國的人，能夠看到東方的祖國和故鄉。墓穴長十米，寬三米，深一·五米。正準備下葬時，陪同許文益大使的蒙古外交部領事司司長高陶布指着一輛剛剛到達的卡車說:「按蒙古習慣應在屍體上覆蓋紅布、黑布，因爲汽車來遲，屍體已經入殮，是否可以把紅布、黑布鋪在棺材上」。許文益大使表示同意。

九具棺木放入墓穴後，許文益大使和高陶布司長先後執鏟作象徵式塡土，接着使館的其他人員塡

土，最後由蒙古士兵塡土修墓。

墓前立起一塊碑，上面寫着「中國民航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遇難同志之墓」。下署「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大使館」。大使館工作人員沈慶沂建議將寫有「中國民航」字樣的一段機翼放到墓上，蒙方認爲那件東西太大，搬不動，最後只把機尾上炸掉的發動機進口環放在墓頂上。一切安排妥當後，許文益大使率領使館人員在墓前三鞠躬，以示哀悼。當時許文益還不知道林彪事件內情，後來每想起當時的情景，便自覺可笑。

就這樣，沒有一朶鮮花，沒有哀樂，也沒有只字片語的悼詞，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便長眠在異國的一片荒涼的草原之下。

與往常的路線鬥爭不同，林彪的外逃投敵、自取滅亡，並沒有給毛澤東帶來勝利的喜悅。相反地，林彪在一夜之間，由中國的第二號神，變成最大的鬼，這一無情而又殘酷的事實，給毛澤東予致命的打擊。

毛澤東當然不是爲這位自井岡山以來，與自己出生入死、並肩戰鬥了近半個世紀的「最親密戰友」的死亡而哀傷。毛澤東感情豐富，兒女情長，可是在政治鬥爭中，他那冷酷無情、意志如鋼，格外令人可怕。毛澤東的苦惱純粹是爲着自己。

經過一番痛苦的思想鬥爭後，毛澤東終於在九月十八日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但通知只限於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幹部。九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批准將通知傳達到全國地、師級以上的負責幹部。十月中旬，又將通知傳達的範圍擴大到全國各地的黨支部書記、副書

記。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批准，將通知向全國廣大工農兵群衆傳達。

毛澤東面臨着八億人民的無形的審判。

林彪是毛澤東一手製造出來的一個怪物。他們兩人，既是師生，又是最親密的戰友；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又是互相利用的政治盟友。他們的關係錯綜複雜，「理不清」，「理還亂」，親密而又曖昧，既有愛，又有恨，既有戰鬥的情誼，又有利益的矛盾與衝突。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大劫難中，他們的親密關係達到了最高峯，緊接着便是分道揚鑣，成爲仇敵。世界上從未有過兩個偉人，如此親密之後又如此仇視。

毛澤東與林彪的初次相遇，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一九二八年，那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草創時期的艱苦歲月。爲了爭奪對紅四軍的控制權和領導權，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當時，林彪是朱德的部下。出於鬥爭的需要，毛澤東有意拉攏林彪，而林彪也有意另找新的靠山。兩人一拍即合，結成政治聯盟，共同對付朱德、陳毅等人。在這場被稱爲「建軍史上第一次路線鬥爭」中，毛澤東與林彪配合默契，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林彪竭盡全力打擊朱德、陳毅，處處維護毛澤東。而毛澤東也刻意栽培、大力提拔林彪，使這位上井岡山時只是一名小小的連長，平步青雲，直線冒升。林彪二十一歲當團長，二十三歲當軍長，二十五歲當軍團長，二十九歲當紅軍大學校長。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說：「林彪是毛澤東的寵兒」。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林彪出任八路軍的第一主力一一五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獲委任爲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成爲地道的「東北王」。

建國後，林彪在一九五四年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八年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

局常委，晉身於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圈子。一九五九年獲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林彪的每一步升遷，都與毛澤東的刻意關照、破格提拔息息相關。

六十年代後，爲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又再次與林彪結盟。他們倆人互相勾結，互相利用，進行了一系列不足爲外人知的勾當。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利用解放軍這座「尊神」的力量，成功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制造天下大亂，亂中奪權，鏟除了劉少奇的司令部。投挑報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親自欽定林彪爲自己的接班人、中共的「副統帥」，自己的「最親密戰友」。在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上，更將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破例地寫入了黨章。

「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在那些難堪的日子裏，毛澤東神情憂鬱痛苦，萎靡不振，終日不修邊幅，由早到晚，躺在牀上憂傷地沉思。

長期以來，英明神武的毛澤東頗爲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而驕傲自豪。現在，林彪企圖政變、謀害領袖，叛國投敵，機毀人亡。這一個十分難堪而又嚴酷的事實，令毛澤東陷入了一生中最巨大、最嚴重的政治危機之中。毛澤東在林彪問題上栽了一個大大的跟斗。「林彪事件」是毛澤東的「滑鐵盧」，是毛澤東無法彌補的致命的創傷——毛澤東那神聖的，至高無上的聲譽、威望和尊嚴、都受到了嚴重的、不可挽回的損害。九月十三日在溫都爾汗的那一聲爆炸，將毛澤東生命中的精神支柱摧毀了，他那充滿自信、揮灑自如的神態消失了。毛澤東一下老了許多。

一九七一年年底，距林彪「九．一三」事件才不到三個月，毛澤東便大病了一場，而且從此一蹶不振，病痛纏綿，苟延殘喘，一步步邁向他那漫長的人生旅途的最終點。

「林彪事件」對八億中國人民也產生了震撼性的衝擊。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自已所崇敬的領袖發生如此巨大的變故，使人們震驚、迷惘，不知所措。從中共逐步地透露出來的事件中，當看清了事情的眞相後，人們對毛澤東的崇拜、迷信的狂熱冷卻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虔誠的熱情減退了。人們開始覺醒，開始以審訊的目光來看待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在那些日子裏，全國人民都在思索着、議論着：

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副統帥，爲甚麼會幹下叛國投敵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情呢？毛澤東爲甚麼要選擇這樣的人當接班人呢？

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爲甚麼會謀害他呢？

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到底是一種甚麼樣的關係？這種關係的性質是甚麼？它對國家、對人民有利還是有害呢？

毛澤東與林彪在一起究竟幹了一些甚麼勾當？哪些是毛澤東指示幹的，哪些是他自己幹的？

由林彪擔任「副統帥」領導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十分正確，十分必要，十分及時的呢？

毛澤東到底是不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領袖呢？毛澤東思想到底是不是「馬列主義的頂峯」，是不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呢？

八億人民中，懷疑的情緒，不滿的情緒，反抗的情緒在悄悄地增長；新的思想、新的意識、新的觀念在悄悄地傳播。人們終於發現：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是束縛中國社會發展的桎梏。破除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迷信——中國人民在本世紀最偉大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種籽，就是在溫都爾汗那一聲爆炸聲中播下的。

「林彪事件」敲響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提前終結的喪鐘。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這位在

一九六六年還在萬里長江中暢游了十五公里，醫生、專家們曾預言可以活到一百歲的偉大領袖，這位主宰了中國人民的思想達三分之一世紀之久的一代偉人，壽終正寢了，而在神州大地上延續和統治了近半個世紀之久的毛澤東時代也隨之結束了。中國和中國人民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

林彪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終結的掘墓人。

而中國現代史的進程，也是從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開始轉彎。

時遷日移，時間又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今年，一九九六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三十周年，是「林彪事件」發生的二十五周年，是毛澤東逝世的二十周年。遙望今日神州，「人間正道是桑滄」。而當年事件的兩位主角——毛澤東和林彪，尤其是林彪，不但沒有被人遺忘，相反，在回顧歷史，撫今追昔的時候，人們便發現，在中國現代發展史上，林彪原來曾經起到了那麼重大的作用，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人們對林彪之謎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

可是，長期以來，林彪事件、林彪現象、林彪問題，由於格外地敏感或重大，從一開始就被有關方面千方百計地掩飾，許多歷史事實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例如，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幹部時，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指葉劍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甚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你們吵了一下也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也不清楚」，「問題搞清楚了，是林彪支持的，搞了一個甚麼五・一六，打倒一切」。

「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涉及陳毅、譚震林、葉劍英、聶榮臻、

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幹部遭受政治迫害。「二月逆流」眞的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是對付林彪的嗎?在「二月逆流」中，林彪究竟起了甚麼作用?究竟誰是這一事件的罪魁禍首?

還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林彪自己願意當的，還是毛澤東強迫硬按的呢?林彪的「副統帥」的頭銜是怎麼來的呢?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與林彪進行了那些幕後政治交易?

至於在「九大」以後那段最後的日子裏，毛澤東與林彪的政治聯盟爲何破裂?究竟是誰首先發難?「設不設國家主席」之爭孰是孰非?林彪這位在戰場上所向披靡的戰將，在與毛澤東的最後的較量中，爲甚麼會輸得這麼慘?

林彪與毛澤東到底是一種甚麼樣的關係?

林彪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

這些問題都顯得撲朔迷離，有些甚至是空白。「林彪與毛澤東」成爲中國最大的政治之謎，成爲最富有神密色彩的政治「禁區」。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代已經十多年了。是解開這些謎團，還歷史於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內容提要

「林彪與毛澤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富有神密色彩的政治「禁區」。

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中共的「副統帥」。可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國投敵，機毀人亡，舉世震驚。毛澤東與林彪到底是甚麼關係？他們為甚麼會由「最親密的戰友」變為「不共戴天」的敵人？林彪是個甚麼樣的人？本書展示了毛澤東與林彪由相遇、結盟到分道揚鑣的錯綜複雜而隱密的關係，尤其着重介紹了林彪其人其事及震驚中外的「林彪事件」真相，是目前為止對林彪的研究最深入詳盡的作品。本書資料豐富許多更是鮮為人知；而且立論新穎，突破了目前流行的種種框框和定論，例如本書認為「九•一三」事件敲響了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提前終結的喪鐘，中國現代發展史從一九七一年「九．一三」開始轉彎，林彪是毛澤東時代終結的掘墓人等，都具有獨到的見解。

欲瞭解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瞭解「林彪事件」、「文化大革命」與今日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的淵源關係，欲瞭解現代中國，不可不讀本書。

ISBN 962 8195 01 8



9 789628 195001 5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120.00

目錄

前言……i
序篇　歷史在「九·一三」轉彎……ii
第一篇　殊途同歸井岡山……1
第一章　「紅色世家」中的「怪伢」……2
第二章　懶惰反叛：毛澤東走出韶山冲……18
第三章　林彪：南昌起義──艱苦的旅程……34
一、南昌起義……34
二、林彪沒有趕上南昌起義……37
三、「紅軍之父」……40
四、林彪的危機……44
五、湘南暴動……50
第四章　毛澤東：秋收起義慘敗……56
一、「煙雨莽蒼蒼」……56
二、「八·七」緊急會議……60

三、與中共中央的爭執……62
四、倉促準備　起義慘敗……65
五、走上井岡山……73
第二篇　鬥爭朱德——毛林第一次結盟……77
第一章　「朱毛」與「毛林」……78
一、朱毛起先無意會合……78
二、毛澤東不歡迎朱德上井岡山……84
三、井岡山並非理想的革命根據地……92
四、毛林相遇在井岡……97
第二章　朱毛鬥爭……101
一、朱毛分歧……101
二、毛林結盟……114
第三章　朱德一生最大的污點：「八月失敗」……119
一、「八月失敗」……120
二、誰之罪……124
第四章　朱毛鬥爭升級……132

一、朱毛再會合 重返井岡山……132
二、朱毛鬥爭的最大得益者——林彪……136
三、朱毛爭執不休……140
四、井岡楚歌……142
五、毛路線失敗 紅軍撤離井岡山……147
第五章 贛南烽火……155
一、東征贛南 林彪備受考驗……155
二、朱毛鬥爭再起烽煙 毛澤東憤然辭職……160
三、患難見眞情 毛林情深……189
四、毛澤東復出 朱毛鬥爭下帷幕……193
第三篇 林彪——最值得研究的人……203
第一章 一代名將……206
一、「戰將」……206
二、善於帶兵……213
三、講究戰術謀略……214
四、擅長伏擊戰……219

五、多思善謀……225
六、不打「官僚主義仗」……230
七、「要打違抗命令仗」……240
八、善於總結經驗……247
九、獨創戰術與大練兵……251
第二章　林彪：在廬山崛起……258
第三章　林彪：從未迷信毛澤東……262
第四章　林彪心中的毛澤東……278
第五章　林彪與政治……286
第六章　語言專家……295
第七章　「勉從虎穴暫棲身」……304
第八章　林彪的「病」……316
第九章　林彪如何辦公……325
第十章　「苦行僧」……332
第十一章　林彪與葉群……340
第十二章　林彪與子女……355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毛林再度結盟……369
第一章 毛林交易 打倒羅瑞卿……370
一、毛澤東的影子……370
二、林、羅：由戰友變敵人……372
三、毛澤東：捨將取帥……378
第二章 投桃報李 《文藝紀要》出籠……388
一、「文化大革命」的來歷……388
二、總導演——毛澤東……389
三、江青駕臨蘇州請「尊神」……391
四、劉志堅的上海之行……394
五、毛澤東親自掛帥……402
六、林彪默認「委託」……404
第三章 毛澤東欽定「接班人」……410
一、不尋常的「十一中全會」……410
二、林彪堅辭「接班人」……414
三、毛澤東的選擇……419
四、林彪生平僅有的一次謙虛……426

第四章 「二月逆流」……430
一、毛澤東的辯白……430
二、「大鬧懷仁堂」……431
三、告御狀……437
四、譚震林向林彪訴心曲……439
五、江青再請「尊神」……443
六、毛澤東震怒……445
七、誰是罪魁禍首……448
第五章 毛林勾結之一 打倒劉少奇……453
一、「天機」……453
二、「表忠心」 林彪整劉少奇黑材料……455
三、「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461
四、江青設立專案組……465
五、欲加之罪……470
六、劉少奇之死……472
第六章 毛林勾結之二 迫害賀龍……474
一、遲開的追悼會……474

二、訪蘇惹禍根……475
三、林賀之間的恩怨……479
四、羅織罪狀……482
五、賀龍蒙難……487
六、毛澤東的「平反」……490
第七章　林彪與江青……493
一、互相利用……493
二、互相吹捧……496
三、林、江衝突……500
四、勾心鬥角……503
五、裂紋……509
第八章　名不符實的「副統帥」……512
第五篇　分道揚鑣——「林彪事件」……517
第一章　毛林關於「國家主席」之爭……518
一、「九大」以後……518
二、「林彪陰謀論」……522

三、「毛澤東陰謀論」……524
四、是毛澤東首先向林彪發難……527
五、「不設國家主席」是錯誤的……533
六、「林彪想當國家主席」——證據不足……537
七、「不設國家主席」的奧秘……539
八、「孫權與曹操」……544

第二章　廬山風雲……551

一、久違了廬山……551
二、兩天半的發難……558
三、「突然襲擊」……565
四、「反黨集團」……575
五、「第十次路線鬥爭」……582

第三章　最後的較量……592

一、毛澤東：事情沒有完……592
二、緊急收縮的毛家灣……595
三、「抓住不放」……599
四、「討嫌」……603

五、撲朔迷離的日子……608
六、拙劣的《五七一工程紀要》……617
七、「南巡講話」……630
八、叛逃……640

第六篇　殘陽如血……645
第一章　林彪在那裏……646
一、「九·一三」……646
二、烏蘭巴托的急電……647
三、周恩來命令：大使親到現場……650
四、機毀肇因的探討……656
第二章　毛澤東戰略退卻……657
一、舉國震驚……657
二、林彪：替罪羔羊……662
三、重提「朱毛」……666
四、批不起來的「批林整風」……671
五、僞造《毛澤東給江青的信》……675

六、毛周交易：「伍豪事件」……682
第三章 毛澤東的黃昏歲月……685
一、毛澤東沒有看透林彪……685
二、失望與絕望……690
三、大病……694
四、女孩子們……697
五、不治之症……703
六、悲歌……707
七、殞落……711
《參考書目》……714

第一篇

殊途同歸井岡山

第一章 「紅色世家」中的「怪伢」

一九四二年二月，重病中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林育英（張浩），托人帶口訊給在西安的林彪，要他趕快回延安，在臨死之前見個面。

二月十四日，林彪乘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一輛卡車回到延安，便急急忙忙趕到延安中央醫院看望堂兄林育英。

林彪詳細地詢問了林育英的病情和治療情況。

林育英說：「黨中央和毛主席對我的病情很關心，而且盡了很大的努力。只是我的病太重了……。」

林彪安慰說：「八哥，你要堅強些，也許你的病會好轉的。」

林育英艱難地搖了搖頭，又說道：

「育容啊，今天見到你，我有幾句話要說，也算是我的囑托，你要好好記住。」

林彪：「你說吧。」

林育英說：「我們林家三兄弟參加革命後，最早去世的是育南。他實際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總惦記着這件事。近來，我和關向應同志曾談過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映過，組織上應對他和何孟雄、李求實等同志的問題作個結論或肯定。中央已經在考慮這個

問題。你回來了，要把這件事和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再談談。育南才華橫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又是我和你的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寃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關係到黨的路線和大是大非問題。我們如不爲他說公道話，對不起黨，也對不起他。」

林彪說：「這件事我記住了。」

林育南是林彪的另一位堂兄，是與惲代英、陳潭秋等人齊名的中共最早的領導人之一，他領導過「二·七大罷工」和「五·卅運動」，是位英名遠播的共產黨人。一九三一年，由於王明和康生的迫害和出賣，被國民黨逮捕，於二月七日被殺害於上海的龍華。同時被殺害的還有何孟雄、李求實、及左翼作家胡也蘋、殷夫、柔石、馮鏗等。魯迅著名的雜文《爲了忘卻的記念》，講的就是這樁案子。

林育英在臨終之前向林彪囑咐的，不是自已的私事，而是堂兄林育南的寃案平反問題。這是一份政治遺囑。林育英將這件事委託給林彪，那是因爲他們都來自湖北黃崗縣林家大灣的林氏家族，他們是「林家三傑」。

林育英於三月六日逝世。中共中央爲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毛澤東親自寫了挽聯：「忠心爲國、雖死猶榮」，還題寫了墓碑：「張浩同志之墓」。出殯時，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尙昆、徐特立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親自爲林育英抬棺。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抬棺。

一九○七年，也就是毛澤東成親的那一年，十二月五日，在湖北省黃岡縣迴龍山區白羊山下林家大灣（六十年代亦稱黃岡縣紅衛公社紅衛大隊），「林家三傑」中的老三出生了，他名叫林毓容（育容），後來改名爲林彪。

黃岡縣位於長江中下游，縣城黃州，是歷代州府的所在地，也是鄂東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因反對王安石變法，曾被貶到這裏，寫下《赤壁懷古》等動人詩篇。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經中國國務院批准，黃岡縣升級爲黃州市。

林家大灣與毗鄰的染鋪灣，是林氏宗族繁衍之地。林氏大族人口衆多，除了耕田務農，織布染布便是他們的專長。林彪的爺爺林時朗，就是此行的皎皎者。而林育英、林育南，也是林時朗的子孫。

林彪的父親林明卿，是林時朗的四子。他讀過幾年書，幾兄弟中數他的文化水平最高。他喜歡看古典小說，也愛寫毛筆字。他的字在當地小有名氣。林明卿十四歲時停學，先到迴龍山鎮的一家雜貨店當店員。兩年後到了漢口，先在大慶輪，後在漢長輪上當帳房先生。

一九〇七年，林氏家族分家，林明卿分到水田二畝多，房屋三間，菜園一塊。一家九口人，生活勉爲其難。

林明卿自小讀書，長大後外出打工，因而他不會種田，也不喜歡種田。爲了糊口，林明卿將自已的田送給二哥林俊卿耕種，自已則到沙和圖鎮開辦了「精益」布廠。

沙和圖鎮是鄂東有名的小鎮。雖然人口不多，但商業發達，每天早上，方圓幾十里的農民從四面八方前來趕集，使這個小小的市鎮熱鬧非凡，素有「小漢口」之稱。

「精益」布廠有鐵機八乘，木機三乘，另外放在附近人家的布機還有十乘。布廠僱用工人達四十名。這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工廠。

林彪的母親陳氏，是方高坪鎮陳灣村人氏，生於一八八六年，比林明卿大一歲。陳氏生育了六名子女：

老大林寶珠是女孩，抗戰時林明卿逃難將她和女婿帶到湖南。建國後林寶珠在湖南長沙居住，現已病故。

老二叫林慶佛，比林彪大三歲，是個作惡多端的鄉紳流氓，建國後由於林彪的包庇，得以逃脫鎮壓。

老三是林彪。

老四是林育菊，一九三七年由林彪寫信動員去延安抗大學習，一九四四年參加革命工作，建國後在天津一家醫院任黨委書記，一九七七年去世。

老五林向榮，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先入抗大學習，畢業後分配到部隊工作，在第一野戰軍任團政委，一九四九年在解放太原戰役中犧牲。

老六是個女孩，生下不久，被林明卿送給附近的農民周伯曉家做童養媳，一九八三年病故。

林育容的出生，給林家帶來了喜悅。鄉親們紛紛前來道賀，一邊看着那個小小的嬰兒，一邊說些讚美和吉祥的話，林母陳氏說：「生他前我做了個夢，好稀奇！夢見一隻大白虎，盤腳架腿，坐在堂屋上，醒來就生下這孩子。」

中國人相信古老的「吉人天相」之類的風俗。爲了孩子有個好前程、好日子，做母親的總希望夢見些吉兆、異兆，即使沒有也想編一個，好多人都相信，陳氏說的這個「大白虎夢」，不知道是眞的，還是編的呢？

名如其人，育容這個名字沒有絲毫男子漢的剛陽氣。而這個孩子生下來後也是瘦弱、淸秀，像個女孩子，而且多病多災，很是難養。

林彪五歲那時，林家由老屋搬到白羊山下的新屋。新家的堂屋內，掛着一幅木板對聯，由於年事遠久，字迹已有些模糊，但卻擦得清光泛亮。上面刻着林氏祖先的遺訓：

一等人忠臣孝子
兩件事讀書耕地

遵照祖訓，一九一六年，林彪九歲，開始入私塾讀書，私塾先生叫李卓侯。他就是中國地質學之父李四光的父親。李老先生思想開放，知識淵博，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是一位頗有聲望的私塾先生。

李卓侯自言一生有三大快事引以爲豪，一是他參加過同盟會，與孫中山、黃興等人多次聚會；二是培養了李四光；三是啓蒙了「林氏三兄弟」。

李卓侯對「林氏三兄弟」都十分喜愛。他說：「育南秉性聰慧，育英勤奮刻苦，育容既聰明又刻苦，日後都會有大出息。只是育容性子陰柔，不好把握，是龍是蟲，一切全靠他自己。」

林彪自小不愛講話，沉默寡言。但生性聰明，記憶力很好。他認字快，記得牢，尤其是背書，在全班學生中，他是最少挨打的一個。

林彪在課堂上專心聽課，但一離開課堂，就特別野。扔石頭，跳水溝，摔跤、爬山、上樹、下水嬉戲、甚麼都做。而且他機靈、刁鑽，善於用腦子，因此甚麼事都做得比別的孩子又快又好。例如摔跤打架，他個頭不高，但一般的孩子都打不過他。

林彪小時頭上生有癩瘡，常常戴帽子來遮着。孩子們便取笑他。從小自尊心就極強的林彪，遭受恥

笑，便動手還以顏色。林彪打架很有路數，他組織一班孩子，鬥得有本事有辦法。幾仗下來，孩子們便不敢再輕視他。

鄂東一帶的農村，有炒黃豆、米泡、米餜給孩子吃的習俗。特別是一到春節，孩子們經常將家裏炒的黃豆、米泡、米餜帶到外面吃，就象現在的孩子吃糖果一樣。

孩子們還常常拿黃豆、米泡作爲摔跤、爬樹比賽的賭注。林彪聰明機靈，手腳敏捷，一般的遊戲他都是高手，時常贏得獎品，自已吃不了，還分給其他的小朋友。

林彪愛吃黃豆的習慣，就是從小養成的。

林彪自小淘氣、調皮、愛惡作劇。平時，他愛跑到私塾附近的興隆寺去鬧事，常向和尙們問一些古靈精怪的問題，被和尙們罵爲「怪伢」，還上林家告狀，要林明卿好好管教。

林明卿夫婦信佛拜菩薩，常到寺裏磕頭燒香。對和尙們的投訴，自然不敢怠慢，便將林彪用竹條子打了一頓。

林彪不但沒有痛改前非，反而懷恨在心，變本加厲。他對同學們煽動說：這個寺裏的和尙，吃用的柴米油鹽都是靠林家大灣的人送的。如果沒有這些菩薩，保證沒有人送東西給他們吃。咱們把這些泥巴菩薩砸掉吧！

一天，乘和尙們不在，林彪領着一班同伴溜進寺裏，用鋤頭將幾尊大菩薩砸爛，又把一些小菩薩抬出來，扔到寺前的水塘裏，然後溜之大吉。

和尙們回來後，看到被毀壞的泥菩薩，又氣又怒，一尋思便知道是林彪幹的。於是立即上林家告狀。

林明卿聽到林彪在寺裏闖下了如此彌天大禍，氣得把林彪捆綁起來，着實狠打了一頓。還帶着禮物，到寺裏磕頭燒香，請菩薩恕罪。

此後，林彪老實了一陣子，但不久之後，便故態復萌，這一次他不敢再去寺裏胡鬧，便將惡作劇帶回家裏。

有一天，林彪在水田裏捉到一條水蛇，將牠綁在木棍上玩。他想起家裏的布廠有不少女工，她們最怕蛇，嚇唬他們一頓，一定很好玩。於是，他將水蛇拿在手裏，衝進倒筒車間，將蛇伸到女工們的臉前、頭上、頸邊，口裏不停地叫喊：蛇來囉，蛇來囉，蛇要咬你！女工們被嚇得花容失色，尖聲呼叫，車間裏亂作一團，林明卿聽到叫聲，趕忙過來查看。林彪見到父親，便趕忙將水蛇扔到屋外。結果，林彪又挨了一頓好打。

在學校裏，林彪仍然話語很少，但心思多多，神情深沉。他平時很少與同學談天說笑，行為古怪，令人難以捉模。

與林彪同桌女同學叫林春芳，是他本房的一位堂姐。有一次，他用毛筆寫了一副對聯送給了林春芳：

讀書處處有個我在
行事樁樁少對人言

林春芳看後，不知所云，沒有說出甚麼意見。

林彪卻對這副對聯感到十分得意，於是又重抄了一副，貼在課室的牆上。

林彪的對聯引到來同學們的圍看，議論紛紛。對聯所表達的思想、含義，對這些孩子們來說，未免太過深奧了，於是同學們都說他是個「怪物」。

林彪喜歡這副對聯並不是偶然的，這十六個字正是展現了林彪的內心世界，是他的思想性格的眞實寫照。

五十多年後，直到六十年代，林家大灣的老人還記得這副對聯。

這一年，全國教育界興起尊孔讀經熱。農歷八月初五，是各大中小學的祀孔日。林彪被同學推荐，寫了一篇《上已祀孔記》，全文如下：

> 孔子爲我國周時代人，仁義愛民，爲我國之偉人焉。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初五日，爲仲秋上丁，全國各學校於此祀孔，遵古禮也。吾校師生亦祀孔，同學高初共百餘人，皆敬祀孔子。因孔子聖人，爲我中華教宗也。

文章語言通順，層次分明，受到老師的褒獎。

一九二〇年，惲代英、林育南、林育英在八門灣辦起了浚新小學，林彪被轉到浚新小學讀書。

八門灣在林家大灣後面，離家有兩三里路。林彪從家到學校，全是爬山，甚爲吃力，爲了鍛煉自已的腳功，林彪別出心裁地在兩腿上各綁一個沙袋子，爬山走路，都帶着它們。久而久之，林彪的腳力特

別好，與同學們賽跑、爬山、林彪總是第一。

放了學或節假日，林彪還帶着一幫同伴，到處去爬山攀懸崖，那裏陡峭就往那裏攀。每次出去，他腳上少不了沙袋。

林彪後來帶兵作戰，喜歡打運動戰、伏擊戰。他的部隊爬山涉水，衝鋒陷陣，均以快速著名。林彪帶着部隊長途奔襲，並沒有感到困難吃力，與他自小苦練腳力有關。

浚新小學的校長胡銀亮是中共黃岡縣委書記，當國共合作時期，他又是黃岡縣國民黨縣黨部常委。他和惲代英，對林彪有很大的影響，林彪開始接受進步的思想教育。這時期，林彪和同學們一起演出了一齣名叫「九頭蛇」的話劇，用以諷刺地主對佃農的剝削和壓迫正像一條九只頭的毒蛇一樣狠毒。

一九二一年六月，正在武漢從事革命活動的林育南，寫信回老家，動員正在浚新小學讀書的林彪等人前來武昌共進中學讀書。

共進中學是由武昌高師畢業的十一位在教育界服務的人士，利用官錢局倉庫創辦的。十一名校董每人月捐二元，並義務教課兩小時。學生也從事勞動建校。在十一名校董中，陳潭秋和錢城是共產黨員。整所學校雖然不是由共產黨控制，但卻是由進步思想主宰，被國民黨認爲是中共滲透的據點。因此共進中學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比較進步。林育南希望林彪等林家子弟，可以接受進步的思想教育。

林彪在共進中學學習期間，經常接觸陳潭秋、董必武、惲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從事革命活動的共產黨人，聽他們議論天下大事，討論革命前途，林彪深受其影響。

除此之外，林彪在這個時期還閱讀到大量的進步書籍，如《新青年》、《嚮導周刊》、《湘江評

論》、《武漢星期評論》，以及由林育南主編的《眞報》，還通讀了《唯物史觀淺釋》、《資本論入門》、《社會進化史》、《共產黨初步》等革命書籍。這時候的林彪，正是求知欲最強、思想意識正處於成長的時期，這些進步的書刊，無疑對林彪日後走上革命的道路奠定下良好的基礎。

一九二二年夏天，林彪與幾位進步同學捐款購進一批進步書籍，在共進中學創辦了「共進圖書社」。圖書社裏面沒有專門的管理人員，由學生輪流值班，每天到這裏閱讀的學生達到百人。

繼圖書社後，林彪又聯絡幾名同學成立了一個「共進販賣部」主要經營課本、紙張、文具、糖菓之類的小商品，很受師生們的歡迎。

共進販賣部的盈利主要用於購買新的圖書，和用作「自治新村」的活動經費。「自治新村」是林彪及其他進步同學組織的一個進步小團體。此外，林彪還用共進販賣部的經費創辦了《共進學生》半月刊。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半月刊只出了一期便夭折了。

這時期的林彪，在林育南和林育英的督導下，將孩童時的調皮、惡作劇收斂了不少。「他對人和氣，對師長與功課好的同學敬重和恭順，他是丘陵地帶的鄉下人，有一種樸實氣息」，「功課卻做得不太好」。

一九二一年夏天，林彪出席由惲代英發起在黃安召開的青年聯合大會，開始參加中共發起的一些外圍組織的社會活動。

一九二二年秋，林彪父親開辦的「精益」布廠陷入困境，家裏經濟發生困難，不能再供他上學。林明卿托人帶信叫他回家種田。

這時，擺在林彪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麼回家鄉種田，要麼休學做工，賺一些錢後再回來讀書。

經過與堂兄們商量，林彪選擇了後一條路。

林育南介紹他到武昌草席門外的鐵路工人子弟學校當代課教師。這個工作雖然不能攢大錢，但收入比其他工作高。

一九二三年春，林彪復學，插在二班。在這裏，林彪一直讀到畢業。這一年，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五年，林彪代表武漢學生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學聯會議。同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林彪的革命道路，似乎已經定型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林彪在共進中學畢業了。何去何從，十八歲的林彪面臨着人生道路的選擇。

對於林彪的前途，林明卿曾有過仔細的打算。林明卿認爲，林家大灣和迴龍山一帶能讀到中學畢業的人很少，鄉下甚缺先生。林彪可回家鄉辦一所私塾，當私塾先生，既受人尊敬，又不愁吃穿。

林明卿將自己的意見寫信通知了林彪。

在武漢的四年生活，令林彪的思想和眼界都開濶了。他已不再願意回到林家大灣那狹小的天地。林彪雖然還沒有立志獻身革命，但惲代英、陳潭秋、林育南、林育英的多年教導，使林彪已不再是個毫無人生目標的庸碌之輩。林彪已成長爲一位熱血青年，成爲一名爲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共產黨人。在這個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林彪自然不會同意父親爲他安排的人生道路，他沒有給林明卿回信。

就在這一年，中共中央向全國各地的黨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各省迅速選派共產黨員、青年團員或進步青年投考廣州黃埔軍校，爲黨組織培養軍事人才。

黃埔軍校計劃招收新生三千名。林彪得知這個消息後，決定報考黃埔軍校，林彪將自已的想法寫信

告訴了已調到上海工作的林育南和林育英。兩位堂兄一致同意林彪的決定。林育南立即給林彪回信，說：

「……你這個考慮很對，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很關鍵的一兩步。這個步子如邁對了，可就受用無窮。如邁錯了，就會跌入深谷。武力沒有正義是暴政，正義沒有武力是無能。中國的革命，最終要靠軍事解決問題，共產主義事業需要大批軍事人才。我和你八哥搞黨務、工運，你搞軍事。我們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長……」。

林彪收到這封信後，報考軍校的主意就更加堅定了。他馬上寫信通知父親。

林明卿看到林彪的信，吃了一驚。俗語說「知子莫如父」。這個三兒子自小長得身材瘦弱，小時候雖然淘氣調皮，但並不野蠻，也不崇尚武力。唸中學後，調皮搗蛋的事再也不做了，整個人出落得斯文有禮，文質彬彬。林明卿怎麼也想不到兒子會與行伍、打仗扯上關係。當時，人們仍然存在着「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一個中學畢業生去當兵，簡直是作踐和糟蹋自己。況且打仗十分危險，子彈沒長眼睛，說甚麼也不能讓兒子去當兵。必須馬上去武漢一趟。

林明卿起了一個大早，步行了二十里路，從團風乘船去武漢。

林彪見到父親，吃驚地問道：「父親，您怎麼到武漢來了？」

「為你的事。」林明卿回答道：「你不能去報考軍校。」

林彪露出明顯的不悅，說道：「我已報名了，目前正在覆習。」

林明卿說：「報了名也不要去！」

林彪說：「那你要我做甚麼？」

林明卿說：「回去當先生，以教書爲業。」

林彪說：「我不想當先生，也不想以教書爲業。」

「那你想做甚麼？」

「我要當兵！」

林明卿第一次發現兒子竟然如此執拗。父子倆吵了一通。最後，林明卿看到不能說服兒子，一怒之下便說：

「你現在長大了，連老子的話也不聽！算了，算了，你要怎麼地就怎麼地吧！」

林明卿生氣了，住在武漢的那幾天裏，他一直不見林彪。

爲了說服林彪，林明卿又跑到漢口那邊去找三哥林協甫幫忙，希望三哥過武昌來勸勸林彪。

林協甫長住武漢，是個見過大世面的人。他聽了林明卿敘述，便說道：

「老四，現在世道變了。他們年青人，不像我們那個時代，一切都規規矩矩的。他們現在有文化，接受了新思想，開口愛國，閉口救民衆，你管不了，我家的育南，我不知勸了多少回，也罵過，根本管不了。我現在不管他，讓他去闖。育容在這裏讀書，受育南的影響，變得跟育南一模一樣。他們這些青年人認定的主義厲害得很，你勸不動的。」

林協甫這一番話，雖然未能解開林明卿心中的疑慮，卻使他的氣消了不少。他搖搖頭嘆息道：

「唉，兒大父難做！」

林明卿在漢口住了一天，便乘船返回老家。

黃埔軍校的考場設在上海，一九二五年年底，林彪在漢口江漢碼頭登上前往上海的客輪。林明卿因

爲家中事忙，分不開身，只好吩咐長子林慶佛趕到武漢爲林彪送別，還帶了一筆錢，給林彪作爲路費、生活費，也作爲防身。林彪接過父親送來的錢，爲父親的溫情感動得落淚。

林彪臨上船時，緊握着林慶佛的手說：「大哥，你回去跟父親說，我這次如能考取軍校，一定好好讀書，不辜負他老人家的希望！」

林彪順利地考取了黃埔軍校，要赴廣州報到。林育南特地爲林彪寫信給自已的老同志、老朋友惲代英和蕭楚女，請他們照顧一下林彪。惲代英當時在國民黨「二大」上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又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兼中共黨團書記。蕭楚女則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兼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有這兩位重量級的人物照拂，林彪順利地進入黃埔軍校。

林彪在報到時，改名爲「林彪」。

從浚新小學到共進中學，林彪一直用「育容」爲名。他屢次想改，認爲這個名字象女人的名字。有一年暑假，他向父親提起要改名，被林明卿罵道：「胡說八道！做人要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哪能隨便改名的呢？」從那以後，林彪再也不敢再提起改名的事。現在，離開了武漢，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廣州，他認爲這是改名的好機會。想來想去，他覺得自已從軍了，新名字應威武有力，又寓義深刻。於是取了一個「彪」字。彪者，幼虎也，顯示了虎虎生威，活力無限；彪，又表示威猛，顯赫，如彪形大漢，戰功彪炳，都是如意吉祥的意思。於是，林彪以新的名字，以新的姿態，開始了人生中的新生活。

在黃埔軍校，林彪屬於第四期。開學入伍後，被編入第二團二營五連。由惲代英的介紹，他加入了中共在黃埔的外圍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林彪是連裏幾個少數公開的中共黨員中的一個，他的特殊

身份，引來連裏其他學員的羨慕。

儘管如此，在黃埔期間，林彪並不是風頭人物，也沒有突出的表現。他常常參加一些公開集會，在會上也常常發言，講得有條有理。但在平時，他依然是沉默寡言，這一性格並沒有因新名字、新生活而有所改變。林彪自小養成了一些鄉村式的生活習慣，例如不注重衣着打扮，服裝常常不整齊，穿過的襪子常常放在枕頭底下，也都沒有改變，而且是至死都沒有改變。

由於身份特殊，林彪在星期日常獲準到廣州市區去。他常去看望惲代英、蕭楚女等人，但更多去的地方是中山大學經濟系教授劉芳的家。劉芳也是共產黨人，大概是通過惲代英或蕭楚女認識的。在劉芳的家裏，林彪獲得款待，茶餘飯後，劉芳教授時常與林彪討論馬列主義。可是，滔滔不絕地大發議論的，往往是劉教授。林彪只是默默地聽，一言不發——他本來就不是一個高談濶論的人。

近半年以後，由於時局的變化，林彪未畢業就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二營七連任見習排長，參加北伐戰爭。

獨立團是北伐軍的先遣部隊，團長是葉挺。

獨立團在廣東的肇慶組建，七連的士兵大多是湖南醴陵、郴州、宜章一帶的農民。在葉挺的領導、訓練下，他們成爲一支驍勇善戰的「鐵軍」。

林彪的聰明、機靈，很快就在軍事上表現出來。據曾與林彪在同連當兵的易水秋回憶，林彪那時年紀雖輕，但很聰明。連長組織士兵訓練時，他經常幫助連長出點子、想辦法。如射擊訓練用甚麼作靶子，連長總未想出好辦法。因而，一些士兵對單調的射擊訓練沒有興趣。

爲了提高士兵們對射擊訓練的積極性，林彪想出用洋鐵桶作爲靶子。他在一個小洋鐵桶裏裝滿了石

灰，士兵們射中時，鐵桶被射破，桶裏面的石灰噴出一股白灰。

林彪提出的訓練方法增加了趣味性、刺激性。士兵們對射擊訓練的興趣增強了，整個連隊的射擊技術也得到很大的提高。

獨立團從廣東出發，連續打了平江、醴陵、岳洲、汀泗橋、賀勝橋戰役。這支由團長葉挺、黨代表聶榮臻率領的「鐵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一九二六年十月攻克了武昌。

林彪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湖北。更嚴峻的考驗在等着他，而一個對他的命運發生重大影響的人——毛澤東，也正在等待着他。

黃埔軍校的學習生活是短暫的，但對林彪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它爲林彪確定了一條畢生的人生道路。黃埔軍校的學習生活，爲林彪打開了軍事殿堂的大門，爲林彪指引了一條通往這座瑰麗殿堂的道路。正是沿着這條道路，林彪找到了一塊可以充分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的天地。憑藉着種種的歷史條件，在這塊天地裏，林彪所展現出來的光彩，燦爛奪目。

第二章　懶惰反叛：毛澤東走出韶山冲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一支七、八百人的隊伍，來到了江西省寧岡縣古城鎮。這支隊伍，衣着襤褸，五花八門，有工人打扮，有農民裝束，還有身穿國民黨北伐軍軍裝的士兵和軍官。他們手中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門，長槍短槍，火銃，鳥槍，更多的卻是長矛大刀。當中有許多的傷病員。那一張張疲憊、憔悴的面孔，在告訴人們，他們是一支身陷絕境、走投無路的敗兵之旅。領頭的人身材高瘦，一頭長髮，足部受了傷，正被兩名士兵抬着。他的名字叫毛澤東。

古城鎮是井岡山山脚下的一個貧窮的小鎮。一條短短的、高低不平的石板路，路兩旁，又矮又小、破破爛爛的屋子，緊緊地擁擠在一起。民謠說：「小小寧岡縣，三家豆腐店，城裏打個屁，城外聽得見」。唯獨城中央有一座文昌宮書院，高大寬敞，雕樑飛棟，顯示出一派文化的氣息。毛澤東便將他的隊伍駐扎在文昌宮裏。

毛澤東率領的這支隊伍，經歷了秋收起義的失敗，被國民黨軍隊窮追猛打，一路倉惶敗逃，最後來到了這塊窮鄉僻壤，似乎已是窮途末路。可是，毛澤東並沒有灰心，氣餒，他準備率領這支敗兵之旅上井岡山「落草」，做山大王。

誰也沒有料到，甚至連毛澤東自己也沒有想到，正是這點星星之火，後來成爲燎原之勢；也正是從這塊窮鄉僻壤作爲起點，孕育出一個光輝燦爛的共和國。而毛澤東，這位來自湖南的韶山子弟，也就成

爲這個共和國的「開國皇帝」。

從韶山到井岡山，毛澤東走過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

在這條道路上的第一步，也是最具重要意義的一步，便是走出韶山冲。

毛澤東於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韶山冲的一個農民的家庭裏。

韶山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峯中的第七十一峯，這裏群山環抱，林木茂密，是個交通不便的窮山僻壤。韶山冲沒有公路，沒有鐵路，也沒有通航的河道。與外界的聯繫，只有靠人們自己的兩隻脚。到最近的湘潭縣縣城，也要起早貪黑，翻山越嶺，走整整的一天。因此，這裏沒有工業，沒有商業，是一塊古老而傳統的小農經濟的王國。

在這塊閉塞而落後的土地上，農民們辛苦勞作，仍難維持溫飽。爲了糊口，爲了養妻活兒，人們只有將更多的汗水灑在土地上。臉朝黃土背朝天，祖祖輩輩，一代接一代，韶山冲人生活在這裏，被牢牢地束縛在這塊土地上。

由於交通不便，韶山冲成爲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時代的進步，世界的變遷，以及革命的風暴，在這裏都沒有引起劇烈的反響，也沒有激起驚天的波瀾。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乃至二十年代的大革命，當農民運動在湘江兩岸鬧得天翻地覆時，在韶山冲這裏，山山水水還是那麼恬靜，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依然如故。湖北省的黄安縣，被稱爲將軍縣，因爲革命的風暴使這個縣產生了二百多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而韶山冲盡管孕育了毛澤東這樣的一代偉人，然而，在中共的名人政要中，眞正的韶山兒女，卻只有毛澤東一個。

要走出韶山冲，踏上中國政治的大舞台，毛澤東的前面佈滿了重重的束縛和障礙。可是，毛澤東憑着他那強烈的、獨特的性格，經過反覆的鬥爭，才戰勝了傳統，戰勝了命運。

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貽昌），號良弼，生於清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是個沒有多少文化而又能幹的農民。他讀過幾年私塾，可以記賬、寫信。十七歲時就當家理事，也繼承了一大筆債務。由於無法償還，被迫出外當了幾年兵，回家後才下田勞動。由於他精明能幹，善於經營，不久就還清了債務，贖回了父親毛翼臣典當出去的十五畝稻田。到毛澤東出生時，家境殷實，開始發達。毛順生自耕十五畝田，年收稻谷六十石，全家五口人，吃用三十五石，還剩餘二十五石。他便又做起糧食買賣。後來，又得到岳父文家的幫助，在湘鄉太平坳一帶購進稻谷，運往湘潭等地出售。與此同時，還販賣耕牛、豬隻，積攢的錢財越來越多。不久之後，他買進堂弟毛菊生的七畝田，使產業擴大到二十二畝，年收稻谷八十石。同時，他顧了一個長工，專門在家裏種田，他自己則主要從事商販買賣，農忙時候，還要請短工，妻子、兒子也要下田勞動。毛家的日子越過越富裕。

一心想發家致富的毛順生，除了繼續買進田地外，又進軍商場，在長慶和米店入了股，與湘鄉、湘潭一帶的店舖多有往來。他自己還印制「毛順義堂」紙票，在市面流通。到他的家業鼎盛時期，資產達到「兩、三千元之巨」。因此，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見面時，稱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富農」。

毛順生是個治家頗嚴的父親，相信「吃不窮，用不窮，人無算計一世窮」的老話，一心要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能種田、會經商，善於精打細算的接班人，對他們寄予無限的希望。按照毛順生的計劃，作

爲長子的毛澤東，應當繼承父業，種田經商，將毛家的事業發揚光大，並一代接一代地傳下來。毛順生企圖按自己的面貌來塑造毛澤東。要走出韶山冲，父親毛順生成了毛澤東的最大的障礙。

毛澤東的母親毛文氏，是湘鄉四都唐家圫人，與韶山冲相隔着一座雲盤山。她在娘家排行第七，被稱呼爲文七妹。毛澤東的外父文錦薰，也是鄉村中的殷實人家。文七妹十三歲過門，十八歲成婚。她中等身材，圓臉龐，寬前額，清秀而端莊。她心地善良，待人誠懇，勤勞賢慧。她相信「命中注定」，「天王菩薩」，「生辰八字」，奉行「積德」，「行善」和「因果報應」，是個虔誠的佛教信徒。

毛澤東臉孔像母親，高大的身材卻像父親。毛澤東儘管對母親懷有深厚的感情，文七妹過世時，毛澤東作了那首炙膾人口的「祭母文」，但母親的善良的性格並沒有給他多大的影響，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父親那嚴厲、專制、倔強的成份，後來，他又從中國歷代的宮廷鬥爭中，吸取了許許多多的權術，並且又經過中共黨內鬥爭的長期磨練，造就了他後來的那種嚴厲、專制、精明而又狠辣（例如他強調對敵作戰「與其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性格。

文七妹的頭兩胎都沒有養活，對第三胎的毛澤東，自然視如心肝寶貝。她恐怕毛澤東仍難養活，便在滿月之後，抱回娘家寄養。外婆文賀氏找了個算命先生看了毛澤東的八字，說要拜個長壽的乾娘，才能平安長大。外婆於是想到後山有塊兩丈高的大石頭，那是萬年古石，最是長壽了。於是抱了毛澤東拜大石頭爲乾娘，並給毛澤東起了乳名「石三」，人們便叫他爲石三伢子。毛澤東以後寫文章曾用「石生」爲筆名，來由在此。

文家設有私塾。毛澤東四歲時，便常常去私塾旁聽，開始接受啓蒙教育。

一九〇二年，九歲的毛澤東從唐家圫外祖父家回到韶山冲，入南岸私塾讀書。啓蒙教師鄒春培。先

讀《三字經》，接着讀《幼學瓊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毛澤東記憶力很強，能夠口誦心解，很快便領悟。在學了一些字後，父親又要他學習珠算，以幫助家裏記賬。

一九〇四年秋，十一歲的毛澤東轉到韶山關公橋私塾讀書。塾師毛咏生。在這裏只讀了半年，一九〇五年春，毛澤東轉到韶山鐘家灣私塾就讀。塾師周少常。

一九〇六年，十三歲的毛澤東到韶山井灣里私塾讀書，塾師毛宇居。在這裏，毛澤東繼續讀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在毛宇居的指導下，開始練習書法。

毛澤東後來回憶起這階段的學習生活時說：

> 我是家中的「秀才」，念過幾本經書，但我不喜歡讀經書。我喜愛讀的是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造反的故事，我年紀不大時就讀過《岳飛傳》、《水滸傳》、《說唐》、《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等，儘管老師嚴加防範。他討厭這些禁書，稱它們爲邪書。我常在學校裏閱讀，當老師走過來時，就在上面蓋上一本經書。我的大多數同窗也這麼幹。我們把這些故事差不多記的滾瓜爛熟，總要在一起討論許多回。我們知道的這些故事比村裏那些也愛讀這些書的老頭們多，他們常和我們議論這些故事。我認爲，我在易受外界影響的年紀讀的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甚大。
>
>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裏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就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

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爲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

這是毛澤東造反、革命精神的坯胎。

富裕的經濟環境，爲毛澤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物質基礎。孩童的毛澤東，得以學習、讀書。毛澤東所獲得的命運的眷顧，比其他貧窮的農家孩子要優厚得多。父親毛順生四出經商，也爲這個家庭帶來了一些外部世界的新鮮氣息。當毛澤東要離開韶山向外求學時，家庭也爲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經濟支持。這是毛澤東可以走出韶山冲的物質基礎。

一九〇七年秋天，毛澤東離開了井灣里私塾，開始回家種田。

毛順生是個勤勞刻苦的農民。他自己不停地勞動，也嚴格地要求孩子們努力工作。他看不慣遊手好閒，憎惡浪費和糟蹋東西。他的脾氣倔強，暴躁，嚴厲而專制，自私而刻薄。他從來不給孩子們零用錢，平日的飲食也不好，難得見到鷄魚肉蛋。毛順生卻善待長工，農忙時來幫忙的短工，每天也都有鷄蛋下飯。

毛澤東生性倔強、反叛，又不喜愛勞動，對父親爲他安排的人生道路，並不熱心，因而經常與父親發生矛盾和衝突。

一些毛澤東的傳記，將韶山時代的毛澤東描寫成熱愛勞動，具有傳統的勤勞、樸實美德的兒童。那是不正確的溢美虛詞。除了喜歡讀書外，毛澤東是個問題多多的反叛少年。在私塾裏，老師們雖然喜歡毛澤東的聰穎好學，但卻討厭他的倔強調皮和任性。

有一天，塾師鄒春培要學生們站起來背書，毛澤東卻不肯站起來，硬要坐下來背。他說：「先生坐着，我也坐着，我聲音大一點，你一樣聽得清楚。」

又有一次，鄒老先生要到朋友家去吃生日酒，就吩咐學生們做功課，等他回來再背書。時令正交三伏，天氣又悶又熱，毛澤東出主意大家到水塘裏洗澡、游泳。於是，學童們都走出課室，在水塘裏嬉戲。正在這時，鄒春培回來了，見到學生們如此胡鬧，非常生氣，便叫他們到孔夫子的桌位下面罰跪。衆位學童都戰戰競競地跪下了，唯有毛澤東不肯下跪，還說：洗冷水澡是我帶的頭，你要打就打我。鄒春培一聽，越發火冒三丈，舉起那根二指寬的竹篾片，就要打下去。毛澤東急忙閃開，一溜煙便跑了。

毛澤東不敢回家，怕挨父親的痛打。他想到湘潭縣城去，可是卻不知道方向，也沒有出過遠門。結果，他在山裏亂跑了三天，終於被家裏的人找了回來。原來他只是在韶山周圍的山裏兜了幾個圈子，離他的家上屋場還不到八里路。

三十四年後，毛澤東回憶起這次「課堂革命」時說：「回家之後，令我驚喜的是狀況有所改善，我父親開始對我有些體貼，老師也較溫和了一點。這是一次成功的『鬥爭』」。

在私塾裏，毛澤東反抗老師，在家裏，毛澤東則反抗嚴厲、暴躁、慳吝、自私和唯我獨尊的父親。毛澤東喜愛讀書，但讀的不是「有用」的經書，而是無用的閒書、小說。在父親毛順生的眼裏，這自然是一種「糟蹋」和浪費。父子間就此發生過不少的爭執。

毛澤東還厭惡農田裏的勞動。對待家裏的農活生計，他抱着一種得過且過、應付了事的「顧傭」態度，缺乏主人翁的那種全力以赴和盡心盡力的認眞態度。有一次，毛順生叫他挑糞，毛澤東便與父親討價還價，最後答應只挑十五担。吃過午飯後，毛澤東便挑起糞桶出去，不多不少，只挑了十五担，便扔

下糞桶，躲到樹蔭底下看書去了。父親找到他，並責罵了一頓，毛澤東說：「我是按你說的作田，挑糞，當我做完，你就沒有權力不讓我看書」。毛順生無可奈何，只好讓他看書。

毛澤東在後來回憶說：由於經常與父親爭執，「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顧工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着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

毛順生經常責罵毛澤東「懶惰」，「懶而無用」，「不孝」。針對父親的這些指責，毛澤東也經常爭辯、反駁：「長者應該比後輩多做些事，你年紀比我大兩倍以上，應該多做些，等我到你那樣大的年紀時，力氣要比你大得多，做的事情也就更多」。毛澤東還向父親宣稱：等他到了父親這樣年紀的時候，他會比父親勤快得多。當父親指責他「不孝」時，他更引經據典來反駁：古書上說，「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有「子孝」。毛順生時常被駁得啞口無言，氣不過之下，只好訴諸武力。

毛澤東與父親間的爭執，有時也會暴發成激烈的衝突。有一次，毛順生在家裏擺開酒席，款待生意場中的客人，叫毛澤東來陪客。然而討厭繁文縟禮的毛澤東不願奉陪這些客人。於是，父子兩人便在客人面前大聲爭吵起來。毛順生當着客人的面大罵毛澤東「懶而無用」，毛澤東便公然與父親頂撞起來。毛順生於是更加氣憤，要動手打人。毛澤東見機不妙，便憤然出走。母親文七妹急了，連忙趕出來勸架，要毛澤東回去。而暴躁的毛順生也追了出來，一邊罵，一邊命令他回去。毛澤東已經跑到南岸的池塘邊，恫嚇父親說：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池塘自殺。這樣一來，毛順生眞的給嚇住了。毛順生不再追來，但堅持要毛澤東下跪，磕頭認錯。毛澤東又討價還價，說：如果父親不再打他，他可以跪下

一條腿。結果，在文七妹的講和、勸解之下，父子倆終於達成協議，毛澤東單腿跪下向父親磕頭認了錯，而毛順生也不再打他。毛澤東與父親的一場衝突，在雙方的又堅持又妥協中平息了。

在回家務農期間，毛澤東利用一切機會，扔下農活抽空讀書。每天晚上，在幫父親記完往來帳目後，毛澤東便回到自己的臥室，點起一盞桐油燈，就着微弱的燈光，專心致志地讀書，常常讀到三更半夜。

毛澤東的這些行爲，毛順生當然不喜歡。他覺得兒子看那些閒書、邪書，不但浪費時間，躭誤農活，又費精神又費油。於是，一發現兒子在看閒書，他便大發脾氣，呵斥責罵。這時，母親便出來打圓場，說：「三伢子呀，你就聽話，莫熬夜了，明天還要做工夫哩！」

然而，任性而倔強的毛澤東根本不聽父母親的勸告，他用一牀老藍布被單，把窗戶遮得嚴嚴實實，不讓漏出一點燈光，然後便沉迷在那些雜書、閒書中。

毛澤東後來說：自己「貪婪地閱讀我能夠找到的除經書以外的一切書籍」。毛澤東的弟媳王淑蘭也回憶說：「凡是在韶山冲能夠借到的書，他都借來讀了。連和尚的經書也讀」。爲了借書，毛澤東時常翻過雲盤山，到唐家圫外婆家去，向舅父和表兄們借書，來回幾十里路。

在單調而辛苦的農田勞動中，讀書成了毛澤東唯一的精神享受。書籍中的大千世界，成爲他逃避現實的樂園。閱讀豐富了毛澤東的精神世界，開闊了毛澤東的視野。書籍裏展現的燦爛多采的世界，令毛澤東無限嚮往，而現實就越發變得俗不可耐、苦不堪言。毛澤東與父親給他安排的生活道路，距離越來越遠了。

隨着年紀增大，毛澤東的反叛和固執也越來越強烈，與父親的爭吵也越來越頻繁、劇烈了。他說：

「我越來越恨他」。毛澤東對父親如此無禮、反抗，在當時是十分嚴重，十分突出的，是有違當時的封建禮教的。毛澤東並不是一名「孝子」。

與一般人的歡樂、明朗的少年時代相反，同父親的對抗、爭吵，以及田間無休無止的令人討厭的勞動，使毛澤東的少年時代蒙上了灰暗的陰影。韶山的生活是壓抑的，不快樂的。多年以後，當毛澤東在陝北的窰洞中回憶起這段生活時，依然顯得心情沉重，神色黯然。毛澤東對韶山並不眷戀。而事隔了這麼多年後，毛澤東也沒有原諒自己的父親。

毛澤東對父親的態度，使人想起中共的另一位領導人周恩來，他對父親的至敬至孝，與毛澤東形成鮮明的對照。

周恩來的父親名叫周紹綱，是個作風老派，常穿着夏布或黑綢的長袍，老實、忠厚、膽小，屬於那種不生事不惹非，安份守己過日子的老人。一九四二年，周紹綱與兒子一塊住在重慶的紅岩嘴。中共南方局及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都稱他爲周老太爺，鄧穎超則稱呼爲老爺子。

是年六月，周恩來因患膀胱膿腫，入醫院手術。毛澤東特地由延安電告南方局副書記董必武：「恩來須靜養，不痊癒不應出院，痊癒出院後亦須節勞多休息，請你多加注意」。

就在這時，周老太爺突然中風，送醫院沒搶救過來，很快就過世了。

一個難題馬上擺在董必武、鄧穎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這一消息告訴周恩來？如果告訴，周恩來刀口未痊癒，又是孝子，大悲大痛不利於身體且不說，還肯定會跑出醫院奔喪。

「我看暫時不能告訴周公。」董必武說。「大前年他去紹興省親，見了族長三鞠躬，見了姑丈推至

上座執晚輩禮，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長自居。現在父親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醫院。」

鄧穎超也同意董必武的意見，說：「先不要告訴他了，這邊喪事我們先辦着。」

於是，周老太爺去世的消息就瞞了周恩來。

然而，以周恩來的目光和心思，瞞一天可以，瞞兩天他就看出異樣了。這一天，秘書何樹英在照料周恩來。傍晚時，周恩來忽然問道：「董必武怎麼兩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何樹英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來不滿或生氣時喜歡用這兩個字。何樹英感覺到他那銳利的目光正在自己的臉上掃描，心中便不自在起來，故意找些事來做。

可是，周恩來叫住何樹英：「你不要亂找事了。我問你，家裏是不是出事了？」

「沒聽說甚麼事呀，」何樹英努力鎮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來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們越往我這裏跑得勤，怎麼會不露面？滑稽！」

第三天，另一位秘書吳克堅來了。他向周恩來問候，又向周恩來匯報一般情況，周恩來都沒有作聲，兩只眼睛望着吳克堅，目光嚴肅、眞誠、認眞。吳克堅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受不起周恩來的目光，他越來越不自然，臉上的肌肉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周副主席有甚麼指示？要是沒甚麼事我就回去了。」他只想開溜。

「家裏是不是出事了？」周恩來突然問道。

「沒、沒甚麼……」吳克堅僵笑着，但一遇到周恩來那嚴厲的目光，便又笑不出了。

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堅持出院。車子剛到紅岩嘴，周恩來就感到氣氛不對，臉色蒼白，一溜小跑，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鄧穎超聽到響聲，正迎出來，周恩來已跨入辦公室內，一眼見到鄧穎超臂上的黑紗，猛地停下步，好久才問出聲：

「怎麼，怎麼回事？」周恩來從未像這樣失控失態地顯出慌亂。「出了甚麼事？到底出了甚麼事？」周恩來早已明白發生了甚麼事，但他不能接受這一現實。

「老爺子……去世了。」鄧穎超終於小聲說道。「中風，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來的身體一陣悸顫，搖晃了一下，淚水像泉水一樣流了下來。接着，「嗚——」的一聲長長的悽哀的號哭，周恩來雙手捂到臉上，一屁股坐在地上，放開喉嚨，號啕大哭。

鄧穎超和幾位工作人員上前扶着他，不讓他躺倒在地上。周恩來坐在地上，兩只腳孩子似地前後掆動，突然抬起淚眼，憤怒地斥道：「你們沒爹啊？你們怎麼能這麼做？啊，嗚嗚，他是我父親，我父親死了你們封鎖我，嗚嗚，馬克思主義也沒有說不要爹！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說親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嗚嗚……」。

鄧穎超不敢勸，也勸不了，趕緊派人去叫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說：「恩來同志，我們本意……」。

「你沒有爹嗎？」周恩來痛哭失聲。「你們搞封鎖，我父親死三天你們不通知我一聲，他是我父親，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甚麼共產黨員？啊？」

「我們考慮不周，都是我們考慮不周。」董必武彎下腰，連聲自責，周恩來的哭聲才減輕了一些。

董必武以下，職位都比周恩來低。大概是感到再責備也沒有用，然而內心的悲痛還需要渲泄，周恩

來便選擇了毛澤東。周恩來從地上站起來，一邊流着淚，一邊擦着淚，在辦公桌前坐下，拿起筆寫道：

「主席，歸來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於次日安葬。」

延安那邊馬上回電：「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感哀悼，尙望節哀。重病新癒，望多休息，並注意以後在工作中節勞爲盼。　　毛澤東」

周恩來抱着未曾痊癒的病體，前去爲父親守靈。他守了一夜，第二天仍不肯去休息，一直守到下午起靈。

周老太爺落葬時，周恩來塡了第一鍬土。然後大家才開始幫助塡土。堆起坟後，又是周恩來堆最後一鍬土，仔細將坟頭拍實，修理整齊……。

從毛澤東與周恩來對待父親的不同態度，可以看出兩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想意識，不同的作風性格。……

促使毛澤東離家出走的另一個原因，是不愉快的婚姻。

一九○七年，由父母作主，十四歲的毛澤東娶了二十歲的女子羅氏爲妻。這是一段黯淡的婚姻。一九三六年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說：「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後來也沒有。我並不認爲她是我的妻子。」

對老師和父親的責罵，毛澤東都曾用出走來反抗。對於這次婚姻，卻見不到毛澤東用甚麼樣的驚人之舉來反抗。毛澤東與羅氏相處了兩年多。不如意是眞，但與斯諾講的那番話，卻未必是眞。

在當時，成婚即是代表成年和自立。毛順生要毛澤東接過家庭的擔子。可是，家庭的生活令毛澤東

感到越發可惡可憎，日耕夜讀也不能令他感到滿足。於是，毛澤東公然向父親提出繼續上學的要求。毛順生當然不會答應兒子的要求。於是，父子倆又爆發了新的一場劇烈的爭吵。這一次，毛順生氣急敗壞，而毛澤東也絲毫不讓。經過曠時日久的僵持，加上妻子文七妹的勸喻，毛順生終於讓步了。於是，毛澤東便到烏龜井私塾復學就讀，第二年更離家到東茅塘毛麓鐘的家裏寄宿就讀。這時已是一九一〇年，毛澤東十七歲。

在茅塘，毛澤東讀《史記》、《日知錄》、《漢書》、《綱鑑類纂》等古書，還學習唐詩宋詞；此外，還大量地閱讀了時務新書、潮流報刊。毛澤東每日早起晚睡，手不釋卷，貪婪地吸收着新知識。毛澤東的眼界更加開闊了，在他的心中，上屋場的家以及父親給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似乎變得越來越遙遠。

一九一〇年，由於水災，年成歉收，韶山出現糧荒。飢餓的村民們這時寄望於毛氏宗祠的一倉積谷。「養兒防老，積谷防飢」。這倉稻谷是爲毛氏子孫準備濟荒的公糧。只要族長毛鴻賓一開口，就可以開倉分谷了。但是，毛鴻賓和另外一些人，正在發着邪念：準備偷偷地把稻谷賣給湘潭的糧商。不料這一陰謀被一個名叫毛承文的窮哥們發現了，就和族長吵起來。族長依仗權勢，反誣毛承文偷糧及打人。村民們便聚集在祠堂前，理論這件事。族長毛鴻賓的陰謀被村民們揭穿，其作法遭到民衆的強烈反對，被迫當場釋放毛承文，並馬上開倉放糧。

好鬧事的毛澤東，當然不會放過這次機會。在東茅塘的學堂裏一聽到外面的吵雜聲，他便跑出來，跟着人們一起涌進了祠堂，並跟着高喊了幾句話。這一切，族長都看在眼裏。事後，族長毛鴻賓向毛順生告了一狀。聽到石三　子參與鬧事，成爲鄉紳之一的毛順生大覺無顏，氣得半死。毛順生覺得，與其

讓毛澤東在外面讀書，還不如學點實務，學做生意。於是，毛順生當機立斷，要毛澤東馬上離開韶山，到湘潭十四總毛順生的本家兄弟毛槐林開的「寬裕糧行」當學徒，學做生意。

對父親的決定，毛澤東並沒有反對。只要能離開韶山冲就好，況且湘潭縣城是個大碼頭，大商埠，他早就嚮往了。不過，對當學徒做生意，他打心裏不喜歡。於是，毛澤東跑去向他所敬佩的老師李漱清請教。

李漱清正在田地裏除草，聽了毛澤東的訴說，連聲說道：「不行，不行！」他認爲毛澤東放棄學業，十分可惜。正在這時，表哥文運昌來了。文運昌也不贊成毛澤東去湘潭當學徒，反而主張毛澤東跟他一起去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繼續讀書，並介紹說那所學校是湘鄉縣最高學府，是所新式學校，有許多西洋的新科目，教育方法新潮。毛澤東的心更加活動了，他決定去湘鄉，而不去湘潭。

在這關鍵的時刻，了解兒子心思的母親文七妹幫助了他。

一天中午，毛順生由外面回家，見家裏坐滿了客人，有的還是輕易請不來的稀客：東茅塘的毛麓鐘，李家屋場的李漱清，井灣里的族兄毛宇居，唐家圫的舅舅文玉瑞和文玉欽，內姪文閣泉，文運昌，姨姪王素範等等。衆人圍坐在酒席前面，等毛順生坐下，便衆口一聲，勸說毛順生讓石三伢子出去讀書。執拗的毛順生當然不會如此輕易地放棄己見。最後，毛麓鐘提起年前毛順生爲了一塊柴山而打的官司，由於文化水平低，明明自己有理，但講不出，寫不出，最後官司竟輸了，不但柴山斷送給別人，還賠了一大筆錢。這是毛順生內心的一塊隱痛。在衆人的勸說下，毛順生終於點頭了。毛澤東終於戰勝了父親，戰勝了傳統，戰勝了命運，爲自己爭取到了一條嶄新的人生道路。

兩天後，毛澤東整理好行裝、在文運昌的陪伴下，去湘鄉的東山小學應考。臨走之前，毛澤東抄下

了日本人西鄉隆盛的一首詩，夾在父親每日必看的帳簿裏：

男兒立志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毛澤東終於走出韶山冲，並且一去不復返。後來，毛澤東從湘鄉到長沙，到北京，到上海，到廣州，逐步走向中國廣闊的社會，逐步登上中國歷史的大舞台。

第三章　林彪：南昌起義——艱苦的旅程

一、南昌起義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捕殺共產黨人，白色恐怖籠罩着上海和全國各地。

五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已經是九點鐘了，上海的馬路上行人稀少下來。這時，一條里弄中，一名生意人正要出遠門，他提着一件小小的行李，一個伙計跟着他。這名生意人走了幾步，回過頭來望向自己的家，只見一個女人正站在小陽台上目送着他，這個女人便是剛剛由廣州逃到上海的鄧穎超，而那名生意人便是周恩來。

交通員將周恩來由虹口碼頭送上一艘英國的客輪。經過化裝的周恩來躲在三等艙裏，整整兩天沒有出來，只有一位身懷武器的保衛人員跟着他。船過南京、蕪湖時甚爲緊張，國民黨的特憲人員曾上船來搜查。過了九江，才算鬆了一口氣。船到漢口時，另一名商人打扮的人，乘汽車來到江漢碼頭迎接，把周恩來送到中央軍官學校武漢分校居住。來接的人，便是中共要人惲代英。

周恩來，字翔宇，別號飛飛、伍豪，原籍浙江紹興，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生於江蘇淮安。一九一九

年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成爲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一九二〇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組織中共旅歐支部，並擔任其領導人，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巴黎回國，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周恩來憑他的卓越的才華，精明幹練的領導能力，被獲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並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長等職，主持組建中共領導的第一支武裝——葉挺獨立團。一九二六年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事委員會書記。一九二七年三月，領導上海工人起義取得勝利，趕走了北洋軍閥。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政變，身爲上海起義總指揮的周恩來首當其冲。十一日夜裏，周恩來被騙至國民黨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並被扣留。經羅亦農等人多方營救，方才脫險。由於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中共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

周恩來一到武漢，便立即投入中共中央的工作。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常委決定周恩來任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以聶榮臻、王一飛、顏昌頤、歐陽欽等人爲助手，着手對中共控制下的軍隊進行整頓、組織、聯絡和開展政治工作，並負責指導武漢的工人糾察隊和湖南、廣東的農民運動。當時毛澤東主持的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便歸轄周恩來領導。五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又決定周恩來代替張國燾任中央常委，參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工作。這時的中共核心領導人還有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四人輪流值日，處理各項緊急事務。

六月十七、二十日，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周恩來兩次提出舉行湖南暴動的計劃。會議通過了周恩來的建議，並決定由周恩來前往指揮。可是，由於共產國際的反對，這項計劃沒有能夠執行。

直至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在武漢實行「分共清黨」，與蔣介石聯手捕殺共產黨人，中共中央才再次確定組織民衆武裝起義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的計劃。後來，更進一步決定

以在「東征討蔣」口號下，結集在九江、南昌一帶的賀龍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和朱德領導的第三軍官教育團爲基礎，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並任命周恩來爲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統率整個起義。這就是「八·一」南昌起義——中共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起源。

當時，毛澤東還沒有資格參與「八·一」南昌起義的討論和決策。直到「八·七」會議上，他才有機會發表自己關於武裝鬥爭的見解。

而林彪，這時正率領他的連隊，駐防在南昌附近，準備參加「八·一」南昌起義。

林彪隨北伐軍到達武漢後，曾於一九二七年春節請假回家鄉探親。一回到家裏，父母親便來勸林彪結婚娶親。原來，在一九一四年，由父母包辦，林彪曾與鄰村的一名沒有文化的女子汪靜宜訂婚。那一年林彪才七歲。待林彪年長，尤其是到了武漢念中學後，林彪對這椿婚事頗不滿意，曾於一九二四年回家渡假時向母親陳氏提出退婚，但遭到父親的反對，這件事便拖了下來。事過境遷，現在的林彪更不願意與這樣的一位女子結親了。於是，他多方推搪，拒絕父母親的提議，並且於大年初三按時返回武漢。從此以後，林彪再也沒有回過林家大灣。而那位汪靜宜小姐，竟也發誓終身不再婚，一直到一九六三年病故。

林彪返回武漢不久，便開始第二次北伐。

一九二七年四月，奉系軍閥部隊由張學良率領進至河南，沿京漢鐵路南下，威脅武漢國民政府。於是，武漢國民政府下令舉行討奉戰爭，由唐生智爲總指揮，進軍河南。這時，葉挺留在武漢擔任衛戍司令，所部第七十團及第七十三團仍隨軍北伐。林彪就在第七十三團。

河南的戰事進行得十分激烈。在五月份的一次戰役中，雙方死傷慘重，戰鬥反覆拉鋸。在一次爭奪

戰中，第七十三團三連擊潰奉系的軍隊，追擊至渭河邊，潰軍潮水般竄過橋樑退至北岸。連長卻在這時命令停止追擊。

「爲甚麼吹停止號令？」林彪氣呼呼地問道。

「上級交待，窮寇莫追，以免孤軍深入，受敵夾擊。要等友鄰部隊到齊後，再行追擊。」連長向林彪解釋道。

「戰機瞬息萬變，指揮官應見機行事。如果敵軍炸橋或在北岸設防，再追就來不及了。」林彪建議立即繼續追擊。

連長還在猶豫，林彪向士兵們高喊：「衝啊！」他率領自己的那個排衝向北岸，其他各排也跟着衝鋒。正在北岸布防的敵軍立腳未穩，徹底潰散，紛紛棄械投降。

這一仗，北伐軍共俘虜八百餘人。林彪因機智、果斷，善於隨機應變，受到嘉獎，被提升爲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一營七連連長。

南昌起義，一場嚴峻的考驗，正在等待着年輕的林彪。

二、林彪沒有趕上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密鑼緊鼓地秘密準備着。

七月中旬，周恩來派聶榮臻先去九江，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

七月二十六日，周恩來由陳賡陪同趕到九江。二十七日由九江秘密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

七月二十七日，葉挺、賀龍的部隊乘火車通過搶修恢復的鐵橋，先後趕到南昌。

也就在七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在南昌城內的江西大旅社裏，周恩來主持成立了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四人組成，後來加入了張國燾、譚平山。

南昌起義於八月一日凌晨提前發動。經過一整夜的激戰，到清晨六時南昌城內的敵軍全部肅清，共殲敵三千多人，繳槍五千多支，子彈七十多萬發，還有大炮數門。起義成功了。周恩來宣佈，成立國民革命委員會，周恩來爲委員，任命吳玉章爲秘書長，劉伯承爲參謀長，賀龍代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朱德爲第九軍軍長，郭沫若爲政治部主任。

嚴格地說，林彪沒有趕得上參加南昌起義。

林彪所在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當時駐紮在九江與南昌之間的馬回嶺。七月二十六日，周恩來指示聶榮臻到馬回嶺，將該師拉到南昌，參加起義。並且約定，起義打響後，周恩來立刻派出一列火車到馬回嶺，將部隊和輜重物運往南昌。二十五師是預定爲參加起義的主力部隊之一。聶榮臻到達馬回嶺後，便在共產黨員軍官中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起義的通知和有關決定，又具體擬定了各項行動計劃。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師，由七十三團、七十四團、七十五團組成。七十三團又是中共較早就掌握的基本部隊。林彪在第一時間便得知起義的計劃，並在他指揮的七連內作了傳達和動員。

八月一日清晨，起義打響後，周恩來由南昌發出一列火車開往馬回嶺。聶榮臻立即找到七十三團團長商量，要他下令部隊不帶背包、行李、伙食擔子，只帶武器彈藥，以到野外演習爲名把部隊拉出馬回嶺。預先準備好的七十三團很快就登上了火車，七十五團一部分部隊也同時行動。就在這時，國民黨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和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得到消息，急忙趕來阻攔。張發奎隔着鐵路橋大聲喝斥已

登上火車的七十三團官兵：

「你們幹甚麼？我就是總指揮，快去告訴你們團長，停止一切行動！」

此時此刻，就是玉皇大帝也不能阻止七十三團開往南昌。可是張發奎的行動，會干擾七十五團的行動。聶榮臻便指示身邊的一名排長：叫他們走開，否則就開槍！

那名排長喊了一陣，張發奎仍然站在火車旁不走。聶榮臻一聲令下：「開槍！」一陣急促的槍聲，子彈呼嘯着，從張發奎的頭頂上飛過。張發奎嚇得不顧一切地逃回九江。

在聶榮臻的率領下，二十五師的大部分官兵，都登上了火車。列車開到德安時，鐵路損壞，火車不能前進。聶榮臻便下令全體官兵步行向南昌急進，經過一夜急行軍，當趕到南昌時，已是八月二日清晨了，起義已經取得勝利。

聶榮臻從馬回嶺拉回來的二十五師共有三千多人。到南昌後經整編，周士第爲師長，陳毅擔任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林彪仍是七連連長。後來，南昌起義失敗後，到一九二八年，跟隨朱德上井崗山，組成紅四軍，成爲紅軍的主力的，主要就是這支隊伍。

林彪由於地位低微，沒有參加領導（而是被領導）聞名中外、且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向來注重名利的他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儘管他後來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可謂身居高位，肩負要職，但面對着當年參加領導起義的周恩來、朱德、賀龍、劉伯承、聶榮臻等人，想到自己當年曾是他們手下的小兵，心中未免酸溜溜的。他曾對羅瑞卿說：「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爲我們不是南昌暴動的領導人呀！」

三、「紅軍之父」

按照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的決定，南昌起義部隊於八月三日至七日分批撤出南昌，向南進發。周恩來任命朱德爲先遣司令，率領第九軍教育團爲先遣隊，比其他大部隊早兩天踏上南下的征途。朱德說：

「我自從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一路上沒有遇到敵軍的抵抗。先遣隊的主要任務是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和我一起的有彭湃，惲代英、郭沫若，我們只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宣傳隊，又是糧秣隊。」

起義部隊經撫州、宜黃、廣昌、寧都，到達瑞金。休息幾天後，部隊準備經會昌向廣東進發。這時，國民黨已在會昌結集大批部隊，準備阻攔起義部隊的前進。八月三十日，起義部隊主動向駐守在會昌的錢大鈞部發動攻擊。周恩來等領導人都在前線陣地指揮。會昌的敵人有萬餘人，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戰鬥力很強，戰鬥打得十分慘烈，起義部隊久攻不下。二十五師因夜間走錯了路，最後趕到戰場，總指揮部下令二十五師立即投入戰鬥，周恩來說：「部隊是很疲勞，可是會昌一定要打下來。你們有沒有把握呀？」師長周士弟及黨代表李碩勛都表示：「我們向黨保證，一定打下會昌。」二十五師與二十四師擔任主攻，而林彪的部隊又是主攻中的主攻。

林彪率領的七連，飯也來不及吃，便飛跑投入戰鬥。進入陣地後，林彪發現敵人正面的火力很強，兩側較弱，當即決定正面佯攻，由側面主攻。

在一排的掩護下，二排沿着側面的一條乾水溝，巧妙地運動到敵人的側翼。正當二排要接近敵人的

火力點時，被敵人發現了。不等敵人調整火力，林彪立即下令二排向敵人發動猛烈的攻擊。敵人紛紛倒下，慌忙向後撤退。二排順利地佔領了敵人的陣地。林彪指揮的攻擊獲得成功。

緊接着，七連全體官兵向後撤的敵人發起追擊，敵人徹底敗潰了。這時，兄弟部隊也衝了上來。

這一役，錢大鈞部傷亡、被俘、逃亡者達六千多人，只有三千人退走。錢大鈞的轎子來不及抬走，被丟棄在水溝裏，他慌忙抓了一匹馬，逃出了會昌城。

這次戰鬥取得勝利，團部、營部都表揚了七連。

會昌戰役後，前委召開會議研究下一步的行動。決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份兵力於三河壩監視梅縣之敵。這就形成了三河壩分兵的決策：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第二十軍和第十一軍的二十四師，直奔潮汕；朱德率領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和第九軍教育團，共約四千餘人留守三河壩，以防止敵軍從梅縣抄襲進軍潮汕的主力部隊的後路。林彪任連長的七連，屬於留守三河壩的部隊。命運又一次將林彪和毛澤東拉近。

三河壩在廣東大埔縣的南面，是一個位於三江口上的大鎮子。從北面飛流直下的汀江，同從西南面奔流而來的梅江在這裏匯合，又向南流入水深流急的韓江。

十月一日，朱德率領師長周士第等人，連夜構築工事，準備隨時迎擊敵人。

布防方畢，由錢大鈞率領的經過補充的三個師、十個團、約兩萬人的兵力，向三河壩撲來。按照朱德的「半渡而擊」的命令，起義軍先後三次擊退了敵人的渡河攻擊，堅守了三天三夜，大量地殺傷敵人，完成了掩護主力部隊的任務。爲免陷入衆多敵軍的包圍，朱德於十月六日清晨，率領部隊撤出三河壩，日夜兼程去潮汕追趕主力部隊。

當朱德率領部隊到達饒平以北的茂芝，遇到第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采帶領的從潮安退下來的起義部隊官兵二百多人（粟裕大將當時就在這支隊伍內），方知道主力部隊在潮汕已經失敗。這個消息像一盆冷水澆在大家的頭上。許多人頓時心情沉重，思想混亂，不少指揮員也感到不知所措。

這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他們處於強敵包圍之中，而自己勢單力弱，既孤立無援，又與上級領導機關失去聯繫。一切困難都落在朱德的肩上。「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於危急之中，朱德決定部隊必須盡快離開這個險惡的處境，甩開敵人的重兵，擺脫全軍覆沒的危險。朱德當即在茂芝的全德學校召開會議，參加的有朱德、周士第、陳毅等二十多人。會上，朱德介紹了起義部隊在潮汕失利的情況後，斷然決然地說：「我是共產黨員，我有責任把『八·一』南昌起義的革命種籽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的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在一起，一直把革命幹到底！」朱德鏗鏘有力的講話，給與會者予巨大的信心和鼓舞。經過熱烈的討論，朱德總結了四條意見：

一、要盡快找到上級黨組織；

二、我們要保存這支軍隊，就要找到一塊既隱蔽又有群衆基礎的立足之地，湘粵贛邊界地區是理想的地點；

三、敵人已從南、西、北三方面向我靠攏，我們要從東北方面穿插出去，敵強我弱，我孤立無援，彈藥不足，行動上要隱蔽；

四、對全軍要做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發揮黨團員、幹部的先鋒模範作用，堅決扭轉對革命失去信心的混亂思想，安定軍心，更要防止自由離隊、拖槍逃跑、甚至叛變投敵的嚴重事件發生。

會議否決了少數人關於解散部隊的建議，這次會議爲這支處於困境而又陷入混亂的隊伍指明了出

路。

部隊向福建進發，一路上不斷與敵人遭遇。到十月十七日到達福建武平時，部隊只剩下一千五百多人。這時，部隊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四面受敵，孤立無援，雖然擺脫了敵軍重兵的尾追，但仍經常受到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在山林裏穿行、宿營。官兵饑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隊的信心陷於崩潰，許多人——「甚至師長、團長都逃去，各營、連長亦多離開」，「每個人都考慮着，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麼辦？該往那裏去？」不少官兵離隊，有的甚至帶着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開，有的堅持要解散部隊。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這點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危險。

在這危急的關頭，在贛南的天心圩，朱德發表了一篇激動人心的演說。朱德說：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

粟裕後來回憶說：「朱德同志這些擲地有聲的話語，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陳毅也說：「人們聽了朱總司令的話，也逐漸堅定，看到光明前途了。當時如果沒有總司令的領導，這個部隊肯定地說，是會垮的」。「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裏，在群衆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衆革命的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沒有馬列主義的遠見，是不可

能的。」

天心圩的整頓，大約三百多名官兵離隊了。但留下來的人都更加堅定了。天心圩整頓是起義軍餘部轉戰的一個轉折點。與後來的大餘整編、上堡整編，稱爲「贛南三整」。這些整編，振奮了革命精神，統一了官兵思想，扭轉了思想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朱德在這支部隊生死悠關的時刻，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慨，挺身而出，擔當起歷史賦予的使命，把隊部帶出了絕境。

在南昌起義時，與周恩來、葉挺、賀龍等人相比，朱德的地位並不高，職務也不顯要，在中共黨內資歷既淺，名聲也不響亮。在參加起義的三支隊伍中，數賀龍、葉挺的隊伍人數最多，而朱德的最少。朱德率領的九軍教育團，只有三個連參加了起義。所謂「人微言輕」，當時朱德說的話，不要說「一句頂一萬句」，有時一句也不頂。據陳毅回憶：「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年紀大，是個老同志罷了」。可是，在革命危難的時刻，由於朱德對革命的堅貞赤誠，由於他那寬宏大度、慈善和藹，以身作則，與士兵同甘共苦的優良品德，由於他那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挽救了起義軍，保存了革命的火種。也就在這個時候，朱德在部隊中樹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受到大家的衷心愛戴和信任，成爲這支隊伍，後來是紅軍的領袖。在中共衆多的高級幹部和將領中，朱德得以脫穎而出，「紅軍之父」及「總司令」的地位，就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

四、林彪的危機

南昌起義的失敗，贛南轉戰的險惡和艱難，對年僅二十的林彪來說，是人生道路上所面臨的第一次

嚴峻的考驗。

在此之前，林彪的生活道路基本上是順利的、筆直的。父親所提供的經濟條件，使得他自小衣食無憂，在兩位堂兄的幫助下，他順順利利地加入青年團、共產黨，又考上黃埔軍校，輕而易舉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此過程之中，林彪甚少遇到艱難困苦，更沒有失敗和挫折。對一位革命者來說，過於平坦的道路，未必是件好事。年輕的林彪，還沒有經受過一位革命家所必需經受的那種磨難和錘煉。

而南昌起義的失敗，正是爲林彪補上這必需的一課。

在五十年代，林彪曾爲自己寫了一張條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驟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掛在自己的臥室裏。這是經過多年的磨煉之後，林彪的思想所達到的境界。可是，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林彪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表現出驚慌失措，出現過一系列的動搖。

在三河壩阻擊戰中，林彪所屬的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一營受命抗擊敵人。一營營長是後來被授予大將軍銜的陳賡。敵人派出四個團的兵力，黑壓壓地朝一營的陣地圍攻上來，戰況十分激烈。交戰雙方的下級軍官，多是黃埔軍校的同學，他們不僅彼此認識，而且很多還是相熟的朋友。在肉搏戰時，雙方一邊動刀動槍，一邊喊着對方的姓字叫罵。

「陳賡、林彪、你們過來吧，校長會原諒你們的，你們不要造反啦！」

「我們不是造反，是革命，你們爲甚麼要當蔣介石的走狗？」

雙方一面瘋狂撕殺，一面又忍不住傷心落淚。雙方的人員一批批地倒下，屍陳遍野，血流成河。一營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下，打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自身也傷亡慘重。防禦的陣地被衝破了幾個破口，部

分連排因減員或被分割，已失去戰鬥能力。指戰員們正在作最後的抵抗。

陳賡掃視戰場，發現七連正在徐徐後退。七連的位置處於陣地的中央，如被敵人楔入，後果不堪設想。陳賡急忙大聲呼喊：「林彪連長！」

林彪跑了過來，剛喊一聲「報告！」陳賡便劈頭問道：

「你們爲甚麼後退？這是怎麼回事？」

林彪答道：「連裏犧牲太大，戰鬥力量僅存三分之一，我們要求撤退！」

陳賡嚴厲地說道：「全營都在堅守戰鬥，誰讓你們撤退？你們怎麼可以擅自撤退？」陳賡命令林彪率領部隊立即衝回去，將缺口堵上。

林彪不肯執行命令，堅持撤退。

陳賡急了，喝道：「你再講撤退我就槍斃你！」

林彪這才明白，他如果不執行命令，繼續戰鬥，只有死路一條。於是，林彪只好橫下心，率領部隊衝回陣地。

這是見諸文字的林彪的第一次動搖。此後，林彪的一生中發生過多次大大小小的動搖。最後一次的大動搖，是飛到蒙古的溫都爾汗，在那裏的草原下長眠不醒。

三河壩戰役後，起義部隊進入贛南

這一天，林彪奉命率七連打前站。進至石徑嶺宿營後，林彪下令以班爲單位去採購糧食、衣物。但是，攜帶軍餉的軍需官不見了，有人說：「好像軍需官行軍途中就失蹤了，已經半天了，恐怕是開溜了。」

林彪聽後，急得一頭冷汗。這名軍需官是林彪的一名遠房表弟。而軍餉又是林彪交給他攜帶的。如今錢人兩亡，林彪難辭其咎。

傍晚，後續部隊的大隊人馬到達宿營地，人困馬乏，然而，沒有糧食，也沒有衣物。饑寒交迫的士兵們群情激憤，一片嘩然。

七十三團團長聞訊後大怒，下令將林彪抓起來。

林彪嚇得臉色蒼白，手足無措。正在這時候，朱德和陳毅趕到了。

朱德操着濃重的四川口音，像個父老長者似的和藹問道：「怎麼回事？慢慢說，不要怕。」

林彪驚魂未定，結結巴巴地將表弟攜帶軍餉開小差一事講了一遍。

爲人寬厚的朱德，認爲儘管林彪有錯，但他年青無知，只是受騙上當，罪不在他。

朱德讓人端來凳子，叫林彪坐下，朱德和言悅色地說：「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丟了軍餉，就等於丟了大家的食糧，弄不好士兵們要造反的。你今後一定要吸取教訓，重要文件，軍餉細軟一定要親自保管，不要隨便交給別人。」

林彪對朱德的寬大溫和的態度，感激得涕淚交流，他發誓今後一定吸取教訓，如果再碰上表弟，一定親手殺了他。

一場風波過後，林彪跟隨大部隊在饑寒交迫中，繼續前進。

粟裕大將，曾對這段戰鬥生活，有過具體的回憶：

在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嚴峻時刻，反革命勢力無比猖獗。我們這支南昌起義保存下

來的部隊在江西境內、贛南山區，邊走邊打。

我們從武平經筠門嶺、尋烏、安遠、三南等縣境，向信豐以西的大庾嶺山區挺進。部隊在孤立無援和長途跋涉中，困難越來越多，情況也愈來愈嚴重。我們雖然擺脫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兵追擊，但一路上經常遇到地主武裝、反動民團及土匪的襲擊和騷擾，特別是三南地區地主土圍子和炮樓很多，不斷給我們造成威脅和損耗。爲了防備地主民團的襲擊和追蹤，我們有意避開大道和城鎮，專在山穀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營。此時已是十月天氣，山區氣溫低，寒冷、饑餓糾纏着我們，痢疾、瘧疾一類的流行病折磨着我們。

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敗之後，全國革命處於低潮、南昌起義軍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敗。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前途究竟如何？武裝鬥爭的道路是否還能堅持？我們這支孤立無援的部隊究竟走向何處？這些問題，急切地擺在每個起義戰士面前。

嚴酷的鬥爭現實，無情地考驗着每一個人。那些經不起考驗的人，有的不辭而別了，有的甚至叛變了，不僅有開小差的，還有開大差的，有人帶一個班、一個排、甚至一個連公開離隊，自尋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後來又重返革命隊伍，繼續爲革命工作。我們這支隊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豐一帶時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對革命悲觀動摇，離隊逃跑，特別是那些原來有實權的、帶兵的中、高級軍官差不多相繼自行離去，給部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使部隊面臨着瓦解的危險。

粟裕大將還特地指出，林彪就是一個「想跑而沒有跑成的逃兵」。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起義部隊經過天心圩整頓後，基本上已穩定下來。部隊繼續按計劃在贛南穿插前進。但正如粟裕大將所說，部隊的處境是越來越困難。到達大余縣城時，林彪再也忍受不了這種艱苦的環境。這一天，林彪同一些黃埔軍校畢業的中、下級軍官來找陳毅，表示要離開部隊，還勸陳毅也跟他們一起走。

林彪說：「你是一個知識分子，沒有打過仗，沒有搞過部隊。我們是搞部隊的，現在部隊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與其當俘虜，不如穿便衣走。」

陳毅堅決地拒絕了林彪等人的勸說。陳毅說：

「我不走，現在我有槍，可以殺土豪劣紳，我一離開部隊，土豪劣紳就要殺我。要走你們走，把槍留下，我們繼續幹革命。部隊能存在，我們也能存在。拖槍逃跑最可恥。」

對陳毅的勸說，林彪沒有聽進去。他又一次表現了執拗的性格：決定了事情，別人很難讓他改變。就在部隊離開大余縣的前一天，林彪伙同幾個動搖分子偷偷脫離大隊，朝梅關方向跑去：林彪開小差了。

在山林中，他們遭到國民黨軍隊和反動民團的阻擊、搜捕、追殺。林彪與其他人失去了聯繫，單身只影，踽踽而行。路上林彪遇到一個好心的山民，告訴他：梅關一帶的路隘、關口，都被地主「挨戶團」把守，鳥都飛不過，只要是操外地口音的人或可疑分子，輕則搜去財物痛打一頓，重則被砍頭殺身。林彪聽到這番話，害怕起來。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只好尋路返回部隊。

中午時分，林彪回到部隊，立刻到團部痛哭流涕地檢查了自己動搖逃跑的經過。最後表示：「今後就是天塌下來，我只有一口氣走，就決不會離開革命隊伍。從這次慘痛的教訓中，我算是領教了離開革

命隊伍就是死路一條。今後我要帶罪立功，戰場上見。」

團裏的的幾位領導人，被林彪的誠心悔改態度所打動。當時，開小差，甚至是開大差，是司空見慣的事。況且林彪當時只是一個毛頭小伙子，他能自動歸隊，說明他已放棄逃跑，把自己的命運和革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了。大家一致同意寬恕林彪，讓他官復原職，繼續擔任七連連長。

「浪子回頭金不換」。團長黃浩拍拍林彪的肩膀，鼓勵他說：「哪裏摔倒的，再在哪裏爬起來，不要愛面子，在連裏當衆好好檢討一下，通過現身說法，對全連也是個教育，開小差是沒有前途的。」

林彪在全連大會上作了深刻的檢查，不少戰士受到了教育。一場危機終於過去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當林彪「永遠健康」的時候，一些吹捧文章說南昌起義失敗後，是林彪率領剩餘部隊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朱毛會師」應改爲「毛林會師」。深悉內情而又疾惡如仇的陳毅，憤怒地痛斥道：「僞造歷史是一種犯罪行爲。南昌起義失敗後上井岡山，林彪起甚麼作用？他說穿了是一個逃跑分子！」

這是林彪一生中最低迷的時期。

五、湘南暴動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領起義部隊來到湖南省宜章縣的楊家寨子。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由於得到國民黨第十六軍軍長范石生的幫助，起義部隊得到休整和物資上的補充。一九二七年年底，蔣介石發現了朱德的行踪。接到范石生的秘密通知後，朱德離開廣東，打算進

入湘南，策劃紅色暴動，建立革命根據地。

湘南暴動的第一個目標是攻佔宜章縣城。宜章是座石頭城，易守難攻，而且這是紅色暴動的第一仗，其成敗至爲關鍵。爲此，朱德同陳毅、王爾琢等研究，決定「智取宜章」。這智取的主角人物，便是共產黨員胡少海。

胡少海是宜章縣豪紳的「五少爺」，他雖然出身於豪門，但上學時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放棄了「嗣承祖業」的士紳少爺生活，投身於民主革命，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程潛的部隊裏當一名下級軍官。「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受到懷疑，便帶領部份湖南籍官兵，離開部隊，回到宜章，以販馬作爲掩護，秘密進行革命活動。楊家寨子便是胡少海的活動據點。

朱德提出：由胡少海以國民黨第十六軍一四〇團團副的身份，以「奉范軍長之命移防宜章，保護鄉里」爲名義，率領一支先遣部隊進駐宜章。然後大部隊隨即跟進。胡少海的革命身份沒有暴露，在宜章又是鄉紳，敵人不會懷疑。

果然不出朱德所料，一月十一日，天氣晴朗，宜章縣城裏的頭面人物紛紛到南門外迎接胡少海「榮歸故里」。先遣部隊入城後，胡少海立即佈哨，換下團防局的哨兵。一月十二日午後，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率領大部隊開進宜章。在縣長楊孝斌爲朱德舉辦的洗塵宴會上，朱德把酒杯往地上一擲，門外預先佈置的革命軍士兵立即衝進來，把在座的官員士紳都抓了起來。與此同時，陳毅和王爾琢指揮起義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解決了團防局和警察局，俘虜了四百多人，繳槍三百多支。

一月十三日，根據中共廣東省委指示，宣佈起義軍改名爲「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朱德爲師長，陳毅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蔡協民任政治部主任。鐮刀斧頭的紅旗，就是在這裏第一次舉起的。

朱德在湘南暴動，攻佔宜章的消息傳到廣東的國民政府，李濟深密令曾發動長沙「馬日事變」，大批屠殺工農革命群衆的獨立第三師師長許克詳，「即日進剿，不得有誤」。許克祥接到命令後，曾得意地說：「老子用六個團同朱德的一個團去較量，吃掉他綽綽有餘！」

在強敵面前，朱德認爲「決不可以採取南昌起義後那種死打硬拼的方法，同敵人拼消耗，而應該有勇有謀，靈活機動，揚長避短，用遊擊戰和正規戰相結合的打法，去戰勝敵人」。於是，革命軍避實就虛，主動撤退，誘敵深入。

戰鬥的結果是，朱德的一個團，把許克祥的六個團打得落花流水。尤其是在許克祥的大本營坪石一仗，朱德以不足二千的兵力，俘虜了許部的一千多人。朱德親自帶着部隊追擊許克祥，把他打得只剩下六、七個人、換上便衣，跳上樂昌河邊停靠的一隻小船逃走。這一仗共繳獲步槍兩千餘支，還有重機關槍、迫擊炮、山炮和各種彈藥，以及幾十挑子銀元。後來，毛澤東在《西江月·井岡山》一詞中寫到「黃洋界上炮聲轟，報道敵兵宵遁」中的那門炮，就是在坪石這一仗中繳獲的。

朱德在三十多年後回憶起這次戰鬥時說：

「我們的同志和廣大群衆對許克祥恨之入骨，聽說打許克祥，士氣空前高昂，個個爭先恐後。許克祥把他的六個團擺成一條長蛇陣，這就便於我們各個擊破。所以，戰鬥一打響，我們很快就把他先頭的一個團打垮，緊跟着追擊下去，一路走，一路打，把他的六個團一個一個地都打爛了。我們追到坪石時，敵人已潰不成軍，亂作一團。坪石是一條峽谷，且無交叉道路，敵人只能沿這條峽谷逃竄。我們就一直追下去，追到樂昌河邊，再不能追了才停下來。這一仗打得好，我們抓了許多俘虜，其中有一部分補充了我們的隊伍。特別是在坪石，把許克祥的後方倉庫全部繳獲了，補充和武裝了自己，不僅得到機

關槍，而且還得到了迫擊炮和火炮。可以說，許克祥幫助我們起了家。」

打許克祥一仗，是紅軍發展史上重要的轉折點。在這裏，朱德採用了嶄新的運動戰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戰鬥風格，為日後紅軍在這方面的發展，奠定了一個成功的基礎。同時，由於取得豐富的繳獲，朱德領導的這支隊伍，不但訓練有素，而且裝備精良，成為紅軍中戰鬥力量強的隊伍，成為紅軍的骨幹力量。從井岡山到江西蘇區，這支隊伍驍勇善戰，立下了豐功偉績。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授予這支部隊——紅四軍以『英勇衝鋒』的錦旗。這一切的光輝起點，便是坪石戰役。

坪石大捷後，朱德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相繼攻克耒陽、資興、永興、桂東、汝城等縣，茶陵、安仁、酃縣也舉行了暴動。共有十一個縣的群眾行動起來了，並且組織了自己的地方武裝，在地方黨的領導下，打倒土豪劣紳，推翻反動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動。」

在湘南這個廣闊的戰鬥天地裏，林彪的軍事指揮才能得到了發揮。

二月十六日，工農革命軍攻克了耒陽縣城。二月下旬，國民黨的第十九軍軍長胡宗鐸派出大批的部隊向耒陽撲來。朱德採用「敵進我退」的策略，主動退出耒陽，而林彪率領的一營二連進駐到離耒陽縣城三十五里的東山敖山廟。胡宗鐸得知後，便決定派一支五百人的加強營去偷襲二連。

林彪得知這個情報後，很想消滅這股敵人。

可是，敵人是一個加強營，三個連，裝備又好。而自己只有一個連，一百多號人，力量是三比一，敵人佔了絕對的優勢。因此，要吃掉這股敵人，就不能硬拚，只能智取。

說到智取，從過往的一些戰鬥，例如會昌戰役，林彪已經領略到它的無窮妙力。愛動腦子的林彪，

越來越喜歡在戰鬥中講究戰術，運用謀略，從而把仗打得更加出色。他不喜歡那種不講究戰術的死打硬拚。他發現，打仗越來越像一門藝術，而「運籌帷幄」，便是這種藝術的巨大的享受。打巧仗，打活仗，逐漸成爲林彪的作戰風格。

林彪親自來到敖山廟觀察地形。只見敖山廟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周圍是五個村落。在東、南、西面，是陡峭的山坡，像兩條鐵臂，環抱着敖山廟。而北面則是一條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橋。若從大路過來，必須走這座橋。這是一個理想的伏擊戰的戰場。

敖山廟是座頗大的古廟。中共耒陽縣委曾在這裏設了一個臨時招待所，並把爲工農革命軍籌集到的一批物資，存放在這裏。林彪決定將敵人誘進敖山廟這個伏擊圈，而這批物資——糧食和豬肉，便成爲誘餌。林彪吩咐將那些物資搬出來，放在廟前面。又將二百餘名赤衛隊員佈置埋伏在周圍的山上，而自己則率領二連指戰員，埋伏在賀家冲。

天快亮時，偷襲的敵人來到敖山廟。經過一番搜查，沒有發現一個革命軍，只見一堆豬肉和糧食堆在廟前。已經走得精疲力盡的敵人，便叫嚷着造飯吃肉。正當敵人毫無防備的時候，林彪的槍聲響了，埋伏在四周的革命軍和赤衛隊一齊向敵人發動猛烈的攻擊，一時殺聲驚天動地。在黑暗中敵人不知有多少革命軍，亂成一團，營長來不及躲避，在一陣亂槍中被打死。敵人喪失了抵抗力。

這場戰鬥只打了一個多小時便結束了，五百名敵軍，死的死，傷的傷，其餘都做了俘虜。

林彪牛刀小試，大獲全勝。

胡宗鐸的部隊佔領耒陽縣城後，燒殺姦虜，無惡不做。群衆紛紛要求工農革命軍再打進城來，趕跑這股殘害百姓的敵人。

中共耒陽縣委負責人來到敖山廟，請二連出兵打耒陽縣城。林彪感到事關重大，便立即向朱德和陳毅報告。

朱德同意打耒陽，但其他的部隊都有自己的任務，這一仗只能由二連自己承擔。

三月二日，林彪與中共耒陽縣委負責人開會研究作戰方案。

第二天，林彪率領二連由城西北方向的子埠嶺向耒陽縣城發起攻擊。三千名農民赤衛隊員則從東、南、西三面包圍敵人，進行佯攻。

攻城戰鬥一打響，農民自衛隊按照原先的佈置，立即打出數千面紅旗，步槍、鳥槍、火銃、松樹炮一齊向城裏發射。縣委的「獨立團」還組織了一支百餘人的敢死隊，繞到敵人後面，用稻草、木柴燃起沖天大火，威嚇敵人。

林彪指揮二連的進攻，打得又急又狠。城裏的敵人不知道革命軍到底有多少，只見四周都是紅旗飄揚，炮聲轟隆，又想起那個加強營的覆滅，便心無鬥志，丟下六十多具屍體，倉惶逃跑。

敖山廟和耒陽的兩次戰鬥，顯示出林彪機智靈活的作戰風格，樹立起能征善戰的美譽，在工農革命軍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後來上井岡山，朱德和陳毅向毛澤東介紹時，就說：「他就是打耒陽的林彪。」

第四章　毛澤東：秋收起義慘敗

一、「煙雨莽蒼蒼」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經過一個月的農村考察後，毛澤東由長沙來到武漢，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

像歷代的騷人墨客一樣，毛澤東向往着那四大名樓之一的黃鶴樓。一個陰雨霏霏的春日，毛澤東抽空遊黃鶴樓。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領略著名的白雲黃鶴的風光。當他登上頂樓，憑欄遠眺，只見浩浩蕩蕩的長江，在腳下滾滾奔流，煙雨蒼蒼，天野茫茫。一股郁結心中的愁緒湧上心頭，毛澤東寫下了《菩薩蠻·黃鶴樓》：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澤東自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號，黨的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找到了出路。」

「心情蒼涼」，既爲國事，亦爲私事。經過曲折的探索，毛澤東終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了中共的「一大」，是中共的「開朝元老」之一。可是，幾年來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沉浮不定：

一九二一年七月，毛澤東出席中共「一大」，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在大會上擔任記錄。

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毛澤東正在上海。可是，由於「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他竟沒有出席大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參加了，並身居要職。他不僅成爲九名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之一，而且成爲五名中央局成員（即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的一個，他又兼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協助總書記陳獨秀工作，儼然是個「副總書記」。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召開「四大」。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大會，連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也沒有選上——當時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設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五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毛澤東是作爲候補代表出席，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毛澤東被選爲候補中央委員。當時有中央委員三十一人，候補中央委員十四人。毛澤東在黨內排名在三十名以外。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回首往事，曾說：「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又到了，被選爲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會到了，當候補代表，也很好，被選爲候補中央委員。」

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不僅大起大落，而且多年來工作上沒有突出的表現。他從事過工人運動，領導過長沙的一些工人罷工，又到過安源路礦。但都是淺嘗即止，沒有深入地堅持下去。因此，他並未成爲「工人領袖」，不如李立三、劉少奇、林育南、張國燾。他又從事過政治宣傳，一九二五年曾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主編《政治周報》。可是，他的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有限，遠遠不如陳獨秀、蔡和森等人，他寫的文章，多是就事論事，缺乏那種氣勢磅礴的理論力量。而其文采、雄辯，又不如惲代英，蕭楚女。因此，中共早期人才濟濟，群星燦爛，相形之下，毛澤東黯然失色。

毛澤東被譽爲農民運動的專家。他最早提出農民問題，是在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會議上。據張國燾回憶：「農民運動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題。在中共歷次討論中，直到三次代表大會，代表才注重這個問題，尤以毛澤東爲然」。「他向大會提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問題」。可是，毛澤東在此之前實際上並未接觸過農民運動。因此，當大會委託毛澤東與譚平山起草《農民問題的決議案》時，毛澤東並沒有拿出甚麼有效的主張，《決議案》內容抽象空洞和一般化，並沒有做出甚麼建樹。然而，廣東省的彭湃，早在一九二二年即在家鄉從事農民運動，並成立了赤色農會。一九二三年一月，創建了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縣農會——海豐縣總農會，並被推選爲會長，後又兼任陸豐縣總農會會長，惠州農民聯合

會會長、廣東省農會委員長，一九二四年四月出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開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主任，而毛澤東是在一九二六年才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一九二六年一月，彭湃發表《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一文，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部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闡述農民運動的重要著作。而毛澤東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才到湖南農村進行爲期一個月的考察，三月才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前者爲多年研究工作的心得，而後者僅是浮光掠影式的「考察報告」。在這方面，毛澤東顯然是相形見絀。

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六年中，毛澤東從事過工運、農運、宣傳、黨務，如此頻繁地更換工作的內容和戰鬥的崗位，自然很難做到深入和專門，很難有所建樹，也很難形成「突出」，成爲權威。由此看來，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毛澤東還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座位。

一九二七年初，毛澤東到達武漢後，主要是從事農民運動方面的工作。

二月二十三日，他出席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會第二次常會，作《中國各地農民運動狀況》的報告；

三月二日，出席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會第三次常會；

三月初，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推定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爲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常務委員，負責管理全所工作；

三月五日，出席湖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

三月十六日，出席農民問題討論會第五次常會。

這一切，在當時都不是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毛澤東距離中共中央的權力中心和神經中樞，還相當地遙遠。

這一切也並非是毛澤東所期望的。壯志未酬，抱負難伸，毛澤東未免心情郁郁。加上局勢趨向緊張，烏雲密佈，革命的前途困難重重。此時此地，毛澤東的心境，正如黃鶴樓前的景色：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二、「八·七」緊急會議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在武漢的國民政府實行分共清黨，步蔣介石之後塵，捕殺共產黨人。中共在城市裏失去了合法的地位。中共中央遂決定組織民衆武裝起義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贛、粵四省秋收起義的計劃。

要領導農民起義，就要有熟悉農村和農民的人。毛澤東，這個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人的名字，便出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八月初，中共中央讓毛澤東起草《湘南運動大綱》，強調武裝奪取政權，實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常委通過了這份大綱，並決定毛澤東爲書記組織湘南特委。

「時勢造英雄」。毛澤東的機遇來到了。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湘、鄂、贛、粵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提出要「奪取一切政權於農民協會，殲滅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派，沒收其財產」，「黨過去對農民革命者有一錯誤政策，就是抑制農民，保護小地主利益的政策。」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這就是「八·七」會議。會議在漢口俄租界一幢西式公

寓的二樓召開。八月的武漢，熱得如同火爐。參加會議的二十一名代表，個個滿頭大汗，不但是因爲熱，還因爲這是「緊急會議」。這二十一人是：

中央委員：羅邁（即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徵、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

候補中央委員：李震瀛、陸沉、毛澤東。

監察委員：楊匏安、王荷波。

共青團代表：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達。

湖北代表：鄭超麟。

軍委代表：王一飛。

中央秘書：鄧小平。

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紐曼、洛蜀英娃。

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暴動。

毛澤東在會上破除了「向來以爲領袖同志意見是對的」的觀念，在發言中批判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毛澤東還說：

「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衆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會議選出了以瞿秋白爲首的中央政治局，毛澤東當選爲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月九日，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被任命爲「中共中央特派員」，與彭公達一起被指派到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並全權負責改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達爲新省委書記，與毛澤東共同負責領導秋收起義。

中共中央規定「兩湖（湖南湖北）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於九月十號」，「湖南於九月十日開始總的暴動」。（中共中央《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

這時，距暴動日只有一個月。

三、與中共中央的爭執

毛澤東是在八月十二日由武漢到達長沙的，住在已故的楊昌濟在長沙的住所「板倉楊寓」。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到長沙縣凊泰鄉板倉看望先期回板倉的楊開慧和孩子們，同時，找了六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教師，在楊開慧家開了兩天調查會，瞭解農民對土地問題的要求。毛澤東在十七日才由楊開慧陪同回到長沙。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出席湖南省委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與會者在暴動範圍、土地問

題、政權形式等問題上，與中央的指示發生分歧。例如，在暴動範圍上，中共中央原來的暴動計劃是「集合湘南現有的農軍等，奪取郴宜汝一帶，設立革命委員會，幫助全省農民暴動」，並已任命毛澤東爲湘南特委書記。可是，毛澤東與多數省委委員想發動全省農民暴動，奪取長沙，而改變中央先奪取湘南然後發展爲全省的計劃。

毛澤東與湖南省委的新計劃，遠比中共中央的宏大，他們將暴動的攤子鋪得太大了。

八月十九日，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寫報告，提出不執行中央原定的湘南暴動計劃，決定以長沙暴動爲起點，湘南湘西等亦同時暴動，堅決地奪取整個的湖南，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

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聽取湖南省委代表何資深的匯報，並討論了湖南省委的報告。會議否決了湖南省委的計劃。有的常委指出：毛澤東拋棄湘南暴動計劃是不對的，現在仍應開始各地的農民暴動。又指出毛澤東提出「槍桿子中奪得政權」，與中央意見有點不同，中央意見是純粹依靠民衆力量，以軍事力量爲幫助。而毛澤東是以現有的由中共控制的一些武裝力量爲主。兩者的意見分歧，顯然頗大。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復信湖南省委，指出計劃中有兩個錯誤：一、靠外面軍事力量奪取長沙，這樣偏重於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二、專注意長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收暴動工作（如放棄湘南計劃，並沒有積極地有組織地去準備長沙（這裏是指長沙縣——作者註）、湘潭、瀏陽、醴陵、湘鄉、寧鄉等處暴動）。中央認爲：湖南暴動，可以湘南爲一發動點，長沙爲一發動點，在寶慶一帶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動點。並在土地問題、政權形式等問題上駁回湖南省委的意見。

八月下旬，毛澤東同湖南省委再次開會，討論中共中央的批評意見。關於暴動範圍問題，毛澤東等

人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見，會議最後決定不執行中央原定的湘南暴動計劃，而以長沙為中心，包括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等縣的湘中暴動。

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就暴動範圍等問題再次致信中央，答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三日來信所提出的批評。他們認為中央的批評「實在是不明了此間情形，是不要注意軍事又不要民衆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指出中央的指責「並不是事實」。

而中共中央在九月五日致信湖南省委，拒絕了湖南省委對中央所提的意見，指出：「中央認為你們懷疑中央的政策是錯誤的，在如此緊急鬥爭的當中，中央訓令湖南省委絕對執行中央的決議，絲毫不許猶豫。」

上下級之間，各執己見，僵持不下，害得中共中央要出示「訓令」來使下級就範，這在以組織紀律嚴明稱著的中共來說，是十分罕見的。中共的組織紀律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在如此緊急的時刻，不服從中央的指令，貽誤軍機，這是十分嚴重的錯誤行為。以毛澤東、彭公達為首的湖南省委如此做法，實在是難辭其咎。

後來的事實證明，湘南確實是革命的形勢與革命的力量都十分優良的「布滿了乾柴的火藥庫」，一經朱德領導的革命軍點着，便立即成為熊熊的燎原烈火。毛澤東捨此而取革命基礎不那麼好的湘中，實在是犯了一個大錯誤。

就紙面上的暴動計劃問題，毛澤東、湖南省委與中共中央的「筆墨官司」，足足打了半個月。十分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就這樣白白地浪費掉了。直到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才最後落實了暴動的計劃，決定成立暴動的領導機關，由各軍事單位的負責人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並前

往湘贛邊界統率工農武裝，組織起義軍的前敵委員會，領導秋收暴動。

這時，距離中共中央規定的暴動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數了。

四、倉促準備　起義慘敗

毛澤東是在八月三十一日才離開長沙的。

九月初，毛澤東經株洲來到安源。在張家灣，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和湖南省委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召開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軍事會議。到會的有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安源市委書記蔡以忱、委員寧迪卿和楊俊，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兼安福縣農軍負責人王興亞等人。毛澤東傳達了「八·七」會議的精神和湖南省委關於秋收起義的具體計劃。會議決定正式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余洒度，副師長余賁民，參謀長鐘文璋。下轄三個團：

第一團駐在修水，以盧德銘警衛團爲骨幹，由平江工農義勇軍和崇陽、通城農民自衛軍組成，團長由鐘文璋兼。

第二團駐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糾察隊、安源礦警隊和安福、永新、蓮花、萍鄉、醴陵等縣部分農民自衛軍組成，團長王興亞；

第三團駐在銅鼓，以瀏陽工農義勇隊和警衛團一個營組成，團長蘇先俊。

三個團的兵力合計四千餘人。毛澤東任前委書記，盧德銘任總指揮。

九月五日，毛澤東在安源寫信向湖南省委匯報會議的情況，約定安源於十一日發動，十八日進攻長

沙。

湖南省委遂於九月八日向全省下達了《關於奪取長沙的命令》。

湖南省委在命令中指出：「令各地趕緊動員，限於本月十六日會攻長沙，奪取省城，建立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因此，會議初步擬定起義部隊分三路向長沙攻擊前進的方案：

第一路（第二團）進攻萍鄉與醴陵，向長沙取包圍的形勢；

第二路（第一團）從修水向平江進攻，並發動平江農民在全縣暴動，奪取平江後向長沙前進；

第三路（第三團）由銅鼓向瀏陽進攻，並發動瀏陽農民在四鄉暴動，逼進長沙。

九月六日，毛澤東同潘心源等離開安源，赴銅鼓第三團駐處。

由於時間倉促，也因爲缺乏起碼的軍事知識，毛澤東對起義的組織、準備工作是十分粗糙，很不充分的。

毛澤東拖延至八月三十一日才離開長沙，而九月九日起義便打響了。在這短短的幾天內，毛澤東根本沒有時間對起義部隊進行深入細緻的政治組織工作。三個團中，毛澤東只到了兩個團，駐在修水的第一團，毛澤東沒有能夠去到，連團長鐘文璋，毛澤東都沒有機會見到。既使去到的二團、三團，毛澤東也沒有深入到起義部隊的基層單位，進行最起碼的政治思想工作。

毛澤東在離開安源、前往銅鼓的途上，於九月九日在瀏陽的張家坊被團防局的清鄉隊抓住。在被押送去團防局處決的路上，毛澤東機智脫險，死裏逃生，趕到銅鼓第三團的駐地時，已是九月十日夜裏，恰巧是農曆的中秋佳節。

據陳伯鈞回憶：「毛委員頭髮很長，上身穿白線褂子，下身穿白細布長褲，腳穿布鞋，手裏還拿着

一件短上衣」。「記得正是舊曆八月十五中秋節，團部召集排以上幹部，在蕭家祠堂舉行會餐，飯前，毛委員和全體幹部見了面，並且講了話，說黨很懷念大家，關心大家，他特地來看望大家。毛委員接着爲我們闡述了當前形勢和黨的任務，號召我們舉行秋收起義」。「過了中秋節，我們就出發了」。毛澤東在第三團來得及作的政治組織工作，也僅是如此而已。

至此，在起義部隊的三個團中，毛澤東只是走馬觀花地走了兩個團。至於駐在修水的第一團，是在九月十七日起義失敗後，在瀏陽的上坪，毛澤東才與敗退過來的殘部會合。這時第一團已損兵折將，損失十分慘重，連團長鐘文璋都失踪，毛澤東最終都沒有見到這位團長兼參謀長。

由於缺乏深入細緻的政治組織工作，第一團在這方面出現了一個大漏洞。第一團是在九月九日首先發動起義的。從修水出發後，第一團按計劃向長壽街進攻。部隊於九月十日拿下朱溪廠，隨即越過平、修邊界，佔領了平江縣龍門廠。正當一團繼續向長壽街進軍的時候，敵人在平江增兵一個團。這時，混在起義隊伍中的邱國軒部，乘機叛變。邱國軒把部隊埋伏在距長壽街十五華里的金坪附近，當一團路過金坪攻打長壽街時，邱國軒突然發動襲擊，致使一團腹背受敵。經過兩個小時激戰，一團損失二百多人，步槍二百多支，團長鐘文璋失踪，被迫撤出戰鬥，向瀏陽方面轉移。到九月十七日在瀏陽上坪才與毛澤東及三團會合。

一團在起義不久後即出現部隊叛變，團長失踪，部隊不堪一擊，導致全面失敗。不僅如此，師長余洒度和三團團長蘇先駿，也在不久後叛變投敵。這麼多的高級幹部出現問題，說明了起義隊伍的核心領導組織嚴重不純。這完全是政治組織工作上的大漏洞，是起義隊伍的最高領導人、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嚴重失職。

由於欠缺深入細緻的政治組織工作，整個起義隊伍像一群烏合之衆，從思想到組織，都極不穩定。打勝仗時尚可以，一遇到險情或敗仗，部隊就潰散逃亡。二團是毛澤東去過的，在那裏活動了五、六天。在九月十日起義開始時，第一個目標是攻打萍鄉，打了一天多，沒打下來，便改打老關，得手了。九月十二日，二團乘勝進攻醴陵，在當地革命群衆的支持配合下，又得手了。醴陵城裏鬧得火紅，街道上人潮滾滾，革命群衆將紅布扎在脖子上，喜氣洋洋，揚眉吐氣。當天晚上，在文廟廣場召開了軍民聯歡會。第二天又成立了縣革命委員會。二團在醴陵住了幾天，敵軍乘機以優勢兵力壓過來。二團連夜主動撤退，秘密開往瀏陽，於十五日晨順利佔領了本是三團攻佔目標的瀏陽縣城。在勝利的形勢下，團長王興亞驕傲自滿，痲痺輕敵，結果在十六日被敵人包圍。部隊不堪一擊，大部份被打散，不少人犧牲，只有少部份人突圍脫險。二團基本上不存在了。

準備工作的不足，還表現在軍事行動上。由於沒有統一的領導、部署，加上時間倉促，各路起義軍對各自面對的敵情沒有調查，茫然不知。因而也無從研究和制定相應的策略和戰術，更沒有相應的物質準備。按毛澤東和湖南省委的計劃，起義後一團攻打平江，二團攻打萍鄉，三團攻打瀏陽。但三路起義軍對各自的目標根本不偵察瞭解。結果，二團打萍鄉，因敵軍力量過強，打了一天多沒打下。而三團的攻擊目標瀏陽，當時是座空城，敵軍的主力部隊已開往東鄉永和市一線，僅留下僞團防隊和法警，槍不滿一百，隊長是個叛徒池成竹，整個守城部隊力量很弱。如果毛澤東和三團的領導人事先瞭解到這些情況，起義後三團可繞開那些小市鎮，直接奔襲瀏陽，可以一舉攻下。

可是毛澤東和三團對此一無所知。起義後，毛澤東率領三團按部就班地從銅鼓出發，順着大路向瀏陽進發，而且對一路上的敵情全然不知。第一天走到白沙鎮，就與敵軍遭遇，一連連長不幸犧牲，付出

了很大的代價才拿下白沙鎮。第二天繼續向東門市進發，在距東門不遠的十二墩又與敵人相遇，幸巧來敵不多，被三團一舉擊潰，勝利地佔領了東門市。到九月十四日，幸運之神不再眷顧毛澤東和三團了。由於他們已暴露了行踪，敵軍新八軍以兩個團的優勢兵力在半路上設下埋伏。蒙然不知的毛澤東率領三團進入了敵人的埋伏圈，三團受到兩面夾擊，情況十分嚴重。三營營長、共產黨員湯采芝身先士卒，率領全營戰士多次發起進攻，企圖奪取敵軍的陣地，衝出包圍，但不幸壯烈犧牲。三團與敵人激戰六個小時，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形勢不利，損失過半，最後只好撤出戰鬥，向上坪敗退。

毛澤東與三團由於不明敵情，不能避開敵人，直接奔襲空虛的瀏陽，反而一路上不斷與敵人遭遇，倉促接戰，最後失敗。而空城瀏陽，卻被二團意外地偷襲得手。眞是仗打得稀里糊塗，敗也敗得稀里糊塗。

準備工作不足，還表現在其他地方配合不力。按原計劃，在各路起義部隊發動起義的同時，長沙縣、醴陵、平江、株洲、瀏陽等地的農民也暴動起義，進行配合。但由於沒有進行深入、充分的發動，上述地區農民的起義稀稀拉拉，沒有形成預期的聲勢，因而也沒達到預期的效果。起義部隊勢孤力單，爲敵人所敗。

導致起義失敗，還因爲毛澤東和湖南省委制定的「兵分三路」的策略。三路起義軍，總數只不過四、五千人，如果起義後即迅速集中，統一指揮，統一作戰，或許還能有所作爲。分兵三路進攻，分散了兵力，削弱了進攻的力量，造成讓敵人各個擊破。九月十四日伏擊三團的新八軍的兩個團，就是先打敗了一團後，才回過頭來打三團。在東門市將三團擊敗後，這股敵軍又掉回頭攻擊佔領了瀏陽城的二團，最後又將二團擊敗。這股兩個團的敵軍，「各個擊破」了三個團總數達五千人的一個師的起義軍。

分散兵力還表現在毛澤東與湖南省委將三路兵馬的起義時間分別定在九、十、十一日，而不是在同一時間內起義。同時起義可以同時給予敵人沉重的打擊，令敵人顧東顧不了西，捉襟見肘，沒有喘息機會。相反，則削弱了自己的聲勢和力量，讓敵人有時間、有機會將起義軍從容地各個擊破。

參加了秋收起義的何長工在回憶錄中說：「那時，我們還相當幼稚，打仗還是按黃埔軍校的思想體系來的，即是採用北伐時期的正規戰，死拚硬打的戰術。另外，我們還不懂得集中優勢兵力的戰法，而是分兵出擊；不是選擇敵人的弱點，各個擊破敵人，相反把部隊分成幾路打敵人的強點，且兵力分散，指揮失調，結果反被敵人各個擊破。我們一團就吃了這個虧。」

一團從九月九日起義到失敗，只堅持了兩天。

三團從九月十一日起義到九月十四日失敗，只堅持了三天。

好一些的二團，從九月十日起義到十六日失敗，也不過堅持了六天。

看起來好像是兒戲。

是起義隊伍不行嗎？並不是。起義部隊中有盧德銘的警衛團。南昌起義前夕，原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漢口趕赴南昌參加起義，途中得知南昌起義部隊已南下廣東，遂轉至修水休整。期間，曾與平江、瀏陽農軍的負責人在修水山口鎮舉行會議，決定將部隊聯合起來，合編為一個師，余洒度（警衛團一營營長）為師長，余賁民（平江縣工農義勇隊隊長）為副師長。這些有組織、有戰鬥力的武裝部隊，後來成為秋收起義的骨干力量。起義隊伍中還包括了安源工人糾察隊，安源礦警隊等這些組織紀律性較強，革命覺悟較高的隊伍。餘下的便是各縣的農民自衛軍。這樣一支以正規軍隊警衛團為骨干，有工人、農民參加的起義部隊，是相當理想的配合。只要組織

得好，使用適當，是不乏戰力的，是可以大有作爲的。

秋收起義的失敗，主要在領導方面，主要在毛澤東與湖南省委彭公達等人的身上。毛澤東與彭公達等人更變中共中央關於湘南暴動的計劃，改爲以奪取長沙爲目標的湘中暴動，首先就犯了方向、路線性的錯誤。當時革命處於低潮，敵強我弱，敵衆我寡，長沙作爲省會，是大城市，敵人力量十分強大。以剛剛揭竿而起，尙未站穩腳跟的起義部隊，去攻打這樣的大城市，無疑是一個左傾的冒險主義。

同時，毛澤東彭公達等人，好大喜功，眼高手低，一方面改變中央的計劃，將暴動搞得很大，但是卻沒有進行深入細緻的準備發動工作。他們花了大量的時間、精力與中共中央爭吵，卻不下去做具體工作。毛澤東作爲中央的特派員、秋收起義的最高統帥，自八月十二日回到長沙後，沒有立即投身入起義的緊張的準備工作，卻去板倉探親，住了四、五天，到十七日才回長沙，十八日才開會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和討論暴動事宜。這種作法是否合適？此後，毛澤東沒有立即下去與起義部隊接觸，而是繼續逗留在長沙，直到八月三十一日才離開，以致連最起碼的政治組織工作都沒有來得及做，便倉促發動起義。如此輕率、潦草，那有不失敗的？湖南省委，尤其是毛澤東，難辭其咎。

毛澤東的錯誤，還在於他的「靠槍桿子奪取政權」的單純軍事觀點。在起義前，他只注重幾個軍事武裝部隊，不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群衆，起義後又只注重攻打縣城，佔領縣城，沒有深入農村去發動群衆，打擊土豪劣紳、分配土地，土地革命方面的工作一點都沒有做。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中指出：

農民暴動中專靠武裝的力量（農軍），甚至專靠雜色軍隊土匪首領的力量，而不發動

群衆，不執行土地革命的根本任務（殺戮豪紳，分配土地等等）——這是單靠軍事機會主義的一種」。「農民暴動之中只注意領着武裝勢力去撲城，甚至完全不考察敵我軍力方面的戰術，以奪得縣城、固守縣城，爲暴動之唯一目的，以取得縣政權，發告沒收土地爲土地革命之唯一方法，同時卻忽視鄉村中的土地革命工作，不去更多更廣的發動鄉村群衆，不去率領他們肅清暴動沿途鄉村的一切豪紳反動勢力，不去率領群衆自己動手的解決土地問題，這當然是軍事機會主義。」

《決議案》還說：

湖南省委對於農民暴動的指導更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中央屢次指出湖南暴動應以農民群衆爲其主力，並且向省委書記彭公達同志當面正告其軍事機會主義的錯誤，要省委改正此錯誤，把暴動主力建立在農民群衆上面，遵照中央兩湖暴動計劃切實準備，當時經過反覆辯論，結果彭公達同志雖然勉強接受，但省委的指導仍然沒有改變舊的軍事投機的錯誤：（一）、公然違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動看作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起極大的農民群衆起來暴動，以致暴動開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參加鬥爭外，各地農民群衆實在沒有一點行動。（二）、在暴動區域以內完全沒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權的具體綱領，以致農民只以爲是共產黨的搗亂；甚至省委懷疑農民應需要土地，反對提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三）、在工農軍所經區域以內沒有屠殺土豪劣紳的策

略，以致農民視若客軍過境。因這些指導上的錯誤與懷疑的結果，湖南農民暴動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

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消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爲「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爲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做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秋收起義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雖然這是一次不成功的嘗試，但它爲毛澤東後來在井岡山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八·七」會議以後，中共領導的革命鬥爭，進入了土地革命時期。武裝鬥爭成爲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主要的潮流。在大革命中一直坐冷板凳的毛澤東，秋收起義是個極其重要的機遇，成爲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使得他有機會投身到武裝鬥爭中來，成爲中共創立革命武裝和革命根據地的最早的一批元勛之一。秋收起義爲毛澤東開辟了一條通往中共最高權力中心的道路，爲毛澤東的崛起，奠下了第一塊基石。

五、走上井岡山

九月十四日，毛澤東率領三團敗退至瀏陽的上坪，獲悉第一團已在金坪失利。當晚，毛澤東召開三團幹部開會主張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向萍鄉方向轉移，要與第一團會合。毛澤東還寫信給湖南省委，

決定停止十六日晨在長沙暴動的計劃。

九月十七日，毛澤東與盧德銘率領的第一團在瀏陽的孫家磝會合。毛澤東遂舉行一、三團幹部會議，決定退往湘南。會後，一、三團分路向文家市前進。

九月十九日，二團的餘部與一、三團在文家市會合。這時距起義爆發才十日時間，起義部隊只剩下一千五百多人，損失了三分之二以上。晚上，毛澤東在里仁學校召開前委會議（這是前委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會議），經過激烈的辯論，會議決定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發展。這是從攻打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的新起點。這就是有名的文家市轉折。

在文家市稍作休息後，毛澤東率領革命軍繼續向東南方向轉移。厄運似乎還沒有脫離這支已是疲憊不堪的敗兵之旅。部隊從文家市出發後，一路上戰鬥頻繁，傷病員不斷增加，部隊的士氣不斷下降。

九月二十五日，部隊從蘆溪出發，準備向蓮花前進。由於偵察不力，敵情不明，部隊行軍不久，便在晨霧中響起了一陣陣密集的槍聲。原來起義軍陷入了國民黨江西軍閥朱培德部下的一個特務營和一個保安團布下的伏擊圈。在敵人的猛然攻擊下，這支士氣低落、人心渙散的隊伍，很快就潰敗了。總指揮盧德銘在緊急中親自率領一個連，搶佔路旁的一個高地，阻擊敵人，掩護大部隊撤退。這位才二十二歲的共產黨人奮不顧身，在戰鬥中英勇捐軀。

而毛澤東在這次戰鬥中則備受驚險。九月九日毛澤東被捕逃跑時，腳部受了傷，不能走路。九月十一日隨三團起義時，有人找來一張椅子，綁上兩根竹杠，做成一個轎子，抬着毛澤東轉戰千里。在蘆溪之戰中，由於情況緊急，為毛澤東抬竹轎的兩名民伕，將毛澤東扔下逃跑了。毛澤東不能動彈，只好躲在草叢中，是路過的戰士發現，將毛澤東救了回來。

蘆溪失敗，使起義部隊又一次遭到慘重的損失。幸免於難的毛澤東領着這支部隊避開萍鄉，且戰且走，繼續前進。

此後，一路上起義軍不斷與敵軍發生戰鬥。爲了避開敵人的追擊，毛澤東率領部隊向交通不便、地處偏僻的蓮花、永新一帶轉移。接連的戰鬥，使部隊大量地減員。長途跋涉，連續行軍，疾病流行，傷病員迅速增加，有些傷病員因缺醫缺藥而死在路旁。不少軍官、士兵自行離隊，逃跑回鄉。餘下的人，內無糧草、彈藥，外無援兵，人心惶惶，士氣低落，前路茫茫，不知所之。而四周圍，都是兵強馬壯的敵軍。部隊到達永新縣的三灣時，是九月二十九日，距離起義只是二十日，部隊只剩下不到一千人，軍紀鬆弛，思想浮動，不少團營出現官多兵少、槍多人少的情況。起義部隊似乎已走到了盡頭。

在這危急的關頭，毛澤東採取了兩項斷然的措施。其一是進行整編，將一個師縮爲一個團，稱爲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爲陳浩，下轄一、三營、特務連和軍官隊、衛生隊。改編時，毛澤東提出去留自願，要走的發給路費。結果留下的共有七、八百人。同時，在部隊裏建立黨、團組織，支部建在連上，連以上設黨代表，加強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其二是放棄進軍湘南的計劃，決定就在永新境內的井岡山「落草」，做「山大王」。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

井岡山當時被兩股土匪盤據，其頭目分別叫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駐紮在山下的寧岡茅坪，王佐則在山上的茨坪。兩人結拜爲兄弟，脣齒相依，山上山下互相呼應，同甘苦，同命運。

改編後，毛澤東派人與袁文才、王佐聯絡，曉以革命大義，又送去一百條槍。加上袁文才、王佐本是窮苦人家出身，爲時勢所逼，才上山落草。在毛澤東的勸喩下，袁、王兩人不但同意讓毛澤東上井岡山，而且各率自己的部下加入工農革命軍。

十月三日，毛澤東率領革命軍進駐寧岡縣古城鎮。井岡山抬頭在望。

第二篇

鬥爭朱德——毛林第一次結盟

第一章　「朱毛」與「毛林」

一、朱毛起先無意會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在湖南省茶陵縣的坑口鎮，出現了一位二十二歲的軍人，他穿着一身整齊的國民黨軍官製服，向駐守在那裏的靖衛團出示了「國民革命軍」的證件，上面寫着他的身份：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副官，姓名叫覃澤。

靖衛團團長羅克紹聞訊後，立即設宴款待這位年輕的副官。在跟羅克紹的閒聊中，覃澤得知附近駐紮着井岡山袁文才的一個連隊。

覃澤悄悄地離開了坑口鎮，按照羅克紹所說的地點，覃澤果然找到了那個連隊。在見到了連長游雪程後，覃澤才公開了自已底細，原來他就是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

毛澤覃是毛澤東的三弟，是三兄弟中的老么，一九〇五年出生，十三歲時隨大哥毛澤東去長沙讀書，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前往廣州，先後在黃埔軍校、中共廣東區委工作。一九二七年到武漢，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授上尉軍銜。不久，參加南昌起義，在五師政治部工作，一直跟隨朱德轉戰。這一次到井岡山，是受朱德委托，專程來找毛澤東聯繫的。覃澤只是他的化名。

朱德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底便知道毛澤東的消息。那是在江西信豐，朱德率領起義軍到達後，地方黨組織中共贛南特委派人來接頭，便提起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

十一月上旬，朱德率領起義軍來到贛南崇義縣上堡，進行休息、整訓。當時，地方黨組織又報告毛澤東的部隊就在附近。朱德、陳毅聽後十分高興，陳毅自告奮勇，化裝成老百姓，前往偵察、聯絡。在上猶與桂東交界地區，果然見到一支工農革命軍的部隊。原來，他們是井岡山上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營，營長張子清，黨代表是伍中豪。他們是在十月下旬隨毛澤東在湘贛邊界游擊時，於十月二十三日清晨遭到國民黨「靖衛團」的襲擊，隊伍被打散，張子靖與伍中豪率領三營向南退卻，與毛澤東失去了聯絡。陳毅將他們帶回上堡，朱德幫助三營進行整訓，便一直跟隨朱德活動。在與范石生的第十六軍合作時，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改稱爲第十六軍第四十七師第一四〇團，而張子清、伍中豪率領的三營，則改稱爲第四十七師第一四一團。

在上堡，朱德向張子清、伍中豪詳細地詢問了井岡山的各方面情況，對毛澤東及井岡山上的情況，大體有了一個較爲準確的瞭解。

爲了加強與毛澤東這支僅有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的聯繫，朱德於十一月中旬派毛澤覃前往井岡山，與毛澤東聯絡。

毛澤覃由資興出發。由於化裝成國民黨的軍官，一路上通行無阻，不久便到達茶陵。在袁文才部隊的帶領下，毛澤覃在寧岡縣的茅坪見到了大哥毛澤東，介紹了南昌起義餘部跟隨朱德、陳毅轉戰的情況，轉達了朱德、陳毅的口訊。

聽了毛澤覃的匯報後，毛澤東將毛澤覃留在井岡山工作，卻並沒有再派人與朱德聯繫。

朱德和陳毅托毛澤覃轉達的口訊是甚麼呢？是要求盡快聯合呢，還是「今後加強聯絡、加強合作」這樣的一般性的聯絡呢？看來是後者，朱德並沒有立即或盡快與毛澤東聯合的意思。

朱德得知毛澤東的準確消息，是從張子清、伍中豪那裏瞭解到的。當時正是上堡整訓的時候，也是贛南轉戰接近尾聲，雖然情況已有穩定，但只餘下七、八百人，物資供應等仍是十分困難的時候。如果朱德有意立即與毛澤東會合，可以借助張子清與伍中豪的三營，大家聯合起來，一起打回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這完全是可能的。朱德之所以沒有這樣做，那是因爲從張子清與伍中豪那裏，朱德瞭解到井岡山的情況，知道毛澤東的處境並不比自己好多少。朱德當時面臨的當務之急，是讓部隊得到休養生息，以及物資、彈藥得到補充。之後，這支隊伍便再次變得生龍活虎，可以大有作爲了。然而，在井岡山上，物資同樣地缺乏，戰士們是紅米飯、南瓜湯，三餐難以爲繼。朱德以他那豐富的軍事經驗，從張子清和伍中豪的介紹中，便馬上知道，井岡山做爲革命根據地，是太小了（後來朱德向何長工說，要搞一塊大的根據地），各方面的條件，尤其是經濟條件（物資供應）並不理想。這時候上井岡山，於事無補，徒給毛澤東添麻煩，而自己面臨的各種問題仍得不到解決。

就在這個時候，朱德得知范石生的第十六軍駐紮在粵北，距離不遠，經過聯絡，認爲可以有合作的機會。於是，在毛澤東與范石生之間，朱德選擇了能夠解決目前追切問題的范石生。

朱德並不急於與毛澤東會合，朱德胸懷壯志，目光遠大。他的目標並不是苟且偷安——如那樣盡可以立即上井岡山避避風；朱德是志在東山再起，要把南昌起義餘下的這點火種發揚光大。因此，當務之急是讓部隊得到補充和休息。於是，朱德選擇了去粵北，而不是井岡山。

事實證明，朱德的選擇是正確的。范石生與朱德在汝城會面後，迅速向朱德提供了現款、彈藥、冬

裝、被蓋以及醫生、藥品等物資。僅陳毅和王爾琢，在資興一次就得到六十萬發子彈。范石生的資助，對朱德的起義部隊來說，無疑是及時雨，雪中炭。朱德說：「在紅軍的發展上來講，范石生是值得我們贊揚的。」

范石生，字筱泉，號小翁，雲南河西人。一八八七年出生，自幼隨父學中醫，十六歲中秀才。後考入昆明優級師範學校，加入同盟會，從事反清活動。一九〇九年考入雲南講武堂，與朱德同窗、同班。一九一一年參加辛亥革命的雲南起義，一九二二年任孫中山的北伐滇軍第八旅旅長，一九二七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軍長。蔣介石「四·一二」「清黨」後，曾掩護過軍中的共產黨員。一九二八年八月，朱德與范石生在郴州出於誤會打了一仗，兩人再沒有見面。一九二九年後，范石生受到蔣介石排擠，於一九三三年離職寓居廬山，抗戰爆發後，舉家返昆明，掛牌行醫，一九三九年被暗殺身亡。

在毛澤東這邊，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從報紙上毛澤東就瞭解到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失敗，但還有餘部的消息。上到井岡山後，驚魂甫定，今後何去何從，怎樣發展，毛澤東頗費思量。秋收起義的慘重失敗，實在是毛澤東所始料而不及。「槍桿子出政權」之路，並不如想象當中那樣的平坦順利，輕而易舉。毛澤東需要從長計議了。毛澤東作出的一個重要決定，是於十月十二日派何長工下山向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會報起義的情況，並讓他去尋找南昌起義隊部的下落。毛澤東這時還沒有站穩腳跟，他急需得到外界的支持和幫助。

何長工的尋找之旅，漫長而又曲折。他輾轉到長沙，向湖南省委匯報工作後，便轉赴武漢，搞到一筆款項後，便乘英國的輪船到達香港，又轉赴廣州。在廣州，打聽不到任何南昌起義隊伍的消息，何長工便又乘火車到粵北的韶關。正在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何長工得到了朱德的消

息。何長工說：「我到犁頭舖滯留一天，毫無消息，第二天，我到韶關的一個澡塘洗澡，正好范石生部的一些軍官在那裏議論。他們很隨便，對我一點也沒有戒意。一個說：『那個王楷，原來名叫朱玉楷，跟我們軍長是同學。』另一個說：『同學歸同學，朱部暴徒很多，我們還是要注意防範才是』。聽了之後我暗暗高興，沒等洗完澡便趕回住處打點行裝上路了。」

「當時，廣東的華僑很多，一般軍隊對這些人不大敢過問和盤查。因爲這些人的身世各異，有的還大有來頭。我發現了這個竅門，也就將計就計，我穿着呢子大衣，黃皮靴，裝成個財大氣粗的官家子弟。結果，順利的通過了范石生部隊的崗哨和警戒，沒有遇到甚麼檢查。可是，當快要到朱德的防區時，盤查十分嚴格。我沒有走多遠就被捆綁起來，解往朱德司令部。」

一進門，便迎面碰上曾在洞庭湖一帶與何長工一起做過秘密工作的蔡協民。何長工喊道：「我是何長工！」正當兩人各述別情的時候，朱德走進來了：

「他的頭髮和胡鬚較長，但是兩眼有神。穿着一身灰軍裝，打着一副綁腿，精神抖擻，有說有笑」。何長工雖然在法國就知道朱德的名字，但見到朱德本人，這還是平生的第一次。

朱德向何長工詢問了井岡山的詳細情況，又詢問了領導人的情況，何長工都一一做了回答。朱德聽後十分高興，又從軍事的角度，與何長工一起就能否屯兵、打仗等問題，認眞地研究井岡山的地勢來。何長工在回憶錄中寫道：

朱德同志詳細瞭解了井岡山區的地形、群衆、物產等情況後，十分滿意，懷着羡慕和贊許之情說：「我們跑來跑去就是要找一個落腳的地方。我們已經派毛澤覃同志去找毛潤

之了，如果不發生意外，估計已經到了。」

這時我看到，朱德同志一邊同我談話，一邊有很多人來向他匯報請示工作，非常繁忙。我說：「看來這裏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啊！」朱德同志會心的笑了笑說：「是啊！我們要搞一個大暴動，把隊伍拉大一點，把根據地搞起來。因爲事情忙，我就不多陪了，有甚麼事情和陳毅同志講。」

臨分手前，朱德還對何長工說：「我們這兩支部隊要經常聯繫，將來部隊力量要集中」。

朱德說的「把根據地搞起來」，當然就不是指井岡山，因爲井岡山已經是「搞起來」了的。朱德講的「大暴動」，就是指湘南暴動，而根據地指的就是湘南根據地。朱德也想爲自己的部隊建立一塊可以落腳的根據地。

這一次，朱德向何長工傳達的訊息是很清晰的。何長工寫道：「離開犁鋪頭時已是陰曆十一月多了。深夜，船在凜冽的寒風中向前移動，我的心裏如同燃燒着一團火。我看到南昌起義的部隊在朱德同志領導下，不但沒有垮，而且轉戰出來，開始了更積極的武裝鬥爭，感到極大的鼓舞和欣慰。」

回到井岡山，何長工向毛澤東轉達了朱德的意向，不久，便被派到王佐的部隊任黨代表去了。

毛澤東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很想將朱德這股南昌起義的部隊收歸自己麾下，以壯大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擔心井岡山這塊巴掌大的窮地方，能否養活這麼多的軍隊，擔心朱德他們的到來影響到自己的生存。經過幾番思量之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議

朱、毛兩部建立聯合領導，改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在信中提出：部隊行動，由朱德、陳毅、張子清、宛希先、余賁民、袁文才、毛澤東七人組成前委，請批準。如係駐軍，則應組織湘贛特別委員會，指揮軍事及交界八縣黨務、農村暴動等，人員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劉眞，請呈報中央批准。又朱雲卿應加入前委和特委。

毛澤東算計得很淸楚，朱、毛兩部聯合後，在上述的前委成員中，以毛澤東自己在黨內的資歷最老，地位也最高，前委書記一職，是非己莫屬。這樣，黨政大權，對軍隊的控制權，仍可掌握在自己手中，毛澤東所要求的聯合，就是在這種條件上的聯合。

大動蕩的一九二七年過去了。當一九二八年來臨時，形勢又發生了新的變化。而毛澤東的想法，也隨之改變了。

二、毛澤東不歡迎朱德上井岡山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中共郴州縣委在郴州召開群衆大會，貫徹湖南省委提出的燒毀政策。原來中共湖南省委實行左傾盲動主義，於三月初派人到湘南特委及朱德的司令部傳達省委的決定，要把沿湘、粵大道兩側各五里的村莊房屋全部燒毀，以免國民黨軍隊從廣東沿大道進佔湘南。朱德沒有執行這一政策，但湘南特委卻大力執行這一政策。在這次郴州的群衆大會上，廣大群衆對湖南省委的這一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鼓噪騷動，加上有壞人從中挑撥，利用群衆的不滿情緒，中共郴州縣委書記夏明震等領導幹部和一些共產黨員當場被殺，釀成一場重大的政治血案。

朱德聞訊後，派陳毅率領一個營趕到郴州，平息了這次動亂，並糾正了當地黨組織的一些極左的錯誤作法，舒緩當地人民群衆的不滿情緒。

在湘南暴動的過程中，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一直實行左傾的盲動主義政策。湖南特委書記陳祐魁認爲：「中國文化落後的農民，要他們出來革命，只有一個赤色恐怖去刺激他們，使他們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省委特派員何舍鵝提出「燒燒燒，殺殺殺，幹幹幹」。他們要求到處燒殺，嚴重地挫傷了群衆的積極性，引起廣大群衆的不滿和反抗。

而當地的土豪劣紳也乘機煽動，說：「鳥都有個窩。我們的房子燒了，家都沒有了，那共產黨有甚麼好處？」

當地黨組織的這些極左政策，嚴重地脫離了群衆，逐漸失去人民群衆的支持，使起義的隊部難於立足，這是迫使朱德要撤出湘南的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在一九二八年，國民黨的漢寧戰爭結束。爲了撲滅湘南暴動的熊熊烈火，國民黨湘粵軍閥根據南京中央政府的電令，糾集了七個師的兵力，從湖南的衡陽和廣東的樂昌兩個方向南北夾擊，進逼湘南。而湘南的地形較爲平坦，交通便利，便於敵軍調動兵力，而不利起義軍的活動。

在敵軍的力量佔了絕對的優勢，而群衆基礎又失去的情況下，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決定上井岡山。這時是四月上旬。

在湘南實行燒殺政策的同時，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魯於三月上旬到達井岡山，貫徹執行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決議，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給湖南省委的指示，宣佈中央給毛澤東予開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撤消省委委員的處分。並取消前委，成立師委，任命何挺穎爲師委書記，毛

澤東為師長，率領工農革命軍離開井岡山根據地，去支援湘南暴動。在傳達時，周魯誤傳為毛澤東被『開除黨籍』。毛澤東在後來說：「『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要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你說開除黨籍對於一個人是高興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

這一切，對毛澤東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

對於南下支援湘南暴動，毛澤東的態度並不積極。延宕至三月中旬才離開井岡山後，剛走不遠，便在井岡山附近的　縣中村集中，不再前進。為了應付了事，毛澤東一方面派毛澤覃率領特務連往湘南與朱德部聯絡，另方面自己卻率領大部隊在湘東一帶活動。一場「支援湘南暴動」的大行動，變成了「與朱德部聯絡」。

在湘南特委的命令下，毛澤東儘管不願意，但也不得不離開井岡山。但這時候他既不願意去湘南，也不願意與朱德會合。

從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內，毛澤東一直駐守在中村，在其周圍活動，又是幫助中村建立區工農兵政府、鄉的工農政權，又幫助　縣成立赤衛大隊，改組縣委，在中村召開有三千餘人參加的軍民訴苦大會，開展打土豪，平分土地等等，但就是不再向湘南再前進一步。

四月上旬，朱德率領工農革命軍兵分兩路，一路由他領導撤出耒陽，攻佔安仁、茶陵；另一路由陳毅率領，由郴州撤向資興。中共湘南特委以及各地的農民赤衛軍等，跟隨朱德和陳毅撤退。

四月二十日，朱德與陳毅在　縣的沔渡會合。

同一日，湘軍第八軍一個團尾追湘南起義軍，毛澤東與張子清率領第一團，在　縣城西利用有利地形擊退敵人，完成阻擊任務，就在這一天，毛澤東與朱德在　縣十都第一次面晤。但由於軍情緊急，他們很快又分開，各自率領自己的隊伍向井岡山方面轉移。

四月二十四日，朱德與陳毅率領湘南起義的一部分直屬部隊從沔流到達寧岡礱市。而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團也回到礱市。南昌起義與秋收起義的兩支部隊，以及朱毛，在這一天於礱市正式會師。

朱德部上井岡山，是中共湘南特委的決定；朱、毛會師後，根據中共湘南特委的決定，兩部合編爲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下轄兩個師一個教導大隊：第十師師長由朱德兼任，宛希先爲黨代表，第十一師師長由毛澤東兼任，何挺穎爲黨代表，教導大隊由陳毅任大隊長。全軍先編九個團，後改編爲六個團：

第二十八團，是原南昌起義的餘部，團長由參謀長王爾琢兼任，黨代表何長工；

第二十九團，由宜章農民起義軍組成，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

第三十一團是原秋收起義的餘部，團長伍中豪，黨代表何挺穎；

第三十二團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隊；

第三十和三十三團是湘南郴州、耒陽、永興、資興等地的農民起義軍。

全軍共有一萬二千多人，槍二千餘支。

對於毛澤東與朱德的會合，中共黨史有一套官式的，標準的說法，那是以何長工的回憶錄爲主，雜以其他人的回憶文章所組成：

毛澤東和朱德同志的會見地點是在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毛澤東同志一到礱市，得知朱德、陳毅住在龍江書院，顧不上一路征塵，立即帶領幹部向龍江書院走去。朱德同志聽説毛澤東同志來了，趕忙與陳毅、王爾琢同志等主要領導幹部出門迎接。我們遠遠看見他們，就報告毛澤東同志説：「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邊是陳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後的那位是王爾琢同志。」毛澤東同志點點頭，微笑着向他們招手。

快走近書院時，朱德同志搶先幾步迎上去，毛澤東同志也加快了腳步，早早把手伸出來。不一會，他們的兩只有力的大手，就緊緊地握在一起了，使勁地摇着對方的手臂，是那麽熱烈，又是那麽深情。毛澤東同朱德同志這次歷史性的會見，是我黨我軍歷史上光輝的一頁。從此，毛澤東和朱德的名字便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何長工回憶錄）

會師後，兩軍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在龍江書院召開了兩支部隊的連以上幹部會議，通過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成立的各項決定與人事安排。接着，召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四軍軍委，毛澤東任書記（五月二十日以後，改由陳毅任軍委書記）。四軍軍委由二十三人組成，委員有毛澤東、朱德、陳毅等。

「五四」運動紀念日，在礱市隆重召開軍民聯歡會，慶祝兩軍會師和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會場就設在龍江西岸的河灘上，用幾十只禾桶和門板搭起的主席台，上面用竹竿和席子搭起一個涼篷。會場中央整齊地坐着部隊，四周是來自寧岡等地的群衆。當毛澤東、朱德、陳毅、王爾琢和黨政軍各方面的代表登上主席台，陳毅宣佈了四軍軍委決定，兩軍會合後改編爲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

接着由朱德講話。他說：「我們黨領導的兩支革命武裝的會合，意味着中國革命的新起點。參加這次勝利會師大會的同志，一定都很高興。可是，敵人卻在那裏難過。那麽，就讓敵人難過去吧。我們不能照顧他們的情緒，我們將來還要徹底消滅他們呢！這次勝利會師，我們的力量大了，又有井岡山作爲根據地，我們就可以不斷地打擊敵人，不斷地發展革命。」他希望兩支部隊會師後，加強團結，提高戰鬥力，並向群衆保證：紅軍一定保衛紅色根據地，保衛群衆的利益。他的話音剛落，就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毛澤東講話時，指出這次會師是有歷史意義的。同時分析了會師後的光明前途。他說，現在我們部隊雖然在數量上、裝備上不如敵人，但我們有革命的思想，有群衆的支持，不怕打不敗敵人。我們要善於找敵人的弱點，然後集中兵力，專打他那一部分。等到我們打勝了，就立刻分成幾股躲到敵人背後去跟敵人玩「捉迷藏」的把戲。這樣，我們就能掌握主動權，把敵人放在我們手心裏玩。毛澤東還在會上宣佈了紅軍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四軍參謀長王爾琢講了搞好軍民關係的問題。各方面的代表也相繼講話，大家都熱烈祝賀兩軍勝利會師和四軍的成立。（見《朱德傳》）

這些官式的，標準的說法，只是問題的表面。在那鑼鼓喧天鞭炮響的背後，卻曾經發生過一場不同尋常的鬥爭。

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紅四軍前委書記、軍委書記的陳毅，於一九二九年九月在上海寫給

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有這樣的鮮爲人知的一段：

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四軍各部會合於江西寧岡，成立了四軍，並有軍委，但黨內不統一，軍隊各自爲政。袁、王（指袁文才、王佐）爲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願意朱部及湘南農軍這樣多人在寧岡，使他目標大惹下大禍，主張四軍到贛南去。毛部頗有自了之心，看見朱部及農軍那樣混亂，不願意合伙，主張他們自己到平、瀏（回北游擊），朱部及農軍（向南游擊），到贛南，軍委則隨朱部出發。朱部及農軍尚一致主張到贛南，因爲寧岡沒有飯吃，實在不滿意袁、王及毛部的態度。軍委明知這種分家政策是不對，因爲四軍在此時初初成立，應該整頓，到平瀏及贛南皆屬單獨的軍事行動，尤其是軍隊未整訓到處要引起許多壞的影響，更應該顧慮，若說經濟問題困難，事實上四軍在寧岡一年多亦終有辦法。當時的分南分北的政策大部建築在各部的私利上，尤以袁、王的自私，毛部的自了不管，引起朱部及農軍不滿。這個政策決定後並未實行，因爲一、二日後，朱部二十八團即擊潰江西敵人兩團，佔領了永新，經濟問題得了解決，大家又合伙起來。（毛部係指毛澤東領導的原秋收起義部隊，朱部係指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餘部——作者註）。

以陳毅的身份及品德、爲人，陳毅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報告的上述內容，自不會是撒謊、揑造。毛澤東並不歡迎朱德上井岡山。

毛澤東「不願意合伙」的時間，是在四月二十四日朱毛會合之後，五月七日朱德率二十八團粉碎敵

人的第二次「進剿」，佔領永新縣之前。毛澤東「不願意合伙」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看見朱部及農軍那樣混亂」。那些湘南來的農軍，缺乏訓練，裝備又差，很多是「大刀隊」，「梭槍隊」，戰鬥力自然是很差的；不少的農軍還拖兒帶女，舉家從軍。其「混亂」可想而知。可是這些農軍及其他們的眷屬，照樣每天要吃飯穿衣。毛澤東視他們是一種沒有用處的負累，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因此不願與之「合伙」。

其二是經濟問題。井岡山的經濟條件較差，這麼多人上山，影響到毛澤東的生存。於是「不願意合伙」。

性子直爽的陳毅，直斥「當時的分南分北的政策大部建築在各部的私利上」，這點是顯而易見的。「尤以袁、王的自私，毛部的自了不管，引起朱部及農軍不滿」。想當年梁山水泊的晁蓋、宋江，尙有雅量招納天下各路英雄，湊成一百零八條好漢。而共產黨人的毛澤東，竟然不願意與自己的同志朱德「合伙」，這眞是所思匪夷的事。

在以毛澤東爲書記的軍委會議上，這項「分南分北」的政策無疑是決定了，通過了的。之所以沒有執行，是在「一、二日後朱部二十八團即擊潰江西敵人兩個團，佔領了永新」。於是，第一，二十八團顯示出強大的戰鬥力，令毛澤東感到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對自己很有用處；第二，是永新縣城是個較大、較富庶的地方，打開永新，糧餉、物資都有了，「經濟問題得了解決，大家又合伙起來。」

雖然「又合起來」，但毛澤東在不久後仍拿那些「白吃飯」的農軍開刀，遣送他們下山，致使這批數量達到八、九千之多的革命力量被敵人消滅。本書稍後再詳細介紹。

這項「建築在各部私利上」的分家政策，決定後一、二日便取消了，「大家又合伙起來」。那麼

「又合伙起來」時，「各部的私利」是否在這一、二日內就消失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朱毛」的「合伙」，有多大的程度是建築在革命的共同目標上，有多大程度是建築在「私利」上，人們不難想象得到。

多少年以來，一直被渲染爲「珠璧聯合」、「偉大的會師」的朱毛會合，原來在其背後有着這麼一段鮮爲人知的曲折。從整個歷史長河來看，這段插曲就像一朵小小的浪花。然而，從這朵浪花上，人們可以窺視到毛澤東的內心世界，它向世人展示了毛澤東靈魂的另一面——也許這正是眞實的一面。

這一年，毛澤東是三十五歲，而朱德是四十二歲。

三、井岡山並非理想之革命根據地

井岡山是羅霄山脈的中段。

羅霄山脈地處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四省交界。北自湖北省南部的九宮山，沿着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南至廣東北部的諸廣山，由北向南，延綿八百餘里，形成湖南、江西兩省的天然分界線。

羅霄山脈的北段，地勢不如中段險要，又太靠近長沙、武漢這些中心城市，國民黨的統治勢力較強。南段地勢比較好，但群衆基礎不如中段。而中段的井岡山，周圍二百餘里，橫貫江西的寧岡、永新、蓮花、遂川，與湖南的酃縣、桂東、汝城相毗連，地勢險要，崇山峻嶺，峭壁叢立，森林茂密，進可攻，退可守；而且離大城市較遠，國民黨的統治勢力比較簿弱，群衆基礎又較好，是比較適於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區域。

井岡山地勢險要，地廣人稀。山上有五個大小村莊，村前都有一口水井，故稱大、小五井。其中以大井、小井、茨萍最大，各有幾十戶人家。當時通往井岡山的道路只有三條，其一是由寧岡經黃洋界，上山十五里，到達井岡山山腰的小井；其二是由永新縣經龍溪口、七級嶺而到達小井；其三是由遂川經黃坳到井岡山。這些道路都是崎嶇的山路，亂石嶙峋，路旁多是懸崖峭壁，步行十分艱難。如果憑險據守，很難攻破，即使有重型武器，也發揮不了作用。

在歷史上，明朝武帝年代，朱宸豪在江西南昌叛變，失敗後即逃上井岡山落草。後被王陽明所殲。王氏建功後，刻「不爲」石碑，記載巢匪史實。這個古跡至今還在。近代有朱聾子匪首以此爲基地，打家劫舍，進退自如，官軍無可奈何。由此可見，井岡山自古便是「草寇稱王」的理想之地。

井岡山以及周圍地區，屬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就當時整個中國而言，也是不發達的，落後而貧窮。尤其是井岡山上，「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滿萬擔」；這裏屬高寒地帶，土地貧瘠，物產匱乏，靠着山坡上的梯田，種些農作物，村民們過着十分貧苦的生活。大部分農民缺食少穿，常年靠紅薯、南瓜果腹，是典型的窮鄉僻壤。

井岡山上的村民，自己尚且難以果腹，那有多餘的糧食養活軍隊？因此，袁文才、王佐的部隊多是從周圍的各縣攫取物資供應。然而井岡山周圍各縣，亦非魚米之鄉，養活少量軍隊尚且可以，大批的軍隊，也就供養不起了。毛澤東率領七、八百名秋收起義的部隊到來後，各項物資供應頓時緊張，毛澤東不得不組織部隊攻蓮花，打遂川，籌糧籌款，斷斷續續，勉勉強強地維持着。朱德上井岡山，領來了一萬多人。這麼多的人要吃飯，要發餉，要穿衣，傷病員要醫治，一時間，經濟物資供應，便立即成爲頭號的大問題。尤其是吃飯，一日三餐，一餐也少不得；一萬多人，一個也少不了。朱毛連連叫苦：「一

萬多人，一人一天一斤糧食，一天就要一萬多斤！難乎其繼！」井岡山上缺糧，就要靠周圍地區輸送，山路崎嶇，道路遙遠，僅在這方面每天就要花費大量的人力。

在湘南時，由於周圍地區較爲富庶，容易籌到糧餉。當時朱德的部隊官兵平等，每人每月一律發給十二個銀洋，糧食全部購買，士兵的生活過得很好。十二個銀洋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士兵們每月發餉後，多能送幾個大洋給家人。而一塊銀洋可買一百斤糙米，因此農民們都喜歡參軍。朱德的經費，是由廣東出發入湘時，帶來的一筆范石生發給的現款，經過仁化、宜章縣城時，又籌得一筆，在坪石消滅許克祥的部隊，繳獲更豐，在當地打土豪劣紳時，也不斷有所補充，足以支持部隊五個月的供給。退出湘南，上了井岡山後，官兵多了數倍（包括毛澤東及袁文才、王佐的部隊），存款已將用盡，如何補給，便成爲朱毛會師後的一個嚴重問題。

毛澤東的部隊在井岡山時每人每月發餉三塊銀洋，尙難以爲繼。當聽到朱德部每人每月發十二塊銀洋，毛澤東連連搖頭，說道：「太多了，太多了！」

前委爲糧餉問題專門開了幾次會議，決定全部糧食由沒收富戶存糧補給，每日每人發給五分錢菜金，每月共一元五角；每月每人還發給零用錢二元。另外，規定紅軍勢力所控制的地區，分了田的農民按每年生產收穫糧食總額的百分之十五繳納軍糧；各部隊分散工作打土豪所繳獲的現金及豪紳地主的罰金，一律繳交軍部統籌使用。規定通過後，通令各級黨組織，發動全部黨員發揮帶頭作用，並向廣大士兵進行說服工作。新規定實施後，起初官兵中尙有少部分人認爲待遇一下子減得太多，太菲薄，表示不滿。但經過一段時間後，也就無怨言了。因爲不久之後，每人每月二塊銀洋的零用錢也發不起了，改爲每人每月一元，到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連這一塊錢的薪餉也取消了，謹保留了每人每日五分錢的菜金，

官兵的零用錢便靠「伙食尾子」分配，或三角，或二角，官兵一律平等。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等文章中都有所敘述。

糧餉難以爲繼的原因，是井岡山周圍地區本來就不富庶，那麼幾個縣，地域狹小。共產黨和國民黨來回拉鋸作戰，你來了籌一次糧款，我來了又籌一次糧款，各個縣就像用篦子梳過似的，一乾二淨。加上戰火連連，當地居民，尤其是富戶人家，大都外逃。因此，不久之後，井岡山及其周圍地區無糧、無款、無丁。毛澤東曾嘆息道：井岡山地區已無餉可籌。

井岡山地區物資供應缺乏，還由於國民黨的經濟封鎖。由於井岡山區域不大，地勢又特殊，甚易被敵人封鎖。不但糧食缺乏，食鹽、食油、布匹、藥品等日用必需品，也極度缺乏，價格也自然十分昂貴。永新、寧岡等縣幾乎完全無貨，有錢也買不到。在這種情況下，紅軍物資供應艱難困苦，其程度的嚴重，持續時間之長久，在整個中國革命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當時流傳着兩首歌謠：

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乾稻草來軟又黃，金絲被兒蓋身上，不怕北風和大雪，暖暖和和入夢鄉。

這就是當時紅軍生活的眞實寫照。沒鹽沒油的南瓜湯，成了紅軍將士日常的食糧。冬天就更難挨，沒有棉花沒有布，下雪了，官兵們還只穿着兩層破舊的單衣，赤着腳，沒有棉衣，沒有鞋子，也沒有被蓋。傷病員就更苦，缺醫少藥，很難痊愈。紅軍將領之一、毛澤東在軍事方面的主要助手張子清，在四

月的鄢縣之戰中受了槍傷，一直得不到適當的醫治，長期不能痊愈。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進軍贛南時，他因爲行動不便，被留在井岡山堅持鬥爭。不久，佔領井岡山的敵人撤退了，而他的傷勢卻更加沉重了。到了四月，這位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便不幸病逝。高級幹部尚且如此，普通士兵可想而知。

井岡山的局限性，還表現在軍事方面，由於它的區域狹小，腹地又是荒無人烟的崇山峻嶺、深山老林，不適於部隊行軍作戰。因此，它缺乏廣闊的回旋餘地，沒有造成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條件。國民黨如派出重兵，很容易將井岡山團團圍住，紅四軍就只好退守上井岡山，在敵人的圍困中束手待斃。這是兵家的大忌。

井岡山既有其地勢之利，也有種種的缺陷和局限性。這些局限性，給紅四軍帶來了巨大的、難以克服的困難，嚴重地威脅到紅軍力量的生存，成爲革命形勢發展的重大障礙。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寫的《中國紅色政權爲甚麼存在？》一文中曾說道：

「在白色勢力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一年以來，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爲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群衆和紅軍士兵群衆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眞是到了極度。紅軍一方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

井岡山適合於小股的武裝力量的暫避和藏匿，但卻不適合作爲大規模發展的革命根據地。如何認識和對待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成了朱毛分岐和鬥爭的基本原因及起點。

四、毛林相遇在井岡

朱毛的會合，附帶了毛澤東與林彪的會合。

關於毛澤東與林彪相遇的情景，有兩個版本。其一是：

毛澤東與朱德、陳毅等在礱市會師後，朱、陳領着毛澤東巡視自己的部隊。在路邊，毛澤東見到一個連隊正坐在草地上休息，一個娃娃模樣的軍人，站在那裏給部隊講話：這個土匪，那個軍閥，只要有槍，就有塊天下。我們紅軍也有槍，紅軍也能坐天下！

毛澤東站在那裏聽了一會兒，問道：這個人是誰？陳毅回答：他叫林彪，是個連長。

毛澤東說：連長？連長是領兵打仗的嘛。

毛澤東的意思是：連長是帶兵打仗的，但這個連長的講話卻那麼富於哲理性，具有相當高深的政治思想水平。毛澤東開始注意林彪。

第二天，毛澤東找林彪談話，讓林彪給井岡山的紅軍做報告，題目就叫做《紅軍能夠坐天下》。

另一個版本是：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這一天陽光燦爛，天氣晴朗。

林彪吃完早飯，二十八團團部通訊員匆忙趕來通知：毛委員清晨已從寧岡出發，特地到茅坪來迎接部隊，團長命令你們作好迎接毛委員的準備。

回到住地，林彪找出一套乾淨的半舊軍裝換上，然後向本連通訊員說：通知部隊集合，有重要事情

宣佈。

林彪的連隊迅速在草地上集合好了。林彪走到隊列前面，說道：

「同志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剛才團部派人來通知，毛委員馬上要來看我們，並接我們到寧岡與他的部隊會師！」

隊列中響起了掌聲和歡呼聲。

林彪揮揮手，戰士們靜了下來。林彪繼續說道：

「毛委員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我們紅軍的重要領導人。我們即將要去的井岡山根據地，是他親手創建的。為了迎接毛委員，請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帽也要整一整，使毛委員對我們的連隊有個好印象。」

林彪講完話，戰士們立即行動起來。

中午時分，毛澤東來到了茅坪。

在陳毅等人的陪同下，毛澤東來到了林彪的連隊面前。陳毅介紹說：

「這就是指揮部隊在敖山廟和耒陽城打了勝仗的林彪連長。」

毛澤東緊握着林彪的手，說道：「你這麼年輕，又敢打巧打，很不錯啊！」

毛澤東從隊伍的這頭走到那頭，又從那頭走到這頭，看到站得整整齊齊的隊伍，感到很滿意，稱贊這個連隊人員整齊，訓練不錯。

林彪趁機請毛澤東給戰士們講話，毛澤東說：

同志們，你們今天到井岡山來，是很不容易的，大家辛苦了！你們是一支「鐵軍」，是百戰百勝的

隊伍！你們參加了北伐，從南打到北，又參加了南昌起義。你們在會昌、敖山廟、耒陽城的仗打得很好，爲革命立了功，現在來到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希望再立新功！……。

毛澤東講完話，便單獨與林彪談了一陣。當毛澤東得知林彪是林育南、林育英的堂弟，在他肩上輕輕拍了兩下，笑着說道：好幾年前，我就認識了你那兩堂兄，他們很不錯啊！

這次見面，林彪給毛澤東留下良好的印象。毛澤東認爲林彪年輕有爲，出身好，又是黃埔軍校畢業，又會帶兵打仗，是個可造之材，這是毛澤東與林彪建立親密關係的開端。

毛澤東在一天之內，遇到了兩位對自己的一生發生巨大影響的人。

忠誠寬厚的朱德，像是專門爲毛澤東準備的一座登上權力頂峯的階梯。朱德的到來，爲毛澤東帶來了他所欠缺的，因而也是他極之需要的一切。毛澤東因此得以壯大、成長。等到毛澤東壯大到可以問鼎最高權力時，朱德的歷史使命便結束了。當毛澤東正式登上權力中心的寶座時，朱德便逐漸淡出歷史舞台。「朱毛」僅是毛澤東未取得成功之前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短暫的現象；毛澤東崛起後，「朱毛」便不復存在了。

朱德的角色，有點像火柴。他用自己的光，點燃了另一個人的亮光。等到那一個人熊熊燃燒時，他自己便功成身退了。

朱毛會合的另一個最大得益者，是林彪。能夠得以上井岡山，對林彪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機遇。在井岡山上，林彪得以與毛澤東相遇、結盟，從而踏上了一條晉升的捷徑和坦途。在「朱毛紅軍」這個廣闊的天地裏，在毛澤東的刻意栽培下，林彪的軍事才能得到淋灕盡致的發揮，林彪也崛起

了。憑借着這個機遇，加上自己那特殊的個性與才能，林彪脫穎而出，成爲與朱德一樣的對中國現代史產生深遠影響的歷史人物。

在歷史的巧妙的安排下，當「朱毛」逐漸消褪時，「毛林」出現了，並且在六十年代達到「最親密戰友」的頂峯。然而，與「朱毛」一樣，「毛林」也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短暫的現象，當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那一天對毛澤東施予沉重而致命的一擊後，林彪也「功成身退」了，「毛林」便也宣告結束，而毛澤東與他的時代的末日，也隨之到來了。

在井岡山上，「毛林」會合的歷史意義，並不亞於「朱毛」會合。朱德爲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毛澤東時代的到來，投下了第一塊最重要的基石。半個世紀之後，這個曾經是嶄新的毛澤東時代變得過時了，它成爲束縛中國歷史發展的桎梏。而林彪便是拆除毛澤東時代的基石，從而爲中國迎來另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的人物。

如果說，朱德是毛澤東的崛起以及毛澤東時代到來的奠基人，那麼，林彪的到來，是爲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的終結，準備了一個敲響喪鐘的掘墓人。

歷史在井岡山上同時爲毛澤東安排下了崛起和沒落之路。

第二章　朱毛鬥爭

一、朱毛分歧

一九三六年，在陝北的窰洞裏，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了毛澤東和朱德。他是這樣描繪毛澤東的：

「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着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眞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談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爲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眞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徵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

史洙特萊以一個女人兼記者所特有的敏銳，對毛澤東有如下的描繪：「朱德爲人所愛，毛澤東爲人所敬。少數和他很熟的人喜愛他，但是他的精神內向，使他落落寡合」。「我的印象是，他的靈魂裏有一扇從不向任何人敞開的門。」

斯諾筆下的朱德是這樣的：

「朱德貌不驚人——一個沉默謙虛、說話輕聲、有點飽經滄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藹』這是大家常用的話），身材不高，但很結實，胳膊和雙腿都象鐵打的一樣」。「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樣，同甘共苦……他喜歡在營地裏轉，同弟兄們坐在一起，講故事，同他們一起打球」。「我認爲他的基本特點就是天性極端溫和。」

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是這樣描繪朱德的：

「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富有同情心，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給人一種對全人類都那麼仁慈和友好的感覺」，「最主要的是，朱德不盲目地反對西方，而且思想開放，胸襟開闊，忠誠老實，公平厚道」。

毛澤東與朱德，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

早在朱德一行還未上井岡山之前，中共湘南黨組織的領導幹部就向他們提出了警告：「毛澤東是個陰險殘忍的人物，湖南黨的中上層同志對他素無好感。但朱德軍長是坦白誠實的人，很容易受毛愚弄，陳毅同志爲人太爽直，無防人之心，今後你們合作，我眞的替你們擔心，希望你們多多注意。」

中共湘南特委書記夏正民也說：「毛澤東的聰明才智，倒是不亞於三國時代的魏武帝曹操，但他是唯我主義，且缺乏人情，卻沒有曹操能知人善用及有容人之量的襟懷。」

同時，陳毅也寫信給龔楚，詳述了何挺穎轉告的毛澤東的近況，並鄭重地說毛澤東是工於心計的人，今後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

儘管打了這麼多的思想預防針，可是，從會合的第一天起，朱毛之間便產生分歧和矛盾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毛澤東不願意合伙，「頗有自了之心」，提出向南向北的分家政策外，如何對待數量衆多的湘南農民自衛軍，朱毛之間也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朱德帶上井岡山的一萬多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湘南的農民自衛軍，以及中共湘南各縣的黨政幹部及其家屬，自衛軍中也有舉家隨軍的。男女老幼，又沒有槍支武器，上到井岡山，不能作戰，「白吃米飯」。對此，毛澤東很不滿意。據龔楚回憶，當毛澤東聽到朱德軍中有很多眷屬，「他聽了，皺皺眉頭，站起來，背着雙手，踱來踱去，一聲不出。這正是他考慮事情及苦悶時的神態。」

在朱德方面，這些農軍不少是在湘南暴動時，自己親手發動和組織起來的，每支農民自衛軍的成立和壯大，都凝結着朱德、陳毅等人的辛勞和心血。而且，大家都並肩戰鬥過，結下了戰鬥的友情。這些農民之所以拋離家園，跟隨工農革命軍一起上井岡山，正是相信革命，投身革命的表現。他們是革命的力量。朱德既然將他們帶上井岡山，自然是當作革命的同志，同甘苦，共命運，對他們負責到底。

蕭克將軍在回憶錄中說：

當時八千農軍湧上井岡山，既增強了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力量，但也給邊界特委和四軍軍委帶來了很大困難。井岡山區人口稀少，耕地不多，又處高寒區，經濟落後。衆多兵馬齊集山上和山下小塊平原，吃飯、穿衣等等，都成爲大問題。加上湘南農軍上山時，爲「跑反」而倉促成行，有的舉家攜口，拖兒帶女，不像是從軍打仗，倒像是遷居。這些剛剛組織起來的農軍，軍容不整，紀律差，引起邊界特委和四軍軍委的不滿。軍委書記毛澤東在給中央的信中說：「豈有此理的湘南縣委和縣政府，帶了一大批農軍一起跑

來」。

於是，毛澤東不願收留這批農軍。在毛澤東的堅持下，以毛澤東爲書記的軍委終於決定，將這些農軍遣送下山，讓他們回湘南。第一次遣送行動在五月中旬，共二千多人，主要是湘南各縣的黨政幹部及他們的家屬；第二批在五月底，是由湘南農民自衛軍組成的第三十、三十三團，共五、六千人。二批共八千人。這些沒有武器，組織訓練又差的農軍，離開井岡山後就被敵人消滅了。

蕭克將軍說：

這次返回湘南的是三十、三十三團，約五六千人。臨走時，上級令我率二十九團二營七連去護送。我們從沔渡出發，送了七八十里，到湖南酃縣水口才分手。當時我看到這個十分之九爲梭標的隊伍西去，心情也沉重，既有對戰友的惜別之情，也有對他們的前途的憂心。不幸得很，這支隊伍返回湘南後就失敗了。

蕭克將軍還說：

不管怎麼樣說，這是一支不容忽視的革命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初期，當革命力量還處於「星星之火」的時候，一兵一卒對於革命都是寶貴的，更何況八千子弟兵。可惜，當時的特委、軍委（這兩個委的書記都是毛澤東——筆者注）沒有重

視。我感到軍委對他們處置有些失當。經濟上有困難是事實，但也不是沒有辦法可想。比如當時井岡山周圍的寧岡、永新、遂川等縣接近山區的地主很多跑了，有很多耕地，可以讓這些農軍去耕田。又比如，如果對這些農軍加以整理，有計劃地派往蘇區附近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開展工作，也可以補充一部分到主力團，我記得二次打永新後，二十八團就感到槍多人少，應該說，軍委、特委在主觀上沒有想更多的辦法，沒有從當時形勢作長遠考慮。後來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討論這一問題時，也認識到：「當時軍委太無準備、計劃，不估量湘南敵情，簡單的因經濟困難，沒有整頓，這是不對的」。（見《朱毛紅軍側記》一二二頁）

這種將參加了革命隊伍的人遣出門外，在中共革命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次。當時，湘南的國民黨軍隊勢力十分強大，否則朱德也不會率部撤出來，上井岡山。對此，毛澤東是十分清楚的。兩個月之後，當朱德要率領二十八、二十九團去湘南時，毛澤東便是以「湘南敵人力量強大，不宜去」為理由來勸阻的。二十八、二十九團這樣的主力部隊都「不宜去」的地方，卻將「十分之九是梭標隊」的三十、三十三團遣去，這無異是送羊入虎口。這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是因為二十八、二十九團有戰鬥能力，能作戰，能守山，而三十、三十三團則是「白吃米飯」的無用之物，因而不惜推出門外讓其「自了」。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不像是共產黨人的作風。中共向來強調階級友愛，同甘苦，共命運，這正是她強大的原因所在。在中共的革命史上，只有像紅軍長征過草地時，因嚴重飢餓，官兵割皮帶一起煮吃，共渡難關的情景，而從來沒有因為吃飯問題而在革命隊伍中分家拆伙的。毛澤東究竟以甚麼利益為宗旨，實在令

人猜疑。

毛澤東對八千湘南農軍採取如此輕率而不負責任的態度，是他在早期所犯的嚴重錯誤之一。兩個月之後，二十八、二十九團因頻繁的作戰，「其精英損失了三分之一」，而竟然沒有兵員補充。這是迫使朱德想脫離井岡山的原因之一。

井岡山根據地的局限性，嚴重地阻礙了革命的發展，這已是十分明顯的事實了。經濟供給的困難，沒飯吃，沒衣穿，傷病不能醫治等等，極大地影響了紅四軍官兵的軍心士氣，造成人心不穩，不想留在井岡山。這是引發後來的「八月失敗」的潛在的根本原因。

日夜與軍隊、士兵生活在一起的朱德，淸楚地了解到士兵們的困苦和憂慮。與士兵同甘苦的朱德，感到壓力十分沉重。朱德多次提出，井岡山周圍地區已無糧餉可籌，無兵員補充，爲了解決給養問題，需要作遠距離的游擊，或另闢新的根據地。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創建的，這是他的政治資本，也是他得以在紅四軍佔有領導地位的基礎，毛澤東自然不想放棄它，也不允許任何人輕視它。同時，毛澤東也知道，在井岡山周圍，國民黨的大軍虎視眈眈地注視着這塊革命根據地。一旦朱德率領二十八、二十九團下山遠去，國民黨軍隊就會乘虛而入。屆時，自己率領三十一、三十二團，根本不能抗擊敵人的進攻，井岡山根據地肯定會喪失。因此，毛澤東既不願意放棄井岡山，也不願意讓朱德離開井岡山。毛澤東要留下朱德幫他守山。

因此，毛澤東主張固守井岡山，以井岡山爲中心，波浪式地向外擴展。在紅四軍的戰鬥策略上，他不允許紅軍主力遠離井岡山，作大範圍的游擊，而只可以囿於井岡山地區各縣活動。

在這裏，毛澤東認爲革命根據地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而武裝力量的發展則是第二位的，後者要爲

前者服務，受前者的制約和決定。

朱德不是不想要革命根據地。轉戰贛南期間那種無後方依托，無根據地支持的痛苦滋味，朱德已有深刻的體會。但與革命根據地相比，朱德認爲革命武裝力量的發展更爲重要，根據地是爲武裝力量服務的，不能因爲固守某一地域，而妨礙或不要武裝力量的發展。而且，朱德對根據地的理解是廣義的，不是固定在某一狹小的區域，因此，他主張作大範圍的游擊。

毛澤東與朱德在根據地問題上的分歧，不但包含了對革命根據地的認識和紅軍應採取的策略，而且，在問題的背後，體現了兩人對革命發展的思想，是積極主動，還是右傾保守的鬥爭。

一九二九年，陳毅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時說：

> 在五月至七月邊界割據日益擴大，敵人進攻日益劇烈，紅軍的精英至少有三分之一損失，這個時候黨內有兩種主張是對立的。
>
> 第一派（指毛澤東）主張繼續在邊界鬥爭，邊界的割據是可以擴大的，紅軍只有在這割據裏可以保存，離開邊界就有被消滅的危險，尤其是在七月間谷子黃的時候，紅軍爲使農民割禾不不能他去。
>
> 第二派（指朱德）主張，敵人進攻是沒有止境的，紅軍屢次作戰殺人三千自損八百，此時邊界割據用紅軍去打出來，結果紅軍必爲邊界而趨於消滅，紅軍消滅了，邊界亦同歸於盡。所以紅軍應該脫離邊界，到別處去游擊。
>
> 第一派在軍事行動上主張推進不脫離根據地，第二派在軍事行動上主張不要根據地，

流動的辦法（按：陳毅在此是說不要某一塊固定的區域）。

第一派主張紅軍應該爲邊界割據而奮鬥，第二派主張紅軍應該是游擊的，不能爲某一地域死守。

朱毛關於根據地問題的分歧與鬥爭，是井岡山上所發生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鬥爭內容之一。這也是土地革命初期最重要的理論課題之一。這一鬥爭不僅關係紅四軍的命運，也關係到整個革命的命運。

朱毛的另一個分歧，是爭奪對紅四軍的領導權。

毛澤東是個對權力具有很大的野心和強烈慾望的人。朱毛會合後，朱部人多而毛部人少，朱部強而毛部弱。如何掌握紅四軍的領導權，如何能夠控制紅四軍，成爲毛澤東最關注的問題。

早在朱毛會合之前，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便以「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指揮地方的黨組織。他所到之處，或者越俎代疱，包辦代替，或者發號施令，越權干涉，而且作風專橫。中共湘南特委和各縣縣委多表示不滿，曾多次上報給中共湖南省委，而湖南省委則轉報中共中央當局，遂於一九二八年三月派特派員周魯上井岡山宣佈取消了前委。

據龔楚在回憶錄中說：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省委派楊開明到寧岡縣建立邊區特委，毛澤東卻把持着他一手組織的永新、寧岡縣縣委及鄢縣、遂川之地方黨組織，不與楊開明合作。致使楊開明無法開展工作，迫得跑回湖南省委。毛澤東隨即自組邊區特委，自任爲書記。後來爲了數

衍中共湖南省委，才由楊開明代理特委書記。但毛澤東仍在幕後操縱，諸事均按毛澤東的意見辦。於是中共湖南省委就罵毛澤東爲「新軍閥」，並支持耒陽、郴州赤衛隊脫離毛澤東掌握，只繼續保持與朱德紅軍的聯繫與配合紅軍作戰。

朱毛會合後，毛澤東被任命爲紅四軍黨代表，又被選爲中共紅四軍軍委書記，大權獨攬。許多問題，毛澤東往往獨自決定，朱德和陳毅往往只有接受毛澤東的通知，執行指示的份，而沒有參與研究決策的份。對此，朱德曾向龔楚抱怨說：

> 「毛澤東同志對我們總有點隔膜，凡事都不事先商量，等到立即行動時才通知我，使我連研究和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現在各縣送來的情報都先經過他，真是有點麻煩；本來他個人要獨裁，我沒問題，事情總要有點時間準備才成」。他的表情已表現出對毛極爲不滿。我問他：陳毅同志是軍的黨委書記，毛澤東的聯席會議，他總是有份參加的，難道他沒有對你說嗎？朱德說：「或者他有時也不知道吧！」（見《龔楚回憶錄》）

毛澤東的獨裁攬權，必然引起朱德、陳毅等人的不滿。對毛澤東的一些不正確、不適當的指示，朱、陳等人也加以抵制。爲了維持和鞏固自己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毛澤東提出了「黨管一切」的理論。這是毛澤東的一張王牌。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在軍事上還沒有多少本錢，他率領的兵不多，將也不廣，又缺乏軍事知識，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

事」。那麼，毛澤東憑甚麼當紅四軍的最高統帥，發號施令呢？那就是「黨管一切」。

毛澤東的優勢不在軍事方面，而在黨務方面。在紅四軍中，毛澤東在黨內的資歷最老，地位也最高，在這方面，朱德和陳毅都難以與之匹敵。因此，在紅四軍中，毛澤東代表黨組織，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毛澤東將三灣改編時的黨領導軍隊，發展爲「黨管一切」，黨不但要領導軍隊，指揮軍隊，而且黨要管一切，包辦一切。

「黨領導一切」和「黨管一切」，是兩個貌似相同，但在本質上卻是根本不同的概念。「黨領導一切」，着重在於領導、指導，通過發佈路綫、方針、政策，使「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接受黨的領導，與黨的目標、步伐保持一致。這裏面所體現的，是出於革命整體利益考慮的組織原則。在強調「黨領導一切」的同時，中共又強調反對大包大攬和包辦代替，這方面的思想是很清晰的。而「黨管一切」，重點在個「管」字，管即是權力。口號的提出者所着重的，是「管」的權力。「管一切」即是包攬一切，取代一切，「獨裁」一切。黨組織成爲無所不包，無所不在的事務主義者，這與中共的宗旨是大相徑庭的。

有這麼一張「王牌」在手，每當朱德、陳毅等人對毛澤東的領導表示異議時，「黨管一切」便被抬出來了：「黨管一切」，代表黨的毛澤東就要管一切，不服從毛澤東的領導，就是不服從黨的領導，而與毛澤東爭論，就是「個人與黨爭雄」。於是，朱毛兩人的分歧鬥爭，變成了個人與黨組織之爭。朱毛之爭又多了一層內容和性質。

儘管朱德沒有讀過多少馬列主義的書，理論水平也不高，但他是覺得毛澤東提出的「黨管一切」不妥，有問題。因此，他從一開始就不同意「黨管一切」這種說法。雖然毛澤東的大帽子一頂又一頂地飛

過來，但朱德硬生生地頂住，堅持自己的意見。一時間，朱毛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出現了僵持的局面。

朱毛分歧，還表現在部隊的調動與武器裝備的分配上。

在紅四軍中以南昌起義餘部組成的二十八團和秋收起義餘部組成的三十一團戰鬥力最強。朱毛會合後，毛澤東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權，將朱德部的二十八、二十九團調去第一線，衝鋒陷陣，而自己則與第三十一團一起留在第二線，擔任阻擊、守山等輕便的任務。

例如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發動的第二次反「進剿」，軍委決定的部署是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二十八、二十九團，作爲主力，在遂川方面迎戰國民黨的左路軍第八十一團，相機奪取永新城；而毛澤東、何挺穎、朱雲卿率領第三十一團，在七溪嶺阻擊敵方的右路軍第七十九團。

戰鬥主要發生在朱德這一邊。一連三仗，朱德部打敗了敵人，繳槍幾百支，一舉打開永新城。正向七溪嶺進發的國民黨第七十九團聽到左路軍的第八十一團慘敗的消息，不戰而退，而毛澤東部也就不放一槍便結束了戰鬥。

五月中旬發生的第三次反「進剿」，也是朱德率領二十八團擔任主力，在草市坳設伏打敗國民黨軍第七十九團，第二次打開永新。

在六月中旬的反「第四次進剿」鬥爭中，最慘烈的戰鬥，發生在二十八團和二十九團擔任攻擊任務的老、新七溪嶺戰役。二十八團由於路途較遠，趕到老七溪嶺時敵人已佔據有利地形。在王爾琢的指揮，二十八團發動多次攻擊均未湊效。這時敵軍大部隊趕到，居高臨下，正向第二十八團壓來，在這千

鈞一髮之際，王爾琢抽調第三營營長蕭勁，組織部隊中的班排長和共產黨員擔任「敢死隊」，輪番向敵人發動衝鋒，終於佔領了制高點，奪下百步墩。而蕭勁營長在戰役中壯烈犧牲，還犧牲了不少的班、排長和共產黨員精英。二十八團在是役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敵人在七溪嶺潰敗後，二十八、二十九團在龍源口將敵軍團團圍住，經過異常激烈的搏戰，殲滅了敵人一個團，擊潰兩個團，繳獲槍支四百支，重機槍一挺，取得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以來的最輝煌的勝利。

在這三次「反進剿」戰役中，全部是二十八、二十九團擔任主要的攻擊任務。而三十一團，從未以整個團的兵力去擔任攻擊任務。只是在第二和第三次戰役中，三十一團派出了一營參與朱德部的作戰行動。

親身經歷了這個時期鬥爭的譚震林說：「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部隊大了，我們有力量打下永新。當然，在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佔領了寧岡縣城，那時候不敢走遠，因爲國民黨來上兩個團我們就打不贏。可是朱毛會師後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嶺打了一仗。這樣就把江西的三個師打敗了。」

蕭克將軍也說：「紅四軍在井岡山時期主要是靠朱德指揮。當時四軍官兵特別是參加過南昌起義在三河壩失敗後繼續戰鬥的人，不管遇到甚麼樣的危險，只要朱軍長在，就感到踏實。」

由於毛澤東這種不適當的分配戰鬥任務，在紅四軍中出現了一種不良的現象，即二十八、二十九團看不起三十一團，因爲在這三場大戰役中，三十一團都沒有正式上陣，也沒有甚麼建樹。而三十一團在無奈之中，便反譏二十八、二十九團紀律不好，風氣不好等等。兩部份軍隊之間出現了不團結的現象。

與此同時，正是「殺人三千，自損八百」，在數次大戰中，二十八、二十九團損失了三分之一的精英分子。而且裝備彈藥也消耗很大。朱德、陳毅、王爾琢等，將在戰場上繳獲的彈藥、裝備，首先補充了二十八、二十九團。對此，毛澤東及三十一、三十二團都不滿意，毛澤東時常下令將繳獲的裝備、彈藥抽調給三十一、三十二團。對這種「不勞而獲」的行爲，二十八、二十九團自然不高興，也不買毛澤東的賬。被迫得緊了，便將一些舊槍、次槍送上去交差。於是，毛澤東便指責朱德、陳毅及二十八、二十九團是「本位主義」。

當時，還需要組織地方的農民赤衛隊，需要抽調武器和彈藥給他們。毛澤東也時常下令從二十八、二十九團抽調，而甚少從三十一、三十二團抽調。二十八、二十九團官兵認爲：我們作戰任務這麼重，還抽調我們的，三十一、三十二團少打仗，爲甚麼不抽調他們的？於是，毛澤東又指責朱德、陳毅等人是「單純軍事觀點，不了解組織民衆、武裝民衆的重要性。」

這些磨擦也增加了朱毛的分歧。

從一九二八年四月到七月，這是朱毛分歧的最初階段。龔楚在回憶錄中說：

一、毛澤東是個權力慾極強而又獨裁的人物，凡事都自行決定，而且非常固執，處處都想控制朱德爲他守住井岡山，使朱德不滿；

二、井岡山糧食十分缺乏，紅軍官兵常常以南瓜作菜，蕃薯和米煮食，生活過於艱苦，致官兵多不願意在井岡山附近駐留，影響朱德的決策很大；爲了改善官兵生活，則非急向外發展不可，故對毛澤東要以井岡山爲中心，作波浪式的緩緩向外發展的計劃，不感

興趣；

三、毛澤東常反對湖南省委和中央的指示，朱德認爲毛澤東完全爲了他自己個人着想，有個人主義思想，不惜反對上級，是嚴重的抗命錯誤。朱德不願跟住毛澤東作抗命行爲；

四、紅軍前敵委員會是中央指示成立的，紅軍的一切行動決策及地方黨工作的配合，均應由前敵委員會決定。但毛澤東爲了便利自己獨裁，就自行組織紅軍黨與地方黨的聯席會議，以代替前委，將朱德和我（按：朱、龔與毛澤東是中央指定的三名前委常委）置諸於外，等於不願我們參加決策會議，因此朱德就罵毛澤東獨裁。

二、毛林結盟

在爭奪對紅四軍控制權的鬥爭中，林彪是毛澤東手中的一隻重要的棋子。

毛澤東缺乏軍事方面的資本，要想很好地控制紅四軍，並非易事。二十八團是紅四軍的主力，又是朱德的嫡系部隊，訓練有素，裝備齊全，戰鬥力強。要想控制紅四軍，首先就要控制二十八團。然而，二十八團的團長是紅四軍參謀長王爾琢兼任的。此人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一九二六年七月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二十六團黨代表，後任東路軍先遣隊政治部主任。作戰驍勇，善於指揮。參加南昌起義後，跟隨朱德南征北戰，是朱德的得力助手，能文能武，十分難惹。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採取「打進來、拉過去」的策略。

「打進來」是指委派毛澤東的親信何長工去二十八團任黨代表。朱毛會師後，毛澤東提出爲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將原三十二團王佐部隊的黨代表，調派到二十八團。何長工在王佐部隊任職期間，積極工作，對改造這支土匪的部隊作出了貢獻。這一次，毛澤東是希望何長工能把二十八團「改造」過來，成爲可以無條件地服從毛澤東領導與指揮的部隊。

可是，令毛澤東大失所望的是，何長工到了二十八團後，非但不能把王爾琢及其他官兵「改造」過來，反而他自己卻被王爾琢「改造」過去了。何長工與王爾琢配合無間。在八月南下湘南途中，何長工不但不能控制部隊拒絕南下，而且同意王爾琢及二十八團官兵的意見，不回井岡山，主張到贛南游擊，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何長工這種思想，是與毛澤東背道而馳的，完全失去了毛澤東的原委與初衷。於是，回到井岡山不久，毛澤東於九月初便將何長工調去新從國民黨部隊起義過來的畢占雲、張渭的部隊，讓他改造這批「雙槍兵」去了。

所謂「拉過去」，就是在二十八團中培植自己的勢力和代理人。毛澤東選中的目標就是林彪。由於林彪在轉戰贛南途中曾當過逃兵，朱德和陳毅雖然原諒了他，讓他官復原職，可是在心目中已對他的觀感大打折扣，大概是定下「以觀後效」的宗旨，因此，儘管林彪在湘南起義打耒陽等戰役中有過出色的表現，但朱德、陳毅都沒有給他昇職，到達井岡山時，林彪仍然只是個連長。對此，林彪一直怨恨在心，而且對朱德、陳毅耿耿於懷，終生不忘，直至到六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還拿朱德、陳毅出氣。

朱毛會師後，毛澤東開始注意林彪，時常找他談話。當毛澤東了解到林彪沒有得到升職的苦惱後，毛澤東便利用手中的職權，將二十八團一營營長李奇中調任他職，把林彪提升爲一營營長。對此，林彪

對毛澤東感激涕零，更加促使他背棄朱德、陳毅，而投靠毛澤東了。

井岡山時期，由於地域狹小，毛澤東與林彪見面的機會很多。毛澤東經常在自己的住所接待林彪，與之促膝長談。這段時間，是毛澤東與林彪接觸最多的時期。

年輕的林彪，初涉中共黨內的政治鬥爭，完全像個未啓蒙的小學生，極需要有明師指點和引導，毛澤東便順理成章地成了林彪的「良師益友」。毛澤東老謀深算，精於權術，對中共黨內的政治鬥爭頗有經驗，而這些都是林彪所極之需要的。在井岡山的那些促膝長談中，毛澤東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看法，以及在各種政治鬥爭中應注意的戰略策略，都一一向林彪講授，在林彪那猶如白紙一張的政治觀念上，毛澤東深深地蓋上了自己的烙印。毛澤東是林彪在政治上的啓蒙老師。

一九三六年，當斯諾在陝北保安採訪時，發現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有一種特殊的、微妙的關係：

> 我記得有一次在抗日劇社看戲，休息的時候，群衆一致要求毛澤東和林彪來一次合唱。林彪是紅軍大學的校長，只有二十八歲，他以前是蔣介石參謀部裏一個著名的年輕軍校畢業生。林彪像一個小學生似的漲紅了臉，講了幾句很得體的話，請女共產黨員代替他們唱一支歌，逃脫了「點名表演」一關。

還有一次，斯諾採訪林彪時，毛澤東也在座。交談中，斯諾驚奇地發現毛澤東當着林彪和自己的面脫下了長褲，低着頭專心致志地找虱子，隨隨便便，毫不在乎，沒有一點難爲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諾驚異的目光，顯得十分窘迫。斯諾由此發現，林彪和毛澤東具有一種類似學生與導師的關係。

這種學生與導師的關係，就是在井岡山的那些艱苦的歲月中結下的。

毛澤東把林彪既視爲學生，又當作自己在軍隊（紅四軍）中的代理人而加以刻意栽培。在毛澤東的破格提拔下，林彪在二十三歲就當上紅四軍軍長，二十五歲就當上軍團長。而紅四軍和第一軍團，都是紅軍中最精銳，也是最光榮的部隊。林彪得以扶搖直上，脫穎而出，成爲中共高級將領之一。「林彪是毛澤東的寵兒」。

毛澤東與林彪由井岡山開始的這種親密關係，一直維持了將近半個世紀。在往後的日子裏，當林彪多次在政治上犯錯誤，背棄甚至反對毛澤東時，毛澤東總是像慈父似的，一次又一次地原諒他，頂多只是訓斥道：「你懂得甚麼，你只是個娃娃！」在政治鬥爭中表現得那麼冷酷無情的毛澤東，從未如此善待過第二個反對自己的人。

林彪不僅是毛澤東的學生，也是毛澤東政治上的盟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副統帥》一書記載：

> 有一次，二十八團全體指戰員討論關於建立羅霄山脈根據地的問題，毛主席參加了這個會議。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有人不重視根據地的建設，主張亂竄。林彪同志堅決反對這種「流寇主義」的主張，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的軍隊叫工農紅軍，是徹底爲人民服務的軍隊，我們不但要打仗，還要做群衆工作，進行生產……我們應該堅信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戰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林彪同志對毛主席「工農武裝割據」的光輝思想領會得這樣深刻，闡述得這樣透徹，引起了在場同志的

贊揚。

這段文字難免有誇大其詞之處。可是，在井岡山上的鬥爭之中，林彪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無條件地支持毛澤東，堅決無情地反對朱德，卻是千眞萬確的。

第三章 朱德一生中最大的「污點」：「八月失敗」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當朱德從北京市郊的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裏，就接到中央文革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戚本禹發出的通知，勒令朱德必須去看批判他的大字報。那些大字報，是在江青、戚本禹的煽動下，由中南海的造反派貼出來的。大字報「揭發」了朱德「在歷史上一貫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個老三反分子，是不折不扣的黑司令」。大字報中列舉的「事實」，第一樁，也是最重要的一樁，就是一九二八年的「八月失敗」。

「八月失敗」是紅軍在土地革命的早期所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失敗」事件，打開中共黨史的教科書，開宗明義，講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凡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必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而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就必講「八月失敗」。「八月失敗」與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撤離江西中央蘇區，舉行二萬五千里長征一起，成爲中共黨史上的兩次「因違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使革命事業遭致重大損失」的典型事例。「八月失敗」像一貼揭不去的膏藥，一直粘在朱德的背脊上，成爲朱德一生中最大的污點。

一、「八月失敗」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攜帶兩封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來到永新。兩封指示信，一封是給紅四軍軍委的，一封是給湘贛邊界特委的。兩封信講的都是一個內容：要紅四軍「立即向湘南發展」。

收到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後，毛澤東隨即在永新縣城商會樓主持召開邊界特委、四軍軍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出席的有朱德、陳毅、宛希先、王爾琢、何挺穎、朱雲卿、譚震林、陳正人、劉珍、賀學敏等人。會議在討論省委的決定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權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後，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指示，仍然留在井岡山堅持鬥爭。

七月四日，毛澤東在永新代表紅四軍軍委和邊界特委寫報告給湖南省委，說明聯席會議討論的結果，提出：「請省委重新討論，根據日前情形，予以新的決定。」

這時，國民黨的湘軍、贛軍，又出兵合擊井岡山。朱毛分別率兵抗敵。七月十二日，朱德率領二十八、二十九團攻克酃縣縣城，擊退湘軍的進攻。

按原定作戰計劃，朱部應回師支援永新。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從二十九團傳出要回湘南去的消息，還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的口號。

二十九團團長是胡少海，黨代表是龔楚。這個團的指戰員，多由宜章的農軍組成，家鄉觀念十分嚴重。上井岡山後，因爲經濟困難，他們不願留在井岡山地區繼續過艱苦生活，一心想回家鄉去。六月三十日的聯席會議雖然否決了湖南省委的指示，但杜修經、龔楚等人卻在私底下散布湖南省委的指示。酃

縣是湘南的大門口。來到這裏後，二十九團官兵思鄉之心更加迫切了。七月十二日晚，二十九團的士兵委員會召開秘密會議，「不通知上級長官及黨代表，竟決定十三號由酃縣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帶路的人，出動的時間都決定了」。

朱德、陳毅得知二十九團的秘情後，一方面寫信向留在永新的毛澤東報告，一方面立即召開紅四軍軍委擴大會議，對二十九團要返回湘南的行動多加勸阻。當朱德向士兵講演時說：軍部沒有決定，怎麼能回湘南？底下的士兵就喊道：軍長帶我們回湘南。朱德又說：革命要聽命令。士兵們就說：你帶我們回湘南，我們就聽你的命令！

在這種情況下，朱德不得不斷然宣布撤消二十九團的士兵委員會，下令紅軍大隊仍回師永新。七月十四日，朱德、陳毅率領紅軍大隊向井岡山進發，但「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頭喪氣，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亂，軍心渙散，組織解體。如果途中遇着敵人定是不能作戰，馬上潰散」。

部隊到了沔渡，二十九團官兵又群集要求回湘南。朱德、陳毅不得不再次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出席的有連以上幹部及各連士兵委員會代表約一百餘人，會上絕大多數人不願回井岡山，紛紛主張回湘南。明確地反對去湘南的，只有二十八團的一些人，但他們不是要回井岡山，而是主張到贛南。王爾琢說：「湘南敵人兵力集中，現在又沒有糧食，我們去了，會非常困難。我主張先向贛南發展，那裏物質條件好，敵人又不多，我們可以立足生根！」

連何長工也說：「王爾琢去開聯席會議時，我們就統一了認識，打郴州到贛南就食。那時我們有萬把人上井岡山，單靠寧岡受不了，中心地區還有點糧荒，雖然不甚厲害，但時間一長肯定要把老百姓的

糧食吃光，儘管部隊有些生產，但終非久遠之策。我們主張屁股坐在井岡山的邊緣，到贛南就食，一有事馬上回來。我們開始就不同意回永新，而進軍到余口。」（《何長工回憶錄》一九〇頁）

會議出現的情形，不是回不回井岡山，而是回湘南還是回贛南了。二十九團有的軍官就說：「分甚麼湘南贛南！沙田、桂東轉過去不遠不就是贛南了嗎？先到我們湘南，要眞不行，就到贛南去嘛！」問題的關鍵是兩個團絕大多數的官兵都不想回井岡山。會上最「土」的意見是一個湘南戰士說的：「吃飽了不想家。在井岡山餓飯不如回家鄉去餓飯。」一想到在永新、蓮花、寧岡半饑半飽的日子，二十八團和二十九團在精神上更接近了。（見羅英才、石言著《探索》第十九頁）

龔楚提議表決，話未落音，主張回湘南的一下子舉起八十多只手。

爲了愼重起見，陳毅提出應先報告邊區特委和毛澤東。杜修經也同意，決定部隊暫停行動一天，由他回寧岡茅坪向毛澤東請示，以便決定去留。龔楚對杜修經說：你去吧，我們等你一天，你不來我們也走了！

當杜修經赶到茅坪時，毛澤東已去永新。他只好報告了邊區特委書記楊開明。楊開明說：旣然你們決定了，就走吧！老毛那裏我跟他說一下。

七月十七日，紅四軍大隊正式向湘南進軍。爲免「二十九團單獨回去，孤軍奮鬥爲敵所算，乃復決定二十八團同去湘南」。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派茶陵縣委書記江華一天赶一百多里路，給杜修經、朱德、陳毅送來一封親筆信，要求紅軍返回井岡山，不要去湘南。然而，這時的形勢如同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事已至此，只能向前繼續走下去。

第一個目標是打郴州。朱德原以爲城內是許克祥部，部隊展開後，才從城裏逃出來的難民中得知，那是范石生的部隊。雖然兩人在分手時有默契：今後相遇時，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可是，眼下軍令已下，朱德反復思索後說：「不打了吧！」杜修經卻說：「已經打響了，就打吧！」朱德只好又把二十八團調上去，襲擊成功一舉奪下了郴州。

郴州是范石生的基地，存有大量物資，入城後，面對着大量的「洋財」，許多人能撈就撈。曾經擔任過國防部長的楊得志將軍，當時在四軍軍部特務營當班長，他們奉命去看守軍用倉庫，目睹了許多官兵見東西就拿，大發洋財。當時任二十九團副營長兼連長的蕭克將軍回憶說：「那時大發洋財的大有人在。林彪在郴州就搞了不少銀元。」二十九團官兵撈得最甚，他們極力想爲宜章家裏的老婆孩子多撈點東西，自由行動，已經完全失去控制。

晚上，范石生率領兩個團的主力部隊進行反撲。二十八團頂不住，只好向後邊撤退。二十九團也受到攻擊，城內一片混亂。朱德下令馬上撤出郴州，向資興轉移。

朱德、陳毅率領二十八團以及軍部、特務營安全撤退了蘇仙橋，但二十九團集合後竟不聽團部的命令撤退，一營營長朱舍我帶着親信領頭先跑，說：「走，回宜章！」頓時響起一片「回家了！回家了！」的喊聲。一營一亂，二營也亂了。只有蕭克堅決壓住他領導的一個連：「坐下，不准動！」結果，二十九團絕大部分沒有撤過蘇仙橋，都往宜章方向跑了。部隊在資興縣的布田村結集時，二十九團只剩下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所帶領的團部和蕭克率領的一個整連，共二百多人。

二十八團沒有多大損失，二十九團卻是沒有了。後來查明，二十九團的官兵絕大多數在半路上就被國民黨殺害，少數回到宜章的也站不住腳，被迫外逃。

禍不單行。二十八團三營營長袁煥全叛變，帶走了六個連。後來，這些部隊大部分都回來了，可是團長王爾琢在追回部隊時，被袁煥全開槍殺害。

損兵折將的朱德，抱着王爾琢的屍體淚流滿面，他單腿跪在地上哭喊着：「爾琢，你不能走哇！」周圍是一片嗚咽。

這就是「八月失敗」。

二、誰之罪

近半個世紀以來，朱德成為「八月失敗」的「罪魁禍首」。

毛澤東說：「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採取在統治階級分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

毛澤東還說：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於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

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對「八月失敗」所做的評論。毛澤東將責任首先歸於湖南省委以及杜修經、楊

開明，其次便是「未能加以阻止」的軍委。毛澤東所指的「軍委」和不明了形勢的「一部分同志」，指的便是朱德和陳毅。

時移勢遷，當年的湖南省委早已煙消雲散，楊開明也已犧牲，而杜修經則淪落爲一名庸庸碌碌的小人物。朱德則成爲這一事件中僅存的地位最高的領導人。於是「八月失敗」的責任便自然而然地落在朱德的頭上。

毛澤東在《井崗山的鬥爭》一文中對「八月失敗」所做的評論，自然成爲經典性的結論，成爲「最高指示」。因此，中共黨史以及所有一切的書刊，都按照毛澤東的說法，統一口徑，評論或批判「八月失敗」。例如，由何幹之主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於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史》一書中就說：「井岡山時期，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是由於遵循了毛澤東同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策，而一九二八年八月湘贛邊界和湘南的失敗，就是由於違反了這個政策。」（見該書一二九頁）「八月失敗」成爲違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的典型事例。建國以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爲了宣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光榮、正確，就必要突出「八月失敗」。久而久之，「八月失敗」就與朱德結下「不解之緣」。

對於「八月失敗」，毛澤東指出了一干人等的責任，唯獨沒有說到自己。其實，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八月失敗」的表面原因，是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而朱德沒有阻止。事實上，在這些問題的背後，還存在着更加深刻、更加重大的原因。

要探討「八月失敗」的根本原因，就要首先探討二十八、二十九團爲甚麼要離開井岡山。

一九二八年七月，要離開井岡山的，不單是家鄉在宜章的二十九團，連二十八團——這支由北伐時期葉挺的「鐵軍」組成的隊伍，也不願意回井岡山。高級幹部中，除了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之外，連二十八團的團長、紅四軍參謀長王爾琢，以及毛澤東派出的親信、二十八團黨代表何長工，也不同意回井岡山。可以說，在當時，離開井岡山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人們爲甚麼紛紛要離開井岡山？從表面上看，好像是二十九團官兵的鄉土觀念嚴重，但實際上，在鄉土觀念的背後，還存在着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井岡山沒飯吃，沒衣穿，傷病沒法醫治。正如在七月十三日晚於沔渡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那名湘南戰士所說的：「吃飽了不想家。在井岡山餓飯不如回家鄉餓飯」。吃不飽、餓飯（是長期的吃不飽，不是三天五天，一頭半月的吃不飽）才是二十九團官兵想家的原因，才是誘發他們的鄉土觀念的根本原因。

「鄉土觀念」可以解釋二十九團官兵要離開井岡山的原因，但解釋不了二十八團官兵也要離開井岡山的原因，更解釋不了連何長工、王爾琢這樣的主要高級幹部也要離開井岡山的原因。

井岡山的經濟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這才是紅四軍官兵普遍要求離開井岡山的根本原因。

井岡山經濟貧乏給紅軍帶來的嚴重困難，上文已有所述。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進剿」和「反進剿」戰爭的頻繁發生，井岡山及其周圍地區的經濟已受到戰火的摧殘和破壞，民窮財盡。了解軍情，面對客觀現實的朱德就說：「現在圍繞井岡山的附近地區民窮財盡，就是白軍不來，我們也無法維持下去，遑論軍費無法籌措，就是軍服問題也難以解決」。經濟困難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尖銳，成爲紅四軍所面臨的最主要的矛盾，是比國民黨的進剿更爲長期、更爲嚴酷的危害，是關乎紅四軍生死亡存的最主要的威脅。它嚴重地阻礙和束縛了革命武裝力量的壯大和發展，成爲革命前進的最大障礙。

二十九團官兵的鄉土觀念，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誘發出來的，「吃飽了就不想家」，這就是二十九團官兵，也是紅四軍官兵思想的眞實寫照，而離開井岡山，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已成爲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的大趨勢，成爲革命武裝力量得以進一步發展的唯一出路。

人要吃飯，要穿衣，才能生存，才能打仗，才能革命，這是最淺易的道理。毛澤東作爲紅四軍的黨代表，軍委書記，邊區特委書記（楊開明是六月底才上任的），是井岡山根據地和紅四軍的最高領導人。爲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提供溫飽，使他們保持旺盛的戰鬥力，這是毛澤東應負的責任，是毛澤東的主要職責之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作文章」。革命戰士不時要受苦受累，忍饑挨餓，甚至流血犧牲，因此，一時的困難是免不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讓前線的將士長期地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影響到士氣、軍心，使紅四軍的官兵普遍地要求離開井岡山，這就是毛澤東的過錯和失職。

紅四軍所遭受的經濟困難，是不是不可以解決的呢？並不是。紅四軍的困難，主要是因爲井岡山根據地沒有經濟能力養活這支隊伍。正如林彪所說：這個軍閥，那個軍閥，有槍就可以坐天下，我們紅軍也有槍，也可以坐天下。井岡山養不活紅四軍，中國這麼大，能夠養活紅四軍的地方多的是，紅四軍完全可以，也完全有能力去另辟新的革命根據地，使革命的武裝力量得到壯大和發展。紅四軍一九二九年後，放棄井岡山，在江西建立起廣大的中央蘇區的實踐，就證明了這一點。

可是，在一九二八年的時候，由於毛澤東實行一條右傾保守的路線，儘管井岡山的局限性已暴露無遺，但是毛澤東不僅不允許放棄井岡山，另辟新的革命根據地，而且連紅軍遠距離、大範圍的游擊也不允許。毛澤東不但自己不想離開井岡山，也不允許朱德或其他人離開井岡山。毛澤東奉行的「固守井岡

山」的死政策，正是造成紅四軍經濟得不到解決的根本原因。毛澤東的右傾保守路線，成爲革命發展的主要障礙和桎梏。

因此，紅四軍的經濟困難，完全是毛澤東的人爲錯誤造成的。而包括二十九團在內的紅四軍廣大官兵的不滿情緒，也是由此引起的。包括二十九團在內的紅四軍的廣大官兵，要求有飯吃、有衣穿，傷病可以醫治，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一點也不過份。而他們的正當要求，長期地得不到解決，給他們造成嚴重的痛苦和困難，從而引起他們的不滿，這也是合理的、正常的。作爲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不但沒有正視這些不滿情緒，正確地疏導這些不滿情緒，反而是壓制這些不滿情緒，使它們逐漸地積聚起來，到了一九二八年七月，已經到了瀕臨爆炸的地步，正如朱德所說：「等到打開酃縣，隊伍都要回湘南去，上下一致都這麼主張，多糟糕！」

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被導揚起來的。如果不是有這麼強烈的不滿情緒作爲基礎，杜修經等人也導揚不起來。因此，二十九團官兵的鄉土觀念的被誘發，是他們的不滿情緒的一種發洩；而紅四軍官兵普遍地要離開井岡山，實際上是對毛澤東的右傾保守路線的一種反抗。紅四軍內部出現這種瀕臨危機的局面，毛澤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挺進湘南，便是紅四軍廣大官兵「不願回井岡山」這種信心危機的總爆發。湖南省委及杜修經等人的誤導，只是外因，而不是內因，只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原因。而導致湘南進軍變成『八月失敗』，其主要原因是沒有進行充分的準備。在這方面，毛澤東也要負上重要的責任。

一九六二年，朱德回到井岡山，在參觀井岡山博物館時說：「『八月失敗』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起主要作用，當時軍隊由特委指揮，湖南省委要部隊回郴州，在戰略上不對」。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

朱德不可能有其他的說法。儘管如此，他沒有說自己離開井岡山是錯誤的，只是說「在戰略上不對。」

事實上，朱德率領部隊離開井岡山，另辟新的革命根據地的作法是正確的，它順應了廣大紅四軍官兵的要求，順應了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對革命是有利的。

朱德的錯誤，在於錯誤地選擇了進軍的地域和方向。湘南是聯結湘粵兩省的交通要道，是國民黨必爭之地。那裏敵人的勢力強大，交通便利，是不適合建立革命武裝割據的。尤其是四月湘南暴動失敗在前，革命基礎遭到很大的摧殘，國民黨將湘南當成「暴亂區」，三天一搜，五天一剿，搞得田園荒蕪，斷壁殘牆。實在是不宜再回去。因此去湘南在「戰略上是錯誤的」。

適合革命武裝割據的地區，是東側的贛南。那裏敵人的力量較弱，地勢也好，又有一定的群衆基礎，東可出閩南，西可入粵湘，迴旋的餘地很大。一九二九年，朱德再次離開井岡山，向贛南挺進，在戰略上選擇正確了，革命形勢便蓬勃地發展起來了。

毛澤東如果不存私心，不固執己見，從革命的利益及大局出發，是應該及可以考慮放棄井岡山，另辟新的革命根據地的。這樣一來，就可以從容計議，仔細選擇正確的、有利的出擊方向和時機，避免盲目的錯誤而帶來的損失。毛澤東的錯誤在於，他在井岡山上不但執行了一條右傾保守的錯誤路線，束縛了革命形勢的發展，而且固執己見，釀成了二十九團要回湘南的危機。在危機之中，朱德不能從容選擇戰略方向，錯誤地附和了二十九團官兵回湘南的要求，從而導致了「八月失敗」。

「八月失敗」以後，毛澤東仍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又把紅四軍帶回井岡山，從而醞釀了第二次危機。這時，敵人出動強大兵力，將井岡山團困住，紅軍饑寒交迫，再次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這時，朱德再次提出離開井岡山，但毛澤東仍然固執己見，朱毛爭執達一個月之久。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澤

東在朱德堅持要走的情況下，迫不得已才肯紅軍大隊離開井岡山。可是，這時候敵人的包圍已完成了。紅四軍失去了有利的時機。紅四軍又一次在不利的時機中倉促地出征，結果在挺進贛南的路途上，沿途被敵軍重重圍攻追擊，損失十分慘重。部隊人數由下山的三千六百多人，減至二千多人，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三十一團營長周舫，獨立營營長張威，朱德的妻子伍若蘭等，英勇犧牲。這次損失之大，並不亞於「八月失敗」。

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共釀成了兩次危機，給紅四軍造成了兩次重大的損失。後來的革命實踐證明，毛澤東的「紅軍不走」、「固守井岡山」的路線（請注意：這裏所指的並非是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革命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在鐵的事實面前，毛澤東亦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井岡山失守後，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毛澤東在代表前委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道：前委「決定拋棄了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採取變定不居的游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的跟踪窮追政策」。對此，《陳毅傳》一書寫道：「這個決定對中國革命武裝鬥爭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擴大是有深刻的歷史意義的。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鬥爭》）中說：『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餘團之多。但若我們於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作者按：這一點毛澤東說的不確實」），則憑籍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敵人，均有辦法』，因此，他力主『紅軍不走』，只有『在井岡山作長期鬥爭』才是正確的。而將任何想遠出游擊的意圖，都視爲不要革命根據地。然而實踐卻證明雖然採取了變通辦法，派主力突圍下山打外線，範圍不大的、沒有誘敵深入條件的井岡山還是沒有辦法守住，因而不得暫時放棄過去認爲只有如此才正確的固定區域的公開割據。從主力下山外線游擊到正式採取打圈子政策，不僅是戰術上的改變，而

且在實際上認識了大範圍的游擊也是鞏固、擴大或開創革命根據地主要戰略手段。突破了片面性和局限性，就爲紅軍此後在閩、贛兩省機動游擊最後創立中央革命根據地開辟了廣濶的道路」。（見「當代中國出版社」：《陳毅傳》第九十五頁）

這段文字較公允地指出了毛澤東「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的錯誤。實際上，從離開井岡山之後，紅四軍再也沒有採取「固定區域公開割據」的政策，而採取了朱德主張的大範圍的機動游擊的政策，而朱德的主張的正確性以及它的良好的客觀效果，也從江西中央蘇區的日漸擴大和紅軍隊伍不斷擴展，得到了很好的驗證。

革命實踐證明了毛澤東的錯誤，「固定區域割據」的政策被歷史淘汰。

朱德在「八月失敗」中的錯誤，在於沒有正確地選擇出擊的戰略方向，附和了下面的錯誤要求；儘管當時部隊面臨嘩變，朱德有些身不由己，但是，在危機之中，沒有能夠堅決地掌握部隊，盡量減少損失。朱德的另一個錯誤，是在「八月失敗」之後，不應再向毛澤東的錯誤政策屈服，不應再順應毛澤東的要求，重返井岡山。如果當時朱德能從容部署出贛南，就不會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撤離井岡山時那樣倉促被動，造成很大的損失。

「八月失敗」的眞正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而不是朱德。中共黨史的專家們，應當破除「兩個凡是」的迷信，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第四章　朱毛鬥爭升級

一、朱毛再會合，重返井岡山

「八月失敗」後，朱德將部隊拉到桂東附近的沙田休整。

朱德和陳毅一方面整理隊伍，一方面在萬壽宮召開黨員代表大會，總結湘南之行的經驗教訓，由朱德、陳毅向大會正式作了檢討。會上，代表們對朱德、陳毅作了許多嚴肅的批評。前委委員、特務營營長宋喬生要求將朱德、陳毅撤職查辦，還說要打陳毅的屁股四十大板。

陳毅當場反駁：「我不同意！」

宋喬生說：「你憑甚麼不同意！」

陳毅說：「同志嘜！黨章上沒有打屁股的規定嘛！」陳毅的辯解引起一片哄笑。

最後，大會給予朱德、陳毅「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

朱德並不想回井岡山，但何去何從又尚不能定。於是，朱德決定在桂東分兵游擊、籌款，發動群衆。

林彪率領一營於八月十八日佔領沙田北邊的桂東城。

離開朱德、陳毅後，林彪主動派人聯絡毛澤東。幾天後，林彪從桂東給朱德、陳毅送來急信，說毛澤東親自率領三十一團第三營前來迎接，已於八月二十二日到達桂東城。朱德、陳毅、杜修經一行立即動身，於八月二十三日晚到達桂東城。

朱毛又見面了。

第二天，毛澤東、朱德、陳毅、杜修經四人單獨開會，商討未來出路。毛澤東介紹，自從朱德率部出擊湘南後，敵軍乘虛而入，井岡山及周圍的根據地全部失去，邊界割據的損失十分嚴重。正說間，外面傳來了一陣陣急劇的槍聲。原來是敵人前來偷襲，三十一團三營的防地受到攻擊，抵擋不住，且戰且退，漸漸退到朱毛等人開會的唐家大屋一帶。還沒等到朱毛等人撤退，敵人已從中間插進來。朱毛等人與三營隔絕了。

敵人其實並不瞭解城內的底細，沒有向唐家大屋進迫。朱毛等人帶着隨從警衛員得以走脫，向縣城南邊轉移。天色黑下來了，與大部隊失去聯絡的朱毛一行人，在野地裏磕磕絆絆地向前行走。

正在黑暗中摸索間，突然從前方傳來了熱情的招呼聲：

「軍長，黨代表！我們來接你們啦！」

原來，前面正是林彪率領的一營駐地。林彪聽見城裏的槍聲，便派出二連連長率領一個排，前來迎接，而自己則指揮部隊佔領陣地，嚴陣以待。

當朱毛來到林彪的駐地時，只見戰士們在月光下加修工事。林彪上前迎接朱毛一行。

朱毛一行在林彪的親自護送下，向南走了二十多里，當晚在一條村子裏宿營。

毛澤東提議繼續開會。會議是在一戶農家的堂屋裏接着開的。前委委員龔楚也參加了。那農家的堂

屋沒有桌凳，地上只有幾張曬席，大家只好席地而坐。一盞桐油燈放在覆過來的米籮底上。毛澤東靠近燈盞坐着，他不時撥動一下燈芯，使它儘量亮一些。

會議繼續討論紅四軍未來的去向和前途。這裏面包含着兩個問題。一個是朱、毛兩部要不要重新合起來；另一個是合起來到哪裏去。毛澤東當時是堅定地要建立羅霄山脈中段革命根據地的。因而若要合，必須一起回井岡山；若是到別的地方打游擊，那至少是要暫時分家了。

龔楚和杜修經由於心懷愧意，不想多開口。

毛澤東坦率地說明了自己的意見。朱德也襟懷坦蕩，毫不隱諱自己的觀點。朱德在會上表示：帶兵的人應該常常瞭解官兵們在想甚麼，要懂得官兵們的心理，要知兵愛兵。我們官兵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革命的，非常可愛。現在他們中許多人不想回井岡山，說井岡山太苦，囿於井岡山狹小的環境，不容易發展，所以想到贛南一帶去伸伸展展地幹一場。贛南是湖南、廣東、江西三省交界地區，也有較好的地理環境。另外，湖南、廣東、廣西三省交界的嘉禾、藍山等，是九嶷山區，與井岡山相似，也可以考慮。

毛澤東說，朱德的考慮也有根據，但是，對比這些地區，還是井岡山好。一是黨和工農運動的基礎，贛西南、湘東比之贛南要好得多；二是井岡山直接影響湘贛兩省的下游，離兩省會近，對整個長江流域迺至南京、上海的影響也大。現在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內爭暫時穩定的時候，特別需要穩定可靠的根據地作依托與敵人作鬥爭。到了軍閥內戰再次爆發的時候，平江、瀏陽、安源、萍鄉這樣的工農覺悟高的地方就大可發展了。

朱毛兩人的意見，一個南轅，一個北轍。這樣，處於第三者地位的陳毅的意見，就具有決定性的意

義，陳毅站在那一邊，天秤便會向那一邊傾斜。實際上，自從三河壩轉戰以來，陳毅成了朱德最得力的助手。朱德在軍事指揮上內行，但在政治工作方面卻不大在行，在這方面主要依靠陳毅。近一年以來，兩人性格相近，坦誠爽直，合作愉快。朱德可以沒有毛澤東，但不可以沒有陳毅。

陳毅這時的想法是想回井岡山。陳毅更多是從政治方面考慮的。從湘南暴動及前階段井岡山的情況來看，陳毅最大的感受是與湖南省委及地方黨組織的關係最難處理。朱德曾經一再抱怨：湘南一些地區的地方黨組織，出於一種狹隘的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只想把紅軍引到自己所在的地區去效力，不供給眞實情報，促使紅軍與敵人打硬仗，軍隊的給養，要軍隊不管，由地方蘇維埃管糧草供給，事實上蘇維埃多沒有辦法維持，紅軍到處感到困難。所以朱德主張「在軍事行動的時間，軍隊要管理政府與（地方）黨」，即軍隊的黨要管理地方的黨政工作。在這方面，毛澤東有着出色的表現，另外，朱德和陳毅對地方黨組織的亂指揮十分頭疼。各地方黨部不但時常過左，像湘南特委的燒殺政策硬把湘南糟塌了，而且不懂得軍事策略和戰略戰術，湖南省委「喝米湯」式的決定就葬送了二十九團。在這種普通的不懂軍事又要亂指揮的情況下，以自己與朱德的情況，很難頂得住地方黨組織的這種亂指揮。因此，一個有可靠的根據地，有懂得軍事策略能頂得住亂指揮的領導核心的地區，就萬分寶貴。毛澤東不搞亂指揮，毛澤東能頂住亂指揮。這就是毛澤東與井岡山的長處。朱、毛在一起，相輔相成，必然能走向勝利。如果單獨到別處去游擊，又要吃地方黨組織的苦頭了。

陳毅的發言很有說服力，毛澤東顯然很欣賞，他把燈芯又撥得亮一點，看着朱德。

朱德顯得很沉靜。對毛澤東及陳毅的意見他都專注地聽取。他那黑瘦的臉上沒有甚麼表情，他在沉思。屋中出現了暫時的寂靜。

形勢是很明顯的了，陳毅站在毛澤東一邊。但是他並不是反對朱德，他是善意的，他不願意再看到紅四軍再出意外，再受到損失。儘管如此，朱德還是感到有些不妥，回到井岡山，不又像以前那樣了嗎，然而不回去又怎麼辦呢?兵剛敗，王爾琢又不在了，陳毅現在又贊成回井岡山。朱德已經沒有其他的辦法和出路。於是，朱德說道：

「好，我贊成回師井岡山。由我對二十八團的同志做工作。力爭全部帶回去，一個排也不少！」

朱德態度的明確改變，既出人意外，又令大家高興。於是，朱毛又一次合作。

第二天拂曉，敵人從桂東追來偷襲。林彪率領二十八團一營頑強阻擊，掩護朱毛等人撤退。在作戰中，林彪負傷。

在一營的掩護下，朱毛一行回到沙田，率領大部隊向井岡山進發。

經過了這麼多的風風雨雨之後，二十八團官兵上下同仇敵愾，一路上與前來阻攔紅軍返回井岡山的敵人開戰，三戰三捷，殺出一條血路，回到了井岡山。

那一天是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正是中秋節的前一天。

二、朱毛鬥爭的最大得益者——林彪

在井岡山上，林彪雖然以毛澤東爲師，但他並不是唯毛澤東之言是聽，唯毛澤東之命是從。

林彪是個有強烈的獨立思想的人。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任何情形下，林彪都保持着一個獨立的「自我」。

井岡山上的環境是艱苦的，鬥爭又是頻繁而殘酷的。林彪所在的二十八團第一營，經常擔任戰鬥的主要攻擊任務。戰士們吃不飽，經常在挨餓中行軍、打仗。各個連、排中，一批批的精英分子倒下，而敵人卻是像源源不盡的潮水似的，來了一批又一批。林彪手下的連排，人員不斷地減少，但卻沒有老百姓補充，常常發現槍比人還多。由於邊界地區的老百姓中已經沒有兵員了，俘虜便成了唯一的補充來源，誰抓到的俘虜，就補進誰的單位裏。此外，還有槍支彈藥，軍部根本不發，全靠自己的繳獲，正是自力更生，自己靠自己。

由於二十八團打仗多，所以繳獲也多。毛澤東下令從二十八團抽調武器彈藥支持三十一團，二十八團官兵普遍反對，林彪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個。在營以上的幹部會議上，何長工宣佈了毛澤東的命令，林彪就是不同意從自己的一營抽調，何長工以行政命令他執行抽調，他置之不理。林彪說：「現在要比賽，各繳的武器各帶，捉俘虜兵也是一樣，那個捉的多那個就多補一點」。何長工便批評他這是「本位主義」，如果按照他的意見辦，裝備好、戰鬥力強的部隊就槍支裝備彈藥用不完，而裝備差、戰鬥力弱的團隊就永遠得不到補充。再說，這樣也不利於團結。何長工的這一番大道理打不動林彪。沒有辦法，何長工去找陳毅出主意。陳毅說：長工啊，召集兩個團的士兵委員會開會吧。

紅四軍中的「雙何」何長工、何挺穎，召開了二十八團和三十一團的士兵委員會聯席會議，各個連都有代表參加。經過朱德的同意，聯席會議決定由二十八團抽調三門迫擊砲和兩挺機關槍，給三十一團成立機炮連。還要求二十八團的戰士每人拿出一些子彈給三十一團，一顆或一排都可以。

第二天早晨，三十一團搭起了一座宣傳棚，刷上大標語，上面以三十一團士兵委員會的名義書寫「感謝二十八團老大哥給我們補充武器彈藥，補充我們的裝備」。由於有權力很大的士兵委員會作出決

定，林彪雖然生氣，但也無法阻止這次抽調。二十八團的士兵們都或多或少地拿出了自己心愛的子彈。

林彪在井岡山上另一項與毛澤東相左的表現，是懷疑紅旗能打多久。

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汪洋大海中，井岡山就像一葉紅色的小舟，在風雨中飄搖。而井岡山上的經濟困難，就如同這只風雨中的小舟破爛漏水。於是，不少井岡山人紛紛提出：「紅旗究竟能打多久？」而林彪就是其中的積極的一個。尤其是在「八月失敗」後，「紅旗究竟能打多久」的輿論，一時甚囂塵上。林彪也不時流露出悲觀的思想。

爲了平息紅四軍內這股不健康的思想，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次專題報告，後來，這篇報告的主要內容被寫入大會的決議，原題爲《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爲《中國的紅色政權爲甚麼能夠存在》。

儘管林彪有一些左右搖擺的舉動，但毛澤東只當做是一個年輕人思想上的不成熟，不但沒有深責，而且給予大力的栽培和提拔。在朱毛鬥爭以及「八月失敗」中，林彪是最大的得益者。這個機緣，就是王爾琢的犧牲。

在軍事上，王爾琢在紅四軍中佔據着第二把手的地位，除了朱德之外，就是這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的團長了。如果朱德獲得升遷，那麼繼任紅四軍軍事上最高領導人的人選，就非王爾琢莫屬。一九三〇年六月，朱德升任紅一軍團軍團長，如果當時王爾琢未死，那麼繼任紅四軍軍長的人，必然就是王爾琢。無論在資歷、地位、威望、能力、經驗還是在上下人際關係等方面，王爾琢都是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年輕的林彪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王爾琢的犧牲，使紅四軍失去了軍事上的第二號人物，也使林彪消除了前進道路上的一個最大的勁

敵、最主要的障礙。王爾琢以下的一些軍事領導人，除了伍中豪以外，其他均屬庸庸之輩，少有出類拔萃者。面對這群競爭對手，林彪具有明顯的優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與毛澤東的政治盟友的關係。

王爾琢犧牲後，朱德痛心地兼任起二十八團的團長。朱毛重新會合，回到井岡山之後，毛澤東提議林彪任二十八團團長。在桂東一帶活動時，林彪在軍事上有過較出色的表現，在研究紅軍的行動方針時，軍事骨幹中，只有林彪鮮明地贊成做艱苦的發動群衆工作。林彪率領第一營在桂東一帶打土豪、做宣傳，搞得很紅火；後來阻擊國民黨第八軍的襲擊，打得也很堅決，進退有據。然而，朱德和陳毅不同意任命林彪，因爲林彪在南昌起義軍轉戰贛南的艱苦時刻，曾表現出嚴重的動搖，企圖做逃兵，同時林彪喜歡搞小圈子，任用私人。儘管有朱德、陳毅的反對，但由於朱、陳兩人剛剛在「八月失敗」中犯了錯誤，被留黨察看，因而他們的意見正是說服力不足的時候。以毛澤東爲書記的行委，還是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林彪被正式任命爲二十八團的團長。

獲任二十八團團長，是林彪一生中重要的里程碑。二十八團是紅四軍最主要的團隊。這一任命，不僅使林彪晉身於紅四軍的高層領導之列，而且，林彪從此取代了王爾琢，成爲紅四軍中軍事上的第二號人物。這種形勢爲林彪日後的進一步冒升，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紅四軍又是紅軍中的主力部隊，在整個中共的武裝力量中，佔有「第一」和「老大」的地位。林彪有幸在這裏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沿着這個幸運的階梯，步步攀升，很快就晉身於中共的主要軍事將領之列。通過這個幸運的命運之梯，林彪逐步在中國政壇上也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爲他日後登上「副統帥」的寶座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二十一歲的林彪，前程無量。

三、朱毛爭執不休

朱毛率領紅四軍回到井岡山了，但朱毛之間的分歧、矛盾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趨於激烈，更加表面化了。

回到井岡山之後，毛澤東要召開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來清算「八月失敗」。代表大會是在十月召開的。在此之前，雖然毛澤東曾對部隊說過湘南的問題讓二十八團自己講，三十一團不要講，又在召集部隊時的講話中說：朱軍長本人是反對去湘南的。但是，在黨內幹部的會議上，毛澤東還是主持會議對「八月失敗」進行檢討。於是，朱毛之間發生了多次的爭辯。毛澤東主張鞏固井岡山根據地，根據地的擴大則採取波浪式的發展。而朱德則主張紅軍主力遠道大規模游擊。朱德說毛澤東的主張是「保守主義」；而毛澤東說朱德的主張是「逃跑主義」，造成了「邊界與湘南同歸失敗」的大損失。毛澤東雖然要部隊（三十一團）「不要講湘南問題」，但他自己卻不時地講要從中吸取教訓，時常在私底下講湘南失敗的問題。面對這種情況，朱德也在部隊中宣傳，強調到湘南的必要性，和曾獲得的勝利和繳獲。這樣一來，朱毛的分歧和鬥爭擴大了。朱德在部隊中的個人威信本來很高，如今也降低了一些。

另外，在武器分發和人事問題上，也有帶原則性的不同意見。

繳獲的槍支，毛澤東主張將十分之四交給群眾，用以建立群眾武裝，鞏固根據地。朱德則主張用來擴大紅軍，少量發給群眾。在林彪的任命問題上，朱毛之間也存在着相反的意見。在這些問題上，行委的擴大會議的與會者，絕大多數都贊同了毛澤東的意見。

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召開，毛澤東的意見主導了這次會議，

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對「八月失敗」做出了組織結論。朱德雖然也被選爲第二屆特委委員，但朱毛的思想隔閡加大了，同時，林彪對朱德的敵意也加深了。林彪更加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也更加旗幟鮮明地反對朱德。

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在寧岡縣城召開了紅四軍第六次黨代會大會。大會通過的《黨務決議案》中，關於黨對部隊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法所做出的規定，與毛澤東向來主張的「黨管一切」，有着明顯的不同，決議案說：

「紅軍中各級黨部，不應公開處置各種事務，竭力恢復秘密狀態。黨的機關可設置在各級士委會內，黨的負責同志須兼爲士委職員，對外須提高士委權力，成立黨、團指揮之。軍事機關亦須健全，使其有執行黨的革命指揮軍事的權利。糾正過去黨部直接處理日常事務，視軍事機關及士委爲虛設的毛病」。「決議還規定前委須經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切實做到連支委爲紅軍核心」。

很明顯，這個決議並不是削弱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決議規定和強調的，是「領導」、「指揮」，而不是毛澤東所主張的「直接處理」，「公開處置」，即「黨管理一切」。

原來，在中共中央六月來信的指示下，在朱德、陳毅以及其他領導人的堅持下，「六大」會議上，「領導」、「指揮」的意見佔了上風，決議案中體現了朱德、陳毅等人的正確意見。毛澤東的「黨管一切」的主張沒有被大會所接納。

然而，毛澤東是個專橫獨斷而又固執己見的人。對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毛澤東根本不執行。他將決議案扔在一邊，我行我素，仍然搞他那一套的「黨管理一切」，大權獨攬，小權也不分散。在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拒不執行黨組織的決議，自來就是毛澤東的一大特色。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後更變本

加厲而已。

毛澤東不執行黨代會的決議，自搞一套，獨攬大權，包辦代理的行徑，必然引起朱毛之間的進一步衝突。這是後話。

面對朱毛矛盾的日益激化，苦煞了陳毅這位前委秘書長。陳毅對朱德的寬厚忠良，是深有瞭解的，在長期的工作中，兩人意氣相投，配合無間，在朱毛之爭中，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陳毅都站在朱德一邊。陳毅對毛澤東印象不佳，殊無好感，在上海寫給中央的信中即可見一斑。然而，大敵當前，朱毛之爭，對革命有百害而無一利。從革命的利益出發，陳毅只好當泥瓦匠，在朱毛中和稀泥。他極力統一思想，加強團結。對「八月失敗」，陳毅首先在各種會議上作自我批評，自我檢討，主動承擔責任，希望以此做爲表率，使朱毛放棄成見，團結一致。同時，陳毅還在前委會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既批評朱德，也批評毛澤東，努力使朱毛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趨於緩和，至少在下級官兵面前不要再公開爭吵。

可是，陳毅的努力並沒有湊效。

朱毛仍然爭論不休。

四、井岡楚歌

正當朱毛在井岡山上爭吵不休的時候，國民黨調動了十八個團共三萬多人的兵力，任命何鍵爲總指揮，對井岡山發動了新的圍剿。

何鍵吸取了以往的失敗經驗，今次採取了圍困戰術，只圍不攻，「分途並進」，「分進合擊」，

「統一指揮，毋分畛域，窮剿極剿」等方針，企圖將紅軍困久而潰。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九月、十月，敵人不來攻打，專門圍上不動，說是『久困窮追』，這是王均幹出來的新政策」，「我們盡量發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戰士的生活都變得很苦，都是單衣，天天吃的是南瓜。」

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說道：自從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紅軍進攻寧岡，收復了寧岡全境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四軍迄未動作，純全在休養訓練時期」。就是說，連較近的地方也沒有去游擊，更不用說當時已成爲批評對象的大規模的遠道游擊了。

在紅軍極需要物資供應的時候，紅四軍竟然在兩個月內「休養」，這是極爲罕見的。

原來，在如何對待何鍵發動的第三次會剿，紅四軍應採取甚麼對策等問題上，紅四軍高層內部，尤其是朱毛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些分歧又勾帶起過往的一系列分歧，前委、軍委連日開會，爭論不休。而且，敵人採取了圍而不攻的策略，無仗可打。於是，在紅四軍「六大」後，前委便讓全體官兵進行冬季整訓，爲期一個月。

朱毛的主要分歧是：朱德認爲，在敵人的這種圍困政策下，紅軍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遠道游擊，擺脫敵人的圍困。並主張出擊贛南。原來，中共中央在六月的來信中曾指示：「中央前此依江西省委的建議主張你們向贛南發展，佔領贛南奪取吉安爲屏障，這一計劃如果在事實上有勝利的把握，那當然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影響，而且可以與廣東的北江聯繫」，「主要的路綫是：贛西要向萍鄉、安源、醴陵、茶攸發展……贛南各縣特別是吉安、贛州、興國、南康、信豐、雩都等縣已經有群衆鬥爭起來，你們必須派出許多游擊隊伍，以很大的力量幫助那一區域的群衆暴動而與你們形成犄角之勢，再則向贛西北必須派遣游擊隊幫助修水、銅鼓發動群衆的鬥爭，同時向東幫助萬載、宜春、安福、分宜、新喻以致樟樹

鎮群衆鬥爭的發動」。當時，毛澤東以「游擊區域過寬」一語就全部拒絕了中央的建議，包括向贛南吉安方向的發展。而贛南吉安、贛州、興國、雩都等地，正是一九二九年後朱毛開闢的江西根據地，後來成爲中央革命根據地。

朱德這次選擇了一個正確的戰略出擊方向。

而毛澤東則仍然堅持固守井岡山的政策。毛澤東說：「爲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像八月那樣的蹂躪，立可重來」，「爲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群衆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岡、永新、酃縣、遂川四縣……和敵人作長期的鬥爭」，「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鬥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只有這樣才是正確的。毛澤東將朱德的主張斥爲「不要根據地」，是「逃跑主義」，「流寇主義」。

朱、毛之間的爭論，擴大到前委、軍委，在這兩級組織中，幹部們也分成兩派，進行熱烈的爭論。

一九二八年的冬天來得早，入冬以來，井岡山地區連下大雪，天氣嚴寒。由於國民黨的圍困，經濟上的封鎖也更加嚴密了，井岡山地區的經濟更加困難了，紅四軍將士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之中。

入冬後，敵人增加了各條通道、隘口的駐守兵力，防止井岡山上的軍民下山；同時又派出巡邏隊，四處巡邏。本來有一些山羊出沒的山道，井岡山上的人還可以攀登下山，但下雪後，山石濕滑，加上雪地上的腳印將敵人引來進攻，連這樣的通道都被切斷了。有一次，紅四軍曾派部隊下山採購物資，還沒下到半山，便被敵人打了回來。井岡山被嚴密封鎖，與外隔絕。國民黨一心要把紅軍困死在井岡山上。

爲了固守井岡山，除了在黃洋界、八面山、雙馬石、朱砂冲、桐木等五大哨口加修堅固工事外，還發起從寧岡挑糧上山的運動。

寧岡的糧食是從礱市、古城等地集中起來的，存放在大隴。挑糧上山，就是將這些糧食從大隴挑上

井岡山，來回一百多里地。朱德、陳毅和官兵一起，翻山越嶺，頂風冒寒，身先士卒，參加挑糧運動。一些回憶錄說：朱德常穿雙草鞋，戴斗笠，挑了滿滿的一擔米和戰士們一道爬山。爲了照顧年已四十三歲的朱德，戰士們把他挑糧用的扁擔藏了起來。朱德便又做了一根扁擔，並在上面寫下「朱德記」三個大字，以防別人再拿去。這就是燴炙人口的「朱德的扁擔」的故事。朱德軍長帶頭挑糧的事跡，在井岡山上傳爲佳話，戰士們編成歌謠唱誦：

朱德搬糧上坳，
糧食絕對可靠。
大家齊心協力，
粉碎敵人圍剿。

那條記錄井岡山艱苦歲月的朱德的扁擔，至今還陳列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裏。井岡山革命博物館裏沒有毛澤東的扁擔，歷史上也沒有「毛澤東的扁擔」這一類的故事。可是，在前段時期出版的有關毛澤東傳記的書刊中，都寫有毛澤東和朱德一樣帶頭挑糧。有一本很權威的書中還說：「毛澤東經常腳穿草鞋，身背糧袋，同戰士們一起運糧，並做思想政治工作，當時群衆在運糧時編成了一首山歌：

毛委員搬糧上坳，

糧食絕對可靠。
大家齊心協力，
粉碎敵人圍剿。

這首山歌與上文所引的歌頌朱德的民謠，四句中只有第一句中的「朱德」和「毛委員」不同。「朱德搬糧上坳」是六個字，與後三句相同，而「毛委員搬糧上坳」是七個字，其他三句則是六個字。這首「山歌」是當時人所作，還是後人爲了歌頌毛澤東而杜撰的，讀者可自鑑。

挑上山的糧食，對廣大的紅四軍官兵來的，畢竟是「杯水車薪」，對解決紅軍的困境沒有多大的幫助。漸漸的，連紅米飯、南瓜湯也難乎爲繼。毛澤東向中共中央訴苦說：「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菜錢，還是難乎其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

陳毅在上海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說：「在隆冬之際，邊界叢山中積雪不消……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處游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在此時期中，紅軍官兵單衣禦寒，日食紅米南瓜，二月沒有一文零用錢」。

敵人的包圍圈正在收緊。外無援兵，內無糧草。紅四軍又一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

五、毛路線失敗　紅軍撤離井岡山

在蔣介石的不斷催令下，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湘贛兩省會剿軍總指揮部在江西萍鄉正式成立，由湖南省的「清鄉」督辦魯滌平任總指揮，第十九師師長何鍵任代總指揮，江西國民黨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任副總指揮，劉晴初爲參謀長，糾集湘贛兩省六個旅、二十四個團約三萬多人的兵力，策劃分五路對井岡山根據地進行第三次會剿。

國民黨的這次會剿，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就開始部署了。魯滌平和何鍵的策略是緊密圍困，步步進逼，分進合擊。經過兩個月的策劃，至一九二九年一月，第一路江西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已進逼佔領到遂川；第二路張興仁的第三十五旅和周沛元的第三十四旅已進逼到泰和永新一帶；第三路湖南的王捷俊部三個團，進佔了蓮花；第四路吳尚部一個旅，進佔了酃縣、茶陵；第五路劉建緒部，進佔了桂東。五路大軍將井岡山圍困得水泄不通。何鍵命令各路兵馬做好準備，於一月十日開始對井岡山革命據地發動進攻，揚言一月十五日會合，血洗井岡山。

國民黨發動會剿的情報，很快就傳上井岡山。

井岡山上的爭論，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據陳毅在上海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

> 紅四軍內部出現了三派意見。
>
> 第一派是奉行死守，在軍事觀點上斷定井岡山天險敵人不能攻破。在政治分析上，認爲在「三全大會」（國民黨）敵人破裂可期（即指蔣桂戰爭）。因此主張紅軍死守井岡

山，準備兩月時間即可取得最後勝利。

而第二派是以守爲攻說：積極準備邊界八縣群衆的力量，憑藉井岡山天險，到敵人到山下來攻，俟其疲憊，然後由紅軍群衆夾擊消滅敵人。

第三派是拋棄邊界說：紅軍應打圈子，到別處另圖發展，不要在邊界死守，紅軍一去敵人也要追去，如此才能保存邊界黨及群衆組織。

毛澤東持的是第一派的意見，而朱德是持第三派的意見。

這些意見分歧和爭論，從紅四軍前委、軍委，擴大到各級黨組織，大會小會，爭論不休。整整一個月，紅軍何去何從，仍不能決定。《陳毅傳》一書說：「從一九二八年九月至十二月四個月中，紅軍要不要派主力打出去擴展游擊區，在紅四軍內是有爭論的。因爲有七月湘南遠行的失敗，遠出游擊的主張當然不可能實現」。

朱德憑着自己的軍事經驗，十分清楚井岡山根據地內無糧草，外無援兵，面對着兵力比自己多達六、七倍的敵人，固守下去，彈盡糧絕，無異是束手待斃。爲了紅四軍這支革命的武裝力量，也是爲了革命的整體利益，儘管頭上還籠罩着「八月失敗」的陰影，但朱德沒有做縮頭烏龜，沒有被毛澤東壓服。相反，他堅持自己正確的意見，據理力爭。如同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失敗後，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朱德挺身而出一樣，此時此地，爲了挽救紅軍，朱德同樣地挺身而出，表現出了一股奮不顧身的凜然大氣。所不同的是，一九二七年朱德面對的是國民黨敵人，而今天朱德面對的卻是手握大權的毛澤東。

在朱毛爭論達到白熱化之際，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的隊伍——紅五軍，來到了井岡山。

過了幾天，紅四軍和紅五軍舉行聯歡會，慶祝兩軍會合和紀念廣州起義一周年。豈料搭起的台子不穩固，人一上去講話時，就垮倒下來了。有人覺得不吉利。朱德則說：不要緊，垮了台，搭起來再幹吧！於是，又把主席台重新搭起來繼續開會。這個「不吉利」，是否就是預兆三十一年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挨整，並在文化大革命被囚禁八年直致病死呢？

彭懷德在《自述》中說：「當時紅四軍還是草鞋單衣，冬服未解決，無鹽吃，每天三分錢的伙食也難解決，只有離開井岡山到白區打土豪才能解決。可是傷病殘人員無法安置，又不可能帶走。似此，勢必派部隊留守。當時，四軍全部也不過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會更加單薄。爲這些問題，四軍前委開會討論好多次，我也參加了這些會」。

一九二九年一月初，中共「六大」的文件到達井岡山。一月四日，中共紅四軍前委在寧岡柏露村召開有紅四、五軍軍委、湘贛邊區特委、各地方黨組織以及紅四、五軍代表共六十多人參加的聯席會議，傳達「中共六大」的文件精神。

會議地點設在柏露河畔的橫店。這是一家兼開旅館的雜貨舖。會議共開了四天，第一天由毛澤東傳達了中央文件。接着，會議討論和研究了井岡山目前的局勢和對策。根據會議得到的情報，敵情之危急，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紅軍何去何從，再也不能拖延不決了。

柏露會議的詳情，中共黨史沒有公開地披露。按中共黨史的官式說法，會議最後決定了留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朱毛率領紅四軍主力二十八、三十一團打出去，向贛南進擊，並稱之爲「圍魏救趙」的策略。爲了便於指揮，會議還決定紅四、五兩軍合編，將紅五軍改編爲紅四軍第三十

團，由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兼第三十團團長，滕代遠任紅四軍副黨代表兼第三十團黨代表。留守在井岡山的還有王佐的第三十二團，由彭德懷、滕代遠統一指揮。「會議既否定了主張據險死守而不能解決經濟困難的消極防禦觀點，又反對了主張全部轉移而不要根據地的逃跑主義，贊同毛澤東提出的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相結合的策略」，「採用『圍魏救趙』的策略，迫使兩省國民黨軍隊分兵回援以解井岡山之圍」。

在最後的關頭，毛澤東為何放棄「固守井岡山」的意見，而同意朱德的大範圍游擊的主張，同意離開井岡山，這是一個謎。然而，龔楚在回憶錄中有這樣的透露：

「會議時，先由毛澤東報告敵情，繼由朱德提出一個方案。他說：井岡山是我們建設一年的革命根據地，防禦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夠移動的重傷官兵五百餘人，我們是不能放棄的。但是若全部紅軍守住這個山頭，則糧食不能維持很久，有被困斃的危險，因此，我主張紅軍分為兩部，以紅四軍之三十一團及紅五軍全部，由毛澤東、彭德懷兩位同志指揮，固守井岡山，我率紅四軍二十八團突圍東征，轉移到閩粵贛三省邊區游擊，創造新的根據地，如此便可分散圍攻的敵人，並可東西呼應作戰。

「當時與會各人均同意朱德這一建議。毛澤東登時目瞪口呆。他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後，便提出他的意見。他說：我原則上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見，但留守部隊仍嫌太多，突圍東征部隊則必須加強，方能達到吸引敵人跟縱追擊，以解井岡山之圍的目的。所以他主張：

一、由他（指毛澤東）和朱德同志率領紅四軍全部，向贛南方向突圍，轉移到閩贛邊區游擊；

二、彭、滕兩同志指揮紅五軍及袁、王部和遂川赤衛隊留守井岡山，並應以第五軍之主力在周圍展開游擊戰，以配合守備軍作戰。」

在敵人的圍攻之下，作爲一個軍事家，朱德很明白，紅軍固守井岡山，只有全軍覆沒，死路一條。而且敵情已不容許再拖延了。於是毅然地提出打出井岡山。毛澤東既然要留守井岡山，就讓他留下，和三十一團一起固守。朱德的提議，合情合理，人們並不感到意外。

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澤東。既然井岡山根據地在毛澤東的思想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一再堅持「紅軍不走」，在井岡山作長期鬥爭「才是正確」的，毛澤東理應留守井岡山，保衛井岡山，捍衛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原則。可是，在大敵面前，在緊急的關頭，毛澤東卻放棄這一「正確」的原則，離開井岡山，不親自去保衛井岡山。很顯然，毛澤東在危急的關頭放棄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原則。

另一方面，井岡山根據地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是毛澤東和朱德。作爲最高的軍事領導人、一軍之長，朱德率領主力出去東征，這是當然不過的，也是不可以替代的。剩下毛澤東，理應義不容辭地負起堅守井岡山的重任。可是，在大難臨頭，毛澤東竟然逃避、推脫這個責無旁貸的責任。毛澤東如果認爲朱德率領的出擊兵力不足夠，即管可以加派三十一團一起東征，但他自己沒有必要，也無須一定要跟隨三十一團一起東征。在當時，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仍然是在學習，還沒有「畢業」，他的參不參與東征，能起的作用不大。反而是堅守井岡山更需要他。毛澤東的崗位應在井岡山。於情於理於義，毛澤東都不應該在這個時刻離開井岡山。毛澤東的行爲，實際上是一種「臨陣逃脫」。

更有甚者，毛澤東自己不堅守井岡山，而將此等重任推給甫剛上山的彭德懷和滕代遠。紅五軍剛剛從遠道而來，一路轉戰，備受艱辛，元氣未復，怎麼也是個「客人」。據彭德懷在《自述》中說，中共湖南省委給紅五軍的指示是「去井岡山與紅四軍取得聯繫」，具有「取經」的意思。剛來乍到，紅五軍對井岡山人生地疏，環境不熟，怎麼能夠擔負起守山的任務呢？如果是爲了增加東征部隊的力量，應該

讓紅五軍跟隨朱德一起東征，而毛澤東率領三十一團留下守山。毛澤東是主，是井岡山根據地的創辦人，彭德懷是客，在如此重大危難的關頭，毛澤東把最危險、最艱難的守山任務，推給彭德懷，而自己一走了之。這種事情，也只有毛澤東才能做得出，而也只有像彭德懷這種忠誠剛直之士，才能臨危受命。一奸一忠，一丑一美，毛澤東與彭德懷的思想品質、內心世界，在這一刻形成極其鮮明對照。

在柏露會議上，毛澤東的這種損人利己的提議受到紅五軍代表的強烈反對。

「五軍不能守山！我們剛來乍到，人生地疏，情況不大明了，當然是四軍守山為好！」紅五軍縱隊長李燦說道。

「是呀，我們已經完成了同四軍聯絡的任務，應該北返擴大湘鄂贛邊區，還是四軍弟兄守山吧！你們有經驗嘛。」五軍八大隊十隊長郭炳生也跟着說。

還有的幹部說：「我們來取得聯絡的任務已經完成，應立即回湘鄂贛邊區，傳達『六大』決議。如果我們長期留在井岡山，就會影響湘鄂贛邊區的發展」。

紅五軍幹部的這些發言，無不有理。他們在這時候離開井岡山北返，是順理成章，無可挑剔的。

彭德懷在《自述》中說：「第一種（反對）的意見是大多數，第二種意見是我和滕代遠。我們說服了不同意見的同志，準備犧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發展」，「故我們應當承擔起來」。

疾風見勁草，危難見眞心。這是彭德懷的第一次臨危受命。然而，在三十一年後，在廬山會議上整彭德懷時，毛澤東算彭德懷的歷史總帳，說：「你彭德懷不願上落後地區，不願上山」，是合作與不合作「三七開」。

在柏露會議上，毛澤東作出如此出人意表的決定，是因為毛澤東終於認識到，再不讓紅軍下山，只

有全軍覆沒。在嚴酷的事實面前，毛澤東不得不低頭。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不得不承認：「離開井岡山是爲了解決經濟困難問題」。

其次，在會上，朱德已鐵下心要下山游擊，毛澤東再也阻攔不止了。而且朱德擺出一副「要留你毛澤東自己留」的姿態。老謀深算的毛澤東意識到，朱德帶走二十八團之後，井岡山無論如何是守不住的了。充其量朱德一行只能把贛軍引走，而剩下來的湘軍仍有十多個團，繼續圍攻井岡山，屆時只有死路一條。「圍魏」根本救不了趙。自己如果留下守山，結果將是「玉石俱焚」，性命危矣。而跟隨朱德下山，與紅軍的大部隊在一起，就安全得多。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不願冒着生命危險留下守山。毛澤東爲自己選擇了一條對自己的生命較爲安全、有利的道路。

所謂「圍魏救趙」，「圍魏」只是手段，「救趙」才是目的。熟讀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對此是一清二楚的。朱德提出率二十八團下山，留三十一團和紅五軍一起守山，紅軍的大部隊仍在井岡山，仍在「趙」這邊守着，仍是以「趙」爲主。毛澤東提出率三十一團一起下山，只留下五軍少數兵力守山，絕大多數的兵力放在「圍魏」這一頭了，「趙」那裏留下的兵力根本不能守得住，「趙」的陷落已在必然之中。以「趙」爲主成空話，「圍魏」成了主，守「趙」成爲次，本末倒置，主次顚倒。這完全失去了「圍魏救趙」的本來意義。毛澤東提出的「圍魏救趙」，成爲名符其實的遮人耳目的幌子，成爲安撫守山部隊的人心，掩飾自己臨危逃脫的手段。

柏露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會議，是土地革命早期的一個重大的轉捩點。這次會議宣告了毛澤東「紅軍不走」、「固守井岡山」的錯誤路線的失敗，結束了毛澤東錯誤路線對紅四軍的統治和束縛，使紅四軍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紅軍離開井岡山，也使中國革命關於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理論，打

破了毛澤東所設立的條條框框，得到充實、豐富和健康的發展，對全國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陳毅傳》一書對此寫道：「這種將主力用於遠出機動作戰的思想，已含有嶄新的軍事因素，已突破以前不離開井岡山地區，只作較近距離機動的常規」。「這就說明：經過新的實踐，紅四軍的領導人（指毛澤東）對於堅持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必須創造必要的經濟條件，對於開創和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可以有更多的作戰方法，已有了感受。」毛澤東徹底地放棄固守某一狹小區域作爲根據地的思想，是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到達贛南的東固以後。贛南的優越條件，尤其是東固革命根據地所取得的優異成就和良好的經驗，使毛澤東大開眼界，頗有「井底之蛙」的感覺。於是在三月二十日爲前委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就明確表示：前委「乃決定抛棄了固定的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採取變定不居的游擊政策」。

毛澤東、朱德和紅四軍，從此再也沒有回去井岡山。

第五章　贛南烽火

一、東征贛南　林彪備受考驗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清晨，朱毛率領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團、第三十一團和軍部特務營、獨立營共三千六百多人，從井岡山茨萍、小行洲出發，順着一條山間小路，向贛南東征。

這是林彪自昇任第二十八團團長以來的第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林彪的軍事指揮才能，面臨着眞正的考驗。

儘管紅四軍是秘密下山的，但已經將井岡山圍困得水泄不通的國民黨部隊，還是很快地發現紅四軍的行踪，並且派了三路部隊跟踪追擊。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紅四軍下山東征，只能吸引來一部分的敵人。然而，僅是這一部分的敵人，數量已比紅四軍多數倍，而且是「統一指揮」，「毋分畛域，窮剿極剿」，令紅四軍窮於應付。

紅四軍與尾追的敵人首場的遭遇仗，發生在大餘縣。

在此之前，紅四軍順利地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順利地占領了大餘縣，便誤以爲這次會剿的敵人，也不過如此而已。他們那裏知道，強大的敵人正在秘密而頑強追踪着。

紅四軍前委在城裏的天主教堂內召開了全軍連以上軍政幹部會議，決定在大餘暫停三天，進行休整。並以二十八團佈置於城東北一帶的山地擔任警戒，保障全軍的安全。軍部、三十一團、特務營和獨立營在城裏和近郊開展群衆工作，打土豪、籌款。但是，據蕭克將軍等曾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回憶，會議上只是一般地議論了敵情，對出現敵情時應予於堅決回擊雖已舉手通過了決議，卻並未在行動上認眞貫徹。二十八團進入警戒位置後，各營連即各管一段，團長林彪並沒有組織營連主管看地形，也沒有研究各種戰況下的協同配合和應變支援。一句話，擔任全軍警戒任務的林彪，並沒有作出正確的組織和調配。

而且大餘是個沒有黨組織，沒有群衆革命基礎的地方。當國民黨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餘城時，沒有黨員或群衆來向紅四軍報訊。李文彬部以偷襲的方式突然發起猛烈攻擊，戰鬥相繼在金蓮山、水口寺、東山嶺一帶打響，二十八團被打個措手不及。而且，敵人組織的火力特別猛烈，紅軍傷亡較多。林彪擔心硬頂下去傷亡太大，便下令後撤，自己則急忙跑到軍部報告。

二十八團的急速後撤，在城內引起一片混亂。敵軍尾追着二十八團衝進城內，軍部還沒有來得及撤退，分散在各地的部隊也還沒來得及收攏，李文彬部的槍彈已經滿城飛舞了。

當時在軍部目擊戰鬥實況的歐陽毅指出：這次戰鬥沒有打好，主要是林彪沒有盡到責任。林彪這一撤，在部隊中引起很大的混亂，隊伍潮水般退下來。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誰不撤誰就有可能被打死打傷或當俘擄。這形成了一種普遍的恐懼心理。這是極其危險的。這種形勢如發展下去，將出現全軍的崩潰。

就在這千均一髮，萬分緊急的時候，朱德和毛澤東出現了。當時，敵人就在跟前，子彈橫飛，有時

簡直是擦耳而過。然而，朱德帶領着軍部人員反擊。而毛澤東則督促林彪返回二十八團部隊，擋住敵人，說必須組織部隊把敵人打下去，而且這一仗要打好、打勝，否則對以後轉移不利。而林彪則說部隊已退下來了，面有難色。毛澤東怒令道：「撤下來也要拉回去！」這時剛由外地趕回軍部的陳毅也憤然地說：「軍部首長都在這裏，主力要堅決頂住敵人！」在毛澤東與陳毅兩人的壓力下，林彪帶着身邊的少數兵員殺回去，敵人的攻勢果然被擋住了一陣，這樣才把局面穩住，敵人的攻勢不得不慢下來。這就爲集合分散的部隊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但是，李文彬的部隊仍在全線猛攻，紅四軍的防禦體系已被打亂，不得不向南全線撤退。在撤退途中，又受到突然殺出的一支敵軍的衝擊，軍部也被打亂了。陳毅同毛澤東在一起，朱德軍長卻不知所踪，軍中一些將士失聲痛哭。後來，部隊到達南雄縣的烏徑時，才意外與朱德率領的人員會合。

這一仗，三十一團營長周舫、特務營營長張威犧牲，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負重傷，要用擔架抬着行軍。

何挺穎是陝西省南鄭縣人，上海大學數學系的高材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是參加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中的重要幹部。他思想敏捷，有較強的組織和領導能力，在井岡山上曾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黨委書記，是毛澤東的得力助手，甚爲毛澤東所器重，他原任三十一團黨代表，自林彪任二十八團團長後，爲了使年輕的林彪得到有力的輔助，毛澤東將何挺穎調到二十八團任黨代表。聽到何挺穎負傷，毛澤東特意要陳毅轉告林彪，要把何挺穎轉到安全地區好好照顧。而陳毅還特別叮囑林彪，何挺穎是從三十一團調來的好同志，一定要派人細心照料。可是林彪並沒有派專人照顧他。結果在夜行軍中，身負重傷的何挺穎從馬上掉下來被踩死了。

三十一團的官兵對何挺穎懷有深厚的感情，便紛紛責備林彪。而陳毅也爲此事專門狠狠地批評了林彪。

在尋烏縣境內的圳下，紅四軍遭遇到另一次嚴重的挫折。

圳下是座落在山溝裏的一條小村落。山溝南北各有一道亂石壘壘、雜樹叢生的山梁。一條岸邊結滿冰凌的小河在村子南邊流過，周圍是一些冬季休耕的水田。

軍部就駐在圳下村裏。獨立營、特務營駐在軍部北面，擔任前衛的三十一團駐在軍部的東邊，擔任後衛的二十八團，駐扎在軍部的西邊。

清晨，突然槍聲大作，房頂上子彈呼嘯，瓦片紛紛碎落。偷襲的敵人不僅進了村，還衝進了軍部駐扎的土圍子。在朦朧的晨曦中，黑蜮蜮的戴着大蓋帽的敵人的身影直向軍部駐地撲來，子彈不斷地在耳邊急嘯而過。連敵人「抓住朱毛有重賞」的喊聲都聽到了。

原來，又是林彪的二十八團出了問題。作爲後衛的二十八團，還未等軍部移動，他們便先行開拔了。加上特務營也沒有及時發覺敵情，敵人直撲軍部。當時，陳毅和毛澤覃正在吃早飯，而晚睡晚起的毛澤東，這時還在蒙頭大睡。是槍聲驚醒了他，當他起牀，敵人的先頭部隊已經越過了他的住房。毛澤東當即隨警衛員乘昏暗向林外轉移。

對這次戰鬥，粟裕大將有如下回憶：

「最驚險的一次是二月初向羅福嶂開進時，聽説那裏是個山區，地形很好，山上還有幾户土豪可打，當時，敵人離我們十多公里，我們一個急行軍，一天走了六十公里，但敵

人還是追上來了。凌晨，我們在項山受到劉士毅部的突然襲擊。那次第二十八團擔任後衛，林彪當時任第二十八團團長，他拉起隊伍就走，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和軍直屬機關被拋在後面，只有一個後衛營掩護，情況十分緊急，毛澤東同志帶着機關撤出來了，朱德同志被打散了，身邊僅有五名衛鋒槍手跟隨。敵人看到有拿衛鋒槍的。認定有大官在裏面，追得很兇，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計，幾個人分作兩路跑，自己帶一個警衛員，終於擺脫險境。這時，我們連到達了一個叫聖公堂的地方，聽說軍長失散了，我們萬分着急，覺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緒很低沉，恐慌。因爲軍長威信很高，訓練、生活、打仗又總是和我們在一起，大家對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點半朱軍長回來了，此時部隊一片歡騰，高興得不得了，士氣高起來了。但不幸的是軍長的愛人伍若蘭同志卻被敵人抓了去，慘遭殺害，我們看到朱軍長把伍若蘭同志爲他做的一雙鞋子一直帶着，很受感動。」

朱德離開屋子時，敵人已近在眼前。警衛員開槍掩護，中彈犧牲。朱德依依不捨地摘下警衛員的衝鋒槍，在敵我交錯中奪路撤退。在槍林彈雨中，妻子伍若蘭被敵人衝散、活捉，當敵人知道她是朱德的妻子後，便將她的頭割下來，掛在贛州城樓上示衆。

陳毅披着大衣，奪門急走。一群衝上來的敵人抓住他的大衣，高叫着：「一個大官，抓！」陳毅立即把大衣向後一脫一拋，正好罩住了敵人的腦袋，自己得以快跑脫身。

這時，二十八團的連黨代表彭睽帶着一個排趕來接應，用火力壓住了敵人，而其他的部隊發現敵情，也趕回頭來掩護，才將敵人的進攻擋住。

部隊安全撤出後，陳毅又一次批評林彪：

「你的部隊怎麼不掩護軍部而先跑了？」

林彪辯解說：「軍部要我帶部隊到羅福嶂，沒有交給我掩護軍部的任務。」

陳毅一針見血地說：「是那麼回事嗎？林彪同志，你不要狡辯了，你的做法是錯誤的，今後再不允許這樣！」

在陳毅的嚴厲批評下，林彪不再作聲。但在他的內心裏，對陳毅的敵意卻是越來越深，不可磨滅了。

在打大餘城時，林彪丟失了一只箱子，裏面有七只金戒指，一百多塊光洋。那是林彪的「私己貨」。

二、朱毛鬥爭再起烽煙　毛澤東憤然辭職

紅四軍挺進贛南後，朱毛亦將分歧與鬥爭，由井岡山轉移到贛南。

朱毛新的鬥爭，發生在一九二九年二月間，

紅四軍這次轉戰贛南，被毛澤東稱爲是「我軍最困苦的時候」。

大雪滿天飛舞，雪花落在官兵們的頭上、身上，鑽進衣領裏。雪水、汗水，濕透了身上那襤褸的單衣。紅四軍將士饑寒交迫。山路崎嶇，雪沒脛，四周荒無人煙。

更要緊的是，後面有強大的敵人窮追不捨，前方又不時出現時阻擊的敵人。而當地的地主民團，憑借對地勢的熟悉，不時進行襲擊，給紅四軍帶來傷亡。而且，因爲連續的失敗，使紅四軍士氣大大受挫，一股失望、埋怨、不滿的情緒正在滋長。

最大的敵人是經濟供給困難。在偏僻的貧窮的山區中，幾千人的吃飯，成了頭號的大問題。將士們在吃不飽飯的情況下行軍作戰，不僅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而且因營養不繼，許多將士病倒。再這樣下去，紅四軍不被敵人打垮，也會被饑寒交迫所拖垮。

二月三日，紅四軍來到尋烏縣的羅福嶂山區，在這裏停留一天。毛澤東在一家祠堂裏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總結下山以來的幾次戰鬥，研究和制定下步行動方案。

會上照例發生了爭論。

爲了應付緊張的情況，必須指揮便捷。過去有根據地，前委有大量地方工作要做。但目前軍情緊迫，已沒有固定的地方工作，前委、軍委都全力管軍隊，出現了機構重疊的現象。「人就是這幾個人」，軍委可以「暫時停止辦公」，原軍委機關可以改爲軍政治部。大家一致通過了這項建議。

關於行動方向問題，聽聞吉安東固一帶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在那裏建立了根據地。會議遂一致決定向東固靠攏，以找到一個有黨組織和群衆基礎的休息地，並安置傷病的將士。

對於如何對付敵人的追擊圍堵，以及如何解決給養和宿營困難的問題，會議上發生了劇烈的爭論。朱德以及多數人認爲：部隊有必要分兵，以便縮小目標，容易躲開敵人的追擊及解決給養、宿營問題。毛澤東則堅決反對分兵，認爲在這種情況下分兵，必造成機會給敵人各個擊破。經過一番爭論後，最終決定將紅四軍改編成兩個縱隊。一縱隊由二十八團，特務營編成，縱隊長林彪，黨代表陳毅，由朱德率

領活動，三縱隊由三十一團和獨立營組成，縱隊長伍中豪，黨代表蔡協民，由毛澤東率領行動。

南昌起義前，陳毅是武漢中央軍校的黨委書記，起義時，周恩來叫他「不要嫌小」，分配擔任起義部隊七十三團團指導員。而當時林彪僅是個排長。上井岡山時，陳毅是軍委書記，林彪是連長、後昇爲營長、團長。現在，林彪竟與陳毅同級了，對此，陳毅心中不可能沒有感覺，但在行動上卻若無其事，對林彪照樣熱情豪爽，平等相待，對林彪的一些缺點，就像大哥哥似地，給予批評教育。

當天下午，得知敵人將於次日凌晨偷襲羅福嶂。軍部當即決定，一縱隊爲前衛，明早拂曉之前向福建武平縣境內轉移，以擺脫追敵。

在此後的一個星期的轉戰中，都是深山野林，羊腸小道，偶爾才在林間看到一、二處炊煙，聽到幾聲樵斧。三千人的大隊伍，在這樣的窮山僻壞中，衣住無着，其艱難困苦已無以複加。紅四軍中多數官兵紛紛要求分兵游擊，要求前委開會決定。然而毛澤東意識到，如果在此時此地開前委會討論，分兵必然成爲多數意見而被通過，自己的意見必然孤立。毛澤東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分兵對紅軍很危險，堅決不能分兵。因而，他有意識地壓制着下面的意見，置之不理，既不召開前委會議，也不同意分兵。

在此種情況下，朱德率第一縱隊單獨行動。他決心要擺脫毛澤東的控制，按照廣大官兵的要求，也按照自己的意願，帶領這支從南昌起義以來備嘗艱辛，南征北戰的隊伍，殺出一條生路。

朱德不再理會毛澤東的阻攔和種種意見，率領第一縱隊按自己定下的目標向大柏地前進。可是，毛澤東不願意離開朱德和二十八團，也不想自己單獨行動。因爲毛澤東意識到，自己在軍事指揮上還不成熟，於行軍布陣欠缺朱德那種大將的才能，自己沒有能力指揮這支隊伍與敵人周旋、搏鬥。更重要的是，二十八團是主力，是老大哥，而三十一團只是小弟弟。離開朱德、離開二十八團，毛澤東沒有信

心，也沒有勇氣獨撐大局，將隊伍領出生路。於是，在朱德率領第一縱隊出發後，毛澤東也率領第三縱隊「依依不捨」地尾隨，朱德和第一縱隊走到那，毛澤東和第三縱隊也跟到那，朱德和第一縱隊開拔行動，毛澤東和第三縱隊也開拔行動，朱德和第一縱隊止息宿營，毛澤東和第三縱隊便也止息宿營。無論朱德和第一縱隊怎麼掙脫，毛澤東和第三縱隊都緊緊追隨。

朱德始終沒有能夠擺脫毛澤東的控制。

陳毅後來在上海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到這段時期的「分兵」時說：

在出發贛南（本年一月至三月）四軍四戰皆北。強大敵人窮追不息，同時在所到各地閩粵贛邊界一帶群衆組織非常薄弱，紅軍感覺異常困難，尤其大的軍隊（三千人左右）行動頗不方便，給養大感困難，四軍黨內引起爭論。

第一種（指朱德）主張，此時四軍應分爲兩部分，以團爲單位，各路自行去圖生存，以避免敵人的追擊。一面行動快，敵人追不上我們，一面人少給養容易，可以恢復紅軍紀律，一面減少目標。

第二種（指毛澤東）主張，此時四軍應該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開展，敵人的進攻不會再有時間延長。一面集中起來可以最後一戰，分散要各個擊破，一面分散以後聯絡困難，士兵膽子更小，更動搖。

這兩種主張，第一步是分了兵，把四軍改成兩部分（二月間事），第二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來依依不捨，所以終沒有分開。

二月十日，毛部跟着朱部來到了大柏地。無法分開的兩軍又會合在一起，朱德決定利用大柏地這裏的有利地形，給孤軍深入的尾追敵人予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二月十一日，是農曆大年初一。這一天細雨蒙蒙，風雨交加。紅四軍的將士們在寒冷中設下埋伏。國民黨劉士毅部兩個團大搖大擺地進入埋伏圈。朱德一聲令下，紅四軍戰士立即開火。雙方激戰競夜，殲滅了劉士毅這兩個團的大部，俘虜敵人團長以下八百多人，取得東征以來的決定性勝利。

大柏地戰鬥後，整個局面頓時改觀，紅四軍士氣大振，國民黨部隊再不敢尾追。二月十三日，紅四軍進佔寧都，籌了款，買了布，補充了給養，每人還發了五角錢的零用錢。接着大隊向吉安、興國方面靠攏，二月二十日到達了東固革命根據地。

在此途中，就象耀眼的火花一樣，林彪的軍事指揮才能，有過一次漂亮的表現。

林彪、陳毅率的第一縱隊向西進發，擬取道興國然後向北前往東固、行至葛坳，前面發現敵情。敵軍數量甚多，不僅搶佔了有利地形截擊紅軍，還分兵向紅軍側後運動，企圖包抄。面臨這種危急情況，如果不及時處理或處置不當，第一縱隊都會陷入敵人預設的包圍之中，而蒙受慘重的損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陳毅尊重作爲軍事首長的林彪，放手讓他處理。而林彪也感到黨代表的信任和支持，便向陳毅簡要說明了目前的危急形勢及自己的意圖，陳毅立刻表示同意。林彪當即命令前衛變後衛，搶佔附近有利地形，掩護本隊和後續部隊轉而向東急行軍四十里，擺脫了敵人的威脅，然後再向北取道黃陂、小布，向東固進發，與軍部會合。整件事看似簡單，但其中包含着軍事首長臨危不驚和隨機應變的良好素養。林彪獲得了滿分。

東固距離吉安縣城一百二十里，是江西共產黨人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展起來的一塊革命根據地，紅軍

獨立第二團團長兼政委是李文林，紅四團團長段月泉，政委金萬邦。李文林是中共江西地方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不久之後，由於他在政策、方針上與毛澤東的意見相左，被毛澤東以「AB團」的罪名，在著名的「江西蘇區肅反運動」中被殺，這是後話。

紅四軍到來後，李文林組織東固軍民給予盛大的歡迎，又給予各個方面的協助和支持，使朱毛和紅四軍好似回到家裏一樣。紅四軍在這裏實行休整。

紅四軍脫離固定的狹小的井岡山地區，來到贛南、閩西，就像蒼龍潛入大海，渾身解數，都得以發揮。在此後的兩三個月內，紅四軍打長汀、打上杭、打龍岩，連下數城，軍威大振。尤其是在三月十四日打下中等城市汀州，使紅四軍的經濟供給得到很大的幫助。紅四軍上下穿上了清一色的青灰色軍裝，頭上戴了綴有紅五星的八角形軍帽，打上新裹腿，上至朱德、毛澤東，下至勤務兵的「紅小鬼」，裝着一致，喜氣洋洋。每人還發四塊大洋的津貼費，大家輪流上街理髮洗澡，全身上下煥然一新。陳毅後來有詩歌頌紅四軍這個不尋常的春天：

閩贛路千重，春花笑吐紅。
敗軍氣猶壯，一鼓下汀龍。

紅四軍的情況改善了，穩定了。可是，內部潛在的朱毛的矛盾，在新的環境下，又變本加厲地爆發出來。

《朱德傳》一書寫道：「這些分歧由來已久。在紅四軍下井岡山後的一段時間內，處境困難，屢遭

挫折。於是，紅四軍內部，包括高級領導幹部中，對井岡山時期以及下山後的一些政策和作法產生了各種議論。對紅軍中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軍事和政治的關係、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等問題，爭論更一直不斷。這年四月前委召開的于都會議後，爭論又逐漸發展到基層。」

所謂「于都會議」，是指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澤東在于都主持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外，還有各縱隊首長林彪、伍中豪、蔡協民等，及贛南特委負責人，中央軍事部派來的代表羅壽男也參加了會議。會議主要對蔣桂戰爭的形勢進行了分析，討論了紅軍今後的行動計劃。

會上，毛澤東檢討了井岡山突圍的決策及入贛作戰的行動。毛澤東認爲：這次突圍東進，紅軍的損失很大；而我們突圍後，井岡山根據地又被國民黨攻陷，所有山上的一切後方機關、民房，均被燒光，民衆損失很大。由此證明，這次反國民黨第三次會剿的決策是錯誤的。毛澤東提出要求與會者多提意見，進行檢討，以糾正每一同志的錯誤，作爲今後的教訓。

毛澤東點明題目後，林彪接着發言。林彪認爲：突圍決策是朱德的積極主張，因這一決策錯誤，引致紅軍、蘇維埃政權、工農群衆都受到重大損失。這一責任應由朱德同志負責。並指責朱德有軍閥習氣，無政治頭腦，打仗只知硬拚，無戰略戰術修養，黨今後對軍事領導應重新研究。

陳毅聽了毛澤東及林彪的發言後，即起來發言：

突圍會議，我是參加的一個，當時朱德同志只是提出一個原則，具體的計劃還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出席同志的一致通過。如果要負責，應該是毛澤東同志負主要責任，朱德同志負次要責任，我自己也要負責任。林彪同志既未出席那次會議，又不明實情，便將責任推到朱德同志一人身上，

這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同志應有的態度。至於軍事指揮問題，當時敵軍十倍於我，到處遭敵追擊、堵截，誰能保證不失敗？且襲擊瑞金縣城的成功，大柏地主動採取攻勢，擊潰三倍於我的敵軍，我軍能以少勝多，固然是全體武裝同志拚命參戰所致，但當時是不是朱德同志堅決要打？又是不是朱德同志親自在前線指揮？我本人和林彪同志都是同時隨朱德同志參加軍事工作，每次作戰，我們都同在一起，這種事實是不容抹煞的。黨對每一個同志都是公正的，希望各同志不要憑個人的喜怒而歪曲事實。

陳毅這一番義正詞嚴的發言，既駁得林彪啞口無言，又刺正了毛澤東的痛處。毛、林兩人一時無言以對。

前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過去在會議上很少發言。但這次他也是忍無可忍，接着起來發言。胡少海反駁林彪的意見，認爲這是對朱德同志的侮辱。

朱德末了在會議上表示：檢討會是大家平等的，任何人有錯誤皆應該接受批評。關於他自己的錯誤，只要是事實，他很樂意接受。突圍的決策如果認爲是錯誤，當然要負責，但不是一個人應負全責。至於軍閥殘餘習氣，他表示自己或者還有，希望同志們幫助糾正。

當時，中共中央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曾給紅四軍發出一封指示信。該信是由中共福建省委派人於四月初送到瑞金的。四月三日，毛澤東主持前委擴大會議，宣讀和討論中央這一來信。其時，中央已知道朱毛已撤出井岡山，對全國的革命形勢持悲觀的態度，並主張將紅四軍分散到「農村中間發動農民的日常鬥爭走入廣大的土地革命」，並且要求：「中央依據目前的形勢決定朱毛兩同志有離開部隊來中央的需要。……兩同志得到中央的決定後，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對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毛澤東及前委均表示不同意見，既不同意中央對形勢的悲觀看法，又

不同意分兵，更不同意朱毛離開部隊。四月五日，毛澤東代表前委給中共中央寫的回信中，一開頭就說：「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之後，列舉了多項理由強調不能分兵。至於要朱毛離開紅軍，毛澤東說：「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毛澤東將中央「二月來信」和自己的四月五日復信，一起發表，發到各連黨支部。一時間朱毛要調走的消息便傳遍整個紅四軍。有的人主張兩人都不要走，有的主張毛走朱不走，有的則主張朱走毛不走，有的人還議論他們走後誰接替。

四月十一日的于都會議之後，紅四軍內更議論紛紛。紅四軍在井岡山時就存在「秋收起義派」與「南昌起義派」，當時，朱德到三十一團講話不大受歡迎，而毛澤東也輕易不到二十八團去講話。羅福嶂研究分兵時，也是朱德率領第一縱隊，而毛澤東則率領第三縱隊。現在，朱毛又發生衝突，一縱、三縱之中也就出現「擁毛反朱」，企圖驅逐朱德，及「擁朱反毛」，驅逐毛澤東。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滿城風雨，紅四軍中從未出現如此嚴重的政治分裂局面。地方黨組織領導人便出面邀請陳毅和張際春（時任第二縱隊黨代表）進行調停，才將一場風波平息下去。

朱毛鬥爭烽火的另一導火線，是毛澤東的專權。

羅福嶂會議後，軍委被暫時取消，新設立軍政治部，主任一職又由毛澤東擔任。如此一來，毛澤東兼任前委書記、軍黨代表、軍政治部主任三個主要職務，軍委又停止辦公，毛澤東實際上不僅有主持前委決定各種重大問題直到指揮部隊之權，擁有黨對軍隊幹部實行配備和領導之權，有各項政治工作之權，而且有了經濟沒收和分配之權，在地方建政之權。這樣，通過這三個要職，黨權、軍權、政權、人

權以至財權，都具體、確實地集中到毛澤東的手裏。

在轉戰贛南時，地方工作少，還不覺得甚麽，紅四軍在閩西、贛南打開局面後，各項工作接 而來，毛澤東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叫苦「時間不夠用」，因而往往他答應了的事情，到時都沒有辦，各項工作都受到影響。而在他忙得頭昏腦漲之餘，其他的高級幹部，如陳毅等，則無事可做。對此，朱德等人頗有意見。

由中央軍事部派來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的到來，使朱毛鬥爭火上加油。

劉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學法國，後來加入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後到蘇聯學習軍事。他軍事理論上有一套，也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他在擔任第二縱隊司令員後，幹部戰士說他勇敢能打，反映不錯。他一到紅四軍，就受到推崇，他是中央派來的，又是才從「老大哥」蘇聯回來的。他又能說會道，使紅軍官兵們很欽佩。劉安恭的到來，朱毛雙方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毛澤東便請他出席各種會議發表講話，以拉攏感情。但是劉安恭似乎對老鄉朱德和陳毅更爲親近些。不久，劉安恭便公開地站在朱德一邊，參與朱毛之爭了。

實際上，劉安恭在中央時，就聽聞湖南省委不時向中央告狀，反映毛澤東越權指揮、專權獨斷的問題。打一開始，劉安恭對毛澤東就沒有好印象。到了四軍後，劉安恭又聽到朱德等人的訴說，便毫不猶豫地站在朱德一邊。劉安恭說：「紅四軍領導人中有兩派，一個是擁護中央派（指朱德），一個是反對中央派（指毛澤東）」，他還在下面說了許多支持朱德的言論。陳毅聽到後，勸劉安恭說話要謹慎，但劉安恭沒把這些勸告放在心上。

在劉安恭到來後不久召開的前委會議上，在朱德、劉安恭等人的壓力下，毛澤東終於辭去軍政治部

主任一職，讓劉安恭出任；並在大多數人同意下，通過了恢復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兼任臨時軍委書記。在這次會議上，反對恢復臨時軍委的只有林彪和陳毅。

劉安恭出任軍委書記後，與朱德的關係更加密切了。五月二十三日，紅四軍攻克龍岩城，朱德、劉安恭便以他們二人聯名簽署向中共中央寫了《紅軍第四軍報告》，報告中的署名中沒有黨代表毛澤東的名字。

劉安恭主持召開臨時軍委會議作出的第一個決議，就是限制以毛澤東爲首的前委的權力，規定前委以後只管紅四軍作戰行動方針，而不要過問紅四軍的其他問題。還提出要成立正式的軍委。消息傳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感到很震驚。前委是代表中央領導紅四軍和割據地區的一切工作的，是紅四軍和所到地方最高指導機關，前委不管軍隊，就被架空了。可是，臨時軍委的決定已成事實。毛澤東雖感到氣憤，但也一時沒有辦法。

對劉安恭的這個決定，一些人舉手贊成，另一些人覺得不適合：下級怎麼能決定上級的權力範圍呢？一時四軍內又議論紛紛，並且由議論變爲辯論、爭論，過去爭論過的一些老問題，這時又提出來爭論。同時，爲了對劉安恭還以顏色，毛澤東便提出取消臨時軍委。於是，「四軍軍委應不應成立」，便成爭論的焦點。毛澤東說：「近日兩種不同意見最明顯的莫過於軍委問題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現時代軍黨部要不要的問題。」

主張設立軍委的，是以朱德、劉安恭爲首，認爲：「既有四軍，就要有軍委」，「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他們認爲軍委是四軍的一級黨組織，從支部、營黨委、團黨委直到軍委，缺一不可，並說前委之下設軍委是中央的決定。這一派還指責前委「管得太多」，「權力

太集中」，「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代替了群衆組織」，甚至指責前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

反對設軍委這一派，是以毛澤東爲首。這一派認爲：贛南閩西的蘇區尙未發展，地方工作不多，領導工作重心還在軍隊，由前委直接指揮就可以了。毛澤東說：「現在四軍只有四千多人，又處在游擊戰爭環境，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的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應再設軍委」。毛澤東還說：「做事要從實際出發」，「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甚麼用處呢？」毛澤東指責說：設立軍委實際上是與前委「分權」，指責朱德、劉安恭等人「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在他們手裏」，「爲要成立新的指導機關——軍委，便不得不提出舊的理由，攻擊舊的指導機關——前委以至支部」。結果只能是「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

這些爭論的實質，在於黨怎樣領導軍隊，農村中的紅色武裝割據，應當怎樣進行。其中心問題還是權力問題，即紅四軍應由誰來控制和指揮。

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不但大抓對地方黨的控制權，而且還緊緊抓住對紅四軍的控制權、指揮權。他提出「黨管一切」，「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上議決後」，才允許執行，形成一種「以黨代軍」，「以黨代政」，「以黨代群」的現象，形成「黨軍」。毛澤東以「前委書記」自居，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自己的政治野心、專橫獨斷的家長作風，都可用「黨管一切」來掩飾。而對反對派的種種批評，也可用「黨管一切」來抵擋。「黨管一切」成了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王牌。

朱毛之爭，在五月底召開的湖雷前委會上達到了第一個高峯。湖雷市只是一個市集、圩場，有幾百

戶人家，百十家店舖，東邊是鬱鬱青山，西邊是幽幽綠水，是個靜謐而又繁盛的地方。可是，毛澤東在這裏主持召開的前委會議卻一點也不「靜謐」，爭論的雙方激烈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意見不但不能統一，反而更激化、尖銳化，也更擴大化了。

其一是爭論的問題更加廣泛，更加複雜了。在井岡山上時，由於物質供應是最尖銳、最突出的矛盾，所以朱毛之爭主要在離開還是固守井岡山的問題，而其他的問題，如黨的領導等等，暫時被掩蓋了起來。到了閩、贛後，吃飯、穿衣的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尤其是涉及到權力之爭的「黨管一切」問題，便突出起來了。據毛澤東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給林彪的信中說：朱毛之間爭論的問題達十四項之多。毛澤東說：「現在爭論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和一年以來長期鬥爭的問題，不過從前因種種原因把它隱蔽了，到近日來才暴露出來。」

其二，參加爭論的雙方，由開始時的朱毛以及四軍高層幹部，擴大到整個四軍官兵，連下層的指揮員和士兵，都參與這場爭論。將爭論範圍擴大，是毛澤東有意公開的，在給林彪的信中，他說：「其實從前的隱蔽是錯誤的了，現在的暴露才是對的，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只有趕快調和敷衍了事，抹去了兩方的界線，以歸到傭俗的所謂大事化爲小事才是退步。」於是，毛澤東以前委的名義，不斷將有關爭論的資料公開，發到支部一級，力求「人人皆知」。

其三，朱毛之間的分歧和隔閡，由正常的工作上的爭論，發展到意氣用事，人身攻擊。這一點毛澤東表現得最明顯。毛澤東指責朱德是「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等等，極力貶低朱德，頗有「揭人之短」的味道，甚失身份和風度。但這正是毛澤東的本性的眞實表現。林彪是有樣學樣，跟着毛澤東對朱德進行漫罵式的攻擊。倒是朱德能沉住氣，表現出豁達大度。

朱毛之爭的第二個高潮發生在六月八日的白砂前委會議。白砂是上杭城東北的一個大集鎭。六月七日，紅四軍打下白砂鎭。前委會議便在翌日召開。

參加白砂會議的共有四十三人。毛澤東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煙，宣布開會。首先，毛澤東說他有個書面發言，請江華給大家念一念。書面意見共四條：

一、前委、軍委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領導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

二、根本分歧在前委和軍委；

三、反對黨管一切（認爲黨管太多了，權力太集中於前委），反對一切歸支部（主張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機關），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受限制，要求黨員有相當自由（反對一支槍也要問過黨），這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動搖，成了根本上的問題——個人主義與無產階級組織性紀律性鬥爭的問題；

四、對於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充分發表意見，切實討論，決議形成後又要反對，並把責任推給前委書記一人。因此，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發生問題，民主集中制執行不了，這個問題同時成了全黨的問題。

江華念完後，毛澤東接着說：他的意見是否正確，大家可以討論，他認爲軍委應該撤消，還是要集中權力於前委。

毛澤東的話剛落音，劉安恭便立即發言表示反對。

朱德接着發言，針對毛澤東的三條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第一，他認爲「『黨管理一切』爲最高原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並說這種口號是「違背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所以，他不同意「黨管一切」的說法。第二，對於「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他是「極端擁護的」，但是他認爲四軍在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爲「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衆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這樣何嘗有工作歸支部呢」？第三，他認爲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自由要受到紀律的限制，他認爲只有「贊成執行鐵的紀律方能培養全數黨員對黨的訓練和信仰奮鬥有所依歸」。同時，他指出，恰恰在這方面，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做好，不僅自由發表意見，自由漫罵同志，而且對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認眞執行。

毛澤東堅持自己的觀點，進一步指出：不能因爲要成立軍委而與前委分權，攻擊前委以至支部，削弱黨的領導。毛澤東最後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前委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林彪接着發言，支持毛澤東而攻擊朱德。

劉安恭又起來發言，指責毛澤東喜歡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建議選舉前委，前委書記可輪流擔任。

陳毅發言不同意劉安恭的意見，並勸毛澤東不要辭職。但毛澤東執意不肯撤回辭職。

最後進行表決，以三十八票贊成，五票反對，通過了取消軍委的決定。而毛澤東的辭職被接納，委任陳毅代理前委書記。劉安恭的軍委書記也被自動撤銷，軍政治部主任一職也由陳毅代替。

白砂會議散會時，已是夜裏了。毛澤東在牀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突然，政治部秘書黃琳給毛澤東送來林彪的一封信，說：「林彪說話厲害啊！」毛澤東接過林彪的信，只見上面寫道：「現在四軍裏確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群衆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屁的攻擊別的同志」，「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所蒙蔽陰謀，附和這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嘆息的現象」。

林彪信中還說：「你今天提出你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裏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來代替你以前，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後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志的錯誤思想。」

林彪的信除了表示支持毛澤東、攻擊朱德之外，主要是不同意毛澤東的辭職。林彪與毛澤東，這時已是共榮共辱的關係。毛澤東離開前委書記一職，對林彪當然十分不利，因此表示「非常不贊成」。林彪希望毛澤東「不應該離開前委」。

幾天以後，毛澤東將林彪的信刊登在《前委通訊》上。紅四軍「七大」決議中批評林彪這封信時引用的句子，如「政客手段」、「卑汚行爲」等，《前委通訊》刊出的信中都不見，可能是毛澤東覺得太過分，而將其删掉了。

白砂會議後，紅四軍上下的爭論就更激烈，更擴大了。毛澤東決心要爭論個水落石出，反對「模棱兩可，是非不分」。而朱德則說：「我對於此次的辯論，不但對黨沒有損失，並且使黨有長處的進步」，「各個同志積極的鬥爭，使黨內一切不正確的一切錯誤都要應有盡有的洗滌，努力建設新生命的

黨。」劉安恭的意見是：「黨內糾紛只有鬥爭才有正確的出路，中央對於黨內糾紛，反對彌縫敷衍辦法」。

毛、朱、劉的信件都發表在《前委通訊》上。前委號召：同志們努力來爭論吧！

前委還決定：「特指定毛澤東、朱德、劉安恭三同志各作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意見」，連同毛澤東六月八日的辭職的「書面意見」和林彪給毛澤東的信，一起刊登在《前委通訊》上，發到各支部，「全篇文章合起來一看，可以知道這次爭論的是甚麼，每個同志對於這些爭論都應發表意見」。

毛澤東的文章以回復林彪來信的形式，於六月十四日寫出，朱德的文章也採用答林彪來信的形式，於六月十六日寫出。劉安恭的文章也在十六日寫出。

毛澤東六月十四日復林彪的信，是他早期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現摘錄如下：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爲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因爲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鬥爭的問題，不過從前因種種原因把它隱蔽了，到近日來才暴露出來。其實從前的隱蔽是錯誤了，現在暴露才是對的，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只有趕快調和敷衍了事，抹去了兩方的界線，以歸到庸俗的所謂大事化爲小事才是退步，我想這回是不會發生可怕的惡結果的。白砂會議後不到幾天，問題已經在黨內群衆中熱烈地討論起來了，我

想同志們一定要求這問題的徹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調和敷衍，模棱兩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選擇並擁護一種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前進的意見。四軍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軍的黨由此可以得到一極大的進步，這是絕對無疑的。

二、不明四軍鬥爭的歷史，便不明白現在爭論問題的來源，不明白它的來源，便不明白自有四軍到現在兩個思想系統的鬥爭的全部問題的性質。問題的主要點有以下各端：（一）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二）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三）小團體主義與反小團體主義，（四）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五）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六）地方武裝問題，（七）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八）對時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敗，（十）科學化、規律化問題，（十一）四軍軍事技術問題，（十二）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十三）分權主義與集權，（十四）其他腐敗思想。讓我在下面預說出來。

三、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記得的就是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我們記起了這兩點，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習慣、制度何以這樣地難改，而黨的領導與個人的領導何以總是抗分，長在一種鬥爭狀況之中。紅軍既是從舊式軍隊變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的擁護者和一些反對這種思想、習慣、制度的人作鬥爭，這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裏至今還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原因。不但如此，四軍的大部分從是失敗環境之下拖出來的（這是一九二七年），結集又是失敗之前的黨的組織，既是非常薄弱，在失敗中就是完全失了領導。那時候的得救，可以說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個人的領導

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這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裏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二個原因。明白了這兩個原因，我們再來看一看四軍黨組織以後的歷史，更明白個人與黨鬥爭的盈虛消長之機。自四軍成立以後，黨從連上建設了普遍的基礎，現在上級指導機關對於鬥爭策略的正確（湘贛邊界特委，四軍軍委前委），邊界各縣地方黨部之建立，群衆鬥爭之發展，使得個人作用漸漸減少，黨的領導漸漸加強。大概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從四軍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邊界爲第一個時期，這時期包括邊界迭次戰爭的勝利和湘南的失敗。黨在這時期中不能有絕對的指揮權，小團體主義充分存在而發展，黨不敢作調動槍枝上的嘗試，紅軍後方兼顧主義與少數同志的紅軍本位主義是衝突的，軍需制度和編制法規未能建立，個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這時候的黨從連到軍從它的實質說是處在一種從屬的地位，在某些問題上是絕對聽命於個人。

從去年九月重回邊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領汀州是第二時期。……這時期內少數同志極力把頭低下來，黨確處在指揮的地位了，從支部以至前委大體上說來都是如此的。在這時期內有幾個顯著的特徵：第一，是在湘南失敗及大餘一路逃難形勢之下，個人沒有顯出甚麼大領導，同時非依賴黨的領導就會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時期有迭次的軍事勝利，這是黨的領導抬頭的第一原因。第二，這時期內黨的組織與同志們的政治程度和鬥爭經驗比起第一時期來確實進步些，少數同志不正確的言論行動比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擁護，因此自己要收斂一些，這是黨的領導抬頭的第二個原因。

從汀州到現在的第三時期。這一時期內黨及紅軍的各方面實在都比以前進步了。……

但因爲黨的意志極大的限度的伸張、個人意志感到從來未有的痛苦，一連打了幾個勝仗和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這三樣匯合所以爆發了近日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在現在時代軍黨部要不要的問題，因爲少數同志堅決地要軍委，遂不得不攻擊前委，於是涉及黨的機關的本身問題，「黨太管多了」、「權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們攻擊的口號。在辯論中論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說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話，這亦是由於黨的管轄範圍一問題生出來的，因爲他們主張黨所過問的範圍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張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爲黨的意志伸張，個人意志減縮，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席上議決之後，才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工作，使得個人沒有英雄式的自由，於是從要有相當自由要求出來的「一支槍也要問過黨嗎？」「馬夫沒有飯吃也要黨去管嗎？」這就成他們嘲笑黨部精密細小工作的口號了。以上是他們在湖雷前委會議時發表的意見，議論問題雖則分成了三個（黨的勢力所及的範圍，支部的工作，個人無自由），但精神是一貫的，就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爭雄的具體的表現。自近日爭論問題發生之後，有的同志覺得四軍的黨到來了一個危機，如果少數同志作的個人主義領導勝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來信所說有一種破壞黨團結一致和不利於革命的前途會要到來。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爲現在的四軍的黨是比第一、二時期都有顯然的進步，各縱隊的基礎已是不能動搖，個人自私的欲望決定會被群衆所拒絕，我們只要看四十一個人會議中三十六票對五票取消那少數同志們硬要成立軍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數人一定不會擁護他們的「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革命」的主張了。個人主義與反個人主義的，亦即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的鬥爭，是四軍歷史

問題的總線索。下面各項大體說來（均其分支）沒有一項不是有正相反對的兩種意見，我們試簡單舉出。

四、四軍中向來就有一些同志是偏於軍事觀點的，與站在政治觀點即群衆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

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利害的，它的產生是由於四軍中的遊民成分。黨與這種思想曾作過許多的奮鬥，但它的尾巴至今還存在，從前代表這種思想的人，至今還不能說是已拋棄這種思想。流寇思想影響到政治方面的最顯明的表現，就是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的不同的見解。我們不要忘記，湘贛邊界割據山脈中段政權問題在四軍黨內的一致僅僅是表面的罷了，骨子裏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時時刻刻要脫離邊界的鬥爭，一到危急時候，這些同志馬上（原文脫漏），參加過湘贛邊界鬥爭的人大家明了的。對於建設湘贛邊界武裝問題，因爲要從紅軍中撥槍，歷來成爲一個鬥爭，這是軍事觀點群衆觀點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發生出來不同見解的表現。……

五、到近日，兩種不同的意見最顯明的莫過於軍委問題的爭論。少數同志們硬是要一個軍委，骨子裏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的手裏，以求伸張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與歷來指導路線不同的另一指導路線），然而表現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罷了。他們說：「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這不是完全形式主義的說法嗎？現在只有四千多人一個小部隊，並沒有多數的「軍」如中央之下有多數的省一樣。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

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數同志們對這些實際的理由一點不顧及，只是形式地要於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生生地插進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這是甚麼人都明白在實際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數同志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設立不可，究竟有甚麼理由可以說明呢？要找尋出理由，我只好說這是少數同志們歷來錯誤路線的結穴，兩個指導路線的最後鬥爭，我們只要查明了四軍的歷史，就容易明白這回爭論的實際意義了。

爲要成立新的指導機關——軍委，便不得不搜出舊的理由，攻擊舊的指導機關——前委以至支部。他們提出攻擊的理由最具體的是：（一）黨代替了群衆的組織，（二）四軍黨內有家長制。他們這種攻擊又全陷於形式主義。黨的組織代替群衆組織，自有四軍黨以來就是嚴禁的，就前委指導下的工農組織說來，未曾有黨的支部代替過工農協會的事，就兵士組織上說，未曾有任何一連的連支部代替過連士兵委員會的事，這是四軍中有眼睛的人都見到的。至於黨部機關代替了群衆機關或政權機關，如縱委代替了縱隊士委、縱隊司令部、縱隊政治部，前委代替了軍士委、軍司令部、軍政治部，亦是從來沒有過。但是少數同志的形式主義又要在這裏發揮了，他們說黨部機關雖沒代替群衆機關及政權機關，但實際上縱隊司令部少向軍司令部打報告了，軍司令部淡了。少數同志們不知道這種現象是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之不同，縱委或前委的領導加強，一切問題（凡是他們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夠提出在會議席上討論決定，然後通知政權機關負責同志去執行，否則謂之自由行動（如自由支配財政、自由支配槍彈等）。這種表現是黨部領導力量加強的證例，我們

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每次會議，政權機關的負責同志都是到會的，而意見也參加了，而且許多問題是要這些負責同志提議才能討論的（如作戰計劃、官兵訓練計劃等），大家都參加了問題的討論和表決了，會後拿去執行起來，因而覺得行政機關簡單了一些，自由了一些，於實際上究竟有些甚麼要不得呢？軍長閑起了，但是黨代表（與黨部書記是兩個東西）的閑起更甚，因爲沒有下級黨代表向他打報告。縱隊司令部少有報告打到軍司令部了，但是縱隊政治部打到軍政治部的報告更少。不問後來的狀態比從前行政自由支配、比從前報告打得多的熱鬧的時代——湘贛邊界的初期，於工作上是否有效果，於鬥爭上是否更形便利，不從需要上實際上去估量，單從形式上去估量，這是甚麼一種共産主義者的態度呢？！請問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甚麼用處呢？！……

至於攻擊四軍黨內的家長制，這個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於此我們要先問甚麼叫家長制，然後才可以知道四軍內是否有家長制，不然隨口亂說必定與事實不相符合。家長制的定義是：只有個人的命令，沒有集體的討論，只有上級委派，沒有群衆選舉。如果大家承認是這個定義，那末，我們看一看，四軍的黨內有沒有這定義所說的一樣，就可以知道有沒有家長制了。……

至於我之請求離開前委，並不是消極，不參加這種鬥爭，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對於與黨內錯誤思想奮鬥，兩年以來已經既竭吾力了，現在我又把問題的內容提出以後，使多數同志們作不斷的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二）我在四軍的日子太久了，一種歷史的地位發生出來的影響是很不好的，這是我

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個人身體太弱，智識太貧，所以我希望經過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學兼休息一個時期。在沒有得到中央允許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環境而得到相當的進步。

（四）四軍的黨已經有了比較堅固的基礎了，我去之後，決然沒有不好的影響。黨的思想上的分化和鬥爭既已經起來了，決不因我去而不達到勝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後面一段是過慮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見，決定要在黨部，我沒有離開一天仍舊可以隨大家作思想奮鬥一天！

C的敬禮！

毛澤東

六月十四日於新泉

毛澤東的信洋洋灑灑，長篇大論。他列舉出紅四軍中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如絕對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個人主義、主觀主義等等，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信中也存在許多不正確及錯誤的地方：

首先，他在信中對朱德所做的人身攻擊，顯然就是一種妄顧事實的、非理性的、非黨性原則的作法，那是鬧個人意氣、泄私憤，於解決問題完全於事無補。在這裏，毛澤東儼然以中共的「正統派」、「純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自居，口氣中頗有「主子」「主人」的味道，而將朱德斥責爲外來者、後來

者，「從舊式軍隊變來的」，充滿了歧視、輕蔑。這首先有失公道。朱德雖然以前是舊軍閥，但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了中共，雖然不是中央委員，但他參加領導了南昌起義，又堅持贛南轉戰，領導了湘南暴動，上了井岡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並不比毛澤東差。而毛澤東在參加革命前是個教書匠，按中共的階級劃分，屬小資產階級，並不是工人階級出身，並非甚麼「純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澤東自己也承認在信奉共產主義前，也讀過不少孔孟的書。毛澤東歧視朱德，只是九十九步笑百步而已，其次，毛澤東斥責朱德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也是失敗得一塌糊塗，何嘗不是「從失敗中拖出來的」？在這裏，毛澤東那狹隘的心胸，不能容人的度量，表露無遺。相反，對毛澤東的指責，朱德態度坦然，他說：「革命不是個人的事，我早年做過軍閥，但覺悟後，黨的同志能容納自己參加革命，這是自己畢生之幸，現在自己的去留，悉由黨決定。」

毛澤東在信中的另一點錯誤，是主張「黨管理一切」，「絕對的黨領導」：黨所過問的範圍是不能限制的，「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上議決之後，才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工作」，「指導員支配軍官」，「一個子彈不問過黨不能支配」。毛澤東顯然是將「黨管理一切」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黨領導一切」。而且，儘管後來中共中央明確地指出了他的錯誤，但正如陳毅所說：只要是毛澤東在當書記，不管你文字上怎樣規定，他還是實行「黨管理一切」。

毛澤東還為自己的「家長制」、「專橫攬權」辯護，是因為「四軍中有一種黨部書記兼充紅軍黨代表制度」而引起誤解。其實，「家長制」、「專橫獨斷」、「攬權」等，是毛澤東的本性。上了井岡山後，由於「山高皇帝遠」，「自己就是皇帝」，這些惡性得到充分的表露。在以後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或明或暗，或顯或微，一直到死，毛澤東的這些不良本性都一直伴隨着他，給中國和中國人民造成極大

的災難。

朱德答林彪的信，主要是詳細解釋了自己在白砂會議上陳述的觀點，着重反駁「黨管理一切」問題。朱德說：「共產主義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爲他們的參謀部……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蘇維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眞要實行此口號（黨管一切），必然使黨脫離群衆，使黨孤立」。朱德所理解的「黨的領導」原則，顯然比毛澤東的更接近中共中央的規定。朱德還說，目前「甚至黨還沒有管理一切而是書記管理一切」。朱德還主張「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而反對「由上而下的家長制」，尤其反對「不是集權於前委，而是集權於前委書記」。

劉安恭的文章主要反對毛澤東提出的「黨管理一切」，也反對家長制的包辦等等，而提出「黨內實行選舉制」等口號。

毛澤東、朱德和劉安恭的文章發表後，紅四軍中的爭論，便沸騰起來了。

毛澤東的信是刊登在《前委通訊》第三期上的，「然而毛澤東的意見並沒有爲大多數人接受」。六月十七日晚，前委在小池開會、研究第三次攻打龍岩的作戰部署，前委沒有通知黨代表毛澤東參加這次重要的軍事會議。

六月十九日，朱德指揮紅四軍第三次打下龍岩，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龍岩城建於唐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是座古老的山城。城中的公民小學內有座「興學祠」，古香古色，很像一座小戲院，據說它是過去龍岩縣秀才會考的場所。興學祠的廳堂很寬敞。中共紅四軍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就在這裏舉行，正面牆上貼着一幅紅紙寫的會標，一張古舊的八仙桌放在前面，桌上放着幾個藍花瓷碗和白瓷茶壺。這就是大會的主席台。

紅四軍「七大」在六月二十二日召開。會期只有一天。據參加會議的傅柏翠回憶：會場氣氛緊張而熱烈，有甚麼意見都可以講。代表們對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幾位領導人提出很多意見，有些意見是中肯的，但也有些偏激誇大。

會議通過了《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七代表大會決議案》，最後，會議進行選舉，新的前委共十三人，朱毛、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等都榜上有名。但大會選出來的前委書記是陳毅，而不是毛澤東。毛澤東落選了。這是陳毅第二次代替毛澤東出任前委書記。在後來，被稱爲「陳毅奪了毛主席的權」。爲此，陳毅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價。

《決議》的主要內容有：

一、總結紅四軍自成立以來的工作，肯定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和政策，以及紅四軍中實行的一些制度，如宣傳兵制度、士兵委員會制度、經濟制度等。但也指出：

1 一九二八年五月遣返湘南農軍是錯誤的；

2 一九二八年九～十二月，在軍事上有保守主義的錯誤，沒有很好地有計劃地進行游擊戰爭，是一種單純的軍事割據，而且因爲紅軍物質上的需要給群衆以不好的影響，甚至「有脫離我們的傾向」。這是批評毛澤東的；

3 前委（指毛澤東）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在于都會議上決定「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的決定是不正確的，是對主觀條件缺乏正確估量的結果」。

二、對黨內爭論的一些問題作出結論：

1 「黨應不應管一切」？由於大會爭論沒有結果，因此只說這個口號在文字方面太簡單，不明

確，可以引起不正確的解釋，今後不多引用；

2 關於前委與軍委關係問題：決議認爲不能說前委與軍委是分權式，只能說軍委分擔了前委的工作，但決議主張不設軍委；

3 關於過去黨有沒有家長制度的傾向？決議認爲在客觀上是存在的。因爲四軍內黨員對黨，下級對上級，只有機械式的服從而無活潑的黨的生活，將一切工作集中到書記一人身上。但對「書記專政」的提法則予以否認，說是種「偏見」，因爲在組織上是前委書記（毛澤東）兼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這樣有時難免出現把一切事情集中於一個人的現象，這不是「書記專政」，是屬於組織上人才安排得不合適。

4 關於過去黨有沒有代替群衆組織的錯誤？決議認爲沒有。

5 關於過去是不是上級黨包辦了支部的工作？決議斷然否認，說「這完全不是事實。」

6 關於毛澤東提出的紅四軍黨內歷史上存不存在個人領導（指朱德）與黨的領導的鬥爭，決議認爲絕沒有「個人與黨爭權」的事實，把這些爭論看成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爭雄的具體表現」（毛澤東語）的說法，是「最要不得的」。

7 決議在分析這次爭論的性質和原因時，指出原因之一就是「過去黨的批評精神缺乏」，領導人（朱毛）之間因某種政策與意見不同而互相懷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來批評交由黨解決，以致造成這次黨內嚴重的爭論問題，給黨以不好的影響。

三、決議對毛澤東的個人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給予了嚴格的批評。還說：毛澤東「見着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狀態，不去積極搶救，反施以消極態度，這是不對的」。在批評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說的「四

軍有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的鬥爭」時，認爲這些判斷是不正確的，並一條一條地進行了反駁說明。

決議也對朱德的思想作風和工作進行了批評。

決議認爲在這次黨內爭論中，毛澤東和朱德都犯有錯誤，並宣佈給他們以嚴重警告和書面警告的處分。

四、在談到這次黨內爭論的原因時，決議說是四軍內黨員的經濟背景複雜，思想認識不一致；領導幹部間工作方式與態度不好，引起了意見糾紛；組織上不完備，兼職過多，責任心都很重，愛多管事，缺乏黨內批評精神，決議認爲爭論的性質「並不是簡單的兩種路線思想鬥爭的結果。」

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強調爭論的性質是：「少數同志們歷史錯誤路線的結果」，是「兩個指導路線的最後鬥爭」。喜歡搞「路線鬥爭」的毛澤東，在這裏第一次使出「路線鬥爭」這一殺傷力極強的武器。

在毛澤東的主導下，這場爭論向來被確認爲中共建軍史上「兩條路線第一次決鬥」。這種觀點從江西蘇區流傳到延安整風，一直流行到文化大革命，直至今天仍有中共黨史專家認爲紅四軍「七大」是錯誤思想佔上風、毛澤東被排斥的一次會議。

「七大」一直開到深夜。大會結束前，朱毛都發了言。朱德講完後，毛澤東說：「對於今天的大會，我不想多說甚麼，還是讓事實、讓歷史去作結論吧。」

散會後，代表們差不多都走光了。但毛澤東仍坐在那裏，不停地抽煙。地上的煙頭積了一小堆。是負責會務的江華，收拾完東西，叫了一聲：「黨代表，散會了！」毛澤東才從沉思中醒了過來，望着空蕩蕩的會場，說了一聲：

「唉，他們都走了！」

然後，兩人一起走出興學祠。

毛澤東是個權力慾望極強、個人自尊心極強，只能上不能下的人。在「七大」上，毛澤東雖然仍被選為前委委員，仍作紅四軍黨代表，但「前委書記」這個至高無上的權位卻失去了。對此，毛澤東接受不了——他不能接受被人領導的地位。於是他不惜離開紅四軍。前委根據毛澤東個人的要求，批准他離開部隊去養病休息或到蘇聯留學（毛澤東曾提出要赴蘇留學）。

七月八日，毛澤東、賀子珍和蔡協民、曾志、江華一行，離開龍岩城，前往上杭蛟洋休養。

三、患難見眞情　毛林情深

朱毛紅軍在閩西、贛南的勝利，震動了南京。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蔣介石下達了第一次會剿朱毛紅軍的命令，由金漢鼎為總指揮。這次三省會剿的兵力，閩省七個團，贛省四個團，粵省三個團，共兩萬餘人。

七月二十九日，紅四軍前委朱德、陳毅等人由新泉趕到上杭的蛟洋，同在那裏的毛澤東一起舉行了前委會議。經討論，決定第二、三縱隊由朱德率領，向閩中出擊，第一、四縱隊留在閩西活動。為了縮小目標，紅四軍領導人都化了名，朱德仍用王楷，毛澤東用楊子任，林彪則化名為陳韶。會議還決定根據中共中央四月五日來信中提出：「派一得力同志來中央報告與討論一切問題」的要求，陳毅提出要毛澤東與自己一起去，但毛澤東說不願意去住亭子間，像坐班房一樣憋悶。前委只好決定陳毅一個人去上

海。陳毅又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澤東面有難色地回答：七次大會那個和稀泥的作法，我不能同意。是非沒有分清，問題沒有解決，難以開展工作。我不能隨隨便便就回去。

毛澤東選擇到上杭養病，是因爲林彪率領的第一縱隊就在上杭活動。當國民黨軍隊逼近上杭後，毛澤東從蛟洋轉到蘇家坡。

蘇家坡雖然座落在深山幽谷之中，但距龍岩城只有一天路程，又是敵軍進攻的重點地區，不宜久留。林彪、傅柏翠與特委的幹部商量後決定，讓毛澤東化名扮裝成「教書先生」，轉移到永定的偏遠深山中隱蔽起來，繼續治病休養。

當時，毛澤東與賀子珍身上只有五塊大洋。林彪和傳柏翠商定：一縱隊從公積金項下支出二百元，四縱隊也從公積金項下支出一百元，送給毛澤東使用。但毛澤東只接受了林彪送來的二百塊大洋。當傳柏翠和譚震林帶着一百塊大洋來看望時，毛澤東說四縱隊家底也不厚實，說甚麼也不收。

毛澤東與賀子珍在蘇家坡只住了一晚，第二天，蘇家坡村蘇維埃政府就派出幾名赤衛隊員，用擔架將毛澤東轉移到上杭的大洋壩。林彪的第一縱隊隊部，就駐在大洋壩。隨後，林彪派出第二支隊黨代表粟裕率領一個大隊，護送毛澤東去永定，並指示粟裕要絕對保證毛澤東的安全。

粟裕帶着部隊用擔架抬着毛澤東，第二天從大洋壩出發，幾經輾轉，於八月二十一日轉移到永定縣城東面六十里的歧嶺鄉「牛牯撲」。

「牛牯撲」是永定金豐大山的一個深山溝，只住着赤衛隊員陳添裕一家人。陳添裕在這深山裏築了一座兩層土樓，取名「華興樓」。毛澤東和賀子珍就住在這土樓裏。

按照林彪的命令，粟裕所率領的大隊，就在永定活動，就近保衛毛澤東。而閩西特委和永定縣委又

令盧其中帶着兩個中隊的赤衛隊前來「牛牯撲」，協助粟裕負責毛澤東的安全。盧其中還遵照張鼎丞等人的指示，選派縣委幹部熊炳華專門擔任聯絡並負責採買物資，協助陳添裕照料毛澤東的生活起居。

在林彪等人的悉心關照下，毛澤東儘管離開了紅四軍，但其生活和安全，都得到周祥而特殊的照顧。

不久後，敵情日緊，陳添裕等人在離牛牯撲三公里之外的青山下，搭了一座竹寮。屋裏的桌凳用具，也全是竹製的。毛澤東和賀子珍便被轉移到這座竹寮中。

竹寮處於一片茂密的竹林中，周圍荒無人煙。賀子珍面對滿目的古樸蠻荒景象，不覺深感寂寞，然而毛澤東卻說：「好地方！古人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使人俗」。毛澤東還親筆寫了一塊「饒豐書屋」的牌匾，掛在門外。

此後，毛澤東便在這座竹寮中服藥、看書，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賀子珍說：「看來你是想在此深山隱居了。」

初秋時節，深山風寒。毛澤東患的瘧疾又復發了。粟裕得到報告，與張鼎丞商量，找了一名可靠的中醫前來爲毛澤東把脈診治。服過幾貼藥後，毛澤東的病情有了好轉，但他的行踪卻暴露了。

九月十七日清晨，岐嶺方面傳來陣陣槍聲。金豐民團和廣東大埔保安隊四百餘人，分數路向牛牯撲撲來。

粟裕一方面率兵抵抗敵人，一方面要中共岐嶺支部書記陳兆祥派出陳添裕等四位赤衛隊員，火速護送毛澤東轉移到雨頂坪村。

從青山下到雨頂坪，有十里山路，陡峭崎嶇。當時賀子珍懷有五個月的身孕，行動不便，而毛澤東

大病初癒，體弱無力，爬上山路不久，就氣喘噓噓，邁不動步子了。陳添裕急得滿頭大汗。

槍聲越來越緊，也越來越近。情況越來越危急。情急之下，年輕力壯的陳添裕背起毛澤東就往山上跑。毛澤東身材高大，山路又難行。走不多久，陳添裕也累得直喘粗氣，兩人的汗水粘在一起，將衣裳都打濕了。

山下的敵人越衝越近了。陳添裕慌不擇路，急忙往前跑，鞋子跑丟了也顧不得拾。腳被利石刺破，血漬斑斑。當陳添裕將毛澤東背到雨頂坪村時，剛放下毛澤東，自己便昏倒在地上，他全身不但被汗水濕透，而且雙腳上滿是荊刺和石刀劃破的傷口，鮮血直流。

毛澤東說：「多虧了牛牯撲的同志」。毛澤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除了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時被捕的那次外，這一次便是最危險的一次。毛澤東沒有忘記陳添裕。二十四年後，一九五三年國慶節前夕，毛澤東從北京去電邀請陳添裕赴京觀禮。可惜陳添裕剛好妻子坐月子離不開，只好委托弟弟陳奎裕代爲赴京看望毛澤東。

牛牯撲歷險後，林彪便將毛澤東轉移到合溪，住在一幢名叫「師儉樓」的土樓裏。吸取牛牯撲的經驗教訓，這次林彪下令將保密工作加強，除了與交通員單線接觸外，其他人不知道，也見不到毛澤東。毛澤東與賀子珍眞正過着與世隔絕的、隱居的生活。

毛澤東「隱居」，惹來了許多揣測，國民黨的報紙出號外，說「匪首毛澤東被擊斃山中」。

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看到敵人的報紙後，也眞以爲毛澤東犧牲了。竟然爲毛澤東出「訃告」，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刊載於共產國際辦的《國際新聞通訊》上：

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在福建前線去世。毛澤東同志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最害怕的仇敵。自一九二七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以重金懸賞他的頭顱。毛澤東同志病情不斷惡化而去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當然，毫無疑問，敵人會因此而感到高興。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正當毛澤東與賀子珍在深山中隱居的時候，朱德率領的第二、三縱隊在閩中縱橫馳騁，打破了敵人的三省會剿。後來，在大田戰役中失利，被迫退回閩西，與第一、四縱隊會合。之後，於九月二十一日攻打上杭，取得重大勝利。

而這時陳毅也去到了上海，與中共中央接上頭。

一場重大的歷史轉折，正在醞釀之中。

四、毛澤東復出　朱毛鬥爭落帷幕

陳毅經廈門、香港，輾轉來到上海，於八月下旬順利地與中共中央接上關係。

陳毅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匯報了紅四軍及「七大」的情況。李立三當年也是留法勤工儉學，與陳毅一同因革命活動而被法國政府押送回國。大家都是老朋友兼老戰友了。李立三聽畢匯報，表示他會盡快向中央政治局報告，並要陳毅寫下幾份上報的材料。

陳毅在旅館中閉門不出，埋頭苦幹。九月一日，陳毅寫完了李立三代表中央要求的五個書面材料：《關於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於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陳毅襟懷坦白，公正無私，如實地反映了朱毛及紅四軍的各方面情況。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出席的有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委員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會議由向忠發主持，由陳毅向中央作全面的口頭報告。

在這些匯報中，陳毅的意見是「毛可先走」。陳毅說：「代表大會決議案主張兩人都離開，但事實上朱去指揮上困難」，「朱去軍長代替人難」。「毛的信仰差」，「毛繼續工作不大好」，「政治上中央派去人無問題，內部提一人出來難」。在上交給中央的《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中，陳毅寫道：「對朱、毛去留的意見：（一）在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擔任他兩個的工作，則兩人同時可以離開。（二）、如不能同時派出兩人去，則先派一人去任前委書記，毛可先走，朱可暫留工作」。陳毅還說：「在大會之後，朱方面還沒有甚麼意見，毛方面則不滿意，有不能一朝之概。所以代表大會並沒有把問題徹底解決了，所以朱毛爭論以後不能恢復工作如初，還靜待中央派人去主持。」

陳毅主張毛澤東先離開紅四軍，主要是從毛澤東的思想品德方面來考慮。在匯報中，陳毅雖然一再說毛澤東政治上強，工作能力較朱強，政治分析大體是不亂的。但陳毅也着重指出了毛澤東思想作風的嚴重缺點，如在報告上寫着毛澤東「喜歡攬權」，八月二十九日的口頭報告中說「許多同志對毛恐懼，養成了毛專斷的毛病」。

改變陳毅的思想，改變毛澤東命運的人是周恩來。

從八月底起，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和李立三與陳毅一起討論和研究紅四軍和朱毛的問題。

原來，在陳毅到來之前，中共中央專門討論過紅四軍及其「七大」的問題，並委託周恩來去信紅四軍。周恩來的信是八月二十一日發出的。周恩來將底稿拿來給陳毅看。周恩來的信便成爲今次討論的主導思想。

周恩來的信中說：「在大敵當前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你們應指出紅軍中黨的生活之正確路線，號召全體同志消滅一切糾紛，一致地擁護此正確路線向着敵人奮鬥」。「紅軍不僅是戰鬥的組織，而且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每一個紅軍士兵都負有向群衆宣傳的責任，整個紅軍的游擊，更充分負有發動群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誰忽視了這一點，誰便要將紅軍帶向流寇土匪的行徑。」

周恩來支持毛澤東的「紅軍除了打仗消滅敵人，還要花大力氣做群衆工作，打仗的時間與做群衆工作的時間是一與十之比」的觀點，而不同意朱德的「部隊主要是打仗，敵人打退了，消滅了，部隊可以抽一些人協助地方黨做群衆工作」的觀點，即「單純軍事觀點」。

周恩來說的「流寇土匪行徑」，二十八團就存在。「八月失敗」打進郴州，二十九團官兵大發洋財，搶了許多錢財什物，準備帶回去給老婆孩子。二十八團發洋財的本事比二十九團還要厲害，林彪就搞了一百多塊銀元。

周恩來的信中還批評了「七大」在組織路線上的缺點是「對於集權制沒有勇敢回答他是目前與敵人肉搏的環境中所絕對必需的，而同時又沒將『黨管一切』之不妥當的涵義與解釋，給以恰當的批評」。

在討論中，周恩來說：「楊殷同志（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被捕前在八月十三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給

紅四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集權這一點特別要指出在軍隊中應該如此』。我把他的意見也寫上了。軍隊只能集權，才能行動敏捷，步調一致，便於行軍作戰。你們去年湘南失敗，就和放任讓群衆自由討論有關」，「前委一定要集權。軍隊行動的方向決不能由大家任意討論，而且前委還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一個能把正確意見集中起來的書記。他當然要比別人多負點責任。這絕對不是家長制」。

陳毅認爲，這在實行中會產生許多矛盾，軍長既是一軍之長，軍事指揮員的權力不能因爲書記要多負責任而削弱。紅四軍過去主要在這些問題上處理不好。

周恩來說：「這就是『黨管一切』的毛病了！黨應該領導一切，但不宜說『管理一切』。大權要集中在前委。前委應該通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通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

周恩來的意見是代表中共中央的，陳毅也認爲有道理，但他還是覺得，在「集權於書記」與「家長制」、「獨裁」之間，很不容易區別清楚。尤其「只要毛澤東在當書記，不管你文字上怎樣規定，他還是實行『黨管一切』。」而在中國這樣封建宗法思想和小農經濟特別廣泛的國家，如不注意反對家長制，個人專制終有一天會害黨害軍。

在討論到紅四軍的組織問題時，李立三開門見山，主張仍由毛澤東任前委書記，朱德仍任軍長，原班人馬不動，只把劉安恭調回中央。

陳毅認爲：毛澤東堅持的，大部分正確，而且別開生面，爲中國革命闖出新路。但在組織上，擔心他搞不好團結，他的爲人……我在匯報時都說了，個個怕他。這次代表大會沒有選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很多人把他與朱軍長一比，當然是朱德更得人心。毛澤東人事關係已搞壞，很多人不會接受。

周恩來說：「你匯報時說，『七大』結束後，毛澤東說大會對他的批評『完全是倫理觀念』，是

吧？對一個政治家如何認識？」

按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於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主要看他的思想和實踐活動對推動社會前進，對發展社會生產力起到甚麼作用，而不是看他在倫理道德方面有甚麼優缺點。周恩來和李立三批評「七大」不是主要看黨的負責同志奉行的政治軍事路線對革命起了甚麼作用，而是集中更多注意力批評個人的意識、作風、態度。這無助於分清是非。

陳毅最後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見。但他還是憂慮：在反對「偏於軍事觀點」時，在執行時會產生「偏於政治觀點」，把政治問題夸大；在政治與「倫理觀念」之間，如果個人的道德、品質、作風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民主，妨礙團結，使革命隊伍離心離德，許多人變成唯命是從，甚至拍馬奉承，造成政治腐敗，反過來又是政治問題！

對於陳毅的這些憂慮，周恩來與李立三認爲，那是在今後的實踐中鍛煉和掌握的問題，目前急需解決的，是紅四軍領導人的人選，而毛澤東是最適當的。周恩來還說：他相信，這樣一位同志，身負重擔，面臨大敵，是不會不注意改進自己的思想作風的。

周恩來與李立三對毛澤東的了解，是表面的，膚淺的，並沒有陳毅那種深刻的認識和感受。對毛澤東來說，「集權」，「偏重政治」、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實行強有力的政治領導，這些都不成問題。毛澤東的缺點、弱點、也就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陳毅擔憂的那幾個方面的問題。以周恩來爲代表的中共中央，在處理紅四軍的問題上，雖然也批評了「黨管一切」，批評了毛澤東的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但強調得不夠，尤其沒有強調在「集權」與民主之間，在政治與軍事（業務）之間，在政治素質與個人品德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互相制約，不使一方壓倒另一方。也就是說，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情況

下，爲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在這些十分複雜而又容易混淆的問題上，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強調了「集權」和「偏重政治」這些方面，而沒有強調（或強調得不夠）需要全面地、辯證地理解和執行這些方針，更沒有建立有效的機制去檢查和監督如何全面地執行這些方針。

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漏洞和缺陷。毛澤東是個專制而「攬權」的人，個人的思想作風和道德品質又存在許多不良傾向。中共中央採取這種方針，等於默認和鼓勵、慫恿毛澤東的這些作法，在其後的漫長歲月裏，毛澤東在這些方面的錯誤，不但沒有得到如周恩來所希望的那樣的改進，而且變本加厲，只是在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下，時而隱蔽，時而露骨，時而收斂，時而放縱。例如，在政治與軍事這對矛盾中，自從毛澤東復出，紅四軍「九大」（即古田會議）召開後，批判單純軍事觀點和單純業務觀點，在中共黨內，逐漸地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在戰爭年代，由於有強大的敵人存在，軍事佔有重要地位，誰也不敢過分輕視。可是到了建國以後，在和平建設時期，政治就越來越膨脹，從「外行領導內行」，到「政治掛帥」、「突出政治」，政治成爲壓倒一切，而業務則被壓低到從屬的、可有可無的地步。一九六四年，陳毅的二兒子陳丹淮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回北京探親時問陳毅，到底是又紅又專對還是「四個第一」對？陳毅反問：現在你們學校是不敢紅還是不敢專？丹淮說：當然是不敢專。陳毅說：你要記住，現在我們黨需要科學技術就像一九二七年我們黨需要一支強大的軍隊一樣！

在「黨管一切」、「家長制」、「書記專政」等這些問題上，後來在中共黨內、紅軍內、新四軍內都成爲大問題。一直到「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身上的這些毛病就發展爲影響到全中國的大浩劫、大災難。正如鄧小平所說：「從一九五八年批判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

象，不斷滋長」。而這一切的根源，便是一九二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決定。

根據周恩來的委托，陳毅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九月來信」分「目前軍閥混戰的形勢」、「紅軍的根本任務與其前途」、「紅軍發展方向及其戰略」、「紅軍與群衆」、「紅軍的組織與訓練」、「紅軍給養與經濟問題」、「紅軍中黨的工作」、「朱毛問題」、「紅軍目前的行動問題」等九個部分。在關於革命形勢、紅軍的任務、紅軍的建設、黨的組織等這一系列問題上，「九月來信」均做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只要比較一下，便可發現，「九月來信」要比毛澤東六月十四日給林彪的信，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也更詳細、全面，更加系統化，更有理論深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陳毅，猶如站在高山之巓，視野更加廣闊，看問題也更加深遠。這些都是毛澤東所不能比擬的。更加重要的是，毛澤東看問題，帶有很多的私人偏見，私人的恩怨，帶有濃厚的偏激的色彩，加上他當時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並不高，因此使他的一些觀點，不能昇華爲普遍的眞理。這些方面，「九月來信」都超越了毛澤東。

例如，對紅軍的使命，「九月來信」說：「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毛澤東從未有這樣深刻的概括。周恩來在一九四四年曾說：「在『六大』那時候……關於把工作中心放在農村，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來領導農民游擊戰爭，我認爲當時毛澤東同志也還沒有這些思想，他也還是認爲要以城市工作爲中心的。開始他還主張在閩浙贛邊創造蘇區來影響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給林彪的信中（指一九三〇年一月的信）才明確指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爲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農村爲中心。」

周恩來在這裏說的「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原文是「無疑地它是促

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並無「最」字，「最」字是後來發表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時才加上去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另一句：「……才能眞正的創造紅軍，成爲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在原信中則是：「……成爲將來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並非「主要工具」。

其實，毛澤東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給林彪寫信時，其思想還未完全從「以城市爲中心」轉變到「以農村爲中心」。周恩來說的是客氣話。毛澤東並非從來就正確。

「九月來信」對朱毛的爭論作了結論：「至於紅軍是否應該固守一個地區的割據……紅軍應是採取經常游擊的政策，若停留在一個地區，或固守一個地帶，求其繼續存在，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於失敗。過去羅霄山脈政權的經驗告訴了我們」。「總之農村的政權或游擊隊應該是一個鬥爭的單位，實行游擊四向發展的策略，保守必然要失敗。反之預定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的決定，也是錯誤」。

「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政權」是毛澤東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提出的。儘管中央「九月來信」已做了批評，但毛澤東根本不承認錯誤。在一九三〇年一月給林彪的信中還批評林彪認爲「一年內不可能奪取江西全省政權」，是對「革命前途悲觀」。

對「黨管一切」，「九月來信」說：「黨管一切這口號，在原則上事實上都是不通，黨只能經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目前前委指揮軍部、政治部這是一個臨時辦法。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前委應着眼在紅軍的政治軍事經濟及群衆鬥爭的領導上」。

「黨管一切」本是朱毛爭論中的核心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可是，由於陳毅認爲周恩來八月二十一日的信中已講清楚了，爲免增加新的麻煩，陳毅有意地避開了這一敏感而重要的問題，在「九月來信」中只是點了一下，並沒有充分展開。

至於「家長制」和「書記專政」等問題，陳毅也有意地避開了。「九月來信」雖對「朱毛工作方法上的錯誤」作了批評，但明顯地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儘管「九月來信」存在不少缺點，但在當時，是紅軍建設，也是黨的建設的綱領性的文件。在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時，《古田會議決議》被捧爲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件，那是妄顧歷史事實的虛誇之詞。「古田會議」是在「九月來信」的指導下召開的，而《古田會議決議》也是在《九月來信》指導下產生的。捧「古田會議」而棄「九月來信」，是本末倒置。

在陳毅去上海期間，朱德代理前委書記，曾於十月召開了紅四軍「八大」，但結果不理想，會上，林彪等人提出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但毛澤東耿耿於懷，回信說：陳毅要他當八面玲瓏的觀世音菩薩，他做不到。他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不打倒陳毅主義不能回來。

陳毅是在十月二十一日與朱德率領的紅四軍會合的。回到閩西後，陳毅將中央的「九月來信」及自己的一封親筆信，送去給毛澤東。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秋的陪同下，結束了在深山中的「隱居」生活，心情舒暢地回到紅四軍所在地汀州。毛澤東向朱德、陳毅等人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央的批評，願意回前委工作（擔任前委書記）。陳毅向毛澤東介紹了上海之行的詳情。朱德則誠懇地說了對部隊極端民主化的感想，認爲部隊組織松懈確實是個問題。而毛澤東也說在「八大」時由於身體不好，情緒也不好，在信中說了些傷感情的話，他已撤銷了這封信。

於是，毛澤東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給中央及李立三（李立三托陳毅向毛澤東問候）的信中說：「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紅四軍「九大」會議，在上杭的古田村廖氏宗祠召開。

對於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澤東仍然是有選擇地、片面地執行的。對中共中央提出的不利於自己的批評，如「黨管一切」、「固守一區域割據」，「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等，在「古田會議」上完全避而不談，而只講針對朱德、陳毅等人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等等，並且大講特講。因此，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出現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中，被認爲是「建黨建軍的綱領」的《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章節。而如何在紅軍中正確地實現黨的領導這樣的重大原則問題，在這個「綱領」中卻一字不見。

「九大」以後，朱毛鬥爭告一段落。然而毛澤東的思想作風並沒有改變。由於有了中共中央的批評，又是處在戰爭的年代，毛澤東稍有收斂。後來在五十年代，毛澤東的這些缺點惡性膨脹，造成千古劫難，這是後話。

第三篇

林彪——最值得研究的人

「林彪是個極其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中國作家官偉勛說。

林彪是個最神密的人——「這是一個黨史軍史少了他，有的史實就會講不明白，就會出現空白，就會留下問號，進而愈發挑逗起人們的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這是一個不時要面對，又不敢面對，竭力要迴避，又很難迴避（看着好像也挺容易），輕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淺不得，稍不謹愼就要引起麻煩，已經死去快二十年了（至本書結集時已二十五年），依然異常敏感的人；

「這是一個人們私下裏有不少議論，據說世界上也有不少傳聞，而今逐漸開始比較客觀公正地放到歷史天平上的人；

「誰都知道，這個人的名字叫林彪」—中國作家張正隆這樣說。

林彪之所以顯得如此神密兮兮，一方面是由於中共當局一手造成的。在毛澤東被捧爲中國第一號神的同時，林彪也被捧爲中國的第二號神。但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之後，林彪在一夜之間便變成中國最大的鬼。這種巨大的反差不但億萬的老百姓費解，就連毛澤東自己也不明白，不瞭解。更由於林彪與毛澤東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官方千方百計進行掩飾，於是林彪連同整個事件被蒙上了神密的面紗。

另一方面，林彪本身是個矛盾的聚合物。他的思想、言行在公開的場合與在私底下裏的天壤之別，被形容爲「當面是人，背後是鬼」，不但普通人難以理解，連熟悉林彪的人，也感到疑惑與迷惘。許多林彪當年的老戰友、老部下，在談到林彪時往往說：

「林彪這個人我講不清，你也寫不清」。

有的人又說：「眞要講起來，誰都不能信」。

有的還說：「他後來怎麼變成那樣子，我可不知道」。

就連從一九三二年開始，直到文化大革命，長期在林彪身邊工作的蘇靜中將，在被問到林彪時，也說：「林彪這個人很難說清楚。」「恐怕一時講不清楚」。

作家官偉勛說：「在一些最重大最本質的問題上，他在表裏兩個方面的反差之大，是驚人的，是舉世罕見的」，「要眞正說清楚（林彪）這個人，需要把他的某些外表現象與某些本質結論中間的一大塊空白填補之後才能做到」。

「九・一三」事件後，官方將林彪說得十惡不赦、一無是處。可是林彪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林彪絕不像官方所說的那樣。並表示，他們有許多話要說。

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林彪恐怕是一個最神密、最值得研究的人了。

第一章 一代名將

一、「戰將」

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林彪在接見解放軍總政治部的一批幹部時說：「我這個人是搞軍事的，一向分工抓軍事工作。但是，我的興趣是搞政治」。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後，林彪在政治上處於顛峯時期。林彪講這番話時，有些得意忘形。其實，在林彪的一生中，他的主要活動，他的主要功績，是在軍事方面，林彪是作爲一員戰將而名垂青史的。這是他的前一部份。

一九八五年春季，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百科全書編輯室將《林彪》條目釋文送呈給中共元老黃克誠大將審查時，黃克誠對林彪的評價問題，發表了長篇的談話。黃克誠批評了採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來評價歷史人物，某人當紅時，就甚麼都好，一點缺點錯誤都沒有，也都提不得；一旦當黑，就一無是處，把他的歷史功績也一筆勾銷。黃克誠說：

你們寫人物誌，要學習司馬遷，他在史記裏寫了一大群歷史人物。你們現在要用歷史

唯物主義的觀點，用歷史學者的態度，去評價歷史人物。不要用過去黨內鬥爭中開鬥爭會的那種過火的語言，揪出一個人就把他的歷史功績一筆勾銷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兩面，要全面的觀察，作出全面的評價，寫出歷史的真面貌。不要受『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傳統説法的束縛，要打破這個束縛。

林彪在我軍歷史上是有名的指揮員之一，他後來犯了嚴重的罪行，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這是罪有應得。但是在評價他的整個歷史時，應當分爲兩節，一節是他在歷史上對黨和軍隊的發展、戰鬥力的提高，起過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後來對黨、國家和軍隊的嚴重破壞，造成了極爲嚴重的後果。這樣，兩方面都寫明確，不含糊，才符合歷史事實。

在這條釋文中，你們寫了林彪在歷史上擔任了甚麼職務，這是必要的。但是在擔任這些職務時，他指揮了很多戰鬥。據我瞭解，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中央根據地指揮中央紅軍作戰時，他們手下有幾個著名的戰將，一個是彭德懷，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黃公略。伍中豪同志犧牲得早，一九三〇年就犧牲了。黃公略也在一九三一年犧牲了。紅四軍是毛主席、朱總司令創建的。成立紅一軍團後，紅四軍就是林彪指揮，他是紅四軍軍長。開始時一軍團三個軍，紅三軍軍長是黃公略，紅十二軍軍長是伍中豪，後來是羅炳輝。在這三個軍中，戰鬥力最強的是紅四軍，戰功最大的是紅四軍。據我瞭解，林彪的確有指揮作戰的能力。他生前我是這麼講，他死後我還是這麼説。有人説林彪不會打仗，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不符合歷史事實。

在土地革命時期，他先當連長、營長、縱隊司令，以後當紅四軍軍長。在毛主席、朱

總司令領導下，他指揮了不少戰鬥，在我們軍隊中，他可以說是一位戰將。要承認這個事實。一軍團在我國革命歷史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打過很多仗，在一軍團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部隊也很多。當然主要是毛主席、朱總司令領導的，後來林彪是軍團長。在寫這一段時，我想可以寫他指揮過紅四軍、紅一軍團，在一至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他指揮了渡烏江、臘子口等戰鬥。在廣西全州戰役中，他在前線指揮一軍團和三軍團一部分作戰。那時我是四師政治委員。我帶部隊到全州地區時，他指揮我們。我親自找了他，他告訴我部隊怎麼擺法。土城戰鬥是他指揮的，不過那次戰鬥沒有打好，沒有消滅敵人。總之，他是有戰績的。

在抗日戰爭初期，林彪指揮了平型關戰鬥。平型關戰鬥的勝利，對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日信心，樹立八路軍在全國人民中的聲威有重大作用。這個戰鬥是林彪和其他同志一起指揮的。他是一一五師師長，聶榮臻同志是副師長，羅榮桓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不過主要指揮還是他。毛主席、朱總司令當時都不在前線。後來有人說，平型關戰鬥打錯了，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當然，平型關戰鬥一方面是勝利，另一方面也有教訓要吸取，就是同日本人作戰，當時按照毛主席的方針，是不能硬拚的，盲目地拚會把我們的老部隊拚掉，當時我們沒有多大的本錢。但是這個戰鬥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有很大的影響和意義，這是不能否定的。

解放戰爭時期，一九四五年冬我們進軍東北的部隊是十萬多人，經過三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部隊進關時是一百多萬人。帶十萬人進去，帶一百多萬人回來，建立了東北那

麼大的解放區。當然，這不是林彪一個人的功勞，這是整個東北局和東北部隊指戰員和東北人民的功勞，但是林彪是主要負責人，也不能抹煞這一點。不然外國人會說我們寫歷史不顧歷史事實。在《林彪》這條釋文中，對他的成績也需要寫具體一點，概括地寫幾句話。譬如，他與陳雲、羅榮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領導了東北的解放戰爭，解放了整個東北，後來進關指揮了平津戰役，解放華北，以後又進軍中南，直到中南地區全部解放，他才回來休息。總之，對他歷史上的成績也要概括地點出來。

關於林彪在過去歷史的錯誤，我不知道你們寫其他人的時候，像這類的問題是不是都寫上。譬如，林彪寫信給毛主席，提出「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我考慮，如果其他人的條目釋文中像這類問題都寫，《林彪》這一條也可以寫；如果在其他人的條目中這類問題不寫，對林彪也不要那麼苛刻。在我們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沒有錯誤的人是沒有的，沒有講過錯話、沒有做過錯事的，恐怕一個也找不出來。毛主席也犯過錯誤嘛。像這類歷史上的問題，如果其他人的條目中不寫，《林彪》這一條也可以不寫。如果要寫，也要在肯定他在歷史上的成績之後，再提到他在歷史上也提過錯誤的意見。至於他後期的問題，屬於另外一個性質，那不是錯誤，而是嚴重的罪行。他坐飛機外逃，機毀人亡，身敗名裂，自己給自己作了結論，這要嚴肅批判，當然也是按照歷史事實表述出來。總起來說，我的意見就是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用歷史學者的態度，來寫林彪的歷史，好的，壞的兩方面都寫，不要只寫一方面。

曾經擔任過中國國家主席的楊尙昆，在《紅軍長征》、《八路軍》、《新四軍》史料叢書編纂工作會議上也說：

對於歷史人物，我們要客觀地評價。比如，我們軍隊的兩個元帥，一個是彭德懷，從盧山會議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把彭德懷說得一無是處，但歷史上的彭德懷並不是這樣的嘛。另一個是林彪，他最後走上了叛國的道路。但不能因爲他叛國，就對他一概否定，而不作全面的、歷史的評價。林彪在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打日本，特別是在東北解放戰爭中，還是有功的。陳雲同志在談編寫《遼瀋戰役》一書時曾指示，對林彪還是要實事求是地寫。我們對待歷史人物，不能因爲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一切，也不能因爲一個人一時正確就寫成一貫正確。

黃克誠與楊尙昆的講話，基本上概括了前期的林彪：中共的一員戰將。

在衆多的紅軍部隊中，爲甚麼「戰鬥力最強的是紅四軍，戰功最大的是紅四軍」呢？除了種種的客觀原因之外，林彪的領導和指揮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紅四軍中，團（後來是縱隊）是個相對來說獨立性較大的作戰單位。林彪自從出任二十八團團長、後來改編爲第一縱隊司令後，在軍事指揮上的獨立自主權力增大了，爲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創造了一個活動的舞台。而紅四軍自從脫離井岡山那狹小、固定的區域，挺進到廣闊的贛南、閩西之後，採取廣泛的游擊戰術，作戰頻繁，爲林彪發揮自己的軍事才幹創造了許多的機會。更重要的

是，還有毛澤東的處處關照提攜。「時勢造英雄」。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林彪都佔有了優勢。

受時勢影響的另一個例子是粟裕。這位指揮過淮海戰役，後來被授予大將軍銜的將領，也是中共著名的一位戰將，他的軍事指揮才能，與林彪不相伯仲。南昌起義時，粟裕是名戰士，起義失敗後，在轉戰贛南之時，粟裕被委任為連黨代表，當時林彪是連長，兩人平級。然而，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粟裕的運氣和際遇，就比不上林彪——粟裕沒有毛澤東那層人事關係。於是，林彪昇為二十八團團長，而粟裕到挺進閩西後才被昇為林彪領導下的第一縱隊中的第二支隊黨代表，獨立自主的權限就小得多了。粟裕的軍事指揮才能，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才開始得到充分的發揮。

值得一提的是，林彪軍事才能得以發揮，是朱德和毛澤東為紅軍制定了一條「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紅色武裝割據」的革命路線，確立了無產階級的建軍路線，創立了游擊戰的戰略戰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在這些符合中國當時實際情況的、正確的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導下，林彪的軍事指揮才幹始得以發揮。一旦脫離和違背了這些正確的原則、規律，林彪的軍事指揮才能也就不能發揮作用。例如一九三〇年李立三路線指導下的攻打長沙，就是一個失敗的戰例。第五次反圍剿，由於放棄了正確的游擊戰的十六字訣，而採用了李德的陣地戰，「拒敵於國門之外」等等，使得包括林彪指揮的第一軍團在內的紅軍，都遭受到慘重的失敗。

早在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時期，林彪的軍事指揮才能，曾像火花一樣，一閃而現。真正得到發揮和展露的，是在江西蘇區，一九三〇年的第一次反圍剿以後。在一至三次反圍剿鬥爭中，林彪領導的紅四軍，作為紅軍的主力，參加了所有的重要戰役，並且幾乎戰戰擔任主要的作戰任務。林彪的軍事指揮藝

術，在實戰中得到充分的鍛煉，獲得長足的提高。到一九三三年的第四次反圍剿，林彪的軍事指揮才能臻於成熟，其標誌就是他所指揮的黃陂、草台崗之戰。尤其是黃陂伏擊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所打的規模最大、勝利最輝煌的一次戰役。是役，林彪指揮的紅軍，數量達五萬多人，全殲敵人兩個現代化整師，計兩萬多人。在這次戰役中，林彪在戰術運用上的正確巧妙，布陣方面的細緻、周密，戰場指揮中的冷靜、靈活，都臻於無懈可擊，頗具大將風度。林彪成爲紅軍中著名戰將的地位，就是在這時確立的。

在長征中，林彪指揮紅一軍團，在強攻大渡河，飛奪瀘定橋，以及在臘子口、直羅鎭戰役等，都有出色的表現。

在解放戰爭時期，在黑土地上，林彪的軍事指揮藝術處於巔峯狀態。不但揮灑自如，出神入化，而且在軍事理論及戰術原則上有獨特的創造，提出了「六項戰術原則」。在中共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中，這是十分突出的。林彪領導的第四野戰軍，成爲全國四個野戰軍中人數最多、規模最大、裝備最精良、參加的戰役最多、消滅的敵人也最多，因而戰功也最大的一支隊伍。

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共擬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率領志願軍赴朝作戰的統帥，毛澤東心目中的第一個人選，便是林彪。

二、善於帶兵

林彪對部隊管理嚴格，重視軍紀，重視和善於操練，很會帶兵。他帶領的部隊，紀律嚴明，步調一致；由於重視操練，整個部隊的精神面貌良好，軍容整齊，戰鬥力強，具有一種正規部隊的素質。

在井岡山上，紅四軍內的各支部隊之間向來存在着隔閡。其中的原因，除了朱德和毛澤東、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這些因素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各支部隊的素質參差不齊。二十八團一上到井岡山，就以一支正規化軍隊的姿態出現，與其他的部隊相比，猶如鶴立雞群。四月底上山，在五月二日的反國民黨進剿作戰中，就擔任主力。而且從此以後，一直在紅四軍中擔任主力部隊的重任。這種情況，使得紅四軍內的各支部隊，出現很大的差別。

林彪及其二十八團，看不慣懶散皮塌的二十九團，也看不慣華而不實的三十一團，認爲他們「善辭令，多刁滑」，嘴皮上能說會道，戰場上卻不見眞章。這種差別，是因爲二十八團的主帥是朱德、王爾琢、林彪，他們以「講武堂」、「黃埔軍校」那套正規化的操典來訓練部隊，重視軍事質素。而三十一團的主帥是毛澤東，他對帶兵打仗是外行，只知道「黨管一切」，「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支部建在連上」。因此，三十一團的政治質素可能不錯，但軍事質素卻比二十八團相差一大截，不得不稱二十八團爲「老大哥」。

蕭克將軍在回憶錄中說：林彪「平時注意訓練，管理也嚴格，臨陣有決心而且靈活。他喜歡讀兵

書，《曾胡治兵語錄》和張乃燕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他都讀過。他欣賞黃埔軍校的一套，對軍校的教程和條令都較熟。我們打下龍岩，繳到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二八年頒佈的軍隊操典。他看，我也看。他對我說：『這個操典好』。後來，選一部分由我刻蠟版，印發給大家看。他把幹部集合起來，自任連長操演。」

在當時，整個紅軍處於游擊戰爭時期，軍紀、軍容、操練、訓練，一切都是「游擊式」的。毛澤東只知道牢牢地控制紅軍的領導權，只知道「黨管理一切」，很少注意軍隊的正規化建設。在這種大氣候下，林彪如此注意部隊的操典，注意部隊的正規化訓練，而且身體力行，努力不懈。這在當時汪洋大海般的「農民游擊」習氣中，顯得十分突出，猶如「萬綠叢中一點紅」。

林彪的不同凡響，就表現在這裏。

三、講究戰術謀略

林彪在作戰中，講究戰略戰術，不硬拚、死拚，不打笨仗、死仗，而是主張打巧仗，打活仗，力求減少傷亡和損失，以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

在土地革命乃至長征時期，彭德懷和林彪是毛澤東和朱德手下的兩員大將。紅一方面軍的總指揮是朱德，黨代表是毛澤東，紅一方面軍屬下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軍團長分別就是林彪和彭德懷。一位外國記者曾經這樣比較這兩位大將的風格：

彭德懷一生中說話坦率，不轉彎抹角。彭寫文章措詞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長，言詞誠懇而激烈，使人一聽就瞭解他的觀點。他的部下常說，「他和革命結了婚」。面對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厲聲斥責他們，響聲震動牢房的牆壁。「我甚麼都不怕」，他大聲吼着，「你們可以槍斃我，你們的末日不遠了。」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懷那樣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輕十歲，長得十分瘦削，他的臉是橢圓形的，膚色淺黑，顯得很清秀。彭經常和部下交談，而林卻同他們保持一段距離。對許多人來說，林似乎生性靦腆和含蓄。找不到稱頌他對部下熱情和愛護的故事。他在紅軍指揮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開口就是談正經事。

毛手下的高級指揮官雖然性格各異，但他們配合得很好。林彪善於聲東擊西和隱蔽自己，善於奇襲和伏擊，善於從側翼和敵後發起進攻和使用計謀。他的膽量和善用疑兵超過任何人。不過，據說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時才出戰。而彭德懷總是從正面進攻敵人，他打仗極爲勇猛，對手一次又一次被消滅。彭認爲打一場戰鬥，必須使得失相抵，或得大於失，要多繳獲槍炮，多抓俘虜，並更多地把戰俘轉化爲紅軍。這才算打好了仗。

在戰場上，彭德懷的特色是驍勇、剛猛，而林彪則是陰柔而辛辣；彭德懷喜歡從正面強攻敵人，林彪則喜歡更多的計謀和韜略；彭德懷是「兩軍相遇勇者勝」，突出一個「勇」字；而林彪的側重點主要是講究戰略戰術，利用天時地利及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把仗打的更巧、更妙，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突出一個「謀」字。

林彪曾批評和指責朱德和王爾琢作戰時不講究戰略戰術。論起使用謀略，打仗時的巧妙、機智，在林彪的心目中，連朱德、王爾琢這樣的大將，也還是稍遜一籌。

早在南昌起義後的會昌戰役中，林彪就靠採用正確的戰術而取勝。當時的敵人是國民黨的王牌部隊錢大鈞部，敵人又預先佔領了有利的制高地。起義軍從正面強攻，多次失敗。起義軍指揮部將遲到的林彪的部隊投入戰鬥。林彪上到前線觀察，發現敵人的防守正面強而兩側弱。於是採取了避強而擊弱的策略，從側翼進攻，利用一條乾水溝隱蔽地將兵力運送到敵人的眼皮底下，才突然發起攻擊。結果奏效，將敵人打敗。

從那以後，林彪對謀略就更加情有獨鍾。他利用各種機會，努力閱讀各種兵書，學習、鑽研兵略。此後，林彪對各種謀略的使用越來越嫻熟，其規模也越來越大，效果也越來越好。

長征途中的臘子口戰役，可以看出林彪「智取」的風格。

臘子口是進入甘南地區的險道要隘。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決裂了，又已經過了草地。如果臘子口打不開，中央紅軍南不能返回，向北又走不過去，將處於進退不得的困境。

毛澤東將攻打臘子口的戰鬥任務交給了林彪。林彪將任務交給了紅二師四團，團長是王開湘，政委是楊成武。由於事關重大，林彪和聶榮臻冒雨趕到臘子口，親自視察戰場。

從山下往上看，臘子口寬約三十米，兩邊是懸崖陡壁，無路可通。山口下面的兩座山峯之間，是一條深不見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橫架一座木橋，把兩山連接在一起。這座木橋，便是通過臘子口的

唯一通道。難怪人們將臘子口稱爲「天險」。

國民黨爲了阻止紅軍北上，甘肅軍閥魯大昌在木橋和山口佈置了兩個營的兵力，橋頭上築有堅固的堡壘，密集的火力封鎖了整個橋頭、山口。山後囤積了大批糧草彈藥。距臘子口不遠的岷州城內還駐有強大兵力，隨時增援臘子口的守敵。難怪國民黨的守敵十分囂張地對楊成武率領的紅軍喊道：「你們就是打到明年的今天，也休想通過我們的臘子口！」

由於正面衝鋒道路狹窄，敵人設有嚴密的火力網，紅軍的兵力展不開，英雄無用武之地。如從正面強攻，不但損失慘重，也未必能湊效。在這種情況之下，林彪幫助四團確定了正面佯攻，由側面攀上懸崖峭壁，出其不意地向敵人進攻的戰術。

林彪說：「你們只要堅決這樣做，天險臘子口就一定可以突破」。林彪還咬着牙對楊成武說：「事關全軍命運，臘子口是座刀山，你們也要給我上。不然，我們還得退回去。」

林彪和四團制定的戰術一舉成功。臘子口天險被紅軍順利攻破。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得以到達陝北。

林彪善打「巧戰」的風格，從東北戰場上殲滅國民黨五十三軍第一一六師的戰例中，可見一斑。

那是一九四七年九月，韓先楚將軍剛到三縱就任司令不久，就接到了林彪的攻打中長鐵路線上的西豐、威遠堡地區五十三軍一一六師的命令。

這一仗怎麼打？司令員韓先楚與政委羅舜初之間意見不一。

羅舜初認爲：敵五十三軍三個師成犄角配置，一一六師居中，爲避免三面受敵，應先集中兵力殲滅西豐之敵，而後由東向西發展戰果。

羅舜初曾任八路軍總部作戰科科長，戎馬一生，主要是擔任軍事指揮，打過許多好仗，深得部隊信賴。所以當時三縱指揮部多數人同意他的意見，因爲這種打法比較穩妥，符合「不打無把握之仗」的要求。

韓先楚的主張是：採取「掏心」戰術，遠距離滲透奔襲威遠堡，打敵師部指揮中心，同時以部分兵力攻擊郝家店和西豐，爾後誘敵和迫敵突圍，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避免由東向西逐個打陣地戰，拖長時間，讓敵獲得集中兵力向我反擊的時間，形成對峙的局面。這是一個奇兵色彩極濃，風險也頗大的方案，一旦實施不好，很容易陷入敵人的包圍。

兩種意見爭持不下。最後，剩下司令員和政委唇槍舌劍，各抒已見，互不讓步。

三縱黨委決定將兩種意見同時上報「東總」，讓林總裁決。

林彪很快回電，同意韓先楚的意見。

戰役發展的結果，完全如韓先楚預見的那樣。十月一日，韓先楚率領主力奔襲威遠堡時，敵人毫無防備，正在室外出操跑步。敵師部被襲後向部隊求救，但郝家店和西豐之敵亦被襲，不能增援。僅一天一夜，一一六師全部被殲。一一六師師長劉潤川被俘後說：

「我估計你們要打，可能先打西豐，那裏有一個團防守，工事堅固，我不怕。也可能先打郝家店，你們進攻部隊被我們兩面夾擊，也不怕。萬萬沒想到你們直打我們師部，這一着太厲害了！」

毛澤東對林彪的軍事指揮的特色和風格，曾有過這樣的評語：

「又刁又狠。」

四、擅長伏擊戰

林彪最擅長的是伏擊戰。在井岡山和江西蘇區時期，紅軍打得最多的，是伏擊戰：在運動中選擇優良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將孤軍突出的敵人殲滅。

林彪較早時打的一場伏擊戰，是在湘南暴動時敖山廟之戰。林彪率領自己的二連，伙同二百名農民赤衛隊，將來犯的五百名敵軍誘入埋伏圈，然後乘敵人不備，發動突然襲擊，取得了勝利。

到了井岡山及挺進江西後，林彪參加、指揮的伏擊戰就越打越大了。著名的一九二九年二月的大柏地之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活捉張輝瓚、殲敵九千的龍岡之戰，一九三一年五月殲滅公秉藩的東固之戰，都是取得了輝煌勝利的有名的戰例。

紅軍在中央蘇區時期打的最大的一次伏擊戰，是第四次反圍剿時打的黃陂、草台崗戰役。戰役的全勝，使林彪善於組織大部隊、大兵團進行伏擊戰的才能，更為人們所佩服，「常勝將軍」的美譽也傳播遐邇。有一次，當林彪的老部下吳法憲向他請教作戰的要訣時，林彪不無得意地援引了黃陂、草台崗伏擊戰為例，對吳法憲說道：

我有「常勝將軍」的美名，這並不是我有甚麼特別的才能。事實上，我只有一種才能，我絕不把打贏一場戰役的機會搞砸，這個機會絕對不能放過。機會一旦失去，就永遠

不會回來。

而黃陂、草台崗戰役的關鍵，是紅軍和林彪極其準確把握住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稍縱即逝的一線機會。

一九三二年冬天，蔣介石調集五十萬人馬，分左、中、右三路大軍，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已被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逐離了紅軍的領導崗位，正在長汀的福音醫院休養。紅軍由朱德任總司令、周恩來任總政委，領導反圍剿的鬥爭。圍剿一開始，敵人主力齊頭並進，步步緊逼。紅軍在南豐城向守敵發起攻擊，但守敵陶峙岳部依城憑堅固守，紅軍失利。後來紅軍改變戰略，採取了「敵進我退」的游擊戰的戰術，大步撤退，誘敵深入。敵人果然中計，三路大兵，氣勢洶洶地向紅軍撲來。

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紅軍總部發現敵軍第一縱隊的第五十二師和第五十九師在運動中孤軍深入，而且，在開往黃陂途中，被一脈高聳綿亙的大山—摩羅嶂，將這兩個師隔開，使他們之間的聯繫和協調都極爲困難。紅軍總部立即抓住這一稍縱即逝的良機，決定吃掉這兩個師的敵人。紅軍採用了大兵團的伏擊戰，集中了紅軍的主要兵力達五萬人，隱蔽在東陂、黃陂、東坑嶺、固崗、登仙橋一帶，準備迎擊敵人。

二月二十六日，紅軍總部作了最後的部署：紅軍主力編成左右兩個縱隊，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和紅二十一軍爲左路縱隊，由林彪、聶榮臻統一指揮，進至黃陂一線設伏，擔任主攻任務；右路軍由紅五軍團、紅十二軍、紅二十二軍組成，負責阻擊敵人和掩護紅軍的右側。

林彪作爲這次戰役的戰場最高指揮官，與彭德懷、董振堂等人商量後，決定左路軍以平行路線，隱蔽接敵，準備以伏擊、側擊、兜擊等手段，從左至右逐次消滅敵五十二師、五十九師。大家約定，以林彪打響的槍聲爲總攻擊信號。

二月二十七日，天下着濛濛細雨，而且大霧彌漫，好似第一次反圍剿活捉張輝瓚時的天氣。拂曉前，林彪、聶榮臻等率領全軍進入陣地，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也相繼進入陣地，隱蔽在叢山密林之中。林彪不放心，親自察看了十一師的陣地，發現該師西部的力量薄弱，便命令他們加強西面的火力。上午八、九點鐘，天放晴了，不一會，太陽露出臉來，霧散天晴，敵人也大搖大擺地走進伏擊圈。

首先進來的是敵五十二師。全師二個旅四個團毫無戒備地從林彪的指揮部前面走過。

「打不打？」參謀請示林彪。

林彪冷靜地說：「不打。等輜重部隊。」他判斷，敵人大部隊行動，不可能沒有輜重部隊。不出林彪所料，敵人的輜重部隊隨後走過來了。

「打吧？」參謀人員又請示道。

林彪仍是冷靜地說：「等護衛團。」

不久，敵人的後衛團也走過來了，就這樣，等到敵人全部進入了紅軍的伏擊圈，林彪才發出總攻擊訊號。頓時，平靜的山谷裏，幾百支衝鋒號一齊吹起，槍炮轟鳴，地動山搖，震耳欲聾。數萬紅軍如猛虎下山，將敵人的隊伍攔腰截成了幾段，被分割包圍。經過三小時的戰鬥，全殲敵五十二師，後又殲敵五十九師，活捉五十二師師長李明，俘虜一萬多人，大獲全勝。紅一軍團軍威大振。

黃陂大捷後，林彪又指揮了攻擊草台崗之役，殲滅和俘虜敵軍近四千人。

在黃陂、草台崗戰役中，林彪率領的紅一軍團擔任主攻，立下了殊功。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說：「紅一軍團在決戰方面作用很大」。林彪聽後，心中十分高興，但臉上只是淡淡一笑。完全是「喜怒不形於色」的儒將風度。

林彪運用伏擊戰，最出名的當然就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平型關戰役。

平型關戰役是一場中外聞名大戰役，也是一場地地道道的「硬仗」。林彪率領八路軍的主力第一一五師，在這場戰役中伏擊日軍，殲滅日板桓師團二十一旅團一千餘人。這是八路軍抗戰後的第一個勝仗，極大地鼓舞了八路軍和全國人民抗日的士氣。

當時，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已爲中共和八路軍制定下了抗日的戰略方針，基本上是獨立自主的敵後游擊戰，其戰術原則是山地游擊戰。而林彪的伏擊戰，是屬於運動戰，與毛澤東的指導原則是相違背的。那麼林彪爲甚麼要打這次仗呢？

原來，林彪在平型關看了地形之後，便說：「如果阻住正面路口，截斷敵人的增援，將部隊埋伏在公路兩側的山地裏，在缺口處的高地上設置重兵，公路上的敵人就是瓮中之鱉了」。所以林彪覺得這次仗好打，地形有利。而且在政治上「有一鳴驚人的效果。再抓一批俘虜，在太原游行擴大影響」。

關於決定平型關伏擊戰的詳情，聶榮臻有以下的回憶：

> 我見到林彪以後，告訴他部隊都帶上來了，問他前邊的情況怎麼樣。他說，敵人的大隊人馬正向平型關方向運動，這裏的地形不錯，可以打一仗。他攤開地圖，同幾位參謀一起，把平型關周圍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戰設想介紹了一下。問我的看法。我表示，可以在這

裏打一仗，居高臨下伏擊敵人，這是很便宜的事。我說，現在不是打不打的問題，而是要考慮怎樣打得好，這是我們同日本侵略軍的第一次交鋒，全國人民都看着我們，這個仗必須打好，打出八路軍的威風來，給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來一個振奮！

在平型關打一個大伏擊戰的計劃，就這樣決定了。

在一一五師的戰鬥動員大會上，林彪發表了講話：

林師長分析了戰局，介紹了敵情，激動而有力地號召道：「同志們，中華民族正在經歷着巨大的考驗！我們共產黨人，應該擔當起，也一定能夠擔當起這救國救民的重任！」他聲音激昂，一字一句都像鋼鐵一樣有份量。接着，他揮着拳頭下達任務說：「我們要在日寇進攻平型關時，利用這一帶的有利地形，從側後猛擊一拳，打一個大勝仗。給敵人一個打擊！給友軍一個配合！給人民一個振奮！」

正在這時，駐平型關的國民黨晉綏軍發來電報說：「日寇先頭部隊已接近平型關。」林師長看過電報，派出偵察部隊，繼續講話。最後，他把這次伏擊敵人的具體打法向到會幹部作了詳細交待。

平型關戰役的規模比不上黃陂戰役，但林彪重視的程度，以及事先的準備功夫，卻是前所未有的。

開戰前，林彪先後三次親自到平型關看地形，並率領各級指揮員一起到現場佈署戰鬥和確定指揮陣地。第三次從平型關回來時，適逢傾盆大雨，林彪渾身上下淋個濕透。但他顧不得休息，立即下達作戰命令：全軍於九月二十四日夜晚十二時出發，在天明以前進入埋伏陣地，並再三囑咐：「暴露與否，是勝敗關鍵！」然後，又親自去六八五團的陣地檢查。

九月二十五日清晨，林彪與一一五師全體指戰員，已埋伏在平型關陣地。將近八點鐘時，敵人出現了。敵軍排成三路縱隊，在一面太陽旗的帶領下，鑾不在意地前進，後面跟着的是汽車、山炮。敵人的先頭部隊過去了，參謀們焦急地望着林彪，等待着他的攻擊命令。然而林彪冷靜地注視着敵人，沒有任何動作。直到敵人的指揮部、輜重隊都進入了埋伏圈，林彪才喊道：「發信號彈！」。

隨着紅、綠色的信號彈騰空昇起，六八五團先打響了第一槍，緊接着山谷中槍聲大作，敵人擁擠在狹窄的公路上，亂成一團。

日本鬼子畢竟不同於國民黨兵，陷入包圍的敵人頑強抵抗。最激烈的戰鬥發生在老爺廟制高點的爭奪戰。老爺廟山頭在李天祐率領的六八六團陣地內，是控制整個平型關公路的制高點。遺憾的是李天祐竟沒有在這個制高點上佈署兵力。戰鬥打響後，敵人便想搶佔這個制高點。而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林彪把李天祐叫去，要他派一個營去搶佔老爺廟。林彪說：「拿下這個制高點，我們就可以居高臨下，把敵人消滅在溝裏！你們動作要快，慢了是不行的！」

李天祐回答：「明白了！」

林彪把手一揮，說：「好，去吧，狠狠打，一定要狠狠地打！」

率領第三營搶佔老爺廟的是六八六團副團長、解放後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楊勇。三營打得很艱苦，第

九連幹部差不多都犧牲了，全連只剩下十多人，三營營長受傷，楊勇也負了傷。但老爺廟制高點最終還是被八路軍搶佔。

由於林彪在駕馭戰場全局方面，具有卓越的能力，及時地作出兵力調動，搶佔了制高點，始終把握着整個戰役的主動權。因此戰局的發展，就如林彪事先預測的那樣：甕中捉鱉。只不過這只鱉的甲殼之堅硬程度，有些出乎林彪意料之外。

平型關伏擊戰的勝利，為林彪頭頂上的榮耀的光圈，增添了新的光彩。到此時，林彪已不單只聞名於中共和紅軍，而且蜚名於中外，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國打了一個平型關戰役，指揮官是林彪。

五、多思善謀

拿破侖說：「對於一位偉大將領，決不會有一連串的大功績都是由機會或幸運造成的；這些功績常常是熟籌和天才的結果。」

林彪也不例外。

拿破侖話中的「熟籌」，即是「運籌帷幄」。用林彪的話來說，就是「不打無把握之仗，不打無準備之仗」。為了做到這一點，林彪對作戰之前所做的「運籌」，給人予十分深刻的印象。

林彪的「運籌」的特點，是細緻、精確、嚴謹、縝密，尤其是在解放戰爭時期，他的這些特點表現的淋漓盡致。每一戰役，大至敵情我情民情，兵力裝備，行軍佈陣，捕捉戰機等等，小至兵要地誌，天

氣溫度，甚至部隊冬天穿的棉衣裡子應該是白色的，他都想到。

從江西革命根據地開始，林彪形成了自己的認真、細緻的軍事指揮風格。曾經擔任過武漢軍區司令員的曾思玉將軍說：「根據我在軍團司令部工作的經驗，我瞭解到林軍團長指揮的特點是認眞、細緻。在戰鬥的緊要關頭他總是親自出馬，戰場指揮；在戰前，他更特別重視指揮員親身實地調查研究。他常常這樣要求每一個指揮員：要腳杆子勤勞一多跑、多看，不要怕疲勞；嘴巴子要勤勞一多問、多調查，不要怕麻煩。他自己也正是這樣做的。每當到達一個新的地區，他總是到住地周圍看看，找老鄉扯扯。常常有這樣的事：有些敵情、地形和民情風俗，我們這些專作偵察工作的人還不知道，他倒早知道了；在我們匯報時，他插上一兩句話，修正和補充些情況，弄得我們大吃一驚。至於甚麼大的行動，那就更不要說了。不久之前的直羅鎮戰鬥，我就曾跟隨他去作過實地偵察的。」

曾擔任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李天祐上將說「他（指林彪）身子很弱，常常在地圖前，靜坐幾個小時，想了又想，把戰鬥的每個細節都想到，然後才肯休息」。

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部部長的蘇靜中將，長期在林彪身邊擔任參謀工作。他說：

「林彪打仗很動腦子，鑽得很深很透，每天都不離開地圖。每天只知道看地圖，看地圖。打起仗來特別專心。在作戰中他總是動腦子，老琢磨這件事，一有甚麼問題的時候，就想變動一下。於是就趕快將新的想法告訴前面。他的主意多，隨時跟着情況變。

「他比較相信自己，甚麼事情都自己考慮，尤其在作戰指揮上，自己說了算。他佈置的兵力不准任何人動，哪個部隊擺哪兒，他一清二楚，任何人都休想動他的一個團甚至一個連。

「從蘇聯回來後，他對我說怕太陽。我問甚麼原因？他說是愛克氏光照的。但後來在東北打仗，行

軍走路，整天曬太陽，他沒有甚麼事。他這個人喜歡打仗，打仗很專心。一天不打仗，身體就會出毛病，不是這裏不舒服，就是那裏不舒服。」

蘇靜是一九三二年在漳州加入紅四軍的。「我在三二年一參軍就在林彪的司令部工作」，「後來長征了，我也跟着走過來」，「在隰縣他（指林彪）負傷後就離開了，解放戰爭又跟着他，直打到衡陽」，「林彪當國防部長時，又調我到總參軍務部當部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論在林彪身邊工作的時間，我是最長的一位參謀。」

在戰場上，林彪多思、善謀。林彪只要醒着，幾乎沒有不思考的時候。在解放戰爭時期，在雙城堡那幢古香古色的屋子裏，林彪由早到晚，在那裏踱步、思考。

不論春夏秋冬，也不管槍炮聲怎樣在耳邊隆隆震響，步子總是不緊不慢，勻速運動。你盡可以說這是一個大將軍運籌帷幄，或是成竹在胸的從容、鎮定和自信。也可以說是一個無所事事，甚至是一個百無聊賴的人，在那兒無所事事、百無聊賴地隨意走動。這印象，來自好像面部神經已經壞死，因而看不出任何表情的那張蒼白的臉，來自那雙有時袖着，有時隨意甩動着，或是耷落着的手（背着手時，形象能好點），更來自那腳步聲。那雙穿着大頭鞋，或是布鞋，或是皮鞋的腳，腳跟幾乎沒有離地的時候，就那麼在地上拖着，落下時，腳掌再着地，拖拖沓沓，一步兩響。這腳步把從容、鎮定和自信全破壞了。

被一些老人稱爲「像個大姑娘」的清秀的林彪，那步履，那臉色，那神態，就像個大

病未癒的人。

戰爭的輪子卻在腦子裏超速飛轉！視周圍一切如無物，也沒有自我，大腦皮層的每個細胞，渾身上下的每根神經，只有戰爭！戰爭！戰爭！

不抽煙，不喝酒，不講吃，不講穿。大到一次戰役，小到部隊棉衣裡子應該是白色的，都在他腦子裏轉。打起仗來一夜一夜不睡覺。部隊到甚麼位置，一眼就能在地圖上找到。一口氣口述幾封電報。然後，再踱步，再思考。生活就像腦子裏那個軲轆，周而復始。

他思考問題時，任何人都不得干擾。並不是誰說話走路聲大了，他批評誰了，而是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而林彪只要醒着，幾乎沒有不思考的時候。所以，人們一天到晚都噤若寒蟬。

林彪不吸煙，不喝酒（必要場合，象徵性喝一點），也不講究吃。

每頓兩菜一湯。大多是白菜（或酸菜）炒肉，有時炒瘦肉絲，或是炒雞蛋甚麼的。另一個固定是黃豆：炒黃豆，或炸黃豆，或煮鹽豆，或是豆腐。反正黃豆是必不可少的。不但飯桌上頓頓有，平時也抓着吃，就和黃豆過不去。來了客人，也唏哩嘩啦倒一盤，好像誰都像他一樣愛吃炒黃豆。

「永遠健康」時，也愛吃炒黃豆。

有時加盤菜，他就說：別這樣嘛。有時也不說，也不吃。再就不加了。

秀水河子戰鬥前，在法庫，一個地主聽說來了個「總司令」，請吃飯。有個酸菜白

肉。瘦巴巴的林彪從不吃肥肉。被勸不過，試探着吃了口。從不談論吃喝的林彪回來後，說：好吃，好吃。連說兩遍，又說：再不能吃了。意思是，再不到有錢人家吃飯了。

和林彪吃了近兩年飯的季中權老人說，和他吃還不如和警衛員吃。

據說，羅榮桓和劉亞樓吃得都很好。下邊一些縱隊司令和師長、團長，就更不用說了。「大燒鍋」李作鵬等人能吃能喝，會吃會喝，就在林彪眼皮底下吃喝。

不講吃，也不講穿，給甚麼穿甚麼。量體裁衣，伸胳膊伸腿的，裁縫怎麼擺弄怎麼是，像個木偶。從未聽他講過哪件衣服質地如何了，樣子好壞了，合不合身了甚麼的。

還不愛玩，也不會玩，甚麼嗜好也沒有。在雙城打過兩次獵。劉亞樓看他太累了，鼓吹去的，到哈爾濱邀請他去跳舞，有時去，有時不去。舞姿平平，總不長進。一次，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舉辦舞會。一個蘇聯女人，不知嫌林彪是個「三等殘廢」，還是嫌他剛從雙城回來，身上有股味兒，反正是拒絕了他的邀請。尷尬極了。總領事大發雷霆，烏哩哇啦把那位高傲的女同胞臭罵一頓。那以後，舞就跳得更少了。

有時看看書。一是軍事，二是哲學，都是馬列和毛澤東著作。看得認真，紅藍鉛筆劃得是溝溝道道的。三是醫書，都是中醫書。邊學邊用，活學活用，給自己開藥方。一次讓秘書去買砒霜，秘書吃了一驚。他說：你不懂，我這種病吃點砒霜好。有次吃錯藥了，半夜三更爬起來，雙手扶牆哆哆嗦嗦去開燈。秘書醒了，來扶他。他說：沒關係，有點不舒服。

都說他生活枯燥乏味兒。

有人說他像個苦行僧。

（見張正隆：《雪白血紅》）

由於過度地思考，使腦神經受損，林彪在平型關大戰時便已需要戴上健腦器，那一年他正好三十歲。

爲了「熟籌」，爲了勝利，林彪將整個身心，完全地、徹底地投入了戰爭之中，達到了忘卻自我的地步。爲了革命的勝利，林彪對自己肩負的使命的那種認眞、負責的精神，那種刻苦、忘我的精神，是十分突出的，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林彪爲戰爭爲革命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從紅四軍到紅一軍團，從一一五師到東北野戰軍，每一個勝利的後面，都凝結着林彪的刻苦辛勞。

六、不打「官僚主義仗」

在解放戰爭時期，林彪發明了許多有關戰爭的詞匯，如「硬拚仗」、「拚命仗」，「莽撞仗」，「老太爺仗」「官僚主義仗」等等。

「硬拚仗」和「拚命仗」即是指不講戰略戰術的亂打一氣，結果是得不償失或得失相當，都是賠本的買賣。

「老太爺仗」即是指部隊的指戰員不能吃苦耐勞，不能急行軍趕路，不能爬山涉水，動作慢慢騰

騰。

「莽撞仗」和「官僚主義仗」，即是指事先不調查研究，沒有經過「熟籌」，匆匆忙忙，倉促上陣而打的「無準備」之仗。

這些仗林彪都是極力反對的。尤其「莽撞仗」和「官僚主義仗」。

林彪是受過「官僚主義仗」之苦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紅四軍挺進江西途中，第一個比較大的仗，是大餘之戰。紅四軍順利地占領大餘縣城後，將警戒全軍的任務交給林彪的二十八團。林彪將任務分配給各連營，劃清了各自防守的區域。可是，林彪自己沒有去駐防陣地看地形，也沒有組織各營、連的主官去看地形，更沒有研究一旦出現情況時的應付方略和辦法。其結果是紅四軍被敵人李文彬部偷襲，二十八團被打個措手不及，所防守的城東的陣地抵擋不住敵人的衝擊，很快被敵人攻陷。爲了減少傷亡，林彪只好率部後撤。而此時，城內的紅四軍兵力來不及收攏，軍部也來不及撤離，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部領導人暴露在敵人的槍彈之下。這是紅四軍挺進江西中的第一次大敗仗，損失慘重。

這是不折不扣的血的教訓。從這裏，林彪學到了許多東西，使林彪既知道了如何避免打敗仗，也使他知道了怎樣才能打勝仗。從此以後，林彪便不敢再打這種「莽撞仗」、「官僚主義仗」了。

在東北戰場上，爲了使自己多瞭解戰場上的第一手資料，避免再打「官僚主義仗」，林彪要求部隊行軍到達指定地點，第一件事就是向自己報告當面敵情。在三下江南時，林彪要求二十分鐘內就得將下面的敵情報告給他。十幾個師，到達地方不過個把小時，情況通報就下來了，這就逼得你往前跑，調查研究，不打官僚主義仗。一仗下來林彪六小時內要簡報，二十四小時要詳報，逼着你總結經驗教訓。把

你搞得緊緊張張的，腦子裏一點空閒也沒有。

那時候，林彪已是手握幾十萬大軍的「林總」了，但他在打仗時，經常直接指揮到師。特別是打運動戰，重要的戰鬥，重要方向，有時還直接指揮到團，直接向這些師團瞭解敵情，將作戰的命令直接送到師團一級的指揮員手中。

當年「東總」和四野的秘書參謀人員都說：林彪的電報，一般都是先到師，後到縱隊（軍）再兵團的順序發出去。打下錦州後回師打廖耀湘兵團，有的師在哪兒，縱隊首長不知道，但林彪知道。有時兵團一級正在執行第一封電報的指示，師裏已經按照變更命令的第二封電報行動了。

被授予大將軍銜的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司令兼政委陳賡，曾風趣地說：在「林總指揮下打運動戰，兵團司令是『空軍司令』，可以睡大覺」。

林彪對敵情的瞭解，也往往比縱隊的首長更深入、更細緻。一九四七年公主嶺大捷後，負責指揮該役的縱隊首長周赤萍到哈爾濱總部開會。林彪對周赤萍說：「據前方指揮員報告，敵人有一個營漏網，據守在法庫的何家油坊，十縱二十八師離的很近，就便消滅它，我估計不要太長的時間，你看怎麼樣？」接着，林彪走到地圖跟前，向周赤萍指明這個營所在的具體地點，立即下令圍殲該敵。

第二天，二十八師的捷報就從千里之外飛到哈爾濱的「東總」。

從大餘之役的慘敗中，給林彪教訓最深的還是看地形。從那以後，林彪十分注重親自到戰場上看地形，重要的戰役，還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看：不但自己看，而且還要組織手下的主要將官去看。

平型關戰役，林彪就三次出動去看地形。

林彪當年的警衛員楊興桂有過這樣的記述：

會後師長（指林彪）帶着旅長、參謀長，來到平型關以西的山地上察看地形，我是師長的警衛員，自然也跟着去了。

眼看着横貫平型關東西的是一條長達十余里的公路。兩邊都是峭壁高山，無法攀登；途中只老爺廟前有一缺口通往山上。我聽到師長説：如果阻住正面路口，截斷敵人的增援，將部隊埋伏在公路兩側的山地裏，在缺口處的高地上設置重兵，公路上的敵人就是瓮中之鱉了。

這是林彪第一次看地形的情景。

第二次看地形時，較爲仔細，需要隱蔽，林彪和隨行人員都化了妝。楊興桂這樣説：

首長們回來作了研究，第二天，師長又出發了，這次去的還有團幹（即團一級的幹部——作者注）和偵察員。

師長穿着老百姓的一件破大褂，紮根布腰帶，頭上戴了一頂山西的氈帽，活像一個本地的農民。

師長一路都是走着，爬山，没有騎馬。没有飯吃，只好吃生山藥蛋（東北人稱土豆），但他卻吃得津津有味。偶然搞到幾塊烙油餅，但他還分給大家吃，也給了我一塊。

看地形回來，人累得很，我一躺下就睡着了。半夜醒來，我看見師長還没有睡，他的

眼睛緊盯着地圖，鎖着眉頭在沉思。

這些天來，他每天都是晚睡早起的，眼睛都熬紅了。我想請他去睡覺，但又不敢驚動他。昏暗的燈光下，壁上的人影顯得又高又大，我覺得林彪師長簡直像巨人一樣。

師長第三次出發，是去作戰鬥部署，確定指揮陣地的。

師長攤開地圖，作了這樣的佈置：六八五團從東過來，六八六團從西過來，埋伏在公路兩側；缺口處的高地上，正面架四挺重機槍，兩翼各架三挺輕機槍，一共是十挺機槍，封鎖了這條唯一的出口。正面的路口有國民黨一個軍在防守，我們的六八七團守在平型關東北的山地上，專門打敵人的增援部隊。

師長真是考慮得周到、細緻啊！連團的指揮陣地也確定下來了，師、旅的指揮陣地在中央高地，與團的指揮陣地構成三角形，團的指揮陣地則設在營與營之間。

一九三六年二月，林彪率領紅一軍團準備隨毛澤東渡黃河東征山西，以解決紅軍經濟問題。如何橫渡黃河天險，是東征成敗的關鍵。爲了選擇渡口，林彪親自出動到黃河邊上偵察。

陪同林彪一同前往的，是曾經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的曾思玉。那時，曾思玉是紅一軍團司令部的偵察參謀。

曾思玉帶領一個十多人的偵察班，護送林彪向清澗、河口方向進發。曾思玉有如下的回憶：

我們一行十幾個人輕裝向清澗、河口方向進發。第一天走了一百多里，到達了一個區

蘇維埃政府住地。在這裏向政府的幹部進行兵要地誌的調查。林軍團長還特地要了一份縣誌地圖。這也是他的習慣。他喜歡把縣誌地圖和軍用地圖對照起來看，因爲縣誌地圖比普通軍用地圖詳細、準確。第二天晚上，冒雪到達了河口附近地區，在離河十幾里路的一個小村子住下來，決定明天吃過早飯以後，就到河邊去。

當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已是深夜了，我檢查過警戒，看見軍團長的窰洞裏還有燈光，就悄悄地走進去。軍團長還沒有休息，只見炕上滿鋪着幾幅拼起來的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他坐在炕頭上，雙手按着地圖，正聚精會神地看着、思索着。發覺我進去，他微笑着問我：「天這麼晚了，怎麼還不休息？他們都睡了嗎？」聽口氣，倒像休息的是我們，而不是他自己。

「他們都睡下了。」我回答之後，接着向他請示：「雪下大了，明天還去不去河上？」

「去。找個好嚮導就行。」他略略思索了一下，又說：「找兩個。找一個放羊的，找一個搖船的，最好年紀大一點的。」說完，他又俯身看地圖了。

我到村蘇維埃去，托村主席搞幾身化裝的衣服，把找這樣兩位嚮導的事也交代了。但心裏總不由得暗暗納悶：到河邊總共才不過十幾里路，有一個嚮導帶帶路滿够了，爲甚麼還要兩個；而且一定要這樣兩個人？

雪，整整下了一夜，足有二尺多深，而且還在繼續下着。這樣的天氣跑到河岸上去，實在够受的；但對敵前偵察來說，卻也很有利。

吃過早飯，村主席給找的兩位嚮導來了。兩人都約有四十來歲，那位放羊的老鄉年紀略大些。他們都粗壯得很，臉膛又紅又黑，額角上的皺紋很深很深，一看就知道是淳樸、勤勞的勞動人。我叫騎兵偵察班長盧迪同志挑了五個戰士，就立即用借來的衣服裝扮起來。我們有的穿上一身光皮板的老羊皮襖，頭上纏條羊肚子手巾；有的索性把棉衣翻過來穿。這樣渾身上下通是白的，莫説隔條黃河，就是離幾十步也看不清人形了。那邊，軍團長也動手化裝了。他把自己那件舊大衣翻過來穿上，攔腰紮根繩子。看慣了他平時那整齊的裝着，看他穿了這一身，倒覺得很不習慣了。

一切準備停當，我們這八、九個人就踏着齊膝深的雪，冒着紛紛揚揚的雪花，向河岸上走。正是陽曆十二月底，天氣已經很冷了，從黃河邊上吹來的東北風，捲着大把的雪花直往人們的臉上和脖子裏撒，冷得人直打寒顫，有時憋得人連喘氣也喘不過來。但是，走出村子不久，我們就慢慢習慣了，而展現在眼前的一片雪景，卻把我們這些長期生活在南方的人吸引住了：白雪把整個西北高原蓋得嚴嚴實實的，到處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邊，真是又雄偉又壯麗。

那兩位嚮導大概對我們的行動很感到奇怪，忍不住問我們：「同志，這樣的大雪天，你們到河上來幹啥？」我連忙回答：「俗語説：『不到黃河心不死』嘛，我們這些南方人没見過黃河甚麼樣子，聽説黃河多麼大，水怎樣黃，現在來了，不管怎樣也得去看看。」這句話是爲了避免暴露我們的意圖而事先編好的。説着，我望望軍團長，他笑着點了點頭。他正一大步一大步慢吞吞地在深雪裏走，有時抬起頭來，四下裏望望，還不時地伸出

手接接雪花。他是那麼悠閒，看來倒真像是有着濃厚的看河、賞雪的興緻。

再往前走出不遠，就聽見「呼——呼」「喳——喳」的聲響。嚮導說：「聽見了沒有？那就是黃河了。」十點鐘左右，我們來到河口附近辛關渡對岸的河邊上。這時，雪已經停了，冰凍了的黃河，更有一幅奇特的景象：大塊的冰塊像一座座小小的銀山，在水裏緩緩地浮動；一陣急浪捲來，冰塊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和四濺的冰末，發出震動人心的響聲。四野裏靜悄悄的，只有成群的長嘴巴的白鳥在貼着冰面掠過，真是好看極了。

這時，放羊的老鄉走過來，拉拉軍團長的衣服，指着對面的渡口說：「同志，你們得注意點。這河是赤白交界，那邊有閻老西的白狗子，晴天有時候還打槍過來。」

軍團長點點頭，立即繞到河岸崖頭的後面，伏在雪上，舉起望遠鏡來觀察。他看得那樣專注，剛才賞景的神情登時消失了。我也連忙掏出鏡子來觀察。在望遠鏡裏看來，對岸的地形十分清楚：渡口的兩側全是立陡的懸崖削壁，山頭上、隘路口，零散地隆起一些雪堆，張着黑口，那是一些碉堡。渡口上的設防更是嚴密。在密集的碉堡旁邊，有敵人的哨兵在活動，幾個敵兵正在掃雪。

軍團長看了一陣，繼續向渡口北面、河北上游走。這裏雪更深，有的地方把整條腿都陷沒了。他好像忘了下雪這回事，蹣跚地走一陣，停下來看看，再走。

走出了好遠，他停下來，向對岸望了一會，然後拍了拍大衣下擺上的雪，走向那位放羊的老鄉。他舉起手好像很隨便地向對岸畫了一個圈，問道：「老鄉，這一帶山上你都上

去過嗎？」

「走過。」老鄉回答，「過去給人家當了二三年羊工，從河這邊跑到河那邊，哪個地方沒去過？」

「哎喲，那麼陡的崖頭，人可怎麼上？」

「放羊的嘛。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得上去；羊上不去的地方，人還得拉牠一把呢。」老鄉指着山梁上被雪蓋着的斷續部份說，「看，那些河汊口上，崖頭都是斜的，能上得去。」

林軍團長點點頭，自言自語地把放羊人的話又重複了一遍：「對，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上得去。」

我一面聽着他們的談話，一面把放羊人的話記下來。並且隨着老鄉手指着的地方，勾了一張草圖，把斷續處畫下來。這時，我忽然想起軍團長讓我去請嚮導時的情景。真的，這西北地區放羊的多，放羊的整天滿山跑，哪個山溝角落他不知道？請這樣一位嚮導來對照實地觀察作調查，實在妙極了。不用說，那位船工也一定會在瞭解水情方面給我們許多幫助的。

軍團長又和牧羊老鄉扯了些別的，像山上的草多不多，從河汊子上山怎麼爬法等等，這些看來都是些無關緊要的閒扯，但對岸一些眼睛看不見的地形情況已是清清楚楚了。

接着，他又走向那位船工，從古到今地談了些關於黃河的水情以後，又問：「河這麼寬，劃一個來回得多少時間？」

「那得看水勢，」船工老鄉說，「平常一個來回得兩三頓飯的時間，碰到水漲了，時間更長一些。」

「歇船的時候，船往哪裏放？」軍團長又問。

老鄉往北指了指，說：「就在河口那裏。那裏水穩。」

就這樣邊看邊扯，河口、延水關之間地段偵察了一遍，一天就在這冰雪的大河岸上過去了。

傍晚，雪又下起來，我們又冒着雪往回走。整整一天在雪地裏奔走，大家又冷又疲勞。但軍團長卻沒有疲倦的神色，仍是精神奕奕地跟着老鄉的腳步走。但是卻沒有來時那種賞雪的興緻。他一面走，一面沉思着。根據以往的經驗，我知道，在這位首長的胸中，一個英明的、巨大的行動計劃，已經在醞釀、在成熟了。

一個多月以後，我們踏過雪、觀察過的地段，就成了東征強渡黃河的登陸場。就在那位老船工所指點的無定河口內，隱蔽了渡河的船隻；就在那位老羊工當年經常攀登的山腰斷續部上，佈滿了突擊隊的紅色戰士。

我們紅一軍團這支強大的抗日先遣軍，在彭德懷司令員和林彪軍團長的指揮下，從這裏強渡過天險黃河，開始了英勇的東征。……

七、「要打違抗命令仗」

在東北戰場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事件的主角是五師師長鍾偉和林彪。

三下江南時，林彪命令五師進至長春路東，配合一縱消滅大房身約一個團的敵人。三月九日，五師到達靠山屯西南。夜間行軍，白天睡覺。黃昏起來準備趕路，聽見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邊亂哄哄的。一偵察，是八十七師二六二團兩個營。鍾偉説打，有人説咱們的任務是去大房身。鍾偉説：甚麼娘賣×的大房身，送上門的敵人給我打！

十四團一個衝鋒攻進姜家屯，俘敵二百多。王奎店連攻數次未下。

正在這時，林彪來電報，命令五師速去大房身。鍾偉説：把這股敵人吃掉馬上就去。哪知這股敵人跑到靠山屯，和二六四團一個營會合了，拚死抵抗。林彪又來電報，催促執行總部意圖。鍾偉説：我這兒都快吃掉一個團了，一大堆俘虜，也拔不出腳啦！

一五一團連衝四次都未成功。這時，八十八師和八十七師主力分別從農安和德惠趕來增援，林彪的電報也到了。有人説：這回不走也得走了。鍾偉拍起了桌子：誰再説走，我就斃了他個娘賣×的！一邊組織攻擊、打援，一邊給林彪回電：現在正是抓大魚的好機會，我就在這打了，快讓一縱它們都來配合我吧！

林彪不愧爲林彪。他接到電報後認爲，現在戰場形勢已變，戰鬥部署必須跟着變。林彪當即回電：改變原來的作戰部署，將殲滅大房身之敵的部署改爲監視，令一縱、六縱向

靠山屯集結，集中主力殲敵八十七、八十八師。戰鬥結果，敵八十七、八十八師被大部殲滅。

這一仗打了個本末倒置，把一縱和六縱都調過來，把林彪都指揮了。林彪後來說：要敢於打違抗命令的勝仗，像鍾偉在靠山屯那樣，三次違抗命令。

林彪的性格是善於獨立思考，凡事有自己的主見，不隨大流，不人云亦云，不盲從。表現在作戰指揮上，就是機動靈活，不墨守成規，不怕上級的條條框框，甚至會根據具體情況，改變上級的命令、指示，「打違抗命令仗」。

林彪曾經潛心地研究過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軍閥混戰資料，按軍閥人物、地區、特點分專題，把每個軍閥怎樣一步步爬上來，又怎樣垮台，各個軍閥之間怎樣互相利用矛盾，勾心鬥角的歷史資料，作了深入而細緻的探索。從其中，林彪爲自己總結了幾條經驗：

善用兵者隱其形。

有而示之以無。

與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

還有一條，就是：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在中共的高級幹部中，敢於當面與毛澤東頂撞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彭德懷，另一個就是林彪。在井岡山時期，長征路上，抗日戰爭中，解放戰爭時，林彪多次頂撞毛澤東，有時頂得很厲害。過去的一些書刊文章，寫過毛澤東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甚麼？」其實，林彪挖苦毛澤東也不輕。當發生爭執時，林彪衝着毛澤東說道：「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聽說，我是在前線親眼見！」毛澤東常常被頂撞得講不出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

林彪不打「唯命是從仗」，敢打「違抗命令的勝仗」，在歷史上確實有過那麼幾次。

那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廣昌保衛戰慘敗，紅一軍團蒙受巨大損失。林彪、聶榮臻和參謀長左權經過研究決定，冒死違抗李德的「六路出擊」、「全線防御」的命令，打一場好久沒打了的運動仗。

林彪計劃：率領紅一軍團和暫歸紅一軍團指揮的紅九軍團，秘密運動預先隱蔽埋伏。再誘敵離開堡壘，離開主力。然後斷其後路，集中優勢兵力，發起攻擊。

九月二日，獨立紅二十四師在敵軍前進方向構築工事，引敵來攻。

國民黨第八旅兩個團被誘上當，貿然脫離主力，脫離堡壘群達十餘里。

林彪指揮紅一軍團早已嚴陣以待，隱蔽在溫坊附近之有利地形。當敵軍兩個團到達溫坊後，被紅一軍團截斷其退路。晚九時，林彪命令發起攻擊。速戰速決，全殲敵兩個團。擔任主攻的紅四團靠刺刀手榴彈解決戰鬥，僅耗子彈四百餘發，傷三人，就俘敵逾千。

第二天早晨，敵第三師、第九師三個團聞訊離開堡壘工事向溫坊進發。林彪又下令紅一師斷其退

路，紅二師和二十四師從兩側方向對敵夾擊。

又是速戰速決，殲敵四千多，俘敵二千四百餘。

林彪的第二次「違抗命令之仗」，是平型關戰役。儘管有毛澤東的指示在先，但林彪看到地形有利，這仗好打，打了又能一鳴驚人，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地打了。

平型關之戰取得重大勝利，產生巨大影響，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打得好」。但在後來，卻一再強調「敵後游擊戰」。到了一九五九年，在清算彭德懷時，毛澤東指責彭德懷組織「百團大戰」，違反「中央決議」，林彪聽後趕忙說：「平型關大戰是任弼時決定的」。

林彪的不打「唯命是從仗」，最突出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戰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林彪離開延安，到山東軍區任司令員。林彪一行從延安坐一架美國運輸機到太行山，然後騎馬，步行，到達河南省的濮陽時，接到中共中央「萬萬火急」的電報，命令林彪、蕭勁光、江華、鄧華、李天祐、聶鶴亭等原定去山東的人，立即轉赴東北。

林彪一行從濮陽出發後，一路陰雨綿綿，秋風蕭殺，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味道。道路泥濘，日夜兼程。半路上還與僞軍打了一仗，那是在夜裏，馱在馬背籃子裏不到兩歲的林豆豆，因馬夫受重傷，馬驚起來，被掀到一片花生地裏，黑天瞎火，好容易才在一副馬鞍子下面找到。

十月中旬，林彪一行到達山海關，然後乘火車直達瀋陽，十月三十一日被任命爲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林總」的稱呼就是由此開始的。

當時的形勢是國共雙方都全力爭奪這塊肥沃的黑土地。蔣介石派出杜聿明爲東北保安司令官，下轄八個正規軍，共三十萬人，其中有國民黨五大主力中的新一軍和新六軍，一式的美式機械化裝備。這些

軍隊大多數參加過抗日戰爭，新一軍、新六軍等還是遠赴中緬邊境作戰的遠征軍，打得很出色，歷盡艱辛，功勛卓著，是國民黨最精銳的部隊。

而共產黨這方面，由山東軍區、晉冀魯豫派出十萬人，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小米加步槍」，唯一的優勢是其中有包括陳雲、彭眞、高崗、林彪、羅榮桓在內的二十名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雙方力量對比是十分懸殊的，敵強我弱，敵多我少的形勢是十分明顯的。

可是，在延安，剛剛從重慶談判回來的毛澤東，十足是「閉門造車」，十月十九日來電指示中共東北局要「掌握全東北」，二十三日又來電指示「竭盡全力，霸佔全東北」。當國民黨派出運輸機、運輸艦，將大批武裝到牙齒的王牌軍運到東北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又來電指示「拒敵於國門之外」，打算在錦西一帶打一場大戰，「一戰解決問題」。

在毛澤東於延安做着黃粱美夢的時候，共產黨的部隊卻遇到極大的困難。黃克誠在給毛澤東的一封電報中說：部隊「現遇到極爲困難之情況，無黨，無群衆，無政權，無糧食，無經費，無醫藥，無衣服，鞋襪等，部隊士氣受到極大影響」。而且還無武器、彈藥。正面是國民黨的強大部隊，背後還有多如牛毛的土匪，腹背受敵。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林彪在錦西一帶組織部隊與敵人開戰，但遭到慘敗。林彪只好率領部隊向北撤。林彪發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列舉了部隊面臨的大量困難，提出與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相反的意見：撤退。

「獨霸東北」的口號落空後，坐在延安窰洞中的毛澤東又提出「最後一戰」。原來毛澤東寄希望於國共達成的和平協議。

對形勢看得十分清楚的林彪和黃克誠等人，向毛澤東提出的又是相反的意見：建議「以一部主力去佔領中小城市，建立農村根據地，作長期鬥爭之准備。」林彪在電報中還「請主席頭腦清醒考慮之」。據說毛澤東在《建立東北根據地》一文中提到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就是採納林彪的意見而提出的。

時局的發展是：毛澤東所希望的和平又落空了。於是毛澤東又指示林彪「化四平街爲馬德里」，要與國民黨決一死戰。

四平保衛戰打得極爲慘烈。林彪的部隊傷亡慘重。但毛澤東還一再命令「請考慮增加一部守軍」，繼續打下去。《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中說：「四平保衛戰我軍傷亡總數達八千以上，部隊元氣損失甚大，黃克誠之三師七旅，原爲井岡山老部隊，四平撤退後只剩下三千餘人，失去戰鬥力；萬毅之三師，原有一萬三千人，經四平戰鬥傷亡及撤退被擊潰，只剩四五千人」。其餘的部隊的情況，大體相若。面對這種情況，林彪不顧毛澤東的「化四平街爲馬德里」的指示，毅然撤退，而且一撤就撤到哈爾濱，松花江以北。此後，林彪與陳雲等人不再理會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在四平保衛戰慘敗後也有所收斂），大力建設農村根據地，眞正「讓開大道，佔領兩廂」。東北局面才有了後來的根本改觀。

到了一九四八年，「敵強我弱」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毛澤東指示林彪發動遼瀋戰役，南下打錦州。這一回，林彪與毛澤東調了個位置：林彪錯了。林彪的思想落後於形勢的發展，不敢貿然千里南下，在沒有後方依托的情況下打錦州。林彪以種種理由、借口拖延。雙城堡與西柏坡之間的電報，你來我往，各抒己見，你講你的理，我講我的理。事後統計，竟有七十多份。毛澤東次次不離「南下」，旗幟鮮明，有指示，有批評，有告誡，但無強迫命令。

而這時的林彪，盤算得太精細了，太專注了。太專注容易鑽牛角尖，太精細會變得婆婆媽媽。「不打無把握之仗」以及「諸葛一生唯謹慎」變成了力求「四平八穩」。其中的原因，是一九四七年夏天的四平攻堅戰。此仗之慘烈程度，在整個解放戰爭中都是絕無僅有的。一心想得手的解放軍，遇到了「陳明仁防線」。這些鋼筋水泥的永久式工事，對於解放軍來說還是嶄新的課題，指戰員們還沒學過攻堅戰。結果「四平戰鬥自十四日總攻擊開始到二十六日經十三天激戰，我軍俘斃傷敵三萬餘人，我傷亡一萬餘人」。這是林彪在東北戰場上最大的一次慘敗。事後，四平慘敗的陰影沉重地壓在林彪的心頭上。他對南下攻打比四平還要堅固、規模也大得多的錦州，心中確實沒有把握。然而，毛澤東「南下」的電報一封又一封地飛來，朱德後來也參加這場電報大戰，站在毛澤東這一邊。在總決戰到來之前，林彪備受煎熬，痛苦而煩躁。林彪非常喜愛女兒林豆豆但就在這時，他踢了四歲的女兒一腳。這是平生唯一的一次打女兒。有人說「林彪不打錦州打豆豆」。

在抗命了近半年之後，林彪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南下打錦州。儘管在兵臨城下時又猶豫了一下，但還是大功告成，東北全境一舉解放。

林彪的「獨立自主」，「不打唯命是從仗」的特色，在東北戰場上的一正一反的事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八、善於總結經驗

在被問到「林彪打仗有甚麼特點」時，蘇靜中將回答道：

林彪在打仗上十分重視總結經驗。在東北，林彪曾叫我到三縱去，看看雲南盧漢的部隊怎麼樣，戰鬥力強不強，好打不好打。

打鞍山，林彪叫我去瞭解情況。我去總結了部隊挖坑道攻城的經驗。這個經驗總結出來後，林彪很高興，立即轉發部隊推廣，爲在遼瀋戰役中打錦州發揮了重要作用。

「六個戰術原則」就是在實踐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

林彪不但注意總結自己的經驗，還注意吸取他人的經驗。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林彪去電中央軍委，要求介紹其他部隊的作戰經驗。電報說：

軍委：

我們甚盼吸收關內作戰經驗，望將冀魯豫及蘇北等地的作戰經驗特別是夜戰經驗在戰役、戰鬥、在技術上的各種辦法陸續告我們以便研究吸收。

林　文日

類似這種電報，林彪發出不止一封。

林彪注意總結成功的經驗，更注意總結失敗的經驗。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林彪、羅榮桓在發給各縱隊並報中共東北局及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剖析了沙後所和王道屯兩個戰例。這是兩個規模並不大，影響也不大，但卻是頗爲典型的「不良戰例」。林彪抓住不放，進行研究，總結出經驗教訓，並通報全軍。

毛澤東見到後，將林彪的電報轉發給各個野戰軍。毛澤東在電報中說道：

「這種情形，恐怕不但東北部隊有，你們所屬部隊也會有的，不過你們在戰術問題方面給我們反映太少，我們無從知道」。

毛澤東在這裏說的「給我們反映太少」，是指其他的野戰軍類似林彪的這種從失敗的戰例中總結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工作做得不夠。

林彪從失敗總結和吸取教訓，最典型的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夏季四平攻堅戰失敗以後。

四平攻堅戰是在六月十四日打響的。事先，林彪和下面的縱隊首長估計守敵不超過二萬，其實是三萬四千多，犯了輕敵的錯誤。因而，在兵力部署上，林彪只派了一縱和鄧華縱隊攻擊，沒有形成絕對優勢。當鄧華估計守敵有三萬多，要求林彪增派部隊時，林彪不置可否。

其次是戰術上犯錯誤。由於輕敵，認爲必勝無疑，就沒有考慮「圍城打援」等其他的打法，一味地在城裏巷戰、強攻。

第三，此役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解放軍過去打游擊戰、運動戰，多是野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對城市攻堅戰缺乏經驗，從戰術、裝備到訓練，完全是新課題。現在，解放軍壯

大了，在戰略上已壓倒敵人，今後更多的是攻打敵人佔領的中、大城市。但林彪和「東總」的戰術指導思想還沒有跟上來。

結果，四平攻堅戰發動後，突破快，發展卻很慢，逐條街道、逐間房子地艱苦爭奪。二十二日，一縱喪失戰鬥力後被迫撤出戰鬥，六縱全部投入攻擊，犯了兵家的「添油添燈」的大忌。最後將守敵壓縮至城東北隅，卻苦戰不下。二十九日，國民黨援兵九個師迫近四平。三十日拂曉，不得不退出戰鬥。

滿城屍體，滿城烈火。四平變成一座血城。

事後，中共東北局和「東總」專門開會總結四平攻堅戰失利的經驗教訓。在會上，林彪先後三次站起來檢討：「這次四平沒打下來，不要你們負責，主要是我情況瞭解不夠，決心下得太快。不馬上攻，圍城打援最好。先消滅援軍再攻城，就能攻下來。另外，這次攻城還暴露了我們攻堅的技術差，這也主要是我平時研究不夠」。

林彪這種不推諉、不掩飾，勇於承擔錯誤的精神，令部下十分感動。周赤萍在回憶錄中說：

「林總的這種榜樣，使我和部隊的幹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評的教育。我回部隊傳達以後，幹部紛紛主動地進行檢查，勇於承擔責任。之後，在部隊幹部中，自我批評成風，對戰術的檢討和研究，真如雨後之花，遍地開放，人們的心情都十分舒暢。」

林彪還在哈爾濱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專門研究城市攻堅問題。林彪親自找來參加四平攻堅戰的龍書金將軍，向他詳細詢問了戰況。龍書金說：

「林彪兩道眉毛很濃，穿一套舊軍裝。會議休息時，他問我，打四平，你們一個營打一條街是怎麽打的？（其他部隊是一個團打一條街）我說，一個班分成幾組，先打幾個手榴彈，爆破隊就乘着手榴彈的煙幕，冲上去爆破。爆破成功後，突擊組再上去……」

林彪聽得很認眞，很仔細。

龍書金說：「會議總結時林彪講話，想不到我們的打法被林彪總結成有名的『四組一隊』。」

林彪說：「提出『四組一隊』主要是提醒大家：突擊連隊要分工，小組互相掩護，互相配合，至於實際運用，應根據具體目標。同志們提出三個組，五個組，也有將機槍組織起來成爲一個戰鬥班的，我想今後也可能不一樣的。」

對四平失利的經驗，林彪並沒有「諱疾忌醫」，而是反覆講，多次講。據四野的幹部回憶：

大會講，小會講，專門開會講。不是要把誰講得抬不起頭，而是爲的使大家從敗仗中振作起來。怎樣振作？把教訓鉅細無遺地一條一條擺出來，擺深擺透，擺得明明白白。然後，再一條一條理出對策，反覆演練。一句話：要贏得明白，更要輸得明白。

林彪非常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特別是教訓。一個敗仗講起來沒完。吃虧是師傅，壞事變好事。若沒有四平「走麥城」和大講「走麥城」，遼瀋戰役前的攻堅大練兵，就不會搞得那樣深入、徹底，錦州就不大可能那麽快打下來。

九、獨創戰術與大練兵

林彪的軍事指揮才能，在解放戰爭時期達到了「頂峰」。

這時，林彪已經在戰場上馳騁了二十多年，大小戰役何止上百。一位軍事家，能經歷如此長時間、如此眾多的戰役，能夠擁有如此豐富的戰爭經驗，是十分罕有的。這是一筆十分難得的寶貴的財富。加上林彪擁有黃埔軍校的底子，四十年代初期在蘇聯養病時又閱讀和鑽研了不少軍事著作。這時的林彪，無論是在實踐經驗還是在理論上，都有了一定的造詣。

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林彪愛動腦子，多思、善思。於是，在東北戰場上，林彪獨創了一系列的戰術。

毛澤東有「十大軍事原則」，林彪則創立了「六個戰術原則」。它們是：

「一點兩面」；

「三三制」；

「三猛戰術」；

「三種情況三種打法」；

「四快一慢」；

「四組一隊」。

「一點兩面」是集中兵力在一個狹窄的地段上，進行縱深梯次配置，頭尖尾巴長，像一把鋒利的尖刀一樣，向敵人實行猛衝猛打。這就是「一點」的意思。而「兩面」是指斷絕敵人退路，對敵人形成嚴密的包圍，不讓敵人遭到猛烈攻擊後跑掉，打成擊潰戰。因此，「一點兩面」是將殲滅戰的戰術具體化。

「三三制」是指一種疏散形的進攻戰術。解放軍每個連有三個排，每個排有三個班。林彪提出：戰鬥時每個班還可以分爲三個戰鬥小組，每組三——四個戰士，進攻時不要全班密集在一起，這樣容易增大自己傷亡，而應以小組爲單位進行疏開，採取不整齊的隊形波浪式的向前躍進，迅速投入與敵人進行白刃戰。

林彪是在秀水河子戰鬥前，在一間小學校裏給一批指揮員講解這兩個戰術原則的。林彪說：在錦西打的幾仗，敵人火力密集。咱們隊形密集，傷亡大。現在不同於抗戰打日本，敵人是美械裝備，火力猛，又是精銳，不能像過去那樣一打一衝，人海戰術。林彪又說：在戰略上要集中兵力，戰役上一點兩面，而在戰術上，戰術動作卻是分散兵力，稀疏兵力。兵力集中並不是要求我們在衝鋒時密集隊形，而是要求在部隊衝鋒時，必須有充分火力掩護與配合衝鋒的部隊及二梯隊，所以兵多不是一下子都衝上去，而必須用「三三制」的隊形。

「三猛戰術」是指：

對於所選定的主攻點上，應將各種機關槍各種炮秘密的盡量接近敵人，適當的配備起來，以便統一向主攻目標射擊，並於同時猛然開火，這就是我們所謂「猛打」。這種火力用法，他是反對零零碎碎打的，反對把火力到處分散使用的。

在主攻點上，火力猛然開始射擊後，我突出部隊應乘此際敵人發呆，發慌時一拿不出主意和來不及調兵時猛烈衝鋒，躍然奮進，以刺刀、手榴彈向前衝去，以刺刀刺殺敵人，不敢以刺刀刺敵的不算最勇敢的部隊與戰士，我軍必須建立刺刀血戰的威風和隨手榴彈的飛出爆炸而猛進的勇氣，這就是我們所謂「猛衝」。

對於已被衝動和潰亂的敵人，應實行猛烈追擊，要一直壓下去，這就是我們所謂「猛追」。

「三種情況三種打法」是：

一種是敵人守，一種是敵人要退不退，一種是敵退，爲了不致於亂用，提出三種基本不同的情況。如果敵人守，就要經過正式的準備，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後再攻擊；如果敵人要退不退，我們準備好了再打，敵人會跑掉，不準備就打，又會被碰下來，這時應先將敵人圍起來，圍而不攻，或圍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們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脫，然後準備好再打；如果敵人退，就要猛追，這時不要等命令，不準備就是合乎戰術，準備了反而不

合乎戰術，不要怕部隊少，也不要怕情況不清楚，追就是了。當然，戰役指揮員是應該組織有計劃的追擊。

「三種情況三種打法」蘇軍條例上就有，但比較抽象。林彪用比較通俗的語言，把它形象，具體了，明確了。

當時沒有條件辦正規院校，軍政大學和各種參謀集訓隊，也都是速成性質。戰爭環境，沒有機會長篇大套上大課，而且幹部戰士文化很低，講多了，講深了，也不懂，記不住。於是，林彪就用「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猛」這些新名詞，把它們歸納起來，通俗易懂好記。

「四快一慢」是指：

向敵前進要快：譬如打某個地方，怕敵人跑了，前進時要快。……

抓住敵人後進行準備要快：看地形，選突破口，構築工事，捆炸藥，動員，調動兵力，佈置火力等等，忙個滿頭大汗才好，這要快。

突破後擴張戰果要快。

敵人整個潰退了，離開了陣地，我們追擊時要快，這時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

一慢是指甚麼時候，甚麼事情上慢呢？是指總攻發起時機這一下要慢（但總攻開始後就要快）。在這問題上要沉住氣，上級催罵，派通信員左催右催，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

準備好再打。

「四快一慢」和「四組一隊」，都是四平攻堅戰後提出來的。

「四組一隊」是指：

四組即火力組，突擊組，爆破組，支援組。由這四種功能不同的組別，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組成一支具有強大力量的突擊隊。

孫子說「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林彪是根據東北戰場的實際情況而創立了這些戰術原則，它們的作用和效果無疑是正面的。當年四野的指戰員都說打錦州和天津時，「四組一隊」起了很大作用，而「三三制」等，確實也爲部隊減少了傷亡。

據說毛澤東當年對林彪的這些戰術是肯定的，有的還很欣賞。

又據說，國民黨認爲東北共軍的戰術水平甚高。

「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些戰術原則好不好用，有沒有效果，東北戰場的勝利就是最大的證明。

「九·一三」以後，林彪在一夜之間由神變爲鬼。他的那些戰術原則也就由香花變成了「毒草」。

北京軍事科學院就專門編寫了《批判林彪的「六個戰術原則」》的文章，供「批林整風運動」使用。這正如黃克誠所批評的「用過去黨內鬥爭開鬥爭會那種過火的語言，揪出一個人就把他的歷史功績一筆勾銷了」，是因人而廢言。

有了新的戰術原則，還得操練、演習。於是林彪和「東總」提出了「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新時期的指導思想，還提出了全軍大練兵。

練兵中立一大功、三小功的黃達宣老人說，陣地和工事，都是按長春佈防情況設置的，反覆演練三、四個月。白天練射擊，刺殺，投彈，衝鋒，翻院牆，爬城，晚上練夜行軍和村落、街道攻防戰鬥。村頭到處都挖的掩體、交通壕，人人練捆炸藥包，安雷管，接導火索。破土地廟，爛房子，坡坎甚麼的，都成了「地堡」，爆炸聲白天晚上響。怎樣穿牆打洞，土牆怎麼炸，石牆怎麼炸，反覆研究、演練。怎樣過外壕，壕那邊有地堡，壕下有地雷，怎樣把炸藥包扔過去炸，綁在竿上伸過去炸。那兵練的呀，長那麼大頭一回。

黑龍江省軍區原副政委張多樹，當時是九縱二十五師七十三團政委。老人說，九縱沒昇級爲主力時，在冀東沒練過「一點兩面」，「三三制」這些戰術，這回從頭練，趕緊練，打四平沒攻下來後，上邊是真下了狠心，下了也真練。不練不行，過去盡打野戰，野戰變攻堅，是門新功課。「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句話可不是掛在嘴皮子上的。

每個老人對這場大練兵印象都很深刻。都說那幾個月的汗水沒白流。那戰術動作、機靈勁兒和精神頭兒，都和過去大不一樣。

談到林彪的「六個戰術原則」，老人們都說管用，就是那麽練的，那麽打的。（見張正隆：《雪白血紅》）

在中國十大元帥中，林彪是資歷最淺，年紀最輕的一個。南昌起義時，他僅是個二十歲的連長，與擔任總指揮的賀龍，參謀長的劉伯承，以及陳毅、葉劍英等人相比，可謂是天壤之別。二十二年後，林彪趕上來了，並且超過了他們。在「三大戰役」中，林彪指揮了兩個，他率領第四野戰軍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林彪與他領導的第四野戰軍，殲敵最多，建立的功勛也最大。

如果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林彪的冒升，還包含有毛澤東提攜的因素，那麽在解放戰爭時期，各路諸侯都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比賽的結果，舉世矚目。在一九五五年頒發軍銜時，林彪壓倒了賀龍、劉伯承等人，僅排在「紅軍之父」總司令朱德及副總司令彭德懷之後，位居第三。

林彪的成功並非只是靠幸運。

林彪是一代名將。

第二章　林彪：在廬山崛起

有人說：廬山是座魔山。

廬山之魔，並非它有名寺古剎，「有寺則靈」；也不在於它有多麼的雄偉、險峻、高大，「離天三尺三」。其實，在中國那多如恆河之沙的山山嶺嶺之中，這座海拔只有一千四百多米的「匡廬」，只是個小弟弟；它入不了「五岳」，與青藏高原那些世界名峯相比，更只是個小泥丸。

廬山具有它獨特的風韻。那變化莫測的雲海，那輕紗帳似的迷霧，時常瀰漫在巉岩、峭壁、清泉、飛瀑、綠樹、野草之間，一切都變得那麼虛渺、迷惘、朦朧、飄忽，自古便有「不識廬山眞面目」之稱。

也許正是廬山這種波譎雲詭的特色，使它與政治鬥爭結下了不解之緣。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彭德懷到林彪，從八屆八中全會到九屆二中全會，它招來了那麼多明爭暗鬥的風雨，見證了那麼多人的崛起和殞落。而這些風風雨雨和大起大落，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帶來了那麼大的衝擊和災難——廬山是座不祥之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廬山召開會議，就中了它的魔力，爆發了毛澤東與彭德懷的曠世之爭。這場鬥爭的結果，不但導致了造成四千多萬人死亡的古今中外最慘重的「三年災難」，而且因爲彭德懷的殞落而引發了另一個人的崛起，而這個人的崛起，又爲下一次更加慘重的劫難埋下了伏

線。

在廬山上崛起的就是林彪。

彭德懷的殞落和林彪的崛起，都是毛澤東安排的。

林彪是奉毛澤東之召，於七月十八日上山的，與葉群住在中八路旁一幢二層的西式洋樓裏。那是原國民黨總統府某要員的別墅。這時彭德懷已向毛澤東上書；而毛澤東也已經決定要向彭大將軍開刀，就在毛澤東於七月二十三日發出「雷霆之怒」以前。有一種說法：「毛澤東找林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密談，林彪曲意奉迎，毛澤東找到了知音。毛澤東決定讓林彪重振雄風，在關鍵時刻助他一臂之力」（馬輅等著：《彭德懷廬山起禍》）密談後，林彪即刻下山，據說是奉毛澤東之命進行某些必要的「部署」。

林彪再次上山，是在七月二十九日。那時，彭德懷已遭到全面的批判，毛澤東下令：「對事，而且也要對人」，因此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對彭德懷進行全面的清算和組織處理。林彪便是與最後一批中央委員，如留守在北京的彭眞、黃克誠等，一同上山的。

在廬山上，林彪並不是批判彭德懷最落力的一個，然而卻是毛澤東之外，最具影響力的一個。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批判彭德懷的常委會議。會上，毛澤東做了長篇講話，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帳，從井岡山講到百團大戰，講到抗美援朝，結論是：「彭德懷與我的合作與不合作是三七開，合作是三，不合作是七」。其中，林彪多次插話，那些話短小、精闢而又打中要害，充分顯示出林彪的風格。

八月一日，舉行第二次常委會議。朱德先發言，態度比較溫和，只就信的內容而談，顯然是沒有

「擊中要害」。只講了幾句，毛澤東即將腿抬起，用手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滿臉通紅，停止了發言。

林彪見狀，便急忙補上發言，他只講了幾句話，但卻是字字千鈞。林彪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僞君子，馮玉祥式的人物。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林彪說時聲色俱厲。這幾句話便成了即將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的基調，也成了給彭德懷戴上的政治大帽子。

照例又是毛澤東唱主角，作長篇發言，之後是劉少奇發言，接着便是林彪發言。林彪說：

「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你混同了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個人野心，政治方向，靈魂深處沒有脫胎換骨，危險在此，是個不馴服的黨員」，「好犯上」，「對上級同級不尊重，對下看不起，項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好名，攬權」，「老奸巨猾，老於世故」，「利用坦率迷惑人，採用迷人辦法，事實證明是右傾，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把」，「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但沒有這個野心：搞大局面，自己的一套拿出來。這種雄心、信心都沒有。缺點是有暮氣，主席講元帥有暮氣。這樣大局面，理論知識，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

林彪的講話不很長，但句句是刀子，字字似子彈，「又刁又狠」，比起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發言，更具殺傷力。

八月十六日，八屆八中全會結束，通過了《關於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爲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

八月十七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宣布，中央決定任命林彪爲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九月十七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公告：根據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決定，任命國務院副總理林彪兼任國防部長，免去彭德懷兼任的國防部長的職務。

林彪踏着彭德懷的身軀，在廬山崛起。

林彪的崛起，標志着毛澤東與林彪的第二次結盟開始運轉了。

第三章　林彪：從未迷信毛澤東

林彪對毛澤東的態度，最富爭議性，也最令人感到興趣。

就像講孫悟空離不了「金箍棒」和「七十二變」一樣，講林彪就離不了「高舉」、「緊跟」。由於官方的宣傳機器長期的、大力的宣傳，「林彪是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最好的學生」、「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家喻戶曉，老幼皆知。

「九·一三」以後，一夜之間，林彪又被說成面目猙獰的魔鬼，「陰謀殺害毛主席」，準備搞武裝政變，是毛主席最兇惡的敵人。

這種截然不同的宣傳，必然使人們驚愕，如同掉進五里霧中。

林彪對毛澤東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

林彪對毛澤東的態度，可分爲三個時期：

一、由一九二八年至第四次反圍剿，這是早期；

二、由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這是中期，

三、由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這是晚期。

在早期，林彪對毛澤東是熱愛的，敬佩的。在思想上、行動上，能與毛澤東保持高度的一致，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方針、路線。由於將毛澤東視爲師長，林彪在此時期對毛澤東的熱愛具有一種年青人的純

眞與虔誠。

在中期，是林彪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瞭解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林彪建立起了鮮明的自我，而對毛澤東的方針路線，已不是無條件地支持了，而是有選擇地區別對待，認爲合理及對自己有利的，就支持，否則就不支持或反對。在此期間，林彪做了不少與毛澤東的思想相違背的事情，如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發表《論短促突擊》，一九三五年在會理要求毛澤東下台，一九三六年要求游擊陝南，一九三七年平型關大戰，以及在東北戰場上一系列與毛澤東的意見相左的行動，都是背棄毛澤東的具體表現。因此，在這個時期，林彪對毛澤東維持一般的敬愛。

値得一提的是，人們向來認爲，林彪對毛澤東的研究是在建國之後，由於養病，沒事幹，便對毛澤東進行研究。其實，林彪對毛澤東的觀察和研究是長期的，解放後的研究只是比較集中而已。林彪是中共幹部中對毛澤東認識得最早、最徹底的一個，他對毛澤東似乎有一種特別的、異乎常人的深刻洞察力。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開幕。在聽了毛澤東在「七大」上的報告的第二天，羅瑞卿到林彪家中擺龍門陣，羅瑞卿說：「毛主席講到對犯錯誤者，只要他們願意改正錯誤，就要同他們團結的時候太激動了。我從來還未見過主席這麼激動過。」林彪聽後淡淡一笑，說：「人家毛主席是在呼吁團結。」羅瑞卿覺得林彪的話不能說不對，可是總感到那腔調，有點異樣的，特別的東西。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開始搞個人崇拜。對此，斯諾、史沫特萊等中外記者均有記載。經過整風運動，毛澤東批判了歷史上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將全黨的思想統一到自己的路線上來。一九四五年「七大」時，延安楊家嶺中共中央大禮堂會場中的會標，大字寫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奮勇前

進」。毛澤東在大會上呼吁的團結，是在毛澤東旗幟下的團結，是以他為核心，服從他的領導的團結。這種團結毛澤東當然是歡迎的。可是，敏感的林彪從這裏似乎已經嗅出了家長制的味道，嗅出了「假公營私」的味道。因此，林彪的腔調和口吻是輕蔑的、不敬的。這就是羅瑞卿感到怪異的原因。

在後期，林彪對毛澤東的方針、政策、路線、思想、意識、作風、脾氣、性格、習慣、行為、內心、喜惡、愛好等，進行了深入的集中的觀察、揣摩和研究，從而對毛澤東有了透徹的認識和瞭解。這時期，林彪與毛澤東在思想上的分歧，如同鴻溝，對毛澤東的許多重大的內外方針大計，林彪都持有不同的、反對的意見。同時，對毛澤東的一些所做所為、品行作風，林彪也持着否定的態度。林彪對毛澤東，已由熱愛轉為憎惡，由敬仰轉為怨恨和懼怕。在中共黨內，對毛澤東持批判態度的並不少，但批判得像林彪那樣深刻和徹底的卻不多。

毛澤東這座神，在很大程度上是林彪捧起來的，人們往往將林彪和個人迷信連在一起。但是，在實際上，林彪自己卻從來不迷信他捧起來的這座神。即便是在早年，林彪對毛澤東的敬愛，也不是徹底的、無條件的、盲目的。林彪從來都沒有將自己溶化在毛澤東的偉大裏。

如果說林彪有甚麼「上帝」的話，那麼這個「上帝」就是他自己。他說：「在戰場上，你唯一可以信賴的只有自己」。這是林彪在戰場上的信條，也是他在政壇上的信條，是他終生信守的座右銘。在林彪的人生觀中，「自我」是至高無上的，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因此，在與毛澤東的交往中，不論在何時何地，林彪都能夠保存着一個具有鮮明特徵的「自我」。

林彪的「自我」表現在那裏呢？

首先是自己的思想和見解。一九二八年，當林彪與毛澤東在井岡山相會時，他只是個二十一歲的初出茅蘆的「娃娃」，職務也只是個低級軍官。而三十五歲的毛澤東，卻是個名播遐邇的老資格革命家、政治家，又是井岡山根據地上的「最高統帥」。可是，林彪對毛澤東不是盲從、愚忠，而是獨立思考，坦陳己見，直言不諱，竟然向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關於革命根據地、革命前途等不同看法。這就是著名的毛林之間關於「紅旗能打多久」的爭論。

毛澤東與林彪的公開爭論，發生在一九三〇年。事實上，早在井岡山時，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而毫無出路的情況下，林彪沒有盲從毛澤東，而是與不少人一樣，產生「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來信到達紅四軍後，信中對時局的悲觀的看法，對林彪也產生了影響，「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帶到了一九三〇年。元旦這一天，林彪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除了向他賀年外，又提出了自己對時局及革命前途的看法，直言自己認爲中國革命高潮不會很快到來，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和一年爭取江西的戰略很難實現的觀點，並建議毛澤東採取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等等。

毛澤東收到林彪的信後，於一月五日給林彪寫了覆信，那就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九・一三」事件後，林彪的信被當作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證據；而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則被當作是對林彪悲觀情緒進行嚴厲批判的宏文。其實，在當時的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對革命前途說些悲觀失望的話，發點牢騷，那純屬小兒科，普遍得很。林彪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善於獨立思考，因而有一整套關於悲觀失望的看法，成爲了一個「典型」；另外，林彪不隱

瞞自己的觀點，直陳不諱，爲毛澤東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教材。毛澤東出於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順手便抓住了林彪這個典型。而毛澤東的覆信，口氣溫和，循循教導，批判是談不上的，批評、教誨、開導卻是眞。而且，在當時，只有關係親密者之間，才互通信函，交流思想。林彪與毛澤東的通信，表明了他們之間關係的融洽與親近。

毛澤東給林彪的覆信，最早發表在一九四四年由淮北蘇皖邊區黨委出版的《拂曉》刊物的第十二期上，後又收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蘇中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上。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寫信給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再出版《毛澤東選集》時，在這篇文章中不要再公開自己的名字，以免「在群衆中引起誤會」，避免外國「種種無益的推測」。當時，林彪已是手握重兵的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毛澤東考慮到林彪的政治影響，同意在文章中刪去了有關林彪的字句。

對於這一樁公案，林彪和毛澤東似乎都耿耿於懷。

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在重遊井岡山時，叫人代筆寫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岡山》：

繁茂三灣竹樹，
茫茫五哨雲煙。
井岡搏鬥憶當年，
喚起人間巨變。
紅日光彌宇宙，
戰旗涌作重洋。

工農億萬志昂揚，
誓把敵頑埋葬。

四十年前舊地，
萬千往事縈懷。
英雄烈士名蒿萊，
生死艱難度外。
志壯堅信馬列，
豈疑星火燎原。
輝煌勝利盡開顏。
鬥志不容稍減。

回到北京後，林彪將這首詞送給了毛澤東，其意似乎是用「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來反駁毛澤東當年對他的批評。

而毛澤東看了林彪送來的詞後，微微哂笑，用紅鉛筆在「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劃了二條粗杠，並打了一個問號，說道：「這是歷史公案，不要翻了。」

對這樁「歷史公案」，剛直不阿的黃克誠將軍有一段十分中肯的專門論述：

譬如，林彪寫信給毛主席，提出『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在黨內來說，一個下面的幹部，向黨的領導反映自己的觀點，提出自己的意見，現在看來這是個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觀點隱瞞起來，上面說甚麼就跟着說甚麼，這是不正確的態度。林彪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儘管觀點錯誤，但敢於向上面反映，就這一點說，是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態度。在黨內有甚麼意見就應該提出來，現在應該提倡這種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見，生怕自己吃虧，這不好。提的意見不一定都正確，還可能是錯誤，這不要緊，錯了可以批評。由於林彪提了這個問題，毛主席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個問題，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寫不出來。在黨內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按照組織系統提出自己的意見，我們應該提倡這種事情，不是批判這種事情。特別現在應當提倡這種作風。在『文化大革命』中，誰說一句錯話就記帳，弄得誰也不敢講話，怕說錯了挨鬥。據我瞭解，像這類的事情林彪不止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見還有提的更厲害的。

在我們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沒有錯誤的人是沒有的，沒講過錯話、沒有做過錯事的，恐怕一個也找不出來。毛主席也犯過錯誤嘛。

毛澤東雖然是中共的偉大領袖，英明的導師，但是在某些方面，他的眼光，他的胸襟，他的思想境界，比起黃克誠還要低三等。

毛澤東還有作爲一個偉大領袖所最忌諱的，也是最令人可怕的一點，那就是特別愛記仇。

林彪雖然年紀輕輕，但是善於獨立思考，凡事有自己的思想和見解，不人云亦云，不隨大流。林彪從未將毛澤東思想當作自己的思想、行爲的準則。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追求自己獨立思想和獨特風格的傾向，越來越強烈，越來越鮮明。

由於林彪在六十年代大搞「高舉」和「緊跟」，加上輿論媒界大力宣傳毛澤東與林彪的「親密戰友」的關係，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印象：好像林彪對毛澤東從來都是唯命是從，唯唯諾諾，毫無自尊和主見，只懂得拍馬和吹捧。其實，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長期擔任周恩來秘書的何樹英有以下的說法：

整個的武裝鬥爭時期，應該說，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澤東一邊。在元帥中，他是戰功顯赫的一位；雖然在資歷方面不如陳毅元帥等人，但還是以戰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帥中排名第三位。朱德是總司令，在井岡山時期便以「朱毛」確立了自己的歷史地位。彭德懷是副總司令，在長征及到達陝北時期，曾代理過總司令職務。除了這兩位總司令在歷史上已形成了所處地位，林彪無法超越，其他的軍事領袖都排名在他之後。

現在有種成見性的說法，即「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這種說法是不够全面也並不能反映全部歷史真實的。林彪若只是這樣一種小人，以毛澤東的英明，那麼多共產黨領袖人物的睿智，是不會讓他身處元帥第三，並最後當上毛澤東接班人而寫入黨章。

爲毛澤東服務的一組的同志常對我們講一些情況，有時我們跟隨周恩來見毛澤東時也可以感覺到，林彪曾經是忠誠於毛澤東的。表現這種忠誠決不是人們現在所說「當面喊萬

歲，背後下毒手」，恰恰相反，是「當面敢頂撞，背後喊萬歲」。

在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中，特別是在軍隊幹部中，在七居二中全會後仍然敢於當面頂撞毛澤東的，爲我們工作人員所見並留下深刻印象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彭德懷，由於在廬山會議上對着毛澤東摔帽子，剃光頭，掄胳膊罵娘而聞名全國，留名歷史，無須我多講。另一個頂撞毛澤東厲害的就是林彪。這一點也許還不爲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說。

井岡山時期，長征路上，抗日戰爭中，解放戰爭中，林彪多次頂撞毛澤東，有時頂得很厲害，過去的文章中寫過毛澤東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甚麼？」其實林彪挖苦毛澤東也不輕：「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聽說，我是在前線親眼見！」許多人都曾見到林彪頂得毛澤東講不出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

解放戰爭，林彪在東北確實打得出色，他與毛澤東有過幾次意見分歧。有的意見毛澤東對，有的意見林彪對，最後都是誰對就照誰的意見辦。本來，工作中有不同意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後來的政治鬥爭，硬把這種意見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貫緊跟」，要不就是「一貫反對」。然而，這種淺薄而庸俗的評價永遠不會成爲歷史的聲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戲而已。

林彪頂撞毛澤東並不像彭德懷常常帶有濃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對事不對人，公事公辦的態度。他每次去見主席，基本都是談工作，並沒有甚麼私交。他見主席很少有笑臉，不請自坐，並且軍人氣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兩目平視毛澤東，有事說事，沒事告辭。談事時，基本是板着面孔，該匯報的匯報，該聽指示聽指示，聽到不同意見，

有的接受，有的爭論。他爭論時，不喊不吵，聲調始終平板、平淡，喜歡講一句：「不是那麼回事」。然後陳述自己的意見。一組的同志多次見他堅持自己的意見。

當面頂撞「不是那麼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聽說，我是親眼見！」背後卻不許人說毛澤東一個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對面時與毛澤東有爭論，在公開的會議上從來不爭，而是全力維護和擁護毛澤東。有了成績，歸毛澤東；有了錯誤，算自己或大家的。比如在東北戰場上，毛澤東曾經想不叫國民黨進東北，用武力擋住他。林彪一再爭論、一再陳述己見，毛澤東才改變了方針：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我們由此爭得了主動，林彪不說自己的意見對了，而說毛主席的英明，歸功於毛澤東。

黃克誠也有類似的看法。「紅旗能打多久」之爭，只不過是林彪「頂撞」毛澤東的眾多事例中的一樁。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林彪在中國紅軍的軍事刊物《鬥爭》和《戰爭與革命》上發表的文章被南京的軍事刊物轉載，受到他們的研究和評論，在日本和蘇俄也是這樣。他以短促突擊戰創始者著稱，馮玉祥將軍曾就這種戰術發表過評論。據說一軍團的許多勝利都可歸因於紅軍熟練地掌握了短促突擊戰。

斯諾的話並不完全對。事實上，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短促突擊」不僅未能使紅一軍團獲得勝利，反而將紅軍陷入慘敗。

實際上，林彪發表的《論短促突擊》，是對毛澤東的一種背棄。

毛澤東向來主張的戰略戰術是「運動的遊擊戰」，是那著名的「十六字訣」。王明的「左」傾領導統治中共中央後，將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罷免，代之以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短促突擊」就是李德和博古等人提出的。

林彪素以善長打運動戰著稱，他一開始就反對這種「短促突擊」的戰術，因爲如陳雲所說：「短促突擊拒絕了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戰術」。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林彪和聶榮臻向中央軍委提出恢復毛澤東的運動戰的建議，結果遭到中央軍委的批評，並告誡林彪，要堅決服從命令，不要脫離中央的正確軌道，導致不可挽回的惡果。

在李德和博古的淫威下，林彪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請李德來一軍團講授「短促突擊」戰術。李德整整講了一天，但紅一軍團的指戰員紛紛反應說「聽不懂」。林彪說「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學嘛」。於是林彪埋頭鑽研「短促突擊」。由於他愛動腦子，果然有所悟得，並將之寫成文章，題爲《論短促突擊》，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發表。文章中提出了二十七條實行的措施和注意事項，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讚賞。

林彪並不是毛澤東的盲目的、堅定不移的支持者。

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上，李德、博古等人的錯誤受到毛澤東等人的嚴厲批評和清算，「短

促突擊」自然包括在其中。對此，林彪有些坐立不安，在會議上也沒有甚麼發言，而且會後也遲遲不向一軍團幹部傳達會議精神。當時擔任紅一師師長的李聚奎這樣認爲：「雖然林彪在參加遵義會議之後就回到了部隊，但卻沒有及時給我們傳達」，「不能不說同林彪對遵義會議的態度曖昧有關。」

李德在遵義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並被解除了領導職務，他想起了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林彪，便主動要求到紅一軍團去。沒想到林彪冷淡地接待了這位失去權勢的「太上皇」，寒暄之後，林彪指定軍團管理科科長照顧好李德的生活，說完便不再理他，甩袖而去。李德氣得一肚子火。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重新上台，擔任了紅軍的領導職務，指揮紅軍四渡赤水，二打遵義，在雲貴之間來回運動。林彪雖然執行了總部的命令，但善於獨立思考的他對毛澤東朝令夕改的指揮作風十分不滿，對翻來覆去走路的行軍方式尤爲惱火。林彪向聶榮臻抱怨說：「盡走弓背！盡走弓背！不會走弓弦嗎？這樣會把隊伍拖垮的，像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

聶榮臻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好比落在敵人的口袋裏，如果不聲東擊西，如何出得去？」

林彪看見聶榮臻不支持自己的看法，在會理休整時，便給彭德懷打電話，說：「彭總，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了。我們服從你的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

彭德懷拒絕了林彪的要求，回答說：「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現在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至於我，則更不適當。」

彭德懷斬釘截鐵的回答，令林彪感到難堪。他苦笑了一下，對聶榮臻，左權（紅一軍團參謀長）等人說：「彭德懷眞倔。」

很明顯，林彪是在反對毛澤東的領導。對此，作爲政治委員的聶榮臻批評林彪道：「你不要亂來，

你是甚麼地位？你怎麼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

林彪的個性是：決定了的事，很難令他改變。過了幾天，林彪給中央三人指揮小組寫了一封信，要求朱毛隨軍主持大計，讓彭德懷指揮作戰，迅速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林彪把信交聶榮臻看後，請他簽名。

但聶榮臻說：「革命到了這樣緊急關頭，你不要毛主席領導，誰來領導？你剛剛參加了遵義會義，現在又反對遵義會議，這個態度是很錯誤的，是違反紀律的。我不能簽這個名，我也堅決反對你簽名送上這封信。」

結果，林彪獨自簽名送出了這封信。

毛澤東看了林彪的信，大吃一驚。但他以為這封信是林彪的語言，彭德懷的思想，林彪少不更事，是比他大九歲的彭德懷在搗鬼。這個誤會，愛記仇的毛澤東記住了二十多年，不止一次地公開批評彭德懷的搗鬼。而彭德懷蒙此不白之寃，直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給彭德懷算歷史總帳時，林彪才承認這封信是自己寫的，與彭德懷無關。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澤東在會理城外的一家鐵匠舖裏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林彪。毛澤東說：

「現在有個別軍事指揮人員，打了幾個勝仗，就自以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翹到天上去了。其實沒有紅一方面軍指戰員的齊心協力，靠個人，就是三頭六臂，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樣？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評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論，我們中央和中央軍委誰也不是白癡，如果能走弓弦，誰願走那個弓背……戰士有這種想法，不奇怪，作為紅一方面

軍高級指揮員有這種想法就是錯誤的。」

周恩來也批評林彪的錯誤。

林彪辯解道：「我給中央寫信，沒有別的目的，也是希望革命少走彎路。」

毛澤東厲聲斥道：「你是個娃娃，你懂得甚麼？」

紅軍經過了千辛萬苦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

迎接林彪和紅軍的，並不是看慣了的江南的水鄉澤國、魚米之鄉，而是荒涼貧窮的黃土高原。在這裏，人煙稀少，經濟落後，除了狂風塵暴中的幾孔殘破的窰洞，連樹木綠草也不多見。天是黃混混的，地也是黃混混的。林彪的內心跟這黃土高原一樣悲涼。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瓦窰堡會議前夕，曾徵求各軍團領導幹部對今後戰略問題的意見。藉此機會，林彪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帶領部隊到陝南去打游擊。林彪在信中說，開辟陝南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更有意義。林彪還開列出一張長長的名單，要求將紅一軍團主要幹部盡數調走，跟他一起南下。

林彪又與毛澤東產生分歧。

毛澤東的戰略意圖是要建立陝北革命根據地。陝南雖富庶，但那是敵軍胡宗南和東北軍的天下，根本沒有紅軍立足之地。而經過長征後，紅軍（紅一方面軍）只剩下這麼一點點力量，如再分兵南下，力量就更單薄了，很難有所做爲。毛澤東意識到，在陝北的困難面前，林彪又動搖了。於是，毛澤東找來林彪談話，批評他的悲觀思想，指出他與中央存在分歧，希望他及早改正。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林彪依然是個少不更事的娃娃，想起井岡山與江西蘇區的戰鬥情誼，毛澤東語氣溫和，循循告誡，希望林彪回

心轉意，在思想上能與自己及中央保持一致。

林彪那執拗的性子，使他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主意。幾天後，林彪在一封電報裏又再次提出「我還在期待中央批准我南下游擊。」

這一次，毛澤東沒有再理會林彪的要求。

正在這時候，林彪的堂兄張浩（即林育英）歷盡危險和辛苦，把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主要文件和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指示，帶回到陝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窰堡。聽了張浩傳達的文件精神後，林彪才打消了南下的主意，投身入建立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林彪那獨立自主的精神和善於獨立思考的特性，加上倔強的個性，使得他從不盲從、愚忠於毛澤東。他的思想與毛澤東時常出現分歧，甚至衝突。發展到了五、六十年代後，毛澤東的思想、路線、方針、政策越來越向「左」偏移，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犯下許多錯誤。對此，林彪更有自己的一套與毛澤東截然不同的看法，導致林彪與毛澤東在思想上的鴻溝日益加深，最後竟分道揚鑣。林彪因此而獲得了一個恰如其分的外號：「搖擺不定的毛派分子。」

另一方面，林彪頑強地保留着自己的利益和奮鬥目標。林彪參加中共和投身革命，是摻雜着自己的利益和目的的，對此林彪從沒有忘記過。當革命利益與自己的利益一致時，林彪全神投入，表現得有聲有色；但是，當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損害時，林彪就不惜當逃兵。林彪與毛澤東的合作也是這樣，當毛——林利益一致時，林彪才會全力以赴，與毛澤東合作無間。林彪從來沒有將毛澤東的目標和利益置

於自己的之上，或取代自己的目標和利益。因此，在毛澤東被王明、博古撤職，失去紅軍的最高指揮權後，林彪便放棄對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理論的支持，發表文章支持毛澤東的對立面李德的「短促突擊論」。一九五〇年，毛澤東要林彪率領志願軍抗美援朝，但林彪感到沒有打贏的把握，如果輸了，一世英名將付諸東流。於是拒絕了毛澤東的任命。一九六九年以後，毛、林之間發生嚴重的利害衝突，導致了兩人的政治聯盟的崩潰和決裂，於是林彪再一次大動搖，那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對林彪來說，毛澤東既不是神聖的偶象，也不是敬愛的導師、領袖；這位曾經統治和主宰了八億人民的身心的至高無上的神祇，在林彪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盟友，是個可資利用，以便達到自己的利益和目標的工具。

第四章　林彪心中的毛澤東

「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這是「九·一三」以後在中國流行的一首打油詩。此詩刻畫了林彪在公衆場合與在私底下裏對毛澤東的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在私底下裏，林彪心目中的毛澤東是怎樣的呢？

經過長期的觀察、揣摩和研究，林彪對毛澤東有了透徹的認識。林彪曾將這些認識，以格言、箴語、散記的形式寫下來，以供自己參考和利用。下面引錄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先爲你揑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揑——老東（指毛澤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着」。

這段話，是寫在一張《新華報》的散頁，貼在一九四九年版《邏輯的產生和發展及其法則》一書中。

這是林彪根據自己的經歷體驗及其他人的遭遇，而總結出來的感想。「揑造」，即是妄顧事實，羅織罪名，生按硬造，抓其一點，不顧其餘，捕風捉影，無限上綱。這種事情毛澤東並沒有少做。彭德懷便是一個活生生的、衆所周知的例子。一九四五年延安召開的華北會議上，毛澤東就是用這種手法整彭德懷，整整四十天，彭大將軍被蒙上不白之寃。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再次被整。毛澤東給

他羅織了「裏通外國」和組織「軍事俱樂部」的罪名。在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上，彭德懷被逼迫交待子烏虛有的「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彭德懷不願累及無辜，又被逼迫不過，便怒喊道：「你們誰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便來報名吧！」這一招果然使「打手」們收斂了，但是「裏通外國」這一條卻怎麼也說不清，擺不掉，一直到死，還背着這一根本不存在的罪名。

最典型，也是最鮮為人知的例子，是反右鬥爭。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毛澤東揑造了一個「章羅反黨聯盟」。章，是指章伯鈞，曾加入了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後脫離中共。反右時任「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第一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羅，即是羅隆基，曾任大學教授、報刊主編，反右時任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第二副主席等職務。

羅隆基生性倔強，鯁直，看不慣，也看不起章伯鈞的為人、作風。兩人雖然同在「民盟」任職，但一見面就爭吵，兩人的關係長期以來勢如水火，除了公開場合，兩人從不私下交往、談話。章、羅無論是思想、作風、性格，無一相同。這是京城人所共知的事。

然而，毛澤東卻在《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甚麼？》及《〈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中，揑造出一個「章羅反黨聯盟」，一時間，億萬群衆口誅筆伐，勢如排山倒海。

當時，羅隆基出國訪問。回國到達昆明時，看報紙才知道出了個「章羅聯盟」。羅隆基立即打電話給北京的章伯鈞，憤怒地質問：「我甚麼時候跟你結成『聯盟』？怎麼『聯』的？你說呀！你說呀！……我明天就回北京，我要找你算帳！」

第二天羅隆基回到北京，當天下午便找上章伯鈞的家門。一見面，羅隆基便說：「伯鈞，我們吵得還不夠嗎？我們吵了多少回？天曉得！可笑，可笑，可笑之極！」

原來，當羅隆基在國外訪問時，章伯鈞已被鬥得五顏六色，被逼迫承認所謂的「聯盟」。章伯鈞熬不過，只好承認與羅隆基思想上相近，存在共鳴，亦即「思想上的聯盟」。所謂「聯盟」者，都是指組織上、行動上的聯盟，天底下那有「思想上的聯盟」？這可是滑天下之大稽。

羅隆基說：「你承認甚麼『思想上』存在聯盟，我跟你思想上分歧那麼大，那會存在『思想上的聯盟』？我們之間，不光是沒有組織上的聯盟，就連思想上的聯盟也根本不存在！」

兩人吵了近三個小時。最後，羅隆基憤怒地厲聲道：「章伯鈞，我過去沒有跟你『聯盟』，現在沒有跟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跟你『聯盟』！」

說罷，羅隆基雙手橫握手杖，用力往大腿上一砸，咔嚓一聲，手杖斷爲兩截。

「你我之間，如此而已！」羅隆基將折斷了的手杖往地上一扔，揚長而去。

原來，毛澤東認爲，光憑章、羅等人在「大鳴大放」中的言論，還不足以定罪，且天下人不服，也不足以證明毛澤東發動的這場「陽謀」的必要性。因此，必須指出右派分子在組織上是「聯盟」的，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如此才「師出有名」。於是，章、羅這兩位生死寃家便成了「聯盟」，成了全國最大的「右派分子」。

毛澤東製造了一件千古奇案，鬧出了一樁莫大的歷史笑話。

毛澤東的「並無，揑造」手法，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使得出神入化，得心應手。然而，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已指出了毛澤東這一「特性」。足見林彪對毛澤東認識上的「先知先覺」與「眞知灼見」。

林彪在一九五〇年版的《論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的封底上寫道：

「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無鋒芒的必要」。

這些箴語，林彪雖有意講得隱晦，曲折，但其意思還是淸楚的。小幫幫即是小幫派，小團體，小圈子。毛澤東需要屬於自己的小幫派，來貫徹、執行自己的方針、主張。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喜歡有小幫派爲其「歌功頌德」，而對於「逆耳忠言」及不同意見，則是「鋒芒」以對。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版的《毛主席語錄》扉頁上寫道：

「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佔多數否」。

建國後，毛澤東的思想日漸「左」傾，其路線、方針、政策越來越脫離實際，脫離群衆，在政治局、中央常委中得不到支持，經常處於少數。可是越到晚年，他就越固執地堅持這些錯誤的東西。於是，「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佔多數否」。爲了得到「多數」，使自己那些錯誤的主張得到貫徹，毛澤東在失去眞理後唯有依賴「個人崇拜」。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提出「需要個人崇拜」，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再次提倡「個人崇拜」的根源所在。林彪洞察毛澤東的心機，上台後便投其所好，率先大搞「個人崇拜」。《毛主席語錄》便是其中的傑作。

林彪的這句話，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精闢注解。

林彪在一九六一年版的《辭海》扉頁上寫道：

「你先說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一致。」

這是兵略上的「虛虛實實」、「聲東擊西」在政治鬥爭中的運用，是林彪根據自己的切身經歷而總結出來的體會。建國後，毛澤東將封建皇帝治國安邦的寶典《資治通鑑》讀了十七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官廷鬥爭的權術，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你說東，我就偏說西，叫你捉不着，猜不透，掌握不到真正的玄機」。毛澤東在與劉少奇的鬥爭中，就常常運用這一條。一九六七年一月，「打倒劉少奇」的大字標語已是鋪天蓋地。十三日深夜，劉少奇去見毛澤東，提出由自己承擔全部錯誤，以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減少傷害和損失，並要求允許自己去延安種地。毛澤東沒有就劉少奇的問題做任何的回答，只是要他回去多讀馬列的書。劉少奇那裏知道，早在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和王光美的「專案組」已經偷偷地建立了，毛澤東那裏會放過他。然而，在會見時，劉少奇說東，毛澤東便說西，臨走時還將劉少奇送出門外，害得劉少奇回到家喜滋滋地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還挺和氣。」但兩天後，就被抄家了。

這是很高明、又很厲害的一招。在虛虛實實之中，既可保護自己，又可令對手分不清東西南北而中招。彭眞的「二月提綱」事件，劉少奇的「派工作組」事件，都屬於這一類。

爲了避免中招，材彪提醒自己「當聽他先說」，這樣才能與領袖的「戰略部署」保持「一致」。

林彪在一九五八年版《學文化辭典》中「個人崇拜」條目旁寫道：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爲己，過爲人」。

林彪還在私底下與身邊的人說：

毛澤東「言行不一」，「愛搞權術」。

林彪還說：「誰不說假話，誰就垮台」。

「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這是林彪對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眞實寫照，實際上也是他對毛澤東的一種政治認識。這裏面包含了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毛澤東「左傾」思想急劇膨脹，頭腦發熱，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指標，黨內黨外，全國上下，一片弄虛做假的浮誇風氣。另一方面是表明了毛澤東的專橫獨斷的家長式作風，聽不得不同意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人人必須跟着說假話，否則就「辦不成大事」，甚至「垮台」。

林彪對毛澤東的認識和評價，還可以從《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見一斑。在這份由林立果策劃泡製（中共官方說是林彪授意的）的政變綱領裏，對毛澤東（代號B-52）有如下評述：

「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片；

「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衆鬥群衆，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時向所有方面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語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可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成階下

四；

「今天拉這個打那個，明天拉那個打這個；

「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哪一個開始被他扶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爲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

「他是一個懷疑狂，瘧待狂，他整人的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都嫁禍於別人；

「戳穿了，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他不是一個眞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大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

不但如此，林彪在私底下還認爲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犯了一系列的重大錯誤：

林彪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後，就斥責毛澤東：「憑空想胡來」，「說絕了，做絕了，絕對錯」；林彪還說彭德懷七月十四日的信「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

林彪還對女兒林豆豆說：「劉少奇在理論上比毛主席講的透。」又說：「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林豆豆說林彪還爲此哭過。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私底下一再對林豆豆和他的秘書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甚至反感。

林彪還對他最疼愛的女兒林豆豆講了許多關於毛澤東、關於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許多陰暗的、負面的東西，講了對黨和國家前途的一些悲觀看法。林豆豆將這些話寫進日記裏，被「林辦」黨支部書記關光烈看到，非常害怕，說：「你不能寫這些東西，寫這些東西不得了！」受到林彪這些言論的影響，二十歲的北京大學學生的林豆豆對前途失去信心，吞下大量安眠藥企圖自殺。（以上見《我所知道的葉群》）

這就是林彪對毛澤東的眞正的、實際的認識和看法。

在三十年後來看林彪當年對毛澤東的這些認識和看法，不能說是錯誤的、不正確的，也不能說是膚淺的、幼稚的。林彪的許多看法，已被事實所驗證，很多人現在都在說着與林彪當年說的意思相同的話。就認識毛澤東這一點來說，不能不承認林彪是先知先覺，帶眼識人。

第五章 林彪與政治

「九·一三」事件後，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編著的《林彪與孔孟之道》一書的「前言」中說：「林彪這個政治騙子，不讀書，不看報，不看文件，是個甚麼學問也沒有的大黨閥、大軍閥」。據說，這是「最高指示」，是「欽定」的。

除此以外，給林彪戴的帽子還有：「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蘇聯修正主義的走狗，內奸，萬人憎惡的魔鬼，超級間諜以及劉少奇一類的政治騙子」。名目之多，超過了劉少奇，排名第一，堪稱「中國最大的鬼」。

在這衆多的帽子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毛澤東「欽定」的那個「政治騙子」。騙了誰？騙了毛澤東。在那方面受騙？是政治，所以叫「政治騙子」。毛澤東是個政治經驗十分豐富老到的政治家，是個「政治天才」。能夠令到毛澤東在政治上受騙的人，豈不成了「超級政治天才」？

說林彪是軍事上的天才，很多人都會接受。但說林彪是政治上的天才，則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即使接受了，也要加上引號——「天才」：雖然承認他是天才，那也是貶意的，並不等於承認他的……一個引號能包含這麼多的意義，中國文字的精妙，可見一斑。

林彪的軍事天才，確實非凡，仗打得出神入化，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又刁又狠」。蔣介石的百萬大軍，又是美式裝備，又是機械化兵團，但在第四野戰軍的打擊下，如拉枯摧朽，如秋風掃落葉。黃

克誠大將在一九八五年說：「林彪是一位戰將」，「他是有戰績的」。其實，林彪在政壇上表現出來的才能，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點也不比在戰場上遜色。在戰場上，林彪打敗了杜聿明、衛立煌、陳誠，在政壇上，林彪可騙倒了毛澤東。

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林彪在接見總政治部部長以上幹部時講話說：「我這個人是搞軍事的，一向分工抓軍事工作。但是，我的興趣是搞政治，搞無產階級政治。我搞軍事是鬥爭的需要。其實我年輕的時候就愛搞政治，對政治感興趣，我的職業是搞軍事，興趣是搞政治。毛主席一貫搞政治，我是學毛主席的。他的法有效力，我也學他的法。」

林彪此番話甚耐人尋味。

「亂世出英雄」。林彪投身革命時，正值國、共分裂，共產黨人迫切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因此從事武裝鬥爭，變得特別吃香，毛澤東當年就是看準了這一點，拒絕去上海坐亭子間，而要去當「山大王」。「八·一」南昌起義後，軍隊、戰爭成了中共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軍事負責人在中共領導中佔據重要地位。這種大氣候爲林彪的發展提供了大好機會，他的聰明才智在戰爭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從而也得到了很大的回報。然而，軍事的局限性在建國後很快就表現出來了。

五十年代初期，林彪到莫斯科療養，受到了斯大林的盛情款待。在一次宴會上，斯大林稱林彪爲「無敵將軍」，並半開玩笑地說：

「林彪同志，中國現在已經和平了，作爲軍人，你失去了用武之地。你才四十三歲，你不感到可惜嗎？」

林彪的回答簡短而精煉：「一切爲了和平。中國人天性愛好和平，軍人也是如此。」

林彪的回答博得了熱烈的掌聲。

在掌聲沉寂後，斯大林的話不禁在林彪的心裏徘徊。在和平建設年代，軍事顯得遜色了。中共的領導原則是：「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因此，在建國後，是黨委顯赫，政府重要，軍隊無用武之地。四十三歲的林彪，需要為自己另謀出路。出路很快就想到了，那就是從政。然而在這方面，林彪具有很大的缺陷：政治資歷不夠。儘管林彪在軍隊中地位顯赫，但是在中共中央卻沒有擔當過重要職位，建國時只是中央委員，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元勛相比，相差一大截。雖然有毛澤東的刻意提拔，到五八年時便當上了中央常委、副主席，排名第六，但是，這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難孚衆望。林彪資歷、威望不足的因素仍然存在。

出任國防部長，掌握了實權後，林彪可以大展鴻圖了。

擺在林彪面前的，是一條人們走過來的老路子：抓業務，抓國防建設，抓軍備生產，抓軍隊訓練，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博個好國防部長的聲譽。然而，林彪需要的不是這個。林彪的戰略目光，並沒有限制在國防部，而是投射到全國。在國務院系統中，有軍事、外交、工業、交通、農業、文教、財貿等部門，共九十多個部、委；中共中央還有宣傳、組織、統戰、外聯等系統。國防部只是「芸芸衆生」中的一分子。軍事工作做得再好，也只是在軍隊系統內產生影響和效果，對其他部門以及全國，影響不大。例如，山西省大寨的陳永貴，發明了在荒山野嶺上修建水平梯田，帶領鄉親們艱苦奮戰，使糧食增產，博得「農業學大寨」的美名。但是，它只是在農業系統內產生影響，對工業，對汽車製造、煉鐵煉鋼就派用不上。林彪追求的不是這個。他需要的，是在全國範圍內脫穎而出，凌駕於「芸芸衆生」，壓

倒一切，成爲至高無上的楷模。因此他不能走「突出業務」的老路，需要另闢奚徑，出制奇兵。這個「奇兵」，就是「突出政治」。

毛澤東說：「政治是統帥，是靈魂」。在當時，政治與革命是同義詞，「政治挂帥」就是「革命挂帥」；最「政治挂帥」，自然就是「最革命」。而且，政治不分部門、系統，無疆無界，在全國一切機關單位、工礦企業通通適用。只有成爲「政治挂帥」的旗手，才能成爲全國的楷模。

林彪經過精心設計而提出的「突出政治」，頗有學問。在此之前，只有毛澤東提出了「政治挂帥」。經過多年的宣傳，耳熟能詳，婦孺皆知。其缺點是概念陳舊，不新又不奇，不能喚起人們的注意力。沒有襲用毛澤東的提法，另起爐灶，這是林彪的高明之處。林彪需要創立屬於自己的新口號。林彪設計的「突出政治」，其內容與「政治挂帥」相同，但「突出」比「挂帥」更有份量。「挂帥」者，即是首位、第一的意思；「突出」則含義更廣泛，也更出位。「突出」既包含了「挂帥」，又超越了「挂帥」，突出多少，到甚麼程度，從量到質都無邊無涯，沒有止境了。

「政治挂帥」本是毛澤東的「聖旨」，經改裝成「突出政治」，變成了林彪的口號，既不失去「最高指示」那雷霆萬鈞的威力，又顯得更加新奇，更有份量，又帶有林彪鮮明的特色。因此，「突出政治」一出籠，便令人耳目一新，所向披靡。

既然要「突出政活」，那麼中國最大的政治是甚麼呢？有的說是階級鬥爭，有的說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的說是「大躍進」、「人民公社」，有的說是六億人民的吃飯問題，衆說紛紜，各有各理。林彪則認爲中國最大的政治是毛澤東。林彪的取向，既大膽又特出，前所未有。這是林彪又一「高明」之處。五十年代以後，失去眞理的毛澤東不得人心，經常處於少數地位。他只好乞靈於「個人崇拜」，來

維持自己的權勢。「心有靈犀一點通」。對此林彪心領神會。因此，林彪毫不猶豫地將爲毛澤東製造個人崇拜當做最大的政治。於是，「突出政治」就變成了「突出毛澤東」，林彪一下子就抓到了中國當時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和關鍵，抓到了「時代的脈搏」。

「政治挂帥」本是毛澤東用以抗衡劉少奇、周恩來那班業務官僚的一項戰略性措施。林彪抓「突出政治」，正是投毛澤東之所好，明裏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暗中是爲毛澤東擂鼓助威，必然得到毛澤東的賞識。而「個人崇拜」更是爲毛澤東雪中送炭，幫助他實現最大的政治願望。林彪這顆「糖衣炮彈」，準確地命中了毛澤東的要害，毛澤東一下子便被擊倒了。「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得到好處的毛澤東自然不會虧待林彪這位有功之臣。

林彪的謀略成功了。他找到了一個撈取政治資本的最佳方法，找到了一條通往最高權力核心的捷徑。林彪玩弄政治的伎倆，一點也不比打仗遜色。

毛澤東以一種無限欣慰的心情，注視着林彪這顆政壇上的新明星。

六十年代，在中國政壇上，林彪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

林彪發動的「高舉」、「緊跟」和「突出政治」，成爲一場政治運動，席卷神州大地。

林彪所鼓吹的「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等，爲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所擁護和接受。林彪的這些最新和最時髦的語言，成爲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的最經典、最精采的表述，在全國和全世界，都造成了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其結果是，一方面對毛澤東崇拜的神壇被祭起來了。對毛澤東個人迷信的狂熱，越來越昇溫，毛澤

東個人的政治威望，達到了空前的「神化」的程度。毛澤東作爲中國最高的「神祇」，正式登位了。

另一方面，林彪的鼓動、宣傳，使得他成爲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最忠實的擁護者，最熱烈的宣傳者，最堅決的捍衛者，林彪將原來屬於劉少奇擁有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旗手」的光榮稱號，爭奪了過去，成爲「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光輝榜樣」。

這可是一筆異常豐厚巨大的政治資本。

林彪打出來的另一張王牌——「突出政治」，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突出政治」的原則下，林彪創造了「三八作風」、「四個第一」、「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等新的措施，尤其是「四個第一」提出，轟動了全國。

「四個第一」是指：在人和武器的關係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種工作的關係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與事務性工作的關係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關係上，活的思想第一。在當時的政治大氣候下，林彪的「四個第一」的提出，被稱爲是對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對毛澤東的《矛盾論》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精闢的概括，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光輝榜樣」。林彪的「四個第一」，在中央軍委《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中，被認爲是「創造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是人民解放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個建軍的方向。

「三八作風」也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林彪的這些「創造」，毛澤東是讚賞的。一九六一年六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不加掩飾地表

揚了林彪，肯定了他的「突出政治」的作法。毛澤東說：

「最近，林彪同志下連隊做調查研究，瞭解到很多情況，發現了我們部隊建設中一些重要的問題，提出了幾個很好的部隊建設措施」。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在給林彪、賀龍等人的信中更是明確表示：「自從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軍隊的軍事、政治工作都有一個新的發展，軍隊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論化，也更加具體化了。」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澤東在一次接見活動中，又一次肯定了林彪的做法。毛澤東說：「四個第一好。我們從前也未想到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是個發明。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

對一名高級幹部，給予如此頻繁而又鄭重其事的高度讚揚和評價，這在毛澤東來說，是絕無僅有的。

林彪的另一張王牌是「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是融合「高舉」、「緊跟」和「突出政治」爲一體的一項重要創舉。林彪提出：

「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這就是有名的「學毛著三十字方針」。

林彪還說：這一套方針「不僅適用於戰士，也適用於幹部，不僅適用於一般幹部，也適用於高級、中級幹部，適用於各行各業做各種不同工作的幹部。」

於是，在林彪的大力鼓動之下，「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滲透到全國的各行各業，每一個角落，每一名男女老幼。

「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加強了毛澤東思想對六億人民的思想統治，也進一步神化了毛澤東。而林彪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更加崇高、偉大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林彪發動的這場「高舉」、「緊跟」、「突出政治」的運動，其影響之廣泛，其滲透力之強大，其效果之顯著和深遠，它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影響了幾億人以及幾代人的思想，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林彪的這一套策略，也達到了他自己的「開闢通往最高權力的捷徑」的效果。在中央政治局與中央常委處於孤立地位的毛澤東，將林彪視爲自己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政治盟友，視爲自己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毛林已密不可分。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旬，毛澤東在致林彪的一封信中說：「你對黨內政治形勢的分析、判斷，和我基本相同。修正主義就出在中央，黨政軍中都有一批。」毛澤東還說：「望你保重身體，很多工作要我們去做。」

一九六五年十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南海住宅設宴款待林彪、葉群，當時，江青，康生也在座。席間，毛澤東說：「下月初，我們要組織反擊了（指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我們不能再等了。決定不在政治局內打招呼，這是一場政治鬥爭。我看阻力還很大，會有反覆。你給上海很大支持，你是在搞地下鬥爭，瞞着中央。」

林彪說：「我最近身體一直不怎麼好，但一直在學習、研究主席思想，增強了鬥志，看問題看得更

遠，思考問題更深入，這是主席的教導。」

毛澤東說：「有人要我早退下，望我早些去見馬克思、列寧呢！」

毛澤東這時已將林彪視爲瞞着「中央」和「政治局」搞陰謀詭計的「同伙」。

毛澤東與林彪的親密關係，從側面反映出林彪在政壇上所取得的優異成就。能不說林彪在政治方面也是個「天才」嗎？

第六章 語言專家

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林彪奉命要在會上發言。於是佈置毛家灣的秘書「拉條子」（即草擬發言稿）。秘書們經過研究，認爲林彪講話的內容離不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然而，連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都感到「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文化大革命」，秘書們又能說些甚麼呢？大家心中沒數，爲了交差，只好東抄西引，好容易湊合了四、五千字。當秘書們將拉好的「條子」念給林彪聽時，才念了幾段，林彪就截住，說：「都是些廢話！」

林彪訓斥道：「這是在作官樣文章，不是拉『條子』。你們寫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夠了。不要寫那些連成片的話，不要抄報紙上那些官樣詞句，眞正有用的話，有幾句就夠了。」

秘書們只得回去再修改。

葉群安慰秘書們：「不要怕失敗，他準備他的，你們準備你們的，要看毛主席的批示，看看『中央文革』的文件，別怕重複，只要不捅漏子就行。」

秘書們只好重新打起精神，從更大的範圍裏，做更廣泛的東抄西引。

結果，秘書們準備的東西，林彪根本沒有用。後來，秘書們看到林彪在大會上的發言記錄，覺得只有一句話像是引用講話稿的，那就是林彪一開頭講的「這次會議，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繼續」。

在中共的高層領導中，能吟詩作賦、出口成章的，並不乏其人。然而，像林彪這樣注重和追求自己的語言風格的人，卻是十分罕有。不拾人牙慧，討厭官樣文章，憎惡流行的套語，努力創立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是林彪在語言使用上的一個鮮明的特色。

林彪重視語言，將語言當作一項重要的鬥爭工具。在他與女兒林豆豆關於寫作的談話中，林彪說：「語言是形成思想、表達思想的重要工具，有了好的語言，才能使文章生動簡煉，有立體感，增強藝術性，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一篇文章沒有好的語言，就等於一碗白開水。」因此林彪對自己的語言千錘百煉，勤於推敲，不斷創新，並像藝術家一樣，努力保持自己的風格。

作家張正隆說：在語言方面「林彪也是個專家」。

有一次，林彪破例地與秘書閒聊，問秘書：「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

秘書說：「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有兩條，一條是首長對毛主席跟得緊，另一條，是首長講話少而精。」

精闢而簡煉，是林彪語言的特色之一。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的那篇「政變經」中說：「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對政權這個概念，如此表述是否科學，可以暫且不去理會。然而，用這麼少的文字來表述，卻是第一次。而且，這種表述轉達了當時劍拔弩張的政治氣氛，給人予深刻的印象。

林彪還說：「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

「槍桿子和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

在「高舉」、「緊跟」方面，林彪說：

「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

「打仗就是打政治」。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

「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把毛澤東思想眞正學到手！」

林彪極力以最簡潔、精煉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可能是長期的戰爭環境所養成的習慣。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蔣介石調動十萬大軍對江西革命根據地發起第一次圍剿。朱德、毛澤東實行「誘敵深入」的策略，指揮紅軍轉移至黃陂、小布地區。十二月下旬，東固之敵張輝瓚部孤軍深入，朱、毛下令反擊。按照「前委」的指令，林彪率領紅四軍直撲龍崗以北的上固。急行軍途中，偵察員報告張輝瓚位於龍崗。林彪立即決定改變行軍路線，簽署了一份十分簡短的命令：

上固無敵，敵在龍崗，望全軍將士奮起精神消滅之。

林彪的命令簡潔、精煉，近乎訓詞。林彪還讓參謀人員將命令用大字抄在一塊門板上，豎在部隊經

過的路口，以便使每一個指戰員都能看到。戰士們急行軍經過路口，一望便知張輝瓚部已被包圍，高興得直叫喚，行軍更快了。這時，包圍住張輝瓚部的紅三軍、紅十二軍正吃緊，紅四軍及時趕到，立即投入戰鬥。在紅軍三面夾攻之下，張輝瓚部土崩瓦解。是役殲敵九千余人，是紅軍建軍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寫道：「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建國後，林彪無意改變自己的語言風格。當秘書們向林彪請示工作時，林彪的答復常常只有幾個字：「可以」，「不用答復」，「劃掉」，「一律劃掉」，「立即去電，務必執行」。秘書們說：「他平時的說話，簡單到就像對士兵下命令一樣」。

一九六六年，紅衛兵們鬥爭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邱的妻子胡敏打電話向林彪、葉群求救，說：「我們老邱天天挨打，現在快不能動彈了，快被折磨死了！他平時對林副主席一貫忠誠，對葉主任處處尊重。林副主席和葉主任快想辦法救救他的命吧！」胡敏泣不成聲。

林彪和葉群決定保邱會作。林彪寫了一封信，給葉群持着去找紅衛兵放人。這封救了邱會作一命的信，只有九個字：

立即放出邱會作

林彪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在蘇州作出了「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

第一，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十月二十日在北京開始會談，對此應提高警惕；

第二，爲防止蘇聯利用談判作烟幕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要立即疏散，各種重要裝備，設備及目標要進行僞裝隱蔽；

第三，通訊聯絡要經常暢通；

第四，國防工業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

第五，二砲部隊要做好隨時發射的準備。

這就是著名的「第一號命令」。一句話一條，沒有多餘的廢話。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達的政變手令，只有：

盼按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意見辦

林彪

共十六個字。是否太簡單了一點？

還有：將「學習毛主席著作」叫做「學毛著」；

將「創造四好連隊運動」稱爲「創四好」；

毛家灣的秘書們稱之爲：「吝嗇的語言」。

林彪討厭囉嗦，而葉群又正好囉囉嗦嗦。於是林彪給葉群寫了一條警語：

做事莫越權，說話莫囉嗦。

語言簡潔、精煉，自然就直接明了。

毛澤東的講話比喻多，典故多，引古據史多，常常撒開來漫無邊際，侃侃而談，想到那說到那。時而引經據典極爲斯文，時而遣詞凝重故作驚人之語，時而又毫不留情地挖苦諷刺，左一個典故，右一個比喻，話裏套話，弦外有音，牽着聽者們周遊列國，往往到他嘎然而止時，人們還在雲端霧裏。

林彪的講話鮮有典故，甚少比喻，直截了當，清晰明了。不兜圈子，不賣關子，一是一，二是二，十足是戰場指揮官頒布作戰命令的口氣。

林彪的語言的另一個特色，是喜歡用重疊詞和排比句，喜歡用「最」。例如：

「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

「（彭、羅、陸、楊）他們幾個人問題的揭發，是全黨的大事，是保證革命繼續發展的大事，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是防止資本主義復闢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的大事」；

「誰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

「把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提得高高的，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空氣搞得濃濃的，把士氣鼓得足足的，把團結搞得好好的，把對敵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

「毛澤東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遠是第一位的，是起決定作用的，是靈魂，是命根

子」；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

爲了突出自己，博取更佳的政治效果，就要出位，超前和「極左」。因此在語言上也要走極端，加重語氣，加大份量，語出驚人。在這一點上，林彪卻不怕囉嗦。

林彪的語言中，有許多的數目字。

林彪認爲，用數目字來表達、概括事物，比用文字更加簡潔、明了、清晰。因此，林彪往往將一些比較複雜的思想、概念，用數目字來概括、表達，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在軍事方面，有：

「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猛戰術」，「三種情況三種打法」，「四快一慢」，「四組一隊」等等。

當時是戰爭環境，沒有正規軍事院校，幹部戰士文化水平很低，講多了，講深了，聽不懂，記不住。林彪針對這種情況，用數目字加以概括、歸納，通俗、易懂又好記。

蘇靜將軍也說：「我軍進山海關時，林彪提出『一點兩面』，我們當時都不懂，後來都接受了。所以他（指林彪）這個人，自己想出一個觀點，一個意見，一個看法，他要千方百計，絞盡腦汁，把他的觀點、意見、看法，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口號，把它表達出來，讓大家理解接受。」

林彪將這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運用到政治上，創造了「三八作風」，「四個第一」，「四好連隊」，「五好戰士」，「老三篇」等等，收到了十分顯著的效果。

以「三八作風」爲例。「三八作風」是指毛澤東當年爲『抗大』的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等三句話、八個字。這三句話、八個字內容較爲豐富,一大套,如不加以概括,不便於記憶和掌握,以致自一九三九年提出之後,得不到流傳,幾乎被湮沒。

林彪上臺後,將它抄出來,擬作爲建軍綱領。有人將它概括爲「三句話,八個字」。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等人,則稱之爲「我軍的傳統作風」。而林彪則將它概括爲「三八作風」。相比之下,林彪的概括更爲簡潔、明確、易記。儘管譚政等人對之進行詰難,說:「是不是叫三八作風?這種簡單化的提法好不好?你這裏叫做三八作風,還有個『三八節』呢?容易混淆。」然而,從客觀上來看,不可否認,林彪的概括是最好的。事實也是這樣,在六、七十年代,神州大地上,誰個不知「三八作風」?那個不曉這是林彪提出來的建軍綱領?

這種數字式的語言,爲林彪樹立「光輝的榜樣」,撈取政治資本,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嚴家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中說:「林彪是簡潔語言的創造者」。林彪在一生中曾創造了許多「新語言」。在解放戰爭時期,林彪創造的多爲有關軍事、作戰方面的語言:

「硬拼仗」,「拼命仗」,「莽撞仗」,「老太爺仗」,「官僚主義仗」。這是批評那些打得不好的形形色色的「仗」。

作戰方面則有:「攻城軍」,「爆炸軍」,「刺刀見紅」,「二百米內硬功夫」。人們講「人力」、「物力」,林彪加了個「時力」。天時、地利、人和,「天時」也有它的效果和作用,不能說林彪不對。

五十年代後，林彪的創造主要在政治方面，成果就更多了：「學毛著」，「活思想」，「活學活用」，「突出政治」，「天天讀」，「老三篇」，「抓活思想」，「最高最活」，「徹頭徹尾、徹裏徹外」，「兩桿子」。

還有一個「過硬」，可以套起來用，如「思想過硬」、「作風過硬」、「技術過硬」等，是指「很好，經得起考驗」的意思。由於在六十年代，「林彪式的語言」風靡一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使用，「過硬」一詞便到處可以聽到：「走路過硬」、「寫字過硬」、「開車過硬」，甚至在形容抽烟、喝酒、打撲克上，也常常用「過硬」。

至於在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吹捧方面，在一些政治理論方面，林彪的發明創造就更多了。如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等等，不勝枚舉。爲了標新立異，林彪的一些創造顯得不倫不類，但有一些確是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具有一種懾人的巨大力量。

林彪並不是文學家，也不是藝術家，林彪的語言不會像曹雪芹那麼絢麗多彩，具有永恆的生命力。作爲軍事家、政治家的林彪，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創造了一套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語言。雖然它們沒有永恆的生命力，卻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具有強烈的滲透力和感染力。它們爲那麼多人接受，爲那麼多人使用，那麼深入人心，無論在古今中外，林彪都是罕見的。

林彪能在政壇上嶄露頭角，直線上升，他能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呼風喚雨，發揮了那麼大的能量，與他所使用的語言，具有特殊的風格和魅力是分不開的。

林彪在軍事上是天才，在政治上是「天才」，在語言上起碼稱得上是專家。

第七章 「勉從虎穴暫棲身」

「勉從虎穴暫趨身，說破英雄驚煞人。巧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

這是《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冑」中的一首詩。話說劉備勢弱力單，暫時借住在曹操的地盤許都。「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中種菜，親自流灌，以為韜晦計。」

為了試探劉備，一天曹操邀劉備赴宴，宴會中「曹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劉備問：『誰能當之？』曹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玄德聞言，大吃一驚，手中所執匙筯，不覺落於地下。時正值大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筯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畏？』將聞言失筯緣故，輕輕掩飾過去。操遂不疑玄德。」這就是膾炙人口的「煮酒論英雄」的一幕。前面那首詩，便是後人稱讚劉備而作。

林彪將這首詩抄錄下來，制成條幅，掛在自己的臥室之內。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林彪還在談話中提到：「韜晦　操之論英雄　胸有大志　腹有良謀　范蠡」，由葉群親筆記在「一〇一談話」筆記本上。

在這裏，林彪自比劉備，是個「胸有大志，腹有良謀」的英雄，只是時機不到，只好「勉從虎穴暫

棲身」（林彪將原詩中的「趨身」，改爲「棲身」），因此必須「韜晦，」，必須學習范蠡、勾踐「臥薪嘗膽」的精神。

林彪自比劉備，那麼誰是曹操呢？林彪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曹操」自然就是居於林彪之上，身居中南海的毛澤東。

劉備與曹操，是勢不兩立的敵人。林彪將自己與毛澤東的關係，比喩爲劉備與曹操，突出地表現了他的內心世界：對毛澤東又恨又懼。

林彪的「韜晦」之計，可謂多姿多彩，歸納起來只是四個字：「緊跟」與「忠於」。

有一次，林彪罕有地與秘書聊天。林彪問秘書：「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有甚麼優點，有甚麼缺點？」

那位秘書不敢評論，無以對答。林彪口氣平和地說：「可以評論，你說說看法，沒有關係。」

秘書說：「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有兩條，一條是，首長對毛主席跟得緊；另一條，是首長講話少而精。」

林彪頗爲得意，說道：「你說的這兩條特點，這第一條非常重要，要緊跟毛主席。其實我沒有甚麼本事，我的本事是從毛主席那裏學來的。你們給我當秘書，記住這一條很要緊。」

「緊跟」之一，是「主席畫圈我畫圈」。

林彪榮升「接班人」後，中央發來的傳閱文件多了。葉群向林辦秘書們嚴格交代，只有毛主席已經圈閱或有過表態的文件，在給林彪講過之後，林彪才能在文件上畫圈。否則，寧願把這份文件推出去，也不能由林彪帶頭表態，以防止林彪的表態與毛主席的意見發生矛盾衝突。因此，凡是中央發來的文

件，不管內容如何，只要是毛澤東畫了圈的，林彪也必畫圈。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早晨，負責林彪警衛工作的秘書李文普忙得不亦樂乎，因爲當天是國慶節，林彪要陪同毛澤東上天安門城樓。李文普既要安排林彪的衣着裝扮，又要安排交通工具，更要掌握林彪從毛家灣出發的時間，既不能搶在毛澤東的前頭，也不能落在毛澤東的後頭。

「主席動身了！」毛家灣的警衛值班室接到了中央警衛局特意打來的電話，便立即轉告李文普。整裝待發的林彪也立即由毛家灣動身，目標都是天安門城樓。李文普原來以爲，毛家灣與中南海到天安門的距離「差不多」，只要同時動身，毛澤東和林彪抵達的時間也「差不多」。然而，這個「差不多」害了李文普，中南海到天安門的距離要近一些。因此，毛澤東比林彪早到了一、兩分鐘。

事後，葉群將這次出錯，視爲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一連幾天對李文普嚴厲批評，猛烈訓斥。

葉群怒氣沖沖地質問李文普：「你是怎麼搞的？爲甚麼讓首長落到主席後邊？叫主席等首長，這像話嗎？這是一次政治上的大事故！這個責任你能負得起嗎？你失職，你不負責任！你是損害了領袖和領袖之間的關係，這個政治錯誤，說多大，就有多大！」

李文普嚇得面色如土，辯解道：

「我是照主任（葉群）的指示辦的，主任交代，讓我掌握好，只要主席動身，我們就動身。」

葉群訓道：「我交代的意思，是不能讓首長搶在主席前邊上天安門；但也不能在主席到後，首長才到。首長可以早到一、兩分鐘，在城樓下電梯旁等主席，不能叫主席先到等首長。上天安門城樓，首長不能搶在主席前邊半步，但到達城樓下的時間，首長不能比主席晚到半分鐘。這是最大的政治，你懂嗎？」

「是我沒理解好。」李文普認了錯。

葉群訓了多次，李文普也檢討了多次，這才罷休。

經過這次事故，李文普再也不敢「差不多」了。爲了使林彪不早不晚到達天安門，李文普煞費苦心，一次又一次地驅車，測試由毛家灣到天安門的時間。李文普看着汽車的計程錶，一分一秒地計算着時間。他又怕到時路面出現意料不到的情況，因此又設計了不同的路線；又變換車速，掌握不同車速下的時間，來回測量，反復計算，力求做到萬無一失。

李文普還請求中央警衛局的協助，將毛澤東動身的准確時間提前通知毛家灣。從此以後，只要得知毛澤東即將動身，李文普就讓林彪從毛家灣出發。一路上，李文普精確地計算時間，掌握林彪座駕的速度，時間尚早就讓司機開慢一點，時間緊迫則開得快一點，使得林彪到達天安門城樓的時間，不多不少正好比毛澤東早一至兩分鐘。等到毛澤東來到，林彪已恭候在電梯旁邊。然後林彪陪同毛澤東坐電梯登上天安門城樓，毛澤東走在前邊，林彪如影隨身地緊跟其後。

葉群認爲，林彪如果比毛主席早到五分鐘，那就將林彪降低到與周恩來等一般中央常委平起平坐的地位，這有失林彪「副統帥」的身份。如果林彪比毛主席晚到一分鐘，那不僅是不禮貌，而且是不尊重毛主席，這可是天大的政治問題。因此，比毛主席提前一、兩分鐘到，是最佳的選擇。

葉群還規定，秘書在天安門城樓上要隨時提醒林彪站的位置要恰到好處，要顧及主席，不能離得太近，也不能離得太遠。遠了就「不親」了，近了又會擋住主席，有喧賓奪主之嫌。因此，不論是在正面、側面、左面、右面，距離都要不遠不近，不棄不離。加上林彪手上揮動《毛主席語錄》的動作，一切都要做到分文不差。

林彪從不讀《毛主席語錄》，也從不隨身帶《語錄》，葉群只好規定秘書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參加群衆性的集會，就由秘書將《毛主席語錄》交給他。當群衆高呼口號時，林彪右手擧起《毛主席語錄》，一上一下地揮動。大會結束後，「紅寶書」便又回到秘書手中。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批給毛澤東的文件，都寫上「請主席閱」，「送主席批示」之類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年初，葉群吩咐秘書，從今以後，將「請」、「送」等字，一律改爲「呈」字。

秘書問：「爲甚麼？」

葉群回答：「『呈』字比『請』字顯得更加恭敬些。」

秘書說：「過去封建社會，下文上送才叫『呈』，解放以後，這個『呈』字已經沒人用了。」

葉群說：「對別人不需要，對主席完全可以。主席地位最高，怎麼恭敬也不算過分，特別是首長所處的身份，寫『請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點想與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寫『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原來，林彪是擔心來自毛澤東的嫌疑。連這等細微末節都顧及、想到，林彪可謂用心良苦。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全軍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末段是：

「另外，我講一個單獨的零碎的問題。最近我發現有甚麼《林彪同志語錄》，是學生搞的。一個是一間中學搞的，另一個是一個甚麼紅衛兵組織搞的。我們就收到兩種。另外，我們總政過去也搞了我的一個政治工作語錄。我看，不要搞。你們看到的時候，請你們代爲沒收。總政，我是給他們講了，我這個意見是雷打不動的，你們不要搞。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全中國人民的思想財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財富。毛主席的話，一句等於我們一萬句，我們要

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帥全國，來指導我們一切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林彪向秘書口述《給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林彪說：「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只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林彪要求將這封信印發到全黨、全軍和所有群衆組織。

這封信當天夜裏便傳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認爲此舉可以不必，沒有立即處理。然而林彪「避嫌」心切，便繞開中央辦公廳，下令「林辦」工作人員將信送到軍內一家印刷廠，印了幾萬份，準備分發。碰巧那幾天人民大會堂接連舉行群衆集會，林彪便派工作人員到會場內四處派發。周恩來見狀，只好讓中央辦公廳印發。

一九六八年夏天，林彪出去「轉車」，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紀念林副主席八·九講話發表一周年」之類的大字標語。回家後林彪下令連夜將這些標語撕掉。據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這種事一共做了兩次。頭一次是葉群親自帶領工作人員辦的。第二次是葉群派張雲生和另一位工作人員辦的。張雲生說：「在大街上撕標語，可是『現行反革命行爲』，如果被人揪住怎麼辦？」葉群說：「一旦有人查問，你們就堂堂正正地打出首長的招牌，說你是『林辦』秘書，是奉首長的指示幹的。他們如不信，可以打電話來問。」

張雲生一行在夜深人靜時出去，一直到天亮，在城內各大街察看，見到有關標語就撕去，行程近百里。當中果然有人盤問，張雲生都按葉群的指示，亮出「林辦」的招牌。後來，北京衛戍區向「中央文革」報告，說街上宣傳林副主席的大字標語，在一夜之間被人撕掉，據說是「林辦」人員幹的，不知眞

假。葉群去釣魚台開會時證實：「確有其事」。大家便認爲：「林副主席眞謙虛。」

林彪下令撕標語，是爲了「避嫌」，想不到竟給人予「謙虛」的印象。「九大」召開時，江青等人要求將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寫入黨章，所持的理由便是：「他那樣謙虛，就在黨章上寫他。」

有一次，葉群鄭重其地向秘書們交待：「現在文件中對首長的提法很多，你們要幫助把關。人們尊敬首長，這是好事。但提法不當，就可能幫倒忙。今後凡是文件中出現對首長的新提法，你們都要提醒，一定要把那些不適當的提法劃去。」

秘書問：「怎樣算適當，怎樣算不適當呢？」

葉群顯然也分不清適當與不適當的界限，因此只是模棱兩可地說：「適當的提法，例如說首長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這是報紙上經常宣傳的，不會有甚麼問題。至於甚麼提法不適當，這很難講具體。反正你們見了新提法，就注意提醒吧。你們不要有顧慮，這是首長親自交代的，我可以做證。」

葉群還囑咐：「特別是送給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傳閱件，一定要注意。」

一天，秘書張雲生報告葉群：有一份文件多處提到首長是「副統帥」和「光輝榜樣」，不知這樣的提法是否合適？

葉群不能作主，便去找林彪審定。

到了林彪那裏，葉群一進門就說：「你叫秘書幫助把關，現在人家把關了。」

林彪說：「好嘛。」

張雲生簡單介紹了文件的內容，說裏面有多處提出「副統帥」。

「劃掉！」不等張雲生說完，林彪就十分乾脆地作出決定。

張雲生又講到文件中提到首長是『三忠於』的光輝榜樣」。

「一律劃掉！」林彪不加思索地說。

葉群說：「這不能劃掉吧？別的可以劃掉，這一條不能劃。人家提你是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光輝榜樣，你只顧謙虛，就不『三忠於』了？」

在葉群囉囉嗦嗦的要求下，林彪不耐煩地說：「好了好了，不劃掉這條就是了。」

林彪還通過題詞，來表達自己的「忠於」和「緊跟。」

一九六六年冬，林彪給鐵道部『毛澤東號機車』題詞：「毛澤東思想是人民革命歷史發展的火車頭」。

一九六七年夏，林彪給北京衛戍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五·一前」，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蒯大富給『中央文革』寫信，說他們正在建造一尊毛主席的全身塑象，希望林副主席給題一下「四個偉大」，用在竣工後的基石上。『中央文革』明確表態支持此事，便轉告給葉群。

鬼心思比林彪還多的葉群，向秘書們說：「我想這是首長義不容辭的。第一，這是在宣傳毛主席，而首長是一貫緊跟主席的，不能失去這個機會；第二，這是「中央文革」支持的，份量很重；第三，要求題詞的是蒯大富，我對這個人不太熟，但他是全國有名的造反派頭頭，不能給他潑冷水。你們要準備好筆、墨和紙，一旦首長哪天情緒好，不出汗，那就叫你們，你們要保證不要誤事。」

兩天後的一天下午，林彪的內勤突然傳令：「主任叫快準備好筆、墨、紙，首長要練字！」

秘書們趕忙出動，磨墨的磨墨，裁紙的裁紙，不一會，便在林彪會客室內一張大茶几上，將文房四寶佈置好。一名內勤還在細細地研墨，葉群則在一旁指手劃腳。

林彪出來了。

葉群說：「首長今天情緒特別好，有哪些要求題詞的，你們趕快報。」

秘書說：「好幾個軍區的小報要求首長題刊頭，都壓了很久了。」

葉群說：「這些都不忙，不是蒯大富也要求首長題詞嗎？」

林彪尙知道有個蒯大富，問道：「他要求題甚麼？」

葉群說：「他要求題四個偉大。這事我和你講過，你怎麼不記得了？」

林彪說：「蒯大富不過是個紅衛兵，全國的紅衛兵上千萬，我那裏記得這麼多。」

葉群說：「不能小看蒯大富。人們都叫他蒯司令。蒯司令的能量，比我們的一個軍區司令都大。這個人好張揚，不知天高地厚，我也不喜歡。但他是宣傳主席，又有中央文革支持，我們不能潑冷水。毛主席這桿旗是你帶頭高舉的，能叫別人代替嗎？」

經葉群這一番囉里囉嗦的解釋，林彪才肯動筆。葉群逐句地唸，林彪龍飛鳳舞地寫。

第一張林彪嫌自己的落款「林彪」兩字寫得不好看，又重新寫了一張。

「很好，很好，」葉群對第二張題詞讚不絕口。葉群不愧是個老狐狸，又說道：「這張題詞的份量比過去的所有題詞都重。不能叫蒯大富獨佔，否則他會拿去到處吹，提高自己。也不能說這只是給清華大學的題詞，那樣就沒甚麼意思了。我想把題詞交給『中央文革』，請他們公開發表，這樣影響就大了。」

果然，在「五・一」節後的第二天，林彪題的「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出現在全國報刊的頭版頭條位置上，所佔的版面有半版大小。在全國各地還出現了慶祝林彪題詞的遊行集會。

海軍的李作鵬還要求林彪題「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各軍區的小報刊頭題詞，林彪、葉群可以不理，但心腹大將李作鵬的要求卻不能坐視不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林彪從山海關回到北京，一到家就要「練字」，在葉群的攛掇下，林彪當即給李作鵬題了詞。

當晚，不僅李作鵬親自率領海軍大院的全體人員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而且吳法憲、邱會作也發動「首都三軍」列隊上街，又是高呼口號，又是鳴放鞭炮，一直鬧到半夜。

在全國各地照例也有慶祝活動。在青島，兩派造反派因為慶祝題詞大會的組織形式問題，發生了爭執，最後釀成一場流血衝突。

林彪在聽文件時聽到這個消息後，感到很驚訝，問道：「這個消息是從那裏知道的？」

秘書回答：「北海航隊為此事寫了一份專題報告。」

林彪又問：「這個報告，主席、總理和『中央文革』能夠看到嗎？」

秘書說：「軍委收電照例抄送主席、總理和中央文革，因此他們能夠看到。」

林彪冷冷地板起面孔，說道：「好，你們記住，我今後不再題詞了。今後不論甚麼人請我題詞，你們一律擋回去！」

從那以後，林彪就再也不題詞了。題詞是因為毛澤東，不題也是因為毛澤東。毛澤東成了左右林彪思想、行動的中心。

除了對毛澤東表示絕對的忠誠外，林彪和葉群還爲自己定立了一套守則：

「三不」：

一、不干擾人之決心（免已負責，免予領導之嫌）不建言；

二、不批評；

三、不報壞消息（去影射之嫌）。

「三要」：

要響應，

要表揚，

要報好消息。

「三不主義」：

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

閉目養神　照上面辦　不置可否

林彪還有「一不」：建國後不串門（不去別人家裏做客、聊天、聚會，免去各種嫌疑）。

這些守則透露出來的，只有四個字：謹小愼微。

在戰場上，面對着國民黨的百萬大軍，面對着敵人的武裝到牙齒的機械化兵團，林彪從不畏懼，一往無前，從松花江打到海南島，可謂豪氣干雲，英雄本色。可是，到了政壇上，林彪的勇敢豪邁的氣概，一去如洗。從這些守則，那裏還看得到當年叱咤疆場，指揮千軍萬馬的大將軍的威風模樣！

何其變得如此？

一位中共中央的「副統帥」，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居然認爲自己是「勉從虎穴暫棲身」，需要處心積慮、挖空心思地施展「韜晦」之計，這是不可思議的。是林彪有異心異志，還是沒事找事，神經過敏呢？將原因單純歸咎於林彪，顯然是片面的。林彪不怕國民黨蔣介石，唯怕毛澤東。從林彪的這份誠惶誠恐、如履薄冰（周恩來亦曾說過自己「如履薄冰」），可以折射中國的政壇比戰場更險惡，折射出毛澤東的陰險，可怕。從劉少奇的前車之鑑可以看出，林彪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和多此一舉。

當前的普遍的說法，是林彪的這些陰謀詭計，在於博取毛澤東的信任，是爲了篡奪更高的權力。這種說法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臆斷之談，其目的和效果是爲毛澤東開脫。林彪的「韜晦」之計，是防禦性質，而不是進攻性質的，旨在「避嫌」，保護自己，而並非「博取」。林彪如果想邀寵、出風頭或撈取政治資本，作爲「副統帥」，他有許多機會，有許多事情可做。然而，從他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低調態度來看他顯然志不在此。

林彪的「韜晦」之計，無疑是成功的。他騙過了多疑的毛澤東，騙過了老謀深算的周恩來，騙過了「中央文革」那班敏感的秀才們——能說林彪沒有政治「天才」嗎？

第八章　林彪的「病」

寫林彪，就不能不提起他的「病」。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說，自己「神經不好」；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也說自己「身體不好」。

林彪到底有沒有病？究竟是甚麼病？

據林彪和葉群說，那是抗日戰爭打平型關戰役時負傷留下的後遺症：植物神經紊亂。

一九三七年，平型關戰役勝利後，在隰縣，林彪穿着一件繳獲的日本黃呢子軍大衣，騎着高頭大馬，閻錫山的一名老兵誤以爲是日本軍官，便向他開了一槍。這一槍打中林彪的胸部，傷勢嚴重，流血不止，延安都準備了追悼會。林彪被送回延安後，經過簡單的治療，毛澤東便安排他到蘇聯繼續治療。據說，那一槍傷到了脊柱神經，留下了一塊疤痕。如要動手術切除，生存的機會只有十分之一。於是，只好作罷。這個「植物神經紊亂」，便是這樣落下的。

從蘇聯回來後，林彪基本康復。否則毛澤東也不會派他到東北戰場，委予主持黨、政、軍的重任。解放戰爭那沉重的負擔，又一次將林彪虛弱的身體拖垮了。在解放戰爭後期，大軍渡江南下，林彪是躺在牀上指揮、口述電報的。五十年代初期，毛澤東曾調林彪接替患病的聶榮臻，任總參謀長，但不久便又病到了。林彪第二次去蘇聯療養，回國後便長期休息。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曾派蕭華主持，組織以傅連璋爲首的專家小組，爲林彪會診。會診的結果是：林彪各個器官正常，沒甚麼病，唯一的是吸毒。

葉群對傅連璋軟硬兼施，要傅連璋向毛澤東和中央遮掩林彪的「病情」。但傅連璋不賣帳。不久之後，林彪收到毛澤東的一封親筆信，打開一看，原來是毛澤東抄錄曹操的名詩《龜蛇壽》：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林彪和葉群知道：傅連璋出賣了他。林彪在心裏記下了這筆帳。

一九六〇年，林彪升任國防部長後，成爲傅連璋的頂頭上司。林彪下令讓傅連璋退休，回福建長汀，要將他趕出北京。傅連璋徬徨無計，只好向毛澤東求助。毛澤東出面制止，此事才作罷。但在軍隊評定級別時，林彪硬是壓低傅連璋的級別，算是出了心頭一口惡氣。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就再也救不了傅連璋，葉群、江青伙同邱會作將傅連璋折磨死在獄中。

據看過林彪病歷的人說，林彪患的是精神病，早在一九五三年就有記載。林彪的一名保健醫生後來透露，林彪的確患有精神病。並說五十年代蘇聯專家就說過，葉群聽後火了，把這位蘇聯專家趕回國。還有一位老幹部，在延安時就給中共中央領導人當保健醫生，原來是胡宗南的醫務官，他也說林彪有精神病，結果也被葉群趕到西南地區一個醫學院當教書匠去了。另一位說林彪有精神病的醫生，與葉群發生了劇烈的爭吵，事情鬧到中央，雙方都給中央寫了報告，互相指責對方。葉群堅持林彪沒有病。

從後來的種種症狀來看，林彪患精神病的說法，還是可信的。

患這種病的人，有時在某些方面和正常人一樣，但在另一些方面，卻是病態嚴重，如同白癡。

五十年代後，林彪怕光、怕風、怕熱、怕冷、怕涼、怕出汗，尤其怕水。這便是病態之一。

一九六六年國慶節前後的一天晚上，江青前來毛家灣探望林彪。

葉群扶着江青，來到林彪的房間。

江青的到來，使林彪表現出少有的興奮。

林彪說：「見到你，非常高興，非常高興非常高興！」

江青坐下後，裝模作樣地說：「經常想來看望林總，又不敢輕易打擾你。」

林彪說：「有空你就來坐。江青同志，聽說你也受了感冒？」

江青說：「可不是，就是因爲出汗受了涼。」

林彪十分認眞地說：「這就對了，『金木水火土』的那個水，屬於寒性，寒性順着毛孔進入內臟，跟火相矛盾，於是生感冒。所以我從一九五八年以後就不洗澡，一九六三年後就不洗臉，不洗，不洗，我勸你也不要洗。」

江青抱着葉群的肩膀，呵呵地笑了一陣，說道：「我們可辦不到，你當了副統帥，可也不能這樣不民主啊！」

林彪的情緒依然很高，又說：「人哪，人，人要拉大便是不正確的，吃下東西，應該完全地吸收掉，我是半個月一次，不是病態。」

江青驚訝地瞪大眼睛，說道：「我可不行，一天不用馬桶，我就心煩，就想罵。」

以上是林彪與江青關於洗澡、洗臉、大便的一段對話。

開始時，林彪不洗澡，後來連臉也不洗了。平時只用濕毛巾擦臉和擦手。越到後來，林彪的病態就

越嚴重，竟然見到水，聽到水聲就拉稀。林彪出外開會，下榻的賓館門前的噴泉都要關掉。林彪年年去北戴河避暑，但一直躲在屋裏不出來，說是怕見到海水。到了七十年代，就發展到連山水畫都怕。有一次，在北戴河，林彪的住處掛着一些名家國畫，山山水水，都是大手筆，可是，林彪說看到後緊張，覺得渾身發冷，下令將這些大手筆統統拿掉。

怕水怕到如此程度，算不算白癡？

一九七一年夏，北戴河。葉群在為她而設的游泳池裏游完了泳，披頭散發地坐在房間裏的一張沙發上看電影，幾位借調來幫忙的工作人員，以及林辦的一些秘書、內勤也在一起看。葉群一邊看一邊聊天發議論，還一邊讓內勤給她梳頭。正看着，林彪的一名內勤突然跑進來，到了葉群跟前問道：

「首長說他口裏有口痰，讓問問主任是吐出來，還是不吐出來？」

葉群皺起眉頭，很不耐煩地一揮手，說道：「告訴他吐出來！」

內勤急忙掉頭跑了回去，而葉群則不耐煩地嘟囔了一陣子。

這算不算是白癡？

上面提到，林彪自稱自己半個月拉一次大便。於是作家官偉勛在毛家灣便看到了這樣的一幕：

「有一次，是工間操（小息）時間，我，還有G秘書，W醫生，都在小院裏盛開的西府海棠樹下，晒太陽賞花。李××從南院急急忙忙地過來了。W一見李，知道是來找他，便迎了過去。李××把他拉到牆根，嘀咕了兩句，G對我詭秘地一笑，使了個眼色，我們倆便走進屋裏。

只見院裏的李和W一說完，W就慌慌張張地往南院跑。邊跑邊回頭問：『派車嗎？』

李說：『我馬上要兩輛車，給三〇一那邊也打招呼了！』

我問G：『是不是甚麼人病了？』

『怎麼了？』他莫名其妙地問。

『李××來找W醫生，慌慌張張地跑了，還說派車，馬上去三〇一（醫院），是不是送甚麼人？』

G一聽，仰面大笑起來，說：『哪裏，是去送大便的。可不，首長好久不大便了，今天大便了，這還不是大事？多少天不屙了，好不容易屙出幾個羊屎蛋兒一樣的大便，還不趕快送去化驗？』

我這才恍然大悟。」

林彪怕出汗，也到了病態的地步。林彪一出汗，就整個人都垮了下來，甚麼也不能幹了。因此，與其他人的「心肌梗塞」、「胃出血」一樣，出汗對林彪來說，也是「重大事故」。

針對林彪這麼多的「怕」，毛家灣裏有一套清規戒律：

爲了防止出汗，林彪規定，在他吃飯時及吃飯後一個小時內，不見客，不見秘書，不聽匯報，不得有任何的干擾。

林彪還規定，秘書講文件時，只能「講」，不能唸，因爲一唸，林彪就緊張，一緊張就要出汗。

由於怕風，秘書給林彪講文件時，必須距離他幾米遠，因爲怕揭動文件時，有風吹着林彪。

林彪還向秘書規定：「以後你們來講文件，不要敬禮，我一見人敬禮，就緊張，就出汗！」

葉群還規定：去見林彪時，不要喊「報告！」以防止林彪被嚇着。

林彪在出席類似天安門廣場的群衆大會這樣的大庭廣衆的場合，人們看到林彪雖然身材瘦弱，但笑容滿面，不失神采奕奕，與正常的健康人無異。據說這些都是假像，林彪的「神采奕奕」是「人造」的。臨出席大會之前，葉群都要吩咐醫生爲林彪打興奮劑。因此，在大庭廣衆之下，林彪精神飽滿，神

情輕鬆。然而，一回到毛家灣，興奮劑一失效，林彪整個人就垮得像一灘爛泥。

在一天之中，除了有半個至一個小時的時間，是用來聽秘書講文件外，其他時間林彪便無所事事。他有時在房間裏踱步，但大多數時間是歪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或冥思默想。越往後就越嚴重，迷迷糊糊，神情恍惚，以致連大、小便，吃飯喝水都忘記了。

在六、七十年代，秘書們的眼光中，林彪的形象是這樣的：

「我看到靠牆的一張長沙發上坐着穿軍衣、頭戴軍帽的林彪」，「他操着一口湖北口音，面孔消瘦，沒有一點血色，但說話聲音很大。」

「他腦袋光禿禿的，走路時慢裏斯條，目不斜視，好像四周不屑一顧似的。」

「他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一聲不吭，他的模樣和平時報紙上看到的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新聞照片中的林彪都戴着帽子，現在看到的林彪，卻是頭頂禿光。雖已脫髮，兩耳後側和後腦蓋下，還殘留着幾根頭髮。由於常年不見陽光，面色是蒼白的，沒有一點血色。」

「不設防」時的林彪，是這樣的：

「果然見到林彪一個人，光着頭，穿一身黃呢子舊軍服，閉着眼，歪在沙發上。……我以為他睡着了，正想輕輕地從他身前走過去，他的眼睛突然睜開，一抬頭，頗為吃驚地看着我們兩個。問：『甚麼?!』我看到一張被嚇了一跳的、蒼白毫無血色、胡子拉茬的臉。」

宣傳媒介中「神采奕奕」、「永遠健康」的林彪，與現實生活中病態懨懨、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林彪，相差如此之大，令人們十分震驚。一位新調到毛家灣來的秘書，在看到林彪那個樣子後，難過地哭了好幾個晚上。

林彪有病是確定的。說林彪沒有病，凡是接觸過他的人，都不會信服。但是，林彪的病並不像癌症、心臟病那樣的絕症，有劇烈的、嚴重的症狀，不能行動、臥牀不起，影響到正常的工作、生活。林彪的病症，除了那麼多的「怕」以外，就是緊張，出汗、拉稀、身體虛弱，更多的是精神萎靡不振。因此，他的保健醫生說他患的是「精神病」，其他醫生診斷是「神經系統疾病」，都是確實可信的。

林彪的精神病，使他在某些方面看來像個「病夫」、「白癡」，但在思想方面，他卻表現出超乎常人的頭腦敏捷，思維縝密，思想深刻而又老謀深算。「四個第一」的提出，以及他在中國現代政治舞台上所表現出來的非凡身手，就是很好的證明。林彪的情形，似乎有點類似希特勒，在發出進攻波蘭的命令後，第二天早上，希特勒的秘書發現他躺在地板上啃着地氈。

林彪之所以患上這種精神病，是有其主觀和客觀上的原因的。林彪自小身體單薄，他的性格雖然固執而好勝，但其神經卻是脆弱的。平型關的槍傷，使他的身體健康走下坡路。解放戰爭時期，緊張的腦力勞動，沉重的精神壓力，將他拖垮了。加上他那不正常的性格和生活習慣，孤癖，好靜，不愛活動，不善於交際，缺少娛樂，使得他所承受的精神壓力，不能夠在社交，友情中得到渲泄和忘卻，而只能鬱積在心裏。從而使得他的精神不堪負擔，日漸衰弱。林彪又是一個頗具野心，權力慾極其強烈的人。毛澤東主宰的中國政壇，籠罩着緊張、壓抑和窒息的氣氛，使得林彪未得志前鬱鬱寡歡，患得患失，得志後又成日提心吊膽，誠恐誠惶，這樣就愈發增加了他的精神壓力，最後「積勞成疾」，成爲精神病。

林彪無大病，這是事實。一個能做四個小時的大報告，能在天安門城樓上一連幾小時地檢閱紅衛兵的人，身體再差也差不到那裏去。然而，這種不是大病的病，給林彪帶來了頗大的影響，這也是十分明顯的。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林彪、葉群諱疾忌醫。葉群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怕林彪

的病，尤其是精神病影響到林彪的宦途，從而也影響到她的「遠大前程」，於是拚命地掩飾林彪的病情。誰說林彪有病，她就整誰。既然如此地諱疾，自然就不能好好地進行醫治，對症下藥，使林彪的病情得到根治。而林彪自己也是過於自信的人，他只相信自己，不相信醫生。他對醫生說的話、開的藥，都當成耳邊風和垃圾。他整天捧着《醫藥大詞典》和《辭海》，自己研究自己的病情，有病痛時就自己開處方買藥來吃，弄得群醫束手無策，毫無辦法。只好在他買來的藥內，摻上醫生開的藥，給林彪服用。有一次，事情被林彪發現了，林彪驚呼：「有毒！有毒！有人下毒！」葉群急忙過來向林彪解釋：「那是我吩咐，將一些補藥加在裏面給你吃」，這才平息了一場風波。

林彪的「諱疾忌醫」，不相信醫生，與毛澤東如出一轍。林彪與毛澤東的身體健康，也都是因此而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林彪的病，也有假裝的成份，正是六分病，四分裝。

利用病來僞裝、掩飾自己，向來是中共政治生活中人們慣常使用的方法，康生、陳雲、胡喬木等，都是這方面的老手，而林彪尤其運用得得心應手。

從建國初到五九年，是林彪「養病」的最長的一段時期。在此期間，林彪無病呻吟，小病大養，一年到頭，冬居江南勝地，夏處渤海之濱，享盡了人間富貴，其中竟是大有奧妙。

原來，一九五〇年因拒絕帶兵出征朝鮮，林彪開罪了毛澤東，受到了冷落。各大軍區、野戰軍的司令員和政委們，都先後被調到中央擔任要職，唯有林彪只掛了個副總理的虛銜，而沒有實權職位。這是不光彩的、丟面子的事。爲了掩飾自己的狼狽、難堪的處境，「有病」就成了最好的藉口。

同時，建國後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行軍打仗這一套用不着了，政治鬥爭提到日程上

來。面對着詭譎多變的政壇，林彪心中沒數。尤其是在高饒反黨集團事件中，高崗和饒瀨石的倒台以及自己被掃着了邊，令林彪心驚膽戰，認識到政治鬥爭如同無底泥潭，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林彪認爲自己在軍事方面身經百仗，經驗老到，但在政治鬥爭方面，卻是新手，需要學習的東西還很多。最重要的是林彪還摸不准毛澤東的底細，搞不清中央核心領導內的行情，不能輕舉妄動。林彪需要時間來學習，需要觀察，需要思考和準備，一句話，需要「韜光養晦」。而自古以來，「養病」就是「韜晦」的最好的藉口。

當毛澤東又一次向林彪招手，兩人再度結成政治聯盟後，對於林彪來說，毛澤東既是盟友，又是最大和最危險的敵人，最好的明哲保身的策略，就是對毛澤東敬而遠之，與他保持一段距離。而「養病」就又成了順理成章的藉口。爲了躲開毛澤東，林彪經常不在北京。夏天，毛澤東如去北戴河，林彪便去大連；冬天，毛澤東比較鍾意十里洋場的上海和西子杭州，林彪便選擇了小小的蘇州。蘇州不是省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經濟的中心，是個園林風景迷人的小城市。毛澤東南來，常常連休養，帶視察地方工作。既不是省會，又不是經濟政治中心的蘇州，毛澤東就不會來了。林彪便可放心大膽地「韜晦」。

疾病成了林彪保護自己的一件武器。躲在疾病的背後，林彪既可攻，又可守，進退自如。一九六五年板倒政敵羅瑞卿大將，林彪就是在蘇州養病中突然發起的；一九六六年八月，當毛澤東要林彪當副統帥，而林彪又不願意接受時，林彪就稱病躲在大連，不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

第九章　林彪如何辦公

寬大與精緻的辦公桌，是權力與地位的象徵。在中南海豐澤園的菊香書屋，毛澤東有一張寬大的紫檀木辦公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都有自己的辦公室（書房），自然也有寬大、考究的辦公桌。

唯獨「副統帥」林彪沒有自己的辦公室與辦公桌。

是偌大的毛家灣，放不下林彪的一張辦公桌嗎？非也。這是林彪獨特的風格。

在有關林彪的一些書籍、文章中，秘書們向林彪請示工作、講文件，一會兒說是在「會客室」，一會兒說是在「辦公室」。其實，所指的就是林家大屋中那間與林彪臥室相連的西會客室，那就是林彪處理黨、政、軍要事，籌謀天下大事的地方。

無論是在毛家灣，蘇州或北戴河，林彪的辦公室都具有同樣的格式：一是大，二是空。毛家灣的西會客室，足足有四、五十平方米大，其他地方的行宮，林彪的「辦公室」也不小於此數，有的足可以做個籃球場。在中共高層領導中，這是數一數二的。毛家灣的西會客室內，既無寬大、考究的紫檀木辦公桌，也沒有成排的精緻的玻璃書櫥——那常常是表示主人家儒雅、博學的必不可少的裝飾；在中國，代表顯赫地位的紅色電話，西會客室內也沒有。因爲林彪從不親自接聽電話。所有打進毛家灣的電話，都先由秘書們接聽，然後轉給「林辦」主任葉群。一般的來電，葉群都處理了，只有極少數的特別重要的，如毛澤東或周恩來的電話，葉群才讓林彪接聽。

西會客室裏的擺設，只有兩張長沙發和一張茶几，看不到文件、報紙和書刊。一九六九年備戰以後，林彪下令添了個直徑一米的大地球儀，算是多了一件擺設。會客室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毯，窗上掛着厚厚的窗幔，遮掩得嚴嚴實實，將外面的陽光、風雨、塵囂完全隔絕。這就是林彪「辦公室」的基本格式。空曠、孤寂、死一般的寧靜，永遠是這裏的氣氛和情調。

林彪要求自己的「辦公室」大而空，主要是因爲踱步。這是在東北戰場上養成的習慣。在黑土地上，林彪一醒來就開始踱步，不論春夏秋冬，也不管槍炮聲怎樣在耳邊轟轟隆隆，他的步子總是不緊不慢，勻速運動，腳步拖拉，腳跟幾乎沒有離開地面，拉拉沓沓。進了北京城後，林彪踱步的習慣沒有改變，只是踱步的時間逐漸地少了、短了，而坐在沙發上的時間卻逐漸地多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林彪雖然擔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但大量的日常性的工作，均由羅瑞卿爲秘書長的軍委辦公室處理，能夠上到林彪面前的並不多。因此林彪都能親自處理。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林彪由老六升爲老二，榮升「副統帥」，需要經林彪過目的文件自然多了。加上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林辦」顯得空前的忙碌。每天送到毛家灣來的文件，電報和參考資料多達上百份，少者一、二十萬字，多者三十多萬字。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和葉群採用秘書先過目，從中選出重要者，在重要者中再取其主要內容，然後講給林彪聽。每天講兩次，每次半個小時，每天共一小時，上午講「文化大革命」動態，下午講軍事和國際動態。林彪說自己身體不好，聽文件時間長吃不消。到了後來，連這每天一小時的時間都保不住，每次只能聽十多二十分鐘。

林彪足不出戶，又不看書、不看報，對外界的了解和認識，主要來自秘書講文件。這是循正路來的「大道消息」。

林彪的另一消息來源，是葉群。葉群性格好動，不甘寂寞，交遊廣泛，四出活動。她的目標之一，便是打探北京政壇上的內幕消息，尤其是中南海、釣魚台的動靜，更是首要之列。回到毛家灣，葉群便將這些情報轉告林彪，並加上自己的分析和見解。這是「小道消息」。

林彪的再一個消息來源，是開會或接見下屬時，所聽到的匯報、發言。例如，解放軍各總部的頭頭，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以及各軍、兵種的首腦，多是毛家灣的常客。從與他們的交談中，林彪自然得到許多消息。有一次，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武漢事件」後調到武漢軍區代替陳再道任司令員的曾思玉赴任前來毛家灣拜會林彪，兩人交談了很長時間。曾思玉向林彪談了許多前所未聞的情況，使得林彪事後大有感慨地說：「眞是故人吐眞言！」

這種情況，使得林彪對外界情況的了解極其有限，然而又保證了林彪對必要的、最重要的情況的了解。在林彪與葉群的心目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毛澤東的動向，這是林彪賴以生存的基礎。據說，爲了最快地得到毛澤東動態的準確情報，林彪和葉群曾派出了「臥底」，到毛澤東身邊工作；而毛澤東也向毛家灣派出了「臥底」，互相刺探消息。在一九七一年的那場最後的決鬥中，這些臥底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送給「林辦」的文件中，有一些是屬於中共中央的傳閱文件，那是最高領導層對黨、政、軍的重大問題的討論和決策。

建國以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重大問題的決策，除了召開中央常委或政治局會議外，更經常使用的方式是文件傳閱。中共中央辦公廳在需要傳閱的文件前面，列出傳閱的人名，按順序傳閱，同意者在自己的名字上畫圈，並簽名作實，官方稱之爲「圈閱」。由於傳閱者要作出表態，因此必須對有關方面

的情況熟悉了解，又要顧及中央高層圈子內複雜的政治關係，既需要思想上的遠見卓識，又需要豐富的政治經驗，實在是十分考究工夫。

林彪坐上中共的第二把交椅後，需要他傳閱並提供決策的文件就多了，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外交，各行各業，林林總總。林彪除軍事，政治精通以外，其他方面，諸如經濟，外交等，就所知甚少了。而林彪所處的地位，舉足輕重，若胡亂批示，不但招惹笑話，萬一與毛澤東的意見相左，那就大件事了。而要對每一件事都調查研究，「熟籌」後再下筆批示，林彪又沒有那份精力。因此，林彪與葉群想出一種既快捷又保險的方法，那就是「主席畫圈我畫圈」。葉群向秘書們交待，只要是主席畫圈了的，不管是甚麼文件，首長也就畫圈；而凡是主席未畫圈表態的，首長就不宜先表態，以免與主席的意見相左。

剛開始時，新官上任三把火，林彪對有關的文件還看一看，聽秘書講一講，然後再畫圈，後來膩歪了，便連看也不看，聽也不聽，只要是毛澤東畫了圈的，林彪也就照畫不誤。再往後，林彪乾脆讓秘書代畫圈、簽字。

原來，林辦有名工作人員叫李根深，才二十歲出頭，善長模仿他人的字跡。有一次曾學着周恩來寫的一份文件及其簽名，幾可亂眞。葉群看到李根深是個人才，便吩咐他學習林彪的字跡和簽名，到了一定火候後，便讓李根深「坐正」，代行林彪批閱中央文件了。

這件事聽起來近似笑話，古今中外，聞所來聞，但卻是屬實無疑。從這裏面，所透露出來的訊息，決不是林彪對自己的職務和所擔當的角色的如何敬重和熱愛；恰恰相反的，是深深的鄙視、輕蔑，還有無聲的抗議。

在解放戰爭時期，林彪對自己的職務，其態度之認眞負責，工作之積極主動，是出了名的。在雙城堡那座古色古香的大院裏，林彪一醒來，腦子裏便開始工作運轉了。「不抽煙，不喝酒，不講吃，不講穿。大到一次戰役，小到部隊棉衣裏子應該是白色的，都在他腦子裏轉。打起仗來一夜一夜不睡覺，部隊到了甚麼位置，一眼就能在地圖上找到。一口氣口述幾封電報。然後，再踱步，再思考」，「視周圍一切如無物，也沒有自我，大腦皮層的每個細胞，渾身上下的每根神經，只有戰爭！戰爭！戰爭！」東北戰場上的輝煌勝利，並不是偶然的，其中，它凝結着林彪的勤勉、熱誠、忘我的獻身精神。

林彪升任「副統帥」後，這份勤勉和熱誠消失得無影無踪。很難想象得到，當年南下廣西，在衡寶戰役後期，累得病倒，躺在床上口述電報，繼續指揮大軍作戰的林彪，今日竟然會讓一名工作人員冒替自己的簽名，批示中央文件；很難想象得到，當年對自己的使命和職責看得如此崇高、神聖，如此忘我地捨身奮鬥的人，如今卻玩忽職守，視同兒戲。這是不可理喻的。很明顯，林彪是在消極怠工，而矛頭所指，正是大老板毛澤東。

是嫌「副統帥」、「接班人」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職位太低嗎？顯然不是。「九大」中，將「接班人」的地位寫入黨章，曾令林彪喜形於色。而且，直至一九七一年三月之前，林彪並沒有在毛澤東生前取而代之的野心（這一點本書後面還會詳細闡述）。林彪不滿意的，顯然是「接班人」這個職位以外的東西：那就是對毛澤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不滿，對毛澤東的思想作風的不滿。尤其是對毛澤東大權獨攬、專橫獨斷，而自己的「副統帥」、「接班人」地位，徒有虛名，沒有實際權力，形同虛設，從而感到被毛澤東玩弄、欺騙而不滿。林彪與毛澤東同牀異夢。

林彪的消極怠工，不僅表現在玩忽職守上，而且還表現在遇事上推下諉。在「文化大革命」中，林

彪和葉群根據「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政策，事無鉅細，推給毛澤東，秘書們背地裏將葉群叫做「葉推事」。

一九六七年六月初，總政治部主任辦公室向「林辦」打來電話報告：天津駐軍請示，準備派一個連到郊外二十多公里的一個地方收割小麥，往返需要三天。總政主任蕭華準備用電話答覆他們，同意他們的意見，但由於這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中部隊行動，因此特向「林辦」報告一下。

當秘書將事情向葉群報告後，葉群說：

「你可以給首長講講，但必須把這個電話記錄抄報主席。」

秘書說：「蕭主任辦公室電話的意思，是叫我們知道一下這件事就行了。這屬於備案性的報告，並不需要答覆。因此還有必要請示主席嗎？」

葉群說：「蕭華既然向這裏報告，就是想叫我們對這次部隊調動負責。首長才不替他擔這個責任呢！」

秘書又解釋道：「這不是部隊調動，而是一個連隊的行動，它的駐地並無變化，只是臨時到附近去收割小麥，這樣的事，『文化大革命』以前連向總部報告都不必，由軍區或軍一級單位首長批准就行了。現在雖然由於運動關係，部隊調動批准權限相對集中一些，但一個連隊去收割小麥會有甚麼問題呢？」

葉群說：「說是去收小麥，誰知道他們去幹啥?他要去鎮壓造反派怎麼辦？」

秘書對葉群的強詞奪理又好氣又好笑。但又不能繼續和她硬頂。於是建議道：「我看這樣的事可以不必干擾主席。如果需要答覆，只要首長點頭，由我們打個電話就足夠了。我記得首長講過，對主席要

大事不干擾，小事不厭煩……。」

葉群打斷秘書的話，說道：「我比你更了解首長！」說着把手中的那份電話記錄收了去。「我和首長商量一下讓他去決定吧。」

過了一會，葉群走過來，說道：「首長說了，現在是非常時期，權力強調高度集中，部隊的一切行動都應報告主席。天津這個連隊的行動，要經主席批准。」

就這樣，林彪將這件事推給毛澤東：「呈主席批示」。毛澤東看過林彪轉來的這份電話記錄，在上面畫了個圈，即將它退回「林辦」。

葉群拿着毛澤東的批示訓斥道：「你看，主席畫圈同意了，並沒有批評。這證明報主席是對的，反正多向主席請示報告沒錯。」

秘書心想：部隊中一個連隊規模的調動都要報主席，主席受得了嗎？

按中共中央規定，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林彪，有權調動一個師的兵力。對一個連隊的無關宏旨的行動，林彪完全可以自己決定。任「副統帥」前，林彪的作風喜歡獨斷專行，聽不得不同的意見。現在，卻變得謹小慎微了。

林彪是個謹小慎微的「副統帥」，是個膽小如鼠的「接班人」。

第十章 「苦行僧」

戰爭年代，林彪活得像個清教徒，苦行僧。

建國後，儘管環境好了，條件好了，官也做得大了，但是林彪仍然活得像個清教徒、苦行僧，而且越來越清，越來越苦了。

如果說，在東北戰場上，林彪生活的清苦，不講究吃穿，還多少出於對自己的嚴格要求，避免奢華；那麼，六十年代後，林彪就陷入了病態，呈現出一種不正常的講究。

先看林彪的飲食。解放戰爭時期，林彪向來不講究吃喝。到了北京後，這種不講究就發展到簡單，又由簡單變成病態的單一。

在黑土地上，林彪不吃山珍海味，但還吃大米、白面，肉絲炒白菜，酸菜炒肉片之類的尋常老百姓家的飯菜。六十年代以後，就「病態」了。林彪吃白菜，眞正的是白水煮菜，不放油，也不放鹽，還不讓切。理由是可以治療「植物神經紊亂」。

林彪吃魚，要去骨去刺，然後將魚肉剁碎，製成魚丸，依然不放油，清水煮吃。

林彪不講究食物的口味，只講究質量和溫度。質量由保健醫生從中掌握，例如林彪喜歡喝湯，醫生便爲他準備一些營養豐富的高質量的湯。至於溫度，林彪要求必須達到燙嘴的程度，攝氏七十度以下的食物，不能入口下咽。因此，林彪吃飯時，左一個溫水瓶，右一個溫水瓶，服務員不斷地將滾燙的開水

倒出來，將飯菜放進開水中加熱，直至燙嘴的程度，林彪再吃。

林彪也不吃水菓。但愛吃炒黃豆的習慣沒有變。這恐怕是林彪攝取蛋白質的重要來源。

到了晚期，據說林彪就愛喝麥片粥粥了，似乎他的腸胃退化到嬰兒階段。

林彪不抽煙，不喝酒，連茶也不喝，只喝白開水。對喝水，林彪就特別講究，一定要喝北京玉泉山的泉水。那是當年慈禧太后喝的。林彪只有喝這裏的水，肚子才不拉稀，喝其他地方的水就拉稀。因此，林彪去其他地方，都要帶上玉泉山的水，每天要派兩名戰士用飛機或火車專門運送。

五十年代後，林彪像當年研究軍事戰略那樣，研究起食品的特性來，特別是他本人食用後的種種反應，記錄在案，成爲「林氏食療集」，頗具心思。

林彪特別注重產地，說：「全國不少地區產大棗，吃後我的反應就不一樣」。

有鑑於此，林彪規定他的食品產地：

山西莜麥麵（莜麥，又稱油麥，可磨成麵食用）；

山東大棗；

江西茅坪紅米；

浙江青蛤；

福建藕粉；

北京玉泉山青龍橋的水。

林彪說：「福建的藕粉是純的，吃了能止汗。山西莜麥麵吃了身上暖和，山東大棗和青龍橋的水吃了不拉肚」。

一九六〇年，林彪吃羊肉黃芪，結果拉肚子，折騰了一夜。他經常提起這一件事：「我冒冒失失地吃了羊肉煮黃芪，差一點把我折磨死」。從此以後，吃東西，吃藥，林彪都規定「一切通過試驗」，叫手下工作人員試吃，「看看反應好壞我再決定用與不用」。

林彪本不講究穿戴，給甚麼，穿甚麼，絕不挑剔。五十年代後，林彪講究起來了。林彪講究的，不是穿戴的花色，質地，而是溫度。林彪說：

「我的身體時好時壞，就是因爲搞不好溫度害了我。差半度就不行，就會受涼出汗，坐下來不能動。要把掌握好溫度作爲保證我身體健康的關鍵」。

爲此，保健醫生們將林彪的衣物，被蓋都測出溫度。一條毛巾被，測定的溫度爲攝氏七度，爲了保證林彪睡眠時的溫度爲二十八度，就要蓋四條毛巾被。他穿的大衣，每件溫度爲十度，每件襯衣爲一度。

林彪的衣物、被蓋，經測定後，便制定出「溫度計算表」，每天穿幾件衣，蓋幾條被，按表一查便可以。林彪不穿棉衣，天冷了多套幾件單衣。多冷的天，套幾件，嚴格按照「溫度計算表」執行。

林彪說：「我的病是半度病，不要認爲差一點不要緊。你們一馬虎，差一點就坑害了我。」

溫度對林彪的身體健康如此重要，每天早晨林彪起牀穿衣，衛生員要用熱水袋把衣、褲、袜溫熱，鞋子要用電爐烤溫。漱口水規定要四十五度。吃飯用的筷子要用毛巾包起來保溫。要寫字，林彪用的筆也要溫一溫；連電鈴的按鈕，看書用的放大鏡的手把，都要用絨布包起來，以免林彪接觸時受涼。

林彪也沒有甚麼娛樂。偶而看看電影，不看戰爭片，血淋淋的搏殺鏡頭，必須去掉。還偶而聽點梅蘭芳的京劇或電影插曲的唱片，說是可以調劑一下神經。

林彪不愛玩，也不懂玩。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愛跳舞，在延安時代就經常舉辦舞會。建國後，在中南海的春藕齋，每逢周末都要舉辦大型舞會，有解放軍文工團的女孩子來陪舞，毛、劉、周、朱只要不在外地，一般都來跳。在東北戰場，林彪偶爾回哈爾濱跳一下舞。進北京後，林彪一次也沒有參加中南海的舞會。

毛澤東休息時打麻將，玩撲克牌。朱德喜歡種蘭花，下象棋，鄧小平喜歡打橋牌。但林彪甚麼牌也不玩，連牌桌的邊都不沾。

朱德、彭德懷、賀龍等人喜歡運動，假日喜歡郊遊、登山、打獵、釣魚。由於怕光、怕風、怕熱、怕出汗，林彪對甚麼運動都不愛好，也不能做，回歸大自然懷抱的享受，與林彪絕緣。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共「九大」剛開完，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被寫入黨章；而葉群也經過一番煞費苦心的鑽營，得以進入中央政治局。「雙喜臨門」，使林彪與葉群的心情特別高興。有一天，葉群一時興起，拉着林彪想「活動活動」，勸林彪跟她打乒乓球。林彪心情開朗，便欣然從命。不料，林彪剛晃晃悠悠地揮了幾下球拍，就禁不住打了個噴嚏。葉群大驚，趕緊扔下球拍，攙着林彪回屋。又是檢查身體，又是測量體溫，一看，林彪的體溫比正常升高了半度多。葉群大怒，將保健醫生大罵一頓。而這一場夫妻乒乓球表演賽，也就半途而終。

六十年代末，備戰時，林彪下令在會客室裏添置了一台直徑一米的地球儀，林彪經常去撥動幾下，算是多添了一項活動。

林彪不看電視，不聽廣播，不聽音樂，不看戲，只偶爾看看電影。毛家灣有一個電影放映室，可容

納三、四十人。「林辦」經常調些影片來放。有外國片，香港片，還有中國在五十年代初期拍的一些舊片，都是外面難得一見的。開始時，是請部隊的放映員來毛家灣放映，後來葉群從「林辦」工作人員中抽出兩名戰士，去學習放映技術，回來後便建立了自己的放映隊。放映電影時，葉群時常將一些親朋好友找來一起看。能夠到毛家灣來看電影，是一種莫大的榮幸。因此，毛家灣的電影放映室內，經常「高朋滿座」。林彪偶爾也過來看看。也許是仗打得多了，戰火、鮮血見得多了，建國後林彪不看戰爭片。戰爭不僅給他的身體留下了創傷，也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濃重的陰影。

林彪也不喜女色。五十年代初期，林彪和葉群便分居了。葉群時常幽幽地說：「我和林總是政治夫妻」。

林彪唯一的嗜好是「抽」。據說林彪在戰爭年代養成了抽大煙的惡習，一直不能戒掉。到北京後，林彪仍然吸毒。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晚上，天安門廣場上放煙花，毛澤東要上天安門城樓觀賞。照例林彪必須陪同毛澤東，而且要提前到達。然而，這一天林彪沒有抽足大煙，遲遲不來。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西哈努克親王等人都先後到達了，但仍未見到林彪的身影。周恩來只好親自打電話到毛家灣催駕，林彪才姗姗來遲。當林彪穿着黃呢子軍大衣，皺着眉頭，鐵青着臉，從攝影記者杜修賢身邊走過時，杜修賢聞到林彪身上飄出一股濃烈的味道。後來才聽說，那天晚上林彪要吸大煙，不想去天安門，是周恩來的電話催促，他才不得不中斷吸大煙，所以來遲了。由於沒有過足毒癮，林彪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樣，在天安門城樓上沒坐上五分鐘，便不辭而別了。這是林彪與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見面。

不抽大煙時，林彪便喜歡聞火柴燃燒時冒出的硝煙。在他的臥室、會客室內，經常放着一些高級的火柴。林彪將一根火柴擦着，立刻將它吹滅，把還冒着煙的火柴桿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就扔在地下，然

後再擦着第二根、第三根。

林彪可以打發時間的事情，便是看書。

在毛家灣，林彪有自己的書庫。那是一個三米來寬，七、八米長的房間，牆上固定着精緻的木製書櫃。櫃裏的書不很多，鬆鬆散散，很不整齊。而且全是舊書，許多還是解放戰爭年代，甚至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出版的書，裝幀粗糙，紙質低劣，卻是書櫃中的珍品。不少書上都有許多紅筆劃的杠、寫的字，那是林彪閱讀時留下的記號。書庫裏的書種類很雜，多是軍事的，哲學的，邏輯方面的書，也有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還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物傳記、工具書、詞典辭書等也都各有一些。

林彪讀書的方法與葉群不同。葉群是讓別人摘出一些要點、精華，供自己吸收。林彪則是自己看。林彪喜歡的書，一買就是幾本。他喜歡剪書，把他認爲重要的部分，讓內勤給剪下來，貼在一起，其餘的便扔掉。然後，將貼起來的部分再看，再讓內勤給他剪，再貼再扔。如此幾番剪貼之後，最後就只剩下幾句話了。林彪採用這種辦法看完《共產黨宣言》之後說：只要記住「大工業大機器」就行了。

林彪很欣賞《老子》這本書。說裏面充滿了辯證法。老聃那些富於哲理的話，如「正後爲奇，善後爲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以及「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等，林彪都甚爲欣賞。然而，林彪喜歡這本書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裏面講了「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這些具有強烈的「犯上作亂」的話。因此，林彪認爲「這本書不能把人們團結起來，不能把力量集中起來」，不宜在部隊裏提倡。當發現身邊的工作人員在看這本書時，他便說這本書不

好，不要看，但是，在私底下，林彪卻向女兒林豆豆表露出對這本書的讚賞。這是兩面派呢，還是領導人應有的策略？

六十年代以後，林彪身體健康日差，沒精力看那麼多的書了。他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健康。有精神時，他經常看的是一本《醫藥大辭典》和《辭海》。林彪在解放戰爭時期便看醫書，自己開藥方抓藥吃。六十年代後，林彪更專注於醫藥的研究。《辭海》是用來查醫藥辭典的生字古詞的。這兩本書經常不離身邊，是林彪臥室、辦公室（即西會客室）內僅有的兩本書。林彪研究得很細，看哪一條對自己合用，對症，就在上邊劃一道紅杠，讓人去給他找這種藥。用了幾次，沒甚麼作用，就停用了。然後再看，再找。因此，一本醫藥大辭典被他用紅藍筆圈圈點點，劃了一道又一道，在字裏行間，林彪還歪歪斜斜地寫着：「棗子糯米久吃補陽」，「出汗是血管擴張」，「吃蘿蔔膀胱會出汗」……

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林彪沉迷於醫藥書籍。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抄出了不少書。有一次，葉群派官偉勛去從中找些珍貴的好書，來充實毛家灣的圖書館。一天，葉群派保健醫生來檢查，看看在找來的書中有沒有醫藥方面的書。保健醫生傳達葉群的指示，說：

「將這些醫藥書收起來，交給葉群，不要擺出來。主任怕首長萬一進來看到，看了之後，愛想，想得太多，不好。」

這位一代名將，此時此地的精神世界，已龜縮在一本醫藥大辭典內了。

林彪的一生，無論在戰場或是政壇上，他都表現得轟轟烈烈，耀眼奪目。可是，這位軍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天才」，在私生活方面，在個人的天地裏，卻是那麼的單調、枯燥、乏味。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是十分罕見的。他那清教徒、苦行僧式的一生，似乎都沒有好好地享受這個繽紛燦爛的世

界，沒有好好地享受那多姿多采的生活。人們不禁想問：
林彪到底在追求甚麼呢？

第十一章 林彪與葉群

與寫毛澤東不能不提江青一樣，寫林彪也不可不提葉群。

在目前所見的中國現代史書及林彪傳記中，鮮有不提葉群的。葉群是林彪的一部分，也是中國現代史的一部分。

與江青一樣，葉群也是妻憑夫貴，由一個藉藉無名的女人，逐步走上中國政壇，成爲中共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與江青一樣，葉群也是個政治野心極大，權力慾望極強烈的女人。她好動，虛榮心強，好出風頭，不甘寂寞。據說，林彪的再次出山，就是她在背後鼓動、攛掇的。

據林豆豆說，林彪與葉群的婚姻，是毛澤東和朱德說合的，「朱毛」是大媒人。

解放戰爭前期，葉群基本上當「家屬」，在家「湊仔」。後來，葉群挂名擔任林彪的秘書，照料林彪生活。建國後，葉群隨林彪在中南軍區任翻譯科科長。一九五四年轉業到地方，先後擔任過省、市教育局副局長，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副司長。對這些職務，葉群都無多大興趣，只是掛個名，並沒有正式上班工作。當時，與葉群一起投赴延安的同齡人，都在中央當了某某長，地位顯赫，名成利就。唯有葉群還只是一個挂名的副司長，而且還是教育部——這個最不起眼的部。葉群多次向林彪訴苦，鼓動林彪在政壇上進軍。起先林彪不理睬她。但說的多了，林彪也認爲葉群確實是因爲自己而受了委屈。於是，對再次出山也就積極起來。一九五九年，林彪擔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葉群也就重新穿上軍

衣，擔任「林辦」主任。其時葉群的職位不過只是正師級，軍銜不過是上校。然而，隨着葉群在政壇上浸淫日深，尤其是林彪榮升「副統帥」、「接班人」後，葉群的政治野心也逐步膨脹，借着「文化大革命」的「東風」，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成爲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與江青一樣，葉群心狠手辣，品質惡劣，不擇手段。甚麼打擊報復、造謠誣蔑、栽贓陷害，打小報告，整黑材料，揑造名目，羅織罪名，置人於死地，葉群的爲非作歹，與江青不遑多讓。至於謊報軍情，說假話，發假誓，更是葉群的拿手好戲。一九六五年，林彪整羅瑞卿時，就是派葉群先到杭州向毛澤東告御狀，而後又在上海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作主要發言，講了十個小時，最後將羅瑞卿打倒的。「文化大革命」中，在陷害劉少奇、賀龍、楊余傅等人的政治事件中，葉群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是親自衝鋒陷陣，就是身居幕後出謀策劃。其用心之狠毒，其手段之卑鄙，令人髮指。葉群本來就壞，「文化大革命」中，又向「第一號女鬼」江青學習，就變得更加邪惡。葉群和江青一起，將中國攪得天翻地覆，不愧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二號女鬼」。

如果說江青依仗的是毛澤東那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行爲作風是「和尙打傘——無法無天」，那麼，葉群就比較偏向於運用權術，玩弄政治手腕和依靠欺騙。葉群的靠山林彪，畢竟只是「第二號神」，而且正在「勉從虎穴暫棲身」，沒有江青那麼雄厚的政治資本。因此，江青可以肆無忌憚，橫行霸道，動不動就發火、訓斥，在大庭廣衆之下，時常「老娘」不離口，十足是個市井潑婦，小家子婆娘的模樣。葉群在毛家灣雖然也罵人，但她畢竟是宦官家庭出身，又在北平唸過洋學堂，因此，在大庭廣衆的場合，她就裝出一副「大家閨秀」的模樣，待人接物彬彬有禮，態度溫文爾雅，更具欺騙性。江青以「呂后」、「武則天」自居，唯我獨尊，頤指氣使，鋒芒畢露，其人的性子，一點就着，張口就罵，

風風火火，聽風就是雨；而葉群則深受林彪的影響，信奉「韜晦」，將「見人面帶三分笑」作爲自己的座右銘，「善用兵者隱其形」，「喜怒不形於色」。與江青相比，葉群顯得平易近人，喜歡與林彪部屬的家屬、孩子聯絡、交往，常常請他們到毛家灣作客、看電影，施予小恩小惠，借以籠絡人心。

與江青一樣，葉群在政治上平庸，缺乏必要的政治理論修養。江青只喜歡看戲、看電影，絕無耐心看書學習。但葉群的地位不同，她必須學習。因爲林彪、葉群「緊跟」的毛澤東，講話中常常引經據典，中國歷史上的典故、經子史集，信手拈來。因此，林彪、葉群必須有比較豐富的歷史、文學知識，才能正確理解「最高指示」；另外，葉群主持的「林辦」，必須爲林彪在中央的表態、決策提供參謀」。因此，她必須對當前的國內外局勢有所了解。這一切，都需要葉群具備必要的知識，她不得不惡補。於是，葉群調來一批專家幫助她讀書。在這些專家之中，有爲葉群講詩詞的，講《紅樓夢》的（毛澤東喜愛並經常講《紅樓夢》），講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有講馬列主義理論的，有講哲學的等等。如葉群在學習《共產黨宣言》時，吩咐將這本書的內容寫在一張大表格上，主題思想、時代背景、段落大意、重要警句等，一一列在表上。講的時候以介紹該表爲主，再回答葉群提出的問題，就算可以的了。

「林辦」秘書說：這些來「幫忙」（講書）的學者，大都由葉群直接調用，很少有機會與林彪見面。他們所具有的知識，葉群恨不得一夜之間據爲己有。於是就創造了一套「捷徑」，加緊爲自己適應新形勢做準備。秘書又說：葉群最感興趣的東西，莫過於描寫宮廷政變、玩弄陰謀詭計之類的情節，她所注重的，並非名著中的正面人物，而是那些擅長在幕後搖鵝毛扇，能夠隨心所欲地呼風喚雨的人物。因此，葉群學到的眞正精華並不多，而學到的邪門歪道卻是不少。

不能說葉群不學無術，她畢竟發表過論文，翻譯過作品，可算是半個「才女」。但葉群根本不具備處理黨、政、軍大事的那種能力、知識和經驗。她政治膚淺，思想平庸，缺乏政治家那種雄才大略和卓識遠見，她不能夠見微知著，沒有「瞥一葉而知秋」的那種洞察天機的政治功力；她頗具小聰明，也工於陰謀詭計，但是缺乏大智大勇和高瞻遠矚，這是葉群的致命傷。「九大」時，林彪的權勢達到了頂峰，但也是走下坡路的開始。因爲，對毛澤東而言，林彪的利用價值已經完結，林彪的使命也就結束了。在這種形勢之下，作爲林彪的參謀長和林家王朝在第一線的指揮官，不但沒有提出應變的辦法和計劃，反而在國家主席問題上，指揮各名大將莽莽撞撞地與毛澤東對抗，最後導致林家王朝覆滅。

撒謊是葉群的一大特色。葉群幾乎向所有的人撒謊：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撒謊，向中共中央撒謊，向周圍的親朋好友撒謊，對林彪、女兒，兒子，也都大撒其謊。葉群能力和智慧都有限，野心卻很大，往往力不從心，於是，撒謊便成爲她彌補兩者之間巨大差距的一種工具。葉群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她說：「『撒謊』有兩重性，有革命的撒謊，也有反革命的撒謊，爲了革命，撒謊是必要的。」這個被羅瑞卿稱爲「渾身都是假」的女人，遠至國家大事，近至自己的黨籍、是否是處女，她都撒謊，都在弄虛做假。

葉群還假扮斯文，附庸風雅。「九大」以後，葉群忽然心血來潮，要做詩塡詞。但自己不會，便偷偷地調來一名叫朱彥的人，爲她捉刀，但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是來「幫助練字」的。朱彥爲葉群寫了幾十首詩，有五言、七言、絕句，還有各種牌名的詞；其思想內容由葉群口述，然後朱彥便創作成詩詞，還用一手漂亮的柳體字寫下來。最後，葉群採用仿影的手法，依葫蘆畫瓢般描下來，並落款「葉群」。這樣連詩帶字都是葉群的了。葉群吩咐將這些詩詞或裱成字畫，或刻在名貴的古硯上。然而，時

間長了紙包不住火。爲了掩飾，葉群便又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詩是我的習作，只是叫朱彥改改而已。」

與江青比起來，葉群顯得更加虛僞、陰險。江青的喜怒哀樂都是表現在臉上的，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葉群則不然，喜怒不形於色，笑里藏刀，口蜜腹劍，各有各的可怕之處。

一九六五年夏天，林彪和葉群已決定要打倒羅瑞卿，但表面上卻表現得格外親熱。

七月九日，葉群給羅瑞卿打電話：「我們前天到大連，林總的身體比較好，吃飯比較好一些，因爲怕水，沒有住海邊，住大連招待所。想在夏天不回去了，家裏可以施工。我的喉嚨全好了，是點甘油好的，和總長說的一致。謝謝總長和郝治平（羅妻）同志的關心，問候他們。」

七月二十二日，葉群又去電話：「總長去看豆豆，老虎，他們很高興，第二天就給我打了電話。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林副主席，他很高興，天這麼熱，還去看小孩子，要總長注意身體。豆豆到空軍工作，思想有進步，老虎也很好，請總長放心。」

從這兩份電話記錄看，葉群表現得溫文親切，與羅瑞卿好得猶如一家人。

八月二十七日葉群又給羅瑞卿打去電話，說：「林總身體還好，還出汗，虛弱一點。公勤人員、秘書三人感冒，已隔離休息。林總還未發現有傳染。已把李科長留下，另由劉震副司令員從空五軍療養院調來兩個人幫忙。豆豆已回空軍宿舍去住，老虎也很好。感謝總長、郝治平同志對他們的關心。請總長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體。」

依然是噓寒問暖，問候有加。然而，在這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後面，林彪和葉群正四處佈置，找人整羅瑞卿的黑材料。林彪和葉群手中揭發羅瑞卿的黑材料，越攢越多。就在三個月以後，葉群便撕破這層

面紗，在林彪的授意下，到杭州告御狀去了。

向羅瑞卿撒下的羅網，在葉群的親切可人的煙幕下張開。

與江青一樣，葉群追求物質享受，生活奢侈腐化。林彪活得像個苦行僧，葉群卻愛吃，愛穿，愛玩，也會吃會穿會玩。

葉群的飲食，比林彪複雜得多。她很少吃主食，討厭大米白面，對山珍海味，尤其是海鮮，情有獨鍾。她愛吃螃蟹，兩個一斤，當飯吃。她愛吃水果，但對北方的「國光」蘋菓和梨子卻不屑一顧，多吃南國的種種佳果。每年，全國各地以種種名義送給毛家灣的水果成籮成筐，林彪一個不動，葉群挑好的留給自己吃，其餘便分給「林辦」的工作人員。除了山珍海味，葉群還經常吃補品，滋補養顏。

葉群穿戴考究。別看她在公開場合一律身穿草綠色軍服，但在她的更衣房內，綾羅綢緞，棉毛化纖，應有盡有。還有各式各樣帽子九十一頂，高級的綢緞旗袍十二件，毛料褲子五十六條，毛料上衣六十四件，她夏天常常穿一套淺灰色凡立丁小翻領西服，臉上施着淡淡的脂粉。這在當時已算是「濃妝艷抹」了。

葉群的臥室大而雜，塞滿了沙發、玻璃櫃、電視機、牀頭櫃、躺椅，到處是古董擺設，不土不洋，不倫不類。房間的四壁，上面一圈掛滿了古代的仕女圖，下面一圈則是唐宋明清的山水畫，都是名家眞跡，價值連城。這些是國寶珍品，是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抄出來的，葉群只花幾塊錢，便從文物管理處那里買來。還有一些是康生、陳伯達贈送的。梳妝台上擺着從故宮搞來的一座大型黃金鐘，僅黃金便有一斤重，還有小鳥跳出來鳴叫報時；玻璃櫃裏則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古董，有玉器、瑪瑙；書櫃裏有《金瓶梅》、《花月痕》、《九尾龜》、《俊友》、《笑話三千》等作品。左邊的墻壁上掛着林彪的題

詞「天馬行空，獨往獨來」，門後貼着保密員小李寫的條幅：「少吃多活動」，「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及「充其量，壞不到那裏去」；連屏風上都貼着陳伯達的題詞「克己」，以及林彪的指示「做事莫越權，說話莫囉嗦」，而「越權」與「囉嗦」，正是葉群的兩大特色。

葉群的牀也不一般。她用的是電加溫被蓋；牀頭有電動牙刷，因爲她洗臉、刷牙全在牀上，有專人服侍；牀上還有一張帶輪子的飯桌，是葉群在牀上吃早餐用的——這完全是貴婦人的派頭。

林彪怕水，葉群卻喜歡嬉水。空軍的吳法憲爲她在毛家灣大院裏蓋了一座長二十五米，寬七米，深二米的室內游泳池，專供她嬉水。池水是自動循環、過濾、消毒、加溫的，不論冬夏，池水保持恆溫三十一度。水池畔鋪着地毯，擺着精緻的桌椅及藤制躺椅，布置得豪華而舒適。

葉群臥室裏還有一張按摩牀，每天有男衛生員爲她按摩兩次。

除了電影室，葉群還有自己的唱片室，藏有五百多張中外唱片，各種電唱、錄音、播放設備，式式俱全。

林彪不串門，不喜應酬、交往，也限制葉群串門、交往。葉群卻好動，愛串門子，愛應酬、聊天，正是「十處打鑼九處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後，葉群更呆不住了，白天黑夜往外跑。跑得最多的，是釣魚台十一號樓江青的住處。那時江青和她的「中央文革」正紅得發紫，江青自命爲中國的「第一夫人」，葉群便自居「第二夫人」。葉群說林彪緊跟毛主席，她則要緊跟江青，自然要多跑、勤跑。兩位第一、第二夫人此期間打得火熱。

林彪多次勸葉群：「你不要到外面亂說，亂跑。」林彪還讓林立果告訴秘書：「叫葉群少往外跑，晚上從外面回來，你們要勸她早點休息。」但是葉群不聽勸告，撒謊要開會，照跑不誤。

有一天，林彪將秘書叫去，問道：

「葉群每天晚上開會，她都到甚麼地方去？」

秘書們不敢不答，又不敢明答，只好含糊地說：「可能是去釣魚台。」

林彪又說：「她回來跟我說這說那，囉里囉嗦，嘮嘮叨叨。今後，讓她好好睡覺，我不要見她。你們回去開個會，一定要落實。」

林彪對葉群不聽勸告、一個勁往外跑，感到心煩而氣憤。他給葉群定下「約法三章」：

少外出，少說話，多睡覺。

又口述下：「做事莫越權，說話莫囉嗦」，叫秘書用毛筆寫成條幅，掛在葉群的房間裏。

葉群聽到林彪的批評，頓時火冒三丈，臉色鐵青，大聲罵道：「姑奶奶不分晝夜地奔波，是爲了誰？到頭來，勞而無功，反而有過……。」葉群故意大聲嚷嚷，好讓林彪聽見。

葉群嚷嚷歸嚷嚷，但對林彪的命令，卻不能不考慮。然而，要讓她在家裏老老實實地呆着，不亂跑，不亂說，那簡直比要她的命還難受。葉群也不是省油的燈。正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葉群想出了一套應付林彪政策的對策：

一，與工作人員串通，將自己的室溫調低三度，爲十八度，林彪的室溫是二十一度，林彪怕着涼，便不敢越雷池半步了。

二，葉群又怕林彪叫內勤來找她，於是便向工作人員宣布：她的房間門口挂白牌子，表示她起牀

了；如挂紅牌子，則表示她正在睡覺，任何人不得入內。林彪不是叫她多睡覺嗎？這一條正是「照辦」的，林彪和工作人員也就不好再說甚麼。

三，葉群對所有的工作人員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在她外出時，一律封鎖消息，如果林彪問到了，只能說「正在休息」。葉群還在自己的房間開了一道小門，可以自由出入。

一天林彪在自己的房間裏踱步，久久不見葉群過來，便想去葉群的房間。剛去到門口，見到挂着的溫度表上指着十八度，便猶豫了片刻，回到自己的房間。

《三國演義》里有諸葛亮施空城計退司馬懿，在這裏，是葉群用「溫度計」退林彪。熟知兵法韜略的林彪，竟勘不破葉群的「略施小計」，眞可謂「大智若愚」矣。

平心而論，林彪對葉群是管得很嚴格的。「文化大革命」前，葉群的職務爲正師級，軍銜只不過上校，這些都是葉群憑自己的資歷掙來的，並沒有摻雜林彪權勢的成份。而在當時，林彪憑自己的權勢和地位，如要「走後門」使葉群的職級、軍銜高一點並不是不可以的。但林彪沒有這樣做。有一次，葉群向毛澤東告狀，哭訴說林彪如何如何對待她。毛澤東聽後，半開玩笑地說：「葉群是小媳婦受氣。林彪管得太嚴了，管那麼多幹甚麼？」

在串門這一點上，林彪管不住葉群，後來也就索性不管了。也是因爲林彪需要葉群從各處收集來的有關北京政壇的「小道消息」，因此，「串門子」便正式地成爲葉群的工作內容之一。

儘管葉群說與林彪是「政治夫妻」，但畢竟是夫妻。由於林彪身體不好，兩人很早便分居了。他們之間表示恩愛的一種方式，是互贈題詞。

林彪給葉群的題詞有：

天馬行空──書贈愛妻良友葉群，死後骨灰合葬，以記念親密相處

林豆豆說：「葉群也是很不幸的……林彪受過傷，身體不好，病愈來愈重，全國解放後他們就分居了。可以說，她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已不能享受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也許是出於這種內疚和歉意，林彪寫了上面這幅題詞。不管林彪內心如何，其詞義是很纏綿的。

葉群回敬林彪的是：

教誨恩情數不盡，天長地久永相隨──書贈林副主席

葉群表達的情愛，可就淡得多。

林彪書贈葉群的題詞還有：

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克己復禮。書贈葉群同志，一九六九·十·十九

温文，豪放，理智，既受於天，且受於人。書贈愛妻葉群　林彪·五，二十六

這可能是林彪對葉群的讚賞之語，因此葉群將它刻在辦公桌的硯盒上，可以朝夕相對。

除了恩愛以外，聯繫林彪和葉群的更重要的紐帶，是共同的政治利益。

葉群知道，自己才德俱薄，如果沒有林彪，自己始終只是個十一級幹部。自己政治野心能否實現，能在多大程度、多大範圍內實現，全憑林彪了。因此，林彪的興衰榮辱，與葉群息息相關。爲自己、爲林彪，葉群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來當好這個「林辦」主任。

林彪也離不開葉群。

林彪靠葉群作爲自己的耳目。林彪性格孤僻，身體也不好，深居簡出。他瞭解外界情況的渠道十分狹窄，數量也少得可憐。而葉群則是十處打鑼九處到，不是開會就是串門子，在家裏也是電話不斷。她的這一特長，正好彌補了林彪的不足。她把自己聽到的，看到的，大量地灌輸給林彪，成了林彪的主要的消息來源。

葉群又是林彪的智囊、高參。林彪大智若愚，儘管他是戰略家、軍事家，但在處理日常事務方面，卻不是行家。尤其是政務方面，經驗不足，政治手腕也不嫺熟。因此，林彪在決定甚麼事時，都要與葉群商量。林彪出外開會前，都要與葉群嘀咕一陣，讓葉群爲他出謀策劃。據林彪身邊的秘書說，林彪的點子、主意，起碼有一半是葉群出的。

林彪由於身體衰弱，精神不濟，不能也不喜歡多管具體事務。可是，疑心和權力慾都很重的他，又不能讓其他人代他行使權力。於是，只好交給「愛妻」葉群，他才放心。例如，整羅瑞卿時，就是派葉群去遊說毛澤東的。林彪的權力究竟有多少交給了葉群行使？林彪的秘書說：葉群當了林彪一半的家。

葉群替林彪當家作主，還有毛澤東的成分。毛澤東要林彪當「接班人」，林彪以「身體不好，不能經常參加會議」爲理由來推辭。毛澤東說：重要的會你來參加，一般的會議可讓葉群代你參加。林彪不得已，只好從命。但葉群卻是求之不得、樂不得。於是葉群便名正言順地出席各種重要會議，包括政治

局會議以及後來取代政治局的、由周恩來召集的中央碰頭會議。葉群進入了中國權力的核心。

葉群充分地利用了林彪和毛澤東賦予她的權力。《林彪傳》一書說：「林彪根據自己的需要，按照自己的意圖來利用葉群，葉群則根據自己的需要被林彪利用，反過來她利用林彪。她利用林彪要當耳目的需要，按照自己的意圖向林彪灌輸她要灌輸的情況，包括許多顛倒黑白的假情況；她利用林彪要她當高參的需要，根據自己的意圖左右林彪的行動；她利用林彪要她當打手的需要，借機整她要整的人。這樣，他們夫妻之間，也不斷地進行着政治交易。而葉群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林彪，左右林彪的重大行動。她利用夫人兼辦公室主任的身份，利用林彪對她的依靠，她既能打着林彪的旗號，狐假虎威，又能控制林彪的表態權，控制林彪同外界的接觸，直接控制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所以，林彪王朝的實權，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掌握在葉群手中。」

這段話基本上概括了葉群當政的情況。

外面打來的電話、送來的文件、求見的人員，事先都要經葉群過濾，那些可以、那些不可以送達林彪那裏，全由葉群決定。連女兒林豆豆要見林彪，都要受到葉群的控制，能不能見，見多長時間，全由葉群掌握。林彪有點象傀儡了。

難怪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南巡講話中說道：「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人（指黃、吳、李、邱）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葉群專權之情，已「上達天聽」。

對於葉群的「倒行逆施」，林彪並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所斗爭，有所限制。於是，林彪、葉群之間便常常發生爭吵。

據林彪的秘書說：「為了這些事，葉群常跟林彪鬧，在地上打滾，把頭髮撕亂，又哭又叫。林彪也

不客氣，把她攆出去，幾天不讓她來見他，她就幾天不來見。葉群卑鄙得很，有時還下跪，有一次，已經鑽進了林彪的車子，又讓林彪給趕了下來。」

還有一次葉群將林彪惹急了，林彪大動肝火，竟搧起葉群的耳瓜子。葉群跪在林彪面前，也不躲避；林彪又用腳踢她，叫她滾出去。正當兩人大鬧的時候，秘書有事請示林彪，推門走了進來，看到了眼前的這一幕，想退出去又不妥，只好上前婉言相勸，又將葉群扶起來，送出林彪的房間。葉群不但不感謝這位秘書，還說他多管閒事：「今後我還有甚麼臉見你們？我這個主任還怎麼當？」

中共「九大」期間，爲了入政治局一事，葉群與林彪大大地鬧了一場。

爲了擠身政治局委員，葉群利令智昏，竟不惜冒林彪之大不韙，在林彪吃飯的時候，進來嘮叨她的妙計。

林彪剛吃了兩口飯，抬頭一看，葉群滿臉陪笑地走了進來。他的臉沉了下來，把手中的筷子往桌子上一摔，說道：「他們沒告訴你，我正在吃飯嗎？」

「告訴了。」如果是平日，葉群也許會解釋兩句，便退出去。但這次事關重大，葉群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於是又說道：

「我知道你正在吃飯，可有件大事不能不和你商量呀！現在甚麼時候了，『九大』已經快要結束了，聽說主席已經委托周總理、康生和黃永勝三個人，正在醞釀政治局委員人選。這可關係到你、我和咱們全家的政治前途。在這關鍵的時候，你可不能謙讓、退縮。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林彪滿臉不悅，沒有吭聲。

葉群又說：「我考慮好久了，我們的人，應該進政治局。沒有幾個忠於我們的人佔領政治局的陣

地，你就會成爲空頭司令，我們就很難控制住軍隊裏的大權。我這都是爲你着想。我的具體想法是，要讓黃永勝進政治局常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我進政治局，加上你，政治局裏就有我們六票，又有你的地位和權力，完全可以舉足輕重了。」

葉群又說：「啊，我還忘了，永勝讓我代他向你問好。你身體不好，永勝身體很好，有他在常委裏支持你、別人想反對你，也無能爲力了。關於永勝進常委的問題，我琢磨着主席不會提名，你不說，別人不會說這話，只要你一提他，就不會有人反對，事情也就八九不離十了。」

林彪本來就有氣，聽葉群這一套嘮叨不禁火上加油。

葉群還想說：「將來永勝任常委，你身體不好，可以讓他多承擔工作……」。

頓時，林彪勃然大怒，吼道：「你有多大權力，又要安排政治局委員，又要安排中央常委?!」

林彪這一怒，要是在往日，葉群早已噤聲陪不是。但這一天葉群似乎是迫不及待，她拿了一張紙，飛快地寫道：

「不要吵，這樣，工作人員聽不見——你終日躱在房間裏，算計別人，陰險，兩面三刀，口是心非，難以琢磨，心懷仇恨，整天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僞君子的樣子，以假象騙人……。」

林彪看了這張紙，頓時氣得渾身大汗，週身顫抖。葉群見狀，知道鬧得過分了，慌忙上前抱着林彪。

林彪怒吼道：「你走，你給我滾!我不見你!」

這一次，葉群沒有屈服，她「呼」地把門一摔，走了出去，滿腔怒氣地嚷道：「這個倔巴頭，連鹽醬都不入!」

對葉群的胡鬧，林彪的反應是絕食了兩餐。

這是葉群和林彪鬧得最不可開交的一次。

鬧歸鬧，這一對政治夫妻還得維持下去。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兩人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一同摔死，爾後又被一起埋在一個沙坑內。正應了林彪的「死後骨灰合葬」那句話。

第十二章　林彪與子女

林彪冷口冷面，夏天也像塊冰，喜怒哀樂從不寫在臉上。解放戰爭時期，前線傳來多大的好消息，他都只「嗯」聲，露出點笑意，一閃即逝。遼瀋戰役後，敲鑼打鼓，萬衆歡騰，可是林彪那臉色，那步子還是那樣子，幾乎看不出甚麼喜色。

於是，人們便覺得，林彪似乎是個沒有感情的動物。在這個世界上，他不愛任何人，也沒有人愛他，他沒有溫情，沒有友情，沒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慾，是個麻木不仁，不食人間煙火的怪物。

這種看法只對了一部分。其實，林彪也有自己情感，有溫情，也有親情。只是他將之埋藏得更加深沉，更加難得流露，而流露時也更爲吝嗇，從而也更顯得珍貴而已。

在這個世界上，能獲得林彪珍貴的溫情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女兒林豆豆。

在林家三名子女中，林彪最疼愛的是女兒林立衡。由於自己一生喜愛吃黃豆，一生離不開黃豆，於是便將這名女兒昵稱豆豆。

林彪疼惜林豆豆，是有其原因的。

林豆豆生於一九四四年，那是抗日戰爭最艱難困苦的歲月。由於蔣介石對陝北革命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延安的物質生活十分困苦。歷史上有名的「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便是在那個時候提出來的。林豆豆生時不足月，出世後又沒有東西吃。葉群後來說：「她是我在戰爭年代生下來

的。那時候條件艱苦，生下來才三斤半重，沒法養，送在老鄉家裏養着，後來聽說那家成份不好，嚇得趕緊又要回來了。」葉群叫林彪「走後門」搞些奶粉來，林彪不肯，說：「延安這麼困難，怎麼弄呀？」葉群說他「呆」：「比你官小的都能弄到，你怎麼就不行？」林彪回答：「人和人不一樣。」

也許是孩子那嗷嗷待哺的情景，給林彪留下深刻的印象。據說，林豆豆的出世，使得林彪對戰爭、對人生的感觀都改變了。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編輯的《林彪與孔孟之道》中輯錄了林彪在中共「七大」中的講話：

「老百姓天天不是在談抗日，在談共產黨這一套。他們談的是他們本身的事情，怎樣種田，年成好，每天怎樣做工流汗，怎樣做生意，整天男女大小全在這一套……他們想他們生活那一套，我們想我們這一套。」

將革命群衆對革命的需求說成如此這般世俗，這在中共高級幹部中是十分罕見的。其實，革命與世俗生活本是兩回事。是否是林豆豆的出世，使林彪看清了這一點呢？

林豆豆身體瘦弱，兩道又粗又短的濃眉，十足是林彪的印記，與女孩子的嬌美極不相襯。她性格率直、善良，沒有遺傳到葉群的那份虛僞和邪惡。她對林彪敬愛、體貼，自小兩父女就很談得攏，林豆豆親近父親的程度，更甚於母親。林彪喜愛林豆豆的最大原因，在於兩人具有共同的思想和語言，林彪認爲，只有這個女兒還能與他談一些眞心話，跟他說得來，能給他帶來歡欣與快樂。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林彪還有可以信賴的人，那麼這唯一的人便是林豆豆。這名女兒，是林彪在這個冷酷的世界上的唯一的溫暖和藉慰。

五十年代初，林彪在蘇聯療養。莫斯科的療養院風光迷人。可是林彪的心卻牽掛着遠在祖國的林豆豆。孤傲清高的林彪，從不求人。這次想女兒實在是想得緊了，不得已，林彪只好開口托即將來蘇聯的粟裕大將，將林豆豆帶來莫斯科，以慰老懷。對遼瀋戰役的勝利都不多一點笑、漠然置之的林彪，不思妻子，獨對林豆豆牽腸挂肚。如此兒女情長，在林彪來說，是十分罕見的。將女兒萬里迢迢托人帶來相見，這份溫情還不夠深沉，還不夠強烈嗎？

六十年代初期，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林彪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共、中國政壇，有着一系列的負面的看法。林彪多麼想找人談談他內心中這些如此隱密、如此重大的思想，以便使他那顆沉重的心得到舒緩。林彪選擇的，便是林豆豆。林豆豆說：「我把這些看法寫在日記上。關光烈（『林辦』黨支部書記）看了我的日記，非常害怕。對我說，你不能寫這些東西，寫這些東西不得了！後來，不知怎麼搞的讓葉群知道了。一九六六年，葉群趁我到外地去的時候，讓郭連凱（『林辦』秘書）把日記翻出來拿去給她看。只她一個人看，別人誰也不讓看。她看後，從中選了些，讓郭連凱找人拍照。拍後，送到北京公安局去了，然後便把我所有的日記和我的皮包，統統放進廚房爐膛裏燒掉了。多可惜呀！那年我十八歲，你現在讓我再寫，也寫不出當年那個樣子來了。多可惜！現在就看等到哪一天，看看能不能把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些照片找到了！」「要是能找到再看看，該多好呀！」

殊不知，林彪洞察到的這一切，實在太沉重，太駭人聽聞了。林豆豆那顆純潔而年青的心靈，根本承受不了這一切。林豆豆對祖國，對自己的前途失望了，幻滅了。這個二十歲的少女，第一次服毒自殺。

林豆豆的自殺，極大地震撼了林彪的心靈。爲了鼓勵女兒，他寫了些題詞，贈給林豆豆：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　　贈豆豆女兒

爸爸　一九六二，十一，十七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頭。

書贈豆豆　爸爸　六三，十，二十四日

歡歡喜喜　堅持到底　六八年四月加寫

林豆豆將這兩張條幅，挂在自己的房間裏。

林豆豆寫得一手好文章。一九六八年，她到青島採訪，寫了篇《三下九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被毛澤東看到了。因署的名是個化名，毛澤東便查問是甚麼人寫的，當知道是林豆豆寫的後，毛澤東很高興，在政治局會議上，表揚了這篇報導寫得好。葉群聽到後，十分高興，認爲給她露了臉。後來，毛澤東見到林彪時，又提起了這件事。林彪不知就裏弄得很尷尬。回到毛家灣就發脾氣，問葉群是怎麼回事？葉群才把林豆豆寫文章的事告訴了他，於是，林彪便又寫了一張條幅，贈給林豆豆：

腳板底下出文章　服從爸爸教導，熱愛媽媽

一九六七年，林豆豆進入《空軍報》工作，住在空軍宿舍。如果林彪有一段時間見不到林豆豆，便問葉群：「豆豆去哪裏啦？在不在北京？怎麼這麼長時間不回來看我？」在林彪那顆冷酷的心裏，始終

爲林豆豆保留着一個溫暖的角落。

一九六八年，葉群四處爲林豆豆找女婿。林豆豆自小就不滿意葉群的所作所爲，長大後更對葉群產生了抗拒和反叛的心理。葉群爲林豆豆找女婿，是爲自己打算的。她怕林豆豆自己找的人門不當戶不對，有辱林家門面；而且怕這個女婿不聽話，與林豆豆一塊反叛她，於是想由她來決定林豆豆的婚姻，通過控制女婿，來控制林豆豆。林豆豆對葉群的鬼心眼，一下子便看穿了。葉群找來的人，都是將相貌英俊放在首位，才學放在第二位，人品則放在最末。林豆豆心想：葉群雖然討人厭，但惹不起還可以躲得起，但如果身邊有一個葉群的「線人」存在，則只有死路一條了。於是，林豆豆抱定一個宗旨：凡是葉群熱衷的人，她就冷淡；凡是葉群相中的，她就拒絕。一時間，葉群煞費苦心找來的一批貌似潘安、才如宋玉的年青人，都過不了林豆豆這一關。

葉群的這些糾纏，已成了林豆豆精神上的一項重擔。不斷的「相親」，令林豆豆苦不堪言。在忍無可忍之下，林豆豆向林彪告狀。在妻子與女兒之間，林彪毫不猶豫地站在女兒一邊。林彪立即給葉群下了一道手令，命令秘書交給葉群。手令共四條：

第一，給豆豆找對象，要找拿槍桿子的，不要拿筆桿子的；

第二，找對象的條件，應當按照德、才、體、貌的順序，不要光強調相貌；

第三，究竟要誰不要誰，最後由豆豆自己作主；

第四，所有找對象的過程，必須與豆豆協商進行。

林彪恐怕秘書將手令壓下，便派內勤去查問。於是，秘書只好將林彪的手令交給葉群。

葉群看到林彪的手令，氣的跳了起來，當着衆位秘書的面大罵林豆豆，甚麼惡言毒語都罵到了。葉群說：這四條，條條都是沖着我來的，準是豆豆告了御狀。於是，葉群將滿腔的怒氣和怨恨，都發到林豆豆的身上。

葉群將林豆豆關在養蜂夾道的家裏，一連兩天將她關在房子裏毒打痛罵，拳打腳踢還不解恨，又扯頭髮，將林豆豆的頭髮連着一塊塊的頭皮都扯了下來，血淋淋地，連秘書看到都難過地流下眼淚。葉群打累了就罵，甚麼髒言垢語都罵出口。後來，林豆豆將門反鎖上，服下大量的安眠藥，第二度自殺。

葉群發現後，急忙將林豆豆送到醫院急救。葉群怕林彪知道，便下令嚴加封鎖消息。林豆豆養病期間，要求見林彪，葉群不容許。時間長了，林彪想念豆豆，便問葉群：「豆豆在那裏？怎麼不回來看我？」葉群便撒謊說豆豆「出差」，「下基層」，「不在北京」等等，一次又一次地搪塞。林彪見不到豆豆，思念之情更甚，禁不住將林豆豆的照片拿出來，一邊看，一邊流着眼淚，說道：「爲甚麼出去這麼久，也不回來看看我呢？」

這是埋藏在林彪心底裏的溫情的一次大表露。

林彪的心向着林豆豆，林豆豆的心也向着林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上，林豆豆從北戴河打電話給汪東興、周恩來，報告林彪和葉群要逃跑，要周恩來採取措施，將他們截留下來。後來，在全國傳達「林彪事件」，人們只知道林豆豆此舉是「大義滅親」。其實，林豆豆的原意是保護林彪，免得讓葉群和林立果將他劫持逃跑。在北戴河的那段最後的日子裏，當林豆豆從林立果那裏得知他們的政變陰謀後，她感到異常痛苦，將自己反鎖在房間裏，誰

也不見。九月十二日晚上，事態變得危急了，當她得知葉群他們要叛逃後，爲了阻攔葉群的陰謀，挽救林彪，她毅然地撥通了汪東興的電話。林豆豆當然知道這樣做的後果。但是，在林彪與葉群、林立果之間，她還是選擇了林彪。

爲了使葉群和林立果的陰謀不能得逞，林豆豆還向警衛部隊提出了四條措施：

一、調來一輛大卡車，將山路堵死；

二、砍倒一棵大樹，把路堵住。林彪住處雙峯山的公路，兩側都是參天大樹，砍倒一棵樹很方便；

三、調二十名警衛戰士攔截車輛通行；

四、封鎖機場道路。

據林豆豆講，她提出這一方案後，當時警衛部隊的負責人認爲切實可行，都同意了。但是，當葉群、林彪和林立果即將出來上車的緊要關頭，不知甚麼原因，這幾條措施都十分意外地沒有付諸實施。當林豆豆抓起電話，親自向北京報告情況緊迫時，卻從電話裏聽到一個完全出乎她意料的「指示」，她聽後氣的想把電話摔掉。這時，林彪的「紅旗」座駕已風馳電掣般向山海關機場駛去，而警衛部隊追擊的槍聲也響了起來。

如果說林彪對林豆豆的感情基調是「慈愛」，那麼他對林立果的感情基調就是「希望」。

林立果生於一九四五年，細高個身材，長得很像林彪，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

林立果的性格則像葉群，城府深，會來事，當着「林辦」的工作人員，客氣有禮，笑咪咪地一口一個「叔叔」。

林彪將這個唯一的兒子，昵稱「老虎」，與自己的「彪」，均屬一類，是取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意，也有「虎虎生威」，「將門虎子」之意。

林彪對林立果寄於希望，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而林立果又是林彪的接班人。因此，林彪希望他能繼承和光大自己的事業。林彪爲林家後代打算，這並不出奇。可是，林彪的安排，完全是「皇儲」的規格。

林彪寫給林立果的題詞是：

學習韋編三絕的治學精神　書贈老虎兒

爸爸六十三・十・二十四。

太史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道之所止也。強而弱，忍而剛……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錄武經太公兵語贈虎兒

爸爸一九六三，十一，十六

這是周文王臨死時對其子周武王傳授統治經驗的遺囑。林彪親筆抄錄，傳授給林立果，足見其寓意深遠。

這兩張條幅均挂在林立果的辦公室。「九・一三」後，被中共中央抄獲，「批林批孔」時又被當作林彪的「教子經」，妄圖建立「林家法西斯世襲王朝」的證據。

林彪對林豆豆呵獲備至，但對其事業、前途方面，林彪從未加以干預。對林立果則不然，林彪親自

過問和安排他的工作和事業。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全國大專院校停課鬧革命。林立果不便參加群衆組織，便賦閒在家。爲了讓林立果經風雨，見世面，林彪和葉群將林立果姐弟送到上海，委托江騰蛟代爲照顧。

江騰蛟是湖北黃安縣人。這個縣在革命戰爭年代出了二百多名將軍，江騰蛟便是其中的一個。六十年代初期，江騰蛟擔任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此人身材瘦削，但不失精悍，爲人精明幹煉，身邊總有一名女人服侍，連煙咀也是這名女人清理。

一九六四年，葉群和吳法憲在江蘇太倉搞「四清」蹲點。江騰蛟以看望吳法憲爲名，經常到太倉，巴結葉群。葉群看他是個人材，便將他收歸麾下。江騰蛟不愧是老江湖。林立果姐弟是帥府千金，在北京誰敢惹他們？而且北京是首都，那裏缺少人來「照顧」他們？林彪、葉群此舉，必有深意。

於是，江騰蛟將林豆豆送去杭州，托陳勵耘照顧，而把林立果留自己身邊。江騰蛟頗能體恤林彪的旨意。他經常帶着林立果參加各種會議，同各級軍政領導人見面，在各種場合出頭露面，江騰蛟向人們介紹：「這是林立果同志，是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之子，林副主席將立果同志派到我們這裏，這是對我們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關懷，最大的鼓舞……」接着，便是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林立果躊躇滿志地向歡迎他的人頻頻點頭、招手，儼然是「大人物」的派頭。

林立果嚐到了權力的甜頭，瞭解到擁有權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次上海之行，是林立果生活道路的一個轉折點。林立果本來選擇的專業是物理學，希望將來能當個科學家。可是，上海之行使林立果的人生觀發生了徹底的改變，林立果決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是在實驗室中探索種種自然規律，而是要在政壇上馳騁。憑自己的優越條件，完全可以像父親那樣，出將入相。

林立果在上海時，林彪還通過葉群，不斷向林立果提示：

「首長讓我告訴你，你要抽空看看書，不論將來做甚麼，少了文化是不行的。這是一件事。第二件，你要利用這段時間，多接觸些人，多交些朋友。尤其是要留意一些志同道合的，更要多接近他們。想幹大事業的人，沒有自己的左右手是不行的。一員猛打猛衝的大將，充其量只是匹夫之勇，而成不了帥才。眞正有作爲的人，是駕馭千軍萬馬。首長特別讓我囑咐你，要學組織才能，會指揮人，統率人，組織人，就是要善於籠絡人。這是首長說的。」

葉群又叮嚀道：「首長的苦心，有些話不便於在電話裏明說，你應該用心去體會，你也大了，應該懂得這些。首長讓你做的，對你未來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頭一步，你懂嗎？」

按照林彪的囑咐，林立果穿梭於寧、滬、杭之間，在軍隊，尤其是在空軍中進行廣泛的活動。後來，林立果策劃政變時，寧、滬、杭便成爲他的基地。

林立果和林豆豆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回到北京。林立果在這半年中收獲甚大，正是「在滬六個月，勝讀十年書」。

經過一番經風雨、見世面後，林彪覺得林立果可以登場了。

做甚麼事都要走「捷徑」的林彪，也爲林立果安排了一條「捷徑」。

一九六七年三月，在林彪的安排下，林立果加入了空軍。雖然他連黨員也不是，卻被安排在空軍黨委辦公室當秘書。四個月後，即當年的七月一日，吳法憲按照林彪和葉群的指示，親自作爲林立果的入黨介紹人，吸收林立果加入中國共產黨。吳法憲說：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養出來的，根紅苗正。

爲了使林立果盡快吸收政治經驗，盡快成長，林彪安排林立果參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例

如，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就讓林立果參加「拉條子」。

葉群也對「林辦」的工作人員說「有些文件可以讓立果看看。」

一九六七年七月，在空軍的周宇馳、劉沛豐的幫助下，林立果寫了一篇題爲《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的文章，葉群又請來陳伯達、關鋒幫助修改，於七月二十二日在《解解軍報》頭版頭條位置發表，署名爲「空軍司令部紅尖兵」。

經過兩年精心的培養和鍛煉，林彪認爲林立果已具備了一定的條件，於是着手爲兒子作進一步的安排。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給周宇馳、劉沛豐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 周宇馳、劉沛豐同志：
>
> 這兩年老虎在你們幇助下能力已有進步，今後你們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以便鍛煉他的獨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禮並感謝你們過去對他的幫助。
>
> 林彪　二月十六日

愚笨的吳法憲看到這封信，但沒有領會林彪的精神，將信壓了幾個月。林彪等了一陣，見空軍沒有動靜，便親自出面，將吳法憲召到毛家灣。

經過一番問候、寒暄後，林彪切入正題：

「我請你來，是問問老虎的事。他在空軍表現怎麼樣？群衆反映怎麼樣？」

吳法憲誠恐誠惶地回答：「很好，很好。他在空軍很受大家擁護。他經常傳達你的指示，把你的思想運用到空軍。他在空軍我們就可以經常聽到你的指示，對空軍建設有很大的意義。」

林彪說：「空軍是個新兵種，全世界都在發展空軍。所以，我腦子裏經常研究空軍的問題，特別是空軍的作戰問題。」林彪搬出了一個大帽子。

吳法憲趕忙說：「這是我們空軍的幸福，也是我們空軍的光榮！」

林彪又說：「因此，我依靠老虎給我瞭解情況，匯報問題，這也是幫助你們空軍搞好建設。」

到此地步，吳法憲再愚笨，也明白了林彪的心意。於是說道：

「是的，是的，有立果在空軍，就等於林副主席在空軍，我們就有了依靠。」

林彪說：「我的意見，想更好地瞭解空軍的作戰情況，這樣就可以向你及時轉達我的意圖。」

吳法憲說：「很好，很好，我們打算任命立果爲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並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

林彪這時才露出笑容，說道：「也可以嘛，我兒子、女兒都在空軍工作，你要放心，他們都是爲了你，扶持你這位司令！」

於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吳法憲用空軍司令部、黨委的名義，發佈了「任命林立果同志爲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的命令。

就這樣，林立果走過了「一年兵，半年黨，三年副部長」的「捷徑」。

一時間，吳法憲在空軍掀起一股大捧林立果的熱潮。稍後，吳法憲又提出：林立果同志「可以指揮空軍的一切，調動空軍的一切」。一九七〇年年七月六日，在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上，周宇馳向參加

會議的人傳達了吳法憲這個關於「兩個一切」的決定。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軍司令部幹部大會上作了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講用報告」。會後，林立果將錄音放給林彪聽。林彪說：

「思想像我的，語言像我的，連聲音也像我的！」

於是，林立果被捧為「天才」，「超天才，」「全才」，「帥才」，「超群之才」，是「群衆最好的領袖」，「傑出的政治家」，「優秀的軍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論家」、「第三代接班人」。

一個在延安時期連孩子吃的奶粉都不肯「走後門」的人，在二十年後卻為自己的兒子的前程、「接班」如此大費周章。是否林彪認為「接班人」寫在黨章上就牢靠了呢？他是否相信了毛澤東的承諾呢？他和葉群是否讓「九大」的勝利冲昏了頭腦呢？

如果「九大」的勝利並沒有改變他對毛澤東的一貫看法，頭腦沒有昏昏然，那麼，林彪為林立果所做的一切，就似乎是多餘的，起碼在時間上是太早了。

一個「勉從虎穴暫棲身」的人，卻去從事一些「長治久安」之類的盤算，這是犯大忌的。

不久，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一九七一年八月，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就有這麼一段：

「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不好的要給予適當的批評，好的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甚麼好處。」

林彪一家四口，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點到了三個。只有林豆豆榜上無名。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毛林再度結盟

第一章　毛林交易：打倒羅瑞卿

一、毛澤東的影子

羅瑞卿的外號叫「羅長子」，那是毛澤東給起的。

一九二九年六月羅瑞卿以閩西游擊隊領導人的身份參加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那是羅瑞卿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但是由於當時權勢動搖，心緒欠佳，毛澤東沒有注意這個「長子」。紅四軍三打龍岩之後，羅瑞卿正式加入紅四軍，任第四縱隊參謀主任。同年十一月毛澤東重返紅四軍。在一次幹部會議上，毛澤東注意到這位比自己還高長的人。毛澤東問：「你是北方人吧？」

羅瑞卿回答：「我是四川南充人」。

毛澤東略感驚訝，說：「哦，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卻都是長人，你看來比我還要更高一點，稱得上是個『長子』。」接着毛澤東又問了他的姓名、工作。這是他們兩人的第一次交談。從此以後，羅瑞卿便有了個「羅長子」的外號，這個外號伴隨了他的一生。

羅瑞卿於一九〇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生於四川南充縣舞鳳鄉清泉壩。一九二四年在張瀾創辦的南充中學讀書時參加愛國學生運動，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在武漢進入中央軍事政治

學校學習。一九二八年十月在上海轉爲中共黨員。一九二九年春赴閩西，組建訓練中共地方武裝，任閩西紅軍第五十九團參謀長，率部配合紅四軍開闢閩西蘇區。同年六月隨該部編入紅四軍。

長征路上，羅瑞卿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從于都出發時，毛澤東身體不好。據說，是羅瑞卿調來十名身強力壯、又忠誠可靠的戰士，抬着毛澤東，爬雪山，過草地，一路走過來的。

解放後，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部長。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警衛事務，是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毛澤東的警衛工作，羅瑞卿更是親自負責。每當毛澤東離京外出或在北京參加社會活動，羅瑞卿總是親自部署警衛工作，每每親自陪同。對毛澤東出入活動的場所，行走路線，毛澤東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他都一一過問，親臨現場檢查。毛澤東要走過的路他都要自己先走一走，毛澤東要坐的椅子他都要自己先坐一坐，極力做到縝密周詳，萬無一失。

最辛苦的，是經常陪同毛澤東到各地視察。毛澤東要去甚麼地方，羅瑞卿事先都要派人打前站。毛澤東汽車所經過的道路、橋樑、涵洞以及沿途的社會情況，他都要弄得清清楚楚。重要的場合，羅瑞卿甚至親自出馬打前站。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澤東準備回故鄉韶山。事先，毛澤東對羅瑞卿提出了三點要求：「一，不要派部隊去韶山，尤其不要派公安人員去；二，給我行動自由；三，我要廣泛接見群衆。」爲此羅瑞卿親自去了韶山，親自布置警衛工作，還到水庫化驗了水質，測量了水底情況和水深，要求將水庫中妨礙游泳的石塊、水草清除掉，使得毛澤東此次故鄉之行，愉快而又滿意。

五十年代，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凡是毛澤東出現的地方，必有羅瑞卿那高大的身影伴隨在身後。毛澤東常常說：「羅長子在我身邊，天塌下來，有他頂着。」「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人們戲稱：羅瑞卿是「毛澤東的大警衛員」、「毛澤東的影子」。

二、林、羅：由戰友變敵人

紅四軍中曾有過兩羅，一個是羅榮桓，一個是羅瑞卿，兩人同在第二縱隊，一個任政委，一個任政治部主任。爲了方便起見，人們將羅榮桓稱爲大羅，將羅瑞卿稱爲小羅。那是一九二九年古田會議之後，林彪任第一縱隊司令員，在開會時常常與羅瑞卿見面。那是林彪與羅瑞卿交往的開始。

後來，林彪任紅四軍軍長，羅瑞卿任紅四軍屬下的十一師政委；林彪任第一軍團軍團長後，羅瑞卿任紅四軍政委。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林彪與羅瑞卿一起跟隨毛澤東東征。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決定創辦紅軍大學（後改爲抗日軍政大學），毛澤東任命林彪爲校長，羅瑞卿爲教育長。林彪與羅瑞卿這種上、下級關係，維持到「七·七事變」後，林彪被任命爲一一五師師長，開赴抗日前線，而羅瑞卿則繼續擔任「抗大」教育長，才告一段落。

此後，兩人在不同的戰場、不同的崗位上轉戰。直到二十二年後的一九五九年，兩人才得以再度合作：林彪任國防部長、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羅瑞卿任總參謀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仍然是上、下級的關係。

羅瑞卿的任命，是林彪親自提名的。在這個問題上，富於心機的林彪可謂用心良苦。

那時候，擔任總參謀長的人選，至少必須是個大將級的人物。中國的大將，共有十名，他們是粟裕、蕭勁光、徐海東、陳賡、譚政、羅瑞卿、許光達、黃克誠、王樹聲、張雲逸。其中，張雲逸年紀太大，他於一八九二年出生，比毛澤東還大一歲，五九年時已是六十七；徐海東因戰傷長期休養；黃克誠剛剛下台；譚政是政治工作出身，是「政治大將」，剩下還有六位。林彪爲甚麼對羅瑞卿情有獨鍾？

原來，關鍵的因素還是在毛澤東身上。彭德懷的倒台，使林彪對毛澤東的了解又加深一層。廬山上的紛爭中，在關於「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些表面的因素的背後，林彪發現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因素，那就是毛澤東個人對彭德懷個人的矛盾。多年來，彭德懷對黨、對國家、對人民赤膽忠心，功勛卓著，任勞任怨，早已蜚聲於中外。將軍隊交由這樣的人來指揮、控制，自然是穩妥不過。

然而，對毛澤東個人來說，問題就不是這樣。彭德懷與毛澤東在歷史上存有積怨，解放後對毛澤東的路線、方針、政策乃至思想和生活作風看不慣。剛直不阿的彭德懷屢屢進諫，其言語之尖銳、舉動之直接，往往觸到毛澤東的痛處。在毛澤東的眼中，彭德懷是個反對自己的魏延式的人物，是根討厭的肉中之刺。由他來掌握軍隊，對革命事業有利，但對自己不利。彭德懷的存在，對毛澤東構成了威脅。這就是毛澤東必欲將彭德懷除之而後快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在廬山上，毛澤東說「對事，也要對人」，彭德懷必須倒台，軍隊必須掌握在忠於毛澤東個人的「親信」手中——「任人唯親」，這也是毛澤東選擇林彪的原因所在。

對毛澤的心思，林彪自然是心知肚明。見於彭德懷的覆車之鑒，林彪深知，要想坐穩國防部長這個寶座，最重要的就是要令毛澤東對自己信任和放心。因此，在考慮總參謀長的人選時，林彪打出了一張漂亮的王牌——選擇羅瑞卿。

在六位大將中，蕭勁光是「四野」系統的，按理說比較熟絡。然而，打仗打得漂亮，能令林彪佩服的，也比較談得來的，卻是粟裕、陳賡兩位。可是，林彪捨棄了粟、陳、蕭，而選擇了羅瑞卿，其中的奧妙之處，就在於「羅瑞卿是毛澤東的影子」——你的影子做了我的副手，你還不放心嗎！

林彪的選擇，果然甚爲毛澤東受落，羅瑞卿被委任了一大串的職銜：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十五人專門委員會成員兼辦公室主任，以及人大常委會委員。一九六四年，總政主任蕭華患肝病休養，便請他照顧一些總政的工作。蕭華因此稱他爲半個總政主任。一時間，羅瑞卿權傾京華。

羅瑞卿不但位高權重，而且作風強悍。羅瑞卿與林彪的分歧，最初發生在「高舉」和「緊跟」上。一九六一年年底，羅瑞卿奉命組織一個寫作班子，爲林彪在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準備發言稿。在討論修改發言稿的第四稿時，葉群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形成的」這句話不完備，應該加上「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天才」這幾個字。

羅瑞卿不同意葉群的提法，說：「現在已經不再提個人天才了呀！」

葉群理直氣壯地說：「個人天才，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才不提了，斯大林時代還是提的。現在對毛主席，在中國和在全世界，都可以這樣提。」

羅瑞卿又說：「『毛澤東思想是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形成的』這句話不是我寫的，這幾個字是從中南海出來的，是田家英提的」。

葉群並沒有爲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所嚇倒，反而針鋒相對地說：「田家英提的不等於毛主席提的，

即使退一步說，是毛主席叫田家英提的，那也是毛主席自謙的意思。我們現在用這個話在客觀上貶低了毛澤東思想。」

雙方爭持不下。到第五稿時，羅瑞卿仍然堅持不加「個人天才」的字樣。發言稿送到毛家灣，林彪十分不悅。他決定撇開這個稿子，另起爐灶。那便是七千人大會上那個備受毛澤東稱讚的講話。

一九六五年，《解放軍報》起草了一篇社論，有一個小標題是「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羅瑞卿在主持修改這篇社論時，指着那個小標題問起草者：「這個提法是不是林總的原話，還是你們的記錄？以前公開見報沒有？」

起草者回答：「這是林總在上海說的原話，報上也用過。」

羅瑞卿記不起林彪在甚麼時候講過這樣的話，感到這個問題涉及到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關係重大，提錯了或與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提法不一致都不妥。於是到另一個房間給當時分管理論工作的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打了個電話。

老奸巨猾的康生表示：這是新提法，如果要用，恐怕要問中央常委，甚至恐怕還要問主席本人。

由於不得要領，羅瑞卿爲穩妥起見，將「最高最活」四個字勾掉。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羅瑞卿家裏討論總政爲《毛主席語錄》起草的《前言》，當中也有「最高最活」。羅瑞卿沒有把握，便立即打電話給理論修養很好的田家英。之後，羅瑞卿說：「田家英的意思是，『最高最活』的提法不確切，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最高』，那麼今後再不能高了？是不是還有『次高』？『最活』，是不是還有『次活』？難道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都是死的？說『頂峰』，也不科學，到了頂峰，難道不能再發展了嗎？」

於是「最高最活」又被從《前言》中刪掉。

羅瑞卿對林彪的「得意之作」如此不敬，林彪自然懷恨在心。後來，這便成了羅瑞卿「反對毛澤思想」的證據。

使林彪更加不滿的，是羅瑞卿「緊跟」賀龍。

一九六二年秋天，葉群向中央報告，林彪因爲指揮部隊入閩，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澤東當即決定在林彪養病期間，由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並囑咐羅瑞卿要多向賀龍匯報工作。此後，羅瑞卿與賀龍的接觸頻密了。羅瑞卿陪同賀龍參加外事活動、接待來訪外賓的照片，經常出現在報刊上，給人予「親密」的感覺。相反地，羅瑞卿與毛家灣的聯繫減少了，稀疏了。林彪感到被冷落、被疏離、被輕視。對這顆高傲的心靈來說，那是難以忍受的。

最令林彪震驚的是：劉少奇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的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羅長子」極大地威脅着林彪的地位。

於是，林彪搬來毛澤東著作和黨章，對前來會見的羅瑞卿說：「今後要加強通氣，這樣我才好工作，這是組織原則。」說完後，林彪打開《毛澤東選集》，唸了有關加強請示報告的章節，接着又唸了黨章上有關組織原則的章節。最後給羅瑞卿規定了五條有關加強通氣的規定。

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說：「一九六〇年，羅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一九六一年起，便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一九六五年便正式反對我了。」又說：「他大捧別人，大跟別人，讓他做絕。」

其實，林彪早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便開始整羅瑞卿的黑材料。搞這些齷齪的勾當，葉群是位出色的能手，她不但動員林彪的秘書寫揭發材料，還鼓動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等人揭

發羅瑞卿。雷英夫的揭發信如下：

林副主席：

最近期間，我多次想向你報告一件事，但因事關重大，未找到適當的機會不便輕率。我覺得羅總長驕橫懶散，心懷不測，值得警惕。我這個感覺，是經過六年的觀察得出的。六年來可以分爲三個時期。

一九六二年五月去上海修改「關於戰略方針的建議」以前，我對羅總長極爲信任和尊敬，認爲他是堅決執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過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一九六二年五月到今年七月，從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對他產生了懷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對頭，甚至他對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悅誠服的，特別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贊成的，實際上是帶頭抵制的，只是採用了兩面手法，搞了一些僞裝。但這個時期，我對他的本質還看不透，雖有上述懷疑，總是從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參加寫《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和修改羅總長九月三日的講演稿時，我才大吃一驚，才發現他是心懷不測的人……。

此外，葉群還四處找人「談心」、「交底」，極力拉攏。於是在葉群的保險櫃裏，揭發羅瑞卿的材料越來越多。正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三、毛澤東：捨將取帥

要打倒羅瑞卿，必須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所欠的「東風」，就是毛澤東這一關。這是「倒羅」戰役中最困難的部分，也是整個戰役中最精采的部分。

羅瑞卿是毛澤東的影子。像羅瑞卿這樣與毛澤東的關係如此密切，能獲得毛澤東如此的信任，這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是絕無僅有的。在這方面，連林彪都略爲遜色。要打倒一個這樣的人，簡直是水中撈月，癡心妄想。搞不好來個反坐，落得個「誣告」的罪名，那就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這裏面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敢不敢爲，二是能不能爲。乍看起來，這兩方面都是不可爲的。可是，林彪敢爲人之不敢爲，能爲人之不能爲，充分表現了他的謀略和膽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在上海接見了柬埔寨副首相朗諾。這是羅瑞卿受難前的最後一次外事活動。接見完畢後，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澤東讓羅瑞卿也參加旁聽。周恩來匯報完後，羅瑞卿提出，準備第二天去蘇州看望林彪。毛澤東點點頭說：「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養，要保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鐘頭的報告。」

毛澤東對林彪期望之殷切，溢於言表。當時，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已經發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經拉開了。毛澤東的話自然是寓意深刻的。毛澤東將如此重要的訊息托羅瑞卿帶給林彪，足見此時此地，毛澤東對羅瑞卿的信任依然如故，對林彪策劃的陰謀，毛澤東還蒙在鼓中。

這時，距肅整羅瑞卿的上海會議的召開，僅僅十二天。

是甚麼因素令毛澤東在不到半個月的短短時間內，對羅瑞卿的態度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呢？而林彪又是用甚麼辦法，令到毛澤東一下子產生這個大轉變呢？

林彪能夠如願以償，一方面歸功於他對毛澤東透徹的了解；另一方面是他選擇了一個十分恰當的、絕妙的出擊時機。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林彪對毛澤東的思想、作風、性格瞭如指掌，對他欲打倒劉少奇，以及與江青策劃的種種陰謀，也一清二楚。林彪按兵不動，等待良機。

姚文元的文章是十一月十日發表的。出乎毛澤東的意料，北京方面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在彭眞等人的控制下，北京的大小報刊在十九天內，沒有一家轉載姚文。毛澤東下令出小册子，北京也拒絕發行，眞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毛澤東既焦急，又無奈。對方掌握着黨政組織機構，勢力雄厚，自己這邊勢單力弱，唯一可以借助的，只有軍隊的力量。如果沒有林彪這位政治盟友，劉少奇一伙可能一早就策劃政變，將自己趕下台，就象勃烈日涅夫對付赫魯曉夫一樣。在這場大戰中，毛澤東不可以沒有林彪。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發出六六年解放軍政治工作的指示，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必須大大地強調突出政治」。林彪將報告呈交毛澤東。

與此同時，林彪還給毛澤東送去一份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其內容也是突出政治，大抓階級鬥爭。並附上一封短信。

林彪的意圖既是對毛澤東進行試探，又是製造輿論準備，強調自己的「突出政治」與羅瑞卿的「不突出政治」之間的反差，爲向羅瑞卿告狀作好鋪墊。然而，毛澤東那邊久久沒有反應。

十一月二十七日，羅瑞卿到達蘇州，拜會林彪，轉達了毛澤東的囑咐。

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第二天北京各報刊都陸續轉載。按照彭眞的指示，各報轉載都加了編者按，將文章限於「學術討論」的範圍內。

林彪認爲時機到了。

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葉群攜帶給毛澤東的一封短信，以及整羅瑞卿的材料，乘坐由空軍司令吳法憲從上海派來的飛機，秘密地趕到杭州毛澤東的住處。林彪致毛澤東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爲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尙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爲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的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此致

敬禮！

林彪　十一月三十日

葉群向毛澤東作了六、七小時的匯報。

林彪有問題不向北京的中央常委、書記處、政治局報告，而是秘密地向毛澤東報告。葉群此行的

「私相授受」的性質太明顯了。葉群匯報完後，老謀深算的毛澤東收下她送來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蘇州。並派汪東興乘專車送她回去，以防不測。

林彪的這一舉動，對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次「突然襲擊」。毛澤東陷入沉思。

毛澤東是個政治經驗十分豐富的領袖，而且目光銳利、老練。而羅瑞卿又是毛澤東非常熟悉、了解又非常信任的人，否則毛澤東也不會委任他擔當那麼多的黨、政、軍要職。憑葉群的一番話，加上十幾份材料，就能改變毛澤東對羅瑞卿幾十年來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根本不相信羅瑞卿會反對自己，反對毛澤東思想。在後來的上海會議上，林彪、葉群要將羅瑞卿一棍子打死，毛澤東不同意，說：「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嘛，他反對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如果沒有這三條（指羅反對林彪、伸手要權、反對突出政治），可以把問題掛起來。中國有那麼多的問題都是掛起來的，掛幾百年不行，還可以掛一萬年，有甚麼就檢討甚麼！」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毛澤東不但根本不相信羅瑞卿反對自己，甚至連林彪控告的「三條」罪狀也表示很大的懷疑。毛澤東堅信自己的眼光，而不相信林彪的告狀。

可是，毛澤東對林彪那倔強、自尊心很強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如果不答應林彪的要求，那就會得罪林彪。這樣一來，毛澤東將失去林彪的支持；更壞一層，是林彪甚至會倒戈相向，去投靠劉少奇。那樣一來，毛澤東的麻煩可就大了。而且，現在姚文元的文章這第一槍已打了出去，對方已開始應戰。毛澤東已經沒有後退之路。

林彪選擇了一個不容許毛澤東有其他選擇餘地的絕妙時機。為了達到打倒劉少奇這個最大的目標，毛澤東不可以沒有林彪。在林彪與羅瑞卿之間，毛澤東只好選擇前者，而犧牲後者。放棄羅瑞卿，對毛

澤東來說是迫不得已的，勉強的。這一點從他在上海會議上所說的「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嘛」表現了出來。這是大形勢的逼迫下，不得不作出的抉擇，因爲林彪畢竟是黨中央常委、副主席，而羅瑞卿不是。林彪的份量更重些，對毛澤東更有利些。

經過權衡利弊，毛澤東作出了決定：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對林彪十一月十八日的來信及報來的蘭州軍區的材料作了批示：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師的情況，可能和各師、各軍種、各兵種大同小異。可否將此件轉發到各軍區，各軍種各兵種，各軍，到師黨委爲止，供他們參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批示中的「人們」指的就是羅瑞卿。

林彪的「御狀」告贏了。

十二月八日，肅整羅瑞卿的上海會議，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召開。這是一次十分特別的會議。會議的名稱是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可是，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一班常委，在開會之前，對會議的內容完全不知道。當羅瑞卿在昆明被通知到上海開會時，羅瑞卿立即給北京的彭眞去電話，詢問開甚麼會。彭眞這位「副總書記」回答：「不知道」。毛澤東完全沒有向其他常委打招呼，更不用說討論研究了。

參加會議的除常委及彭眞、賀龍外，還有吳法憲、李作鵬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安排在會議上作主要發言的也是葉群，共三次，達十個小時之長。由一個甚麼也不是的人來控告一名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這種安排也是其他中央常委事先不知道，沒有同意之下進行的。

葉群在會議上說道：

過去（我）對羅是畢恭畢敬，沒有想到羅和林的關係搞得這樣緊張。以後發現一些問題，不敢輕易上報，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不過硬，三怕給中央、軍委常委出難題，四怕轉移工作重點。

羅掌握了軍隊大權，又掌握了公安大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

羅的個人主義已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國防部長的位置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又會要求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

一九六四年羅即逼林退位。林從包頭回來時，劉亞樓來說：羅曾聽主席說，希望林多活二十年，因爲林有馬列主義。林約羅來，羅只待了十幾分鐘又走了，並說明天即出發去看地形，在林問到主席有何指示時羅才說，主席是說了希望多活二十年，因有點馬列主義。

國慶節後羅見林，大聲說：「病號，不能干擾，應讓賢。」出門後又大聲喊：「不要擋路」，林氣的昏迷過去。我家裏的人從走廊上路過，聽到了羅講的這些話。林對我說：「我是讓賢的，但國防部長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讓賢也得讓給真正的賢者。羅憑此就不能讓給他」。

葉群這一講話中最聳人聽聞的是下一段：

劉亞樓對我說：「六三年以來，我幾次想和你談幾點意見，是羅交代的。

四點意見是：

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務很重，應保護林的身體。

三、再不要干涉軍隊工作了。

四、放手要羅總長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給羅負責。」

我對劉說：「每個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榮譽很高了，無意再進。這是中央決定的問題，不是我們應談的問題。」劉說：「你怎麼這麼遲鈍。你如果辦到了，林進入政治舞台，不管軍隊，讓羅幹，總長不會虧待你的。」我說：「這是對我最大的污辱。」回來路上小孩都說：「劉講的不對，你答的對。爸爸又沒有野心。」回家後林說：「你答的對，今後不準講這個事，這是違背原則的事。」

葉群接着說：

二月十九日，劉要見林，劉又談四條。說要團結羅、尊重羅。林說：够放手了。羅沒人緣，政治不掛帥，封鎖我，對羅要一分爲二。林無意中說羅看人不准，六二年羅要××

當總長。劉聽後大驚說：「唉呀，原來總長不是我！我上當了，被玩弄了。我是貧農的兒子！……」

這時劉亞樓又對我說：「……我一夜未睡，羅不好，請林警惕，還要多通知幾個人：楊成武、黃永勝、吳法憲注意，不要上當。我收回四條。我坦白，四條中後兩條是重點，是要林退出軍隊。」劉哭了，說對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說不要告訴羅瑞卿同志，他有勢力，軍隊、公安系統都在他手裏。

葉群的發言疑點多多。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葉群的指控進行反駁，劉少奇說：「不可想象，難以置信」。

鄧小平說：「死無對證」。

劉少奇還提出兩點意見：參加擴大會議的人員，常委之間要先通一通；羅瑞卿「反黨篡權」材料不夠實，不少是空談的。

鄧小平也說：「同意少奇的兩點意見。讓羅瑞卿到會上發表看法。」

可是，林彪說：「要相信黨，相信主席嘛！這是碰到實際問題了。羅瑞卿不是個人問題。」

毛澤東也說：「哲學上的折衷主義，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羅把林彪同志實際上當做敵人看待」，「羅是野心家」。

會議也拒絕鄧小平的意見，不讓羅瑞卿出席會議辯白。會議採取了「背靠背」的方式。羅瑞卿一到上海，就被軟禁在上海建國西路六一八號一幢花園洋房裏，既不讓他參加會議，也不讓他見毛澤東或林

彪。完全是「片面之詞」和「一面倒」的非正常狀態。

後來，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對羅瑞卿問題進行批判、撤銷總參謀長、書記處書記等職務進行表決。結果二十九票贊成，二票反對，七票棄權獲得通過。反對的兩票是：劉伯承、彭眞。棄權的七票是：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賀龍、陸定一、李富春、譚震林。

最後，會議強行通過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報告爲羅瑞卿橫加上「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澤東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等罪名。

就這樣，羅瑞卿被打倒了。

羅瑞卿成了毛澤東與林彪政治交易的犧牲品。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他下榻的上海丁香花園宴請林彪，慶祝他們除掉羅瑞卿這一戰役的勝利。出席的還有葉群、吳法憲、李作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毛澤東在宴會上說：

「這一仗是剛交鋒，鬥爭還會更激烈。林帥戰場上打仗是位傑出的軍事家，在黨內反修正主義也是有膽略、有遠見的。黨內這樣的同志不多，要宣傳」。

毛澤東還對康生、陳伯達說：「你們還只夠一半。文，你們是人材」。毛澤東指示康生、陳伯達要多宣傳林彪。

「倒羅」戰役，是林彪一生中最困難，也是最驚險的一仗。林彪運用的，是兵法上的「兵行險着」、「置諸死地而後生」之計，來逼迫毛澤東屈服。由於林彪看透了毛澤東，其時機又拿捏得恰到好

處，林彪的謀略大獲成功。

對毛澤東來說，在這次交易中，自己這方面完全是付出。但毛澤東相信，他一定可以令到林彪有所回報，而且這份回報一定比今天的付出要大得多。另一項交易正在醞釀之中。

第二章 投桃報李《文藝紀要》出籠

一、「文化大革命」的來歷

在中國，提起「文化大革命」，男女老幼，無人不知。但是，知道它的這個命名來歷的人卻並不多。

「文化大革命」的全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初叫做「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它來源於江青得意之作《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的一句話：「堅決進行一場文化陣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雖然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遠遠超出了文化的範疇，變得連發動者本身的毛澤東都感到面目全非，但是它確實是出於江青的《文藝座談會紀要》。因此，《紀要》素有「文化大革命之源」的「美譽」。

《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江青「四人幫」倒台後，早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請示，正式決定撤銷這個《紀要》，比審判江青「四人幫」還早了一年，比中共中央發表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早了兩年。《紀要》當年的「風光」程度，可想而知。

近年來，在批判林彪、江青，或者在談論「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人們往往將《紀要》視爲林彪與江青勾結的最主要的罪證；同時，人們也往往漏掉了一個人，那就是毛澤東。其實，文藝與軍隊，江青與林彪，一文一武，本是風馬牛不相及。能夠把根本不搭邊的兩者拉到一起，能夠指揮部隊，調得動林彪的，不要說江青，就是劉少奇、周恩來也不夠份量。具有這份能量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毛澤東。

事實上，《紀要》的始作俑者和總導演是毛澤東，幕後的策劃、主持者，也是毛澤東。《紀要》是毛澤東與林彪勾結的「傑作」，這樣說才更符合歷史事實。

二、總導演——毛澤東

話說毛澤東與江青策劃的「重磅炮彈」——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沒有炸毀彭眞在北京構築的堡壘。在彭眞等人的控制下，北京各大小報刊遲遲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北京市市長彭眞直言不諱地說：「《海瑞罷官》這齣戲我早看過了，毒害不是那麼大」。同時，彭眞還以攻爲守，針對張春橋、姚文元說：「對姚文元文章的錯誤的地方也要批判」，「上海周信芳也演過《海瑞上疏》，難道張春橋沒有責任？」

除了北京外，陶鑄主管的中南地區（包括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也拒絕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江青後來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給登。後來主席生了氣，

說出小册子。小册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甚麼關係！噢，後來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

張春橋在後來（一九六六年五月）也說：「我們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不知道會觸動這麼深」，「更不知道彭眞會這樣堅決反對」，「令我們感到震驚」。

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也說：「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

毛澤東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指示上海立即將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發表。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徵訂。北京新華書店請示市委，彭眞指示：一本也不訂。

南北對峙了二十天後，毛澤東下令周恩來干預此事，北京報刊才不得不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是，在彭眞等人的策劃下，通過加《編者按》、版面安排等種種方法，將其殺傷力大大地削弱了。北京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依然如故。毛澤東不得不另謀對策。

看來，單靠份量不足，力量單薄的文人秀才是不行的。毛澤東需要殺傷力更威猛的，「原子彈」式的超級武器。

毛澤東與江青商量，決定請出解放軍這座「尊神」。這是毛澤東可以動用的最具威懾性，也是最後的力量。此時此地，毛澤東十分需要林彪的支持。毛澤東＋林彪（解放軍），只有這樣的陣勢，才能與北京抗衡。因此不能再讓林彪置身事外，站在一旁看熱鬧，必須盡快將他拉過來。毛澤東深感自己勢孤力單，林彪必須盡快參戰。況且，毛澤東已幫助林彪剷除了羅瑞卿，投桃報李，林彪也該出把力了。

正如江青後來（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爲人民立新功》中所說：「我們攻也攻不動啊！」

「我的話更沒有人聽。於是想到解放軍中請『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

由於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進行的非組織活動，見不得光，因此毛澤東決定仍然讓江青出面。而江青擅長的是文藝，姚文元是在學術上做文章，今次不妨在文藝上作文章。一九四二年有個《延安文藝座談會》，現在也可以搞一個這樣的文藝座談會。

題目有了，主、配角也有了，戲可以開鑼了。為了避嫌，毛澤東這位「導演」照例要躲開，以造成「不在場」的事實。於是，毛澤東安排妥當後，便由杭州移駕到武漢。在風景秀麗的東湖賓館，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等人準備了專場宴會和晚會，與毛澤東一起，在燈紅酒綠中過春節。

三、江青駕臨蘇州請「尊神」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農曆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乘專車由上海來到蘇州，專程向林彪拜年，並轉達了毛澤東的口諭：由江青出面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林彪務必給予配合和支持。

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幾位名女人，一位是武則天，一位是慈禧，一位是江青。她們具有共同的特點：飛揚跋扈，頤指氣使，手段特別陰險狠毒，正是「蛇蝎婦人心」。她們曾經將神州大地攪得天翻地覆，似乎是對中國男尊女卑的封建制度的一種大報復，對長期被壓抑的一種瘋狂的發泄。不知道是「第

一夫人」的頭銜比「皇帝」、「太后」來得更尊貴、榮耀還是所受的壓抑更多更重，江青比起那兩位古人顯得更加驕橫。她這趟蘇州之行就頗具「本色」，似乎不是來「請尊神」，而是來「提小鬼」。

在拜年、寒暄、交待「聖旨」之後，江青本應切入正題，與林彪開始文藝漫談。可是江青竟氣冲冲地問林彪：「你爲甚麼不看戲？」江青指的是她搞的那幾個「樣板戲」。

林彪回答：「我身體不好，正在休養。」

江青：「你該多關心一些文藝工作。」

林彪：「我不懂。」

江青：「主席最近關於文藝工作有兩個指示，你看過沒有？」

林彪：「看過」。

江青：「你對建國後十七年的文藝工作怎麼看？」

林彪：「方向問題已經解決了，主要是藝術水平問題。」

江青說的「主席最近關於文藝工作有兩個指示」，是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在柯慶施上呈的一個報告上作的批示，批評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社會主義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作批示，批評這些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就是毛澤東關於文藝界的著名的「兩個指示」。

江青搬出毛澤東的兩個指示，其意思是：主席講的意思與你說的不一樣。

林彪沒有吭聲。

江青又說：「這次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不是我要搞的，是主席讓我請『尊神』。」

江青的意思是要林彪親自出面陪她搞這個座談會，那可就勢壯得多了。

可是，林彪說：「我身體不好。」

林彪明顯地是在敷衍，爲自己不能親自陪伴這位第一夫人開甚麼文藝座談會找尋藉口。

江青滿腔不悅，兩人之間的氣氛呈現緊張。

據林豆豆回憶，當時葉群在江蘇太倉搞「四清」蹲點，不在家裏。林彪不擅長應酬交際，拙於言辭，又沒有第三者在當中調停，因此會客室內一時冷場。

江青看到林彪身邊放着幾張唱片，隨手拿起來一看，發現是一些京劇和電影插曲，於是又說道：「到了這時候，你還聽這種東西？這都是些壞戲，壞電影！」

林彪：「我只是用它調劑一下精神。聽上一段，身體就好了些。」

林彪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熱情和奉承。江青感到受冷落，不禁怒火中燒，咄咄逼人，找刺挑毛病，竟訓起林彪來了。以林彪那孤傲清高的性格，他打心底裏看不起這個戲子。但看在毛澤東的面上，不得不忍住火氣，耐心奉陪。一個步步進逼，一個極力迴護，用林豆豆的話來說：「兩人差一點打了起來。」

江青與林彪的談話不歡而散。連上海的文藝座談會怎麼開、談些甚麼都沒有講清楚，江青便提前於當天返回上海了。

林彪儘管冷落了江青，但對毛澤東的意旨卻是不敢怠慢。

一月二十二日，就在江青走後的第二天，「林辦」由蘇州打電話給北京的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傳達了林彪的命令：

「江青同志要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管文藝工作的同志談談部隊文藝工作問題。參加的人不要太多，要四、五個人。去幾個甚麼人，你同蕭華商量，把名單報『林辦』，最好蕭華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戰役的創作，你們準備一下。」

對於毛澤東和江青究竟想幹甚麼，林彪當時還是一頭霧水，以致下給劉志堅的命令含糊不清，竟然說「可能要研究三大戰役的創作」，那可是與毛澤東的心思相差十萬八千里了。

四、劉志堅的上海之行

蕭華是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這位十二歲加入共青團，十四歲加入共產黨，十八歲任「少共國際師政委」的解放軍上將，是林彪的老部下，早在一九三〇年，年方十五歲的蕭華被派往紅四軍任軍委青年委員，而當時的紅四軍軍長便是林彪。解放戰爭時期，蕭華任遼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政委，與林彪在黑土地上並肩戰鬥。「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開時，蕭華因肝病正在休養，由副主任劉志堅主持總政的工作。

接到林彪的指示，劉志堅不敢怠慢，當即向蕭華匯報。蕭華對江青的爲人十分清楚，今次林彪要他親自陪江青召開座談會，深知這是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搞不好得罪了那個女人，便會週身是蟻。於是向劉志堅說道：

「我事情多，身體又不好，文藝方面的情況又瞭解不多，你是主管宣傳文化的，了解情況，還是你去吧！」

儘管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但林彪和蕭華都不想去陪伴江青，最後決定讓劉志堅出馬。毛澤東和江青能請到的「尊神」，只是第三流的角色。

蕭華和劉志堅初步商定的名單有：總政文化部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亞丁，總政宣傳部部長李曼村，另加兩名工作人員，即秘書劉景濤，以及熟悉三大戰役的《星火燎原》編輯部編輯黎明。

由於不知道江青的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於是在臨走之前，蕭華又特意為劉志堅一行六人定下了「約法三章」：

第一：部隊文藝工作的方向是對頭的；

第二：只帶耳朵──聽，少發表意見；

第三：對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爭，有甚麼意見帶回來匯報、討論。

蕭華還說：「江青同志是個病人，她對部隊文藝工作有甚麼批評，你們不要當面辯解」，「江青這個人疑心大、脾氣也大，對她的話，要多聽少說，不要和她爭，要尊重她，有甚麼意見帶回來匯報。對地方文藝工作情況，不要隨便表態。」

蕭華的主旨是：避之趨吉。

二月二日，劉志堅一行六人，乘坐一架「伊爾──十四」飛機，直飛上海。

劉志堅，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八年參加平江起義，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曾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是徐向前元帥的老部下。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時，徐向前怒斥「中央文革」，劉志堅被打倒便是其中一項內容。解放後，劉志堅歷任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總政宣傳部部長，總政副主任，授中將軍銜。他寫過詩，發表過文章，也算是半個文人。

雖然座談會在錦江飯店舉行，但劉志堅等人還不夠資格入住這家專門接待中共高幹的飯店，只好落腳在延安中路的延安飯店。那是一座部隊開設的，專門接待軍中往來人員的賓館。出入那裏的都是穿軍裝的人員，劉志堅一行六人卻換上便裝，因爲穿軍裝出入錦江飯店，未免太顯眼了。

劉志堅一行入住不久，江青便派張春橋來接他們到江青的住處。

江青當時住在華山路上幽靜的丁香花園。這裏有寬闊的綠草地，成片的葱郁的樹林。在人烟稠密和樓房林立的上海，它像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可貴和可愛，是毛澤東經常入住的地方。張春橋不惜用最高的規格來款待這位第一夫人。

劉志堅剛進屋，江青便說道：「哦，終於把解放軍這座『尊神』請來了！我的處境很困難，所以我去蘇州求助於林總。現在，林總終於給了我支持！」

江青喜出望外之情溢於言表。

劉志堅儘管是半個文人，但畢竟是軍人，對蕭華下達的三條指示，劉志堅不敢違背。於是，閒話少說，打開公文包，將文件拿出來，逐字逐句地向江青傳達林彪的一份電話記錄：

「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

也很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甚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瞭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方面都不能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很顯然，林彪是向江青示好。可是他卻採取了一個曲折的形式：蘇州—北京—上海。林彪如果與江青十分熟絡，大可在蘇州—上海之間架起熱線，就像後來的毛家灣與釣魚台一樣。退一步來說，林彪還可以寫一封親筆信，由劉志堅帶去轉交給江青，也顯得鄭重其事。現在，劉志堅傳達的只是一份電話記錄，這可是「最低規格」的了。林彪採用這種方式，表現出他對這位第一夫人，既不滿又不敢得罪的矛盾心理，從整篇電話記錄來看，林彪的態度彬彬有禮，客氣而尊重，但完全是公事公辦的口氣。那兩句有名的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很內行」，並未出格，與幾個月後的對江青的狂熱吹棒相比，顯得相當克制。

儘管如此，林彪這一番話，仍使困境中的江青感到十分高興。林彪不僅對她給予很好的評價，而且要她「指導」部隊文藝工作，這就使得她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變得「名正言順」。《紀要》的題目後來被毛澤東改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這「委託」兩字便是根源於此——這兩個字對江青來說，可是一字千金啊！

江青除了請劉志堅轉達她對「林總」的謝意之外，還對劉志堅恭維了一番。江青說：

「志堅同志，聽主席說，你是劫法場出來的，我要很好地向你們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學習。聽說

你過去寫過詩，寫過不少文章，在文藝方面也很內行。」

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在長沙曾對來訪的王海容、唐聞生說：「她（指江青）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

王海容問：「你呢？」毛澤東答：「不在她眼裏。」

連毛澤東都不放在眼裏的江青，這時卻對一名小小的總政副主任大送高帽，可謂「咄咄怪事」。江青見面時說的一句話泄了底：「我的處境很困難。」有求於人的江青是在演戲。果然，一年之後，「文化大革命」進入了高潮，毛、江取得初步勝利時，這位值得江青學習的老同志，就被江青打倒了。在被毛澤東稱爲「閻王殿」的總政，劉志堅是最早倒下的一個。

如此客套一番後，江青說明開會的辦法：

「請你來，不是開甚麼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

接着又宣布會議的紀律：「不准記錄，不准外傳」，「特別是不准讓北京知道」，「嚴格保密」。江青還查問劉志堅一行六人有沒有帶竊聽器。眞可謂「做賊心虛」。

江青還說起會議印發的材料，其中有毛澤東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關於評劇《逼上梁山》的信：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小姐們統治着舞台，這種歷史的顚倒，現在由你們再顚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

江青說：「儘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確地指示，可是解放後，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仍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着，有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現在，該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

此時，劉志堅他們才明白，江青的座談會並不是「研究三大戰役的創作」。林彪擺了個大烏龍。

當晚，出席了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盡地主之誼」而設的宴會後，於錦江飯店小禮堂放了第一部影片《逆風千里》。這是珠江製片廠一九六二年的出品。編劇周萬誠、方徨，導演方徨。不知江青是有意還是無意，這部影片的背景，竟然是林彪在東北戰場上指揮的「新開嶺戰役」。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國民黨「千里駒師」在新開嶺被殲滅後，解放軍指導員宋志剛和一支小分隊奉命押送被俘的國民黨校級以上軍官前往遼東軍區（蕭華曾任該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駐地。一路上，腹背受敵，「逆風千里」，終於完成任務。江青一邊看，一邊評述：「美化敵人，把敵人當作主人公來描寫，讓敵人佔領了我們的銀幕」。完全是江青一個人在那裏大發議論，劉志堅等人不敢插嘴，又不准記錄，只好「洗耳恭聽」，回去後趕緊追記下來。

在以後的日子裏，一共看了三十多部電影和三場戲。看甚麼片子，演甚麼戲，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場看了十三次電影，張春橋有時也來看。「大理論家」陳伯達來到上海，也陪着看了幾部電影。江青一邊看，一邊發表即興式的評論，依然是她「獨唱」，衆人恭聽。江青還時常在午睡起牀後，叫秘書打電話把劉志堅找來談話，江講，劉聽。據劉志堅回憶，這種「個別談話」共有八次，每次短則半小時，長則兩小時。而正經八百的全體座談會，只有四次，劉志堅六人全部出席。

會議期間，二月九日，江青說有事，座談會暫停數日。

江青所謂「有事」，是從上海去杭州會見毛澤東。原來戰況有了新的變化。

北京的彭眞，爲了反擊姚文元等人的文章，於二月三日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名義，起草

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彭眞提出：要實事求是，在眞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眞理，修正錯誤，還指出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

二月五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

二月八日，彭眞、陸定一、許立群、康生等人專程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問了一些問題後，沒有表示不同意見。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將《二月提綱》批發全黨。

聽取彭眞的匯報後，二月九日，毛澤東立即從武漢趕到杭州，並將江青緊急召來會見，商討對策。如此急急忙忙地趕來會見江青，足見毛澤東對上海座談會的重視。毛澤東將全部的希望都放在這上面了。

二月十六日，江青返回上海，座談會繼續進行。

二月十九日，江青說：「沒有甚麼可說的了，我有事，暫告一段落，你們可以回去了。」

這個「一人談」的座談會，於是結束了。

劉志堅等人將追記的筆記整理成一份三千多字的《匯報提綱》，於二月二十一日送了一份給江青。

二月二十二日，劉志堅等人離滬飛往濟南，向正在濟南的林彪匯報——林彪爲了避開江青的進一步糾纏，已從蘇州移步到濟南。林彪聽了匯報，表示滿意，說：

「這個材料搞得不錯，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會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對頭，路線正確，回去後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眞貫徹。」

林彪如此表態，劉志堅以爲這下子可以交差了。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劉志堅懷着輕鬆的心情，跟其餘同行一道乘飛機返回北京。

豈知，劉志堅的飛機剛到北京機場，上海來的長途電話已經在等着他了！

電話是江青秘書打來的：「江青同志看了你們整理的材料，認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沒有能夠反映她的意思，給她闖了大禍！現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

江青秘書還說：「江青已把此事報告了主席，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修改。另外，請劉志堅主任立即派人來上海，一起參加修改。」

上海的電話如同一盆冷水澆到劉志堅的頭上。劉志堅馬上向蕭華報告。蕭華決定讓陳亞丁去上海參加修改。蕭華關照道：「江青要怎麼改，你就怎麼改。有甚麼問題，回來再說。」

陳亞丁在北京僅逗留了一夜，第二天便又趕回上海。

原來，江青認爲那份《匯報提綱》太簡單，太粗糙，份量也太輕了。江青和毛澤東想要的是「原子彈」，而不是「迫擊炮」。所以要重新修改，寫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劉志堅等人搞的《匯報提綱》，是根據江青那些斷斷續續、瑣瑣碎碎的原話整理成的。劉志堅等人並沒有、也不敢做任何的加工、拔高，他們旨在交差、應付。這種做法與毛澤東、江青那種「給北京施以沉重打擊」的意圖，相去十萬八千里。心高氣傲的江青不滿意，毛澤東也不滿意。而林彪的心思與劉志堅是相同的，對毛澤東和江青的要求，也是抱着敷衍應付的態度，所以對《匯報提綱》稱讚了幾句——那明顯是在打官腔，唱雙簧。因此才出現江青認爲「太簡單，太粗糙」，而林彪則認爲「不錯」，江青認爲「根本不行」，而林彪則認爲「是個重要成果」這種巨大的反差。

五、毛澤東親自掛帥

毛澤東欽點的陳伯達、張春橋果然不同凡響，兩人親自捉刀，將江青那些東拉西扯、零零碎碎的講話，進行深加工、大改造，並賦予它理論的深度和時代的生命力，由三千多字增加到五千五百多字，題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最後通過江青送到毛澤東的案頭。

毛澤東詳細看了修改稿，親自在上面作了十五處重要的修改，並將題目由《江青同志召集……》改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毛澤東不愧是個經驗老到的政治家，將標題改成《林彪同志委託》，這六個至關重要的文字，頓時使《紀要》的份量增加了許多，其意義也就大不一樣。而且這一改，將毛澤東和江青由主動變為被動，將林彪由被動改為主動（是林彪委託，而不是江青要求的）不但使江青師出有名，掩人耳目，抬高了江青的身價，又可逼得林彪走上前台。眞可謂是「一箭三雕」。

這時，在北京發生了「電話事件」，促使毛澤東決心加重《紀要》的政治份量，加快修改的步伐。

原來《二月提綱》下達後，張春橋等人感到壓力很大。三月上旬，張春橋派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去北京「摸底」。楊永直找到五人小組的許立群（中宣部副部長），提出了有關《二月提綱》的一系列問題，尤其是「學閥」指誰，要求回答。許立群將楊永直的問題向彭眞匯報。

彭眞回答如下：

楊永直：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

彭真：學閥沒有具體指甚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

楊永直：上海要批判一批壞電影，包括《女跳水員》，行不行？因爲有大腿。

彭真：你去問張春橋，他們游過泳沒有？

楊永直：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

彭真：過去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裏去了？

彭眞的答覆迅速傳回上海。張春橋說：「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將上述情況馬上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震怒了。毛澤東在杭州與康生等人談話，嚴厲地批評了彭眞和中宣部，毛澤東說：

「《提綱》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眞、北京市委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又說彭眞是「包庇右派的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中央出修正主義，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必須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

《紀要》顯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了：毛澤東需要一件武器來與《二月提綱》抗衡，這件武器便是《紀要》。

三月中旬，江青將毛澤東修改過的草稿拿回上海，再次組織修改。陳伯達、張春橋兩人又先後改了

八稿，將字數增加到一萬多字，增加了吹捧江青和「樣板戲」的內容。

三月十四、十七日，江青將《紀要》兩次送毛澤東修改。毛澤東先後改了三次。三月十七日毛澤東批示：

「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

六、林彪默認「委託」

有了毛澤東的「欽定」，《紀要》總算是大功告成。剩下來便是通過組織手續，使《紀要》合法化，並將它發往全國。這部份的工作，主要是靠林彪。

這部份的工作主要有三項：

第一，林彪首肯；

第二，中央軍委通過；

第三，中共中央發往全國。

第一項，毛澤東和江青想請出解放軍這座尊神，而代表「尊神」的，就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林彪。因此毛澤東才將《紀要》的標題改爲《林彪同志委託……》。由於這個「委託」是毛澤東弄虛做假、生按硬造的，事先並未通過林彪，所以《紀要》必須補上這一點：林彪首肯。於是江青要陳亞丁爲她起草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據你的委託，我於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請劉志堅等四位同志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了座談。座談後，他們整理了個座談紀要送給你和軍委其他領導同志，也送給我一份。我看了，覺得座談會紀要整理得不夠完整，不夠確切。因此，請春橋、亞丁兩位同志座談修改，然後，送主席審閱。主席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並指示請伯達同志參加，再作充實和修改。我於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請伯達、志堅、春橋、亞丁四位同志一起討論修改後，以送主席審閱，主席再次作了修改，並於十七日指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十九日，我又請志堅、春橋、鐘忠、曼村、亞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談，大家一致同意這一紀要。現將座談紀要送上，請審批。

此致

敬禮！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這時正在上海。收到江青派人送來的信及附來的《紀要》大字排印本，知道是經過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便毫不猶豫，立即「首肯」，看也不看，一字不改，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將《紀要》批轉給軍委常委們。林彪找來劉志堅和陳亞丁，要他倆起草了一封致賀龍等中央軍委常委們的信。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覆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極爲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

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

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對紀要有何意見望告，以便報中央審批。

此致

敬禮！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的這封信，對《紀要》作出了高度評價。信中默認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一提法。信末說「以便報中央審批」，意味着《紀要》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由於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和林彪的次高指示，中央軍委於三月三十日通過了《紀要》。根據林彪的指示，劉志堅、陳亞丁為軍委起草了致黨中央、毛澤東的請示報告：

中央、主席：

軍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認為這是一個在文藝工作方面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很系統很完善的文件，部隊必須堅決貫徹執行。現送上這一《紀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兩封信（引者注：指江青三月十九日致林彪信及林彪三月二十二日致賀龍等軍委常委信），請審批。

軍委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毛澤東選擇了一個有利的時機，那就是劉少奇攜夫人王光美由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九日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對方的主腦人物不在，事情當然就容易辦一些。

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鄧小平也不在北京，中央軍委的報告送到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眞的手中。彭眞閱後，感到異常的愕然和震驚，被這突而其來的沉重打擊震昏了頭腦。見於「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林彪同志委託」，來頭不小，只得按章辦事。三月三十一日，彭眞辦公室通知劉志堅爲中共中央起草批語，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轉《紀要》。也就在這一天，康生向彭眞、周恩來轉達了毛澤東在杭州的談話。在這雙重打擊下，彭眞不久便倒台了。

四月一日，彭眞將《紀要》及中共中央批語，以傳文形式，直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共中央負責人。

經過如此繁複的形式、手續，繞了一個大圈子後，《紀要》又回到毛澤東的手中。就在四月一日當天，毛澤東便在杭州寫下批示：「已閱」。

四月十日，《紀要》作爲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印發全黨。

毛澤東與林彪的第二筆政治交易順利完成了。

《紀要》這顆「原子彈」果然將北京的「獨立王國」摧毀了。毛澤東如願以償，江青更從中撈到了一筆豐厚的政治資本。《紀要》成爲她以一顆「政治明星」登上政治舞台的「宣言書」，江青從此飛黃騰達。而林彪也從此加入了「文化大革命」的行列。

一九六六年四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所會見林彪、葉群，江青、汪東興也在座，對《文藝紀要》的順利出籠進行慶賀。毛澤東說：「江青同志在政治上成熟、成長了，是你林帥的關心、培養。我要感謝你。我是贊成讓她闖闖的，不能老呆在園子裏。有人就不准她參與政治，二十年了。這項規定不對頭嘛！」

林彪說：「是毛主席的教導。我也是在主席關懷、教導、幫助下成長的。江青是共產黨員，在主席身邊，是誰下了這個規定，我們要破（這個規定）。」

毛澤東說：「已經給我們破了。」

當中共的廣大黨員和幹部看到《紀要》時，他們只知道「主席三次親自修改」和「林彪同志委託」，他們那裏知道裏面包藏了多少幕後交易、陰謀詭計和明爭暗鬥，他們眞的以爲主角人物是林彪和江青，他們那裏知道毛澤東才是眞正的主謀者和決策者呢！

第三章　毛澤東欽定「接班人」

一、不尋常的「十一中全會」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召開。

這是一次不尋常的中全會。

不尋常之一是，按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開，每年至少兩次」。可是，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是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的，四年來，中共沒有召開過任何的中央全會。

其原因，就在於毛澤東身上。

自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遭到慘敗，中國蒙受了連續三年的「天災人禍」，死了四千萬人，國民經濟損失一千二百億元人民幣。儘管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對造成如此巨大而沉重的災難的錯誤，進行了初步的檢討，但是，作爲最高司令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是否應該召開中全會，對「大躍進」的錯誤給予檢討和總結，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歷史作個交待呢？

然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並不想做這樣的檢討和總結，因爲「大躍進」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澤

東，他難辭其咎。

同時，自從一九六二年以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第一線的領導人，不顧和抵制毛澤東的反對和干擾，堅決執行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使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在這一正一反的鐵的事實面前，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當中，毛澤東的威望急劇下降，而劉少奇的威望直線上升。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召開中央全會，只能是爲劉少奇評功擺好，歌功頌德。毛澤東不願意做這種予對手有利的傻事。

這就是毛澤東不遵守黨章，在四年之內沒有召開中央全會的原因。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毛澤東才提出要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

不尋常之二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在倉促的情況下決定的。毛澤東於七月十八日由外地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四日發出開會通知，七月二十七日便開始預備會議，八月一日全會便正式開幕了。

拖了四年不開，一旦要開時又如此急切，這正是毛澤東的玄機所在。

一九六六年夏天，毛澤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毛澤東的支持、鼓動下，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一張造反大字報，在報紙上刊登、電台上廣播。停課鬧革命的學生，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紛紛向學校的黨組織造反，情況一片混亂。

在該年十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了一張大字報。……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毛澤東將聶元梓的大字報稱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

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廣播的。聶元梓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華北組會議上也說：「毛主席在全國公佈了這張革命的大字報。這天北京大學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國也爆炸了！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高潮。」毛澤東將造反之火點起來後，自己卻遠離北京，躲在杭州「隔岸觀火」。

毛澤東處於反常之中：往年，他是在冬天才到杭州，想在氣候暖和宜人的江南，躲避北京冬日的寒冷和風沙。而每年的春末時節，毛澤東便返回北京。可是，在一九六六年，到了夏天，江南已是一片悶熱，但毛澤東還是呆在杭州，拒不返京。

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中央常委經過研究後，以中央的名議決定派工作組，使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六月四日，劉少奇、鄧小平乘專機去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

毛澤東拒絕返京主持工作，對派工作組也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只是委托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問題。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旨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現在，卻讓劉少奇來主持這個打倒自己的運動：很顯然，毛澤東布下了政治陷阱。

此後，毛澤東繼續在南方各省巡遊，並在韶山那個與世隔絕的滴水洞住了十二天。毛澤東一方面袖手旁觀，另一方面通過各個情報渠道，注視着劉少奇及北京的動靜。當工作組進駐學校，與造反的學生發生衝突而學生受到壓制時，毛澤東認爲已抓住了劉少奇的痛腳，時機來臨了。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來到武漢。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武漢長江游泳。「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毛澤東選擇

「萬里長江橫渡」來作爲他重返中國政壇的「亮相」，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洛厄爾·迪特默所說：毛澤東的舉動是向全國人民表明，毛澤東「仍然是無可動搖的舵手，單憑他的身體就足以證明他仍然有精力掌握全局，更何況他還是壯心不已。」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

當天晚上，劉少奇得知毛澤東歸來，立即前往，求見毛澤東。但是，毛澤東的秘書出來擋駕，說：「主席已經休息了。」劉少奇只得怏怏而回。他發現：毛澤東住處的大門前，停着好幾輛小轎車。

那些小轎車的主人是康生和陳伯達。毛澤東根本沒有休息，一到家後便召來陳伯達，康生等人，聽取他們關於工作組的匯報，還看了「中央文革」搜集的材料。毛澤東已成竹在胸。

翌日，劉少奇再度來到毛澤東的住所。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沒談幾句，毛澤東便用十分嚴肅的口氣對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鎭壓學生運動。誰去鎭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鎭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劉少奇感到一片愕然。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毛澤東繼續發動攻擊，火力一次比一次猛烈，調子也越來越高。並於七月二十四日又一次推翻中央常委的集體決定，下令撤銷工作組。北京的局勢急轉直下，劉少奇掉進了毛澤東預先布下的「伏擊圈」，自「大躍進」以來，第一次處於政治上不利的地位。

在這種不利於劉少奇的情況之下，毛澤東要求召開已經四年沒有召開了的中央全會——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要趁此千載難逢的機會，通過法定的組織形式、組織手續，將劉少奇這個皇帝拉下馬！

在這種情形下，於是就出現了第三種不尋常的情況：全會還沒有召開，可是會議公報的初稿已經在陳伯達的主持下寫好了！

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有三件事令他感到吃驚：

第一，公報初稿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沒有劉少奇；

第二，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毛主席後邊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劉少奇幾天前發表的一段話。那是七月廿二日，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越南胡志明七月十七日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公報初稿中引用了劉少奇聲明中的幾句話，在送審中被毛澤東勾掉了！

這些不尋常的情況表明：十一中全會由頭到尾都是由毛澤東操縱主宰的，大會的主題就是：打倒劉少奇，提升林彪。

二、林彪堅辭「接班人」

對於毛澤東的種種安排，林彪似乎無動於衷。

正當毛澤東在南方巡遊的時候，林彪也不在北京。夏天到了，林彪進駐避暑勝地大連。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林彪理應趕回北京，與毛澤東相會。可是林彪沒有動。

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召開十一中全會的通知，林彪仍沒有動。

七月二十七日，全會的預備會議開始了，主要內容是傳達毛澤東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批判劉少奇的講話。但林彪沒有到會。

八月一日這一天，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開幕。七十四名中央委員和六十七名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了會議，還有有關方面負責人和包括聶元梓在內的首都高等學校「革命師生」共四十七人列席了會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等，都作爲「中央文革」新貴，出席了這次會議。

可是，林彪還是躲在大連，沒有出席。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這一天，還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人民日報》爲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年，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爲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社論公佈了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寫給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這是毛澤東爲了替林彪登上「接班人」、「副統帥」寶座而刻意製造的輿論準備。毛澤東在向林彪召喚。

第二件是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支持紅衛兵組織，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於是「造反有理」以及「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席卷中華大地。紅衛兵作爲毛澤東製造「天下大亂」的第一個工具，登上了政治社會舞台。

會議初期，各路諸侯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表示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有的人對派工作組問題勉強地作了自我批評，但更多的人在發言中表示了對這個問題想不通，不理解；抵觸的情緒，不滿的情緒，像一股強大的暗流，波濤洶湧。毛澤東的戰鬥部署遇到嚴重的障礙。八月四日下午，毛澤東私自決定改變大會的原定議程，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對劉少奇發動了「不是擺事實，講道理」的猛烈攻擊：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點，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毛澤抓住劉少奇「鎮壓學生」這一點不放，拼命上綱上線，把劉少奇與北洋軍閥、國民黨等同起來，正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毛澤東還抬出林彪這座「尊神」，來攻擊劉少奇。毛澤東說：

「這十多年來，林彪同志是受排擠的，很少能負責政治工作。他是懂馬列的，在軍隊中，在文藝戰線上抓了政治，抓了無產階級政治。一些負責抓政治的，抓黨務的，就搞了資產階級政治。」

毛澤東還叫康生讀了林彪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林彪在信中說：「我對近期黨內的政治空氣總覺得不正常，修正主義的東西，資產階級的東西佔了我們一定的領域。指導全黨、全軍、全國工作的思想理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都得不到全面地捍衛、宣傳……我擔憂這樣黨內會出修正主義。」

毛澤東此舉既是借林彪來打擊劉少奇，又是吹捧、抬高林彪，爲林彪取代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製造輿論準備。

在毛澤東的不斷加碼的壓力下，劉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卻，一次又一次地承認錯誤、檢查錯誤。

八月一日，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

八月二日，劉少奇在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講話（這所學院是劉少奇的「點」）中說：

「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

八月三日，劉少奇對各大區負責人和中央一些部委說，自己「跟不上形勢」，對於「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眞，很不得力」。

八月四日，劉少奇對北京建築工程學院的工作組發表講話。檔案中所載原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是正確的。如果是好人，反錯了，還是好人。如果不讓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組不讓人家造反嘛！……」

「這次文化大革命要觸及靈魂。歷代統治者都是鎭壓學生運動的，從北洋軍閥到蔣介石。我們共產黨人也不知不覺地鎭壓了學生運動。我們這樣做，肯定要失敗……」

對於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生的一切，林彪似乎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仍在大連養病。

從林彪後來參加十一中全會以及八月十八日陪同毛澤東上天安門城樓檢閱文化大革命大軍的情況來看，他的身體狀況雖不及毛澤東那樣「紅光滿面，神采奕奕」，但卻也精神抖擻，風采猶存，林彪顯然沒有甚麼足以令他不能出席十一中全會的大病。

在北京，儘管毛澤東與劉少奇正進行殊死鬥爭，兩人鬥得驚天動地，如火如荼，然而，躲在大連的林彪似乎對正在發生的這一切並不怎麼關心，林彪的姍姍遲來，表明了他不願意參加這個十一中全會，也不想介入毛、劉的鬥爭。林彪明顯地是在躲避毛澤東。

那是因爲，會前毛澤東曾與林彪打招呼，準備要他取代劉少奇，任「副統帥」兼「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推辭毛澤東的委任，還寫了書面報告，呈給毛澤東。而毛澤東就在林彪的報告上批示，堅

持要他當接班人。林彪又提出：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會議。毛澤東說：重要的會議你來，一般的會議可由葉群代爲參加。林彪推辭不掉，氣得把這份有毛澤東批示的報告撕個粉碎，扔進痰盂裏，是葉群把它撈出來，拼好後黏到一塊。據說，「九·一三」事件後在毛家灣林彪住處抄出這份文件，現在還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見官偉勛著《我所知道的葉群》）

林彪是故作姿態呢，還是確有難言之隱呢？

看來，林彪的眞實心態，應該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林彪有何難言之隱？

這個難言之隱就是：當毛澤東的接班人，並不是一件好事。

林彪是個權力慾極強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權力。對於最高權力的寶座，林彪垂涎已久。然而，當毛澤東要把這個寶座送給他時，他卻猶豫了。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林彪對毛澤東的思想、作風、性格，已經揣摩得十分透徹了：毛澤東是個可怕的君主。

五十年代以後，毛澤東猜疑之心日重。他不但不信任以劉少奇、鄧小平爲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認爲劉少奇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而且還懷疑在北京隨時可能發生反對他的「政變」，加害於他。因此自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開始就離開北京，一直逗留在江南。毛澤東如此疑神疑鬼，這個接班人地位，可是很難坐得牢。

毛澤東還極端專權，大權獨攬，小權也不分散。做毛澤東的「接班人」、「副統帥」，根本不能與他分享權力。要麼做個名不符實的、沒有權力的傀儡，要麼就要與他在權力分配中發生矛盾衝突。這些

都是林彪所不願意的。

毛澤東還擅於權術，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稍不小心，便掉進陷阱。劉少奇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彭眞在「二月提綱」問題上，便是前車之鑒。

正是「伴君如伴虎」。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一本名爲《曹操》的書上，當曹操講到自己做了宰相（即已「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後，自己已成「騎虎難下之勢」的地方，林彪在這段文字旁邊批了一行小字，曰：「不要輕易騎上去。」——林彪不是不想騎上去，而是告誡自己不要「輕易騎上去」。在這裏，令林彪忌憚的顯然就是毛澤東。現在，面對着劉少奇被打倒這個活生生的例子，林彪就更加不能夠「輕易騎上去」了。

三、毛澤東的選擇

十一中全會召開的前夕，根據當時的形勢，周恩來曾對王稼祥說：接班人是林帥或鄧總書記。

八月一日，全會正式開幕。林彪沒有到會。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鄧小平則講了會議的開法。鄧小平說：

「會議的開法剛才主席講了，要開五天，今天算是第一天，以後開三天小組會，最後再議一下，通過文件……這次會議主要的工作是：一、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准十中全會以

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三、全會要搞公報，最後要通過公報。四、就是法律手續問題。中央政治局曾經決定撤銷彭、羅、陸、楊中央書記處和政府的職務，決定補充陶鑄同志爲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同志爲中央書記處書記，按法律手續要在這一次全會上決定。」

鄧小平在當時擔任着全會的召集者和組織者的角色。

在全會上，劉少奇備受批判，可是沒有人批判鄧小平，唯有謝富治攻擊了鄧小平。在全會最後的選舉中，得到全票的只有四人，鄧小平是其中的一個，其他三人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

鄧小平，原名希賢，四川省廣安人，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儉學，一九二二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一九二七年底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一九二九年冬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領導廣西百色起義。歷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紅星報》主編；一九三七年八月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第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在「七大」中被選爲中共中央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在淮海戰役中任前委書記。解放後，一九五四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政務院副總理；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中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高層中資歷高深、又具卓越能力的領導人之一。

鄧小平比林彪大三歲，比毛澤東小十一歲，屬於年富力壯的一輩。鄧小平身體健壯，對黨、政、軍的工作，具有全面的、豐富的領導經驗。他的思想深刻，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全面，在中共黨內具有「百科全書的頭腦」的美稱。作爲接班人，鄧小平顯然要比林彪適合得多。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曾高度評價鄧小平，說：「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

可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沒有選擇鄧小平。其根本原因，在於毛澤東是從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從黨的、國家的、人民的利益作爲出發點，來選擇「接班人」。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毛澤東根本不需要鄧小平這種難得的「治國平天下」的人材。毛澤東當時的最大目標，是要打倒劉少奇，因此要發動文化大革命，要天下大亂。鄧小平雖然「人材難得」，但他不能、也不會幫助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如果鄧小平當了「接班人」、「副統帥」，由於他政治原則性強，對於劉少奇的錯誤，鄧小平可能嚴格遵守中共和毛澤東一貫的原則：「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不會同意毛澤東爲所欲爲，將劉少奇一棍子打死，更不會同意毛澤東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胡作非爲。一九七五年冬，「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刮起，鄧小平面臨着又一次被打倒的危機。此時，由於林彪的叛逃、滅亡，「文化大革命」是否正確、是否必要，也備受質疑。在這種情形下，毛澤東向鄧小平提出一項政治交易：由鄧小平出面爲「文化大革命」作出「成績與缺點是七三開」的結論，鄧小平便可以繼續執政。可是，鄧小平回答：「這樣的結論由我來做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分晉魏」，婉拒了毛澤東。於是，毛澤東便下令將鄧小平再次打倒了。

林彪雖然比鄧小平小三歲，是中共高層領導中最年輕的一個，然而作爲接班人，他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點。其一是身體不好，難以勝任領導全國黨、政、軍的繁重工作；其二是他缺乏黨、政方面的工作經驗，尤其是行政、組織、經濟方面的事務，林彪不但經驗不足，而且深感繁瑣而厭煩。

然而，毛澤東選擇的卻是林彪。

林彪看透了毛澤東，但毛澤東卻沒有看透林彪。「沒有看透」是指毛澤東沒有看透林彪的思想和世界觀與自己有這麼大的差別，沒有看透林彪在一系列重大的路線、方針、政策上與自己存在這麼嚴重的

分歧與距離。可是，對於林彪的身體狀況，毛澤東是清楚的，林彪每一次身體檢查的報告，都送給毛澤東過目。儘管不是大病，但林彪畢竟是有病，體質較差，難於負擔最高領導人的繁重工作。林彪說不能參加會議，而毛澤東提出由葉群代替就是明證。

毛澤東爲甚麼要選擇這樣一個連會議都不能參加的病號來當接班人呢？他是從甚麼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呢？很顯然，對林彪能否參加中央會議，能否參與中央決策，及承擔中央繁重的黨政軍工作，毛澤東並不重視，也不在乎——毛澤東根本就不是想指望林彪來擔當「接班人」和「副統帥」的政黨工作。毛澤東需要林彪的地方不在這裏。

另一方面，毛澤東並不是白癡，他不會選擇一個很可能比自己先去見上帝的人做接班人，來繼承自己的事業。而毛澤東之所以作出這種有違常理的安排，說明毛澤東沒有把將來和長遠的因素考慮在內，他並沒有將自己開創的事業能在身後長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林彪的身上，毛澤東在這時根本沒有考慮到交班和接班的問題。毛澤東着重的是現在、眼前，是文化大革命這件大事和打倒劉少奇這個最大目標。

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中，不能沒有林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資本，一是自己崇高的政治威望，一是人民解放軍，兩者缺一不可。一方面，面對着劉少奇控制的強大的黨、政權勢，毛澤東唯有借助軍隊的力量來與之抗衡。另一方面，在黨政機構被文化大革命砸爛以後，毛澤東需要一種組織來維持社會秩序。這個組織就是解放軍。因此，軍隊的最高領導人林彪，對毛澤東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少了林彪，文化大革命這台戲就唱不成，單憑「崇高威望」，很難將劉少奇打倒。而利用林彪——軍隊的力量來剷除劉少奇，是毛澤東多年來的戰略部署，前幾年毛澤東多次表揚林彪，又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就是爲了提高林彪和軍隊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使得這件武器變得更有力

量。

因此，毛澤東選擇林彪當接班人，在時間上只是暫時性的，而非長遠之計；在目的上，僅是利用其掌握軍隊的地位和權勢，來助威壯勢，而不是希望林彪分擔或接替繁重的最高領導工作。由此可見，毛澤東選擇林彪，僅是一種權宜之計，毛澤東的主旨僅在利用，而非接班。林彪只是一位過渡性的「接班人」。「九大」以後，毛澤東的打倒劉少奇的目標已達到，林彪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兩人的關係迅速惡化，便是這種權宜之計的必然結果。

十一中全會開幕時，「倒劉」的戰役已打響，毛澤東已沒有後退之地。

儘管劉少奇在大會小會、會內會外連番作檢討，但毛澤東並不滿意。因爲毛澤東並不是想讓劉少奇通過檢討而過關，毛澤東是想將劉少奇置於死地，而且永遠不得翻身。

八月五日，毛澤東在六月二日的《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章的左面，寫下了《我的一張大報》，當時尙沒有標題，落款爲「八月五日」。秘書徐業夫將它在另一張紙上謄清。毛澤東在謄清稿上加上了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又作了一些修改，之後交中央辦公廳付印，準備印發與會者。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

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要跟劉少奇攤牌了。

這時，林彪還在大連。

就在毛澤東的大字報印發給大會的前夕，即八月六日晚，毛澤東令秘書徐業夫打電話給大連的林彪。徐業夫向林彪傳達了毛澤東的口諭：一定要趕回北京參加會議。毛澤東還下令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乘專機到大連去接林彪。林彪拗不過毛澤東，在六日晚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後，林彪立即會晤毛澤東，從毛澤東那裏了解到鬥爭發展的形勢和毛澤東的部署，林彪立即投入戰鬥。

八月八日晚，林彪接見了中央文革小組，在講話中林彪表示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這次經過大震動、大戰役，打下基礎，是很必要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着覺，無產階級也睡不着覺。」毛澤東下令在全會上傳達林彪的講話，還在八月十一日將林彪五月十八日關於政變的講話，印發全會。

據說，在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時，在關鍵性的中央常委的投票中，七位中央常委中，毛澤東投的是贊成票。在毛澤東的游說下，周恩來以及唯周恩來馬首是瞻的朱德，也投了贊成票。而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投的是反對票，三比三。林彪回來後，投下關鍵性的一票：贊成，四比三，毛澤東擊敗了劉少奇。

八月十二日是全會的最後一天。這一天的日程，原定是通過撤銷彭眞、羅瑞卿、陸定一、楊尙昆四人所有職務的決定，追認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通過的關於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任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然而，毛澤東採用突然襲擊的方法，出乎中央第一線和到會的絕大多數人的意料，突然提出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意見，並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名單。在毛澤東的操縱下，結果選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共十一人。林彪取代劉少奇，排名第二，而劉少奇則跌到第八。

全會並未選出副主席。那麼林彪那個「副主席」的頭銜從何而來呢？原來是毛澤東一個人欽定的。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批閱「中央文革小組」關於破四舊的報告時，批示：「照辦。請送林副主席暨各常委閱。」就這樣，毛澤東一句話就決定了林彪的「副主席」、「副統帥」的地位。

在全會的閉幕式上，林彪本來提議新選出的中央領導機構不向外公佈。然而，在八月十八日林彪陪同毛澤東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後，陳伯達在《人民日報》等宣傳機器上大肆宣傳「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黨中央」，並將參加大會的中央領導人的名單排列，按新選舉的次序公佈。這就等於向外界公佈了新的選舉結果，而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的稱呼，也就傳開了。

還有一個插曲，中央常委的名單排列次序最初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江青不滿意這張名單。原因是鄧小平在選舉中得滿票，排名第四。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去找林彪，要把鄧小平的名字往後推，改成：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可是，江青仍不滿意這份名單。她說：「『老夫子』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把陶鑄提上來！」

於是，陶鑄由排名第十一提到第四，鄧小平被壓到第六。

江青似乎才是眞正的「副主席」，而中共也似乎成了毛澤東的「夫妻檔」。

林彪終於上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賊船」。

由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違背人民的意願，逆潮流而動，因此它必然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而它的結果也必然是失敗和破產。林彪「爲虎作倀」、「助紂爲虐」，人民不會原諒他，歷史也不會原諒他，他那悲劇性的命運已經不可避免——即使沒有後來的叛逃，他的命運也好不了那裏去，不是被當做替罪羔羊，爲毛澤東所拋棄，便是像江青「四人幫」那樣，被人民審判，在他登上「副統帥」、「接班人」的寶座的那一刻，他那身敗名裂的結局就已經注定了。

林彪旣是被自己，也是被毛澤東所毀滅。

四、林彪生平僅有的謙虛

毛澤東和林彪是十一中全會的最大贏家。毛澤東預設的各項目標都達到了。全會通過的經毛澤東審定的公報中，除了極力突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突出階級鬥爭，突出「三面紅旗」外，還大力突出了

林彪。公報引用了林彪的話「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並肯定了林彪提出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三十字方針，即「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無異是肯定了林彪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高舉」、「緊跟」的努力和成績。

在偉大的勝利面前，毛澤東躊躇滿志，意氣風發。可是，在林彪那蒼白瘦削的臉上，卻看不到一點笑容，他顯得心事重重，對突如其來的權勢和榮耀，表現出罕有的低調和謙虛。

有人說：「機智」、「敏捷」、「果斷」、「剛毅」、「深刻」、「冷靜」、「穩健」……用這些詞形容林彪都不過份，但千萬不能說「幽默的林彪」。同樣地，也千萬不能說「謙虛的林彪」。清高、孤傲、自負，這是林彪與生俱來的特性，就像愛吃炒黃豆一樣，是林彪身上特有的本色。「謙虛」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虛懷若谷」、「從聽如流」，都是與林彪的本性背道而馳的東西。

然而，在當了「副統帥」和「毛主席的接班人」之後，林彪卻一反常態，變得謙虛起來了。

八月十二日，林彪在全會的閉幕式上發表了講話，這也是他在整個大會上唯一的一次講話。林彪說：

>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但是要力求減少錯誤。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全體同志，文革小組同志。以毛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盤石……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群衆的智慧，一切請示主席，一切按主席的指示辦事，大事不干擾，小事不麻煩。有時免不了要犯錯誤，跟不上主席思想怎麼

辦？辦法是朝朝夕夕不堅持錯誤，隨時修正錯誤。主席是世界革命的天才，我們同他比較，差別很大，錯了趕快改。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思之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也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

林彪講這番話的時候，似乎在感到毛澤東那雙灼熱的目光在投向他，劉少奇那雙冷冷的目光也射向他。他如芒刺在背，如坐針氈，正是高處不勝寒哪。

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進入了「蜜月期」。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與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肩並肩地站在一起檢閱國慶游行隊伍。其間，兩人的一段談話可以充分地看出這種「親密」的關係。

林彪指向天安門廣場一百萬師生和群衆隊伍，對毛澤東說：

「主席，人民都響應你的戰鬥號令，發動起來了。這場文化大革命震撼着全世界。」

毛澤東說：「人民群衆是眞正發動起來了。我們找到了一種形式，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人民群衆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解決反修、防修的道路問題、路線問題。」

林彪說：「這是主席偉大、英明的領導和決策。當初列寧就沒有這個條件，斯大林就辦不到，變修了。」

毛澤東說：「運動還是剛開始，還會有風浪。」

林彪說：「有主席掌舵，有主席思想指引，甚麼大風大浪也不可怕。」
毛澤東說：「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壯大的。」
在休息室，毛澤東將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等常委招呼到一起，說：
「這二、三年來，我的戰友爲黨辦了兩件大事：一是抓了軍隊突出政治，二是在中央造了反。」
林彪說：「是主席的長期教導和關懷。」
陳伯達和康生說：「要向林副主席學習再學習。」
林彪說：「我們要老老實實學習主席的教導，才不會迷失方向，不要自作聰明。」
毛澤東說：「要向人民學習。」
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這種融洽、親密，只是兩人關係中光彩奪目的光環。在這個光環的背面，是狼狽爲奸和勾心鬥角。

第四章 「二月逆流」

一、毛澤東的辯白

「九·一三」林彪叛國投敵後，毛澤東不得不對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幹部平反，其中最早的是「二月逆流」。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幹部，當葉劍英走進會場時，毛澤東說：

「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甚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地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現在問題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個甚麼『五·一六』，打倒一切。」

這時距林彪外逃剛剛兩個月。

毛澤東這麼快就爲「二月逆流」平反，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二月逆流」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三老」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四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大鬧懷仁堂事件。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說：「『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毛澤東也說：「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甚麼十分了不起。」

「二月逆流」使七位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遭到批鬥、迫害，這自然不能算是小事。事情眞的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二月逆流」是對付林彪的嗎？

二、「大鬧懷仁堂」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進入了第二個年頭。徹底造反、天下大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開始露出了它的猙獰面目。尤其是「一月革命」全面奪權以後，幹部統統被踢開、打倒，武鬥加劇，全國陷入一片內戰。

如果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由於不了解，許多人都表現出盲目的支持，那麼到現在，人們開始發現文化大革命原來是個禍患無窮的怪物，於是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不同程度的反抗、抵制和鬥爭。「二月逆流」就是發生在中共最高層內部的一場大規模的抗爭。

二月十四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這是由中央黨、政、軍負責日常工作的幹部和「中央文革」成員共同組成的會議，研究、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召集。在這一天的會議上，江青沒有出席，代表「中央文革」出席的陳伯達便成爲衆矢之的。

陳伯達說：「江青同志身體不好，不能來開會，托我帶個意見來：軍委搞了個八條命令，部隊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戰鬥隊，這個文件沒經『中央文革』討論，怎麼就送去主席批了？」

葉劍英首先向陳伯達開炮，他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甚麼？」

徐向前拍着桌子質問陳伯達：「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搞亂了，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

原來徐、葉兩位元帥在一月份的中央軍委會議上，已經與「中央文革」吵過一通了。「中央文革」力主在軍隊內搞大民主，大串聯。葉劍英在盛怒之下拍案痛斥，以致將右手掌骨震裂。這一回，在徐、葉兩帥的凌厲批駁面前，陳伯達啞口無言，不能回答。

徐向前又提起總政副主任劉志堅被打倒的事，愈加憤怒：「你說劉志堅是叛徒，完全是揑造！我還不了解劉志堅嗎？劉志堅同志根本不是叛徒。我們帶兵的人，軍隊的幹部跟隨我們作戰那麼多年，難道我們還不了解他們？」

陳伯達辯解道：「劉志堅叛徒的案子已經定了，再不能改變了。」

葉劍英接着進攻：「上海奪權，改名爲上海人民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爲甚麼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想幹甚麼？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甚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

請解釋一下，甚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陳伯達的臉一陣紅，一陣白，雖然怒火中燒，恨得咬牙切齒，但無言以對，只是透過兩片厚厚的眼鏡片，恨恨地瞪着徐、葉。

據秘書說，陳伯達回到家中，一言不發便往床上一倒，閉上了雙目。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來再度在懷仁堂召集中央碰頭會。事先通知會議將討論經濟問題。老幹部的陣容是：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毅、葉劍英、徐向前、余秋里。「中央文革」的陣容是：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謝富治。兩軍對壘，會議還沒開始，鬥爭便先展開了

在會議室的門口，譚震林遇到張春橋。譚震林問道：「陳丕顯同志來了嗎？爲甚麼不讓他來北京？」

陳丕顯是上海市委書記，原先與譚震林同是華東野戰軍的戰友。最近毛澤東指示將某些省委書記接到北京來。江華、江渭清、譚啓龍等人先後來了，唯獨陳丕顯沒來。

張春橋怔了一下，然後不冷不熱地回答：「群衆不答應啊！」

聽了張春橋的回答，「譚老板」的火氣不打一處來，文化大革命以來，「群衆」成了這些「左派」的打人棍子和擋箭牌。譚老板朝張春橋吼起來：「甚麼群衆！群衆！老是群衆，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甚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兩人一路吵進來。「左將」們被譚老板的怒吼鎮住了，而陳毅、葉劍英則爲譚老板暗裏叫好。

譚老板指着張春橋的鼻子繼續罵道：「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

光，把老幹部都打光！」「這一次，是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與毛澤東一起參加秋收起義、上井岡山，一路戰鬥過來的譚震林，根本沒把「中央文革」這幾個秀才放在眼裏，甚至連江青他都敢罵。然而上面還有那位「最高統帥」，這些犯忌的話很快就會傳到他那裏，他會怎麼想呢，會不會像彭、羅、陸、楊、劉、鄧、陶那樣被打成「走資派」呢？會不會像彭德懷那樣惹來滅頂之災呢？譚震林已顧不了那麼多——豁出去啦！

這時，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也加入了進攻。而「左派」們除了謝富治、康生偶而回應一、兩句話外，張春橋等人則只是埋頭記錄。精於奸計的張春橋，憑他那靈敏的政治嗅覺，立即覺察到這是一顆難得的「重磅炸彈」，一套陰謀詭計由腹中漸漸升起。

問題越扯越多，話也越說越長，原定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議題只好作罷。

散會後，張春橋把王力、姚文元找到一起，將三人的記錄筆記整理成一份文字材料，題爲《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署名爲「張春橋、王力、姚文元」。

這就是後來被毛澤東、江青定爲「二月逆流」的其中一幕——大鬧懷仁堂。

下面是《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摘錄：

> 當譚震林同志提出要張春橋同志保陳丕顯，張說，我們回去同群衆商量一下，譚震林同志打斷了話，大發雷霆說：
>
> 「甚麼群衆，老是群衆群衆，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甚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幹部都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蒯大富，是甚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

「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着我的面講的！（謝富治同志插話說：江青同志和小組同志多次保譚震林同志，從來沒有說過甚麼「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站起來，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場，說：

「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

「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陳毅同志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發言：

「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

李先念同志說：

「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迫供信。」

譚震林同志說：

「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說：「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同志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裏有一點反毛主席。」當謝富治同志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時，譚震林同志說：「我不是爲自己，是爲整個的老幹部，是爲整個黨！」

李先念同志說：

「就是從《紅旗》第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衆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甚麼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掉了。」

周恩來同志當即對康生同志、陳伯達同志說：「發表十三期《紅旗》社論，這麼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送給我們看看。《紅旗》社論發表以後敲鍾打鼓，也是從這一期開始的。」

康生同志說：「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陳伯達同志也說：「我也没看。」

……

三、告御狀

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拿着材料，直奔釣魚台江青住處。下面引述的，是王力回憶的經過：

張春橋向江青報告，帶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釣魚台十一樓。張春橋向江青一條條講。本來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時「病癒」了。江青暴跳如雷，說道：「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的，陳伯達、康生在路線鬥爭中動搖。」由於李富春在會上一言未發，所以江青沒有提到他。事關重大，江青勸張、姚推遲一天回滬。

江青說要立即報告主席，並說：「你們三個都要去。」

江青馬上給主席打了電話。電話是主席秘書徐業夫接的。江青說：「張春橋、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請主席今晚接見。」過了一會兒，徐業夫回電話說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會見他們。

晚十時左右，我們到了主席那裏。江青這個人的特點是，到主席那裏開會時像隻小貓似的，躲在一邊，一句話也不說，一出門，她就對一切都發號施令。

主席先問張春橋甚麼時候走？張春橋說十八日回上海去，問主席還有甚麼指示，主席說沒有了，都談過了，簡單說了幾句。

這時張春橋說：「今天發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匯報。」接着，把我們三個人湊的情

況，向主席匯報了一遍。我一言未發，只是聽着。

我注意到，匯報前面的那些發言時，主席光是笑。當講到陳老總的發言時，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引者注：據王力回憶，陳毅說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魯曉夫，以後又怎麽樣？」意思是說現在的林彪以後會怎麽樣）。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聽到這裏，扳起面孔，從此以後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如張春橋告總理對第十三期《紅旗》社論没送他看有意見時，主席說：「黨章上没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政治局常委審查？」

匯報的時間不長，主席已經當成很大的問題了，但還没發大脾氣。最後說：「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幹部，第四生産要搞好，要抓鐵路和煤炭。」

因爲張、姚要回滬，主要要我把這一意見告訴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

這時主席又心平氣和了。我說：「我根據主席和總理最近反複講的幹部政策，寫了一篇社論，叫《必須正確對待幹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過没有？」主席說：「你馬上再送一份到這裏來，不要經過陳伯達。」……

這次大約談了兩個小時。

四、譚震林向林彪訴心曲

譚震林從懷仁堂回到家裏，已是夜裏，他的心情象翻騰的大海一樣，久久不能平靜。

譚震林一九二五年參加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井岡山時期的茶陵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到紅四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到新四軍第二師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四十多年來，甚麼大風大浪沒經歷過，甚麼大陣仗沒見過啊！長期以來，在革命隊伍內，在共產黨內，黨內鬥爭件隨着對敵鬥爭，連綿不斷。在井岡山上，朱毛一會師便開始鬥爭；到了江西革命根據地，黨內鬥爭就激烈、複雜得多了。後來在長征路上，在延安，一直到建國後，黨內鬥爭、路線鬥爭，一浪接一浪，從未停止過。

據譚震林所憶，黨內鬥爭最殘酷的一次，是三十年代初期，在江西蘇區搞的「肅反運動」。那一次的「始作俑者」也是毛澤東，搞甚麼「打AB團」，純屬子虛烏有。那時候，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既是紅軍，又是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他一聲令下，便到處抓「AB團」。還派那個小人李韶九做欽差大臣，四處督戰。陳毅當時任紅二十二軍軍長兼政委。紅二十二軍官兵總共三千人，李韶九要陳毅在紅二十二軍中「打出五百名AB團」。陳毅對此持懷疑態度，沒有完成「任務」，李韶九就認爲陳毅是「AB團」，險遭殺害。

在毛澤東的「紅色恐怖」政策下，發生了「富田事變」，整個紅二十軍被毛澤東下令殘殺，全軍覆沒。

在毛澤東的「紅色恐怖」政策下，「打AB團」到了瘋狂的地步，濫殺無辜，人人自危。甚至集合

站隊，看臉紅不紅，哪一個臉紅，就被懷疑是AB團；有時，兩人在一起說幾句話，三人在一起開個玩笑，幾個婦女在一起唱支歌，都被說成是AB團、姐妹團，不分青紅皀白，全部捉走……

經歷過這些腥風血雨的譚震林，覺得目前的文化大革命，比起三十年代的江西肅反，比起歷次黨內鬥爭，其規模，範圍，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是歷來最殘酷的一次！

譚震林感到自己有滿肚子的話，卻沒地方訴說。他很想找一個人來訴說，於是想起一個老同志、老幹部，那就是「副統帥」林彪。

譚震林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就結識林彪。幾十年來，兩人雖然不在一個系統工作，但相互之間的關係還是可以的，就在懷仁堂會議前，葉群還打來過電話，說「一〇一」（林彪的代號）還是很關心譚老板的。因此譚震林認爲：林彪並不是要把老同志置於死地的。

譚震林還認爲，在當時，能夠對「中央文革」發揮影響力和起點制約作用的，除了毛澤東，恐怕就是林彪了。種種迹象表明，林彪與「中央文革」保持着一段距離，他們之間還是有所不同的。應該讓林彪知道一下懷仁堂會議的情況，應該努力爭取他的支持。

於是，譚震林鋪開信紙，提筆給林彪寫了一封信。

譚震林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口口聲聲稱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執行者，但他們根本不聽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國到處挑起事端，製造混亂。江青竟闖到政治局會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黨的主席，你江青算甚麼東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甚麼地位，其狂妄驕橫真比武則天還兇。

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衝口而出」。陶鑄、劉志堅、唐平鑄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對於這些人的錯誤批評過嗎？只批評了××，其他人都未批評。而且批評××爲時很短，根本不給人改過的機會。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北京的群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這些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老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覆説過要保的，無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算，因爲這樣太露骨了，又來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巨大損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對於醜化黨的行爲，對於老幹部倒下去這樣子，他們一言不發，少了幾頓魚，就如此大發雷霆，就可看出他們喜的是甚麼，恨的是甚麼。他們根本不作檢查，把責任推得一乾二净。他們能當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

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

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碰下去。請你放心，我不會自殺。

此致

布禮

譚震林

二月十七日

將信寫好後，譚震林又親自寫了信封，便交給機要秘書立即送到林彪辦公室。

譚震林還打電話去「林辦」，求見林彪。但林辦拖延不覆。

譚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將。如果正像毛澤東所說，「二月逆流」是對付林彪的，則譚震林就不會以這種「訴說衷腸」式的口氣，來寫信給林彪。信中矛頭直指江青和中央文革，這與「大鬧懷仁堂」時的情景是一致的。在整個「二月逆流」事件中，三老四帥從未觸及林彪，從未將批評和指責的矛頭對着林彪。他們將林彪與江青、中央文革不同對待，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五、江青請「尊神」

張春橋告御狀，毛澤東沒有明確的表示，令江青大失所望。於是，江青想起了林彪。

二月十八日一早，江青叫醒還在睡夢中的王力，風風火火地趕到毛家灣。

聽聞江青大駕光臨，葉群急忙迎出相見，兩人又是拉手，又是問候，親密得好像多年不見。

江青說：「我要見林總，有重要事情向他匯報，現在是該他說話的時候了。」

葉群說：「甚麼事情這麼急？」

江青：「有人想鬧事，非得請林總出場鎮他們。」

葉群明知故問地說：「啊？誰有這麼大的膽子？」葉群已知道江青的來意。

江青：「還有誰，不就是那幾個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快請林總出來！」

葉群只好把林彪叫出來。

見到江青，林彪只是淡淡地問道：「主席身體好嗎？」

江青回答：「很好，很健康。」接着，江青便像機關槍似的將大鬧懷仁堂的經過講了一遍。爲了增加說服力，江青又叫王力將他們整理的材料向林彪宣讀。

林彪坐在沙發裏，沉着臉，沒有笑容，也不說話。葉群則打開筆記本作記錄。

王力一句一句地念着，林彪則閉着眼睛一句一句地聽着，既不評論，也不插話，一聲不吭。

王力念完後，江青問林彪有甚麼指示。

據王力回憶，林彪只講了兩句話。

第一句是：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軍。

這是指徐向前說的：「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

第二句話是：陳伯達是一個書生。

這是指一月初陳伯達伙同江青炮轟陶鑄，被毛澤東批評「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林彪的潛台詞是：陳伯達被江青利用，辦了一件蠢事——在中共的高幹中，陶鑄是與林彪比較談得來的一個。

江青又說：「當初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我請來了林總，現在要擊退這股逆流，也要靠林總。只有林總才是我們的『鋼鐵長城』。」

林彪沒有吭聲。

江青接着說：「主席聽了他們的匯報後非常震怒，我估計主席很快將要作出反應，請林總相應也作出表態，對這班人不能等閒視之。」

林彪這時才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堅定不移地執行毛主席的指示。」

林彪的話既清楚又含糊。毛澤東如果對這件事表態，林彪當然會「緊跟」；如果毛澤東不表態，那麼就對不起啦，林彪自然不會表態。

林彪用一句話便打發了江青。

很明顯，矛盾的雙方——譚震林和江青都想取得林彪的支持。林彪究竟支持誰呢？

江青剛一走，秘書便進來報告：剛接到中央辦公廳汪東興的電話，通知林副主席今天晚上到中南海游泳池參加會議。

林彪毫無表情地問道：「都有哪些人參加？」

秘書回答：「不知道。」

林彪擺擺手，秘書便退出去。

林彪在房間裏踱着步，沉思着。

「今晚到主席那裏開會，你替我去！」林彪突然說道。

葉群：「你不去了？」

林彪：「就說我身體不好，又感冒了。」

葉群：「這次會議可是十分重要呀！」

林彪：「重不重要，反正是得罪人的會。爲了那個戲子得罪那麼多人劃不來。如果主席表態了，我們跟着講，大家也會理解。如果主席不表態，讓我打頭陣，我可不想當炮灰。你去了，可以代我聽，講甚麼可以隨便些，旣能堵住主席和那個戲子嘴，也能穩住那些老帥們。」

林彪的傾向性已經十分明顯了。

林彪沒有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會議。

六、毛澤東震怒

參加毛澤東召集的這次會議的有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名單是毛澤東親自擬定的，這旣不是政治局會議，不是中央碰頭會，也不是中央常委會議。

當與會者於十八日晚十時準時到達毛澤東的住處後，毛澤東滿臉怒色地走進來。他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也沒有握手，便逕直走到靠北邊書架旁那個沙發，坐下來。

「我聽說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懷仁堂上鬧事，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氣得嘴唇直打哆嗦，高聲說道。

毛澤東又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對我！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

康生見到毛澤東發怒，不禁精神大振，急忙掏出筆記本記錄毛澤東的話。

周恩來見狀，便不住地向毛澤東說：「主席，不要生氣，要注意保重身體，都怪我沒把事情處理好，要批評就批評我！」

毛澤東似乎更加生氣，大聲說道：

「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嚒！」

周恩來走到毛澤東跟前，低聲說道：

「主席，不要這樣，不要這樣！這樣不好嘛！同志們的出發點絕對不是這樣的，我有錯誤，其他同志也有錯誤，可以批評，但不要用這種語言。」

康生聲色俱厲地說道：「你們都看到了吧，我們毛主席義憤了，發怒了，毛主席是發了無產階級之

怒！」

謝富治也幫腔：「他們大鬧懷仁堂的時候，我就勸譚震林、陳毅等同志不要鬧，不要發難，他們不聽，他們把中央文革的忍讓當作了軟弱可欺，眞是豈有此理！」

毛澤東又說：「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爲甚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周恩來連聲解釋：「請主席冷靜些，請主席冷靜些！我們一定要嚴肅批評他們幾位同志的錯誤，讓他們做檢查。」

毛澤東憤然地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

說罷，拂袖而去。

發這麼大的脾氣，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絕無僅有的。

當譚震林聽到毛澤東的「震怒」後，感到很不理解。譚震林原以爲毛澤東會聽一聽老同志們的意見，對「中央文革」的氣焰壓一壓。然而譚震林錯了。這時的毛澤東已聽不得老同志們的逆耳忠言。

譚震林又認爲肯定有人蒙蔽了毛澤東，應該向毛澤東面陳一切。

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勸譚震林冷靜一下。但譚震林說：「我就是要向主席講明情況！」

於是，譚震林和毛澤東的辦公室聯繫，希望主席抽點時間同他談談。

譚震林得到的答覆是：最近主席很忙，等有了空，就給你打電話。

譚震林靜靜地等着。毛澤東的電話始終沒有來。

至此，譚震林才明白，自己又一次地錯了。

從此之後，「三老、四帥」被多次批判，並被迫停職反省。從二月廿二日至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共開了七次「政治生活會」，對「三老、四帥」進行批判。在這些會議上，跳得最歡的，發言最踴躍的是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王力等「中央文革」一伙，葉群在會上也積極發言，緊跟江青。

康生在會上說：「這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復闢的預演。」

江青咬牙切齒地說：「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

陳伯達說：「這是自上而下地復闢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而且，自此之後，「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碰頭會，「中央文革」不但取代了書記處，還取代了政治局，一切黨、政、軍國家大事統統由「中央文革」討論決定。江青的權力和地位「更上一層樓」了。

七、誰是「罪魁禍首」

毛澤東爲甚麼會發這麼大的火？

有一種說法，是說林彪將譚震林的信轉給了毛澤東，於是「龍顏大怒」。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因爲林彪是在十九日葉群從毛澤東那裏開完會後，才將譚震林的信轉給毛澤東的。林彪還附上自己

給毛澤東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預料之外。現將他的信送上，請閱。

林彪　十九日

（以上見董保存著《譚震林外傳》）

如何處理譚震林的信，原來林彪頗費思量。

十九日，葉群將毛澤東的「無產階級之怒」向林彪匯報後，又將譚震林來過幾次電話的事告訴了林彪。

林彪笑着說：「在這種情況下，還是不見爲好。一旦走漏風聲，傳到釣魚台那幾個人的耳朵裏，還以爲我是他們的後台。」

葉群又說：「譚老板那封信留在我們這裏也不好，還是交給釣魚台吧！」

林彪：「釣魚台？那不等於我作了秀才們的附傭？不行，我不能讓別人嘲笑我拍那個女人的馬屁！我也是老革命，老幹部，我有自己的態度和立場，這事不用你多嘴。」

葉群不高興地走了，林彪將譚震林的信壓下。

精於陰謀詭計的葉群，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她擔心林彪在這件事上感情用事，將自己陷進去，那

就是惹禍上身了。於是，葉群又走進林彪的房間，說道：「我反覆考慮了，譚老板這封信不能留在我們這裏，得交出去。」

林彪：「你怎麼這麼囉嗦！」

葉群：「該囉嗦的時候必須囉嗦，這是革命的囉嗦！我們不能爲了譚震林而得罪江青，得罪毛主席。」

聽到「毛主席」三個字，林彪的心裏震動了一下。

葉群：「信必須交出去，但不是交給釣魚台，而是交給毛主席。我們得表態。」

林彪站了起來，踱了幾步，臉上緊皺着的眉頭展開了。他說道：「好吧，就批給主席，讓主席來決斷。」

林彪這種裝好人，不想得罪老幹部，將矛盾往毛澤東身上推的伎倆，一下子便被看穿了。而且對譚震林的信，林彪沒有上綱上線批判，只是說「糊塗墮落」，這種含混、籠統的話誰不會說?!在大鬧懷仁堂這件事上，林彪明顯地是傾向於譚震林那班老幹部。對毛澤東，林彪不是「緊跟」，而是在搪塞。老謀深算的毛澤東當然知道應該怎樣做。毛澤東抓起粗鉛筆，寫了兩行字：

已閱，恩來同志閱，退林彪同志。

對林彪發來的高招，毛澤東輕輕一擋，便完全化解了。

據說，林彪看到毛澤東的批示後，大爲不悅，將此信揉成一團，扔進廢紙簍中。是身邊的工作人員

事後撿起來存入檔案的——後來，當《譚震林外傳》的作者董保存看到這封信時，確實是被搓、被撕過的。

因此，說毛澤東是看到林彪轉去的譚震林的信後才「龍顏大怒」，那是毫無根據的。

那麼究竟是甚麼因素促使毛澤東發怒呢？江青、張春橋等人告御狀，當然是個不可抹煞的、打基礎式的因素。當時毛澤東已經頗爲不悅了，只是沒有發作。《黨史文匯》月刊曾經發表過一篇《二月逆流史話》，其中講到二月十七日，康生單獨會見了毛澤東。他不僅敘述了開會的情況，而且是從歷史的高度，從理論的高度，從路線的高度把「懷仁堂會議」的內容加以篡改，以此激怒了毛澤東（見《譚震林外傳》一三〇頁）。

綜觀整個事件，鐵的事實證明，「二月逆流」的矛頭所指，是以江青爲首的「中央文革」，是老幹部們發洩對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毛澤東的不滿，只是不敢明指毛澤東而已。二月十八日晚毛澤東在「震怒」時說：「我們聽說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懷仁堂上鬧事，反對中央文革……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對我！」毛澤東的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對付林彪」之說，純粹是毛澤東將林彪當做替罪羔羊，爲自己、爲江青掩飾之詞。而「二月逆流」事件，純粹是毛澤東出於對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聽信江青一伙，對老幹部所進行的政治迫害。

林彪對「二月逆流」的態度，起碼是曖昧的，與毛澤東，更與江青一伙頗有距離。至於毛澤東震怒後，林彪在一些講話中批判了「二月逆流」，葉群更是緊跟江青批判三老四帥，那是「不得已而爲之」、「大家都能理解」的了。

據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有一次葉群參加完釣魚台召開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會議後，將會上的情

況向張雲生作了介紹，吩咐張雲生：「你先給首長（指林彪）講個大概，詳細情況，等以後我給他講。這兩天葉帥徐帥可能要見首長，你們要注意，在我和首長見面前，不能安排見他們。」

張雲生問：「如果首長要主動找他們呢？」

葉群說：「我爲甚麼先讓你們替我把釣魚台開會的情況給首長吹吹呢，就是爲了防止他腦子一熱，就找他們談話。首長對毛主席是緊跟的，對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些老帥也有感情。我實在難哪，但不能推着他向右傾，看着他犯錯誤。」

第二天，張雲生把葉群的話轉告了林彪。林彪面無表情，但聽得很認眞。

林彪問：「葉群每天都從釣魚台開會回來的那麼晚嗎？」

張雲生回答：「差不多每天都這樣。」

林彪顯得不大高興，但沒有再問甚麼。

過了不久，葉劍英給林辦打來電話，說：

「張秘書，請你報告一下林副主席，軍事科學院的一個群衆組織最近幾天接連要我去參加他們批判我的大會。我的身體很不好，去參加這樣的會確實吃不消。我希望讓我休息一下。如果非讓我參加批判會，是否等我身體好一些以後再說……。」

張雲生去報告林彪。「林彪這次卻很爽快：『告訴葉帥，可以休息一下。』我想退出，卻又聽林彪說：『全面看來，葉帥還是功大於過』。

『首長後邊說的這句話，我可以傳給葉帥嗎？』

『不要。』林彪搖了搖頭。」（見《毛家灣紀實》一〇五頁）

第五章　毛林勾結之一　打倒劉少奇

一、「天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上海。

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正在緊張地起草。這一天，從杭州毛澤東那裏傳回來《五·一六通知》的修改稿。起草小組組長陳伯達打開一看，只見在草稿上毛澤東加上了「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這樣的一句話。看罷，陳伯達大吃一驚。憑多年來的政治經驗，陳伯達知道毛澤東的話肯定是有所指的，然而彭眞、羅瑞卿、陸定一、楊尙昆已經被打倒了，那麼這個「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到底是指誰呢？

陳伯達偷偷地向毛澤東夫人、起草小組成員江靑打探。

江靑把眼睛一瞪，指着陳伯達的鼻子，說道：「老夫子，你簡直成了老糊塗！你還不知道中國的赫魯曉夫指誰？你幫他推薦、修改、發表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哼，甚麼《修養》，全是唯心主義的一套！你給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點兒！」

經第一夫人這一指點，陳伯達頓開茅塞，豁然悟明了「天機」：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鋒芒

所指，就是劉少奇。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斯諾問：「你甚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澤東回答：「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對象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打倒劉少奇」，是毛澤東自一九六二年以來在心中逐漸形成的一個「宿願」。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間，中共中央舉行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一再向與會者問道：「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將矛頭指向劉少奇，已是呼之欲出。

毛澤東的「天機」，只有身邊幾位「心腹幹將」知道。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林彪插話說：「有人說毛澤東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現在中央領導同志凡是在群衆中有威信的，全是毛澤東事先將『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給他們了。所以他們未犯錯誤。」

林彪在這裏所講的「在群衆中有威信」的「中央領導同志」，是指「中央文革小組」那幾位核心人物：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另外的當然包括林彪自己。至於毛主席事先所交的「文化大革命的底」，就是「打倒劉少奇」。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的這個「天機」仍屬高度機密。以至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五·一六通知》的劉少奇本人，竟不知《通知》中所說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他自己！因此，在隨後的那些波譎雲詭的日子裏，被蒙在鼓裏的劉少奇便糊裏糊塗地一頭掉進毛澤東預先

設置的政治圈套中，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出了紕漏。毛澤東抓住這個問題大作文章，並要求召開「十一中全會」。在全會上，毛澤東拋出《我的一張大字報》，向劉少奇發出致命的一擊。到這個時候，劉少奇才明白，毛澤東原來是在算計他。

二、「表忠心」 林彪整劉少奇黑材料

「打倒劉少奇」這個天機，林彪知道的時間比陳伯達還要早。

那是一九六五年冬，毛澤東去杭州路經蘇州時，專程找林彪密談，將「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給了林彪。並囑咐林彪養好身體，準備擔負更重大的責任。

毛澤東此行是要拉攏林彪，想借助林彪手中掌握的軍隊，來對抗劉少奇手中掌握的黨組織，利用林彪來打倒劉少奇。

對此，林彪洞若觀火。然而精明的林彪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熱情，不願爲毛澤東火中取粟。

在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軟硬兼施，好容易才令林彪答應擔任「副統帥」和「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和林彪一起登上天安門，檢閱文化大革命百萬大軍，電視、報紙爭相報導，林彪極盡榮耀。

榮升之後，林彪心裏很清楚：毛澤東決不會白白地讓自己享有這份榮耀，自己必須付出代價，否則地位難保。將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又毫無原則立場的林彪，此時此刻只好想方設法「立功圖報」。

「打倒劉少奇」是毛澤東的最主要的目標。爲了投其所好，經過與葉群商量，一個針對劉少奇的陰謀出籠了。

葉群是個搞陰謀詭計的能手。她很快就找到了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雷英夫是個富有才華的軍人，曾擔任周恩來的軍事秘書，一九五〇年六月，預測麥克阿瑟將於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率領美軍在仁川登陸，就是他的傑作。然而，此人的政治野心與他的才華一樣「出類拔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鏟除羅瑞卿時，此人就曾出過一臂之力。

這一次，葉群一招手，雷英夫馬上就向毛家灣跑來了。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毛澤東拋出《我的一張大字報》五天之後，十一中全會還沒有開幕。

毛家灣寬敞的會客室中，只有葉群和雷英夫兩人。葉群說：

「上次你跟我講的羅瑞卿的一些問題，我去跟劉少奇匯報了，你猜他怎麼樣？我只講了幾句，他就不聽了，還說：『雷英夫這個人有能力，但意識不好，他揭發的材料不能相信。』你聽聽，這是甚麼話？他要保羅瑞卿，也不能這樣踩別人呀！」

葉群的一席話，使雷英夫內心一陣顫抖。

接着，葉群又向雷英夫透露了正在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風向，透露了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內容。

葉群說：「劉少奇和我們不是一個司令部的人。究竟是跟着毛主席走，還是跟着劉少奇走，是作出抉擇的時候了。你揭發了羅瑞卿的問題，說明你願意跟毛主席和林總走，但不能半途而廢呀！」

雷英夫坐不住了。

回到家後，雷英夫寫了一份《有關少奇同志的材料》。

雷英夫是這樣寫的：

有關少奇同志的材料：

一、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從不宣傳學習毛主席著作，也不宣傳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例如：少奇同志一九六四年九月給江青同志的信，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宣傳毛主席指示的集中表現。他借口江是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沒有蹲點，不了解情況，手裏沒有真理。實際上是說王光美桃園大隊的經驗是真理，而毛澤東思想的「第一個十條」都不是真理，因此，大家應該學習王光美的指示。這是何其惡毒的作法！

二、自以爲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當最高領袖。這裏，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羅瑞卿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講「在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事前，彭真親自定了調子。

（二）一九六五年九月，朱德同志在會上提出：將來打起仗來，最高的統帥是劉少奇同志，根本不提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坐在一起，不加反駁，還很得意，看來很聽得進去，使人吃驚。

（三）近多年來，每逢「十·一」、「五·一」等節日，報紙上都是刊登毛主席、少奇同志兩張一樣大小的照片，從來未見少奇同志有謙虛的表示。

（四）九評中指出，「以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爲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此事由來如何，不清楚。

三、劉少奇同志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之外，在歷史上也犯過很多方向性的嚴重錯誤，他雖然背着一貫「正確」的包袱，但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懂得毛澤東思想，例如：

（一）一九四六年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和政策，使一些地區和部門的工作受到損失。

（二）一九四七年，西柏坡土改會議時，提出「村村點火，家家冒烟，」使土改發生了大偏差。

（三）一九五〇年在天津蹲點後，提出了資本家可以管理企業的政策，有嚴重錯誤。聽說當時就是在王光美的哥哥在天津所開的工廠蹲點得出的結論。

（四）一九五六年「八大」時，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把「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一語去掉了，少奇說「七大」時有必要，現在可以不說了。

（五）一九六二年贊成陳雲同志的右傾意見。

（六）一九六四年二月，少奇同志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可以考慮派代表團到蘇修參加「二十三大」，好處是可以了解情況。

四、少奇同志在組織路線方面也有很多錯誤：

（一）不傳達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如文化大革命）。

（二）對主席不請示不匯報，搞獨立王國。
（三）包庇壞人（如彭真主持開羅瑞卿的會，定了很多清規戒律）。彭德懷在劉的支持下，非常狂妄。一九六五年彭德懷去西南之前，他竟對彭說：「如林的身體不好，你還當國防部長。」
（四）打擊鎮壓革命左派，文化大革命中就有典型例子。
五、思想作風：
（一）唯我獨尊，一言堂，但又拿不出甚麼辦法。
（二）經常拿帽子壓人，用棍子打人，很多人說他是閻王。
（三）少奇同志的岳母是資本家，常住在少奇同志家裏，享受中央常委的待遇。少奇外出時，也帶到外地遊山玩水，這是喪失立場的事，影響很壞。
六、攻擊養病的老同志：
一九六三年五月底，少奇同志在昆明說：不做工作比甚麼錯誤都大！有無影射攻擊林彪同志，很值得懷疑。

雷八月十三日

雷英夫的材料，當晚就送到了毛家灣。林彪看後，對葉群說：「讓他用給我和主席寫信的形式，然後由我批轉，這樣做更政治化，也可避嫌。」
於是，雷英夫便另寫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林彪副主席並報主席：

聽說中央同志在主席親自領導下，正在開會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我極爲高興。這樣大的問題，關係革命前途的問題，主席和中央同志狠抓一下是最緊要的大事。

這裏，我想向您和主席報告一下有關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的問題。這幾年來我在聽報告、看文件和會議接觸中，越來越感覺到他們並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對毛主席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他們是抵觸的，甚至是反對的。爲了維護黨的最高利益，我把所知道的情況寫了材料，現送上，請閱。

另，關於王光美同志下面議論很多，我在北平執行部工作，她是一個雇員，當翻譯，我知道她一點情況，近幾年來又聽說一些情況，而且直接涉及到少奇同志，也準備寫一個材料。

敬愛的毛主席，敬愛的林副主席，我不該耽誤您們的時間，分散您們的精力，但又忍不住，也不便按級報告。所以，只好把長期壓在心頭的話，向您們報告一下。如有不妥的地方，敬請指示，我一定堅決改正。我決心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永遠當毛主席的兵，永遠爲貫徹執行和捍衛毛澤東思想而奮鬥，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林彪在雷英夫的信上批示：

江青同志，此件請閱，並請轉主席閱。

其實，雷英夫的材料，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經得起推敲的內容。而且很多都是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點了的。因此，並沒有構成「重磅炸彈」。材料呈上去後，不見有甚麼反響。眞正置劉少奇於死地的，是毛澤東和江青。

三、「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指示向劉少奇發起總攻擊。這一號令，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通過林彪之口發出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大會。林彪照例陪同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當時，林彪站在毛澤東的右邊，而劉少奇站在毛澤東的左邊。據說，這是周恩來煞費苦心的安排。因爲劉少奇是國家主席，在國慶節之時，怎能把劉少奇排在不醒目的地位呢？然而，將劉少奇安排在毛澤東的身邊，勢必會引起「中央文革」的強烈反對。於是，周恩來把宋慶齡、董必武安排在劉少奇身邊，兩人都是國家副主席。這樣一來，「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澤東、林彪也同意了。

在這次大會上，照例是林彪發表講話。今次的講話，不是毛家灣的秘書們拉出來的「條子」，也不

是林彪自己寫的提綱，而是陳伯達、張春橋兩人根據毛澤東的意思寫的，林彪只是照本宣科。

講話中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即是指劉少奇的路線。

講話中還號召：「要摧毀這條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

在事先傳閱的講話稿上，毛澤東和林彪都畫了圈。

中央常委兼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在看了講話稿後，覺得「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這個詞太兇，容易把執行這條路線的人等同「反革命」，擴大打擊面，於是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變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同意了。

林彪在天安門上發表了這一號令後，當天晚上，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敞篷汽車去天安門廣場上看烟花時，張春橋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拗口。

毛澤東說：「以後就叫『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劉少奇的罪名升級了，「欽定」了。

當時周恩來不在場，也不知道這些詳情。事後，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異議，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提『左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

毛澤東用英語作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

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

當周恩來知道這是毛澤東的意旨，便說：「我懂了。」

周恩來顯然地還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見。

就這樣，「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傳遍了神州大地。

林彪講話後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了題爲《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這篇由王力、關鋒起草的社論的主旨，就是號召全國上下總動員，「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十月六日，以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爲「司令」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集十萬人，舉行了「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

此後，「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打倒劉少奇」的新階段。

在這種形勢下，江青爲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又指使北京紅衛兵的各路兵馬，首先向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開刀。於是便發生了揪鬥王光美事件。

江青對王光美的嫉妒、怨恨由來已久。王光美作爲「第一夫人」，隨劉少奇訪問印尼、緬甸、柬埔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出現在電視、電影、報刊上的王光美，雍容華貴，出盡風頭，令江青恨得咬牙切齒。「第一夫人」明明是自己，怎麼被王光美搶去了?王光美頻頻出國，八面風光，而自己卻窩在北京，沒名沒份，江青怎能咽得下這口氣?現在機會到了，江青指使紅衛兵三番五次揪鬥王光美，使其受盡凌辱。北京城裏，「打倒劉少奇」，「打倒王光美」的大字報、大標題，滿街滿巷。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電影〈清宮秘史〉》發表。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親修改、審閱並批准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同時發表的。

緊接着，毛澤東指示在全國掀起一場「革命大批判」的高潮。這場「革命大批判」的特點是：規模空前，範圍極其廣泛，大批判的文章鋪天蓋地，從各個方面對劉少奇進行大肆的攻擊。目的是從政治上、思想上將劉少奇搞臭，用江青的話來說就是「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使他臭得比當年的蘇聯的托洛茨基還要臭」。批判文章中有些是江青等人組織、授意下寫成的「重磅炮彈」，有些是群衆組織發表的「機關槍」，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不講道理，無限上綱，扣死帽子，打死棍子，先定罪名，後湊材料，歪曲事實，斷章取義，隨意引申，任意污蔑。

在此期間，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和十二月，兩次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對劉少奇進行進一步的攻擊批判。秉承毛澤東之命，林彪於十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六日兩次發表了長篇報告，其中都有批判「劉鄧」的內容。

與江青、「中央文革」比起來，林彪的講話顯得低調而克制。作爲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副統帥」，如果他有意打劉少奇這隻落水狗，有意表現、突出自己，林彪應該、也完全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可是林彪在這場「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戰役中，仍然保持少露面、少講話的作風。林彪並不積極。

四、江青設立專案組

爲置劉少奇、王光美於死地，毛澤東和江青最厲害的一招是設立劉少奇、王光美的專案組，組長就是江青。

讀者也許不知道中共的「專案組」，是個甚麼東西，也不知道它的厲害之處。中共中央的「專案組」，是個類似明朝的「東廠」、「西廠」那樣的、令人聞名喪膽的組織。據王力回憶，「中央專案組」是與「中央文革」平等的，直接對中央常委，實際上是對毛主席負責。組長是康生，成員有中央文革小組諸位幹將（王力除外），還加上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總參謀長楊成武和葉群。江青說：「康老有延安整風的經驗，他當組長。專案組我要直接抓，戚本禹當我的秘書，具體工作由謝富治、汪東興負責」。江青多次強調：「專案組我要抓，我直接對毛主席負責」。由此可見專案組地位之顯赫，權力之無邊。

「專案」者，「專案審查」是也。其對象主要是中共的高幹和政要。在六十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高幹不同意毛澤東的路線、方針、政策，或者是有意無意中冒犯了「最高權威」，於是「龍顏大怒」，這些高幹便被加上種種罪名，遭受政治迫害。被列入專案組，就是最厲害的一招。一旦榜上有名，受害者立即被停職或撤職，並遭「隔離審查」，亦即受到軟禁。接着的便是專案組工作人員無休無止的審訊，及被勒令寫沒完沒了的檢查、交代。而且專案一經設立，就不會輕易撤銷。個人履

歷、家庭背景、親朋關係，內查外調，翻箱倒櫃，雞蛋裏挑骨頭，非要找出當局所認爲的「嫌疑」和「罪名」的證據不可。萬一實在找不出，毛澤東和中共有一個專用名詞，叫做「掛起來」。由於專案未撤，受害者既不是有罪，也不是無罪，停職和隔離審查照樣如儀。這一掛，三年五年，十載八載，叫你欲生不能，欲死也不能。其間，如果遇上甚麼政治運動，受審查者便首當其衝，舊事重提，從新來過，而且添料加碼，非要弄出個名堂來不可。因此，一被列入「專案」，這個人就是死定了，鐵完了，而且株連親朋好友，一倒一大片。

功勛卓著的彭德懷元帥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根據康生的提議，毛澤東下令將彭德懷列入專案，目標是審查彭德懷的歷史和「裏通外國」的問題。這個專案組於一九六二年成立，整整四年，沒有查出任何頭緒，但彭德懷依然不能平反。「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該專案組重新開始工作，對彭德懷進行囚禁、審查。這一審查又是八年，直至彭德懷一九七四年在囚禁中病逝，這個專案還未撤銷。專案組共成立了十二年，像一頂「緊箍咒」，將彭德懷折磨至死。

現在，劉少奇和王光美被列入「專案」，而且專案組的組長是江青，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命運可想而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應劉少奇的請求，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劉少奇。劉少奇向毛澤東提出：

「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

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聽罷，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烟。

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勸劉少奇認眞讀幾本書，如德國動物學家海洛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狄德羅的《機械人》。

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最後一次談話。

談畢，毛澤東送劉少奇到門口，叮囑他道：「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劉少奇回家，面帶喜色地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眞學習，保重身體」，因而以爲並沒有徹底打倒自己的意思。

劉少奇這位愚鈍的政治家，那裏知道他和王光美的專案組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已經偷偷成立了。

對一位中央常委和國家主席進行專案審查，既不經過中央常委，也不經過中央政治局，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而且，與毛澤東的會見才兩天，受江青和戚本禹的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造反派就衝進劉少奇家中，要劉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張桌子上接受批鬥；同時，劉少奇的文件被收繳，電話線被扯斷。從此，劉少奇失去與外界的聯繫。

當時，中共黨內沒有一個人爲劉少奇打抱不平。倒是黨外人士章士釗大義凜然，於一九六七年三月

初上書毛澤東。章士釗對女兒章含之說：「這個運動再搞下去，國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劉少奇！這些傢伙要把中國毀掉」。「我要給毛主席寫信，請他制止打倒劉少奇，毛劉分裂就會使國家分裂。」

章士釗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

毛劉團結乃共産黨領導核心堅強的象徵。假若劉少奇同志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做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

章士釗一片正義、誠懇之心，躍然於紙上。

然而，章士釗太不了解毛澤東了。毛澤東於三月十日給章士釗回了這樣一封信：

行嚴先生：

惠書敬悉。爲大局計，彼此同心。個別人情況複雜，一切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敬問吉安。

毛澤東　三月十日

三月間，毛澤東還派人把當時江青整理的有關劉少奇的材料送給章士釗閱讀。章士釗看後，接連數日，情緒低落，對章含之說：「劉少奇同志的這些『罪狀』，純系蓄意致他於死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在審問江青時，有如下記錄：

審判員審問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揮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這個專案組裏。」

法庭宣讀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謝富治在「王光美專案組」報告上的批語：「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

法庭還宣讀了原中央專案小組一辦公室副主任兼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組長肖孟的證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注：應爲六月）劉少奇、王光美的專案組剛成立時，康生、謝富治在中南海西樓一次專案組負責人會議上宣佈，劉、王專案組由江青負責，其領導成員還有謝富治、戚本禹等。康生雖沒有列爲該專案組領導成員，但他是直接插手這個專案的，經常出謀劃策。」

法庭兩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見中國京劇團等單位的講話錄音。其中有江青說：「我現在負擔着第一個大專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個小時，……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太惡劣了……我覺得，他應該千刀剮，萬刀割……」

被告人江青聽了播放的錄音後說：「沒有甚麼要説的。這是我對藝術家們談別的問題，大概插了這麼一段。

五、欲加之罪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江青在專案組中首先製造了「王光美是美國戰略情報大特務」。江青將原輔仁大學中與王光美沾邊的一干教授、職員，都抓來審問。

接着江青伙同康生又製造了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罪狀。

那是一九三六年，劉少奇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在天津工作。當時，有一批共產黨重要幹部，包括安子文、薄一波等共六十一人被捕，關在獄中。考慮到抗日烽火將起，需要幹部，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提議，讓獄中幹部履行國民黨規定的「自首」手續出獄。劉少奇將此建議報請中共中央。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批准了這一決定。於是安子文等人「自首」出獄，重新工作。後來，中共「七大」、「八大」均審查過此事，作出「本人不能負責，符合代表資格」的結論。

三十年後，康生伙同江青將此事翻出來，認爲借此能給劉少奇安下一大罪狀，於是向毛澤東報告。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說這是「劉少奇的招降納叛路線。」

江青又覺得，光給劉少奇加上「招降納叛」的罪名還不夠，最好是給劉少奇本人也戴上一頂「叛徒」的帽子。於是，江青指示專案組仔細捉摸劉少奇的歷史。專案組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劉少奇一九二九年曾在瀋陽被捕。於是，「叛徒」的帽子便「自然而然」地戴到劉少奇頭上。

為了取得「證據」，專案組於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將與劉少奇一同被捕入獄的孟用潛「隔離審查」，在專案組一連七天的連續威迫審訊之下，孟用潛違心地講了劉少奇被捕後叛變的話，但第二天就申訴推翻了。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孟用潛共寫了二十次申訴，否定自己被迫而講的話，但江青不予理會。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潛寫的申訴信中說：「一九二九年在瀋陽被捕，我沒有叛變，在隔離審查過程中，我確實也交待過劉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後的叛變罪行。但是這些交待都是編造的，並沒有事實根據。」

專案組人員當面撕毀了孟用潛的五份申訴材料，還威脅說：再申訴就以現行反革命論處。除孟用潛外，當年一些在滿州省委工作的幹部也受到株連，拘捕，受審，逼他們作僞證。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個專案組會議」上說：「要審訊，死就死！」「要狠狠地鬥，集中火力，幾個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鬥。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閻王爺請他喝燒酒！」

經過如此二年的「苦鬥」，江青（當然包括毛澤東）給劉少奇戴上了「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三頂帽子。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上批示：「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

江青也學林彪，用了一連串的「大」和「最」，來突出自己的「極左」和「最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在這份《審查報告》上批示：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向出色的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對林彪這個批示，可以有兩種解釋：

其一是：林彪附和江青，陷害劉少奇；

其二，林彪有意表明：這個《審查報告》是江青一手包辦泡製的，與我無關。

看來，林彪眞正的心思是兩者均有之。在當時的情況下，林彪不可能不贊同江青的批示。值得注意的是，林彪沒有像江青那樣發一番無產階級的義憤，也沒有再寫一個上綱上線、增加罪名的文字。林彪將界線劃得很清楚，將自己也洗刷得十分乾淨。

六、劉少奇之死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批准了江青等人用　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舉着《審查報告》說：「不要小看這麼一本，裏面做了許多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這個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幾乎每天都找她，搞出這一本審查報告，就要叫劉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劉少奇本人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聽到十二中全會決議的。選擇這一天，是因爲那是劉少

奇七十歲的生日。

聽罷決議，劉少奇發燒到四十攝氏度，陷入顛瘋狀態，見東西就抓。護士見狀，便將兩個塑料瓶給他。劉少奇將瓶子緊緊地抓在手中。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據林彪的「一號命令」，劉少奇被押解到河南開封。那時劉少奇身患重病，鼻子裏插着鼻飼管，喉嚨裏插着吸痰器，身上紮着輸液管，白蒼蒼的頭髮、胡子長達一尺多！他全身赤裸，沒有穿衣服，僅用棉被一裹，抬上擔架，送上飛機。

初冬的寒氣，加上疏於照料，使劉少奇着涼，併發肺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時四十五分，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慘死在開封獄中！

死時，劉少奇雙手還緊緊地抓着塑料瓶——它們已被捏得變成葫蘆狀！劉少奇帶着多少的怨恨離開這個世界！

當天深夜，劉少奇的遺體被抬上一輛吉普車，送去火化，他的腳都露在車外！

專案人員在火化單上這麼塡寫：

姓名：劉衛黃　職業：無業　死因：病死……

至於王光美，江青建議處於死刑。但毛澤東說：要留下活證據。於是王光美保下一條命。讀者謹記，毛澤東可不是出於仁慈。

劉少奇之死，誰是「罪魁禍首」？

第六章　毛林勾結之二：迫害賀龍

一、遲開的追悼會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已經被癌症折磨得九死一生的周恩來，從醫院來到八寶山，帶病參加賀龍元帥的骨灰安放儀式。周恩來忍着病痛，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周恩來說：

「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賀龍同志幾十年來爲黨爲人民的革命事業曾作出重大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爭年代，或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賀龍同志是個好同志！」

「賀龍同志是個好同志」這句話，四十八年前，周恩來曾經講過一次。那是一九二七年，在南昌起義後南征的路上。當時賀龍擔任南昌起義部隊的總指揮，周恩來則任前委書記。八月二十七日，會昌戰役勝利之後，賀龍加入中國共產黨。簡單而隆重的入黨儀式，在瑞金舉行。周恩來出席了這次儀式，並在會上發表了深情的講話。上面那句話便是在這次講話中講的。

與朱德、陳毅一樣，周恩來與賀龍具有深厚的戰鬥情誼。在中共黨內，周恩來、朱德、陳毅、賀龍、葉劍英、劉伯承等，被稱爲「南昌起義派」（以毛澤東爲首的則是秋收起義派）。作爲這一派的首

領，周恩來抱着病入膏肓之軀，堅持出席了賀龍的追悼會。周恩來身體瘦削，面容憔悴，神情沉痛而悲憤。周恩來撫着賀龍夫人薛明的肩膀，聲音顫抖地說：「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說着眼淚刷刷地流了下來。賀龍之子賀曉明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呀！」周恩來緩緩地說：「我的時間也不多了。」說罷，會場中響起了一片痛哭聲。

賀龍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就遭到了迫害。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這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戴着「大軍閥」、「大土匪」、「三反分子」的大帽子含冤去世。那時候，沒有花圈，沒有哀樂，也沒有同志和戰友，一條床單覆蓋着賀龍那碩長的身軀，只有夫人薛明帶着女兒到醫院匆匆地看了一眼，就被帶走。賀龍，這位蓋世英雄孤零零地黯然上路。

整整六年後，賀龍才得到平反昭雪，才能在八寶山公墓舉行這個追悼會。這是晚了六年的追悼會。然而，這個追悼會在當時卻不准見報，全國大小報刊沒有發表一個字的消息——這是留有尾巴的、不徹底的平反，這也就是周恩來悲憤的原因所在。

賀龍爲甚麼會有如此的遭遇？他的追悼會爲甚麼晚了六年才開？其中的奧妙只有兩個人才知道。這兩個人就是毛澤東和林彪。

二、訪蘇惹禍根

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賀龍是積極地執行毛澤東的意旨，猛烈地批判彭德懷的其中的一個。

會後，毛澤東改組中央軍委，任命林彪爲國防部長、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軍委工作。而賀龍則被任命爲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

一九六二年秋，葉群向中央匯報：林彪因指揮部隊入閩，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澤東當即決定，在林彪養病期間，由賀龍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毛澤東還多次向總参謀長、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說，要多向賀龍請示工作。

看來，毛澤東對賀龍還是頗爲信任的。

然而，一次去蘇聯的訪問，令到賀龍惹上殺身大禍。

一九六四年，蘇聯的赫魯曉夫下台了。

當時，赫魯曉夫在黑海邊的契索渡假。在莫斯科的副手勃烈日涅夫伙同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發動宮廷政變，將赫魯曉夫趕下台，由勃烈日涅夫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當年十一月，以周恩來爲團長、賀龍爲副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被邀請赴蘇，參加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慶祝活動。七日晚，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舉行國慶宴會。在宴會上，馬林諾夫斯基進行挑釁活動。祝酒時，他向穿着漂亮的元帥服的賀龍說：「賀龍同志的元帥服很漂亮，這已經不像當年的布棉襖了！」

賀龍回答：「還是當年的棉衣好，我捨不得它。」

馬林諾夫斯基說：「我也認爲棉衣好，元帥服是浮華虛飾。我們的元帥服被斯大林玷汚了，你們的元帥服也被毛澤東玷汚了」，接着又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會把毛澤東搞掉，只是時間未到。」

賀龍聽後勃然大怒，說道：「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兩件事，我們黨和你們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能實現的，而且是錯誤的。」

隨後，賀龍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聽到後十分憤慨，馬上找來米高揚，說馬林諾夫斯基胡說八道。米高揚當即表示：「這絕對不代表我們的路線，他多喝了幾杯酒，才說了那樣的蠢話。」

第二天，勃烈日涅夫等蘇共領導人拜會中國代表團時，周恩來又提出鄭重的抗議。蘇共領導再次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周恩來道歉，並一再聲明：這決不代表蘇共中央主席團的看法，還讓馬林諾夫斯基向中方正式道歉。

周恩來表示：你們說馬林諾夫斯基是酒後失言，我們認爲是「酒後吐眞言」，他反映了一部份人的情緒，決不是一件小事。因此，必須在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談及其他問題。不久，周恩來率領代表團提前回國，以示抗議。

由於周恩來和賀龍在這次出訪中，維護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毛澤東的尊嚴，所以，代表團回到北京時，毛澤東破例地親自到機場迎接周、賀一行。毛澤東這一舉動，一方面是要向蘇共新領導表明中共領導層是團結一致的，另一方面，也是對周恩來、賀龍在蘇聯的表現十分滿意。

滿意歸滿意，但是這件事對於患了懷疑狂，對誰也不信任的毛澤東的心裏，還是留下了濃重的陰影。勃烈日涅夫搞掉赫魯曉夫，得助於軍方的大力支持，毛澤東不禁對自己的「軍方」人士也產生警惕。「馬林諾夫斯基如此猖狂挑釁，對毛澤東有何影響與影響大小，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此後作出了北京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的估計。毛澤東問過軍隊和地方的幾位領導同志：『如果北京發生政變，你怎麼辦？』作出這樣不符合事實的災難性的估計，無疑與『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有着關

聯。」（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出於對「軍事政變」的憂慮，毛澤東在國內政策上的第一個反應，是聽信和同意林彪的誣告，肅整了羅瑞卿大將。這其中，「馬林諾夫斯基因素」，占了重要的地位。一九六六年五月，總政主任蕭華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指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會議）後，毛主席又問許世友同志：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

毛澤東與許世友談話時，羅瑞卿已倒台，而林彪又是毛澤東十分信任的「政治盟友」。那麼毛澤東還懷疑誰呢？這個被懷疑的對象，就是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上海會議撤消了羅瑞卿所有職務的同時，毛澤東也不再讓賀龍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賀龍已失去毛澤東的信任。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最近這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眞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爲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三、林、賀之間的恩怨

林彪與賀龍之間，也存在着歷史的恩怨。那是在延安時代。

葉群在赴延安之前，曾在南京國民黨控制的電台當廣播員，與國民黨一些官員有過來往。好出風頭的葉群，還參加過國民黨C·C派搞的學生「演講比賽」，並獲得了第一名。葉群頭腦靈活，能說會道，是個活躍人物，與C·C派的外圍組織有往來。

恰巧，賀龍的夫人薛明與葉群是同學，當時在南京從事地下工作，對葉群的所作所爲一清二楚。一九四二年延安搞「搶救運動」時，薛明把葉群在南京時與國民黨的密切關係揭發出來，她還向葉群開門見山地說：「你應該如實地向組織交代清楚這段活動。」

當時，林彪和賀龍一起在重慶參加與國民黨的會談，不在延安。葉群有難而無人搭救，只有大哭大鬧，說：「有人趁着林彪不在延安，有意陷害我。」

看到葉群蠻不講理，薛明更加氣憤，她寸步不讓，硬是把葉群拉到中央組織部，找到組織科長王鶴壽，將葉群的問題一五一十地都講了出來。葉群沒有辦法，只好向黨組織交待了自己的問題。

過了一段時間，賀龍和林彪都回到了延安。有一天，賀龍與林彪相遇。性格耿直的賀龍對林彪說：「你老婆有問題，是薛明揭發的，揭發得好啊！」賀龍拍拍林彪的肩膀，笑着說：「我老婆有問題，你

老婆也可以揭發嘛，要提高警惕啊！」

林彪臉色陰沉，不自然地看了看賀龍，一聲不吭。愛記仇的林彪，默默地在心頭上記下了這筆帳。

直到二十多年後，林彪和葉群還記得這筆帳。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誣告羅瑞卿。爲了拉攏賀龍，取得賀龍的支持，林彪和葉群對賀龍和薛明表現了罕有的熱情。有一次，葉群摟着薛明的肩膀，甜言蜜語地說：「我們像姊妹一樣，你以前說了我那麼多的壞話，我也不恨你，只要你今後別再講了，我也就既往不咎。」

在批判羅瑞卿的會議期間，林彪還專門派葉群去看望賀龍。葉群說：「林總很關心賀老總，要我來代爲問好」。又說：「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人民日報》上刊登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民主傳統》一文，是林總決定用賀老總名義發表的，因爲林總考慮到賀老總在工作中的威望高，特別是近幾年來在國防建設上有功。」對葉群的表演，賀龍還於一個不冷不熱。

對權力具有強烈慾望的林彪，在工作上與賀龍也結下了仇怨。

一九六二年，林彪有病休息後，毛澤東指令賀龍主持軍委工作，並要羅瑞卿多向賀龍匯報工作。

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林彪通過秘書打電話給羅瑞卿，說：「現在身體不好，比較困難考慮軍隊問題，養好身體再說，讓第一線的人放手工作，不要過多考慮我的意見。一般問題辦公會議決定，重要的問題由軍委常委討論，更重要的事請示中央、主席。」

之後，賀龍積極地負擔起軍委的工作，幹得有聲有色。

一九六四年全軍的「大比武」運動，就是葉劍英提出，賀龍和羅瑞卿組織和策劃的。當年六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比武表演大會上，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眞等中共中央領導人，

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中央各部委負責人都出席了表演大會，場面極其隆重而熱烈。宣傳媒體大肆報導，還拍了電影紀錄片。賀龍和羅瑞卿等人圍繞在毛澤東身邊的鏡頭，頻頻地出現在銀幕上，造成了廣泛的影響。

由於主持軍委工作，賀龍還代表解放軍，時常參加一些外事活動，以及出國訪問。有關這方面的新聞報導和圖片介紹，常見於報端。

賀龍在抓好解放軍的工作的同時，還在他負責的國家體委內大力推廣「突出政治」、「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一九六四年，乒乓球運動員徐寅生發表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將毛澤東思想用於打球上的體會，賀龍看後，加了長長的批語，轉報中央。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將徐寅生作爲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一個典範，向全國宣傳、推介。一時間，賀龍的聲望直線上升。

這一切都使得自尊心極強的林彪產生不滿和妒怨。

於是，從毛家灣那裏傳出來種種怪話：

有幾次，葉群打電話給羅瑞卿，說：「總長啊，我們這裏是個病人，又不會陪你釣魚，打麻將，你還是多來一點吧！」

這裏說的釣魚，是指賀龍。賀龍喜愛戶外活動，打獵、釣魚、爬山，無所不好。有一次賀龍和羅瑞卿都在廣州，賀龍拉着羅瑞卿一起去釣魚。羅瑞卿說：從那以後學會了釣魚。事情不知道怎麼的傳到毛家灣那裏，葉群便拿來對羅瑞卿旁敲側擊。

還有一次，林彪對羅瑞卿說：「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爲我們不是南昌暴動的領導人。」

羅瑞卿聽後，不大明白林彪的意思。後來，總政主任蕭華解開了這個謎。蕭華對羅瑞卿說：「林總

是不是覺得你和賀老總接觸太多，同旁的元帥接近得太少了？」

由於工作上的需要，羅瑞卿與賀龍的接觸的確多了。有很多問題羅瑞卿直接請示賀龍，而沒有向林彪報告。對此，材彪不但對羅瑞卿不滿，更遷怒於賀龍。林彪曾多次說：「他大捧別人」，「大跟別人」，「讓他做絕」

林彪說的「別人」就是賀龍。

舊怨加新仇，使賀龍成爲林彪的政敵。

四、羅織罪狀

一九六六年八月，剛剛榮升爲「副統帥」、「接班人」的林彪，首先向賀龍發難。在林彪的授意下，吳法憲、李作鵬先後寫了誣陷賀龍的材料，由林彪轉呈毛澤東。

接着，葉群找來了軍委警衛處處長宋治國，軟硬兼施，動員他寫揭發賀龍的材料。下面是宋治國寫的揭發材料的一部份：

敬愛的林副主席：

結合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大字報、十一中全會的精神的傳達，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我覺得有些事，情況很不對頭，爲避免發生對保衛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不利的事，我再

次向林副主席報告幾點：

一、我覺得賀龍與羅瑞卿、彭真、楊尚昆來往很爲密切。經常密談，聽說，賀龍與薛明結婚，就是彭真介紹的，後來薛明又將跟她在一起工作的一個人介紹給賀龍的外甥廖漢生。這個人是楊尚昆的親戚。

二、常去他家的人，神態也不正常，特別是羅瑞卿、彭真問題發生後，他們很緊張。在空軍、海軍、地方上到處拉人打橋牌，牌桌上無話不說，許多工作在牌桌上決定。羅瑞卿問題揭發後，他們一伙裏的人還給賀龍送去一大筐桔子。

三、體委榮高棠天天去賀家，萬里也常去密談、吃、喝、玩、樂、釣魚。柯慶施在上海開刀後，被賀龍拉到西南養病，整天打牌、釣魚。不久累死了。他們又多方安撫柯的家屬，使她有話說不出來。

這些情況，我很擔憂，疑慮。爲了保衛毛主席的絕對安全，特向您們報告我知道的一些情況。

宋九月十三日

之二

……賀本人的房間裏保管一支手搶，晚上睡覺壓在枕頭底下，外出帶上，不知爲甚麼？

他還讓身邊的警衛人員帶上步槍和機槍，並讓每天帶在身上，這也不知爲甚麼？

賀龍經常到警衛分隊去打撲克，扯亂談，這是在拉攏部隊，也不讓調換。

過去出去要「跟車」，現在對警衛處跟車不滿，懷疑心很大。因爲怕出事，我就趕寫出來。我認爲這是不正常現象！

宋九月十九日

之三

賀家有槍：八音手槍一支，子彈二十發，白郎寧手槍一支，子彈二十發。十二號獵槍一支，子彈一千零三十七發。六號獵槍一支，子彈一千九百八十九發。

宋九月二十一日

之四

……羅瑞卿的家裏，辦公桌子下面，是賀龍全家的照片，羅瑞卿天天看，但沒有毛主席的照片。聽説怕人發現，有客人去，他們還拿東西掩蓋住。

賀龍到現在還保留着他在舊軍隊時的照片。

宋九月二十二日

這時，社會上廣泛地流傳着「二月兵變」事件。那是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一些師生杜撰出來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寫大字報揭發二月間有人要在學校駐兵。北京本來就被毛澤東和林彪搞得疑神疑鬼，這些大字報一貼出，便迅速傳遍北京城，傳遍全國。

事情馬上傳到康生及「中央文革」那裏，康生在聯絡員寫的匯報材料上批示：「二月兵變」確有其事！

半個月後，康生又在北京師範大學的羣衆大會上宣布：在今年二月底、三月間，北京市長彭眞這個大黑幫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他們計劃之一，就是把北大、人大每一個學校都駐上一個營。這個事情是千眞萬確的，而且在北大和人大看過房子，這件事是包含極大的陰謀。

在謠言傳得沸沸揚揚之際，鄧小平曾特意到中國人大去闢謠。他在一個羣衆大會上說：我告訴你們，沒有這回事。我們的軍隊，彭眞調不動，我調不動，總理也調不動。

可是，「二月兵變」還是很快就「上達天聽」。作爲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很清楚彭眞根本調動不了軍隊，雖說他是北京市市長，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但他在軍隊沒有任何權力，不要說一個營，就是一兵一卒他也調不動。那麼是誰策劃這次「二月兵變」呢？疑心頗重的毛澤東根據邏輯推理，很快就把矛頭指向賀龍。因爲只有賀龍才具有調兵的權力，加上「馬林諾夫斯基」事件，毛澤東認爲賀龍的嫌疑最大。

得到毛澤東的訊息，康生趁機煽風點火，把謠言無限擴大，危言聳聽地說：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還修了堡壘；賀龍與蘇聯共謀推翻毛主席的領導；賀龍在體委陰謀組織政變隊伍，給體委發了槍、炮，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對准中南海；海軍空軍都有他的國防俱樂部，還有無線電俱樂部。等等。

江青也不甘落後，四處散布說：賀龍身上有槍，要搞「二月兵變」。她還在清華大學的羣衆集會上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要把賀龍端出來！」江青還把紅二方面軍戰史編委會誣蔑爲「賀龍裴多菲俱樂部。」

像對待其他的黨內鬥爭一樣，毛澤東對賀龍也採用了兩面手法。

據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九月上旬，林彪主持召開了一次軍委常委會議，說是奉主席指示，就賀龍問題打一下招呼。林彪說，有證據表明，賀龍有野心，想在軍內伸手奪權，他列舉了總參的大字報以及駐京一些軍事機關發生的一系列『炮打』事件，說這都與賀龍有關」（見《毛家灣紀事》）。

有關的專家分析，毛澤東的指示應該是確有其事的，因爲在當時，在關於「最高批示」的問題上，林彪還不敢在那樣的場合弄虛作假。

在授意林彪「打招呼」的同時，毛澤東卻在九月十四日接見了賀龍。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會客室裏，毛澤東穿着睡衣，把桌子上的吳法憲寫的材料交給了賀龍。賀龍沒帶眼鏡，看不清楚，毛澤東便說：「不要急，慢慢看。」當賀龍看完之後，毛澤東望着賀龍那張帶着怒色的臉，和顏悅色地說：「你不要緊張，我對你是瞭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講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聯系羣衆。」聽到這幾句話，賀龍的怒氣消了，他說：「我去找吳法憲談談吧！」毛澤東說：「有甚麼好談的，你不能找他們，不能承認上面講的事情。你放心，我當你的保皇派！」毛澤東哈哈笑着。

幾天之後，九月十九日，毛澤東再次接見賀龍。賀龍剛一進屋，毛澤東就說：「問題解決了，沒事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

賀龍首先要「登門拜訪」的是林彪。

賀龍和林彪談了些甚麼，沒人知道。有一些揣測的記述，在這裏就不引述。據林彪秘書記述，這次會見是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舉行的。「等了一會，賀龍進來了。林彪迎上前去，與客人握手寒暄後，分別在沙發上坐下。內勤去給客人送了一碗茶水，很快退了出來。賓主談話開始，氣氛平靜如常」。「客

人從容而來，平安而去。」（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

然而，賀龍的厄運並沒有過去。

這期間，林彪收到武漢軍區空軍的一位副司令員轉來的一封信，那是三十年代在肅反運動中被共產黨的一位幹部夏羲殺害的紅軍著名將領段昌德的未亡人寫來的揭發信，信中指控賀龍在湘鄂西時跟國民黨有勾結，段昌德被殺害和賀龍有關。這就是所謂的「通敵問題」。

林彪很快地將這封信轉給毛澤東。毛澤東的反應不得而知，然而，賀龍的處境卻迅速惡化了。

「通敵問題」對賀龍的倒台起到甚麼作用，從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爲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可見一斑。《通知》中平反的第一項問題，便是這件所謂的「通敵」問題。

毛澤東已不再當賀龍的保皇派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我對賀龍原來是要保的，現在看來不能保了。」

五、賀龍蒙難

針對賀龍的政治迫害，是從一九六六年年底開始的。

首先發難的是獲悉毛澤東的眞正意旨的江青。

江青指使紅衛兵、造反派抄了賀龍的家，並要揪鬥賀龍。賀龍成爲繼彭、羅、陸、楊後第五個鬥爭

大目標。北京街頭上批判賀龍的大字報滿目皆是，宣傳車的高音喇叭發出的「打倒賀龍」、「把賀龍揪出來」的口號聲，響徹京城的上空。在這種情況下，賀龍被迫到處轉移，但賀龍每到一處新地方，馬上就有人趕來揪鬥。偌大個北京城，已容不下一個賀龍了。

就在這時，周恩來將賀龍接到中南海西華廳自己的家裏住下。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不能見（指見造反派），有甚麼事我頂着。」

但不久後，周恩來也頂不住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周恩來告訴賀龍：「我本來想讓你住在中南海，但現在中南海也有兩派，連朱老總家的箱子也被撬了。為了你的安全，另外給你找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來。」

一月十九日凌晨三時，周恩來派人將賀龍和薛明秘密地送到北京郊外的山區，住進一所山腰間的平房內。

開始倘平安無事，賀龍和薛明過着安靜而無聊的日子。當時，賀龍對毛澤東還抱有希望，他對薛明說：「我相信黨和人民是瞭解我的，毛主席總有一天會說話的」。賀龍還針對林彪、江青一伙的誣蔑，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信，就參加南昌起義，湘鄂西肅反、槍斃熊秉卿（即所謂通敵問題）及其他一些歷史問題作了詳細的反映，但沒有任何回音。後來隨着形勢的發展，賀龍越來越意識到，問題不單只在林彪那裏了。「有一天，他（指賀龍）用手指着毛主席和林彪的像對薛明說：『現在已經不是這個人（林彪）的問題，而是這個人（毛澤東）的問題了。只要毛主席說一句『賀龍沒有問題』，事情就完結了。我相信，毛主席總有一天會說這句話的』。可惜，賀龍生前毛主席沒有說這句話。」（見《訪顧永忠——毛澤東與賀龍》。

一九六七年夏天，林彪、江青一伙查到賀龍的住處，迫害又來臨了。開始是將賀龍和薛明床上的被褥、枕頭全部取走，在一段時間裏，賀龍只好睡在光床板上，用手臂當枕頭。

在伙食上，也開始刁難。飯裏的砂子太多，賀龍抽的烟也斷絕了。

接着，水的供應也斷絕了，有四十天賀龍夫婦沒有水，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水，連喝都不夠，更不能洗臉、漱口、洗澡了。薛明只好偷偷地接雨水來喝。

賀龍有糖尿病，他需要服的藥也被沒收了。後來，本來就很差的伙食，變得更少，更壞了。賀龍夫婦陷入飢餓當中。

殘酷的摧殘，使七十一歲的賀龍身體越來越衰弱。他面容消瘦，高大的身軀經常站立不住，步履艱難，連上厠所也走不動。飢餓還使他坐立不安，神情恍惚。

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賀龍發生連續嘔吐，呼吸急促，周身乏力。監護人員遲遲不給治療。六月九日醫院派來醫生，要接賀龍去住院，賀龍表示不願去。他說：「我沒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但監護人員堅持要賀龍住院，並聲稱這是「組織的決定，非去不可」。接着一幫人七手八腳地把賀龍抬上擔架，送上救護車。薛明緊跟在後面想擠上車去，但是車子開走了，車影消失在視野裏。

六小時後，醫院派人把薛明接去，一個專案人員冷冰冰地向薛明宣布：「人已經死了！」

賀龍，這位樂觀豪邁，生龍活虎，令敵人聞風喪膽的革命家，那顆被敵人懸紅十萬大洋的頭顱，沒有被敵人砍去，現在卻死於中共自己人的陰謀詭計之下。

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下午三時零九分。

六、毛澤東的「平反」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逃後，周恩來對賀龍的問題進行復查。經過許多周折，周恩來在十一月終於找到了薛明的下落，並派人到貴州，將她接回北京。周恩來說：「賀龍同志生前最後一段時間，只有你一個人在他身邊，他都說了些甚麼，希望你原原本本寫下來，報告黨中央。」

一九七三年二月，毛澤東在中南海對張春橋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龍把他殺了」，又說「我有缺點，聽一面之詞。」但張春橋沒有將毛澤東的話向中央匯報傳達。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參加中央軍委的會議上，毛澤東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當時我對他說，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的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與鄧小平的一次談話中說：「要給賀龍平反」，「賀龍恢復名譽搞好了沒有？不要核實材料了。」鄧小平立即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談話。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發出爲賀龍恢復名譽的通知，全文如下：

賀龍同志原任黨的八居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林彪要整

賀龍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賀龍同志歷史上曾向國民黨反動派「請求收編」，和「陰謀篡軍反黨」等問題，要進行審查。中央當時認爲，把賀龍同志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於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以前，對賀龍同志問題的審查，一直爲林彪、黃永勝、吴法憲、葉群、李作鵬等人所把持。他們捏造事實，隱瞞真象，以欺騙和封鎖中央，誣陷賀龍同志歷史上「通敵」和「篡奪軍權」。「九·一三」以後，中央直接對賀龍同志的問題進行了審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緊給賀龍同志作出結論，予以平反，恢復名譽。經中央查證甄别：

一、所謂「通敵」問題，完全是顛倒歷史，蓄意陷害。事實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蔣介石曾派反動政客熊貢卿「游説」賀龍同志，企圖「收編」。賀龍同志發覺後，報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經分局決定，將熊貢卿處決，並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將此事經過報告了中央。

二、所謂「陰謀篡奪軍權」和支持軍隊一些單位的人「篡奪軍權」的問題，經過調查，並無此事。

三、關於所謂賀龍同志搞「二月兵變」的問題，純係訛傳。

賀龍同志已於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病故。

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幾十年來爲黨爲人民的革命事業曾作出重大的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爭年代，或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

因此，中央決定，對賀龍同志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中央的這個通知，印發到縣團級，並口頭傳達到黨內外羣衆。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就在賀龍逝世六周年的這一天，周恩來出席了賀龍骨灰安放儀式。就在這個儀式過後不久，江青「四人幫」就說：這是「用死人壓活人」，「是右傾翻案風的典型」，妄圖把平反了的賀龍的冤案再翻過去。

如果說賀龍是被林彪一伙害死的，那麼江青「四人幫」爲甚麼對賀龍平反那麼反感，耿耿於懷呢？林彪已經死了，用死人壓活人，這個活人是指誰呢？

毛澤東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說到「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時，下面接着說：「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

「高級將領中一些人喜歡玩弄小手槍，本是司空見慣。而毛澤東在爲他（指賀龍）平反的時候，竟加了這麼一句話。從這裏可不可以看出一點眉目呢？」——（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第七章　林彪與江青

林彪與江青的關係，是林彪與毛澤東關係的影子。

林彪與江青在歷史上並無交往，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澤東的主宰和牽線下，出於共同的利益，林彪和江青走到一起來了。

提起林彪與江青的關係，人們都會想到「狼狽爲奸，一丘之貉」八個字，尤其是在「四人幫」倒台後，林彪和江青各代表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在一九八〇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大審訊中，稱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更使人想起他們像是一雙龍鳳孽胎。而孕育他們的，便是毛澤東。

其實，由於林彪與江青代表了不同政治集團的利益，他們在合作之後，還有許多的矛盾與衝突，還有許多的分歧與鬥爭。因此，對林彪與江青的關係，應當加上「爾虞我詐，互相傾軋」八個字才算全面。

一、互相利用

在毛澤東的導演下，林彪與江青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合作，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搞的《林

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本書對此已有專題記述，在這裏不再贅述。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與江青展開全面合作。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林彪誣陷賀龍爲「土匪」，「搞顚覆活動」；江青緊接着便在各種羣衆集會上大講賀龍是「壞人」，是「大劊子手」，「要把賀龍端出來」；

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爲了要找回她請鄭君里轉給唐納而尚未轉出去的信，江青與葉群密謀，指使吳法憲、江騰蛟到上海非法搜查鄭君里、趙丹等四人的家，搜回幾大包有關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醜惡歷史的材料，葉群、江青一起在毛家灣燒毀；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不經軍委常委同意，個人以軍委名義下令，聘請江青爲「全軍文化工作顧問」；

而江青投桃報李，讓葉群以「林彪聯絡員」的身份列席「中央文革」會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爲了搞亂軍隊，江青叫嚷：「軍隊那些走資派爲甚麼不揪」？跟着，林彪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江青看到文件的稿樣後，十分高興，大叫「趕快送林副主席審批」；

林彪看到立即批示：「完全同意」。

一九六七年一月，江青爲首的中央文革要打倒「異己分子」、中央文革副組長劉志堅，原因是劉志堅與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幾位老帥關係密切。一月四日，江青、康生爲首的「中央文革」一齊上陣炮轟劉志堅。不久後林彪發話：「劉志堅犯了大錯誤，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在軍隊的代理人。他發表了不正確的指示。撤銷工作組，本來他同意陳伯達同志的意見，以後又反對。」於是劉志堅被打倒。

一九六七年一月，軍委文革小組改組，林彪個人以軍委名義任命江青爲全軍文革小組顧問；

江青還指使葉群迫害孫維世，致使孫維世屈死獄中。江青對葉群說：「趁現在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個仇人，你有甚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一九六七年八月，林彪與江青合謀，向毛澤東先斬後奏而成立「軍委看守小組」，葉群名列第三，位居老帥們之上；

同月，江青與葉群密謀，修改攻擊解放軍報社負責人趙易亞的大字報，並且布置吳法憲找人抄寫張貼，派人奪取瞭解放軍報社的領導權；

一九六七年年底，由於陳伯達、江青的推薦，葉群成了代行中共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職權的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與葉群密謀，指派吳法憲將三十年代在上海照顧江青生活的女傭人秦桂貞騙到北京，江青又指使吳法憲捏造罪名，將秦桂貞關押七年之久；

同月，江青要求將自己的行政級別提高，周恩來不同意；林彪得知後，下令將江青的行政級別，一下子由九級提高到五級；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她擔任組長的劉少奇專案組編造、整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審查報告》，江青在報告上寫上一段批示：「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危險、最兇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這份《審查報告》後，批示道：「向出色的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二、互相吹捧

林彪還大肆吹捧江青。

除了在《文藝座談會紀要》中那著名的兩句：「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很內行」之外，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軍隊幹部大會上，林彪說：

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很傑出的女同志，也是我們黨內女幹部中很傑出的女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感情，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並採取措施。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麼好，大家不瞭解她，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就看出她偉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實地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創造性，能夠看出問題，發現問題。文化大革命中間樹立了許多豐功偉績……她始終站在這個運動的最前線。

林彪這段講話對江青的吹捧，要比在《文藝座談會紀要》中強烈得多。但是在人民大會堂現場聽到林彪講話的秘書注意到，林彪吹捧江青時有意壓低了調子。按照葉群事先劃好的框框，應當把江青吹捧成「無產階級革命家」。但林彪沒有這樣講。看得出，林彪的吹捧已是很勉強的。

在林彪講話的時候，葉群在大會上帶頭喊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

「向江青同志致敬！」

「誓死捍衛江青同志！」

在當時的政治大氣候下，吹捧過江青的，不止林彪一人。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當過江青的「喇叭手」。與林彪比起來，他們的吹捧有過之而無不及。

江青回報林彪的，除了高喊「誓死保衛林副主席！」「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之外，還在「九大」前後，加緊了互相勾結和利用。

江青爲了在「九大」時實現當上「黨的副主席、中央常委和中央組織部長」的野心，拼命拉攏和吹捧林彪，以希望得到林彪及其集團的支持。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江青極力鼓吹要把林彪作爲接班人寫在黨章上。她說：「林彪同志很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度」，「他那樣謙虛，就在黨章上寫他」。還說：「這一條不寫上我們通不過！」

一九六九年，在中共「九大」召開前夕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又說：「林副主席的名字還是要寫上（黨章），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覦之心。」

張春橋也附和說：「把林彪同志的名字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

康生也跟江青同一個腔調。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爲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百年大計，是關係到我黨、我國今後的命運，關係到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謙虛，他要求把黨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刪去。我們意見，這一段必須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會上公認的，是當之無愧的。」

在江青的帶頭下，加上林彪手下四員大將黃、吳、李、邱等人的積極活動，林彪作爲毛澤東的接班人，史無前例地寫在中共的黨章上。

「九大」以前，「中央文革」權傾一時，葉群經常往釣魚台跑。「九大」後，「中央文革」沒落了，葉群也少往釣魚台跑了。江青與毛家灣之間的聯繫主要通過電話進行。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兩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內，江青和毛家灣之間來往的電話多達四百七十多次，平均每兩天兩家就在電話中聯絡一次。即使是在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發起批陳整風運動，並對黃、吳、葉、李、邱進行批評，毛、林關係處於破裂邊緣，甚至林彪已陰謀政變，磨刀霍霍的時候，江青和毛家灣的聯絡依然如故。

一九七一年四月，葉群打電話給江青，說：「江青同志在最關鍵的時刻對我進行幫助，我非常感動……謝謝江青同志對我的幫助。」

五月二日，江青在電話中說：「很久沒有見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時間，我去看看林副主席。」

五月十四日，葉群又打電話給江青，說：「林副主席叫我約黃永勝、吳法憲同志去看江青同志，談談心。林副主席說江青同志在會上給你們講了很多好話。」

六月九日，江青親自爲林彪拍了一張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照片，登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合刊的《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上。江青題詞爲《孜孜不倦》。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還特意爲此發佈了一條消息：「兩本畫報都以單頁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照片。這張照片把林副主席無限

忠於毛主席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生動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給人們巨大的激勵和鼓舞。」

這張《孜孜不倦》的照片，是空前的。因爲林彪通常頭不離冠。這幅照片卻是免冠的，很顯眼地暴露了他那光禿禿的頭頂。這表明攝影者絕非普通人：可以叫林彪脫下那頂長年不離的帽子。

原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與毛澤東鬧翻後，林彪很想找毛澤東交談，以消除誤會。但毛澤東總是拒而不見。無奈之下，林彪想通過江青，求見毛澤東，才紆尊降貴地脫帽給江青拍照。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葉群從北戴河打電話給江青，說：「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

葉群還派人送了幾個西瓜給江青。

江青收到西瓜後立即回電話給北戴河「請林副主席放心！」

九月八日這一天，正是林彪下達政變手令之時。

九月十二日，在林彪、葉群叛逃、摔死在溫都爾汗前的幾個鐘頭，江青帶上林彪送的四個西瓜遊頤和園。她在感謝工作人員的招待時說：「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給我的，我再送給同志們。這是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關心，我們大家一起感謝林副主席！」

此時此地，江青還頗以與林彪的親密關係爲榮。

三、林、江衝突

互相勾結和利用，僅是林彪與江青關係的一個方面。

由於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礎上的，因此林彪與江青的關係也必然是機會主義的，利益一致時便朋比為奸，利益衝突時便你虞我詐，互相傾軋。尤其是「九大」前後，由於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被摧毀了，文化大革命得到了初步的勝利，林、江失去了共同的對敵目標，聯繫他們共同戰鬥的紐帶淡化了，而重大的爭權奪利的時機又出現在面前。於是林、江兩個集團的矛盾和明爭暗鬥就更突出了。

在與江青打交道時，林彪與葉群是有分岐的。

林彪性格孤寡清高，他打心底裏看不起江青這個狐假虎威、驕橫跋扈的女人，也看不起中央文革那班秀才。他說：文化大革命前根本就不知道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但是，出於政治利益的需要，林彪又不得不與江青虛於委蛇。

林彪出於對毛澤東的瞭解及政治鬥爭的經驗，擔心葉群在外面跟着江青胡作非為，闖下禍端。江青撞禍，有毛澤東這把大傘保護；葉群撞禍，林彪卻很難保護她。「爬得高，摔得重」，林彪多次告誡葉群，要與江青採取小心謹慎、敬而遠之的策略。另外，林彪憑自己老革命、黨中央副主席的地位，也不屑與中央文革那班左派們為伍，他不願意給人以自己與他們打得火熱的印象。

可是，葉群是個權慾熏心，利令智昏，又不甘寂寞的人。林彪緊跟毛澤東，升上了第二把交椅，她也要緊跟江青，當第二夫人。因此，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葉群就拼命往釣魚台跑，跟江青打得火熱。

對此，林彪對葉群是有批評，有鬥爭的。當林彪聽說葉群不分日夜往釣魚台跑後，神情每每不悅，多次向葉群提出告誡。實在不行，林彪便發出命令，吩咐秘書向葉群轉達：「少往外跑」。秘書們有顧慮，最後是林立果向葉群轉達了林彪的這一命令。葉群聽到後氣得暴跳如雷，大發牢騷，對林彪給她定下的「約法三章」：「少外出，少說話，多休息」尤其不滿，但又不敢公然違抗，在家裏又實在呆不住，便由公開跑改爲偷偷地跑。

實在禁葉群不住，林彪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加上林彪也確實需要從江青那裏打聽到中南海的內幕消息，最後只好聽之任之。

林彪與江青發生的一次正面衝突，是在一九六八年冬。

林彪在是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大講從古至今的四次「文化革命」運動，他說：「第一次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影響了二千年，但同我們這次比較起來，微不足道，小巫見大巫，沒甚麼了不起」。「第二次是資產階級的意大利的文化，到了十四、五世紀，以文藝復興進入了繁榮時期」。「第三次是馬克思主義」，「這三次都沒有毛主席領導下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偉大，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

心高氣傲，以「文化大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對林彪的這些說法頗不以爲然。她將林彪的講話細細地寫了批語，多次送給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林彪哪裏受得了江青這一套，況且，如果同意了江青的批評，就等於承認了自己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不及江青高明；更有甚者，可以認爲林彪在重大的理論上

犯下了錯誤，如果再上綱上線，其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林彪大爲生氣，罵道：「江青算甚麼東西！」

林彪與江青的另一次直接衝突，發生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的一天晚上，在毛家灣裏，秘書正在給葉群講文件，突然聽到從林彪房間裏傳來一陣叫聲：

「葉群——葉群——」

秘書急忙放下文件，跑到林彪的房間，只見林彪還在大喊大叫「葉群！葉群！」只見林彪氣得臉色紫青，身上一陣陣發抖。他平時冷淡而嚴肅，喜怒不形於色，從不發脾氣，就是生氣，工作人員也只是看到他板着面孔，語氣粗硬一點而已。像眼下這樣火性大發作，眞是平生罕見。

秘書上前問道：「首長，怎麼了？」

林彪氣呼呼地喊道：「叫葉群，快把江青給我趕出去！」林彪火氣大得很。

聽說要「趕走江青」，秘書驚得不知所措。這時間葉群趕到了。

只聽見從林彪的會客室裏傳來了江青的聲音：「林總，我有缺點錯誤，你可以批評，何必生氣呢……。」

原來是江青和林彪鬧翻了。與林彪的暴跳如雷相反，江青的聲調顯得比較平靜。

江青被葉群輕言軟語地送走了。事後，葉群再三向秘書叮囑：不准將此事說出去。並解釋說：「首長和十一樓（江青住在釣魚台十一號樓）都有自己的倔強性格，互相之間很坦率，但爭過之後，就拉倒，誰也不記仇。他們剛才也是由於一點小誤會，首長性子急，就火了。我進去說了說，雙方的誤會都已消除。十一樓走的時候，她和首長又都笑了。」

江青爲了甚麼把「驟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林彪激得暴跳如雷，不得而知。如果是文

化大革命中的方針政策，一向待之淡漠的林彪，不會動這麼大的肝火。可能是驕橫不可一世的江青，搞天下大亂，「亂」到了林彪頭上，「太歲頭上動土」，林彪才會勃然大怒，不惜得罪這位第一夫人，也不惜得罪毛澤東，林彪的「倔強」脾氣，可見一斑。

林彪和江青這對歡喜冤家，並沒有像葉群所說的那樣「事過之後就拉倒，誰也不記仇了」。事後，林彪禁止葉群再跑釣魚台。而釣魚台那邊也傳來江青的訊息：不稀罕軍委「文化顧問」那個頭銜；又說：軍委的文件沒意思，今後不要給她抄送了，今後不願再看軍隊的文件。

這一幕活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而葉群又活像極力想將兩人重歸修好的賈母。葉群一從釣魚台回來，就常常念叨：「難哪，難哪！」

出於政治利益關係，葉群決心要林彪與江青兩人重新修好。不知道往釣魚台那裏跑了多少次，向江青講了多少小話、好話、軟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位第一夫人勸轉過來。於是，軍委的文件又往江青那裏送了。

四、勾心鬥角

林彪與江青的矛盾，還表現在軍人與秀才兩個集團的層面。

一九六八年五月，林彪和吳法憲等人一起議論：江青看不起黃永勝、吳法憲；張春橋、姚文元只是無名小輩，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排名單卻把張春橋、姚文元排在黃永勝、吳法憲之前；在上

海，只宣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不宣傳林彪。

一九六八年四月，葉群與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通電話。她說：「許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副主席也是保你的……對，有人反對你。你知道是誰反對你嗎？就是你們東邊的那位。那個人，我不說名字，你也會知道他是誰。對，對，我對你講，你心裏有數就行了。」

南京東邊的是上海，「東邊的那位」，指的是張春橋。

不久，上海空軍的江騰蛟，給葉群送來一份揭發張春橋歷史問題的材料。葉群親自作了修改，又退回江騰蛟，讓他重抄一式兩份，由林彪批示發出，一份送給毛澤東，一份由葉群親自送給陳伯達、康生和江青。

過了一陣，上海便出現了「炮打張春橋」的高潮。張春橋被搞得焦頭爛額。由於「最高權威」方面的保護，張春橋這次又蒙混過關，此後對林彪更加敬而遠之。

毛家灣趁機打擊釣魚台，反過來釣魚台也找毛家灣的碴子來報復。

解放軍總政治部被毛澤東點名爲「閻王殿」之後，被實行軍管。軍管小組組長爲海軍第二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王宏坤。可是江青及中央文革認爲總政軍管小組「右傾」，提出軍管小組組長人選不合適，要求換人。

黃永勝帶領軍委辦事組議論了幾次，依然束手無策。黃永勝、吳法憲滿腹牢騷，李作鵬也說：「要派一個不右傾的人去替王宏坤，這個人選還眞不好找」。黃永勝更說：「派我們幾個人去，也搞不好」。邱會作則愁眉苦臉地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幾位大將被釣魚台擠壓得一籌莫展，心情煩躁，憋了一肚子氣，不敢怒也不敢言。

會後，吳法憲向葉群派來參加會議的林辦秘書說：「這個事我們眞難哪！總政的主任、副主任全都靠邊站了，副部長以上幹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打倒或靠邊站了，還說是右傾！解放軍報社也是這樣，站住的人沒有幾個了，還是右傾嗎？我們確實不好說，得林副主席說句話，不然我們確實頂不住。」

後來，此事經林彪、葉群出面斡旋，釣魚台方面才網開一面。

江青還故意找黃永勝的小腳。

黃永勝自從廣州調到北京任總參謀長後，由於他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經驗，頗感吃力。尤其是他缺乏中央上層政治鬥爭的經驗，他既要服從毛家灣，又要取悅釣魚台，順得哥情失嫂意，時常顧此失彼，沒有取得江青的好感。面對驕横跋扈的江青，黃永勝只好敬而遠之。於是，江青大發雌威，說：「這個總長的人選不大理想」。葉群還透露：「黃永勝批出的文件，釣魚台都不願意看」。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央文革碰頭會曾經決定由黃永勝率領代表團，去參加十一月份阿爾巴尼亞召開的黨代會。在代表團動身之前，江青突然提出異議，堅決反對黃永勝出訪。理由很簡單：「他不配！」江青指着黃永勝的鼻子罵道：「你們軍委辦事組（黃永勝是組長）目無中央文革，封鎖我的消息，你們調動軍隊部署的報告，爲甚麼沒報告我，難道中央文革就沒有過問軍隊的權力嗎？」

江青打的是黃永勝，震的是黃永勝背後的林彪和葉群。

黃永勝連忙解釋道：「江青同志，你誤會了，這是主席規定的，調動軍隊的報告，不要寫那麼一大串名字，今後只報主席、林副主席、總理就行。」

「你挑撥！」江青蠻横地喊道。「我現在宣佈三條：一、總理、康老、文元找黃永勝、吳法憲談話，你們要清理思想；二、黃永勝、吳法憲停止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三、黃永勝不能率領代表團訪問

阿爾巴尼亞！」

林彪與葉群知道，江青想插手軍隊。一旦讓這個女人把手伸進來，軍隊將永無寧日。然而江青當時權傾一時，而且出訪的事涉及外交，周恩來首當其衝。於是，林彪和葉群並不露面，看周恩來如何應付這個潑婦。葉群和江青見面，照樣手拉着手，嘻嘻哈哈，彷彿沒發生過這樁事一樣。

不出林彪所料，因爲代表團的名單已通知阿爾巴尼亞，行期已迫在眉捷。周恩來急了，不得不去求見毛澤東。

江青這種無理取鬧，令毛澤東臉上無光。自己的妻子，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更不是中央常委，卻凌駕於總理周恩來之上，對甚麼都發號施令，實在不成體統。於是，毛澤東說：「不要理她。」

善於處理複雜政治問題的周恩來，親自出馬，帶着黃永勝、吳法憲等人去見江青。事先周恩來叮囑黃、吳：「你們要忍耐，不要當面頂，有話慢慢再講。」

周恩來一行剛走進江青的住處，江青就怒氣沖天地說道：「你們軍委辦事組目中無人，好多事情，我都幫你們說話，幫助你們爭，可是——」

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任江青發雌威，誰也不插嘴。

看到江青發泄過了，周恩來便趁機向黃永勝說道：

「你們代表團甚麼時候動身？」

黃永勝心領神會，馬上回答：「後天，我一是向江青同志請示，看看還有甚麼指示，二是來向江青同志告別的。」

江青也明白到要阻止黃永勝出訪是不可能的事。但又下不來這個台階，於是在嘴巴上討回：

「中央文革不派人爲你們到機場送行，回來也不派人到機場接！」

「黃永勝出國了！」葉群得意洋洋地向秘書們說道。「這可眞不容易啊！黃永勝出國本來是中央決定的，可是臨要動身了，有人又出來反對，弄得沒有辦法，只好請主席決定。主席點頭，問題才解決。」

問題雖然解決了，但毛澤東的顏面卻大爲受損。毛澤東下令：「要開江青的會，讓她做檢討，現在就開。」

於是，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傳達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在「龍顏大怒」之下，江青不得不輕描淡寫地做了一番檢討：「我對軍委辦事組規定的三條不妥當，當時我正在生病，發高燒，信口胡言，請同志們諒解……。」

與會者都知道江青是在走過場，但誰也不敢認眞追究。正想收場之際，一份「最高指示」送來了。周恩來立即向會議宣讀：

「中央常委不要縱容江青，江青不對的要批評。」

江青聽罷號啕大哭。會議開不下去，這回只好眞的收場。

毛家灣與釣魚台除了明爭暗鬥，還互相猜疑，其直接受害者，便是溫玉成。

溫玉成原是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廣州受到造反派衝擊，日子很不好過。林彪聽聞後當即表態說「溫玉成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把他保了下來。一九六七年，林彪將溫玉成調到北京，委任爲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楊余傅」事件後，溫玉成取代傅崇碧，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並成爲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一時間溫玉成權重京華，炙手可熱。不料，江青也看中溫玉成，想把

他拉過去，成爲自己在軍隊的代理人。於是，江青將八個樣板戲的劇團交給溫玉成管理。初踏入中央最高層權力核心的溫玉成受寵若驚。但這正犯了北京官場上的大忌：腳踏兩只船。在毛家灣與釣魚台處於蜜月時期，溫玉成左右逢源，春風得意；但到了「九大」前後，由於林、江兩個集團鬥爭加劇，問題就出現了。林彪和葉群嫌溫玉成與江青交往過密，懷疑江青籍他插手軍隊；而江青見他與毛家灣藕斷絲連，又懷疑他不忠。溫玉成夾在互相傾軋的兩政治集團當中，混然不覺，等到驚醒時，大禍已臨頭。

「九大」召開了。溫玉成被選爲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滿心以爲這下子可進中央政治局了。旁人也都是這樣認爲。豈知，名單宣佈後，擁有這種雙重的政治身份的人中，個個都進了政治局，唯有溫玉成落選。溫玉成徬徨了，他急忙打電話給葉群求助。但葉群愛理不理。

禍不單行。林彪和葉群爲了除去溫玉成，從他歷史上找出一個小疑點，便誣陷他「政治歷史有問題」，決定將他逐出北京。江青大力附和，甚至提議「把他抓起來」。毛家灣「寬大爲懷」，將他貶到成都軍區任副司令員。而溫玉成過去與成都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有過介蒂。溫玉成的日子有得捱了。

溫玉成臨走前，獲得林彪召見。葉群將江青的「抓起來」的提議告訴溫玉成，他氣得直罵江青，又對林彪的寬大感激涕零。

溫玉成那裏知道，自己的遭遇，正是林彪與江青勾心鬥角的結果呢？

林彪與江青的勾心鬥角，在「九大」召開時達到高峯。

「九大」是「論功行賞」的權力再分配。葉群想進政治局，希望得到江青的支持；而江青則想當中央常委、組織部長，也希望得到林彪的支持。於是葉群在會上會下，四處爲江青評功擺好，叫嚷「我要提議江青同志作政治局常委！」而江青也公開表示支持葉群進政治局，而且當黃永勝的面說：「我準備

提你爲政治局常委！」

黃永勝雖然政治經驗不足，但還是看出江青是在開空頭支票，其實是想讓自己投她一票。於是很客氣地說：「謝謝江青同志的支持，我自知水平有限，勝任不了常委的職務，但我一定支持江青同志，投江青同志的票。」

江青笑着說：「我們之間雖然也有過矛盾，但那是《水滸傳》上的英雄，不打不相識嘛，我們應當互相支持。不然，反對我們的人，就會有機可乘了。」

在選舉投票時，爲了打擊江青的威望和氣焰，葉群布置黃永勝等人不投江青的票。選舉結果公佈，江青沒有得到滿票，美中不足，氣得直罵娘。江青經過調查，才知道是毛家灣作了手腳。

而爲了打擊葉群，江青也布置了秀才們不投葉群的票。結果葉群也沒有得到滿票。葉群也氣得咬牙切齒。

五、裂紋

「九大」的重頭戲是代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原定由林彪負責，組織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起草。

這時，陳伯達已與江青及中央文革分道揚鑣，投靠了毛家灣。在林彪的支持下，陳伯達不理會張春橋、姚文元，向中央請了一個月的假，躲在家裏起草。

張春橋和姚文元不甘示弱，他們串通江青，由江青出面向毛澤東「吹風」。在江青的攛掇下，毛澤東決定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另起草。於是，便出現了雙胞胎的政治報告。

在林彪與江青兩政治集團中，雖然兩者都無限忠於毛澤東，但是林彪集團羽毛已豐，構成了威脅。於是，毛澤東採取了抑林而扶江的政策。在兩份政治報告中，順理成章地採用了張春橋和姚文元起草的。

陳伯達在家將政治報告寫好後，又將草稿打印成清樣，一式兩份，一份送到毛家灣，另一份送給毛澤東。陳伯達恭恭敬敬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連同草稿一起，裝入一個牛皮紙大口袋裏，派人送到中南海。陳伯達滿懷信心，憑自己的地位與經驗，一定可以打敗張姚那兩名小將。

那個牛皮紙口袋很快地由中南海退回來了。毛澤東連口袋都沒有拆，只親筆在上面寫上：「退伯達同志，毛澤東」

陳伯達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對林彪來說，毛澤東否決陳伯達的草稿，而採用張春橋姚文元的草稿，當然不是一個好兆頭。毛澤東的做法激怒了林彪。對張、姚的草稿，林彪一個字不看。在這個草稿反複修改的過程中，林彪只是向秘書查問毛澤東對稿子修改的意見及批語，其餘一概不理會。

三月底，「九大」召開前夕，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經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最後通過了。周恩來將稿子送到毛家灣，經林彪最後審定（因為這份政治報告將由林彪在「九大」上宣讀）。林彪收到後，依然一字不看，在稿子封頁上大筆一揮：「呈主席審批」。

第二天中午，周恩來給林辦打來電話，說：「『九大』快開幕了，打算早一點將政治報告印出來。這個稿子已經中央文革碰頭會修定通過，我於昨天批送林副主席定稿。你們收到了嗎？」

林辦秘書回答：「收到了。」

周恩來又問：「送給林副主席看過了嗎？」

林辦秘書說：「送過了。」

周恩來說：「如果林彪同志同意，請早些把稿子退給中辦，因爲他們在等着付印。」

林辦秘書說：「林彪同志已把稿子批呈主席了。」

「怎麼，又批送主席了？」周恩來很焦急。「前天在主席那裏開會，主席講他已親自修改幾次，他不再看了，請林彪同志最後定稿。這個事，葉群同志是知道的，因爲她當時在場。爲甚麼又送給主席了呢？」

林辦秘書說：「我是否打個電話，把送出去的稿子追回來？」

周恩來問：「送出多長時間了？」

林辦秘書回答：「半個多小時。」

「不用再追了，那已來不及了！」周恩來十分失望地說。

林彪直到「九大」召開，上台宣讀前，始終沒有對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看過一眼。

林彪與毛澤東、江青的關係，終於出現裂紋了。

第八章 名不符實的「副統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調查員的身份，由北京飛往上海。第二天，一月五日，張春橋和姚文元支持的上海造反派奪了《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權。《文匯報》於一月五日刊登了《急告全市人民書》。這就是引發全國造反派全面奪權，使文化革命進入新階段的「一月革命」。

一月八日，毛澤東召集陳伯達、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開會，《人民日報》總編輯唐平鑄，新華社社長胡癡也有參加。會上，毛澤東對上海的奪權活動給予高度評價。他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書》，可以轉載、廣播。他們內部造反，過幾天，可以寫一個綜合報導。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活毛豬」。

毛澤東還指示「將一月五日《文匯報》的『急告全市人民書』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明天在《人民日報》上登載」。毛澤東還當場口述了一段《人民日報》編者按，由王力當場筆錄，交毛澤東當場審定。

翌日，《人民日報》頭版醒目地刊登了「編者按」，指出：

「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

隨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

毛澤東在一月八日會議上的講話以及口述的《編者按》，成爲在全國進行全面奪權的號召。由造反派從過去的中共各級黨委手中奪權，而且是從上到下，一切機關、單位、學校、工廠、礦山、農村，各行各業，所有組織，其政權都發生了改變。這正如毛澤東所說，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大革命。

如此事關重大的決定，是毛澤東一個人決定的。一月八日的會議上，與會者中沒有周恩來、康生等中央常委，而且沒有黨的副統帥林彪或者常常代表他出席會議的葉群。王力在一份材料上說：「這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總理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葉群也沒有通知」。

毛澤東專橫獨斷，根本沒有把林彪這個副統帥放在眼裏。

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一重大的戰略部署，每一重大的方針決策，幾乎都是毛澤東一個人決定的，毛澤東不願意，也不需要與副統帥林彪研究、商量。

一九六六年八月，支持紅衛兵，發動紅衛兵運動，毛澤東沒有與林彪商量，是自己決定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澤東提出在全國徹底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鬥爭的矛盾指向中央常委劉少奇、鄧小平，殃及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領導人，用以扶持造反派，壓制「保守派」，以便徹底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件事也沒有和林彪研究過，是毛澤東自己決定的。

根據《十六條》和毛澤東原先的決定，工礦和農村原則上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澤東自己決定在工礦企業和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此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便燃遍全國。如此重大的決策，林彪也沒有參與研究、討論。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安徽省軍區關於可否派出部隊警衛羣衆組織召開的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大會的請示報告上，毛澤東致信給林彪：

「林彪同志：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羣衆。以後，凡是眞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請酌。」

這就是解放軍的「支左」。林彪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是解放軍實際的主管人物。可是，讓解放軍「支左」，事先毛澤東並沒有與林彪商量、研究。只是憑一封信，實際上是指示，便要解放軍執行，也是毛澤東一個人決定的。以後，毛澤東還指示解放軍「支農、支工、軍管、軍訓」，合起來是「三支兩軍」，完全是獨斷專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發生了「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事件，亦即是「二月逆流」。如此重大的事件，毛澤東也沒有找林彪商量研究，自己便決定予於反擊，於二月十八日晚大發雷霆，決定：「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是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

決！」從此，「三老四帥」被批判，遭受政治迫害。

劉少奇、王光美之所以被置於死地，主要是被列入專案組，而劉少奇、王光美的專案組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秘密地成立的，組長就是江青。這件事毛澤東也沒有與林彪商量。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決策中被排除在外，林彪這位副統帥實際上也沒有多大權力。除了在軍隊系統內，林彪還有影響力和指揮權之外，在其他系統，如政府機構，黨組織等，林彪乾脆就沒有甚麼影響力。在國務院系統，那是周恩來的天下，林彪不可能，也不願意插手。在文化大革命中，黨組織癱瘓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管理着中國的各種事務。政治野心極大，權力慾極強的江青，對手中的權力猶嫌不夠，那能容他人染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除了增加需要傳閱、劃圈的文件外，他手中的權力與文化大革命前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實際上沒有甚麼大的變化。難怪葉群曾經抱怨：今天的林副主席，與文化大革命前並沒有甚麼分別。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于南就說：「毛澤東如果根本不信任林彪，就不會叫他當接班人。但這種信任是有限度的。林彪作爲二把手從來沒有享受到像劉少奇當二把手那麼大的權力，是林彪不想要嗎？不是，是毛澤東不給他。」

第五篇

分道揚鑣——「林彪事件」

第一章　毛林關於「國家主席」之爭

一、「九大」以後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九大」的帷幕，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徐徐落下。在中共召開的那麼多次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全會」中，最不可取和一無是處的一次，就是「九大」。這次奇特的大會，成了許多事情的分水嶺：

如果將「文化大革命」比做一條拋物線，那麼「九大」就是這條拋物線的頂點。「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它本身的耀眼的光芒，人們對它的盲目的熱情，在「九大」以前是拋物線的前半段，雖然運動的軌跡是曲折的，但它的總的趨勢是向上的，到「九大」時，這一切都達到了頂峯。「九大」以後，便是拋物線的後半段，一切都變得褪色了，冷卻了，整個趨勢逐漸向下。

毛澤東與林彪的政治聯盟也可以用拋物線來比喻，兩人的親密無間，互相信賴，互相配合，在「九大」時都達到了頂峯。過了「九大」這個分水嶺，這一切便走向下坡，最後分崩離析了。

毛澤東與林彪的政治命運也是這樣。

對毛澤東來說，「九大」的召開，無疑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這件由他精心策劃，親自發

動和領導，被譽爲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中的一件大事的勝利，也無疑給了毛澤東巨大的鼓舞。他躊躇滿志，得意忘形地奚落陳毅等一班被「文化大革命」之火燒得焦頭爛額的老幹部。因爲毛澤東是勝利者，而勝利者是可以無所顧忌，爲所欲爲的。同時，人們對毛澤東的瘋狂的迷信和崇拜，也在「九大」時達到了頂峯，他像一座無比高大的神祇，高高在上，向着萬衆蒼生宣喩：「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一切，在「九大」時都達到了頂峯。然而，根據拋物線的規律，過了頂峯後，便開始逐漸向下了。

林彪也沒有逃脫「九大」這個魔劫的制約。在「九大」上，林彪像一顆光芒四射的政治新星，享盡了榮耀，出盡了風頭。他似乎有點忘記了「勉從虎穴暫棲身」的座右銘，在一片「永遠健康」的勝利呼聲中，有點陶醉了。他那裏知道，危機就在前面。他這顆政治新星很快就沿着拋物線後半段的向下的趨勢，急速地殞落了。而「九大」便成了落日前那燦爛的、最後的光輝。

危機來自專權、多疑的毛澤東。

按照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在「九大」後，通過鬥、批、改，結束「文化大革命」，在「天下大亂」的基礎上，實現「天下大治」，然後建立起他所向往的理想社會。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甚麼叫到底？估計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因此，毛澤東自一九六八年全國山河逐漸一片紅後，便陸續就清理階級隊伍、整建黨、下放幹部、「上山下鄉」、教育革命、文藝革命等發表了一系列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我們黨員要吸收新鮮血液。工人、農民、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裏來。舊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另一項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又轉述了毛澤東的另一項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發出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之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毛澤東通過一道又一道的「最高指示」，將中國引導入自己的戰略部署，全國掀起一片鬥、批、改的高潮。毛澤東似乎眞的想要結束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便是「天下大治」，毛澤東夢想中的理想社會，便會在這個東方古國第一次出現。

可是，在「九大」以後，毛澤東的注意力被另一個新出現的問題吸引了去，而很少再提及鬥、批、改了。這個新的問題，便是「四屆人大」和「國家主席」問題。其實，兩個問題中最根本的還是「國家主席」問題，這是毛澤東極不想面對、但又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

中共的「九大」，建立起了一個嶄新的黨組織，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這是將文化大革命的勝

利，包括打倒劉少奇這個主要的勝利，通過黨的組織形式確定了下來。但毛澤東還缺少另一個程序，即是要建立起新的中央政權機構，以及將劉少奇的國家主席職務罷免。那就是召開四屆人大。在四屆人大中，罷免劉少奇不成問題，可是，空出來那個「國家主席」的寶座，由誰來塡補呢？這才是整個問題的核心，也是毛澤東頗費思量之處。本來，在「九大」之後，應該緊接着召開四屆人大，趁熱打鐵，一鼓作氣，可以將文化大革命以及人們的精神、情緒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那樣做是比較有利的。然而，因爲毛澤東對「國家主席」問題頗費思量，遲遲難決，四屆人大便拖下來了。

「九大」閉幕後，過完「五·一」節，上過天安門後不久，毛澤東便離開北京，到了武漢，在東湖賓館住了一個多月；之後，又移駕到杭州，入住了劉莊。

在西子湖畔，丁家山下，有一座花木繁簇、環境幽雅的清代別墅，這裏有精巧的蘇州園林，有小橋流水，亭台樓閣，佳木繁花，又遠離塵囂，秀麗而雅靜，眞好比仙境天堂。那就是劉莊。

毛澤東將那個頗費思量的問題帶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之間，他需要細細地斟酌，深入地謀劃。因爲事關重大，不容有失。每每面臨着重大的戰略行動之前，毛澤東都喜歡離開古老的北京城，來到杭州、武漢、長沙。似乎是置身於秀麗的江南水鄉之中，投入湘楚大地的懷抱裏，就能摒除心中的種種愁思雜念，心靈就能變得更加清淨空明，就能夠產生更多的靈感和啓迪，就可以作出更加英明的決策。毛澤東畢竟是這塊土地孕育出來的湘楚子弟。

除了在「十·一」國慶節，毛澤東回到北京，和林彪一塊例行公事地登上天安門，過後又回到武漢之外，毛澤東一直在江南巡遊。過了春節，毛澤東又來到長沙，聽取黎原和華國鋒匯報工作。毛澤東胸中醞釀的戰略方案終於成熟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澤東在長沙向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提出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正憲法的意見，着重提出了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

毛澤東打響了第一槍。

二、「林彪陰謀論」

毛澤東與林彪關於「國家主席」的爭論，雲霧繚繞的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以及後來林彪的反革命政變、叛國外逃、機毀人亡，由於有關方面的刻意掩飾，多年以來，整個「九・一三林彪事件」變得模糊不清，撲朔迷離，有許多地方甚至處於空白，而有許多地方則被竄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在關於「國家主席」的爭論中，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現任解放軍國防大學正師級教員，多年從事中共黨史教學和研究工作，著有多部著作，被《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的作者、美國的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稱之爲「黨史專家」——作者註）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說：「林彪身爲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地位僅在毛澤東一人之下，身體又確實很不好，他是不是對任國家主席很感興趣，不得而知。即使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也不是反黨行爲。葉群的陰謀活動，他是不是知道，也不得而知。」就在這種「不得而知」的情況下，北京官方公佈了一套官方版本的說法，即「林彪陰謀論」。

按這套官方版本的說法：

一、在「林彪事件」的導火線——「國家主席」問題上，毛澤東在一九七〇年先提出不設國家主

席，而林彪則提出並堅持要設國家主席，與毛澤東進行對抗；

二、林彪提出和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目的，是自己要當國家主席；

三、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爲了「搶班奪權」，急於要當國家主席，於是首先「發難」，搞「突然襲擊」，進行「有計劃、有綱領的」地下活動。這就是發生在廬山上的「第十次路線鬥爭」；

四、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變本加厲，策劃反革命政變，企圖謀害毛澤東，陰謀敗露，最後叛國外逃。

這套說法的一個核心，是林彪想自己當國家主席，所以才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才與毛澤東對抗，才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難。由於是林彪主動蓄謀發難，所以稱之爲「林彪陰謀論」。

「林彪陰謀論」明顯地存在着許多重大的疑點：

一，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發生的關於「國家主席」的爭論，究竟是誰首先發難，是誰打響第一槍？對這一點，官方的版本顯然是有意迴避；

二，毛澤東爲甚麼要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的提議是針對誰的？這個提議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是「陰謀」還是「陽謀」？對這些問題毛澤東以及官方版本都諱莫如深。

三，毛澤東指控林彪自己想當國家主席，究竟有甚麼直接的確鑿的證據？從目前爲止官方公佈的材料來看，在這方面沒有甚麼直接的有力的證據。關於此點本書後面還有詳述；

四，以「韜晦」作爲自己的座右銘，一向謹小愼微地「勉從虎穴暫棲身」的林彪，這一次爲甚麼竟敢於「與虎謀皮」，跟毛澤東針鋒相對地提出並堅持設國家主席？林彪的這一舉動，大大地有違他的個

性，顯得格外不合情理；

五，官方公佈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及林立果策劃的陰謀，與其說是武裝政變，還不如說是兒戲。諳熟軍事謀略，又對古今中外的「政變經」潛心研究了幾年的林彪，竟將一場關乎自己生死存亡的政變，搞得如此「水皮」，一場糊塗，這是不可思議的。而且，林彪打仗一向以謹慎，不打無準備之仗而出名，今次面臨生死決戰，竟然準備的如此毛草、輕率，毫無計劃，不合章法，令人難以置信。

儘管存在上述缺點，可是，由於長期以來的官方宣傳，大部份的人，甚至許多專家學者都已經接受了這種「林彪陰謀論」。在歷史學界以及政治宣傳中，佔着普遍的、主導地位的，也是這種說法。

二十五年來，「林彪陰謀論」蒙蔽了許多人，現在該是還其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三、「毛澤東陰謀論」

與「林彪陰謀論」相反的，是「毛澤東陰謀論」。持這種說法的代表作，是姚明樂著的《林彪的陰謀和死亡》一書。據說，該書是根據中共高層的機密文件以及一位叫「趙研極」的人的回憶錄而撰寫的：

> 本書摘錄的回憶錄的作者，是中共的高幹。他死時的名字叫趙研極，但還有許多其他的名字。爲了安全和方便起見，他和所有在這個中國共產黨最高機構中從事秘密工作的人一樣，有一個專門的名字。自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他已用了多達七個

名字。他最近的名字是在一九七一年取的。

在那一年，他被汪東興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林彪專案組保密組。這個專案組的成員大多是來自中央委員會的附屬機構、安全部和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但他們都不知道有趙研極其人或他的工作存在。因爲趙研極高高在上的權威和他的職務的性質，使他們無法知道他。

趙研極的新職務允許他事實上，有時候是需要審訊並與那些親自參與林彪事件的人有密切關係。因此，他得以成爲發現幕後真相的少數人之一。但諷刺的是，他的工作是要掩飾這個真相。

趙研極擔任調查員的同時，也是一個叫做「中央辦公廳特別調查小組」的名義組長。這個組織也處理林彪事件，但它的功能在編造事件和佐證的文件——簡言之，就是在制造掩飾。

趙研極在開始寫回憶錄時，健康情形已經很壞，還沒寫完就死了。因此永遠沒法知道他是否想藉這個回憶錄來說明這件事，並更正歪曲的內幕。不過他顯然不願把他的秘密帶進坟墓，因爲他把回憶錄留交給一名親戚。回憶錄後來被中央發現，把它鎖進檔案庫里。我們的推測是，寫回憶錄可以使他對他的調查有較佳的分析。無論如何，他的回憶錄似乎在各方面都很正確。這份手稿在本書中首次公開。（姚明樂：《林彪的陰謀和死亡》）

《林彪的陰謀和死亡》一書的主要內容是：

一、「不設國家主席」是毛澤東針對林彪預先設下的一項陰謀、陷阱。毛澤東向林彪說：自己不想當中共中央主席了，打算任國家主席，這樣可以有多一些機會出國訪問，爲改善中國的國際關係作出努力。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將讓於林彪擔任。由於毛澤東不好親自開口，希望林彪能在中央政治局中提議毛澤東担任國家主席，而毛澤東則表示謙讓，林彪則堅持，毛澤東爲了不拂衆意，只好違心地接受。如此的說話，毛澤東向林彪囑咐了兩次。而當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提出「設國家主席」後，毛澤東則反過來說林彪要當國家主席，要「搶班奪權」。

二、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誤中陷阱，與毛澤東鬧翻臉後，便開始與林立果一起指揮和策劃政變—《五七一工程紀要》。林彪政變的主要點是與蘇聯聯手對付毛澤東。林彪將與蘇聯秘密接觸，安排一場假的「中蘇戰爭」。當中蘇戰爭爆發後，林彪將毛澤東、周恩來、江青等大部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誘騙入北京郊區的玉塔山防核工程指揮中心。然後關閉山洞的大門，施用毒氣、火焰器、火箭炮等武器，將地下防空洞中的毛澤東等人殺害。屆時林彪上台，中蘇將化敵爲友，由衝突變爲友好，由秘密接觸變爲公開交往。

三、然而毛澤東畢竟比林彪更加老謀深算。在林彪預謀政變時，毛澤東也在加緊計劃消滅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毛澤東請林彪赴宴。葉群、黃永勝、吳法憲等人認爲太危險，建議林彪不要去。但林彪認爲毛澤東還不至於動手，於是決定赴宴。在回歸途中，汪東興預先埋伏的軍隊，用火箭炮將林彪座駕擊毀。林彪車毀人亡。

四、在林彪策劃政變的同時，仍對毛澤東寄於希望，盼望兩人言歸於好。林彪每次提出要見毛澤東，要與毛澤東交談，但毛澤東卻拒絕不見。林彪對毛澤東的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使得他遲遲舉棋不

定，被毛澤東先下手爲強。

五、在毛、林衝突中，周恩來扮演了一名重要的角色。有一種說法（王兆軍著《誰殺了林彪》），周恩來多次向毛澤東提供有關林彪的情報，促使毛澤東向林彪下手。而當林彪的飛機由山海關機場起飛後，林彪曾要降落北京或返回山海關機場。但周恩來下令關閉全國機場，導航系統也被關閉。迫使林彪不得不飛往外蒙。

「毛澤東陰謀論」的最大弱點，是得不到證實。儘管姚書中列明了資料來源的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稱，但苦於無法取得這些文件的公開發表，因此無法考究這些資料的確實性。其中的一些觀點、說法，情節過於離奇，過於戲劇化，然而尚不失常理，在邏輯方面大體講得通。但不能提供佐證材料。

在官方版本的「林彪陰謀論」之外，姚書是唯一的一個較爲系統而完整的有關林彪事件的不同版本，具有一定的參考的價值。

四、是毛澤東首先向林彪發難

在整個「林彪事件」中，毛澤東與林彪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爭論，是一個導火線，在整個事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根據「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記述，毛澤東與林彪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澤東提出召開四居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提議；

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澤東的意見，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

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和修改憲法中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向毛澤東寫了《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毛澤東閱批了這個請示。

十七日，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討論了召開四居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

四月十一日，林彪提出要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林彪的意見，多數人表示同意。

十二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關於林彪的意見的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四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他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林彪仍然主張設國家主席。

五月下旬，林彪對吳法憲說，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林彪要吳法憲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一章。

七月，葉群私下對吳法憲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裏擺？

七月中旬，在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毛澤東第四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他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八月初，葉群私下對吳法憲說：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八月十三日下午，吳法憲在憲法工作小組會議上說：「有人利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在會議中間，吳打電話告訴了黃永勝，黃即報告林彪，林彪說：吳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葉群分別打電話給陳伯達和黃永勝，要他們準備關於天才方面的和「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的語錄。林彪一伙堅持設國家主席，江青一伙竭力反對，各有打算。

按照官方的這種說法，向人們傳達的訊息似乎是：林彪首先發難，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提出要設國家主席，來與毛澤東相對抗，其他的人只不過是受蒙騙者，或是同黨。這種說法與事實大相徑庭。

究竟是誰首先發難呢？是毛澤東。

而究竟是誰最先提出要設國家主席呢？原來是周恩來。

一九七〇年三月初，毛澤東在武漢視察，休養期間，收到了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提要」比較簡單，是提綱式的，講了修改憲法的基本原則問題。而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周恩來則提出在新憲法中是否要寫設國家主席一章，並說他們提議應設國家主席，由毛澤東任國家主席。

毛澤東看過後，便借題發揮，於三月七日找汪東興談話，發出了「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那一番指示。毛澤東還說：「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並要汪東興第二

天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傳達他的指示。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說：「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除了他自己不願重新擔任而外，它的特定含義顯然首先就是不同意林彪任國家主席」。其實，「不設國家主席」是毛澤東向林彪射出的一根利箭，其目的就是不讓林彪當國家主席。這是針對林彪的一項政治大陰謀。

三月八日，汪東興回到北京，立即去找周恩來，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聽後，說：明天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由你向政治局傳達。

三月九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汪東興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討論的時候，與會者都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林彪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派葉群參加。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指定葉群將毛澤東的意見和會上討論的情況面報林彪。

心細如髮而又老謀深算的周恩來，已經從毛澤東的指示中嗅出了不尋常的味道。由於事關重大，周恩來作出兩項相應的對策，其一是讓汪東興親自向政治局全體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這樣，在林彪和全體政治局委員面前，周恩來可以表明自己與毛澤東的指示毫無干係。否則，如果是由周恩來傳達這項指示，容易使人認爲：這個指示（實際上是個大陰謀）是不是由周恩來與毛澤東一起策劃的？周恩來似乎已經看到，毛澤東的指示將引起正、副統帥之間的一場巨大紛爭，周恩來想置身事外。

其二是指定葉群不但要將毛澤東指示的內容，而且要將會議的情況原原本本面報林彪。周恩來不願意林彪對自己產生誤會。而且，周恩來似乎是想要保證林彪接收到由毛澤東那裏傳達來的全部的訊息。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說，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密切。「九·一三」事件後，汪東興率領的八三四一部隊在毛家灣搜出了不少周恩來、鄧穎超與林彪、葉群的合照。汪東興將這些照片交還

給鄧穎超，鄧穎超感恩不盡。在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周恩來是否更願意接受林彪，從而也更傾向於林彪呢？

毛澤東只是就大的原則、方向問題作出決定，至於如何實施，細節的安排，便交由中央政治局討論擬定。因此，北京的中央政治局聞風而動，於三月九日的全體會議之後，將具體的意見寫成請示報告，在三月十六日呈報給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就批閱了這個報告。三月十七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如何貫徹落實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就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工作，進行規劃和安排。在討論憲法草案時，對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意見分歧很大，爭論很激烈。汪東興在陪同毛澤東在武漢、長沙一帶視察期間，經常接到周恩來反映這方面的電話。不久，周恩來又寫了一封信，呈交給毛澤東，並附上憲法修改草案。周恩來事先在電話中把懷仁堂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對是否設國家主席爭論激烈的情況告訴了汪東興。汪東興把周恩來的信送給毛澤東時，還轉報了周恩來打電話講的內容。毛澤東聽後十分斷然地說：「不設國家主席的話，我早就說過了，還派你回京傳達過。憲法上不要寫了，我也不當國家主席。」

正當周恩來代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一來一往地進行討論的時候，林彪並沒有加入戰圈。他冷眼觀看着這一切，集中精力應付毛澤東的挑戰。在蘇州的行宮裏，林彪踏着厚厚的地毯，來回踱步，他思量着，謀劃着，他決定要作出反擊。

四月十一日深夜，林彪將秘書叫來，口述了他的「反擊」：

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澤東兼任。這樣做對

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爲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認爲，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林彪的意見同時報給在長沙的毛澤東及北京的中央政治局。

毛澤東的秘書回給葉群的電話說，他已向主席轉報了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的提議，主席聽後「笑了」。主席說：「設國家主席，誰當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當了，那就讓董老當吧？」

北京的周恩來，明知道毛澤東不同意設國家主席，也不願當國家主席。但是，在接到林彪的建議後，他還是在四月十二日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討論林彪的建議。中央政治局以多數通過了林彪的建議。周恩來立即將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建議轉報毛澤東。毛澤東閱後，也立即在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

七月中旬，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討論的情況時，又講到一些人提出了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澤東要汪東興打電話給周恩來說：不要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這是毛澤東第五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

此後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即八月二十五日政治局會議開會前，毛澤東又分別找林彪和周恩來談話，再次強調不要設國家主席，他也不當國家主席的問題。

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共講了五次「不設」和「不當」國家主席，其中有三次，即第一、第二、第五次，是專門針對周恩來單獨講的；第四次，即引用曹操與孫權的典故那一次，是在中央政治局全體

會議上向全體與會者講的，只有第三次是針對林彪的四月十一日的提議而發的。

由此可見，林彪並不是提出「設國家主席」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唯一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人。在提出和堅持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周恩來表現得比林彪更積極。

林彪是在毛澤東提出挑戰後，才被迫起來應戰的。

五、「不設國家主席」是錯誤的

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是否正確，是否合理呢？

中國著名的法學家張友漁在一九八二年說：

> 設立國家主席是我國一九五四年憲法規定的重要制度。在十年政治動亂的不正常情況下，把設立主席的規定取消了。……本來，從國家制度來說，對內對外代表國家的國家主席是不可缺少的。它對內代表國家，行使向全國人大提名國務院總理人選，根據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決定，公佈法律，任免國務院組成人員，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等職權；對外代表國家，從事國際交往和友好往來，有利於更好地實現我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加強各國人民的友誼。並且，國家主席的設置是符合我國各族人民的習慣和願望的。

王德祥在《試論我國國家主席制度》一文中說：

從一九六六年以後，由於十年內亂，國家主席被迫停止了活動，當時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五年修改憲法時，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設置，使我國的國家元首制度處於一種不明確的狀態。粉碎「四人幫」以後，一九七八年憲法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的決定。這兩部憲法在設置國家主席問題上的指導思想都是不妥當的，因爲它把要不要設置國家主席看作是一種人爲的結果。這就不能不給我國國家機構的設置帶來消極的影響。

由此可見，「不設國家主席」是不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也是不符合全國各族人民的習慣和願望的。毛澤東的提法首先在法理上站不住腳。

毛澤東將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不是看作國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而是看作自己個人的需要，「是一種人爲的結果」。毛澤東不想當國家主席，「我不能再作此事」，就要修改憲法，「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這是毛澤東在晚年將自己的個人需要和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和人民利益之上的突出表現。從個人利益出發來決定政策，是毛澤東晚年思想作風的一大特點。

相反地，林彪提出及堅持設國家主席，其理由是「否則，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五月中旬林彪又對吳法憲說：「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不管林彪說這番話時，是眞心誠意，還是虛情假意，但他所表達出來的理由是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的需要和利益出

發，因此，它是正當的，合理的。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就不如林彪。

毛澤東提出和堅持不設國家主席的另一個理由是「不要因人設事」。毛澤東的意思是說：不要因爲他而特意設立國家主席這個職位。毛澤東的這種說法十分要不得。毛澤東認爲，若大個中國，八億人口中只有他才適合當國家主席，國家主席這個職位，是專爲他而設的。現在他不想當了，所以「不要因人設事」。而且，毛澤東將國家主席視爲自己的「世襲領地」，不容他人染指。本來，毛澤東不想或不適合當國家主席，提出「此議不妥」，這都是正常的，合理的。他不能當，但其他人可以當，毛澤東應該允許其他人擔任，可是，就因爲自己「不能再做此事」，毛澤東於是提出「不設立國家主席」。自己不當，也不讓其他的人當，美其名曰「不要因人設事」。毛澤東對權力佔有方面的那種自私、專橫、霸道的心理，在這裏表露無遺。

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當時在全國政協機關的小組討論會上發言，十分透徹地講明了問題的實質：

> 比如設國家主席，一國的元首，不能沒有。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選誰當國家主席是一回事。國家主席不可不設，甚麼人當國家主席則可以經過法定手續來選……（引自《開放》雜誌一九八九年創刊號《梁漱溟「文革」自述》）

其中的道理既簡單又明白，連不涉政治的民主人士梁漱溟都看得一清二楚，說得至情至理。是身爲中共中央主席、曾經主持起草了中國第一部憲法的毛澤東不懂得這一淺易的道理嗎？非也。毛澤東完全

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出於種種私心雜念，毛澤東明知錯也要去做，明知不該爲，也要執意而爲。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境界，往往不如一名民主人士。

正如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所說：「即使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這也不是反黨行爲。」梁漱溟先生也說：「甚麼人當國家主席則可以經過法定手續來選」。林彪作爲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和中共的黨員，如果人民選他當國家主席的話，他完全可以當。這本是十分淺顯的道理。可是，毛澤東出於自私自利的考慮，擔心「大權旁落」，威脅到自己的權勢地位，而用「不設國家主席」的權術，來阻止林彪當國家主席。毛澤東的這種做法完全是錯誤的，毛澤東無權私自決定誰可以當國家主席、誰不可以當國家主席，他也無權私自決定設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不僅在中共黨內搞獨裁，搞家長制、一言堂，自己指定接班人，欽定副統帥，而且他還把這一套搬到國家生活中，連國家元首這樣的大事，都要自己說了算。「國家主席」問題，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重大而惡劣的錯誤之一。

由於「不設國家主席」是不合法規，違反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因此，毛澤東的提議遭到政治局大多數委員的反對。周恩來一而再、再而三地將這些反對意見向毛澤東匯報，但毛澤東充耳不聞，不予理睬；當林彪的建議被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之後，毛澤東又一人推翻中央政治局集體通過的決議，踐踏民主原則，不准設國家主席。到了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更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毛澤東爲中共規定的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集體，少數服從多數，地方服從中央」。可是，事到臨頭，毛澤東就不服從了。

在毛澤東與林彪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爭論中，無論從法理、觀點、動機、組織原則來說，毛澤東都是錯誤的。這一點本來是顯而易見的事，可是，至今爲止，不論是官方的正史，還是民間的野史、專

著，在講到這段歷史時，都對此避而不談。他們對歷史、對人民欠了一個交待。

六、「林彪想當國家主席」──證據不足

第一個提出「林彪想當國家主席」的，是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官方發表的毛澤東南巡講話中提到的。毛澤東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於是，從那以後，「想當國家主席」便成爲林彪的一項罪名，官史、野史便都異口同聲地這樣說。

可是，究竟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呢？

「九・一三」以後，在整個批判林彪的運動中，官方公佈出來的有關這方面的證據只有一條，那就是吳法憲後來揭發的：葉群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私下對吳法憲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那裏擺？」這便是唯一的一條證據。

嚴格來說，這不是直接證據，而是間接證據，哪個想當國家主席的意思，不是由林彪口中說出，而是由葉群口中說出，並且是經過吳法憲，輾轉透露出來的。

葉群所講的，是不是林彪的意思？官方沒有說。從法律的角度來講，葉群說的話，並不能等於林彪說的話，何況林彪與葉群之間存在着許多的分歧。同時，吳法憲講的是否是實話，也是值得懷疑的。起碼吳法憲轉述的，並非是葉群的原話。因爲葉群向外人稱呼林彪時，是叫「林副主席」或「一〇一」，而不會直稱名諱「林彪」。另外，如果林彪眞有想當國家主席的意圖，他或葉群必然會跟幾個心腹大將講。爲甚麼「四大金剛」中，只有吳法憲知道這件事，而其他人如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以及陳伯達

和「小艦隊」的頭目江騰蛟、李偉信等均不知道這回事，也沒有這方面的揭發材料呢？如果確有其事，葉群這位愛嘮叨、好囉嗦的女人，不會只跟吳法憲講，而不與其他的心腹幹將講。尤其是論關係，葉群與黃永勝要比與吳法憲親密得多，沒有理由葉群將林彪心中的重大隱密向吳法憲透露，而不與枕邊人黃永勝講。這在情理上是講不通的。事情不能不令人感到蹺蹊。

俗語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在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上，林彪與毛澤東吵得轟轟烈烈，可是毛澤東能夠拿出來的「林彪想當國家主席」的證據，卻是如此的稀少，如此地靠不住，這對毛澤東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能夠證明「林彪想當國家主席」的唯一證據——吳法憲的揭發材料，是「九·一三」以後，將吳法憲逮捕、審訊時，才揭發出來的。那麼，「九·一三」之前，毛澤東在八月的南巡講話中就說「有人想當國家主席」，毛澤東憑的是甚麼呢？毛澤東有甚麼證據指控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呢？完全沒有。毛澤東憑的只是自己的猜測和臆斷，也就是說是憑主觀的因素。對黨的副主席作出如此重大的政治指控，毛澤東竟然沒有任何的客觀事實，只是單純憑主觀推斷，這未免太「莫須有」了。

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說：「林彪身爲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地位僅在毛澤東一人之下，身體又的確很不好，他是不是對任國家主席很感興趣，不得而知。」其實，對於這一點，不但黨史專家王年一不得而知，而且，連毛澤東本人，以及千千萬萬的中共高幹和億萬的人民群衆，都不得而知。

事實上，林彪自己從未講過自己想當國家主席。在四月十一日的建議中，連擔任副主席都「不適宜」。如果說這只是林彪的韜晦之計，虛虛實實，心中的意圖不能明講出來；那麼在整個關於國家主席爭論的過程中，甚至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兩天半的「發難」時間裏，也都完全沒有任何人提出由林彪任

國家主席。《大動亂的年代》一書特別指出：九屆二中全會的「小組會上，沒有人提出林彪當國家主席」。毛澤東指控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難」，「搞突然襲擊」，「急於當國家主席」，可是，在整個會議過程中，竟沒有任何涉及「林彪當國家主席」的內容。這是值得深思的。

「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之說，是否太勉強了？

七、「不設國家主席」的奧秘

「國家主席」這個頭銜，是在一九五四年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而第一任國家主席，也是毛澤東。

其實，早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剛剛成立時，毛澤東便擔任了「主席」，但那時是叫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到一九五四年第一屆人大時，才正名爲「國家主席」。那時候，毛澤東既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名譽主席，一身兼任四個主席，將黨、政、軍大權獨攬，開了歷史的先河。

一九五三年，中共醞釀學習蘇聯的政治體制，毛澤東曾提出辭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職。後來，因爲發生「高、饒事件」，此事便拖了下來。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清算斯大林。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獨裁一時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大氣候。中共中央應順這個歷史潮流，在中共「八大」會議上也提出了「反對個人迷信」等政策。在這種大勢所趨之下，毛澤東不得不再次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並說最遲不超過一九五八年年底之前實踐。

毛澤東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上請辭國家主席一職的。不知道是不是對辭職一事感到勉強和不忿，在討論由誰來接任國家主席職務時，毛澤東竟然一聲不吭。按常規，毛澤東作爲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應當提出繼任人選，供中央全會討論。可是，毛澤東卻像事不關己似地沉默着。由於毛澤東的沉默，其他人就不便開口，會場上一時出現冷場。是鄧小平打破這個沉默，提議由劉少奇繼任國家主席，話剛落音，會場上響起熱烈的掌聲。於是，劉少奇的任命便順利通過了。國家主席的繼任人選不是由毛澤東提出，而是由鄧小平提出，這是不是有些不尋常呢？

在毛澤東的統治權術的寶庫中，有一條叫做「權力平衡」。毛澤東做爲「掌門人」，在權力的分配中，必須注意不可讓某人或某一集團所獲得的權力過多過大。否則，此人或此集團坐大後，便會威脅到毛澤東本人做爲「掌門人」的地位。這是毛澤東從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宮廷鬥爭中所吸取的一條重要經驗。毛澤東在運用這條經驗時，不但得心應手，而且有所豐富和創造，那就是在平衡各個集團的權力的同時，還可以令到他們之間互相猜忌、產生矛盾，這樣一來，各個集團都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來抗衡對方。於是，各個集團都離不開毛澤東，都爭相奉承毛澤東，毛澤東就可以永保至高無上的地位。毛澤東將這一套統治權術運用得爐火純青。

在中共核心領導中，論資歷、水平、能力、威望，除了毛澤東便是劉少奇了。劉少奇當時已經擔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再擔任國家主席，其權力就太多太重了，權力架構的平衡就會打破，毛澤東的地位就要受到威脅。毛澤東不希望見到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但又不能、也沒有理由出面反對。這就是毛澤東矛盾的心理狀態。也是他不提劉少奇繼任國家主席的原因所在。

毛澤東擔心的事情果然出現了。劉少奇由於主持國民經濟的鞏固、調整工作，使國家迅速擺脫「大

躍進」造成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劉少奇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之中的威望，也日漸提高。「劉委員長」變成了「劉主席」，每年國慶節《人民日報》刊登出來的照片，毛主席與劉主席左右並列，大小一樣。用江青的話來說：「那不是平起平坐了嗎？」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北京的中共黨史專家們，在研究和探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問題時，曾總結了各方面提出的十種不同的意見，叫做「文革起因十說」。其主流派的意見，並沒有把「打倒劉少奇」的因素包括在內。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如果說「打倒劉少奇」不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那麼起碼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否認這一點，就是妄顧歷史事實。於是，中共中央主席打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並將其置於死地。中國現代史上又增添了一項新的「創舉」。

在這種複雜的歷史背景之下，毛澤東是否重新拾回「國家主席」這頂桂冠，便需要再三思量了。

其一，如果再當國家主席，便有違毛澤東在五十年代許下的「不當」的諾言，造成了「食言」、「不守諾言」，爲天下人所不齒及恥笑；

其二，發動「文化大革命」，儘管毛澤東做了大量的理論上的掩飾，但打倒劉少奇的成分畢竟是太過明顯了，正所謂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不能不成爲毛澤東的一塊心病。打倒劉少奇之後，又將他頭上的那頂「國家主席」的桂冠拿過來戴在自己的頭上，這不成了予人口實的愚蠢之舉嗎？況且，劉少奇戴過的帽子——即使是頂皇冠，自己再檢起來戴，是否有些犯賤、下作，從而降低了自己的無比崇高的身份呢？

經過反覆的思量之後，政治經驗豐富老到的毛澤東遂決定不當國家主席。於是，「我不能再作此

事，此議不妥」的批示就出現了。毛澤東「不能再做此事」的苦衷便是在此。

毛澤東在一九七〇年面對的情況，與一九五八年有些類似。

經過文化大革命，林彪的權勢得到急劇的膨脹。在「九大」上，林彪被選爲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其接班人的地位又被寫入黨章之中。而且，林彪集團的成員：黃永勝、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再加上新投靠過去的陣伯達，形成了一個陣容頗爲鼎盛、有文有武的權力集團。權力架構的平衡被打破了，權力的天秤出現了傾斜。這是毛澤東不願見到，但又不能不接受的既成事實。

當召開四屆人大提到日程上來時，毛澤東首先想到的，便是林彪和國家主席這兩個問題。自己是再也不能當國家主席的了，那麼這頂皇冠很可能就會落到林彪的頭上。林彪加國家主席，權力的天秤將更加傾斜。劉少奇的情況會不會再次出現呢？大權會不會再次旁落呢？中國會不會又出現兩個主席呢？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毛澤東與林彪的一次談話中，清楚地表達了他在這方面的憂慮。毛澤東說：

「國家主席還是不設爲好。一人任黨主席和國家主席會被壓垮。兩個主席會打架。這方面我有體會。你還是當好黨的副主席，抓好軍隊」。

於是，毛澤東在不當國家主席的同時，又作出了「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決策。這項決策，是對準林彪而射出的一根利箭，其目的就是阻止林彪當國家主席。

毛澤東爲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與地位，而不願意讓林彪出任國家主席，這是出自私心，自然是說不出口的；而且他也沒有可以擺到桌面上來的反對理由。因此，毛澤東沒有開誠公佈地加以反對，只是採取了一招「釜底抽薪」之計，乾脆決定不設國家主席。這當然不是陽謀，而不折不扣是陰謀詭計。毛澤東

反對和憎惡別人對他採用陰謀詭計，可是他卻屢屢向別人施以陰謀詭計，他號召別人要「光明正大」，他自己卻不光明正大。這種現象，在毛澤東的晚年並不少見。

這就是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不可告人的奧秘。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無疑是理虧的、心虛的。因此，當林彪奮起反擊時，毛澤東始終提不出爲甚麼要「不設國家主席」的充分理由，來進行防衛。所謂「不要因人設事」等理由，顯得蒼白無力，不堪一駁。因此，毛澤東既說服不了林彪和周恩來，也說服不了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連跟在他身邊、日夜侍俸的汪東興，都不能理解毛澤東的意旨。只有不願看到林彪集團壓倒自己的江青集團，才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不設國家主席」不得人心。因此，當林彪堅持不捨，到了廬山上也不妥協時，毛澤東無法招架，便老羞成怒了，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毛澤東還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誰去當！」

毛澤東是狼狽的。這些話已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使性子、發脾氣了。爲甚麼不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對國家、對人民有甚麼好處？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沒有加予解釋，他恐怕也無法解釋。毛澤東對歷史、對人民欠了一個交待。

設不設國家主席之爭，是「林彪事件」的導火線和基本點。剖析清楚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有助於我們了解毛林關係、毛林鬥爭，以及整個「林彪事件」的性質。

毛澤東提出的「不設國家主席」的決策，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許多重大錯誤之中較爲突出的一件。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作風和政治品質。而這一錯誤也引致了嚴重的後果——震撼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毛澤東、林彪和億萬的中國人民，都在這次事件中受到了猛烈的衝擊，而中國的現

代史也在「九・一三」這一天開始轉彎。

八、「孫權與曹操」

周恩來的秘書何樹英在回憶錄中說：

「林彪頂撞毛澤東並不像彭德懷常常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對事不對人，公事公辦的態度。他每次去見主席，基本都是談工作，並沒有甚麼私交，他見主席很少有笑臉，不請自坐，並且軍人氣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兩目平視毛澤東，有事說事，沒事告辭。談事時，基本是板着面孔，該匯報的匯報，該聽指示聽指示，聽到不同意見，有的接受，有的爭論。他爭論時，不喊不吵，聲調始終平板、平淡，喜歡講一句『不是那麼回事』，然後陳述自己的意見。一組（指毛澤東辦公室）的同志多次見他堅持自己的意見。」

堅持自己的意見和敢於頂撞毛澤東，是林彪一生的特色之一。

林彪作爲一名政治家、戰畧家，不會看不出毛澤東提出的「不設國家主席」是衝着自己來的，不會感覺不到毛澤東的「苦心孤詣」。當葉群參加政治局會議回來，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將會議的內容和情況詳詳細細地向林彪匯報後，林彪陷入了沉思。

從毛澤東那裏傳來的第一個訊息是：隨着劉少奇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取得初步勝利，以及「九大」的勝利召開，標志着毛澤東今後將依靠黨組織，而不再是依靠軍隊來統治國家了。軍隊，也就是林彪的利用價值已經結束，毛澤東在六十年代中期說的「過去我們依靠解放軍，今後我們也將依靠人民解放

軍」的時代已成爲過去，換言之，毛澤東與林彪及軍隊的「蜜月期」已經過去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過河抽板」，「卸磨殺驢」，看來中國人已經看慣了這些利用和被利用的種種形態，不但過去有，今天也有，毛澤東只不過是打着共產黨的旗號而已。

從毛澤東那裏傳來的第二個訊息，是毛澤東已經將他與林彪的關係，由合作轉爲對抗，由政治盟友變成潛在的敵人。毛澤東對林彪已由信賴變爲猜疑，對林彪採取警惕、提防的態度。林彪吸取以往的歷史教訓，爲自己定下了「韜晦」之計，事事小心，每每在意，又「高舉」，又「緊跟」，結果仍然避免不了毛澤東的猜疑。林彪感到十分的無奈。

最令林彪感到不滿和憤怒的，是毛澤東的那種輕蔑的態度。這麼大件事，毛澤東沒有與林彪商量，連聲招呼也不打;所採取的，又是這麼一種針對林彪的無禮的方式，壓根兒沒把林彪放在眼裏，根本不考慮林彪的感受，就當林彪不存在一樣。相形之下，林彪就像一名妓女，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用完之後，棄之如敝履。毛澤東做得實在是過份了。

生性孤傲、清高的林彪，其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這種奇耻大辱，在林彪一生中，還是第一次。一九三五年，在長征途中的會理，林彪因爲寫信要毛澤東下台的事，被毛澤東在會議上批評兼嘲笑:「你只是個娃娃，懂得甚麼?」雖然是嘲笑，但仍使人們感到其中的一絲溫情和善意。除此以外，中共的其他領導人，對出任紅四軍軍長以後的林彪，從未提出過任何的批評、指責，更不用說是奚落和嘲笑。而與林彪同級的領導人，如聶榮臻、羅榮桓等，都知道他爭強好勝、自尊心很重，因此，除了某些工作上的分歧有所爭論外，在其他方面均尊重、維護他。因此，這次毛澤東的發難，實在是林彪平生僅有的奇耻大辱。

在蘇州，林彪吃不下，睡不好，只是不斷地踱步，累了便倚在沙發上閉目沉思。那情形，就像遼瀋戰役前夕那樣。瞻前思後，林彪當然不會不知道與毛澤東撕破臉的嚴重後果，但是他怎麼也嚥不下這口氣。而且，在毛澤東的「發難」面前做縮頭烏龜，世人將怎樣耻笑他呢？在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方面，由於事不關己，林彪奉行「主席畫圈我畫圈」；可是，一旦涉及到自尊心和名譽，林彪便不能再唯唯諾諾，等閑視之了。林彪沒有後退之路，他只有接下毛澤東的挑戰，奮起還擊。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林彪於四月十一日發出了「三條」意見。第一條是建議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不符合人民的願望。在這裏，林彪針鋒相對地提出要設國家主席，並用「人民的願望」來作爲自己的後盾。而且，林彪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毛澤東不是有難言苦衷，不能再當國家主席嗎？我就偏要提議讓你當，叫你爲難，難堪，看你怎麼辦。對此，毛澤東就如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毛澤東只能說「我不能再做此事」，但爲甚麼「不能再做」，他始終說不出口。林彪還擊的這一招，可謂「又刁又狠」。

第二條，林彪提的副主席可設可不設，可多可少，純屬是煙幕，使人感到他眞的是在考慮「國家主席」的公事，而不是在「還擊」。第三條，林彪提出自己不宜任副主席，這是保護自己的一項措施，以防止毛澤東反咬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或副主席。這三條，有攻有防，有主攻有掩護，十足是打仗的章法。

四月十一日以前，設不設及當不當國家主席問題，只在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來回討論，林彪沒有參加，也不打算參加。所以三月九日的政治局會議，他沒有參加，只派了葉群參加。毛澤東三月八日發難後，林彪不得不加入戰圈，主張設國家主席這一方的陣容大爲增強，形勢大爲改觀，中央政治局做出了「設立國家主席」的正式決議。毛澤東更加孤立了。儘管毛澤東否決了政治局的決議，但林彪堅持不

捨，咬住不放，一味地鼓動，而且還指使吳法憲等人在憲法修改小組堅持寫上「國家主席」這一章。而周恩來也從旁配合，不時將政治局中設與不設兩種意見激烈爭持的情況報告毛澤東，要毛澤東再三考慮。一時間，毛澤東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

四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不願讓此事如此糾纏下去，於是破例地出席了這一次政治局會議，而林彪也跟隨出席了會議。爲了盡快平息這場由自己挑起的紛爭，毛澤東不好正面解釋爲甚麼不設、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又不能夠輕描淡寫地勸說一番，於是他在會上當着林彪的面講了一個《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毛澤東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毛澤東引用的典故，出自《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治風癱神醫身死　傳遺章奸雄數經」，原文如下：

> 卻說曹操自殺華佗之後，病勢急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急奏東吳遣使上書。操取書拆視之，畧曰：
>
> 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王上，尤望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掃平西川，臣即率衆下納土歸降矣。
>
> 操觀畢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

當時，孫權手下大將呂蒙使計襲破荆州，擒殺關雲長父子。孫權恐怕劉備報仇，攻打東吳，便想聯曹抗劉。而劉備是漢獻帝之皇叔，負有驅除漢賊（曹操），扶匡漢室的使命。在這種形勢下，曹操如果

聽從孫權的勸喻，廢掉獻帝而「早正大位」，則可以將劉備的仇恨和注意力轉移到曹操身上，而孫權便可安全脫身。這是一着「金蟬脫殼」之計。

曹操當時已身患重病，心知自己一旦廢帝正位，必招致包括劉備在內的天下英雄的討伐，屆時將天無寧日，自己只會死得更早些。因此，曹操說：孫權是想將我放在爐火上烤。

毛澤東自比曹操，其處境也有相似之處。八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上說：「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引用這個典故，是想向林彪等人表明：他已洞察了林彪的用心。於是又說：「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曹操的魏國，與孫權的吳國，是兩個敵對的國家。孫權於曹操，有殺父之仇；而曹操於孫權，則有赤壁大敗之恨。曹、孫兩人勢如水火，你死我活。毛澤東用曹、孫的關係來比喻自己與林彪的關係，說明毛澤東憤怒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敵意已頗深。

毛澤東引用這個典故，也佐證了林彪確實是想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而並非是自己想當國家主席。否則的話，以毛澤東這樣犀利的眼光，不會不發覺林彪自己想當國家主席的陰謀。這樣一來，毛澤東就不會引用這個典故，而就會引用另外的典故了。

毛澤東的充滿敵意和威脅意味的典故，並沒有使林彪退卻。五月中旬，林彪向吳法憲說：他仍然主張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而言不順。林彪要吳法憲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議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這一章。看來，林彪也豁出去了。

於是，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便擴大到憲法工作小組中去了。在毛澤東與江青的指使下，張春橋和康生在憲法工作小組中不但堅持不設國家主席，而且還提出了「可以不提毛澤東思想是全國的指導思

想」，以及不同意在憲法總綱中寫上「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吳法憲抓住張春橋、康生的這些話大作文章。八月十三日，吳法憲在小組會上說：「有人利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在會議中間，吳法憲打電話給黃永勝報告了有關情況，而黃永勝又報告給林彪。林彪聽後說：「吳胖子放炮放得好。」

與毛澤東的意願相反，鬥爭擴大化了。一方面，毛澤東與林彪的爭論，已從單一的國家主席問題，擴大到其他方面。爲了抑制林彪集團的權勢，也是由於失去了利用的價值，毛澤東從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始，便有意地打擊林彪。在十二中全會公報及「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兩次圈去「天才地」那三個副詞，以及否決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而採用了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都是這種有意的打擊措施。這一次，在修改憲法中，又指使張春橋等人在三個副詞及毛澤東思想問題上作文章。林彪是靠「高舉」和「緊跟」起家的。「三個副詞」和「毛澤東思想是全國的指導方針」等，都是林彪的政治資本，否定它們就等於否定林彪，等於否定林彪多年來的「高舉」和「緊跟」。這對林彪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林彪和葉群自然明白這是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鬥爭。因此，說甚麼也要捍衛這塊陣地。於是，在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葉群分別打電話給陳伯達和黃永勝，要他們準備關於「天才」和「四個偉大」的語錄。林彪和葉群準備大幹一場。

另一方面，毛澤東與林彪的爭論，也由毛林兩個人，擴大到兩大權力集團。以江青爲首的「文革集團」、「筆桿子集團」，不願意看到林彪爲首的軍人集團的權勢超過自己，江青認爲，反正國家主席的頭銜，怎麼也不會輪到自己的頭上，於是跟着毛澤東搖旗吶喊。江青一伙利用毛澤東的旗幟來與林彪集團抗衡，而毛澤東也利用他們作爲工具來打擊林彪。在林彪集團這邊，黃、吳、葉、李、邱幾員大將與

林彪休戚相關，榮辱與共，自然也要賣勁地反擊江青集團的挑戰，保衛林彪。毛、林的鬥爭，已擴大到兩大集團的層面，而且又通過這些親信，擴大、影響到更加廣泛的層面，成爲中央政治局和整個中央委員會範圍內的鬥爭。

一場工作上的爭論，演變成爲一場政治上的決鬥。此時此地，毛澤東和林彪都不能輕易地退卻。一場最後的鬥爭不可避免了。

第二章　廬山風雲

一、久違了，廬山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二時，毛澤東乘專列火車離開杭州出發去江西。十九日到達江西的九江市，接着轉乘汽車於當天上了廬山，準備主持召開九屆二中全會。

毛澤東這是第三次上廬山。上一次是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了工作會議，討論在「大躍進」嚴重失誤後，工業全面退卻，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再上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那也是一次中央的工作會議，後來由於那個彭德懷，演變成「反右傾」的八屆八中全會。整整有十年，毛澤東沒有上過廬山。久違了，廬山！

上廬山的公路還是那麼彎彎曲曲，平均一公里要拐十六個彎。上廬山的公路長約三十五公里，總共要一左一右地拐上近四百個彎。因此，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寫的《七律·登廬山》一詩中，便有「躍上葱蘢四百旋」之句。廬山的風光依故，那茂密的樹林，還是那樣的森森青黛；廬山的雲海，也還是那樣的變幻迷茫。然而，神州大地卻是「換了人間」，而毛澤東本人，似乎也變了許多。

八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天，毛澤東在廬林別墅裏靜靜地休息，看書，沒有外出遊山，也沒有到

蘆林湖游泳。毛澤東顯得心事重重。

想當年，毛澤東無論是對世界還是對命運，都是那麼的自信，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一上到廬山後，便遊鄱陽口，遊仙人洞，在蘆林湖里嬉水弄波，把酒夜話，談笑風生。那首《七律·登廬山》便充分地體現出毛澤東當年的心情：

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葱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

原詩前有小序：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廬山，望鄱陽湖、揚子江，千巒競秀，萬壑爭流，紅日方升，成詩八句。

那時的毛澤東，心情開朗，揮灑自如，豪情滿懷。兩個月後，即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毛澤東給《詩刊》編輯部編輯臧克家、袁水柏去信，說：「近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以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

產階級的投機分子，他們裏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傢伙，簡直要把個崑崙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國內掛着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揀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着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眞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毛澤東在信中還說這首詩和另一首《七律·到韶山》是「答覆那些王八蛋的」。也許是到此時此地，毛澤東的心情已經大變了。因此，在給《詩刊》發表時，將上述的「小序」全部刪去了。

其實，自從肅整彭德懷之後，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便失去了那種平和與安寧了。彭德懷已與「大躍進」連結在一起，在毛澤東的心頭上形成了一副重擔。負着它，毛澤東走過了三年的災難，調整鞏固，然後便是那個「大多數人反對，只有少數人贊成」的文化大革命。「全國山河一遍紅」了，「九大」也開過了，但天下還是大亂，國家已千瘡百孔，黨已遍體鱗傷，群衆四分五裂，武鬥還在連綿不斷。「天下大治」還是一個遙遠的夢。毛澤東對駕馭局勢，駕馭歷史的能力動搖了。現在，又增加了一個林彪和「國家主席」，毛澤東已經沒有遊山玩水的閒情雅緻了。

而且，廬山上的面孔也全然變了。當年，與毛澤東吟詩唱和的有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等元老；與毛澤東清談的有田家英、胡喬木、周小舟、李銳等四方才子；陪毛澤東游泳的則有那個羅瑞卿大將，還有王任重、陶鑄等人。他們畢竟是開國元勛、革命功臣，不要說革命資歷，就是文化素養，也要比現在上廬山的那班文革新貴好得多。現在，他們已經被毛澤東親自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打得七零八落，幸存下來的朱德、董必武等人，也都對偉大的領袖敬而遠之，他們遠避猶來不及，那里還敢去附攀風雅啊！

毛澤東感到深深的寂寞，只好用讀書來打發時間。

林彪是在八月二十日帶着葉群和林立果上廬山的。林立果的身份是軍委秘書，帶上他，是想讓這位「第三代接班人」見見世面。

一九三三年，在第四次反圍剿期間，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長張際春編了一部大型劇本，名爲《廬山雪》，描寫紅軍打進了南昌，殺上廬山，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就像春天廬山上的殘雪，很快瓦解、消融。劇本中有許多角色是紅軍的高級幹部。爲了體現官兵同樂，周恩來支持和鼓勵紅一軍團的領導幹部登台演出。任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的羅瑞卿自告奮勇飾演了蔣介石，童小鵬身材矮小，便扮演宋美齡。林彪也破例上台演出。

原來，大家想把軍團長林彪也拉進來參加演出。但他那個人性格內向，不喜交際，又生性高傲，須用激將法才行。於是，在一次會議後，林彪情緒很好，羅榮桓、聶榮臻、羅瑞卿等人，便一同向林彪走過來。

羅瑞卿說：「我和聶政委剛才講了演戲的事，那可是一門高深的藝術。」

林彪說：「別以爲只有你們才會演戲，我在中學時代就演過了。」

聶榮臻說：「軍團長會演戲？這可是大新聞！」

羅榮桓也在旁邊幫腔，不懷好意地笑着。

林彪說：「像聶政委在台上那麼一站，手按着腰，下幾句命令，滿口四川麻辣味，誰不會？」

聶榮臻說：「軍團長，你要不服氣，咱們上台試一試，比一比！」

這一激之下，心高氣傲的林彪果然中計，說道：「試就試，誰還怕你了？」

過了幾天，羅瑞卿將修改好的劇本送到林彪面前。

林彪一看，便打退堂鼓，說：「前幾天大家是說說而已，怎麼當眞了？」

聶榮臻說：「『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軍團長，你向來言而有信，這一次可不能食言無信！」

林彪脹紅了臉，說道：「演就演，但得有個條件。」

聶榮臻說：「甚麼條件？」

林彪說：「咱們大家都上台，一齊演！」

聶榮臻說：「好，給你演軍團長，羅瑞卿給你演對手戲，飾國民黨的軍長。」

林彪說：「不行，羅瑞卿的官太小。」

聶榮臻說：「那羅瑞卿就演何鍵吧。何鍵（時任國民黨湖南省主席，多次出任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的總指揮）官不小了吧？」

林彪心裏仍不滿意，但又不好出聲。聶榮臻看了林彪的神情，心裏知道林彪心性淸高，虛榮心強，給他演對手戲的，當然官越大越好。於是說道：

「羅瑞卿乾脆就演蔣介石好了。軍團長打敗蔣介石！」

於是，演戲的事便這樣決定了。

林彪，這個公認爲性情古怪的人這次表現出了罕見的熱情。本來，大伙都還挺擔心他過於拘謹、呆板，誰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斷抖出一些令人叫絕的「包袱」。

戲演到最後一幕，達到高潮。台上正是軍團司令部，一張桌子，幾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電話機。突然，鈴聲響了。

「喂，我是軍團長，有甚麼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電話。
「現在山上繳獲了許多戰利品，請示怎麼處理？」
「用船裝回來」。林彪答覆得很乾脆。
「山上怎麼走船？」台下一陣大嘩，周恩來、博古、洛甫等中央領導人笑成一團。
電話裏的人繼續請示，「俘虜怎麼辦？」
「請羅主任回答。」林彪向來不管屬於政治工作的事。這是政治部主任的職責範圍，可是他忘了，羅榮桓正在害瘧疾，事先說好不上台的。林彪這一嚷不要緊，台下又是一陣哄笑，幾個小伙子不由分說，把羅榮桓推上台。
好容易處理了俘虜的問題，蔣介石又被押到。
「你是蔣介石？」林彪問。
「是，」扮演蔣介石的羅瑞卿回答。這些都是台詞，可是，往下，林彪就脫離劇本，隨心所欲地跑調。
「你爲甚麼這樣瘦？」
羅瑞卿一怔，急忙補台，「我滿腦子只想到剝削人民，所以胖不起來。」
「那爲甚麼不吃補藥？」林彪又冒一句。
「補藥？」羅瑞卿答不上，「甚麼補藥？」
「補藥可多囉，人參、燕窩、罐頭、紅燒肉……」林彪越說越帶勁。
羅瑞卿靈機一動，臨場編排道：「甚麼補藥都不中用，我心腸壞了，吃紅肉拉白水，不可救藥。」

一個亂編，一個巧補，自然渾成，天衣無縫。台下的將士，反應極其熱烈。

表演《廬山雪》，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如今，蔣介石早已被打倒，林彪是以一種近似主人翁的心情，躊躇滿志地上到廬山來的。

先期上山的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張春橋、許世友等人，按慣例都來廬林別墅拜會毛澤東。可是林彪和葉群卻一直不露面。

林彪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優閒地看書。他上山後的當天下午，陳伯達便上門拜訪了。他們（當然還包括葉群）談了一個多小時，主要是商量如何對「陸定一式的人物」發動攻擊。陸定一是林彪葉群的宿敵，早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便被打倒了。現在，「陸定一式的人物」指的是張春橋。爲甚麼將張春橋與陸定一掛在一起呢？大概是兩者都是戴眼鏡的文人，但更重要的是，林彪和葉群將張春橋看成是像陸定一一樣危險的敵人。在當時還沒有與毛澤東、江青撕破臉的情況下，亦不便公開點張春橋的名。正如葉群所說：這是不點名的點名！

除了留守北京的黃永勝以外，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來拜會林彪。據吳法憲後來交代：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廬山，黃昏前葉群邀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去遊仙人洞。葉群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我根據林彪、葉群的交代，八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先後同王秉璋、王維國、陳勵耘等人講過堅持國家主席問題，對其中有些人還講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裏擺。」

廬山上的仙人洞，自從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傍晚到此一遊，並在九月九日題詩《爲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之後名聲大噪。毛澤東在詩中寫道：

暮色蒼茫看勁松，
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
無限風光在險峯。

為了領略毛澤東在詩中所寫的那種意境，遊仙人洞的最佳時間，便是在暮色蒼茫的黃昏。為了犒勞林彪麾下的幾員大將，葉群於是邀他們在黃昏前把臂同遊。這既是戰役前的激勵，又是動員令。廬山又面臨着一場龍爭虎鬥。

二、「兩天半的發難」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在廬山三所毛澤東的辦公室，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列席會議，並擔任記錄。會議主要討論和確定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

下面是汪東興所做的會議記錄，這是目前為止公開發表的最詳盡，也是最權威的材料，轉錄如下：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在廬山三所毛主席的辦公室，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毛主席、林彪、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我列席這次會議，並作了記錄。這次會

議主要是討論和確定九居二中全會的議程。

九居二中全會原定有兩項議程：一、討論和修改將要在四居全國人大提出的新憲法草案；二、討論國民經濟的年度計劃。在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主席建議增加一項內容，即談一談當時的形勢。毛主席說：「除了討論修改憲法、計劃問題外，還應該加個形勢問題。據我所知，大家有興趣的問題是形勢問題。」

康生說：「修改憲法搞了很久，憲法委員會也開過第一次會了。全國人民正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說：「憲法修改草案可以發給大家看。但是大家有興趣的還是形勢問題。」

林彪、周總理、陳伯達、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議，並提議由毛主席講形勢問題。

毛主席說：「我主持會議，由總理講形勢吧，修改憲法問題由康生講。」

康生推說：「憲法修改問題也由總理一道講吧。」

毛主席說：「那你們兩個人去商量解決好了！」

周總理接着談計劃問題。他說：「自今年開了計劃會議後，收效較快。五個月以來，全國有一定的生產效率，地方上的積極性大了。」

毛主席說：「原來這個下放（是指中央把管理經濟、管理企業的部分權力及財權、物權、投資權下放給地方）講是講了，但是他們沒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麼清楚，這次計劃會議解決了。」

周總理接着說：「各省、市、自治區不僅僅是農業有了生氣，有了發展，而且現在看起來工業形勢也好。今年的計劃完成的情況和原來預計的差不多，雖然『文革』的頭兩年有一點下降。」周總理是說一九七〇年全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基本上達到了「三五」計劃的原定指標。

毛主席說：「解放以後，統一了全國，出了個南糧北調、北煤南運的問題。解放以前，也存在這個問題，但是我們不知道。不曉得蔣介石統治的時候，煤要不要南運？糧呢，要不要北運？看來，要逐步地解決這個問題。現在南方找到了很多煤礦，北方糧食也逐步自給了。」

周總理說：「人民生活確實是改善了。這種形勢，主要是靠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澤東思想傳播了，生產經驗也就傳播了。」康生接着說：「哪裏的毛主席思想深入，哪裏的工作、生產一定就好了。規律完全是這樣的。」

毛主席聽了擺擺手，表示不贊成這種說法。毛主席說：「看我們是依靠誰的問題了。有的人依靠專家治廠。工業這方面，我看要依靠專家、科學家，甚至洋專家，除這之外，也還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說，工業上既要依靠專家，包括洋專家，也要依靠工人階級。

林彪跟着說：「主要是調動全國億萬人民的積極性。」

陳伯達隨聲附和說：「我到下邊看了一下，形勢很好。群衆積極性很高，幹勁也很大，連中學生都自辦工廠。」

談完經濟問題後，常委們又議論政治問題。

周總理提出說：「還有黨代會的問題。」

康生說：「恐怕有些縣、市，甚至有的省、市要開黨代會。」

毛主席說：「黨代會不僅是從下到上開，有的要用從上到下的辦法開。」

康生說：「兩個辦法都可以。」

周總理分析說：「等到明年九大召開兩周年的時候，各省、市、自治區開成黨代表大會，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主席問：「整黨，各個地方不是早都開始了嗎？這個「吐故」（一九六八年毛澤東就整黨問題講過要『吐故納新』）吐得怎麼樣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對蔣南翔這樣的人留下來好。」

周總理回答說：「現在掛起來的較多。」

康生補充說：「我說『掛故』（掛故，是指當時要處理的黨員幹部被擱置起來）多。」

毛主席說：「你們講掛起來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還是要以教育爲主。」

周總理說：「有的人長期掛起來呀？我認爲還是下去勞動接觸群衆比較好。」

會議討論得差不多了，毛主席就說：「今天把大會的議程定下來了。會就開到這裏！」

根據汪東興的回憶錄，此後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毛澤東後來說的「兩天半的發難」，詳情如下：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開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禮堂的小會議室集合，毛主席問周總理和康生：「你們誰先講啊？」

毛主席剛說完這句話，林彪突然說：「我要講點意見。」（毛主席於八月三十一日寫的《我的一點意見》，題目中「一點意見」，我看是針對着林彪這裏說的「講點意見」的。）

林彪提出講話後，周總理、康生就說：「那好吧，你先講。」

林彪要講話，講些甚麽內容，多數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會討論九屆二中全會議程時，林彪也並沒有說這個問題。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說：「你們三人講吧！」這時，開會的鈴聲響了，常委們進入會場並在台上就座。毛主席宣佈開會，林彪首先講話。

林彪開頭說：「昨天下午，毛主席召集了常委會，對這次會議作了重要指示。這幾個月來，主席對於憲法的問題和人代會的問題都是很關心的。憲法的修改、人代會的召開問題，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認爲這很有必要，很合時宜。在國內、國外大好形勢下開人代會和修改憲法，對於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反帝反修鬥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有深遠影響的。」

林彪在講完開場白之後，逐漸轉入正題。他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

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同志是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們黨、政府、國家、軍隊的締造者。……我們有今天的勝利，決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還說：「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草案，表現出這樣一個特點，就是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爲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這種領導可以說是我們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間的決定因素。……這個領導地位，就成爲國內國外除極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我們的工作是前進還是後退，是勝利還是失敗，都取決於毛主席在中央的領導地位是鞏固還是不鞏固。」他強調說：「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這次憲法裏面規定毛主席的領導地位，規定毛澤東思想是指導思想。我最感興趣的、認爲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

林彪翻來覆去地講他的這些觀點，講了一個半小時。他顯然是有準備的。他講話時，講台上放着一個稿子。林彪的講話，既沒有講形勢，也沒有講其他新的問題。雖然台下有熱烈的掌聲，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聽得越來越不耐煩，明顯的不高興。周總理、康生也表現出着急的神態，陳伯達則聽得很認真。

林彪講完後已經四點半了。毛主席對周總理、康生說：「你們講吧！」語氣中流露出不悅的聲調。

周總理見此狀說：「計劃問題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講了。」

康生也說：「憲法說明已印發給大家，不講了。」

毛主席宣佈散會。

這天晚上，周總理召集政治局委員和各大區召集人開會，安排會議各組分別討論憲法和計劃問題，吳法憲卻在會上說林副主席的講話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學習，要求再播放他的講話錄音，大家附和了。周總理只好根據大家的意見，決定二十四日上午會議代表聽林彪講話的錄音，下午討論林彪的講話。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時，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參加九屆二中全會的全體人員在盧山禮堂聽林彪的講話錄音。會議由我主持，周總理、陳伯達、康生都參加了。錄音一共播放了兩遍，十一點半才散會。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各組討論林彪的講話。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分別在各組帶頭發言。他們在同一時間，引用同樣的語錄，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統一口徑，進行大肆煽動。

二十四日以後，部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代表所有省、市、自治區聯名寫信給毛主席和林彪，表態支持擁護毛主席當國家主席。他們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在各個小組煽動性的發言的影響，上當受騙了。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全會第六號簡報（即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印出來了，這個簡報中反映陳伯達講話的內容不多，卻大量刊登了我的講話內容。這個簡報印前沒有給我看。

三、「突然襲擊」

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的南巡講話中說：「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爲甚麼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峯、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

毛澤東在這裏一連講了三個「突然襲擊」。林彪一伙都搞了些甚麼突然襲擊？毛澤東沒有詳細解釋，人們也不得而知。不過毛澤東在稍後又說：「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毛澤東所指的「突然襲擊」，大概主要是指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那個講話，以及在小組會議上的討論。

林彪作爲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在開會之前向毛澤東報告自已想在大會上發言，並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之後，發表了講話。毛澤東說林彪這個講話沒有同他商量。但據陳伯達回憶，事情是這樣的：

「在廬山全會正式開會之前，林彪個人單獨在一個房間同毛主席談話。周恩來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個房間。等待時間並不很短（引者葉永烈注：又據別人回憶，葉群當時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樓』闖進去。『十一樓』亦即江青。）

毛主席和林彪單獨談話以後，大會開始了。」（見葉永烈：《陳伯達傳》）

林彪單獨找毛澤東談了些甚麼話，旁人不得而知。在「九·一三」以後公佈的「南巡講話中」，毛澤東說「沒有同我商量」，這是死無對證。林彪找毛澤東談了「不很短」的話，究竟講了甚麼，毛澤東

不說，也無人敢問。

在得到毛澤東同意之後，林彪發表了講話，而毛澤東就坐在旁邊聆聽。林彪發表的講話中，除了「毛主席的國家元首地位」這幾個字具有新意外，其餘都是吹捧毛澤東的老調重彈。其中林彪講毛澤東是天才，這個話早在六十年代初已講過了，毛澤東聽得耳朵都出繭子了。可是，毛澤東後來卻說這是「突然襲擊」，似乎是毛澤東受了襲擊。林彪講話中有那些槍彈，毛澤東受到了甚麼樣的傷害？毛澤東不說，人們也不清楚。但有一點清楚的是，當天晚上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決議要討論林彪的講話時，毛澤東是同意了的，而且討論的時間不是一天，而是兩天。同時，在播放林彪講話錄音的過程中，有人提議將林彪的講話稿印發給大家，到會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當時周恩來要汪東興去請示毛澤東。散會後，汪東興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他們都同意印發，我沒有意見，你就印發吧！」毛澤東還囑咐說：「講話稿要由林彪審定後發。」

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並沒有感到林彪的講話有甚麼不妥，也感覺不到受了「槍彈」的「突然襲擊」。否則毛澤東也不會同意印發林彪的講話。因此，在將近一年多之後公佈的講話中毛澤東才講這是「突然襲擊」（那時林彪已死），毛澤東的說法與當時的事實不符。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周恩來召集政治局委員和各大區召集人開會，吳法憲在會上提出要求播放林彪講話錄音，「大家附和了」（即是說政治局集體同意通過了）。周恩來只好根據大家的意見，決定二十四日上午聽林彪講話錄音，下午討論林彪的講話。

以周恩來對毛澤東唯唯諾諾的性格，這麼大件事不會不向毛澤東匯報，也不會未取得毛澤東同意之下，便擅自決定改變大會的原訂議程。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改變原訂的大會議程，是得到毛澤東同意

首肯的。否則，憑一個吳法憲，不可能、也辦不到改變大會的議程。

而且，毛澤東當時就在廬山上，親自主持這次中全會。大會的每一進程，毛澤東必然瞭解清楚。不可能大會的議程改變了達兩天之久，毛澤東竟然不知道。因此，改變大會議程是在毛澤東知道並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

那麼，是甚麼因素使毛澤東的態度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而也使廬山上的政治風向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呢？

二十四日上午，當朝陽穿過濃霧，射到牯嶺上時，葉群正忙着向麾下的大將們布置戰鬥方案。葉群說：「今天下午要分組討論，你們要在各組發言。如果你們不發言，林副主席的講話就沒有根據了。」接着葉群又講了「注意事項」：

一、要表態擁護林副主席講話，堅持天才觀點；

二、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但是，因爲常委會已作了決定，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暫時不要提了，以免被動；

三、林副主席在講話中沒有點名，你們在發言中也不要點名；

四、集中火力攻「陸定一式人物」，不要講康生反對「四個偉大」的提法，打擊面寬了，主席那裏通不過。雖然張春橋的後台就是江青，但在發言中半個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則就要碰壁，問題暴露了，甚麼也搞不成；

五、你們在發言時，要用眼淚表示自己的感情。

陳伯達不愧是「理論家」，他在所屬的華北組講得最深刻、最有水平，射出去的砲彈又急又猛。陳伯達先以「理論家」的姿態，從理論上講了一通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和馬列主義的偉大貢獻、毛澤東思想的「頂峯」地位，然後話鋒一轉，切入正題，批判起「陸定一式的人物」張春橋，他說：

但是，竟然有個別的人把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說成「是一種諷刺」。

林彪同志說，這次修改的憲法裏面規定了毛澤東思想作爲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裏最重要的一條，這反映我國革命中最根本的經驗。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這個根本的觀點。但是，同志們要懂得，加進這一條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是經過很多鬥爭的。

吴法憲同志說得很對：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偉大和謙虛，妄圖貶低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但是這種妄圖，是絕對辦不到的，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已經覺悟起來，已經站起來的偉大中國人民，很能夠識破他們，揭穿他們的各種虛僞。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以後，有的人居然懷疑（八居）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公報，這是不是想搞歷史的翻案？

多麼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興，像跳舞一樣高興。

在「理論家」高談闊論的同時，葉群在中南組、吳法憲在西南組、邱會作在西北組、李作鵬在中南組先後發言，他們的這些講話形成了密集的砲火，射向張春橋，射向江青。在林彪與葉群的導演下，這些發言極具煽動力，不少對毛澤東「抱有深厚感情」的造反派頭頭、工農兵幹部，都「上當受騙」了。這連汪東興這等見慣了中共黨內鬥爭大場面的「老臣子」，也禁不住發言表示「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剛才陳伯達同志的發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另有一點建議，根據中央辦公廳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汪東興的發言，招來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成爲九屆二中全會上主要的檢討者之一（另兩位是陳伯達、吳法憲）。而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頭頭王洪文，不知就裏，也在小組會上大談學習林彪講話的體會：「林副主席的講話非常重要。給我們敲了警鐘，不承認天才，就是不承認毛主席的正確領導……」。

此外，葉群還布置幾名大將串連解放軍的空軍、海軍、總後的一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在小組會上發言。一時間，整個廬山上出現了一面倒的情形，由林彪刮起的這股風，統治了整個九屆二中全會。其中最突出的當然就是陳伯達所在的華北組。由李雪峯、吳德、解學恭簽發的，大會秘書處印發的《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華北組第二號簡報，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說：

「大家熱烈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語重心長的講話。認爲林副主席講話，對這次九居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大家聽了陳伯達同志、××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

竟有人妄圖否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衆，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簡報說：大家「衷心贊成」小組會上有人提出的「在憲法上，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和「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的建議。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散發着油墨香味的《第六號簡報》發到各位代表的手中、當林彪聽完秘書的講解後，說：「聽了那麼多簡報，數這份有份量。講到了實質問題。比較起來，陳伯達講得更好些。」《第六號簡報》像火上加油，將代表們對林彪講話的熱情，煽得更加火紅，更加熾烈了。廬山上的氣氛熱烈中透着緊張，各個小組的發言中，火藥味漸漸地濃了起來。張春橋和江青沉不住氣了。江青悄悄退出會場，領着張春橋、姚文元去找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剛進入周恩來的辦公室，坐下還沒有兩分鐘，江青突然改變主意，又領着張、姚退出周恩來的辦公室。原來，江青要直接去找至高無上的毛澤東。

江青一行三人匆匆趕到蘆林一號毛澤東的住處，一進門江青就尖聲大叫：「主席，不得了啦！他們要揪人！」

據說，毛澤東叫江青回去，只留下張、姚；又有說法是毛澤東將三人都留下，和他們談了好久，好

久。

「十一樓」領着張春橋、姚文元去見毛澤東的情報，很快就傳到了葉群那裏。葉群立即緊張不安起來。那是最高的裁決，也是最後的裁決，是勝是敗，是榮是辱，就憑那一聲「最高指示」了。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左右，毛澤東派秘書去召喚汪東興。正在吃午飯的汪東興趕緊把飯吃完，便匆匆趕到毛澤東的住處。

毛澤東問：「看到六號簡報了嗎？」

汪東興回答：「剛看到。」

毛澤東說：「他們（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已經來過了，他們說六號簡報影響極大。」

接着，毛澤東嚴厲地訓斥道：「你汪主任了解我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還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傳達過，你怎麼又要我當國家主席呢？」

汪東興辯解道：「我聽陳伯達發言說，有人聽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就高興得手舞足蹈了，我很氣憤。」

毛澤東說：「那就讓他們去高興吧！」

汪東興又說：「在群衆討論修改憲法時，都擁護你當國家主席。」汪東興是想用群衆來做擋箭牌，誰知毛澤東聽後更加生氣了。毛澤東厲聲說道：

「不當國家主席，就不代表群衆嗎？你強調群衆擁護，難道我不當，群衆就不擁護了？我就不代表群衆了嗎？」

話已說到這個份上，汪東興不好再辯解了，只好趕緊認錯檢討。談完話時，已是下午兩點鐘了。

怒氣未消的毛澤東，走到院子裏，遇見了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上將。毛澤東與許世友握手時說：

「你看，我的這只手涼不涼？」

許世友說：「涼」

毛澤東說：「你們讓我多活幾年多好啊！還讓我當主席呀？」

毛澤東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員下午三時到牯嶺毛澤東的辦公室開會。汪東興通知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員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負責通知。

毛澤東分別與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單獨談話。然後，向前來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們宣佈：

「剛才，政治局常委們商談後，認爲討論的問題不符合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現決定：

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同志在開幕式上的講話；

二、收回華北組的六號簡報；

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

毛澤東的目光射向陳伯達，十分嚴厲地說：「你們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毛澤東還對一臉尷尬的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

毛澤東在同林彪的講話中，用了一句「紂王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林彪聽不明白，又不好當面問，只好回來後叫秘書向北京求教。坐鎮在毛家灣的秘書趕緊去請教歷史教授楊老，這位學者不加思索便回答：這句話的意思是「紂王雖然不好，但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壞」。原來毛澤東已將林彪看作紂

王了，但又說並不那樣壞。這是典型的毛澤東風格，虛虛實實，叫你捉摸不透。林彪和葉群聽後，不知是喜還是憂好。

從林彪二十三日下午發表「突然襲擊」的講話，到二十五日下午毛澤東下令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正好是兩天半。

林彪面色蒼白地回到自己的住處，默默地在房間裏踱步，神情更加抑鬱。葉群哭了好幾場，要向林彪解釋，林彪不耐煩地揮手讓她出去。而林立果則幸災樂禍，他偷偷往北京打了個電話，將廬山上發生的事向駐守毛家灣的秘書透風。他說：「我告訴你，廬山這裏出事了，翻車了，倒大霉了！」「主任煽風點火，惹下一場大亂子」，「他媽的，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車了，我從心裏高興，但他媽的這個代價太大，連首長的威望也受了損失……」。

林彪全盤皆輸，一敗塗地。林家王朝從此走向窮途末路。

令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的因素，顯然是江青。江青帶領張春橋和姚文元向毛澤東灌輸、攛掇了些甚麼，沒有人知道，但毛澤東的態度，是聽了江、張、姚等人的匯報後才發生變化，這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在打擊林彪集團的這場大戰役中，江青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表揚江青說：「反林有功」。

關於這一點的另一個佐證，是二十五日一早，毛澤東便收到了六號簡報。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即時傳召汪東興，沒有表示甚麼不滿。是江青帶領張春橋、姚文元見了毛澤東後，汪東興才被傳召，那已是上午十一時四十分。而且，毛澤東對汪東興說：「他們（指江、張、姚）已經來過了，他們說六號簡報影

響很大。」毛澤東沒有說自己對六號簡報有甚麼不滿，而是說江青等人的不滿，顯而易見，這時在毛澤東的思想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江青等人的意見。毛澤東聽信了江青，江青令毛澤東對進行中的九屆二中全會有了新的認識，令毛澤東的態度起了根本的變化。

那麼是甚麼問題令到毛澤東作出新的決策呢？

在當時沸沸揚揚的爭論中，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天才」問題：毛澤東是不是「天才」；

「國家主席」問題：要不要設，毛澤東當不當；

「陸定一式的人物」：批判張春橋，江青說的「揪人」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有關聯的，但對毛澤東來說，最敏感和最重要的，是「國家主席」問題。在江青等人的匯報中，是代表們普遍的表示「熱烈擁護毛主席任國家主席，林副主席任國家副主席」，觸到了毛澤東的隱痛處。「國家主席」問題是整個爭論的核心和關鍵，「天才」和「揪人」問題，只不過是陪襯，是附帶的衍生物。

證據是：汪東興在小組會上「天才」、「揪人」、「國家主席」等問題都講了，但毛澤東訓斥汪東興的，主要是「國家主席」問題，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大作文章。而毛澤東與許世友的交談，也是「國家主席」問題。在二十五日下午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第六次提出不設和不當國家主席問題。毛澤東如此頻繁地提出「國家主席」問題，是將這個問題當作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來處理，毛澤東要扭轉的，主要是大會上普遍的要設和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的要求。因爲，那是毛澤東的最大隱憂。如果既成事實，毛澤東將處於進退失據的尷尬地位。

毛澤東別無它路，只好向林彪發出那致命的一擊。毛澤東與林彪的政治聯盟終於土崩瓦解。

四、「反黨集團」

林彪和葉群在廬山上「兩天半的發難」，究竟是甚麼性質，該定甚麼罪，目前爲止官方有兩種說法。

其一，是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認爲林彪、江青所犯下的罪行有：

一、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其中的「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涉及林彪集團的罪證主要是指「一九六六年六月，陳伯達組織編寫和審定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搞亂全國、亂中奪權，製造反革命輿論」。

二、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衆；

三、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

四、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指江青一伙在一九七六年犯下的罪行）。

起訴書中完全沒有提到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的事情。林彪一伙在廬山上的「兩天半發難」，沒有觸犯黨紀國法，並不構成犯罪。

其二，是毛澤東的南巡講話。這篇講話其實是毛澤東對林彪的控告書、起訴書。雖然毛澤東說：

「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中央完全是按照毛澤東這個講話來給林彪定罪的。比如，中共中央給林彪集團定性為「反黨集團」。

在毛澤東來說，「反黨」是一個包羅萬象，而又含糊不清的罪名。上至搞政變、搞謀殺，下至向地方單位的領導人提個意見（如反右運動時，許多人就是因為向單位的領導人提意見，而被扣上「反黨」的罪名，打成右派分子的），甚至中共黨員按照黨章規定的權利，向中央主席寫封信，反映一些意見，也可以被打成反黨分子。如彭德懷就是這樣的例子。其實，在建國以後不久，毛澤東就將凡是與他意見相左的聲音，都視為「反黨」。

林彪及其同伙在廬山的「兩天半發難」中，並沒有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相反是「高舉」和「緊跟」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他們也沒有反對社會主義，沒有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反對文化大革命，除了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之外，沒有對形勢、路線、方針、政策提出任何不同或反對的意見。在這些方面，林彪一伙不但沒有任何不軌的言行，而且他們的行為和思想，都稱得上是「楷模」。那麼，毛澤東有甚麼理由將林彪一伙打成「反黨集團」呢？按照毛澤東當時及後來的南巡講話，大體有如下幾條：

一、林彪在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的講話，毛澤東認為是「突然襲擊」；

二、二十三日晚吳法憲提出聽林彪講話的錄音以及在小組會上討論林彪的講話，是「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

三、陳伯達、葉群、吳法憲等人在小組會上批判「陸定一式的人物」，不點名地批判張春橋「貶低

毛澤東思想」，是「反對九大團結勝利的路線」；

四、陳伯達在大會上散發《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天才的幾段語錄》，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說這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陳伯達成了「政治騙子」；

五、由於林彪、陳伯達、葉群、吳法憲等人在廬山上偷偷摸摸地進行聯絡，後來被定爲「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地下活動」；

六、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

七、林彪「有些話說得不妥」，「說過頭了嘛」。

這一切，對於毛澤東來說，都是「不妥」的。可是究意怎樣不妥，用黨紀國法來衡量，林彪一伙在廬山上的所做所爲在那些方面犯了規（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鋌而走險，策劃政變，那是另一回事，下文還會談及），毛澤東沒有說。

事實上，建國以後，雖然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是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但是毛澤東的行事方式，卻是如他在一九七〇年向斯諾所說，是「和尙打傘，無法無天」。毛澤東往往是以自己的感觀和喜惡，來代替法律，量刑定罪。「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以及「林彪反黨集團」都是這樣。

毛澤東唯一的一次重視黨章和憲法的，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起草「二十三條」的時候。那時候正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處在第一線主政，而毛澤東則退居二線，「大權旁落」的時候。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鄧小平以爲是一般的匯報會，曾好意地說過：毛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了。毛澤東聽後很不高興，沒有理會鄧小平的盛情，徑往會場，參加會議。在中央工作會議進行期間，中央常委於十二月二十日召開會議，討論社教問題。會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針鋒相對的爭論，毛澤東強調要整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插話說：「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複雜，還是有甚麼矛盾就解決甚麼矛盾爲好。」

毛澤東聽後滿面慍色，與劉少奇爭辯了幾句，便猛吸着煙，沉默不言。

第二天，毛澤東手中持着兩本小册子來到會場，一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本是《中國共產黨章程》。毛澤東揚着手中的小册子說：「我這裏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你們一個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人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接着，毛澤東便尖銳地批評劉少奇。毛澤東的「一定要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便是在那個時候鑄定的。

這是毛澤東一生中運用黨章和憲法的唯一的一次。筆者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心中的感覺是怪怪的，毛澤東手持憲法，就像是毛澤東穿花裙子一樣不可思議、荒唐可笑。毛澤東說這番話時，大概沒有想到彭德懷也有黨員權利，也有公民權利。而毛澤東也只有在這一天才記得有憲法和黨章的存在。不久之後，他便和江青一起，「和尙打傘，無法無天」了。

對待林彪在廬山上的「兩天半發難」，毛澤東自然是從「無法無天」的角度去衡量。因此，在毛澤東認爲許多事情「不妥」之中，就存在着許許多多的不妥。

林彪、葉群在廬山上與陳伯達、吳法憲等人的聯絡，在平時的情形，叫做「正常的工作聯繫」；出了事後，自然就成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地下活動」，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陰謀」。後來，毛澤東針對林彪而提出的「三要三不要」中，就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樣一條。實際上，毛澤東只是憎惡別人的「地下活動」與「陰謀詭計」，而他自己卻是大搞特搞的。遠的

不用說了，一九六五年，毛澤東伙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背着全體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員，極端秘密（偷偷摸摸）地策劃、組織炮打北京市委彭眞和吳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才眞正是不折不扣的、地地道道的地下活動和陰謀詭計。這算不算「反黨」？

是否光明正大就不算「反黨」了呢？非也。君不見，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光明正大，又合理合法地向中央主席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還注明「只供主席參考」，但毛澤東照樣將彭德懷打成反黨。

是不是「急於當國家主席」、「急於奪權」，再加上從事「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地下活動」，就是「反黨」呢？按理說這應當是毫無疑問了。可是，這種毫無疑問的問題，到了毛澤東那裏，又成爲「有疑問」的問題。無獨有偶，四年之後的一九七四年，因林彪事件而推延了的四屆人大即將召開的時候，碩果僅存的文革暴發戶江青，拉幫結派，組成被毛澤東命名的「四人幫」，演出了一幕野心更大、時間更長、活動更猖獗的篡權奪位的陰謀活動。江青的陰謀活動實在是太惡彰昭著，連毛澤東都看不過去，便多次地出面批評江青。毛澤東說：

「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又說：「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

毛澤東還對着周恩來、王洪文的面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有。」「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毛澤東還說：「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又說：「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還說：「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爲甚麼照樣搞呀？爲甚麼不和二百多的

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毛澤東還對王海容、唐聞生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毛澤東對江青的這一系列批評，夠清楚、夠明白的了。林彪充其量是急於當國家主席，但江青要當黨中央主席，而且要組閣，其野心比林彪還要大得多。同時，江青大搞幫派活動（也就是「陰謀活動」、「地下活動」），其時間之長，程度之猖狂，比起當年在廬山上的「兩天半發難」，林彪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儘管江青一伙作惡多端，壞事作絕，但毛澤東並沒有將江青一伙打成反黨，反而多端姑息、縱恿，他們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高，張春橋更被委任爲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還親口誇獎張春橋「有才幹」，使得他們更肆無忌憚。事實上，不管江青如何橫行作惡，只要毛澤東健在，都不會受到懲罰。這正是江青有恃無恐的原因所在。

從彭德懷到林彪到江青，人們可以看到「反黨」這一類的罪名，在毛澤東那裏具有多麼大的伸縮性和靈活性，那是因人、因時、因事而異的，甚麼「地下活動」、「急於奪權」、「突然襲擊」等等，實際上都只不過是毛澤東隨心所欲地用來打擊政敵的藉口。彭德懷的遭遇是這樣，林彪的遭遇也是這樣。

彭德懷與林彪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但兩次廬山會議，卻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

一、開會之前，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都有一個必除之而後快的目標，一九五九年是彭德懷，一九七〇年是林彪；

二、開會之前，彭德懷、林彪與毛澤東都發生意見分歧，彭德懷是「大躍進」，林彪是「國家主席」；

三、開會之前，毛澤東對這兩個人可能發生的事情，都有所估計和準備。一九五九年四月，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說：「要警惕分裂。」事後，毛澤東承認那是針對彭德懷而說的。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說：「要把會議開成團結的、勝利的會議，不要開成分裂的失敗的會議。」這是針對林彪而發的；毛澤東似乎都事先爲這兩個人設下了警戒圈；

四、在兩次會議的初期，毛澤東都主張「放」，引蛇出洞，採取釣魚政策。一旦有人中計，便立即「收」，抓住不放，毛澤東一聲令下，扭轉大會風向，將落網者批倒批臭。九屆二中全會有兩個破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有個慣例，大凡遇到黨內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開中央全會之前都召開預備會議，以便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說服工作，達到思想統一，然後才召開正式的中央全會，通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預期要通過的議程。九屆二中全會前，毛澤東與林彪、政治局之間在國家主席問題上出現這麼大的分歧，爲甚麼不按照慣例先召開預備會議呢？其二是，林彪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的講話，毛澤東是坐在旁邊聆聽的，如覺不妥，爲甚麼又同意大會討論及印發這個講話呢？是否這也是毛澤東「放」的策畧，釣魚的策畧呢？毛澤東是在八月二十五日聽了江青等人的告狀（提供了林彪一伙在會上發難的證據）之後，才下令「收」的。於是，林彪、陳伯達一伙都落入網中；

五、毛澤東給彭德懷和林彪羅列的罪名都是差不多的，如「發難」，「突然襲擊」，「地下活動」等等，甚至毛澤東說彭德懷在歷史上「不合作」，說陳伯達三十多年來「不配合」，都如出一轍。

彭、林兩人不同，兩次廬山會議的內容和背景也不同，但毛澤東整人的手法卻極其相似。這種情況，不能不使人深思。

五、「第十次路線鬥爭」

對待與林彪的意見分歧，毛澤東如果就此收手，鳴金收兵，那麼中國的現代史就要重寫，而毛澤東也不成爲「毛澤東」了。

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的南巡講話中說：「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去掉那些甚麼「原則」、「路線」等冠冕堂皇的外衣，把話說白了，毛澤東的意思就是，對別人犯在他手裏的錯誤、過失，他是抓住不放，毫不讓步的。在中共黨史上，這種事例不勝枚舉。怪不得被毛澤東稱爲「開明君主」的張聞天頗有感觸地說：「開國的皇帝都是很厲害的」。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自八月二十五日的常委擴大會議以後，毛澤東宣布休會，代表們可以遊山玩水，看戲作樂。而毛澤東則頻頻找人談話，要了解「兩天半發難」中更多的幕後資料。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周恩來等人，頻密地出入毛澤東的辦公室。各種情報、資料匯集到毛澤東這裏來。

八月二十六和二十七日，周恩來、康生分別找汪東興、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談話。八月二十七日，汪東興第一個寫了書面檢查。周恩來和康生要吳法憲作檢討。八月二十八日，吳法憲向林彪報告，林彪說：你沒有錯，不要作檢討。又說：我們這些人搞不過他們，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這是林彪對這次失敗的一個總結。

黃永勝上山後，看到大勢不妙，銷毀了他的講話稿。葉群則私自撕下了她在中南組的發言記錄，邱會作也一再提出，要從會議記錄中剪去他的發言記錄。這些情報傳到毛澤東那裏後，毛澤東笑着說：「何必當初呢！當初那麼積極，那麼勇敢，爭着發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幾員大將之中，吳法憲最慌恐不安。林立果說，在這次戰役中，「陳伯達是英雄，吳法憲是狗熊」。葉群多次打電話安撫吳法憲，說：「你不要緊張，還有林彪、黃永勝嘛！只要不牽涉到林彪、黃永勝就好辦了，大鍋裏有飯，小鍋裏好辦。」

經過了五天的沉默之後，毛澤東再次出擊。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在全會印發。印發前特意給林彪看過。全文如下：

這個材料①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盧山會議爲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爲了甚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甚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盧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甚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盧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盧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

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爲，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爲，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爲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注①：指陳伯達收集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

毛澤東眞的抓住不放、絕不讓步，要把問題搞大了。《我的一點意見》是專門批判陳伯達的，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這只不過是毛澤東的策畧。毛澤東不會不知道，陳伯達的後台老板是林彪，陳伯達只不過是林彪的軍師而已。毛澤東的策畧是將林彪與陳伯達割開，各個擊破。在當時，由於「九大」剛開完不久，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寫上黨章的墨汁還未乾。如果在這時打擊林彪，全黨和全國將產生很大的混亂，並且對毛澤東的形象、威望不利。因此，毛澤東將林彪和陳伯達分開，先打軍師，後打主帥，在不同的時間、用不同的方法來處理。毛澤東後來說：對林彪還是要保的。那只是穩住林彪的策畧而已。毛澤東是在等待於適當的時間，用適當的方法（主要是不損害到自己的威望和聲譽）來處理林彪。毛澤東絕不會放過林彪。

毛澤東在晚年的許多言行，往往只是根據眼前的需要，隨心所欲，妄顧事實，不計後果。因此，常常漏洞百出，自相矛盾，鬧出笑話。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在評論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時說：「《我的一點意見》是嚴厲批判陳伯達的，指出陳伯達有『野心』。為甚麼要揪出陳伯達，陳伯達的『野心』是甚麼，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問題。這篇文獻穩住了林彪，而林彪絕不會不有感於此。」（見《大動亂的年代》）陳伯達的歷史問題當時還沒有被揭露。為甚麼要「揪出」陳伯達？憑甚麼「揪出」陳伯達？毛澤東當時憑的只是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天才存不存在，就像世界上有沒有鬼一樣，是個思想認識問題，大可以自由討論。即使陳伯達認為有天才，犯了「唯心論的先驗論」的錯誤，也是屬思想意識範疇，並沒有構成犯罪。說「毛主席是天才」，也並不是大罪。因此，在當時揪出陳伯達的理由是極不充分的。同時，毛澤東還說：「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眾所周知，陳伯達自延安時代開始一直當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前後近三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之中，毛澤東又委任他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顯赫職務。一切怎麼能與「從來沒有配合過」吻合呢？毛澤東在寫這篇文章時，只顧給陳伯達如何羅織罪名，其他的都顧不得那麼多了。整彭德懷時，毛澤東也說了「合作與不合作，是三七開」，說彭德懷三十多年與毛澤東是七分不合作。「不合作」、「不配合」成了毛澤東整人的一條罪名。惟有整林彪時，毛澤東才不敢講林彪「不合作」。

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的公開，人為地將「兩天半的發難」問題升級了，擴大化了。「保護林彪」之類的話，林彪不相信，一般的中共的高幹也不相信。第一步是揪出陳伯達，第二步就輪到林彪了。

八月三十一日，葉群緊急召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佈置統一口徑，強調山下山上沒有聯繫，在小組會上發言不要牽涉林彪，黃、吳、李、邱也只講自己，互不涉及。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六日晚，黃、吳、葉、李、邱在黃的住處，交談各組的會議情況。

九月一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組召集人開會，毛澤東在會上說：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發言犯了錯誤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評、檢查。毛澤東還點名要陳伯達作檢查。還要林彪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這些人開會聽取他們的檢查，並指示汪東興也參加。

九月二日，林彪召集了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開會。會議一開始，林彪先說：「今天，找你們開個會。你們在會上爲甚麼要在同一個時間發言，爲甚麼都引用了同樣的語錄。你們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講完後，到會的人都不發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過了一段時間，林處又說：「嗯，爲甚麼沒有人發言？」這時，汪東興便發言，批判陳伯達，指出華北組的討論就是陳伯達放炮後搞亂的。汪東興講完後，與會者七嘴八舌地講了一些，便散會了。

會後，汪東興將會議的情況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毛澤東問會還開不開？汪東興說：林彪打了個招呼，說再開會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九月三日，林彪又主持開了一次會，但沒有通知汪東興參加。毛澤東知道後說：「不要你了。說明你不是那個圈子裏的人。」汪東興後來雖然被毛澤東貶到江西，但卻沒有被打倒，原因便在此。

九月二日後，各組開始集中批判陳伯達。

九月四日，毛澤東找林彪談話。

九月五日，毛澤東與陳伯達談話。這次談話是陳伯達求見的。陳伯達希望得到毛澤東的寬恕。陳伯達在後來回憶這次與毛澤東的最後一次會見時說：

> 我請求見毛主席。等了一會，毛主席那裏來電話要我去。我很高興去了。這是最後得見毛主席。
>
> 見面握手以後，他說：「這兩年你都不見我看我了。」的確，這兩年除了開會外，我很少單獨去見毛主席，這是違反以前多年的習慣的。解放初，最早我住黨校，隨後毛主席要叫我練習做點事，要我住中南海，因爲打電話到黨校找我來一趟至少要半個鐘頭或不止半個鐘頭，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後，見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總是隨找隨到。但是，「文革」後，江青對我干涉過見毛主席的事，說我每次說話太久。過一段時間，恰巧劉叔晏（陳伯達妻子——作者註）沒有經過我同意，我又住在釣魚台，她就自己經過公安部在住處做錯一件事（查一個腳印，本來是無聊的事，如果我先知道，我想是不會讓做的）。事後謝富治向江青匯報，江青於是就對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們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
>
> 本來我因爲書堆得很多，又想有時找一些同志一起做點事較方便，所以請北京市委負責同志幫找一個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趕出中南海，於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後，要見毛主席，總要先打電話向秘書打聽，主席起牀没有，有没有客人……等等。有幾次打聽得很不愉快，有時秘書就乾脆說，「我要回家了」。於是我感覺

要見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漸漸地不單獨求見毛主席了。這樣事，首先要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說清楚的。當然，對黨來說，這不過是極微小的事，但毛主席這時見面劈頭一句話就提「兩年不見」的問題。

毛主席說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來見了。還說我文章也不寫了，總是動動嘴巴，叫別人去寫……

毛主席談話很簡短。結束時，他說，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塊工作的幾個人談談。最後一句是：「團結起來」。

於是，我去找江青。到廬山後，江青兩次打電話要我到她那裏去，我沒去；後來又來電話說要來我這裏，她也未來。所以，一直未見面。這次，去她那裏，她說：「稀客！稀客！」甚麼話也沒有說，就要我跟她到康生那裏。

在康生那裏，先看到曹軼歐，她不招呼。進到康生住的大房子，張春橋、姚文元已先在，可見他們經常在一起論事。

談話開始了。記得江青第一句話：「你們借口擁護林副主席，實際上反對林副主席……」以後各人相繼炮轟，原話現在記不起來了。

隨後，組織上通知我，由周恩來同志、康生幫助我寫反省。記得周恩來同志沉默寡言，沒有談甚麼，發言的是康生。我在廬山的檢討發言內容，基本上是康生授意的。

在我做檢討的會上，我非常感謝恩來周志：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寫就的稿子。當然，也可以說，因爲我的普通話說不好。

會畢，就在會場上，我高興地去感謝周恩來同志。康生也在那裏。恩來周志說，你感謝康生好了。

恩來同志說的正符合事實，是康生給我打了檢討稿的底子。

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丑。」

檢討會的第二天，我覺得事情完了，回家務農好了，可能是恩來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護士來看我，要我出去上廬山一遊。我請他們和做招待工作的同志一塊走。遇到風景好處，同大家照了幾張相片。照相後，又繼續遊山玩水，這一天是從到廬山後最高興的。

但是，風聲所播，也是興盡悲來了。流傳的話就是：「陳伯達並沒有沉痛，還去遊山玩水哩。」

於是，會又開了，這時我已不能參加任何大會小會，但似乎簡報還看得見。有些關於我的事，是從簡報上看到的。

後來聽說，在一個會上，有人曾經批我在大的問題上沒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來同志解釋說，是：「在一些大的問題上沒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配合。」並指出例子。在那樣條件下，周恩來同志竟說這樣的話，更使我感到他對事對人的公正。

全會於九月六日基本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通過了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四屆人大；還批准了國務院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和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

九月六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閉幕。

這就是毛澤東後來說的「第十次路線鬥爭」的整個過程。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一伙處於挨打的狀態，除了檢查未令毛澤東滿意，以及黃永勝「捂蓋子」，不想將問題擴散外，他們基本上沒有其他舉動。而林彪和林立果的政變陰謀，毛澤東在「九·一三」之前尚未知曉。因此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所講及的，基本上就是在廬山上發生的情況。這些情況構不構成「第十次路線鬥爭」呢？林彪執行的是一條甚麼路線呢？他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執行這條路線，又是怎樣與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對抗、鬥爭的呢？林彪的「反革命路線」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方面如何表現呢？這些問題毛澤東沒有說，其他人也沒有說。實際上，毛澤東根本講不出來。因爲根本就不存在一條甚麼「林彪的反革命路線」，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根本就不存在甚麼「路線鬥爭」。衆所周知，林彪自從一九五九年上台後，對毛澤東一直是「高舉」、「緊跟」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主席劃圈我劃圈」，林彪從來都是忠實地、不折不扣地執行毛澤東的路線，林彪從未、也不敢搞一套區別於毛澤東的自己的路線。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欽定」爲接班人後，曾在大會上說：「一切按主席思想辦，不能用另外作法，另外方針，不能有兩種方針，兩個司令部。不能以想當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對台戲，要一元化，緊跟主席。」林彪這樣說，也這樣做。因此，毛澤東才將林彪稱爲「最親密的戰友」。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一封復信（十月十二日林彪去信毛澤東表示要辭去「接班人」）中說：「此議不妥。黨章規定、黨的決議，我不能違反。你我在路線上、在大是大非的鬥爭中，基本還是一致的」。

由此可見，在九屆二中全會中及以後，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根本不存在路線上的分歧與鬥爭。「第

十次路線鬥爭」純屬子烏虛有。

事實上，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鬥爭，是一場由毛澤東挑起的權力鬥爭。爲了維護自己的聲譽和威望，毛澤東於是將這場鬥爭人爲地冠於「路線鬥爭」，企圖使它顯得合理、合法與「革命」，是爲「公」，而不是爲「私」。「路線鬥爭」之說，純屬掩飾。

可是，毛澤東這種作法，正是又向錯誤邁進了一大步，將問題進一步擴大了，昇級了。將一場本來是工作上的不同意見的爭論，人爲地加以激化。毛澤東動機不良於先，處置失當於後，終於將這場爭論發展成爲比路線鬥爭還要激烈、嚴重的，震撼了全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是九月七日下廬山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去九江機場送行，他們還將林彪擁坐在中央，一起照了集體像，既是話別，又是言志。之後，黃永勝等人也走了。

九月八日，各省市、大軍區的負責人都走了。

九月九日上午，周恩來、康生、張春橋、江青等人走了。

毛澤東是最後走的。廬山上秋天來得早。這一天秋霧蒙蒙，天氣陰冷。毛澤東穿着銀灰色的大衣，出現在牯嶺街上，向前來歡送他的人群頻頻招手。他沒有講話，緩緩地走到隧道口，又轉過身來向霧氣迷蒙的廬山再望了一眼，然後上了汽車。這一天正是九月九日下午。毛澤東再也沒有上廬山。

毛澤東的崛起，是由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的秋收起義開始的；而毛澤東的殞落，是從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離開廬山開始的。僅僅經過短短的六年，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便壽終正寢了。

毛澤東的一生中，似乎有太多的九月九日。

第三章　最後的較量

一、毛澤東：事情沒有完

毛澤東回到北京，便將戰場由廬山移到北京。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說：「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廬山會議以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角。」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陳伯達及幾名大將的批語，進行不斷的打擊、轟炸，這叫做「甩石頭」；往軍委辦事組派出一些毛澤東的親信，打破林彪、黃永勝一手遮天的局面，這叫「摻沙子」；改組被毛澤東懷疑為陳伯達的「山頭主義窩子」的北京軍區，叫做「挖牆角」。這便是毛澤東回到北京後旋即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

「批陳整風」的帷幕是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拉開的。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在這一天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並轉發了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附陳伯達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指示說：「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進行了陰謀活動，有反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罪行，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中共中央號召

全黨對陳伯達進行檢舉和揭發。全黨全軍立即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

實際上，早在這之前，毛澤東已經採取了兩項不是針對陳伯達的行動。其一，是在一九七〇年十月，毛澤東在貴州關於「三支兩軍」問題的報告上作了批示：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這是毛澤東對林彪不滿的一種微妙的表示。

其二，是在指示全國開展「批陳整風」的前十日，即十一月六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毛澤東賦予這個機構的權力是空前的，它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工會、青年團、婦聯等中央一級機構和它們的五·七干校，以及中央劃歸該組管轄的單位的工作。原中宣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組織宣傳組組長爲康生，組員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九屆二中全會後，康生怕不小心得罪毛澤東，重蹈陳伯達的覆轍，乾脆稱病不出，李德生不久被調往瀋陽軍區，中央組織宣傳組的大權便落在江青一伙的手中。這個決定明裏是公開加強江青一伙的權力，暗裏卻是在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力。此消彼長，林彪這位副統帥，其權力還遠遠比不上江青。林彪的權力，已經沒剩多少了。這是毛澤東打擊林彪集團的重大措施。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印發毛澤東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對姚文元的一個報告的批示，毛澤東說：「你的學習進程較好較快，堅持數年，必有好處。我的意見二百七十四個中央委員，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幹部都應程度不同地認眞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方能抵制王明、劉少奇、陳伯達一類騙子。」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澤東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稿寫了批語，指出：「我黨多年來

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甚麼是唯物論，甚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這個材料分爲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陳伯達的反動歷史」，說陳伯達「被捕叛變」，是「托派」，「寫反共文章」，有「裏通外國嫌疑」；第二部分是「投靠和追隨王明，鼓吹『國防文學』和『國防哲學』，一貫追隨和投靠劉少奇，是以劉少奇爲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秀才和頭面人物」；第三部分是「對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謀篡權」，說「陳伯達是蕭華、楊、余、傅、王、關、戚、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台」；第四部分爲「投靠王明、劉少奇，招降納叛，搞獨立王國」。

《大動亂的年代》一書指出：「這個材料，若干問題符合事實，許多問題不符合事實。陳伯達的眞正罪行，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所列，恰恰沒有列出。舖陳了許多不實之辭和本人在歷史上交代過的問題。」給陳伯達加上的罪名越多越重，給林彪造成的壓力也就越大越重。這正是「敲山震虎」的策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傳達反黨分子陳伯達問題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澤東對陳伯達作了定性的批示：

「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門，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

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把批陳整風運動推向縱深發展的通知》。

毛澤東的在在措施又狠又辣，都是旨在將陳伯達在全國、全黨、全軍批倒批臭。林彪十分清楚，這僅是第一步。下一步便要輪到自己了。

毛澤東在乘勝追擊，窮追猛打，步步進逼。廬山會議的事沒有完。

二、緊急收縮的毛家灣

九屆二中全會還沒有結束時，葉群便從廬山打長途電話通知留守在北京毛家灣的秘書：「趕快收縮」。葉群的托詞是：「毛家灣的攤子太大了，不利於管理。而今後的主要精神是認眞學習馬列。因此，毛家灣只留下一、兩個人幫助看馬列哲學著作就夠了。其餘的人，一律打發他們回原單位。在外邊幫助老虎、豆豆『找人』的人，也叫他們全撤回來，免得分散精力。」

葉群來電後的短短幾天內，住在毛家灣西院以及在空軍大院裏幫助林彪、葉群工作的人，都被打發走了。若大個毛家灣大院裏，頓時便人去樓空，顯得冷冷清清，門庭冷落。毛家灣一下子便衰落下來了。

林彪和葉群沒有直接回北京。他們由江西直飛北戴河，在渤海灣那靜靜的岸邊稍作喘息，待驚魂甫定後，才於九月中旬回到北京。

在秘書們看來，五十多天沒有見面的葉群，簡直判若兩人。以往的自負、高傲、張張狂狂的勁頭，全都不翼而飛了。她逢人便笑，滿臉和氣，對手下的工作人員客客氣氣，格外熱情、親切。

「張秘書，你好啊？」葉群一見到秘書張雲生，就主動伸過手來。「兩個月不在家，你們可辛苦了！」

張雲生承應着說：「首長和主任在外邊開會，比我們更辛苦。」

「不，還是你們在家值班的秘書辛苦。」葉群顯出從未有過的謙虛。「首長去開會，我只是個助手。這個助手可不容易當啊！這次在廬山，首長原來準備作一次長篇大論的講話，我就勸他少發點議論，而應請主席多講一些。有的人在會上亂放炮，結果就出了問題。我一直比較謹愼，結果就比較主動。主席在這次會議上號召加強學習，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多讀點馬列原著，學點哲學。我以前就積極幫助首長抓學習，證明這樣做就對了。不學習，多麼危險哪！……」

葉群嘮嘮叨叨地爲自己在廬山的失敗作掩飾。對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葉群猶有心悸。

林彪和葉群回到毛家灣，第一件事便是趕緊清除與陳伯達往來的各種記錄、痕跡。以往的書信往來、談話記錄，是在首要的清除之列。陳伯達書贈林彪和葉群的一些題字，卻使他們爲難。陳伯達給林彪的題字有：

> 天馬行空，猛志常在。
> 天馬橫空，知無涯。

「天馬」即是神馬。代表着威武、神駿、飄逸，甚合林彪的「儒將」身份。林彪喜歡自比「天馬」，陳伯達投其所好，林彪自是十分喜歡，覺得字好，意也好。

陳伯達給葉群題的是：

每臨大事有静氣，
不信今時無古賢。

陳伯達把葉群喻爲「古賢」，既典雅，又不俗氣，葉群心中十分高興。

陳伯達還給林彪、葉群共題：

李杜詩篇萬口傳，
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這原是清人趙翼的詩。陳伯達借花獻佛，稱頌林彪葉群是「各領風騷數百年」的「天才」，「全才」。

陳伯達的這些題字，林彪、葉群頗爲珍愛，藏之於內室。如今爲形勢所迫，不得不割愛。林彪下令全部「掃蕩」。

回到毛家灣後，本來就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林彪，現在就更加悶悶不語了。除了不定期地聽秘書

講點中央傳閱的文件外，其他方面的文件，林彪幾乎不聽或少聽。有時看點戰爭題材的電影，但僅選取近戰格鬥片段。大概是眼下正與毛澤東展開生死決戰，林彪想領略一下「格鬥」「近戰」的那種氣氛。林彪減少了會客，連黃、吳、李、邱幾名大將，林彪和葉群也都謝絕不見，爲的是避嫌。偶爾出去「轉車」，更多的時間是一個人在房間內來回踱步。

一九七〇年國慶節臨近了。按照毛家灣的慣例，秘書們會主動地提醒林彪，把尚在外地出差的林立果、林立衡召回北京，一家人團聚慶祝。但今年林彪和葉群都沒有這個興致。葉群說：「老虎最近很忙，在南方搞調查研究，就不必驚動他了。」

林立果不等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就提前下山了。之後，一直在上海、杭州、廣州、南京之間穿梭活動。林立果在與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進行的一次密談中說：

> 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演習，拉練。雙方陣容都亮了相，陳是鬥爭中的英雄，吳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
>
> 這些老總們（指黃、吳、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盤，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說明了一點，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這些人的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

林立果正是爲組織自己的力量，建立今後政治鬥爭的領導權而努力奔波。

夏去秋來，黃葉飄飄。毛家灣裏一片蕭殺的秋意。林彪像往常一樣上了天安門，像往常一樣與毛澤

東一起在報紙上、電視上亮相，顯示出兩人還是那樣的「親密」，可是，在林彪的內心裏，卻寒冷得像三九的嚴冬。

三、「抓住不放」

與林彪這個勢力強盛的集團決鬥，毛澤東感到頗爲吃力。回到北京不久，毛澤東也病倒了。

自從廬山下來後，毛澤東就開始不大舒服。到了十月下旬，越來越嚴重，周恩來不得不組織了三位北京名醫組成醫療小組，來爲毛澤東診治。

拍了X光胸片後，這三位專家診斷毛澤東患的是肺炎，擬出注射抗生素的治療方案。然而，毛澤東不滿意這個醫療小組的診斷，認爲他們是胡說八道，自己的肺部根本沒有事。並爲此大爲光火，說這些醫生是林彪派來的，是按着林彪的指揮辦事的，接連發了兩天的大脾氣。既不肯打針，又不肯吃藥，病情越來越嚴重了。

這時候已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玉鳳提出：不如叫毛澤東原來的保健醫生、現任解放軍三〇五醫院院長的李志綏醫生來診治。毛澤東同意了。可是李志綏自一九六九年就被毛澤東下放到黑龍江省寧安縣農村搞巡迴醫療。中共中央辦公廳便給黑龍江省軍區發去了一封急電。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李志綏正在一個村子裏給農民看病，一輛軍用吉普車風馳電掣般開過來。車剛停定，一位解放軍的高級軍官便從車上跳下來，通知李志綏立即趕回北京。李志綏只好將醫療隊交給同行的醫生，交待清楚各項工作後，便上了吉普車，被送到了牡丹江市一個軍用機場。只見一架蘇聯

製造的伊爾六十二飛機已經停在跑道上。李志綏登上飛機，機艙中只有他一個人。

飛機飛抵北京西郊機場時，已是深夜二時多了。毛澤東的司機正在等着他。車子將李志綏直接送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的住處。這時的李志綏，仍然穿着在黑龍江時那一身厚棉衣，熱得滿頭大汗。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從屋裏迎了出來，向李志綏說道：「他老人家坐在大廳裏等着你，你見過他，我再告訴你詳細情況。」

毛澤東坐在他的書房兼會客屋正面的沙發上，面色潮紅，呼吸急促。一見到李志綏，毛澤東便說道：「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請你回來。你先叫護士長把我的X光片子拿出來看看，明天再給我檢查，說說你的意見。」

李志綏看了毛澤東的X光胸片，確實是肺炎的影象。只是因爲毛澤東當時「被迫害妄想症」已經走火入魔，精神處於極度緊張的懷疑狀態，如果實事求是地將先前的醫療小組的診斷告訴毛澤東，他不但接受不了，李志綏也必被斥責爲林彪一伙。因此，經過再三思量之後，李志綏向毛澤東說：看來仍是舊毛病，是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只要打打針就好了。

聽到李志綏的話後，毛澤東一臉焦慮的神情立刻放鬆了。毛澤東用雙拳猛扣着自己的前胸說道：「林彪大概希望我的肺爛了！你再拿着片子去看看這三位大夫，看看他們怎麼說。這三位大夫太可笑，一個只管檢查，不說話。一個只是說話，不檢查。另一個戴個大口罩，既不檢查又不說話。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針，看死得了死不了！」

毛澤東與林彪這時已形同水火。在毛澤東那受迫害的狂想曲中，林彪成了猙獰的主角，毛澤東滿腦子都是林彪那魔鬼般的影子。這兩位「最親密的戰友」，現在是徹底地分道揚鑣了。

毛澤東雖然在病中，但對林彪一伙卻是抓住不放。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吳法憲的書面檢討上批示：

「作爲一個共產黨人，爲甚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慨？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又找甚麼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藉口」。

毛澤東在這裏已不單止批判吳法憲，矛頭所指，已是整個林彪集團。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澤東在葉群的書面檢討上批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一個傾向掩蓋着另一個傾向。九大勝利了，當上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之外，反九大路線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佔了上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是這樣嗎？」「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一九七一年一月，在中央軍委座談會和華北會議上，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不批判陳伯達，也不作檢討。毛澤東聽聞後又批評道：「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痒，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樣。」

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軍委辦事組（亦即黃、吳、葉、李、邱）寫了一個檢討報告。毛澤東又批示道：「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爲甚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

想，採取步驟，變被動爲主動。」

三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黃永勝等人的檢討上批示：「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

毛澤東甩過來的已不是石頭，而是炮彈，又頻密，又威猛。毛澤東的來勢洶洶，不但緊抓不放，絕不讓步，而且也絕不手軟。林彪集團中的陳伯達，黃、吳、葉、李、邱都提遍了。毛澤東雖然還沒有點主帥林彪的名，但看這個勢頭，那也只是早晚的事了。

毛澤東一方面加緊「清君側」，對陳伯達和幾名大將頻頻出擊，另一方面卻千方百計隱住林彪。

一九七〇年十月八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信：「秋風已起，要保重身體」。

十月十二日，林彪給毛澤東回信，說：

「我深感在路線上、思想上都跟不上主席的教導，跟不上革命形勢的發展」。「我深感不適宜爲主席的接班人，請主席酌定。我完全、無保留地擁護主席的決定。」

十一月九日，毛澤東覆信給林彪，說：「此議不妥。黨章規定、黨的決議，我不能違反。你我在路線上、在大是大非的鬥爭中，基本還是一致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毛澤東託江青贈送林彪一支派克金筆。那是國外友人送給毛澤東的。林彪收到後馬上寫了封感謝信，由葉群呈給毛澤東。

雙方都在敷衍、做戲，都在等待着那最後一刻的到來。

四、「討嫌」

一九七〇年秋天，美國記者斯諾再度訪華。當時正是毛澤東與林彪將戰場由廬山轉移到北京，互相鬥法的時候。這位美國記者用自己的筆記下了這個歷史時期的珍貴片斷。

在國慶節這一天，斯諾夫婦被邀請上了天安門。這是最隆重的禮遇了。斯諾說：「我安詳地坐在擠滿了人的天安門城樓上。忽然覺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轉過身來，看見了周恩來總理。他很快就領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來到毛主席身邊。」

天安門廣場上的群衆齊聲喊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很多人的眼裏迸出了熱淚。

斯諾不由得指着那些場面問毛澤東：「對這些您覺得怎麼樣？您的感覺如何？」

毛澤東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並不滿意。在哪些方面不滿意？毛澤東還來不及作答，談話便被新引來召見的人打斷了。

斯諾是毛澤東的朋友，也是林彪的朋友，他們早在延安時期已經認識了。林彪當時任紅軍大學校長，還曾請這位美國人到「紅大」給學員們作了一次關於美國對外政策方面的報告。雖然如此，斯諾在更大程度上是屬於毛澤東的。《西行漫記》中的主角是毛澤東，而不是林彪。

毛澤東由於身體不舒服，便通知林彪去會見斯諾。但林彪沒有去，理由是：「大家都是熟人，如果他問起一些問題，不好回答。」

林彪說的恐怕是實情。斯諾上一次來訪華，是在一九六五年，這五年多以來，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

了多少事情，多少變化！這一切對斯諾來說，無疑都是絕佳的報導題材。斯諾必然刨根問底，有些問題眞是不好回答。尤其是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後這些敏感的日子裏，林彪擔心再說錯甚麼話，傳到毛澤東那裏，便是引火燒身了。而且，林彪不善於應酬，說話直截了當，並不是應付新聞記者的材料。林彪選擇了「避之爲吉」。

在正常的情形下，本來應該是由周恩來，而不是林彪出面接待斯諾的。毛澤東給林彪出的這個題目，實在是不尋常。其中有沒有試探的成份，「抓辮子」的成份?從毛澤東當時說給他看病的醫生是林彪派來的，「林彪大概希望我的肺爛掉」這種偏執狂來看，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的。

斯諾在北京乾等着。後來，周恩來打電話來催林彪的大駕。林彪不但不去，而且發火了，對接聽周恩來電話的秘書喝道：

「你看我身體不好，能見嗎?你看我的腳，墊着手帕！」

葉群聞聲後，讓秘書不要將這些情況告訴周恩來。晚上，葉群想勸林彪去見斯諾，林彪又發火了，並且追究起來，說：

「已經讓秘書回絕總理，爲甚麼不告訴?」

葉群嚇得讓這位秘書躲起來，以便讓她把責任推到其他的工作人員身上，將事情掩蓋過去。

林彪始終沒有去見斯諾。毛澤東自然是不高興。不是說「一句頂一萬句」嗎?不是「緊跟」嗎?現在怎麼支不動了呢?

斯諾在北京呆等了好久，直到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病情稍好後，才召見斯諾，兩人談了將近五個小時。

斯諾寫道：

那是清晨，我們共進了早餐，一直談到一點左右。

毛澤東寬敞的書房裏四面都是書架，書架上擺滿了數以百計的中文書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書籍。許多書中插着注有解釋的、作書簽用的紙條。大寫字桌上高高地堆着報刊和手稿。這是正在從事寫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過寬敞的窗户，可以瞥見園景，據說主席親自在園子裏種植蔬菜和試種莊稼。

主席批評了對毛「個人崇拜」的專講形式的做法，解釋了爲甚麼在文化革命期間曾有必要採取這種討嫌的做法，並且預言這種做法將逐漸改變。他說，人民共和國政府不久將讓能代表美國廣泛的政界和新聞輿論界的右、中、左三方面的一些人訪問中國。他談到贊成同美國最高級官員（包括尼克松先生在內）開始進行談話。他說他寄很大希望於美國人民，認爲美國人民將是一支有益於世界的潛在力量。

毛主席強調說，他不希望進行接見記者式的談話。我們進行的是一次交談。但是，只是在最近我才能够證實他不反對在不直接引用原話的情況下發表他的某些意見。

我們議論了我寫的關於我們上次一九六五年一月談話的報道，在那篇報道中，我曾寫道，他承認中國確有「個人崇拜」，此外，有理由要有「個人崇拜」。因爲我寫了這一點，有些人曾批評過我。

主席說，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

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TEACHER（導師）」這個詞，就是教員。毛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甚至在他成爲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就是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其他的稱號一概辭去。

我說：「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毛口號最響，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說的——在打着紅旗反紅旗。」

毛點點頭。他說，這些人分三種。一種是真心實意的。第二種是隨大流的——因爲別人喊「萬歲」，他們也跟着喊。第三種人是僞君子。我（按：指斯諾）沒有受這一套的騙是對的。

我說：「我記得，就在你一九四九年進北京之前，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據說是根據你的建議——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來命名街道、城市或地方。」

他說，是的，他們避免了這種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現了。有那麼多的標語、畫像和石膏像。紅衛兵堅持說，如果你周圍沒有這些東西，你就是反毛。在過去幾年中，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應當降溫了。

他接着說，但是，難道美國人就沒有自己的個人崇拜嗎？各個州的州長、各居總統和內閣各個成員沒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麼能幹下去呢？總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總有人願意崇拜別人。他問我說，如果沒有人讀你的書和文章，你會高興嗎？總要有點個人崇拜嘛。

毛澤東在發出「討嫌」、「要降溫」的訊號的同時，並沒有放鬆「批陳整風運動」，沒有放鬆對林彪集團的壓迫。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華北會議上宣佈中央的決定：將李雪峯，鄭維山（前者係北京軍區政委，後者係北京軍區司令員）同志調離原職，繼續進行學習，接受群衆教育，待有成效後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謝富治任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德生任第二書記，紀登奎任第三書記」。這就是毛澤東說的「挖牆角」。

四月十五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批陳整風匯報會。中央、地方和部隊的負責人共九十九人參加。二十九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了總結講話。周恩來指出：黃、吳、葉、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分裂路線上去了。希望他們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實踐自己的申明，認眞改正錯誤。

《大動亂的年代》一書說：「儘管毛澤東注意穩住林彪，但是林彪定然心中有數。林彪會知道：批陳實質上是批林」，「批陳整風運動十分複雜，既有正確的方面，更有不正確的方面，正確與錯誤混雜」。批陳伯達「問題沒有抓准，批陳頗多牽強附會，沒有打中要害，若干問題沒有正確處理，人爲地製造了糾紛」。

毛澤東「沒有正確處理」的是與林彪的關係。毛澤東沒有適可而止，而是繼續抓住不放，窮追猛打，一心要利用九屆二中全會這個問題大大地打擊林彪。從而「人爲地製造了糾紛」，把林彪往懸崖上更迫進了一步。

在毛澤東咄咄迫人的攻勢面前，林彪依然沉默着，在房間裏踱步。有一次，林彪要秘書找一下毛澤東有關犯錯誤幹部表現的論述。秘書爲他找了十多條，如「唯我獨尊」，「壓制不同意見」等等。林彪看後說，你把它燒了，讓人知道了不好。秘書十分納悶：一個黨的副統帥，研究幹部犯錯誤怕甚麼呢？秘書那裏知道，林彪是想用毛澤東的有關論述來衡量一下自己，想知道毛澤東究竟要對自己採取甚麼行動。

林彪是否也有些招駕不住了。

五、撲朔迷離的日子

從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八月，是一段撲朔迷離的日子。

在這半年的時間內，毛澤東與林彪這兩位並肩戰鬥了四十多年的「最親密的戰友」兼政治盟友，走完了最後一段合作之路，終於走向決裂。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爲甚麼最終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而訴諸於暴力呢？毛澤東將鬥爭一次又一次地升級，他到底想達到甚麼目的？他爲甚麼要這樣做呢？林彪在這段最後的日子裏，究竟做了些甚麼呢？是甚麼因素導致這位一代名將在最後一役中全軍覆沒呢？

在這些方面，官方透露出來的資料少而又少，許多問題更是一片空白。比如，林彪在整個武裝政變的策劃、實施的過程中，究竟起了甚麼作用，扮演了甚麼角色，官方能提供的資料，實在是少得可憐。除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寫的一張字條「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被認爲是林彪下達

的政變手令外，官方沒有能夠提供林彪參與政變的直接證據。林彪如果是策劃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大陰謀，竟然沒有留下一點痕跡，這是十分罕見的。

在這段撲朔迷離的日子裏，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探討，那就是：在這段時間裏，林彪有沒有找毛澤東，想就廬山上發生的事情交換意見呢？

官方的說法是「沒有」，林彪不但沒有主動找毛澤東交談，反而躲着毛澤東。其根據是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的南巡講話中的一句話：「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毛澤東在這裏告訴世人：林彪並沒有找過他談話，他將主動找林彪。顯示出毛澤東對林彪寬大爲懷，仁至義盡。

提供另一種說法的，是在林彪身邊工作的秘書。他說：

「毛主席在巡視大江南北時說，林彪不見我，我回去要找他談。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見不上。後來沒有辦法才找江青。他最討厭江青，但又沒辦法，因爲想通過江青去見毛主席。就在這個時候，江青還給林彪拍了個像，就是登在解放軍畫報上的那一張（指江青以峻嶺之名發表在一九七一年第七、八期《解放軍畫報》合刊本的林彪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照片，題爲《孜孜不倦》）這張像照了兩次。江青說她在釣魚台已經佈置好了，讓林彪去。林彪爲了見毛主席趕緊去。走得急，臉都沒刮。到了釣魚台，現借江青秘書的刮臉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還是沒見上毛主席。」上文載於官偉勛著《我所知道的葉群》。爲免讓當事人惹禍，官偉勛對書中的林辦秘書都取了代號，而不具眞名。上文所說的林彪秘書，代號爲Y。官偉勛還寫道：「這位Y秘書是位很精幹的很漂亮的小伙子，他敢說敢講。不少問題使他納悶。他說他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如實地向中央報告了。是怎麼回事，就是怎麼回事，決不打折

扣。這是對黨、對歷史負責的態度」。「Y給我的印象，誠實、坦率、有正義感。憶及往事，仍情緒激動，不能自已。」

姚樂明著的《林彪的陰謀和死亡》一書，也認爲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多次想要找毛澤東交談，但毛澤東都不見。林彪苦苦等待着毛澤東的接見，希望雙方能消除誤會，和好如初。就因爲林彪對毛澤東抱有幻想，苦苦等待，不能最後下決心發動政變，失去了最後的時機，結果反被毛澤東所殺。

在這三種說法中，最可信的，是林彪秘書Y的說法。Y是林彪手下區區一個小秘書，與林彪非親非故。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人們對待林彪，像躲避瘟疫一樣。Y秘書沒有理由無中生有，去編造這樣的事情，惹禍上身。而且Y秘書的說法合情合理。林彪最討厭江青，但爲了能夠見毛澤東，不得不紆尊降貴，去俯就江青。Y秘書的說法可信性極高。

最不可信的，是毛澤東的說法。事緣晚年的毛澤東，其政治作風中有太多的虛假，太多的權術，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爲了達到目的，往往不擇手段。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別的不說，例如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批評林彪「有些話說得不妥」，其中點了「頂峯論」。「頂峯論」是林彪在一九六〇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的。毛澤東如覺得「不妥」，爲甚麼當時不說，過後也不說，直到十一年後，將劉少奇打倒了，認爲不需要個人崇拜了，要「降溫」了，才說「不妥」。如此「過河抽板」，怎麼能取信於天下呢？

林彪多次找毛澤東，當然就是想當面與毛澤東交換意見，消除在「國家主席」、「天才」等問題上的誤會，獲得毛澤東的諒解和重新信任，和好如初。但是，這僅是林彪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毛澤東則另有打算，因此多方拒絕會見林彪。毛澤東的「拒見」，就是不給林彪解釋的機會。毛澤東心中很清

楚，在「國家主席」問題上，是自己首先向林彪發難，是自己心懷陰謀詭計，如認眞追究起來，毛澤東很難自圓其說。而「天才」問題只不過是個理論問題，思想認識問題，有沒有天才，是不是天才，盡可以討論，於國家於人民並不構成損害，完全不必如此大動干戈。因此，毛澤東不想深究，不想聽林彪的解釋，也不願意「諒解」。毛澤東根本就不想「和好如初」了。

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初衷，正如他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與林彪談話的那樣：「國家主席還是不設爲好。一人任黨主席和國家主席會被壓垮。兩個主席會打架。你還是當好黨的副主席，抓好軍隊。」毛澤東只想讓林彪當個聽聽話話、權力也不大的「二等」的接班人。可是，經過九屆二中全會的事件以後，毛澤東已經不再信任林彪這個接班人了。官方引用毛澤東說的「對林還是要保的」一類的話，便認爲毛澤東還是保護林彪。這只是表面的看法。實際上，毛澤東的內心裏，更換接班人，已是勢在必行的了。毛澤東說：「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爲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由此可見，毛澤東認爲林彪改的可能性並不大，毛澤東並不相信林彪能改。毛澤東還說：「林彪改了仍可當常委」。也就是說，林彪即使改了，最多只能當常委。至於副統帥接班人，那當然是不能當了。因此，自從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的章法便是抓住不放，寸步不讓，逐步升級，毛澤東一心一意要把這位接班人拉下馬。

一九七一年七月，毛澤東又一次將事件升級。

七月九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中國方面出席談判的是周恩來、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駐加拿大大使黃華，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翻譯冀朝鑄和唐聞生，還有以國務院總理助理身份，實際上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主管國際形勢研究的熊向暉。第一輪談判結束後，已是深夜了，周恩來要去中南海向毛澤東匯報，準備帶王海容和唐聞生一塊去。但毛澤東要熊向暉也來。周恩來一行四人便匆匆由釣魚台趕去中南海游泳池。

毛澤東的會客室中，七張單人沙發擺成一個半圈，每兩張中間放着一個茶几。毛澤東坐在居中，周恩來和熊向暉分別坐在他的兩旁。寒暄過後，周恩來說基辛格到了，準備匯報第一輪談判的情況。不料毛澤東擺了擺手，說：「那個不忙。」

毛澤東轉向熊向暉，閒聊了幾句，便切入正題。

毛澤東問：「你在總參二部當副部長吧？」

熊向暉回答：「是。」

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煙，操着濃重的湖南鄉音，又問道：「那個『參謀總長』姓甚名誰呀？」

身爲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竟不知道總參謀是誰?!熊向暉回答：「黃永勝。」

毛澤東又問：「你同黃永勝熟悉不熟悉呀？」

熊向暉答：「到總參以後，在會上認識了黃總長，沒有單獨接觸過。黃總長提到過我。」

問：「他是怎麼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四月，黃總長在總參批陳整風小結會上說，主席對他講，總參有篇批陳發言有水平，但

主席沒有講具體是哪一篇。黃總長估計，可能是江鐘的，也可能是熊向暉的。」
毛澤東：「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讀過一些馬列的書。」
熊向暉以爲這些題外話到此爲止，毛澤東該聽取周恩來的匯報了。可是毛澤東似乎還想繼續談下去。
毛澤東又問：「在那個小結會上，黃永勝還講了甚麼？」
熊向暉詳細地介紹了小結會上的情況。毛澤東聽後，又問：「他們沒有講廬山的問題？」
熊向暉回答：「講了，是在批陳整風動員會上講的。吳副總長說，總參同陳伯達沒有來往。黃總長說，他是在廬山會議開始以後才到了廬山，當時主席已經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揭露了陳伯達。黃總長說：他不認識陳伯達，原來只是知道陳伯達是個理論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來，他也看不出陳伯達搞的『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有甚麼問題，也可能上當受騙。以後要堅決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讀一點馬列的書。」
毛澤東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口煙，用緩慢的語調問道：「廬山的事，他們就講這些？」
熊向暉：「主要就是這些。」
毛澤東聽後沉默了一會，深深吸了一口煙，突然伸出左手，數着手指頭，向熊向暉說：「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還有葉群，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
熊向暉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澤東又問有沒有看過黃永勝等人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還是回答：沒有。
毛澤東意味深長地看着熊向暉，問道：「你嗅出點甚麼沒有？」

由於熊向暉對廬山上的事情一無所知，所以依然是回答：「沒有。」

這時，毛澤東轉過身來，問周恩來：「那五個人的檢討，發給總參沒有？」

周恩來答道：「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六十多份。」

這就是說，文件應該發到熊向暉這一級的幹部。可是黃永勝卻沒有這樣做。

毛澤東生氣了，他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提高聲調，說道：「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室內的空氣彷彿凝固了。「他們的後台」指的自然是林彪。

周恩來想緩和一下氣氛，便說：「我過去也犯過錯誤，一經主席提醒、批評，總是努力改。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作了檢討，以後也許會在實踐中改正。」周恩來在為黃永勝等人更是為林彪說情。

毛澤東搖搖頭，說：「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歷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眞正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要講團結、就要光明正大。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這些「題外話」談了一個多小時，毛澤東才聽取周恩來的匯報。周恩來的匯報將近一個小時，離開時已是凌晨兩點多了。周恩來囑咐熊向暉：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

廬山的事情不但沒有完，毛澤東還開始打「後台老板」林彪的主意了。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林彪問題比基辛格訪華、中美關係還要來得重要。按中國的傳統，「安內」向來比「攘外」重要。陳伯達已成

爲死老虎，可以轉入第二步的「打主帥」了。毛澤東決心向林彪發起總攻擊。

毛澤東拒不見林彪，林彪自然不會認爲這是好事，也不會表示「滿意」。於是，林彪便用自己的行動來表示自己的不滿。

一九七一年「五·一」勞動節，例照是在天安門廣場歡慶，白天遊行慶祝，晚上是放煙花和文藝表演。華燈初上的時候，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陪着西哈努克親王到達天安門城樓，但林彪沒有到。這天晚上毛澤東要出席，按慣例林彪必須先到，等毛澤東來到後，一起上天安門。周恩來叫秘書打電話去「林辦」催駕。「林辦」回復：「林副主席身體不好，上午的活動已經參加過，晚上不參加了。」周恩來一聽便急了，親自接過電話，請林彪接聽。周恩來說：「林副主席，晚上的煙花晚會還是請你參加一下……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完，主席是要來看焰火的，你不參加不好。這樣的活動要面對人民群衆，面對全國觀衆……。」

林彪終於同意參加了。

可是，林彪再不肯先到天安門來等候毛澤東一起上城樓。毛澤東的車子到了，下了車只見到周恩來，沒見到林彪。

周恩來解釋說：「主席，林副主席身體不太好，可能晚到一會兒。」

毛澤東若無其事地說了一句：「他對自己的病總是採取唯心主義的辦法。」

毛澤東先在城樓上的休息室裏與西哈努克、陳毅等人閒聊，過了一會兒，周恩來過來報告「晚會即將開始」，毛澤東一行才前往入座。

這時，林彪還沒有來到，他的座位空着。毛澤東向那空着的座位瞟了一眼，依然若無其事地與西哈

努克等人閒聊。

主席等副主席，毛澤東等林彪，這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休息室裏等候的時間不算，在城樓上憑欄而坐又等了足足三分鐘，林彪才神情萎靡，面色陰郁地走過來。

喧嘩聲起處，毛澤東明知林彪來了，不但沒與林彪打聲招呼，反而不屑一顧，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打招呼，但毛澤東彷彿故意似的，一句接一句談話，目光咬着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來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的一瞥，來不及吱一聲，更無法分身去握手寒暄了。

林彪也算沉得住氣，他也不正眼看毛澤東，不握手，不打招呼，獨個兒神情郁悒地坐下來，拉長着臉悶聲不響。

看到林彪受到冷遇，稟性忠厚善良的董必武探過頭去，眯細眼望着林彪，謙和而關切地問：「林副主席，身體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臉，稍向董必武傾下頭，回答道：「不好」。

林彪誰也不看，但他正用眼睛的餘光留意着毛澤東，準備隨時響應毛澤東那邊的動作。可是，毛澤東沒有絲毫同林彪打招呼或談話的意思，甚至始終不肯面對林彪看一眼。

林彪失望了。他的濃眉顫動了幾次，陰郁的眼睛中似乎閃了一道亮光，透出了一股銳氣和火氣。正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澤東那邊的談話中去，只剩下他自己落落無伴的瞬間，他驀地立起身，動作一點也不像病體孱弱，而更像在東北帶兵之時那麼乾脆，站起來便轉身，轉身便旁若無人地揚長而去。（見周恩來秘書何樹英回憶錄）

這是典型的「林彪風格」。

林彪這一不辭而別，正是要向毛澤東表示自己的不滿與憤怒。林彪的一生中，對同志、對下屬甚少發火，從不罵人，更無雷霆震怒。這一次揚長而去，算得是「大動作」、「大手筆」了。看起來，林彪身體裏那股剛烈之火還未熄滅。

六、拙劣的《五七一工程紀要》

在「林彪事件」中，「武裝政變」佔有重要的地位，可是，它偏偏又是一大謎團。

從官方公佈的材料來看，從九屆二中全會後至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和林立果並沒有甚麼不軌的行爲。林彪似乎在觀看，看毛澤東還要做甚麼。這時候林立果雖然在南方活動，但也未見甚麼大動作。在北京，毛澤東這時候正是抓住不放，又是甩石頭，又是摻沙子，又是挖牆角，窮追猛打，來勢洶洶，顯示出一副絕不善罷甘休的樣子。林彪不得不起而自衛。

按官方的說法，《五七一工程紀要》出籠的過程大概是這樣的：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葉群和林立果一起到蘇州。

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到達杭州，進行反革命串聯。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七三五〇部隊原政治委員陳勵耘密談。

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帶着于新野、許秀緒（空軍雷達兵部技勤處處長，聯合艦隊成員）從杭州到了上海。當晚，又通知北京的周宇馳立即來上海。

三月二十日，周宇馳戴大口罩，乘坐吳法憲提供的專機到達上海。

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便糾集周宇馳、于新野和李偉信（七三四一部隊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聯合艦隊」成員）進行密謀，對形勢進行了全面的評估。會後，林立果叫李偉信將會議內容進行整理。李偉信於三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執筆寫下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紀要》是寫在一本手冊上的，「九·一三」事件以後，從北京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查獲了這份李偉信手寫的《紀要》。

《五七一工程紀要》全文如下：（註一）

一、可能性

九·二後（註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

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

群衆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衆叛親離。

（一）一場政治危機正在蘊（醞）釀。

（二）奪權正在進行。

（三）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

（四）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

(五)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

(六)他們「故計［伎］重演」。

(七)政變朝着有利於筆杆子，而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

(八)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

(九)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我方力量

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

在全國，只有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勃勃。

革命的領導權落在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

在中國未來這場政治革命中，我們「艦隊」采取甚麼態度？

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

革命領導權歷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

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餘地大。
空軍機動能力強。
比較起來，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
兩種可能性：
奪取全國政權，
割據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B—52（註三）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
對我們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後發制人，
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
筆杆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爲他們私利服務。
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
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冲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

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

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

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爲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

爲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條件

有利條件：

國內政治矛盾激化，

危機四伏，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

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

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並且握有兵權，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於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幹部，敢怒不敢言。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砲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是變相受剥削。
國外矛盾激化。
中蘇對立，整蘇聯，我們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
最重要的條件：我們有首長（註五）名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
從自然條件上講：
國土遼濶，迴旋餘地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强，有利突襲，串聯、轉移，甚至於撤退。
困難：
目前我們的力量準備還不足。
群衆對B—52的個人迷信很深。
由於B—52分而治之，軍內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力量。
B—52深居簡出，行動神秘詭詐，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一定困難。
四、時機

敵我雙方騎虎難下。

目前表面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是一場你死我活鬥爭，或者我們把他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

戰略上兩種時機：

一種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

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

戰術上時機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敵主力艦（註六）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

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

五、基本力量和可能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

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掌握空四、空五軍（骨幹力量）。

九師、十八師。

廿一坦克團。

民航。

三十四師。

借用力量：

國內，二十軍，三十八軍，黃（永勝）軍委辦事組。國防科委，廣州、成都、武漢、江蘇、濟南、福州、新江（疆）、西安。

國外，蘇聯（秘密談判）。

借蘇聯力量箝制國內外各種力量。

蘇暫時核傘保護。

六、動員群衆的口號綱領

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扛着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的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外，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團結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團結起來！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

用「民富國強」，代替「國富民窮」，使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政治上，經濟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爲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社會主義，代替B—52的社會封建主義。

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維護社會秩序。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准串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率（帥）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破壞活動。

七、實施要點

三個階段。

第一、準備階段：（一）計劃。（二）力量和指揮班子、江、王、陳。△兩套警衛處，公開，李松亭。秘密，上海小組負責，新華一村教導隊。△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面）△南空直屬師工作（十師），周建平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三）物質準備，武器，領、自造。通訊器材（包括○一二工程）（註七），車輛掌握，倉庫地點，主要軍械庫。（四）情報保障：掌握三個環節，搜集、分析、上報。

第二階段，實施階段。一個先聯後斬，上面串聯好，然後奇襲；一個先斬後聯；一個上下同時進行。一定要把張春橋抓到。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佈他的叛徒罪行。總的兩條，一是奇襲，二是一旦開始，堅持到底。

第三階段，鞏固陣地，擴大戰果。（一）軍事上固守。△盡力堅守上海，佔領電台、電信局、交通，把上海對外聯繫卡斷。△力爭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禦。△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運。（二）政治上採取進攻。△上面攤牌。△掌握輿論工具，開展政治攻勢。（三）組織上擴大。△迅速擴軍。△四方串聯。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號打擊B－52力量，緩和群衆的輿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決大多數，集中打擊B－52及其一小撮獨裁者，解放一大片，保護一大片。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批，各個擊破。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衆鬥群衆，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最大倡導者。

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維持他們統治地位的目的。

他們知道同時向所有的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對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階下囚。

從十幾年的歷史看，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爲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過去對B—52宣傳，有的是出於歷史需要，有的是出於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內情。

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給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B—52莫須有罪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註八）。不成功便成仁。

洩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制裁。

註一：「五七一工程」係武裝起義計劃之諧音。
註二：「九、二」指中共九居二中全會。
註三：B—52指毛澤東。
註四：「我們艦隊」係林彪集團自稱。
註五：指林彪
註六：指中共中央黨政首要。
註七：此爲中共新發展之秘密武器。
註八：江田島爲日本海軍學校所在地，此處指武士道精神。

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說：「《紀要》是個草稿。定稿沒有，送給林彪、葉群看過沒有，都不得而知。林立果對于新野等人說，這個計劃是林彪叫搞的。林立果說的是不是眞

話，也無從得知。靳大鷹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記》裏說：『裏面有些話只有老謀深算的人才能說得出來，有的話則明顯的幼稚膚淺』。這是確實的。假設林彪看過《紀要》，他會不會同意，還是不難推斷出來的。」

王年一的答案是：假設林彪看過《紀要》，他不會同意。

王年一的推論是有道理的。作爲一份反革命政變的計劃，《紀要》顯得太簡單、太粗糙了，而且幼稚而膚淺。裏面大部分是空泛的議論，實質性的東西不多。最重要的是，《紀要》沒有一套完整的、切實可行的實施計劃。《紀要》中的「實施要點」以及「時機」中說的種種方法，都是一些泛泛之談——整個《紀要》並沒有定出一套詳盡的行動計劃。

很顯然，《紀要》並非出自林彪之手，並沒有林彪的色彩和印記。林彪指揮打仗其風格是講究戰略戰術，喜歡用謀略，而不喜歡死打硬拚。《紀要》中列舉的一些實施方法，如「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逼宮形式」、以及用奇襲抓住張春橋，公佈他的叛徒罪行，與南京形成軍事對壘等等、都是一些十分幼稚而膚淺的、死打硬拚的東西，根本不可能成功。在這裏，見不到老謀深算的、巧妙的韜略，也見不到扣人心弦的計謀。

另外，林彪指揮作戰以謹慎、不打無把握之仗，戰前「運籌」得十分周詳、縝密、細緻而見稱。然而《紀要》的實施計劃格外地粗糙、毛草、簡單，完全不是林彪的風格。

如果像林立果所說，《紀要》是林彪讓搞的，那麼林彪事先對政變必有所「運籌」。須知，林彪曾在一九六〇年代潛心研究過古今中外的政變，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發表過「政變經」的講話，以林彪這樣的軍事家、政治家，又經過長時間的潛心研究，不會不在這方面有所心得，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

和觀點。因此，在讓林立果搞政變計劃的時候，林彪必然會面授機宜，將自己對政變研究的心得告訴林立果，那麼《紀要》就不會出現上述的那些情況，而就必然會打上林彪的印記：老謀深算、周詳、細緻、縝密。

如果確實是林彪讓搞的，那麼事後林立果必然會將《紀要》向林彪匯報，讓林彪過目。而對於這樣的《紀要》，林彪必然不會滿意，而且必然要下令修改。可是，《紀要》只有初稿，此後又沒有進行修改，更沒有定稿。因此，《紀要》沒有經過林彪之手，林彪沒有參與，這是很明顯的。

「林彪讓搞的」之說，很值得懷疑。

《五七一工程紀要》出籠後，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有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周建平參加的秘密會議，這就是林立果稱的「三國四方」（「三國」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負責人加上北京的江騰蛟）。林立果說：「廬山會議都是幾個老總搞壞的，丘八門不過秀才，現在軍隊日子難過啊！」「現在的鬥爭，是爭奪接班人的鬥爭。主席的班，靠誰來接？張春 他算老幾？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會打仗，就是會造點輿論。」林立果還說：當前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隊；杭州、南京，上海情況各有不同，可以允許有不同做法；南京以周建平爲頭（周於四月一日參加會議），上海以王維國爲頭，杭州以陳勵耘爲頭，你們的老政委（江騰蛟）負總責。」

會議明確了分工。但分工後幹甚麼?依然沒有詳細、具體的計劃。而「負總責」的江騰蛟自始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他是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上才從李偉信那裏知道《紀要》。因此，林立果要江騰蛟怎樣去「負總責」，只有天知道。

四月初，林立果通過王維國建立了「教導隊」。

五月二十三日，周宇馳秘密進行駕駛直升飛機訓練。

七月下旬，林立果、劉沛豐、于新野、李偉信竄到廣東深圳、沙頭角，在飛機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說：「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首長到香港指揮、遙控」。

這就是林立果一伙所進行的「政變準備」。

王年一評論說：「從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等人活動中可以看出，他們想幹甚麼就幹甚麼，雜亂無章，反革命準備不是有條不紊地進行的。也看不出江騰蛟怎麼『負總責』。這時，葉群等人正在為林立果選『妃子』，林立果似乎並非虛假地戀着一個美麗的姑娘」。

政變的準備工作如同兒戲。

很顯然，林彪並沒有參與其中。

林彪這時在做甚麼呢？林彪在等待毛澤東的召見。林彪希望與毛澤東面談，消除誤會，「和好如初」。林彪對毛澤東仍抱有幻想，希望和平地解決問題，林彪並不想與毛澤東決裂，也沒有想到訴諸武力。

是毛澤東的行動使矛盾激化，林彪被迫「狗急跳牆」。

毛澤東的這個行動，便是「南巡講話」。

七、「南巡講話」

八月十六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張春　、紀登奎、黃永勝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周

恩來在匯報結束時說：

「據毛主席的提議，黨中央決定：『十·一』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在各項準備工作正在逐步就緒」。

按照毛澤東的戰略布置，這時要解決林彪的問題了。

毛澤東於八月十四日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到南方視察。毛澤東指示周恩來等人去北戴河，那是迷惑林彪的煙幕。

毛澤東在武漢、長沙、南昌，分別同湖北、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福建等地黨政軍負責人，進行了多次談話。這些談話後來被整理成文件，於「九·一三」後的一九七二年發表。毛澤東的「南巡講話」全文如下：

毛主席說，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麼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贊成分裂。從歷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

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八十一個人發表聲明，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他們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册子，裏面有我說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爲惱火，說槍桿子裏面怎麼能出政權呢？於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後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一九二八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贊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

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發表了「爲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册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够，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上搞光了。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台了。

在長征的路上，一、四方面軍匯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沒有成功。長征前紅軍三十萬，到陝北剩下二萬五千人。中央蘇區八萬，到陝北只剩下八千人。張國燾搞分裂，不願意到陝北去。那時不到陝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那時我們的路

線是正確的。如果不到陝北，那怎麼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麼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那麼多根據地呢？到了陝北，張國燾逃跑了。

全國勝利以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又不講軍事，講甚麼「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

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廬山會議的鬥爭。

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爲甚麼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峯、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居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

到一九一八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麼是天才？那幾個副詞（註一），是我圈過幾次的嘛。「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爲甚麼不翻開看看？《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衆路線，集體智慧。

林彪同志那個講話（註二），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爲有甚麼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後，又趕快收回紀錄（註三）。既然有理，爲甚麼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爲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甚麼「頂峯」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甚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甚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廬山會議以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角。批了陳伯達搞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批發了三十八軍的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麼長的座談會，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够，還要增加一些，這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牆角。

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麼看法？比如華北組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爲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九十九人的會議（註四），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註五），還發了李雪峯、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

討，都認爲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麼行呢？

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毛主席說，要謹愼。第一軍隊要謹愼，第二地方也要謹愼。不能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

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還要當武官。抓軍隊工作，無非就是路線學習，糾正不正之風，不要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講團結。軍隊歷來講雷厲風行的作風，我贊成。但是，解決思想問題不能雷厲風行，一定要擺事實，講道理。

廣州軍區寫的那個三支兩軍的文件（註六），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語上，我添了「認眞研究」四個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視。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還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搞顚倒了嗎？

過去我們部隊裏在軍事訓練中有制式教練的課目。從單兵教練，到營教練，大約搞五、六個月的時間。現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們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

一好帶三好，你那一好也許帶得對，也許帶得不對。還有那些積極份子代表大會，到

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開得好的，也有好多是開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線問題。路線不對，那積極份子代表會就開不好。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不完全，還要加上解放軍學全國人民。

毛主席說，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爲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衆。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註七），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嘛！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鬥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鬥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後，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這幾條記不清了。如果都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多好呀。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就不能勝利。再就是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對人

民，對戰士，對下級要和氣，不要耍驕傲，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這是重點。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戰士，教育幹部，教育群衆，教育黨員和人民。

毛主席說，廬山會議上講了要讀馬、列的書。我希望你們今後多讀點書。高級幹部連甚麼是唯物論，甚麼是唯心論都不懂，怎麼行呢？讀馬、列的書，不好懂，怎麼辦？可以請先生幫。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

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註八）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麼大的權。我的秘書只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

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彭、羅、陸、楊揪出來了，這是很大的收獲。損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幹部還站不出來。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不好的總是極少數。清除的不過百分之一，加上掛起來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給以適當的批評，好的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爲「超天才」，這沒有甚麼好處。這次廬山會議，有些同志是受騙的，受蒙蔽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有錯誤不要緊，我們黨有這麼個規矩，錯了就檢討，允許改正錯誤。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教育。方針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起來，爭取更大

的勝利。

原註：

一、指「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

二、指林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居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三、指葉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居二中全會中南組會議上的發言紀錄。

四、指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出席這次會報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隊的負責人共九十九人。

五、指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的檢討。

六、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發的「廣州軍區三支兩軍政治思想工作座談會紀要」

七、即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一文。

八、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

很顯然，毛澤東是向各地諸侯「吹風」和「打招呼」，目的在於打擊、瓦解和削弱林彪的影響力，爲肅整林彪進行輿論的和組織上的準備。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他的談話要嚴格保密。

毛澤東對黨的唯一的副主席有意見，爲甚麼不可以「搞陽謀」，公開地、面對面地在黨的會議上提出呢？爲甚麼要採用這種背後的、偷偷摸摸的「吹風」、「打招呼」的方式呢？這算不算「秘密串聯」？算不算是「地下活動」？算不算是「搞陰謀詭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是否身份特殊，可以不遵守黨的組織原則呢？毛澤東批評和指責林彪、陳伯達、葉群一伙在廬山上搞的那一套是「地下活

動」等等，而自己現在卻在大搞特搞。同樣的事情，是否黨中央副主席做的，就是「地下活動」，黨中央正主席做的，就不算是「地下活動」呢？或者是「只許正主席放火，不許副主席點燈」呢？

毛澤東「南巡講話」這種做法，合不合法，合不合理，頗有商榷之處。

至於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上文已多有評述，在此不再贅述。

八、叛逃

林彪最早是在九月六日了解到毛澤東講話內容的。那是廣州部隊空軍參謀長顧同舟於九月五日深夜用長途電話將毛澤東講話內容報告給北京的于新野。于新野作了十五頁的記錄，于次日駕駛直升飛機送到北戴河，交給林彪、葉群和林立果。九月六日凌晨，武漢部隊政委劉豐也將毛澤東談話內容，密告李作鵬。李作鵬很快作出三點判斷：

一、廬山的問題沒有完；

二、上綱比以前更高；

三、矛頭指向林彪。

李作鵬於當天回到北京，轉告給黃永勝、邱會作，黃永勝又立即密報葉群。

至此，林彪才恍然大悟，知道毛澤東不但不會放過他，而且毛澤東已經撒開羅網。到此時此地，林彪才決心搞政變：「與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

九月七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了進入「一級戰備」的命令。

九月八日，林彪在北戴河下達了「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政變手令」。

然而，林立果一伙此時尚沒有一套謀害毛澤東、實行政變的周詳計劃。於是，手忙腳亂、雜亂無章便在所難免。而政變慘敗的結局也就鑄定了。

謀害毛澤東的最佳地點和時機在杭州。那裏是陳勵耘負責毛澤東的警衛工作，而且毛澤東在杭州停留的時間最長。毛澤東是在九月三日到達杭州的，而林彪和林立果一伙是在九月七日才決定下手的。還沒有來得及布置和準備，毛澤東便於九月十日中午離開了杭州。

由於在杭州根本來不及布置，林立果一伙於九月九日決定將下手的地點設計在上海，其方案有：

一、爆炸毛澤東列車停放地附近的小油庫，趁火襲擊；

二、在蘇州附近的碩放橋放置炸彈，炸毀毛澤東的列車；

三、用火箭轟擊毛澤東的列車。

很顯然，這些方案都是臨忙臨急想出來的「急就章」，根本沒有經過詳細的策劃，簡單、粗糙、毛草，錯漏百出，完全談不上甚麼策略戰術。事實上也是這樣，在九月九日的會議上，林立果說：「現在的情況很緊急，我們已決定在上海動手」。會上也沒有作出實施這三種方案的具體計劃。

「一代名將」林彪，在此時此刻似乎已方寸大亂，手足無措。他放手讓林立果去搞謀殺，沒有過多地參與。也許是他已意識到大勢已去，於是布置空軍司令部參謀長胡萍安排飛機，準備「動手」失敗後南逃廣州，另立中央，這是「中策」；另外亦準備了「下策」：叛國外逃。九月七日起，葉群準備了俄華字典、英華字典、俄語和英語會話的書籍。九月八日周宇馳要了一本蘇聯航班地圖；以及東北、華北、西北地區雷達兵部署和可作導航用的周圍國家的廣播電台頻率表。

林立果一伙估計毛澤東會在上海逗留幾天。可是，毛澤東在上海僅逗留一夜，九月十一日中午便離開上海，一路不停，回到北京。

林立果一伙的政變陰謀徹底破產了。王維國得知毛澤東安全離滬後，長嘆一聲，一下子癱倒在沙發上。而林立果接到王維國的報訊後，嚎啕大哭，說：「首長交給我的任務沒有完成，我拿甚麼去見首長呀……。」

在北戴河蓮花石九十六號別墅，林彪聞訊後臉色鐵青，兩眼發直，坐在沙發上一聲不吭；葉群則如喪考妣地痛聲大哭。

九月十二日，林彪、葉群緊張地策劃實行「中策」：南逃廣州。

十二日上午，林立果召集周宇馳、于新野、江騰蛟、王飛、李偉信等開會，策劃南逃方案。林立果急着要乘二五六號三叉戰飛機飛回北戴河，他一面收拾東西，一面說：「情況緊張，我立即轉移。由周宇馳同你們談談。」

周宇馳向其他人說：「情況緊張，（毛澤東）要動手了。林副主席決定立即轉移廣州，要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明天到廣州談活」，「到那裏以後，首長召開師以上幹部緊急會議，宣布另立中央，進行割據，形成南北朝的形勢。提出條件，和北京談判」，「和蘇聯等國建立外交關係。要動武，就聯合蘇聯，實行南北夾擊……」。

林立果是在十二日晚上八時到達山海關機場的，由於等不及北戴河派車來接，便自己開着機場的一輛吉普車直奔林彪住地。

在北戴河林彪的住地，十二日夜裏的情形十分混亂。為了進行掩飾，葉群宣布林豆豆與張慶林訂

婚，舉行儀式後，便放映電影《甜甜蜜蜜》和《假少爺》。當林立果到達後，便立即與葉群進入林彪的房間。據林豆豆與服務員的偷探，林立果和葉群跪在林彪面前，林彪淚流滿面，說道：「我還是個民族主義者呵……」林彪似乎十分不願意戴上「賣國賊」這個帽子。

林豆豆為了挫敗葉群和林立果的陰謀，挽救林彪，偷偷將林彪一伙要外逃的情況報告給八三四一部隊警衛團副團長張宏，還親自向北京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報告。汪東興將情況報告給周恩來。周恩來馬上打電話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查問二五六號飛機的下落，並下令任何飛機無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共同簽署，不准起飛。林彪南逃的計劃又敗露了。

十二日夜十一時左右，林彪一伙決定施行下策：外逃蘇聯。

林彪、葉群和林立果是在十一時四十分乘車離開別墅的。

十三日零時三十二分，二五六號飛機強行起飛。林彪永遠離開了中國——這塊他生長和戰鬥了一生的土地。

林彪，這位一代名將，在與毛澤東進行的這場最後的較量中一敗塗地。

林彪失敗的原因，是毫無準備。從一九七〇年九月的九屆二中全會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的逃亡，整整有一年的時間。如果林彪想要搞政變，時間還是來得及的。同時，當時林彪還是「副統帥」，大權在握，完全擁有政變的物質基礎，加上他那韜略與計謀，是可以設計和導演出一場有聲有色、轟轟烈烈的「政變」戲的。可是，林彪並沒有充分地利用這些有利的條件。

其根本原因是，林彪打一開始，就沒有想到要與毛澤東決裂，要訴諸武力解決問題。林彪對毛澤東抱有幻想，希望能通過交換意見，和平地解決問題。是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害了他。林彪是得知毛澤東

的南巡講話之後，才狗急跳墻，鋌而走險，在九月七日決定政變的。這時，一切都已經晚了。

林彪叛國外逃，機毀人亡，他自己自然要負上主要的責任。然而，事實說明，「九·一三」事件的發生，是毛澤東將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人爲地加以激化，而釀成的一起惡性事件。而整個「林彪事件」，是毛澤東從錯誤的動機出發而主動挑起，在錯誤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極「左」思想指導下，用錯誤的方法來處理，從而人爲地製造出來的一場權力鬥爭。

對林彪的「九·一三」事件，毛澤東負有不可推卻的責任。

第六篇

殘陽如血

第一章　林彪在那裏

一、「九·一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清晨，在蒙古溫都爾汗那一聲爆炸，使林彪的生命結束了。然而，林彪給毛澤東和中國的衝擊與震撼，卻是剛剛開始。

九月十三日的凌晨，自從林彪的三叉戟飛機在雷達的屏幕上消失後，毛澤東與周恩來便分頭忙碌起來，應付這一急劇巨變。儘管從上海趕回北京的旅程使毛澤東感到勞累，但他睡不着，服了三次安眠藥，仍然不能使他安眠。林彪的事變，實在是太突然，大駭人聽聞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當周恩來匆匆忙忙地趕來報告這一消息時，毛澤東還不大相信；後來，北戴河警衛部隊的負責人再次打電話向汪東興報告，毛澤東才不得不接受這一驚人的事實。毛澤東面臨着一生以來最重大的政治危機。局勢下一步怎麼發展呢？毛澤東不知道，也沒有人知道。經過簡單的商議後，毛澤東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幾條應變措施，周恩來又匆匆忙忙地離去執行了。臨走前周恩來要他好好休息，但毛澤東怎麼躺得住啊。局勢將會怎樣發展雖然還不清楚，但有一點毛澤東的心中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他必須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解釋這整件事！可是，怎樣說好呢？人們會怎樣想呢？毛澤東必須面對四千萬的黨員和七億人民。

周恩來回到人民大會堂後，立即親自向各大軍區及主要省市的領導人通報了林彪外逃的情況，佈署了一系列的應急措施，除了命令封閉全國機場外，還下令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周恩來還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電的報導，並研究和提出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下需要進行的交涉和對策……忙完這些，已是十四日上午，周恩來已連續五十個小時沒有休息，他服下安眠藥，沉沉睡去。

二、烏蘭巴托的急電

九月十四日上午，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召見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通知他：十三日凌晨二時左右，一架中國的噴氣式飛機侵入蒙古領空，在溫都爾汗墜毀，機上乘員一共九人，全部遇難。中國方面必須就事件作出解釋。

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才走馬上任的。向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桑布遞交國書後，便開始一系列的到任拜會。正在各方面氣氛友好，諸事順利之際，忽然發生了這麼一件大事，許文益急需向北京的外交部匯報。可是，大使館沒有自己的電臺，而烏蘭巴托的電報局，由於線路情況不好，不能提供即時的通訊服務。許文益急中生智，想起大使館內有一條封閉了兩年多的通往北京的直線電話。這種專線電話，是五十年代中蘇關係密切友好時，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架設的，是一種可以直通的高頻電話。北京和烏蘭巴托之間也順便安裝了一條線路。後來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中蒙關係也隨之變冷，專線電話便停止使用。在情急之下，許文益毅然決定啓用。大使館辦公室的秘書從庫房

裏找出一大串鑰匙，一把把的試着開，找了半天，才找到鑰匙開機房，又花了近半個小時，才叫通北京的電話臺。可是，北京臺托詞外交部的機器壞了，不給轉接。許文益極力保持鎮靜，決定先打國際長途電話，通知外交部有重要情況報告，要求使用專線電話。經過幾番輾轉，北京外交部的專線電話終於接通了。當日中午十二時二十分，飛機失事的消息，便傳回到北京外交部。

當時，北京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正在召開黨組緊急會議，研究落實周恩來的指示。會議估計林彪外逃可能出現的情況有：

一、由林彪出面公開發表叛國聲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過外國廣播或報紙發表講話；

三、林彪及其追隨者暫時不露面，也不直接發表談話，由外國通訊社客觀報導林彪等已到達某國某地；

四、暫不發表消息，以觀國內動靜。

會議還制訂了在各種情況下相應的對策。

中午時分，會議室緊閉的房門被突然推開，一名機要秘書匆匆忙忙地走向姬鵬飛，向他遞交了一份特急手抄報告。姬鵬飛看了後，臉上露出了笑容，用一種異常的語調向大家說：「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

接着姬鵬飛把特急報告唸了一遍，與會者聽後都興奮不已。

姬鵬飛想馬上將報告的內容呈報毛澤東和周恩來，便讓王海容馬上打電話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辦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毛主席和周總理自前天（十二日）夜裏起，一直沒有合過眼，剛剛服過安眠藥

入睡」。周恩來按習慣要四個小時後才能醒來。當時，外交部黨組作出決定：必須立即派人把報告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否則就是嚴重的失職。於是，再一次和毛澤東和周恩來辦公室的值班秘書通電話，強調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別重要的文件，務必要把毛澤東和周恩來叫醒。

毛澤東那邊，是汪東興親自報告的。毛澤東聽了後，想了一下，問道：

「這個消息可靠不可靠？爲甚麼一定要在空地墜下來？是不是沒有油了？還是把飛機看錯了？」

汪東興回答：「飛機到底是甚麼情況，現在不清楚，大使准備去實地勘察。目前還不知道飛機是甚麼原因墜落下來的。」

毛澤東又問道：「飛機上有沒有活着的人？」

汪東興道：「這些情況都不清楚，還要待報。」

這個消息雖然很不具體，但它卻使毛澤東心頭的大石落地。

周恩來被叫醒後，便馬上去見毛澤東。

大約兩小時後，周恩來的指示電話打到了外交部：對外交部迅速把報告送到並叫醒他們感到滿意；對駐蒙古使館當機立斷，啓用已封閉兩年之久的專線電話，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況傳回來表示滿意。周恩來還指示：

一、將今天收到的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用三號鉛字打印十八份，下午六時由符浩副部長親自送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內，交中共中央辦公廳王良恩副主任；

二、從現在起，指定專人譯辦駐蒙古使館來的電報，由符浩外交部副部長親自密封後送總理親啓；

三、今天的報告，凡經辦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絕對保密。

下午五時五十八分，符浩提前兩分鐘按指定入口處進入人民大會堂北門，中辦的王良恩副主任已站在走廊裏等候，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準備召開。

林彪在溫都爾汗機毀人亡的消息，就這樣傳到了中共中央。

三、周恩來命令：大使親到現場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姬鵬飛與主管亞洲司的副部長韓念龍，一起給許文益起草了回電，指示他必須親自偕同使館人員赴現場視察。

九月十五日下午三時三十分，駐蒙使館向北京外交部報告：許文益大使及隨行人員四人已於下午二時乘蒙方專機前往飛機墜毀現場視察。

九月十七日晚八時三十分，駐蒙使館報告，許文益大使一行四人已於晚七時回到烏蘭巴托，並簡要報告了現場情況。

經請示周恩來後，符浩用專線與許文益通話，要許文益速派專人送回有關材料，並面報詳細情況。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三十分，由烏蘭巴托開來的國際列車到達北京站。符浩親自到車站去迎接駐蒙使館派回北京匯報的二等秘書孫一先。

當天晚上，姬鵬飛、韓念龍、符浩一行，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聽取孫一先的匯報。周恩來早已到了，正在伏案批閱文件。孫一先到後，匯報即開始。孫一先匯報如下：

飛機墜毀狀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乘三叉戟二五六號飛機叛國外逃，墜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附近。

根據國內指示，並經蒙古外交部同意和安排，我駐蒙大使許文益率領我們三人於九月十五日下午乘蒙方提供的專機赴飛機墜毀現場視察。蒙方陪往的有外交部領事司司長高陶布、二司專員古爾斯德、邊防內務管理局處長桑加上校及一些有關專家、記者、電影攝製組。

飛機二時四十五分起飛，航程三百公里，一小時後即達溫都爾汗的一個簡易機場。肯特省一位副省長、省政府秘書及機場場長前來迎接。全部人員分乘兩輛嘎斯六九和一輛大轎車奔赴失事現場—溫都爾汗西北七十公里的蘇布拉嘎盆地，下午六時抵達現場。這是一個草原丘陵間的沙土質盆地，十分平坦，到處覆蓋着三四十厘米高的茅草，南北長約三千米，東西寬約八百米，北、東、南三面被高低不等的土包環繞，西面則是一個斜坡，連着通向西北十公里的貝爾赫瑩石礦的小路。飛機失事發生在這片平坦草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燒面積長八百米，寬五十—二百米，是個倒梯子形。

首先觀察了甩在現場邊緣的機尾，它從中發動機進氣口處炸斷，斜臥在那裏，一眼就可看到機尾上鮮艷的五星紅旗和機號「256」等標記。這明白無誤地顯示是我國的噴氣式飛機。

飛機着陸點正好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長約二十九米的草皮被擦光，其西側不遠有深約二十厘米的

一道平行淺溝。再往南，擦地痕跡消失了，進入了燃燒區，出現飛機碎片，從少到多，由小到大，散布面越來越廣。至二百米處有一大片帶舷窗的機身，其東略偏南二十米左右的一段機翼上有「…56」字樣（後來判明是左翼的外展部分）。至三百二十米左右，有一扇釘有「旅客止步」塑料牌的門，其東南側三十米處有一架發動機。約四百米處有三個聯裝座位架及座墊，成三角形分布，每邊距離四十米左右，座機東四十餘米有一段機翼，上有「中國」二字（後來判明是右翼的外展部分）。

機頭燃燒區距着陸點五百三十米左右，火勢最猛，只剩下鑲嵌儀表的空架子和大堆殘碎機件，機身都已化爲灰燼。它的正東二十米左右有一大段機翼，上有「民航」二字（後來判明是右翼的內展部分），其根部「航」字旁邊有一個直徑約四十厘米的大洞。機頭以南八十米處有一個起落架，再往南二百米，在未燃的草叢中有一個尙完好的輪胎。機頭西北六十米處是歪斜着的機尾，它的正南和東西二十至四十米處各有一個發動機。

機頭以北五十米範圍內有三攤共九具屍體。第二、三攤屍體間有一炸壞的方形食品櫃，它的旁邊堆有蒙方收集起來的死者遺物。

現場巡視花了一小時五十分，太陽早已西下，天色灰暗下來。

雙方商定死者安葬問題之後至深夜十點多才返回到溫都爾汗。

屍體的察看和埋葬

九月十六日上午九點多，第二次來到飛機失事現場。主要是檢驗屍體並安葬。我們把屍體由北向南編爲一至九號，然後逐具進行察看，並從各個角度拍成照片。屍體面部大都已模糊不清，無法確認，根據事後驗證，一號屍體爲林彪座車司機楊振綱，左臂骨折，小腿有茶碗口大的綻裂，露出脛骨，頭髮燒光，右眼外角有一傷痕，肌肉外翻，血流凝至腦後，腹部有人字形兩條灼痕。二號屍體爲林立果，衣服全部燒光，皮膚燒傷不重，胸部有一大片焦痕，似滲有燒乾的柏油，面部皮膚燒成焦麻狀，眼眉及頭髮焦而未燒完；鼻孔下至右嘴角有幾道血跡流向右腮右鬢，死前似曾在烈火中掙扎，面部表情痛苦、兇惡。三號屍體爲劉沛豐，衣服燒光，皮膚燒灼較輕，指尖大部燒焦露骨，頭部受傷嚴重，鼻尖以上全部裂開，正如俗語所說腦袋開花，腦漿燒乾，腦骨變焦。四號屍體爲特設機械師邵起良，頭頂有一傷痕，血跡流經右耳上部至眼角，面部眼眉以下至下顎全部摔爛。五號屍體爲林彪，衣服全部燒光，皮膚燒灼不重，頭皮有綻裂，露幾道頭骨，眉毛燒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燒焦，右門牙至犬齒摔掉，舌頭燒黑，左眼內角至鼻梁間有一傷痕，血跡順額部流至右頭頂，脛骨炸斷，肌肉外翻，上脛骨刺露，兩腳底及右手心都燒起燎泡，整個屍體瘦削、短小、腫脹，看上去像個孩子。六號屍體爲機械師張延奎，頭髮略焦，眉毛全無，舌外吐，鼻尖及左嘴角至左耳有一道傷痕，右眉心有血跡流至左額角，翻轉身來，撒尿約十幾秒鐘，似乎內臟尚未燒壞。七號屍體爲空勤機械師李平，頭髮焦而未脫，鼻尖以上至兩眉以下，

面皮燒傷較重，肚皮上亦出現焦油狀燒痕。八號屍體爲葉群，燒灼最輕，衣服全燒光，頭髮基本完好，只額前略焦，兩眉焦而未脫，右眼角有一銀元大焦痕，左嘴角燒傷，左臂內身部綻裂酒盃大傷口，肌肉外翻，腳底均燒傷起泡。九號屍體爲駕駛員潘景寅，衣服全燒光，皮膚燒灼較重，兩手掌及手指均燒焦，面部嘴以上焦泡層層，糊成一片，頭髮全焦，胸部左右鎖骨上下，兩大片皮膚綻裂，腹側及兩大腿焦泡連連。

以上這些屍體和一般飛機失事的屍體不一樣，並不個個都是焦骨殘骸，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等摔撞傷。這些傷是飛機着地毀壞過程中造成的。大部傷勢都不重，而且軀幹完整，但皮膚燒灼都較厲害，而且多數屍體都難以辨認。從個別屍體似有火中掙扎狀來推測，飛機爆炸一瞬間被摔昏而未完全死去，是被草地大火燒死。由於燃燒時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屍體皮下均呈櫻桃紅色，加以停放已達八十個小時，個個僵硬腫脹似蠟人，看上去顯得比較年輕，特別是那具女屍當時看來只有三十歲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屍體腕上都無手表，腳上沒有鞋子，看來飛機迫降前，爲避免衝撞扭傷，他們好像作了准備。

逐個查看屍體後，即按蒙古的習慣進行入殮埋葬。最後舉行了簡單的致哀儀式。

飛機墜毀的原因

根據蒙方的看法，認爲該機是在沒有外來的影響下，由於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飛行高度，試圖用飛機腹部着陸時，右翼撞地造成嚴重損壞，因此發生爆炸而失事。另據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台報告，在九月十三日兩點鐘時，肯特省依德爾默格縣上空有二至四U級的雲，能見度五十公里，無危險的氣象情況，無風沙，無霧。因此，由於自然現象成災的因素可能性不大。

從現場周圍無高大目標，迫降場地選擇合理，着陸點到燃燒區有幾十米的距離，以及死者身軀燒傷不重、屍體完整、無高空摔折等情況來看，不像在空中着火爆炸，而是接地後爆炸着火。從現場的一些情況分析，飛機擦地痕跡二十九米後消失，說明機身曾經躍起，右翼外展部分（有「中國」兩字）摔在聯裝座架左手的火場邊緣，右翼內展部分（有「民航」二字）摔在機頭左邊二十米處，說明飛機躍起後失去平衡，爆炸前在空中翻了身。至於右翼根部那個大洞，令人懷疑是防空導彈打的，但是機翼的頂面並未穿透。經專家鑒定認爲，洞孔形狀不規則，邊緣外翻，說明是飛機破碎過程中，從內部爆炸衝擊形成的，不是彈孔痕跡。

四、機毀肇因的探討

孫一先匯報完時，已是二十二日凌晨二時多。服務員送來了夜餐，每人一碗熱湯麵，唯獨周恩來外加一小碟花生米。

用餐完畢，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來到福建廳。隨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也來到了。周恩來將孫一先帶回來的現場照片交給他們傳看，同時把另一套照片交給中辦副主任楊德中，要他主持研究一下，飛機究竟是怎樣墜毀的，並叫符浩也參加。

楊德中帶領大家來到東大廳，公安部部長李震，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等已在等候。大家一邊傳閱照片和示意圖，一邊研究討論起來。最後，大家一致認爲，李際泰的分析有道理。李際泰的看法是：

飛機因燃料將要用盡，被迫做緊急降落的準備，駕駛員不熟悉較大區域的地面情況，最好的選擇就是找一塊平坦的地方，冒險以飛機腹部擦地降落。看來，飛機着陸後，由於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傾斜，觸及地面，與砂石衝磨，驟然升溫引起油箱起火，從而導致全機爆炸。從當時特殊情況來看，駕駛員技術很好，選擇了唯一的處理辦法，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例如，機件失靈，或被地面炮火擊傷而墜落，或擊傷後被迫着陸，但這些可能性較小。

會議結束時，已是早晨四點多。楊德中將上述結果向周恩來匯報。

至此，毛澤東、周恩來對林彪座機墜毀的情況和原因，基本弄清楚了。

這時距林彪死亡只有十天。

第二章　毛澤東戰略退卻

一、舉國震驚

「舉國震驚」這個題目似乎不太貼切。林彪的叛逃、死亡，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不諦是一顆億萬噸級的原子彈，人們感到震撼、驚愕，但在震驚之餘，更多的是興奮、歡欣。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毛澤東。

九月十四日中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號廳，當外交部將駐蒙使館的緊急報告送到後，毛澤東只輕鬆地說了一句：「跑得好嘛。」

毛澤東感到心頭的一塊大石落地。但更困難的日子還在後面，毛澤東似乎看到眼前的無底深淵，他的內心裏可一點也不輕鬆。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說：「死的好，要不然還會有很大的麻煩。」

周恩來說：「這樣的下場很好，解決了大問題。」

在「文化大革命」中艱難地左支右絀，如履薄冰的周恩來，無疑是興奮、歡欣中的一個。

但在毛澤東面前，以及在其他的公開場合，周恩來都會很好地掩飾自已內心的這種感情。然而，外

交部的官員們發現，經過多日的不眠不休的辛苦工作，周恩來明顯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卻有一種喜悅和輕鬆的表情。

外交部的官員是最先聽到林彪的消息的。九月十四日晚上，副部長符浩難於按捺心中興奮的心情，便信步走到副部長喬冠華的家中聊天。喬冠華拿出一瓶未啓封的茅臺酒，兩人邊斟邊談，興致勃勃。符浩看着喬冠華新掛出的一幅章太炎的對聯，突然想起另一位唐朝詩人的佳句，脫口誦出：「月黑雁飛高，單于夜循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喬冠華聽後，沉思了一會，突然將滿杯茅臺酒一飲而盡，說道：「賈寶玉不是說述舊不如編新嗎？我把這首詩略加改動，你看新意如何。」說着，便又斟滿了一盃酒，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蘇北口音吟起來。吟畢又一飲而盡。正是「把酒共慶賀，豪情衝九天」。後來，郭沫若看到了喬冠華的這首新《塞下曲》後，曾揮毫將此詩書成條幅，並加了贊語贈給喬冠華：

> 「月黑雁飛高，林彪夜循逃。無需輕騎逐，大火自焚燒。」巧合無間，妙不可言。囑題小幅一軸，欣然命筆，以示奇文共欣賞，好事相與祝也。冠華同志座右，望常拍案驚奇。

中共元老董必武，在九月十四日政治局討論林彪叛逃事件時，即興作了一首詩贈給葉劍英，在中共高層中廣爲流傳：

鐵鳥南飛叛未成，
廬山終古顯靈威。
倉惶北上埋沙磧，
地上應慚漢李陵。

九月二十六日，符浩即將隨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代表團成員後，符浩正要離去，一名工作人員叫符浩留下，並將他領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沉思了一會，說道：「你明天一早就要動身去巴黎，有關林彪叛逃的事，見到黃鎭同志時，把情況告訴他。」周恩來頓了一下，語氣更加鄭重地接着說：「中央已決定逮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這些也告訴他。」並叮囑：「只告訴他一個人。」

黃鎭當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

九月二十九日，代表團到達巴黎。當晚，符浩即前往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官邸。符浩與黃鎭說笑一番後，暗示奉周恩來之命有要事轉達。黃鎭拿起一隻打開的小半導體收音機踱到花園的草地上，一邊踱步，一邊談起來。黃鎭對符浩帶來的消息感到異常興奮、激動，兩人的情緒互相感染，長時間地沉浸在喜悅之中。

不知不覺，夜已深沉，黃鎭突然拍一下符浩的肩膀，提高嗓子說道：「走，老符，讓我們喝一盃，慶祝一下！」回到屋裏，黃鎭打開所有的燈，屋內一片通明，又找出一瓶茅臺酒，斟滿兩個精緻的刻花高脚玻璃盃。黃鎭說：「這瓶酒已珍藏多年。」只覺得一股清芬的香氣彌漫在整個房間裏，盃裏的酒呈

現成一種淡淡的琥珀色。

與喬冠華等人的興奮、喜悅相反的，是毛澤東。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晚上，周恩來率領葉劍英、姬鵬飛、熊向暉、章文晉等人到毛澤東住處會報接待基辛格訪華事宜。一見到熊向暉，毛澤東就笑咪咪地說：

「那個副統帥呢，那個參謀總長哪裏去了？」

熊向暉說：「主席問我的時候（指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我確實不知道呀！」

毛澤東打趣地問：「現在知道了吧？你甚麼也沒嗅出來，是不是傷風了，感冒了？」毛澤東又連連地說道：

「我的『親密戰友』啊，多『親密』啊！」

這是發自肺腑的深沉而悲痛的感嘆。毛澤東痛心疾首之情溢於言表。

隨後，毛澤東還念了唐朝杜牧的一首詩：《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毛澤東又說：「三叉戟飛機摔在外蒙古，眞是折戟沉沙呀！」

於是，「折戟沉沙」一語，在後來的「批林整風」運動中到處援用。

在當時，吟詩作賦、舉杯慶祝的，肯定不只董必武、喬冠華、黃鎭等一干人。一個中共黨員，對自己的「副統帥」叛國出逃、機毀身亡竟如此開茅臺，舉杯慶賀，這是十分不正常的。這既是對林彪的不滿，更是對「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的不滿。「文化大革命」的五年以來，經歷了多少的風風雨雨，有多少的苦難和血淚灑向神州大地。人民的壓抑已久的不滿情緒，借着林彪事件，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在其後的日子裏，七億人民中，不滿、憤怒的有之；幸災樂禍、看熱鬧看笑話的有之；借着批判林彪，來批判「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舍沙射影，指桑罵槐的也有之。

《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如此評述「九、一三」後中國人民的反映：「載入黨章的『接班人』，『最最高舉』、『最最緊跟』的副統帥出逃，當然這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諷刺和否定。『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這件事，無疑對毛澤東的打擊很大」。「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對林彪一伙的叛賣行徑表示極大的義憤，對中央採取的各項措施表示擁護。更重要的是：爲『九、一三』事件而震驚，以『九、一三』事件爲契機，人民開始覺醒。如果說許多老革命家自始對『文化大革命』就『很不理解』，而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抵制的話，那麼更多的人在『九、一三』以後，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忠誠的信仰逐漸變成懷疑，狂熱的情感逐漸變成冷淡。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中，人們還來不及思索，但已積累了許多迷惘，『九、一三』事件則如晴天霹靂，把許多人震醒，開始認眞回顧幾年來的實踐。當時把林彪的叛變說成『第十次路線鬥爭』，人們普遍地感到路線鬥爭『不可知』。」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這樣寫道：

「從這一驚心動魄的事件中，人們清楚地看到，鼓吹個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陰謀殺害黨的主席，即他所高呼的『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由黨章法定的接班人竟然叛國出逃；新擢昇的六名政治局委員竟然一同從事反革命活動，等等。這些具有極大尖銳性的事件，促使人們進行嚴肅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是甚麼結果？甚麼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究竟有沒有合理性？天下大亂究竟能不能導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爲什麼要通過天下大亂來達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究竟要不要這樣『繼續革命』？『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究竟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究竟有沒有面臨資本主義復闢的危險？反之，『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給中國人民中的任何階層帶來任何利益和希望？『文化大革命』五年來究竟依靠的是甚麼社會力量，它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和巨大災難究竟有甚麼意義？繼續下去又還有甚麼意義？『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促使更多的幹部和群衆從個人崇拜的狂熱中覺醒，客觀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毛澤東本人也由此陷入極大的痛苦和失望。」

二、林彪——替罪羔羊

面對着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如波濤洶湧般的不滿和憤怒，將林彪當作替罪羔羊，對毛澤東來說便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幹部時說：「你們再不要講他（指葉劍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甚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多年才搞清楚。現在問題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個甚麼『五·一六』，打倒一切。」

毛澤東還說：「《我的一點意見》當時沒有題目，撇開一些問題，中心是個主席問題，我就撇開。那個司令部要我當國家主席是假，林當主席、林接班是眞。也有一些人是眞心要我當主席，和林彪不一樣。」

一九七二年一月初，陳毅病危，毛澤東專門讓周恩來、葉劍英去向陳毅轉達他對「二月逆流」平反的想法。毛澤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毛澤東是希望陳毅不要帶着「二月逆流」這個遺憾，不要帶着對他的怨恨離開這個世界。

一月十日，毛澤東臨時決定參加陳毅的追悼會。當毛澤東來到八寶山公墓禮堂時，連個出來迎接的工作人員也沒有，只有陳毅夫人張茜和幾個孩子圍坐在一起，整個禮堂裏冷冷清清，一片淒愴、悲涼的景象。毛澤東向張茜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陳毅同志是立了功勞的。他爲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貢獻，這已經作了結論嘛。他跟項英不同，新四軍九千人在皖南搞垮了。當然囉，後來又發展到九萬人。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陳毅同志是能團結人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兩年前，毛澤東在「九大」上奚落陳毅，說陳毅是作爲右的代表參加中央委員會的。那時，毛澤東當然是把自己與林彪、江青、陳迫達等「左派」劃在一起的。現在相反了，毛澤東將自己與陳毅說成「我們」，彷佛他也像陳毅一樣，是反對林彪的幹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時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辭，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評。」

是「聽一面之辭」這麼簡單嗎？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肅整羅瑞卿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說：「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嘛，他反對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可是他卻同意給羅瑞卿扣上「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的罪名。這哪裏還是「聽一面之辭」呢？這時的毛澤東，不但要推出林彪當替罪羊，而且要極力掩飾自己與林彪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事實。這一點才是關鍵與要害。毛澤東自然要避重就輕。

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毛澤東在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說：

「我們的『左派』是甚麼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裏頭」。「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總後臺的人現在也過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飛機往蘇聯去，其目的是想見上帝。」

毛澤東還在其他一些場合說：「四好運動搞形式主義，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又說：「一好帶三好，你那一好也許帶得對，也許帶得不對。」

毛澤東又說：「甚麼『緊跟』，我就不願聽，不能跟人，要跟黨，跟路線。」

毛澤東還說：「現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們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

又說：「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還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搞顛倒了嗎？」

在這裏，毛澤東將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林彪的身上。毛澤東似乎昨天才知道林彪在部隊裏搞「四好運動」，在中國政壇上鼓吹「緊跟」。「四好運動」和「緊跟」從六十年代初林彪就開始宣傳，貫徹，十年以後毛澤東才說「把部隊作風帶壞了」，「我就不願聽」，此一時，彼一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套政治伎倆，毛澤東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已經用得滾瓜爛熟了。

毛澤東還說：「我提了五條（指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在《九評》中提出的五條接班人的條件），他（指林彪）提了三條。三條不講馬列主義，不講反對修正主義和防止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不講團結大多數，不講批評和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這裏批評的林彪的三條，是指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林彪當時被毛澤東任命為接班人，講這番話時，毛澤東正坐在他的身邊。林彪的原話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要求對幹部來個全面考查，全面排隊，全面調查，我們按毛主席講的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五條原則，提出三條辦法，主席同意了。

一、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

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的罷官，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

三、有沒有革命幹勁，完全沒有的罷官。

這三條，同主席的五條原則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要按主席的五條和這三條，特別是第一條，作爲識別、選拔和使用幹部的標准。」

八月十六日，毛澤東對這個講話作了批示：「贊成」，下令將這個講話印發全黨。（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

爲了急於洗脫自已與林彪的關係，毛澤東似乎不顧一切了。

林彪上了「文化大革命」這艘賊船，助紂爲虐，爲虎作倀，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人民不會原諒他，歷史也不會原諒他。他自有自己的一本賬。在此同時，歷史也記下了毛澤東的一本賬。任何的洗刷都是徒勞的。

三、重提「朱毛」

「朱毛」這面曾經令敵人聞風喪膽的旗幟，自三十年代中期開始，便逐漸地褪色了。

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朱德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中肯的批評，附同彭德懷的意見。當毛澤東決定肅整彭德懷後，朱德嘆息道：「怎麼能想象，當年是在一個鍋裏吃飯的啊！」在毛澤東主持的批判彭德懷的中央常委會議上，朱德不願落井下石，於是只輕描淡寫地就信中的內容，批評彭

德懷，毛澤東便用「隔靴搔癢」的動作，當場奚落朱德。毛澤東對朱德與彭德懷「一個鼻孔出氣」甚爲不滿，曾多次說朱德是「老右傾機會主義」，「一貫右傾」。這時的毛澤東，權勢如日中天，那裏還把朱德放在眼裏。「朱毛」，「豬上的毛」，毛已坐大，壓倒了「豬」，吃掉了「豬」，對「豬」不屑一顧。

奉承毛澤東的意旨，林彪上台後便對朱德進行攻擊。在一九五九年八月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指名批判朱德，林彪說：「我今天還給一位在座的老同志提點意見，他是誰呢？這個人，一般人是看不出來的，他給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實，平易近人，而且德高望重，但這是假裝的，他的骨子裏是反黨反毛主席的，和彭黃是一路貨。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會場上頓時一片嘩然。

林彪又說：「人家稱他爲總司令，他還心安理得地答應呢！他夠當總司令的資格嗎？他根本不配！我們的總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朱德是冒充總司令，無功受祿，不感到心裏有愧？」

於是打手們一擁而上，朱德被當作批判彭德懷的陪綁。九月十日，朱德被迫在大會上作長篇的自我檢查，朱德說：「自己在歷史上曾經犯過路線錯誤，並且支持過錯誤路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又犯了兩大錯誤，一個是在高饒事件上，認爲他們是好人，替他們辯護，支持他們，直到一九五四年二月舉行的四中全會才認識了他們的反黨面目。另一個大錯誤，就是對彭黃張周的反黨野心家的本質認識不夠，同時和他們在思想上又有共同點，光從好的方面去想，所以這次我同樣表現出嗅覺不靈，沒有及時識破他們反黨陰謀的本質。」會後，毛澤東下令中共中央將朱德的這次發言，連同他一九五五年三月就高饒事件的檢討發言，一並印發全黨。毛澤東此舉的用意十分清楚：要在全黨全軍將朱德搞臭。毛澤東已在心底裏厭惡和看不起這位「豬」。

朱德作檢討的第三天，即九月十二日，毛澤東出席了大會，毛澤東說：「有幾位同志，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直到現在，他們從來就沒有成爲馬克思主義者，是甚麼呢？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資產階級革命家進了共產黨，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的立場，沒有改變」，「這樣的同路人，在各種緊要關頭，不可能不犯錯誤。」

毛澤東所說的「有幾位同志」，既是指彭德懷，又是指朱德。於是，在毛澤東指示的中央軍委成員調整中，朱德由副主席降爲常委，這位「紅軍之父」第一次退出人民解放軍的領導崗位。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的指使下，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的戚本禹召集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朱德。造反派們包圍了朱德的家，高呼「打倒朱德」、「炮轟朱德」的口號，把大字報、大標語貼到朱德的家裏，牆上、地下，到處都是。康克清（朱德夫人）回憶說：「他們還提出要把我們從中南海轟出去，當時朱總還在玉泉山，他們一直鬧到很晚才散去。」

當朱德從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須去看批判他的大字報，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說：「周總理聞訊趕到朱老總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體，勸說朱老總到比較平靜的玉泉山休息。在朱老總身邊工作的同志告訴我，朱老總已去看了那張大字報，邊看邊用手杖敲打着地面，說那張大字報只有兩個字是對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內容不知是從甚麼地方造出來的。」

一月底，戚本禹又煽動中國人民大學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鬥爭擴大到社會上。一時間，攻擊朱德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造反派還貼出海報，準備召開萬人大會，公開批判朱德。

北京大學的造反派頭頭聶元梓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開會，她說：「清華大學揪出劉少奇，我們這次也要搞一個大的。」聶元梓組織班子撰寫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戰報》上，印了五十萬份，散發到全國各地。一個更大規模的揪鬥朱德的陰謀正在醞釀。

造反派要揪鬥朱德的消息傳到周恩來那裏後，他徵求毛澤東的意見後，在開會的前一天要秘書通知戚本禹，必須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會」。由於周恩來出面干預，揪鬥朱德的大會沒有開成，朱德避過了一劫。但毛澤東的「讓他們在火上烤一烤」的目的已經達到。

一九六七年夏天，天下大亂，武鬥全面開花。康克清回憶說：「朱老總聽到有些地方武鬥很兇，甚至有的部隊也參加了武鬥的消息後，很痛心。他說：用這種狂轟濫炸的方式解決矛盾，怎麼行呢？」朱德的秘書回憶說：「這一段時間，朱老總一直很沉悶，他想去找主席談談，可是，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沒有時間。」朱德那裏知道，「朱毛」早已分道揚鑣了。

一九六八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使林彪、江青一伙對「二月逆流」進行徹底清算和批判。朱德在小組會上說：「一切問題都要弄清楚，怎麼處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評從嚴，處理按主席路線。譚震林，還有這些老帥，是否眞正反對毛主席？」朱德的發言，引起圍攻。張春橋、吳法憲攻擊朱德「一貫反對毛主席」，「有野心，想黃袍加身」；謝富治也說：「朱德同志從井岡山第一天起就反對毛主席」，「陳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參謀長。這些人都該受批判」，「劉鄧、朱德、陳雲都是修正主義，『二月逆流』這些人不死心，還要爲他們服務！」

在這次中全會上，由於劉少奇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取得初步勝利，毛澤東意氣風發，得意忘形，他奚落陳毅，說可以作爲右派的代表參加「九大」。至於朱德，毛澤東已不屑一顧。

一九六九年十月，根據毛澤東的「加強戰備」的指示，朱德被疏散到廣東從化，處於變相軟禁的狀態。九個月後，由於要參加「九屆二中全會」，朱德回到北京，但他入住萬壽路的新六所，不願再回到他居住了二十年的中南海。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他也沒有再回去這塊居住着「毛」的傷心地。

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決不是偶然的。如郭沫若、章士釗，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澤東下了「要保護」的「聖旨」，他們便得以安然無恙。對於朱德，毛澤東如果想要「保護」的話，其理由應比郭、章更爲充足，也更爲順理成章。可是，毛澤東心中記着朱德的一本舊帳：從井岡山時期的鬥爭，到一九五九年的盧山會議，毛澤東認爲這是一個「右派」的總司令，他與劉、鄧、陶這些「走資派」只有一線之差，因此需要放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上「燒一燒」。「朱毛」之情不但早已煙消雲散，毛澤東早已不屑再提，而且朱德已成爲毛澤東心中的「準走資派」、「準敵人」。

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陷入最重大的政治危機。他需要平息老幹部門的憤怒，減輕這方面的敵意與壓力，以便渡過這場政治危機。因此，「右派的總司令」朱德，便成了毛澤東「綏靖」政策的重要目標。於是，便發生了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記述的這一幕：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他的住所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當我送朱老總到會議室的時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見了這位許久未見面的老戰友，要站起來迎接，還沒等他起身，朱老總已來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體，拍着身邊的沙發請朱老總挨着自己坐下。此時，毛主席很動情，他對朱老總說：『紅司令，紅司令，你可好嗎？』朱老總操着四川口音高興地告訴主席說：『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領導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總這裏。毛主席習慣地從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煙，若有所思地劃着火柴點燃香煙吸了一口，又環顧四周，繼續對朱老總說：『有人說你是黑司

令，我不高興。我說是紅司令，紅司令』，他重複着，又說：『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承認這種事實，在毛澤東的一生中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政治上表現出如此重大的謙虛，如此的虛懷若谷，似乎也是第一次。與廬山會議上當衆奚落朱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將朱德批評爲「資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相比，眞可謂是天壤之別。如此巨大的反差，如此急劇的轉彎，實在令人難以接受。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呢，還是故作姿態，權宜之計呢？這就要讀者自己去判斷了。

四、批不起來的「批林整風」

毛澤東第一次決定向黨內通報「林彪事件」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的這份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說：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對林彪叛黨叛國事件，中央正在審查。現有的種種物證、人證業已充分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爲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

這個通知只傳達到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高級幹部。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及中共中央下令將九月十八日的通知傳達範圍，擴大到地、師以上黨委。

十月六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通知》說：「早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前，林彪就背着毛主席和黨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陳伯達勾結在一起，指揮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多次開會、多方串聯，陰謀策劃，妄圖推翻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林彪、陳伯達及其一伙在廬山會議上的全部活動，完全是有準備、有綱領、有計劃、有組織的。他們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妄圖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它的性質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變」。《通知》又通報了林彪一伙在九屆二中全會後準備反革命叛亂、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以致陰謀敗露，出逃身亡的事實。

十月中旬，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決定將林彪事件傳達到黨支部書記、副書記一級。

十月二十四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決定將林彪事件向全國廣大工農兵群衆傳達。

十一月十四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印發林彪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通知。

十二月十一日及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七月二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向全黨印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二、三。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還召開了揭發、批判林彪的老幹部座談會。陳毅、聶榮臻、蕭克等在會上發言揭發了林彪在歷史上的錯誤。朱德、陳毅、李富春、聶榮臻、鄧子恢、蕭克、曾山等九人還寫了書面揭發材料，批判林彪關於「天才」，「有權就有了一切」，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輝的助手」、

「三十字方針」等謬論。

由於「我們同劉少奇一類騙子（指林彪）的鬥爭，是黨內歷次路線鬥爭中最嚴重的一次，劉少奇一類騙子是帝、修、反的代理人，是地富反壞右的總後台，是隱藏在我們黨內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因此，按照毛澤東的部署，是要在全國掀起一場規模和聲勢都要比批判劉少奇還要大的革命大批判運動，來肅清林彪的影響。毛澤東更希望，藉着這些革命大批判，將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對林彪事件的認識，限制在官方規限的範圍內。

然而，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實在是太親密、太不尋常了。毛澤東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他與林彪那種暖昧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既然說林彪事件是「第十次路線鬥爭」，而且是歷來最嚴重的一次，那麼林彪實行的是甚麼路線呢？除了軍事方面以外，這條路線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有甚麼表現呢？林彪是在甚麼時候，怎樣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呢？

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幹了那麼多事，是不是這些都是「反革命」的勾當呢？如果批錯了，批到毛主席頭上豈不是招惹大禍？

作爲「副統帥」，林彪發出了那麼多的號召、指示，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到「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損失是最小最小」等等，是否這些都錯了呢？如果批過頭，批到「文化大革命」頭上怎麼得了？

於是，在全國各地，「批林整風運動」出現了「擱淺」，發生了形形色色的「畏難」、「不可理解」、「批不下去」的怪現象。下面是見諸報端的一些情況：

一九七二年二月，對雲南省昆明市舉行的一次由軍區司令員王必成主持的革命批判大會有一則這樣的報導：王必成同志發現，少數同志對批判林彪反革命活動有某種畏難情緒，他們擔心幹部文化水平低，因此「問題說不清，搞不了大批判」；他們擔心「群衆覺悟低」，「不能清楚地把不同事物加以區別，甚至可能產生副作用」。王必成同志還指出，另一些同志表現出某種「鬆勁情緒」，認爲沒有甚麼可批判的，從而滿足於表面的討論和一般化的批判。

黑龍江省的幹部不願意參加鬥爭的情況也見諸報端：「他們很多人只是在口頭上同意革命大批判，實際上，他們並未投身於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之中，他們超然事外，瞻前顧後，畏首畏尾。」

在廣東省，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之後，又一次爆發這種尖銳劇烈的鬥爭，這使我們感到太突然，難以理解，這怎麼可能呢？

在四川省，更有人提出：「爲甚麼不早一點把這個害人蟲挖出來呢？」

有許多問題，不但群衆、幹部們講不清楚，連毛澤東自己都講不清楚。加上人們對無休無止的「鬥爭」、「批判」已普遍地感到厭倦，對文化大革命的遙遙無期感到失望，於是「批林整風運動」處於冷場狀態。

與官方的「革命大批判」的冷冷清清相反，在民間，私底下的議論，卻是沸沸揚揚，甚是活躍、熱鬧。茶餘飯後，工閒之時，親朋好友之間，無不談論林彪，談論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人們越是深入地探討，就越是發現得多，了解得多。種種的問題，就像百川歸大海一樣，都集中到毛澤東的身上了。於是，毛澤東那崇高的威望，像春日下的積雪，不斷地熔化。毛澤東焦急了。

爲了掀起「批林整風運動」的高潮，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組織了「全國批林整風匯報會」。

五、僞造《毛澤東給江青的信》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全國批林整風匯報會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共三百一十二人。十分奇特之處在於，在一個多月的會期內，毛澤東沒有出席一次會議，也沒有接見會議代表，只是讓周恩來主持。

經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確定的會議文件有：

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和九屆二中全會以來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講話，共十二件；

九屆二中全會以來的中央有關文件，共兩本；

《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

《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和陳伯達的歷史罪證；

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同志的信。

會議還有一些參閱文件：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材料，朱德等九同志的書面揭發材料；高崗妻子李力群的揭發材料；林彪的《論短促出擊》；關於中蘇關係的十一個問題。

這次會議並沒有提供更多的新的關於林彪罪行方面的材料，對深入批判林彪並沒有起到多大的推動作用。可是，會議卻十分明確地指出：最主要的文件是毛主席給江青的信。

由於這封信如此重要，現全文轉錄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你還是照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裏（即上海）住一會爲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六月十五離開武林（即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住了十幾天（即在滴水洞）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即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講政變的問題。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吧。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爲主。也有些猴氣，是爲次。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符。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對於朋友（指林彪）的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甚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講的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爲了打鬼（指毛在黨內的敵人），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甚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打得粉碎，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冲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接近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衆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

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甚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爲左派和廣大群衆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甚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楣了。中國自己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軍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爲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這封信除了對政局作了一些空泛的議論外，並沒有甚麼新的思想和新的內容。毛澤東爲甚麼如此看重這封信，將它列爲會議最主要的文件呢？原來，信中有一段是寫毛澤東不同意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不同意林彪的「政變經」和「吹捧」，但爲了顧全大局，不得不違心地同意將這個講話批發全國。這是全信中最重要，也是畫龍點睛之處，用以說明毛澤東早在一九六六年就覺察到林彪不妥，毛澤東與林彪之間自來就有分歧，並不是一致。用江青的話來說，就是：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這封信對「批林整風運動」具有「重大意義」的原因所在。

這封信自從公開以後，令人感到十分蹺蹊。

首先是這封信的題目：「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的信」，十分注意突出寫信的時間：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令人覺得很不自然。

這封信內容並不復雜，文字也不深奧，然而中共中央竟出動了包括周恩來、江青在內的九名政治局委員分別到各組去解釋這封信。用得着如此鄭重其事嗎？

毛澤東的書信多用毛筆書寫，所以一般都很簡短，百八十字，最多一、二百字。可是這封信竟然有一千五、六百字，如果用毛筆書寫，需要幾十張信紙。這大違毛澤東的一貫作風。

最大的破綻是沒有毛澤東的原件手跡，只有抄件。周恩來的解釋是：他在武漢看到毛澤東的原件後，找林彪談話，林彪表示悔改，於是毛澤東便將原件燒掉，只保留抄件。這種解釋是十分牽強的，如果像周恩來所說，毛澤東眞是爲了愛護林彪，應該將原件、抄件統統燒掉才是。保留抄件與保留原件，

並沒有甚麼兩樣。燒掉原件的理由並不成立。

同時，信中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也是個破綻。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毛澤東並沒有「七、八年一次」這種思想，當時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設想是比較簡單的，時限定在一九六七年春節結束，大約半年時間（學校停課鬧革命的時間爲半年）。只是後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大大地超出了毛澤東的軌道，呈現出十分複雜的局面，戲中有戲，山外有山，面目已全非時，才提出「七、八年再來一次」，那已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事了。

而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在信中批評林彪的講話及不贊成「吹捧」，這種情況與事實不符。事實上，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給予極高的評價。八月十一日，毛澤東下令將林彪的講話印發給八屆十一中全會；九月二十二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國批發了林彪的講話。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按語指出：「林彪同志五月十八的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極爲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嚴重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顚覆的問題作了系統的精辟的闡述」。「林彪同志這個講話，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

而對於林彪的吹捧，毛澤東甘之如飴。

情況令人感到十分可疑，一切都太過巧合了，就像刻意安排似的：這封信顯然是僞造的。

事實上，現已查明，這封毛澤東致江青函，完全是「九·一三」後毛澤東授意、江青和康生策劃下編造的。江青被捕後，對這件事曾作過交待，說：「主席有這個思想。我和康生根據主席的思想辦（指

編造僞信）了，是革命鬥爭的需要。這事汪東興也清楚」。（見《爭鳴》雜誌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毛澤東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用來掩飾自己與林彪的親密關係，企圖洗脫自己的種種錯誤，以維護自己的「光榮」、「偉大」、「正確」的形象。爲了一己私利，毛澤東不惜竄改歷史、僞造歷史，蒙騙廣大黨員幹部，蒙騙億萬人民群衆。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爲甚麼沒有原件，只有抄件呢?中共向來視毛澤東的字跡如珍寶，今次爲何一反常態呢?原來，「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大病了一場，之後，雙手顫抖，拿筷子都已很困難，飲食需要護士餵，已經沒有提筆書寫的那份定力了。即使勉強提筆，也是歪歪扭扭，完全失去當年毛體書法那種飄逸如流水行雲的風采，行家裏手一眼便會看出破綻。於是，便乾脆說「原件」燒掉，只以抄件示人。毛澤東在這裏虛晃一招，瞞天過海，「欺世盜名」。

在這裏，關鍵人物是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周恩來在全國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對這封信作了詳細的解釋。周恩來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上作了如下的說明：「現在確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這封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過」。「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在河北廳講話以後，林彪講話經過多次改動，送到主席那裏，主席總是有點不安，裏頭有些話過頭，敘述政變那種寫法也不當。……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衆潑了冷水嗎?因爲大家希望看到這篇東西嘛。實際上這裏頭有毛病，有些極『左』的話，有些不恰當的」。「毛主席這封信一針見血。主席寫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漢寫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漢。……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非常深刻的一封信。」（見《大動亂的年代》四四三頁）

周恩來以他的身份和威望，現身說法，幫助毛澤東掩飾，自然是事半功倍。人們敬仰周恩來，自然對他的說法篤信無疑。然而，周恩來恰恰是在幫助毛澤東僞造歷史，欺騙人民。

六、毛周交易：「伍豪事件」

對於周恩來傾力相助掩飾《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毛澤東投桃以報李。於是，在那次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十分奇怪地安排了一段與「批林整風」毫不相干的插曲，那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周恩來於六月二十三日在會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啓事」的眞相》的報告。中共中央又發了文件加以說明，並附若干原始材料，傳達至黨內高級幹部。毛主席當時說過，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黨內高級幹部了解事件眞相，不允許任何人今後在這個問題上誣陷周恩來。」（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申報》、《新聞報》等報紙刊登《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啓事》。啓事署名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那是國民黨使的一招離間之計。當時，周恩來早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已進入中央蘇區，根本不會還在上海報紙上發表所謂《脫離共產黨啓事》。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一九六七年五月，在一片「揪叛徒」的戰鬥聲中，江青將這份材料轉給周恩來，其用意之險惡，路人皆知。這件事本來不値一駁，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種人妖不分、指鹿爲馬的紅色恐怖的日子裏，只要與「叛徒」、「脫黨」這一類的事件沾上一點邊，那怕是只字片語，都

足以令人下獄坐牢，身敗名裂。更何況有着白紙黑字的《脫離共產黨啓事》！而且，江青一伙對周恩來又忌又恨，必欲打倒而後快。因此，身爲總理的周恩來，也被江青這一招嚇得膽戰心驚，於五月二十九日深夜親自寫信給毛澤東，說明事件原委，並附上周恩來親自編寫的與此事有關的大事記，及一干資料，其中還特意選了由毛澤東當年簽署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關於判處登載僞造啓事，而又拒絕刊登更正啓事的上海某報紙的總經理以死刑的布告。可是，對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的毛澤東閱後批示：「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在這裏，毛澤東並沒有明確表態支持周恩來，爲周恩來證明清白，而是「閱、存」。毛澤東這一招就等於將一把利刀懸掛在周恩來頭上，只要周恩來稍不馴服，稍有異志，這把刀就會隨時落下，令英名一世的周恩來身敗名裂。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學有人給毛澤東寫信，又反映「伍豪事件」。毛澤東不得不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雖然有毛澤東發出的聖旨，但周恩來仍然放心不下。因爲此事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的批示，並不是中共中央正式的結論。而且毛澤東的批示只有少數人知道，廣大幹部、群衆並不知道。萬一將來毛澤東過世或改變初衷，再提起此事來，周恩來是有口難辯，跳進黃河洗不清。因此，「伍豪事件」始終是周恩來的一塊大大的心病。然而，老謀深算的毛澤東捏緊這個把柄，不肯體恤周恩來的心情，發一個中共中央的紅頭文件正式作結論，周恩來既無可奈何，又耿耿於懷。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處於衆叛親離，四面楚歌之中，聲望、形象都受到極大的打擊，十分需要周恩來的支持，來渡過這個難關。而毛澤東編造的這封給江青的信，最適當的解說人莫過於周恩來。毛澤東利用了周恩來，而作爲報酬，便是對「伍豪事件」做出正式的結論。這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一筆政

治交易。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來病危，需要再次進行手術治療。在臨入手術室前，周恩來躺在推牀上焦急地等着秘書前來。當秘書趕到，將上述的報告的錄音記錄稿交給周恩來。周恩來用顫顫抖抖的手在上面簽上自己的名字和報告的日期，同時注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即：「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當時，中國政壇上形勢嚴峻，毛澤東不久於人世，又對鄧小平失去信任，黨政軍大權很可能落到江青、張春橋那伙人手中。而江青又借着「批林批孔」批周公，再次企圖打倒周恩來。如果將來中國政權落在江青手中，首當其沖的便是周恩來，而「伍豪事件」正是一個絕佳的把柄。因此，周恩來在病中曾經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說：「將來你們不要在我的名字上打×」。現在，周恩來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已走到了盡頭，這次進入手術室，是否能再活着出來，尚不知道。在這最後的一刻，周恩來心中最惦記的最緊要的事，便是「伍豪事件」。在他進入手術室之前，所要做的一件事，便是交待清楚「伍豪事件」。這是周恩來唯一的「遺囑」。

由此可見，「伍豪事件」在周恩來心中佔有多麼重要的地位。毛澤東利用這個把柄，迫使周恩來爲他「欺世盜名」，其奸雄本色，可見一斑。

第三章　毛澤東的黃昏歲月

一、毛澤東沒有看透林彪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在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後，人們將毛澤東送到汽車前。送行的人中有一位醫生，他發現毛澤東上汽車時，大腿明顯地無力，因爲毛澤東幾次用力邁步，都蹬不上汽車。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用雙手托起毛澤東的腿，才上了汽車。事後，這位送行的醫生說：他注意到毛澤東近期身體的變化太大了。

「九·一三」事件無疑是對毛澤東精神上的沉重打擊。毛澤東根本意料不到林彪叛逃。林彪最後的這一搏，特別顯示了他「又刁又狠」的風格。在別無他路的情況下，林彪選擇了兩敗俱傷的策略。溫都爾汗那一聲爆炸透露出來的意味，似乎是：「我不得好死，也不讓你有好活」。林彪希望的那種效果無疑是達到了。毛澤東低估了林彪，毛澤東沒有看透林彪。

在整個林彪事件中，林彪固然是輸家，但毛澤東也不是贏家。林彪固然身敗名裂，而毛澤東也好不了多少，事件對毛澤東所造成的打擊和損害，並不次於林彪。很顯然，這種兩敗俱傷的結局並不是毛澤東所希望的。毛澤東完全估計錯了。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當發覺毛澤東利用「國家主席」問題來肅整自己時，林彪的應對計劃是：
一、與毛澤東面談，消除誤會，和平解決問題，保住自己的地位。這是上策；
二、謀害毛澤東，發動政變；如果失手，便南下廣州，另立中央，造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然後與毛澤東和談解決。這是中策；
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外逃蘇聯。這是下策。
林彪的主旨是：抗爭到底，絕不束手待斃。無論如何要保住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而毛澤東的如意算盤是：
一、迫使林彪承認錯誤，在九屆三中全會上做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常委的虛銜，但黨的副主席、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權力以及「接班人」的地位必須解除（這是毛澤東的根本目的）。如果林彪能承認錯誤，毛澤東將不戰而勝，林彪集團這顆大毒瘤將順利被摘除，毛澤東又贏得了一場黨內的路線鬥爭，其威望將錦上添花，更上一層樓。這是毛澤東所最希望的。這是上策；
二、用彭德懷的方式解決林彪問題。通過毛澤東操縱的九屆三中全會，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討伐批判，將林彪批倒鬥臭，最後通過全會決議，將林彪及其黨羽逐出權力中心。這固然要勞師動衆，要經歷一番艱苦的鬥爭，但毛澤東自信，憑自己的威望、能力、智慧和多年的政治鬥爭的經驗，完全可以像當年彭德懷一樣，將林彪打倒。毛澤東南巡講話，向各地黨、政、軍首長吹風、打招呼，就是爲着實現這一招。這是中策；
三，是與林彪兵戎相見，在槍林彈雨、隆隆炮聲中較一高低，這是下策。毛澤東雖然也估計到這種可能性，但他自信情況不至於壞到那種地步。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就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

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

毛澤東南巡過程中，隱隱約約感到林彪正在策劃一些對自己不利的陰謀詭計。儘管只是一些蛛絲馬跡，但疑心頗重的毛澤東還是引起了警惕，這就是他提前離開上海北返的原因。然而，對林彪策劃的武裝政變、謀害自己的陰謀，毛澤東根本就一無所知，也完全估計不到；至於對林彪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會外逃，就更加始料所不及。毛澤東的如意算盤完全是建立在「林彪束手待斃」的基礎上的。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林彪雖然不大可能束手就範、聽任擺佈，但其反抗頂多像彭德懷那樣頑固到底，死不認錯。對毛澤東來說，這算不了甚麼，也成不了氣候。林彪在中央、地方的人際關係及影響力，遠不如彭德懷，只要毛澤東振臂一呼，江青、張春橋、康生、姚文元一干人積極響應，口誅筆伐，墻倒衆人推，林彪的反抗不會堅持多久。因此，在毛澤東看來，這第十次路線鬥爭，也將像歷史上歷次的鬥爭一樣，以林彪的失敗而告終。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說：「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彪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大好吧。」完全是勝券在握、游刃有餘的姿態。

毛澤東的估計與實際情況完全是南轅北轍。

林彪是個個人主義思想極端嚴重的人，從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失敗後當逃兵，到一九五零年拒絕出兵抗美援朝，貫穿着一條將個人利益置於革命利益與國家利益之上的黑線。對此，毛澤東似乎估計不足。在面臨與毛澤東攤牌的關鍵時刻，林彪首先顧及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完全不會像彭德懷那樣顧全大局，委曲求全，「你要甚麼我就承認甚麼，檢討甚麼」。林彪根本沒有這種「高風亮節」。九屆二中全

會以後。林彪考慮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而根據中共以往的政治鬥爭經驗，即使顧全大局，承認錯誤，毛澤東也不會給你好下場。而一旦認了錯，就如落入萬劫不復之地，只有死路一條了。因此，林彪是絕不會「違心地」在九屆三中全會認錯的。

林彪又是一個機會主義色彩十分濃厚的人。無論是參加革命，還是與毛澤東結盟，林彪都摻雜着嚴重的投機的成份。對此，毛澤東也是估計不足。彭德懷是個大忠大勇的「大將軍」，他忠於人民，忠於祖國，具有一股凜然正氣。他在廬山上向毛澤東挑戰，正是出於為民請命。林彪身上就缺乏這股大忠大勇的凜然正氣，他只是一個投機取巧的奸雄。儘管林彪出類拔萃，戰功赫赫，卻不得人心，難孚眾望，這是關鍵的原因所在。因此，在關鍵時刻，在自己的生命、利益受到威脅時，甚麼「民族大義」、「革命氣節」就統統抛到腦後。於是「武裝政變」、「謀害領袖」、甚至叛國投敵等一干事，都做出來了。這是毛澤東做夢都想不到的。

林彪還是個自尊心極強烈的人。他心高氣傲，爭強好勝，特別不能蒙受羞辱，被玩弄欺騙。一旦遇到這方面的刺激，他的反應會比其他人更加嚴重，更加強烈。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尤其認識不足。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林彪仍然是個「甚麼都不懂的娃娃」，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玩弄於掌股之間。由於毛澤東與林彪特殊的歷史淵源的關係，林彪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從來就沒有像彭德懷那樣高大和沉重，更加比不上劉少奇、周恩來。毛澤東雖然指定林彪為副統帥、接班人（這種舉動的本身，就是對林彪的一種不尊重，對林彪來說是一種羞辱），但毛澤東極不尊重林彪，根本沒把這位副統帥放在眼裏。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毛澤東都從不與林彪磋商，而是自己做出決定。在國家主席問題上，毛澤東更是隨心所欲，肆無忌憚。毛澤東認為，他既然可以將林彪捧起來，當然也可以將林彪摔下

去。殊不知，毛澤東這種輕蔑、玩弄的態度，恰恰刺到了林彪神經中最敏感的部分。林彪奮起反抗，絕不退讓。批陳整風，南巡講話，毛澤東的這些攻勢如果用在別人身上，也許有效，但用在林彪身上，只能是適得其反。在情急之下，林彪狗急跳墻，叛國外逃了。

事件結局的方式，完全是林彪式的，完全是按照林彪的意圖進行的。只是由於外逃當中出現意外事故，才機毀人亡。否則，林彪的計劃很可能成功。而毛澤東以爲，一切都能按他的意圖進行，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這場鬥爭。然而，毛澤東的計劃和設想完全落空了。林彪是主動的，毛澤東是被動的，林彪牽着毛澤東的鼻子走。在這一點上，毛澤東無疑是敗在林彪的手下。毛澤東大大地失策了。這種結局的方式，完全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毛澤東根本沒有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準備。如果事件能夠按照毛澤東的計劃安排解決，毛澤東就可以將種種的事實掩蓋起來，他可以一手遮天，隨心所欲地編排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論和說詞，來蒙騙世人，爲自己開脫。這樣一來，林彪從中國政壇上消失了，問題解決了，而毛澤東則毫無損傷，安然無恙。然而，毛澤東的這個如意算盤被林彪的鋌而走險打個粉碎。林彪用自己的方式——叛變外逃，向全世界公開了他與毛澤東的矛盾衝突，用這種十惡不赦、大逆不道的行爲，來證明毛澤東的錯誤，來證明毛澤東的不英明，不正確，不光榮，不偉大。林彪的這種結局方式，令毛澤東處於尷尬和難堪的地位。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毛澤東無所遁形了。他與林彪之間那種暧昧的、互相利用的關係，他們倆那些不可告人的勾當，一一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林彪事件是毛澤東的滑鐵盧。毛澤東，這位在中國政壇上縱橫馳騁了近半個世紀，身經百戰，曾經打敗戰勝了無數對手的政治鬥爭的大師，在最後的決鬥中，竟然敗在自己的學生的手下，遭遇了一生中最嚴重的挫折。

二、失望與絕望

一九七六年，重病中的毛澤東召見了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毛澤東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這是毛澤東對自己的一生所做的總結。

毛澤東一生有個夢想，那就是在中國建立起來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人人有吃飯，有衣穿，有工作的世界大同式的社會。這是毛澤東埋藏在心靈深處的一個大夢想。爲了這個夢想，毛澤東奮鬥了整整一生。上述的兩件事，其最終目的，便是爲了實現這個夢想。

早在一九一八年，剛從湖南一師畢業的毛澤東，與蔡和森、張昆弟、陳書農、熊子容、周庭藩等人，在岳麓山下設立工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進行「新村」試驗。「新村」中有：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

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等，實行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愛。這就是理想中的大同社會了。這次試驗爲期不長，很快就夭折了。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在六億人民中再進行規模更加廣大的試驗。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吃飯不要錢，公共食堂，幼兒園，養老院，社辦工廠，社辦學校、社辦醫院……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供給制，工資制，共產風，平均主義，貧富拉平，一平二調三收款。人民公社被譽爲「通往共產主義的橋樑」，是「共產主義的萌芽」，「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可是，這次試驗以史無前例的災難而告終。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五月七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衆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爲主，也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農民以農爲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爲主，兼學別樣……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以上所說，已經不是甚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人民日報》於八月一日發表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全國都應

該成爲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年》，對「五·七指示」進行了闡述，「社論」稱「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這樣，全國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大動亂的年代》一書說，毛澤東在這裏勾勒出他所向往的，憧憬的社會，這是一個軍事共產主義的模式，是有中國特色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毛澤東認爲自己的構想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偉大的，這是建設「新世界」的綱領。這也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理論的動因。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滿懷信心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在浩浩蕩蕩的長江中乘風破浪，暢游了十五公里，發出了「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的豪言壯語；他在天安門廣場上精神煥發地八次接見一千六百萬紅衛兵。他對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合理性深信不疑，對自己駕馭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的能力充滿信心。但是，不久之後，他發現這場運動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簡單。運動一次又一次超出了他所制訂的時間表，一次又一次地越出了他所設計的軌道。他逐漸看到，這個由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運動，越來越不受控制了，越來越變得面目全非。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澤東在武漢說：「文化大革命要在一九六八年春結束，或者稍遲一點，接着開『九大』，不能再搞了」。毛澤東一心只想如何儘快結束文化大革命。

「九大」以後，毛澤東部署通過「鬥、批、改」來結束文化大革命。但是，「林彪事件」將毛澤東的這個願望打個粉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和破產。文化大革命已成爲一個面目全非、不受控制的怪物，成爲收不回來的「潘朵拉」。毛澤東徬徨了。

毛澤東躺在牀上憂鬱地沉思：爲甚麼自己的良好願望與客觀效果之間的反差如此之巨大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出了偏差呢？爲甚麼「階級鬥爭」一抓不靈了呢？爲甚麼大亂達不到大治呢？爲甚麼理論與實際之間出現了如此巨大的脫節呢？「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毛澤東，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不得不低下頭，他感到深深的挫折和失敗。毛澤東失望了。

「九·一三」以後，毛澤東的身體健康一下子垮了下來。他老病交加，身體日衰。命運已不再給他「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時間和機會。面對着國內動蕩不安的政治局勢，面對着被文化大革命破壞得支離破碎、已處於崩潰邊緣的國民經濟，面對着十億人民那殷切的目光，毛澤東既感到焦急、不安、歉疚，又深感無可奈何，無能爲力。一方面是壯志未酬，壯懷激烈，另一方面又時日無多，回天乏力，兩者之間的巨大矛盾，令毛澤東感到無比的激憤，又令他陷入深重的失落與悲痛之中。那個「人人平等、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互助友愛」的理想王國，毛澤東爲之奮鬥了終生的理想社會，變成了永遠的夢想。毛澤東幻滅了，絕望了。

林彪事件能造成如此廣泛、巨大與深遠的影響，這是毛澤東作夢都想不到的。即使像毛澤東這樣的身經百戰的政治鬥士，也經受不了這種震撼性的、毀滅性的打擊。「人哀莫大於心死」。毛澤東的精神支柱坍塌了，他的生命之燈，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三、大病

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達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說：「林彪的策劃武裝政變和死亡，對毛無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擊」。「毛的體質上有了驚人的變化。在林彪的黨羽陸續被逮捕，毛的安全確定後，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運動時那樣，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憂鬱。毛說話變得少了，無精打采，一下子蒼老了許多，步履遲緩，站起來的時候背駝得明顯，睡眠更加紊亂。」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大金剛，毛澤東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下令逮捕的。隨後，毛澤東也從人民大會堂搬回中南海游泳池居住。

很快地，毛澤東又生病了。

李志綏說：「長期以來，他的血壓保持在高壓一百三十毫米汞柱上下，低壓在八十毫米汞柱上下。這時，偶爾高壓上昇到一百八十，低壓則爲一百。兩個小腿和兩腳都有輕度浮腫，在足踝處可以看到很清楚。感冒、咳嗽、濃痰不斷。胸部聽上去，滿是囉音。肺部顯然有反覆的感染。痰培養沒有特殊的致病細菌，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細菌。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爲減低，對正常人不會致病的菌類，在毛的肺上卻引起了感染。心臟雖然沒有雜音，但有時有心律不齊。」

十一月二十日，北越總理范文同到北京訪問。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接見了越南的代表團。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毛澤東，兩條腿像是兩條木棍子似的在挪動，舉動僵硬、遲緩，龍鍾老態畢露。毛澤東一下子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進入冬天，毛澤東肺部的感染越來越厲害，醫生建議打針，但毛澤東不同意，只同意口服抗生素。然而，毛澤東在牀上抑鬱終日，沉思默想，對藥物只是吃吃停停，病厲害時吃，稍一減輕就又停止。這種情形無異於鍛煉細菌對抗生素的抵抗力，使肺部感染更加不受控制。毛澤東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參加完陳毅的追悼會後，由於勞累、風寒，也由於悲傷、悔恨，毛澤東病倒了。

李志綏說：「回來以後，明顯的肺部感染加重，而且有了低燒。我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拒絕了。只好口服抗生素。病狀沒有一絲好轉，兩腿浮腫越來越厲害，肺部囉音滿佈，心律不齊增加……毛已經不能平臥，只能靠在沙發上入睡，而且有時迷迷糊糊，好像時醒時睡。」

得知毛澤東病重，有一天，周恩來和江青來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對周恩來說：

「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恩來立即打斷毛澤東的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

毛澤東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就這樣定了，你們走吧！」

一月十八日中午，毛澤東的脈搏突然跳到每分鐘一百四十下，神志不清。李志綏立即打電話向周恩來和汪東興報告：毛澤東的情況已很危急，再有突然變化，就會措手不及。

周恩來立即決定成立醫療組，任命李志綏爲組長，並從北京各大醫院調來一批專家，加入醫療組，進駐中南海。這時的毛澤東，呼吸急促，其聲音就像在拉風箱一樣，痰鳴很響，咀唇周圍發靑，終日閉着眼睛，坐在沙發上半睡半醒。

二月一日中午，毛澤東咳嗽起來，但是咳嗽無力，不能將濃痰咳出來。痰堵在喉嚨中，呼吸急促，

一下子昏死過去。

李志綏說：「大家立刻將毛的上身扶起，胡旭東（醫療組醫生）用拳連續猛叩左前胸，叫喊『主席、主席』。胡的叩擊過猛過重，毛年紀大了，很容易造成肋骨骨折。我担心他的慌張失措會引起其他在場非醫務人員的混亂。我馬上打電話到門診部，叫急救人員帶着氧氣瓶、呼吸器和吸痰器來游泳池，同時給毛做靜脈輸液，加上呼吸和心臟急救藥物，並且加入激素，緩解氣管痙攣，提高身體的應激能力。

「十幾分鐘後，還不見尙法延等急救人員來到。我趕到游泳池外，向門診部跑去。外面正下着大雪。到了門診部前面，這些人正在等車。我急了，叫他們隨我跑回去。

「趕到游泳池書房內，毛還沒有清醒，喉中的痰仍卡在那裏。尙法延用吸痰器插入喉部，開動馬達，將痰吸出，然後給毛戴上面罩，按上呼吸器。

「痰出來以後，毛睜開了眼睛，立即用手扯面罩，說：『你們幹甚麼？』我問他怎麼樣，毛說：『我像是睡了一覺。』

「毛昏死後，汪東興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周恩來一聽到這個消息，當場嚇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褲子裏。等到周恩來換好衣服趕到游泳池，毛澤東已清醒過來。」

這時，距離林彪叛逃的日子，還不到五個月。

四、女孩子們

一九六三年五月，解放軍空政文工團的舞蹈演員孟錦雲，這個來自湖北省武漢市的十五歲女孩子，有幸被調派來中南海春藕齋陪伴首長們跳舞。她的第一隻舞的舞伴，就是偉大的領袖毛澤東。這位年輕貌美，天眞無邪的姑娘，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年以後，一九六七年，中國已進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孟錦雲所參加的造反派，在空軍被打成「保皇派」，心有不忿，便和其他幾位曾經進過中南海的女孩子，一起去找毛澤東反映空軍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毛澤東十分高興地接待了這幾位當年的舞伴，笑呵呵地聽着她們的紛爭和投訴，然後寫了一紙手令，讓她們去找葉群。

持有毛澤東的聖旨，葉群和吳法憲很快便設法解決了她們的投訴。可是，孟錦雲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葉群和吳法憲。於是，這位造反派在一夜之間便被逮捕、下獄、判刑，最後被下放到農村勞動。

「九·一三」以後，林彪、葉群、吳法憲倒了大楣，有一位叫小麗的女孩子才敢將孟錦雲的遭遇報告給毛澤東。於是，毛澤東說：「聽說你們空軍抓了孟錦雲，趕快放人，她沒有過錯嘛，她告吳法憲有甚麼錯？」

「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孟錦雲很快被釋放了。但空軍當局將孟錦雲送回老家武漢，被安排做護士。

為了討回一個公道，一九七五年，孟錦雲來到北京，又遇到了小麗。經常出入中南海毛澤東住處的小麗，門路嫻熟。她把孟錦雲帶到府右街中南海的北門，向警衛說要見毛主席，那位警衛向毛澤東辦公室掛電話，不一會，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便回電話，說毛主席同意接見。兩位女孩子便十分輕易地走進了這個中國最神秘的政治中樞。

毛澤東自一九六七年遷入的新居「游泳池」，外面有一道高大厚實的鐵門，進來後又要經過重重的門廊，才到達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這時雙眼已視力模糊，他一邊握着孟錦雲的雙手，一邊聽着她的投訴。毛澤東說：「你就不要走了，留在我這裏工作。」於是，孟錦雲不但得到正式的平反，還被留在游泳池，擔任毛澤東的護士。

晚年的毛澤東，衆叛親離。

經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戰友、同志們，對他都敬而遠之，尤其是在林彪事件後，人們對他更加疏離。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委員們以及其他領導人，很少或根本不來毛澤東的家裏作客或請示會報工作。談工作，請示報告，多半是用文件、書信的方式進行。只有周恩來是例外，有時會找毛澤東面談工作——但這樣的次數也極為稀少，更多的只是用電話聯絡。至於其他的領導人，連與毛澤東通電話的機會都沒有。

「九·一三」事件以後，毛澤東逐漸淡出中國政壇。他讓周恩來，後來是鄧小平、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雖然他仍在幕後操縱，大權在握，但毛澤東已甚少出席中央會議。自一九七三年「十大」以後，毛澤東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有記錄的只有兩次，一次是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另一次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兩次都是為了批評江青。經過那麼多的鬥爭之後，毛澤東似乎已厭倦了。

中共的高層領導人疏離毛澤東，連李敏、李納、毛岸青等子女親屬，來中南海探望毛澤東的時候也不多。只是在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生日這一天，子女們才前來，也是略坐一會便離開了。

游泳池住宅的核心，是毛澤東的臥室，能出入毛澤東臥室的只有秘書張玉鳳和護士孟錦雲兩人；次一級的是毛澤東的客廳兼書房。能出入客廳的只是毛澤東身邊的理療、打針的護士，送飯、理髮、洗衣、打掃衛生、管理圖書、保管存款的工作人員，約四、五人。不管是誰，上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下至普通老百姓，不論是請示談論工作、決定國家大事，還是私人探訪，親朋好友日常往來，即使是妻子江青和其他子女，要想見毛澤東，都必須先報告毛澤東辦公室，由外邊的工作人員打電話或送紙條進來，紙條便放在臥室外面的客廳裏的桌子上，再由張玉鳳或孟錦雲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同意或不同意見，再由張玉鳳或孟錦雲傳出來，然後一道道傳到外面。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在毛澤東的住處，偌大的臥室、客廳裏，經常是一片寂靜，瀰漫着「一種鬱鬱寡歡，寂寞孤獨的氣氛」。「那寬敞的客廳，一年四季都是窗簾垂地，紫紅色的厚重的天鵝絨窗簾極少拉開，總是遮得嚴嚴實實，外面的風霜雨雪，春花秋月，似乎與這裏毫無關係，那厚厚的紫紅色的絨毛地毯，也永遠是一塵不染」。「在這寬大的客廳裏，有時也聽到一些議論、談笑，這大半是毛澤東與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與他很少的客人之間發生的」。而毛澤東更多的是在沉思，十分深沉地思索着甚麼。這時，整座游泳池大宅，便如墳墓一般的寂靜，靜得彷彿一切都已睡着。

能夠經常出入毛澤東住宅的，只是些年輕貌美的女孩子，她們多是毛澤東當年的舞伴，任職北京解放軍各個文工團的演員，以及由她們引來的姐妹或朋友。在這段時間裏，能經常出入毛澤東寓所的還有英文翻譯王海容和唐聞生，她們也是年輕的姑娘。

於是，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中共中央的黨政軍高級領導人，難得見到毛澤東一面，可是這些年輕的女孩子，卻可以隨便出入毛澤東的寓所，陪伴毛澤東聊天、說笑、吃飯。那些手握重權、地位顯赫的領導幹部，如有甚麼事情要向毛澤東進言，往往就要托請這些年輕的女孩子傳送口訊或書信。江青、康生這樣做過，連周恩來也都這樣做過。毛澤東的同鄉兼朋友、詩人蕭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揪鬥、批判，被整得死去活來。後來，他探聽到門路，托了一位空政文工團的演員小李的妹妹，捎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後馬上表態，要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負責覆查。一代詩人蕭三，便是藉着一位小姑娘，才得以逃出鬼門關。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後一個生日。這一天，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納來了。她們平時很少來看望父親。但每逢父親生日，那是一定來的。她們都帶來了對爸爸的祝福。「要說毛澤東這一天最高興的時候，還是以前的護士長吳旭君、護士俞雅菊、李玲師到來的時候」。這天晚上，能陪毛澤東一起吃飯的，也只是她們三人，加上張玉鳳、孟錦雲，共五個姑娘。

從這些年輕美麗的女孩子的身上，毛澤東似乎看到了自己逝去的青春和美好的歲月。與她們在一起，毛澤東似乎覺得自己也增添了生命的活力，死氣沉沉的游泳池寓所，似乎也變得美麗起來，生動起來，增添了生氣與活力。衰老的毛澤東似乎由此得到短暫的快樂。

纏綿不去的病痛，內心的絕望與痛苦，再加上由於衆叛親離而造成的孤獨與寂寞，使得毛澤東的黃昏歲月充滿了無限的淒楚和悲涼。毛澤東經常臥牀不起，蓬頭垢面，胡子拉茬。孟錦雲眼中的偉大領袖，成爲「穿着白色的肥大的睡衣，頭髮七零八亂，臉色黃中透灰的老態龍鍾的人」。

當年叱咤風雲，指揮千軍萬馬馳騁疆場的最高統帥，當年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數風流

人物，還看今朝」的激烈情懷，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了。毛澤東變得關注孟錦雲、張玉鳳這些女孩子穿甚麼衣裙，剪甚麼髮型。有一次，孟錦雲穿了一件米黃色的裙子，毛澤東用審視的目光看着她，然後搖搖頭說：「這條裙子顏色不好看，你去做條紅裙子吧，玫瑰紅的，算是我送你。」當孟錦雲穿上由毛澤東掏腰包做的這條玫瑰紅的裙子時，毛澤東那已顯得灰暗的眼睛裏放出了光彩，說：「我就喜歡這樣的玫瑰紅，好看。」

有一次，張玉鳳和孟錦雲要去理髮，毛澤東建議說：「剪短短的，前面有留海，後邊齊齊的那種樣子很好看」。可是，張玉鳳和孟錦雲在北京飯店做了時下流行的電燙頭髮，回來後毛澤東不悅地說：「你們就是不聽我的話。」

這時期的毛澤東，還喜歡看香港、台灣拍的電影。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其情調庸俗、無聊，多是描寫小市民那種瑣瑣碎碎的情愛、家庭的生活，在今天被稱爲「粵語殘片」。然而毛澤東卻看得津津有味，儘管重病在身，但還是天天照看不誤，常常搞到深夜兩、三點鐘。毛澤東還喜歡看《遊園驚夢》、《新局長到來》、《錦上添花》、《廢品的報復》這類喜劇片子，看到趣處，笑得前仰後合。在這些庸俗的笑料中，毛澤東可以暫時忘卻自己的失敗和痛苦。

一九七六年春節，毛澤東請護士長吳旭君吃飯。飯前看了一場電影。那是達式常主演的《難忘的戰鬥》。那是描寫解放戰爭的一部影片。那遙遠的共和國誕生之前的波瀾壯濶的鬥爭，又牽動了毛澤東心靈中的傷痛，他在悄悄地流淚。當銀幕上出現人民解放軍入城受到群衆學生熱烈歡迎的鏡頭時，毛澤東問吳旭君：「那歡迎的學生裏有你嗎？」吳旭君是上海學生，當年她確實是在歡迎之列。吳旭君流淚點點頭，一句話也說不出。

這時，毛澤東淚如泉湧，再也無法控制，全場哭成一片。不等電影結束，醫護人員趕緊把毛澤東攙扶走了。

正是：「鳳雲閣下奇兒在，古角燈前老淚多」。毛澤東說：「這兩句詩正表達了我此時的心境」。

除了那幾個女孩子，毛澤東已經沒有可資談話的朋友，更沒有能夠推心置腹的知交。過去，毛澤東不時將一些文人學者召來，如上海的周谷城等，說古論今，吟詩誦賦，其樂融融。即使是日常身邊，也還有秘書田家英等人，可以聊天論政。現在，這些人都被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刮個七零八落，死的死，散的散。不死不散的，毛澤東亦無顏見江東父老。因此，毛澤東的社交活動，幾乎是絕跡了。

為了打發時間，遣遣愁情，毛澤東便將身邊的女孩子聊以充數，和她們談史論詩。經常侍奉在毛澤東身邊的只有張玉鳳、孟錦雲兩人。張玉鳳不學無術，孤陋淺薄，又欠缺修養，充滿小市民那種庸俗氣，於是，毛澤東便選中了孟錦雲，刻意培養她充當自己的談話對象。然而，孟錦雲中學還沒畢業就參軍當兵了，文化水平不高，對文史詩詞的涉獵就更加有限。毛澤東出口成章，滿口是歷史典故，三朝佚事，聽得孟錦雲滿頭霧水，不明所以。毛澤東便鼓勵和指導她讀唐詩，讀《資治通鑑》，然後叫孟錦雲講體會，提問題，毛澤東便一一解答。兩人如此交談，猶如一名飽學的鴻儒，輔導一名剛啓蒙的學生。孟錦雲與周谷城、田家英不可同日而語，其交談的情趣也就有雲泥之別。但正是「濫竽充數，聊勝於無」，這就是毛澤東最後的一點精神生活。

毛澤東向孟錦雲說：「你下了班可以和家裏人，和朋友到大街上轉轉，我可就沒有這個自由噢……你們可以隨便聊天，但和我談話的人，大都是有顧慮的，這點，我看的出來。人都是好人但話未必是眞話，難得口吐眞言吶……人家說話總要負責，還得對後果負責嘛，你和同志探討點問題，發表點見解，

甚至一句玩笑的話，傳出去，成了『最高指示』，有人還以此大作文章，鬧得你哭笑不得。」這正是「高處不勝寒」哪，毛澤東孤獨寂寞的情懷，躍然紙上。

毛澤東當了一輩子的偉大領袖，發了一輩子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到現在才大徹大悟，羨慕起草根百姓的尋常生活。這也是毛澤東從另一個方面，從另一個角度對自己的一生做的一個總結。

五、不治之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大」在北京開幕。毛澤東出席了開幕式的大會。散會時，代表們全體起立鼓掌，要歡送毛澤東等領導人先行退場，這是合乎慣例的、應有的禮儀。然而，毛澤東幾次試著站立起來，都沒有成功。毛澤東不願意在全國各地的代表面前暴露自己的病情老態，便坐在椅子上不動。全體代表見毛澤東坐着不動，便繼續高呼口號，熱烈鼓掌；而主席台上的幾百名領導人，見到毛澤東不動，便也不敢動，只好站起來與代表們一起鼓掌。場面越拖越久，越來越尷尬。毛澤東只好對着麥克風說道：「請同志們先走！」但代表們堅持要歡送自己的偉大領袖先走，高呼道：「請毛主席先走！」毛澤東又說：「請同志們先走！」台下的代表們以爲這是毛澤東「偉大的謙虛」，群情更加激昂，「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喊得更加起勁。毛澤東與代表們對峙，台上台下對峙，情況越來越尷尬。周恩來見狀，立即走到後台，與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商量怎麼辦，護士長吳旭君說：毛主席根本

站不起來，可向代表們說主席要目送代表們退場。周恩來立即去到麥克風前宣布：「毛主席要目送同志們退場後，他再回去。請同志們立即退場！」代表們這才陸續退場。之後，醫護人員才將毛澤東攙扶離開。

一九七二年大病之後，經過醫生們的搶救和治療，毛澤東的病好轉了。二月二十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美國總統尼克松，又在九月接見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可是，大病後的毛澤東身體衰弱，肌肉萎縮，尤其是右側很厲害，行動都要人攙扶。兩腿和雙手沒有力氣，有時候會自發地顫動，口水也多了，嘴巴常常合不上，口水常常流出來。後來，除了體力衰弱、呼吸急促、視力模糊之外，說話聲音逐漸低啞，口齒逐漸不清，而且體質越來越虛弱，稍微活動一下，就喘個不停，嘴唇發青。

「進入一九七四年後，毛澤東雙眼的視力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與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見了。說話也不清楚，舌頭似乎運轉不靈，即使相當熟悉的人，也聽不清他在講甚麼。嘴經常半張着，嘴唇很少閉攏。兩手兩腿，特別是右側，更加無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明顯萎縮。」

醫療組組長李志綏請來兩位精神內科的專家為毛澤東檢查。他們原以為毛澤東可能是患有柏金森氏症，或者是輕型中風。但是檢查以後，他們認為是一種罕見的運動神經元病，在西方稱之為肌肉萎縮症，其大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運動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死亡。據外國文獻記載，這種病如侵犯到喉、咽、舌部分，最多只能活兩年。而毛澤東的病情已達到上述階段，他的右側會持續癱瘓，由於喉、咽、舌癱瘓，不能吞嚥，不能正常飲食；到最後階段，完全無法吞嚥，主管呼吸的橫隔膜和肋間肌肉麻痺，病人無法呼吸，全身衰竭而死亡。這種病沒有任何有效的治療方法，只能稍微

延長病人的生命。這是一種罕見的絕症。

醫療小組將病情寫成一份詳細的報告，並附有圖表解說，但沒有說這是絕症，呈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看了報告之後，很不高興。他說：醫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嚇唬別人，也嚇唬自己，起不了好作用。毛澤東認爲自己沒有大的毛病，說一九六五年春天在武漢曾因受涼引起聲帶發炎，說不出話來。李志綏向毛澤東解釋，這次的病情不同，但毛澤東不相信，他只同意眼科檢查。因爲眼疾而不能看書，令他十分痛苦。

這年秋天，毛澤東在武漢接見菲律賓總統馬可斯的夫人伊美黛，由李先念陪同，王海容和唐聞生也來了。人們發現毛澤東口齒不清，常流口水，動作僵硬，但精神尚好。當李志綏向他們介紹，毛澤東已患了重病時，唐聞生說：主席是個怪人，得了這麼一個怪病。

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澤東離開武漢，移居長沙，住在省委九所六號樓。

在湘期間，毛澤東多次接見外賓，接見周恩來、鄧小平，王洪文等人，解決四屆人大的任命人選問題。

毛澤東想通過鍛煉身體、增強體質來戰勝疾病。於是他提出要游泳。可是，一下到水裏，只要他的頭一沒入水中，立刻便咳嗆不止，臉脹得通紅，要由陪同游水的警衛人員攙扶上來。毛澤東下了幾次水，結果都不好。毛澤東只好放棄了。

毛澤東酷愛游泳，中國的許多江河湖海，他都暢游過。中國的第一大河長江，毛澤東先後游了二十一次。這一次毛澤東希望通過自己最拿手的運動游泳來鍛煉身體，但未能如願以償。毛澤東灰心了，覺得自己眞的老了。放棄游泳後，他又大部份的時間躺在牀上，而且只能左側向下側臥，否則就會呼吸困

難。由於臥牀的時間長，左邊骨盆凸出的地方皮膚被壓破了，形成褥瘡。每每一處愈合了，另一處又破損。這些褥瘡直到毛澤東逝世時都沒有消失。

毛澤東還抽空去了橘子洲。那是一個雲層低厚的陰霾的早晨，江濤洶湧，北風蕭殺。毛澤東想下汽車，但工作人員說：「主席，風太大了，你會着涼的。」毛澤東猶豫了一下，終於沒有下來。工作人員撩開車窗簾，毛澤東就坐在車上四處眺望。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户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毛澤東：《沁園春·長沙》）

四周的景物是那麼的熟悉而親切。江，還是那樣的碧透；山，還是那樣的紅遍。湘江滔滔，岳麓巍巍，江對岸便是母校湖南第一師範。當年的青春、求學，還有與楊開慧的初戀，都一一湧上毛澤東的心

頭。歲月流逝得多麼快喲，往昔那美好的時光，彷佛就在眼前。那時候，與蔡和森、蕭子升他們，爬山，游水，遠足，「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正是這塊湘楚大地，孕育了這位一代偉人。

毛澤東久久地凝望着它們，神情莊重，一聲不響。江山依舊，斯人獨憔悴。毛澤東心中感覺到，這恐怕是投向大地母親的最後一瞥了。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澤東離開長沙。臨走之前，他曾向湖南省的領導人許諾，到秋天時再回來。可是，當岳麓山上的楓葉又被濃霜染紅時，毛澤東卻沒有回來。一九七六年八月，病重中的毛澤東提出要回韶山。於是滴水洞重新開放，準備迎接他。然而，毛澤東這時已不能移動了。

毛澤東再也沒有能夠回到這塊孕育他的土地。

六、悲歌

毛澤東一生喜愛古典詩詞，愛讀詩，愛寫詩，詩言志，歌咏心。步入黃昏歲月後，詩是寫不出來了，讀詩的興趣卻是依然不衰。只是毛澤東這時誦吟的，已不再是唐代三李那些豪放、熱情而浪漫的篇章了。毛澤東這時更鍾情於辛棄疾、張元干、岳飛、陳亮等人的作品。毛澤東經常吟誦的作品有北宋詞人張元干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

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

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

還有宋人張孝祥的《六州歌頭。長淮望斷》：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夢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羶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

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辛棄疾的名作《南鄉子·何處望神州》，《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菩薩蠻·書江南造口壁》等，都是毛澤東晚年經常吟誦的篇章。

岳飛的《滿江紅》尤其獲毛澤東喜愛。當毛澤東因眼疾無法看書時，他叫身邊的工作人員集體朗誦這首詞，還經常播放專爲毛澤東錄制的、由上海昆曲劇院演員岳美緹演唱的《滿江紅》唱片。一九七五年，眼科醫生唐由之爲毛澤東作白內障摘除手術，毛澤東又叫工作人員播放這張唱片，一邊聽一邊作手

術：「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這些歷史上愛國詩人的作品，它們所表達出來的力透紙背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英勇豪邁、慷慨激昂的氣概，令毛澤東十分神往；另一方面，這些作品中所透露出來的難以壓抑的烈士暮年、壯志未酬，撫今追昔，心事浩渺的抑鬱、蒼涼的心境，又使毛澤東感同身受，引起強烈的共鳴。毛澤東在吟誦這些作品時，常常以手擊拍，老淚盈眶，身心全神投入，直抒鬱結在心中的哀傷、悲痛的感情。

毛澤東不甘心如此退出生活的舞台、政治的舞台、社會的舞台、歷史的舞台，他不甘心奮鬥了畢生的革命事業半途而廢，不甘心畢生的夢想化爲煙雲。還有多少事情需要繼續去奮鬥啊，然而歲月不饒人。毛澤東在老病交加之間，不但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而且直覺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日子已經不多。毛澤東抱着深深的遺恨，等待着最後的日子的到來。

在黄昏歲月中，毛澤東吟誦得最多的是北朝庾信作的《枯樹賦》：「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這似乎就是毛澤東晚年內心世界的寫照。

一九七六年，有一天，毛澤東讓秘書張玉鳳找來《枯樹賦》讀給他聽。毛澤東躺在牀上，張玉鳳讀得很慢，毛澤東閉着雙眼，留心地聽着，似乎在細細品味着賦中描述的思想境界，回顧着自己的一生。毛澤東讓張玉鳳一連讀了兩遍，接着自己又背誦了兩遍。雖然那時發音已困難，但毛澤東還是費力地，一字一句地吟誦。情緒綿綿，感慨萬千，如泉似湧，不可抑止。

後來，毛澤東還常常吟誦這首賦，直到他不能講話爲止。這是毛澤東誦讀的最後的一首詩賦。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最後一個生日。在這一天，毛澤東又重覆了他時常說的一句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每當他說起這句中國古老的民諺時，他漠然的外表下，掩藏着不盡的悲傷。在中國政壇上，毛澤東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然而他卻不能抗拒死亡這個自然規律。由於有太多的遺憾，太多的憤慨，毛澤東似乎不能如尋常人一般平靜地面對死亡。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護士孟錦雲給毛澤東讀報：「新華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電：最近，在我國東北吉林省地區降落了一次世界歷史上罕見的隕石雨。今年三月八日下午，宇宙空間一顆隕星順地球繞太陽公轉的方向，以每秒十幾公里的速度墜入地球大氣層中。由於這顆隕星與稠密的大氣層發生劇烈的摩擦，飛至吉林地區上空時，燃燒、發光，成爲一個大火球，於八日十五時零一分五十九秒在吉林市郊區金珠公社上空發生爆炸。隕星爆炸後，以幅射狀向四面散落。」

毛澤東聽着聽着，慢慢地坐了起來。以往聽讀報、聽文件時，毛澤東都是躺在牀上靜靜地聽着，神情淡漠，很少發表甚麼意見，也很少改變自己或臥或坐的姿態。所以孟錦雲感到，毛澤東對給他讀的東西，多半沒有甚麼興趣。然而，這一次毛澤東聽得全神貫注。孟錦雲感到奇怪，忙放下報紙，準備去問毛澤東有甚麼事。但毛澤東用手勢制止她，並說：「讀下去，我在聽。」

孟錦雲繼續讀道：「大量碎小隕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區……最大的三塊隕石，每塊重量超過了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塊重量爲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過了美國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隕石的重量（一千零七十八公斤）。這次隕石雨無論是數量，重量和散落的範圍，都是世界罕見的……。」

孟錦雲讀完這段新聞，準備開始讀另一段新聞。毛澤東馬上制止，說：「小孟，就讀到這裏吧，不用再往下讀了。」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穿上了拖鞋，在孟錦雲的攙扶下，慢慢地走到窗前。毛澤東被一種情緒籠罩着，臉上出現一種思慮、不安和激動。毛澤東讓孟錦雲將常年拉上的窗簾打開（這又是一個罕見的舉動）。毛澤東站在打開的窗前，望着那夕陽西下的天際，望得十分出神，望了很久很久。

後來，毛澤東問孟錦雲對「天降隕雨必有人逝」有甚麼想法，孟錦雲說那是迷信，瞎說。可是，毛澤東說：「我是相信噢，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甚麼大變動，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們預報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搖地動，天上掉下大石頭，就是要死人哩。《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趙雲死時，都掉過石頭，折過旗桿。大人物，名人，眞是與衆不同，死都死得要有聲有色，不同凡響噢。」

毛澤東說這番話時，帶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動。之後，他不止一次地站在窗前，望着漸漸昏暗下來的天空，久久地沉思着。

毛澤東預感到自己的最後的日子來臨了。

七、殞落

毛澤東的病情日趨嚴重。

一九七五年一月，醫療小組召集各方面的專家，為毛澤東進行綜合檢查。毛澤東有如下病症：運動神經元病，兩眼白內障，冠心病，肺心病，兩肺底部有炎症，右肺有三個肺大泡，左臂部褥瘡，血液中

含氧量過低，還伴有低燒，很厲害的咳嗽。

二月十五日，在人民大會堂，醫療小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了毛澤東的病情。這表明，毛澤東的病情已進入了晚期，需要向中共高層領導人正式通報，以便有所準備。

到一九七五年夏天，毛澤東的身體更加衰弱，站立起來都很困難。連續吸氧時，只要稍有停頓，就立即出現缺氧症狀。呑嚥已十分困難，咳嗽、痰、氣喘加重，每晝夜二十四小時排出尿量不足五百毫升。

周恩來多次指示醫療小組，要想方設法延長毛澤東的生命。但群醫束手無策。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毛澤東出現第一次心肌梗死。雖然搶救及時，逐漸緩解，但毛澤東的情況迅速惡化。咽喉麻痺，已經完全不能夠呑嚥食物和液體。

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第二次出現大面積的心肌梗死。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以及張春橋、王洪文、汪東興四人開始在毛澤東住處輪流値班。此後，毛澤東多次昏死，多次搶救，一步步地向死亡走去。

九月二日下午，毛澤東又出現新的心肌梗死，全身狀況已經臨近衰竭。

九月七日，毛澤東病情進入垂危狀態。政治局委員們一直守在毛澤東的身旁。看到毛澤東睜開了眼睛，委員們一個個上前問候。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吳德、倪志福，許世友……一一地在毛澤東面前走過，毛澤東只是似看非看地望着他們，無動於衷。但當葉劍英從他身邊走過的時候，毛澤東卻抬起了那只顯得又沉又重的胳膊，他的手顫顫地擺動了幾下，嘴唇微微地動了一下，細微得讓人難以發覺。葉劍英走近毛澤東身邊，俯下身子，低頭望着毛澤東，毛澤東的眼睛忽然明亮起來，但他的嘴巴已是力不從心。只見他的嘴唇張翕着，卻很難聽出他的聲音。葉劍英拉着毛澤東的手，緊緊握着，頻頻地向他

點頭。

九月八日，毛澤東進入彌留狀態。醫療小組全力搶救。醫療小組的負責人李志綏握着毛澤東的手，說道：「主席請放心，我們有辦法。」這時，有一痕紅暈在毛澤東兩頰出現，雙眼頓時露出了剎那的光采。接着他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雙眼合下來，右手無力地從李志綏的手中脫落，心電圖示波器上呈現出一條毫無起伏的平平的橫線。李志綏看看腕上的手錶，正是九月九日零時十分。享年八十三歲。

這一天距林彪在溫都爾汗的墜落，僅僅只是五年。

自此，中國現代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進入了嶄新的發展時代。

參考書目

《毛澤東選集》　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文集》　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年譜》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　劉思齊主編，中國書店
《朱毛紅軍側記》　蕭克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朱德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
《朱德年譜》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年譜》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
《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權延赤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陳毅傳》　當代中國出版社
《羅榮桓傳》　當代中國出版社
《探索》　羅英才、石言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　黃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
《彭德懷傳》　當代中國出版社

《烏托邦祭》 蘇曉康、羅時敘、陳政著
《彭德懷自述》 人民出版社
《大動亂的年代》 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曲折發展的歲月》 曲進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雪白血紅》 張正隆著，大地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葉群》 官偉勛著，中國文學出版社
《陳伯達傳》 葉永烈著，作家出版社
《江青傳》 葉永烈著，作家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毛澤東自述》 人民出版社
《紅星照耀中國》 埃德加·斯諾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林彪的這一生》 少華、游胡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林彪一九五九年以後》 四川人民出版社
《喋血平型關》 李人毅著，春風文藝出版社
《毛家灣紀實》 張雲生著，春秋出版社
《林氏兄三弟》 汪幸福著，新華出版社
《廬山會議實錄》 李銳著，春秋出版社
《譚震林外傳》 董保存著，作家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毛澤東在一九三四——一九三六》 葉心瑜著，新華出版社
《歲歲重陽》 舒龍、凌步機著，海南出版社
《毛澤東的黃昏歲月》 郭金榮著，天地圖書出版社
《毛澤東回湖南紀實》 湖南出版社
《何長工回憶錄》 解放軍出版社
《林彪評傳》 李天民著，明報月刊出版社
《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 蕭三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毛澤東軼事》 張玉鳳等著，湖南文藝出版社
《說不盡的毛澤東》 遼寧人民出版社
《龔楚將軍回憶錄》 明報月刊社
《星火燎原》 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中國青年》 雜誌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林彪与毛泽东
作者=冯治军著
页数=716
SS号=11008198
出版日期=1996年08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篇　殊途同归井冈山
第一章　「红色世家」中的「怪伢」
第二章　懒惰反叛：毛泽东走出韶山冲
第三章　林彪：南昌起义——艰苦的旅程
一、南昌起义
二、林彪没有赶上南昌起义
三、「红军之父」
四、林彪的危机
五、湘南暴动
第四章　毛泽东：秋收起义惨败
一、「烟雨莽苍苍」
二、「八·七」紧急会议
三、与中共中央的争执
四、仓促准备　起义惨败
五、走上井冈山
第二篇　斗争朱德——毛林第一次结盟
第一章　「朱毛」与「毛林」
一、朱毛起先无意会合
二、毛泽东不欢迎朱德上井冈山
三、井冈山并非理想的革命根据地
四、毛林相遇在井冈
第二章　朱毛斗争
一、朱毛分歧
二、毛林结盟
第三章　朱德一生最大的污点：「八月失败」
一、「八月失败」
二、谁之罪
第四章　朱毛斗争升级
一、朱毛再会合　重返井冈山
二、朱毛斗争的最大得益者——林彪
三、朱毛争执不休
四、井冈楚歌
五、毛路线失败　红军撤离井冈山
第五章　赣南烽火
一、东征赣南　林彪备受考验
二、朱毛斗争再起烽烟　毛泽东愤然辞职
三、患难见真情　毛林情深
四、毛泽东复出　朱毛斗争下帷幕
第三篇　林彪——最值得研究的人

第一章　一代名将
一、「战将」
二、善於带兵
三、讲究战术谋略
四、擅长伏击战
五、多思善谋
六、不打「官僚主义仗」
七、「要打违抗命令仗」
八、善於总结经验
九、独创战术与大练兵
第二章　林彪：在庐山崛起
第三章　林彪：从未迷信毛泽东
第四章　林彪心中的毛泽东
第五章　林彪与政治
第六章　语言专家
第七章　「勉从虎穴暂栖身」
第八章　林彪的「病」
第九章　林彪如何办公
第十章　「苦行僧」
第十一章　林彪与叶群
第十二章　林彪与子女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毛林再度结盟
第一章　毛林交易　打倒罗瑞卿
一、毛泽东的影子
二、林、罗：由战友变敌人
三、毛泽东：舍将取帅
第二章　投桃报李　《文艺纪要》出笼
一、「文化大革命」的来历
二、总导演——毛泽东
三、江青驾临苏州请「尊神」
四、刘志坚的上海之行
五、毛泽东亲自挂帅
六、林彪默认「委托」
第三章　毛泽东钦定「接班人」
一、不寻常的「十一中全会」
二、林彪坚辞「接班人」
三、毛泽东的选择
四、林彪生平仅有的一次谦虚
第四章　「二月逆流」
一、毛泽东的辩白
二、「大闹怀仁堂」
三、告御状
四、谭震林向林彪诉心曲
五、江青再请「尊神」

六、毛泽东震怒
七、谁是罪魁祸首
第五章　毛林勾结之一　打倒刘少奇
一、「天机」
二、「表忠心」　林彪整刘少奇黑材料
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四、江青设立专案组
五、欲加之罪
六、刘少奇之死
第六章　毛林勾结之二　迫害贺龙
一、迟开的追悼会
二、访苏惹祸根
三、林贺之间的恩怨
四、罗织罪状
五、贺龙蒙难
六、毛泽东的「平反」
第七章　林彪与江青
一、互相利用
二、互相吹捧
三、林、江冲突
四、勾心斗角
五、裂纹
第八章　名不符实的「副统帅」
第五篇　分道扬镳——「林彪事件」
第一章　毛林关於「国家主席」之争
一、「九大」以後
二、「林彪阴谋论」
三、「毛泽东阴谋论」
四、是毛泽东首先向林彪发难
五、「不设国家主席」是错误的
六、「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证据不足
七、「不设国家主席」的奥秘
八、「孙权与曹操」
第二章　庐山风云
一、久违了庐山
二、两天半的发难
三、「突然袭击」
四、「反党集团」
五、「第十次路线斗争」
第三章　最後的较量
一、毛泽东：事情没有完
二、紧急收缩的毛家湾
三、「抓住不放」
四、「讨嫌」

五、扑朔迷离的日子
六、拙劣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七、「南巡讲话」
八、叛逃
第六篇　残阳如血
第一章　林彪在那里
一、「九・一三」
二、乌兰巴托的急电
三、周恩来命令：大使亲到现场
四、机毁肇因的探讨
第二章　毛泽东战略退却
一、举国震惊
二、林彪：替罪羔羊
三、重提「朱毛」
四、批不起来的「批林整风」
五、伪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六、毛周交易：「伍豪事件」
第三章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一、毛泽东没有看透林彪
二、失望与绝望
三、大病
四、女孩子们
五、不治之症
六、悲歌
七、殒落
《参考书目》